



**A STUDY ON
SINGAPORE DIASPORIC CHINESE WRITERS
1945–1980**

**新加坡离散华文作家研究
1945–1980**

**SUN HUEY MIN
孫惠敏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2022**

**A STUDY ON
SINGAPORE DIASPORIC CHINESE WRITERS
1945–1980**

**新加坡离散华文作家研究
1945–1980**

SUN HUEY MIN
孫惠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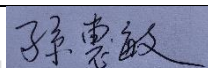
School of Humanities
人文学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22

Statement of Originality

I certify that all work submitted for this thesis is my original work. I declare that no other person's work has been used without due acknowledgement. Except where it is clearly stated that I have used some of this material elsewhere, this work has not been presented by me for assessment in any other institution or University. I certify that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is project are authentic and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Date:	22 June 2022
Name of student:	Sun Huey Min
Signature of student:	

Supervisor Declaration Statement

I have reviewed the content of this thesis an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it does not contain plagiarised materials. The presentation style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what is expected of the degree awarded.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research and writing are those of the candidate except as acknowledged in the Author Attribution Statement. I confirm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thics policies and integrity standards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that the research data are presented honestly and without prejud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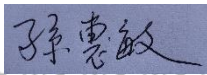
Date:	24 June 2022
Name of Supervisor:	Assoc Prof Yow Cheun Hoe
Signature of Supervisor:	

Authorship Attribution Statement

Please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delete as appropriate:

*(A) This thesis does not contain any materials from papers published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or from papers accepted at conferences in which I am listed as an author.

~~*(B) This thesis contains material from [x number]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following peerreviewed journal(s) / from papers accepted at conferences in which I am listed as an author.~~

Date:	22 June 2022
Name of student:	Sun Huey Min
Signature of student:	

谢辞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游俊豪副教授。老师渊博的学识、开放的思维、创新的思考，不但给我指引方向，也训练我不局限于既定模式。老师儒雅的风度、及时的解惑、不时的肯定，不但给我信心、促我前进、更使我感到亲切和温暖。

感谢王赓武教授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借书赠书并时时殷殷询问论文的进度。感谢陈荣照教授在我入学时的推荐及让我的文章能在南洋学报发表。也感谢王纯强助理教授、张松建副教授、衣若芬副教授在课程中的指导，他们治学的严谨和启发式的教学开拓了我的视野，加深了我对研究方法的认识。感谢论文指导委员会的杨佩华副教授和王纯强助理教授的审阅和指正，鼓励和肯定，使论文可以顺利呈交。

感谢南大人文学院行政人员，特别是 Qiao En 和 Christina，在许多行政细节上她们都给予我高效的、热心的协助。

感谢我先生陈哲贤在生活上对我的照顾，让我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我感兴趣的研究。不仅如此，当我提出一些课题和他讨论时，他新颖的观点往往醍醐灌顶，给我意料之外的启发，过后他还会再三思考，热心地给我补充建议。我坚持完成论文，是对他的关爱的些许回报。

感谢我的上帝让我在逆境中仍有力量前行，在黑暗中得见曙光。

2022 年 7 月 8 日

论文目录

谢辞	i
论文目录	ii
摘要	v
Abstract	vi
第一章：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背景	3
第三节 研究对象	12
第四节 研究问题	16
第五节 研究方法	17
第六节 前人研究	23
第二章：理论与概念	38
第一节 离散的历史与扩展意义	38
第二节 离散的界定	43
第三节 华语语系与反离散	46
第四节 离散的特质	52
第五节 华人性与中国性	54
第六节 多元身份认同	59

第三章：新加坡七位华文离散作家的生命历程	61
第一节 直言强悍的李星可（1913-1996）	62
第二节 温婉谦逊的连士升（1907-1973）	67
第三节 杏影的大同世界（1911-1967）	73
第四节 推动出版事业的李汝琳（1914-1991）	77
第五节 ‘黄色作家’姚紫（1920-1982）	83
第六节 英文教师苗秀（1920-1980）	93
第七节 建构新华文学典律的赵戎（1920-1987）	97
 第四章：中国心	 104
第一节 李星可：‘我认为，身为华人不应该「数典忘祖」’	105
第二节 连士升：‘离开故乡……，我爱它，我想它……’	108
第三节 杏影：‘在潜意识里的所好，究竟还是中国的那一套’	114
第四节 李汝琳：‘永远不会忘记，那永远诉不尽的恩情！’	117
第五节 姚紫：‘祖国的孩子永远是爱着祖国的’	122
第六节 苗秀：‘他的脚从来没有接触过那儿的土地，但他是个中国人……’	127
第七节 赵戎：‘华人慎终追远的传统，和不忘故土的精神……’	131
 第五章：本土情	 134
第一节 李星可：‘全民大团结’、‘华巫团结’	134
第二节 连士升：‘南洋文化的远景’	154
第三节 杏影：‘上帝给人类的这一个「地上天堂」’	174
第四节 李汝琳：‘我爱上了新加坡！’	180
第五节 姚紫：‘死也要死在新加坡’	189

第六节 苗秀：‘培养国家意识，发扬爱国精神’	194
第七节 赵戎：‘我们不爱这个国家还爱什么呢?’	206
第六章： 新华人	221
第一节 离散族裔在彼与在此、 过去和现在的相互牵引的张力	224
第二节 地域对离散族裔的影响	241
第三节 华人性中的中国性	258
第七章： 总结	279
附录	286
1. 1921 年至 1980 年新加坡华人人口的变化	286
2. 新华华文文学史分期详表	287
3. 李星可·连士升·杏影·李汝琳·姚紫·苗秀·赵戎七位作家 的比较	293
4. 新华七位华文作家经历简览	312
5. 李星可 生平·著作·他人评论	313
6. 连士升 生平·著作·敬佩人物·他人评论	338
7. 杏影 生平·著作·他人评论	368
8. 李汝琳 生平·著作·编辑·他人评论	381
9. 姚紫 生平·著作·他人评论	401
10. 苗秀 生平·著作·文艺观·他人评论	422
11. 赵戎 生平·著作·他人评论	438
主要参考资料	458

摘要

新加坡的七位华人文人－李星可、连士升、杏影、李汝琳、姚紫、苗秀与赵戎，是华文作家，也是离散族裔，他们的文字展示了他们对时局的观点、对故国新家的思索、从侨民到公民的过程。本研究以中国心、本土情、新华人三个课题为轴心，讲论 1945 至 1980 年间，这七位华文作家曾经居住的地方，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对他们的影响与他们的回应，以及他们如何以文字留住过去，见证当下，指向未来。他们以文字记录了移民和本土出生的华人如何调适自己进入当地多元的、以英语语境为主的国家社会，在缅怀故乡与探索新国之间，或挣扎、或双重认同，最终落地生根的过程。这过程的书写代表了新加坡离散华文文学，开辟了世界离散文学的一个新篇章。

关键词：华文作家、离散族裔、中国心、本土情、新华人、新加坡离散华文文学

Abstract

The seven Singapore diasporic Chinese writer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Li Xingke, Lian Shisheng, Xing Ying, Li Rulin, Yao Zi, Miao Xiu and Zhao Rong had presented their perspectives on their situations at the time, their views on their ancestral physical or imagined homeland and their thoughts on how they had appreciated Singapore as their new hom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ree core themes – their love for China, love for Singapore and their identity as Singapore Chinese diasporas, and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China and Singapore and the places they had resided in on them in the years between 1945 and 1980, including how they had communicated their past, present and hope for the future through their written works. Whether they were immigrants or native-born, their writings bore witness to how they had strived to integrate into a multi-racial, multi-cultural society with English as the dominant language, their struggle between their attachment to their ancestral home and their commitment to their new-found home, and their final choice to become Singaporeans. Collectively, their writings had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field of diasporic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ry works, but had also opened up a new chapter in the world of diasporic Chinese literature.

Key terms: Chinese writers, diasporas, China, Singapore, Singapore Chinese diasporas, diasporic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新加坡离散华文作家研究

1945-1980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本研究是以新加坡为场域空间，以战后的 1945 年至 1980 年南洋大学关闭为研究时段的上下限，突出以七位华文作家 – 李星可、连士升、杏影、李汝琳、姚紫、苗秀与杏影为代表的华文作家从侨民至公民，从华侨到华人，国民身份的改变的回应与自己身份的探索，与此同时，他们对新加坡与世界政局，以及对新加坡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的思考。他们是华文作家，也是离散族裔，本研究以此两个主要维度探究他们在 1945 至 1980 年间在新华文坛所展现的离散华文文艺。

在这七位华文作家中，有五位来自中国，抵新日期在 1945 至 1949 年之间。新加坡的移民人口中，华族也占了大多数。根据 1871 年到 1967 年的人口统计，华人人口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显示了众多华族移民选择留居新加坡。¹ 这和华人传统思想似背道而驰，因华人长久以来承受‘父母在，不远游’的儒家教诲，到外地也只是希望寓居，不愿久留。移民后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更是匪夷所思。移居国外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不被认可和鼓励，一直到清朝末年才有所改变。然而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或因

¹ 根据 J.F.A. McNair, *Miscellaneous numerical returns [and] Straits Settlements population [for the year] 1871* [microform] (Singapore : [s.n.], 1871), 页 10, 于 1871 年, 华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 55.71; E. M. Merewether. Esq,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1*,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页 46 记录于 1881 年, 华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 58.02; Saw Swee Hock, “Population Trends in Singapore, 1819-1967”,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10, No.1, Singapore Commemorative Issue 1819-1969, (Singapo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969), 页 39 及 41 记录 1891 至 1967 年的华人人口的百分比如下: 1891 年-百分之 67.1, 1911 年-百分之 72.4, 1931 年-百分之 75.1, 1947 年- 百分之 77.8, 1967 年- 百分之 74.4。S.C.Chua (Chief Statistician and Superintendent of Census Singapore),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57*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Printer, 1964), 页 68 记录 1921 年华人人口占的总人口的百分之 75.3。

政治的因素，华人继续南来。² 虽然许多华侨仍然希望有朝一日，回归故里，落叶归根，但国际和中国的局势，英殖民地政府的政策等都迫使华人作出新的选择，长居此地。数据显示，有 22 万非新加坡出生的华人在 1957 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下获得了公民权，占当时全人口的百分之 15.22， 华人人口的百分之 20.17。³ 根据 1957 年 10 月生效的新加坡公民权法令， 在外地出生者，必须在新加坡住满 8 年，并宣誓效忠新加坡和放弃外国国籍， 才可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这表示这 22 万华人至少自 1949 年就已经在新加坡居住。然而当华人选择长居（包括在 1957 年以前），或成为本地公民时，转折的关键在哪里？是否是为了现实的需要，或是真的与这片土地产生了归属感，而愿意落地生根？他们是否具有同时热爱中国和热爱居留地的双重情感，以致在创作上交织着一面对中国的关切和受中国文艺的影响，一面又有对新马前景的期待和塑造新马文艺独特性的意愿？这种种纠葛，本研究试图通过这七位华文作家，以不同的视角进行探索与解惑。

1957 年的公民人数显示了至少自 1949 年就已经在新加坡居住的，占当时全人口的百分之 15.22 的华人的选择，而因为中国中共政权的成立及随之对移民的遏制，其中大部分人应该是 1949 年之前已经南来。以实际人数计算，新加坡人口数据也显示从 1921 年至 1947 年外地出生的华人数目的增加。1947 年以后，虽然外地出生的华人数目继续增长，但出生于中国、香港与台湾的居民却逐渐减少，而这恰被来自其他地方如马来（西）亚的华人增多所填补。⁴ 至 1980 年，出生于中国、香港与台湾的华人数目甚至几乎等同于其他地方出生的华人数目。人口的变化与中国、新马及国际政局密不可分。然而整体而言，华人人口仍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1921 年至 1980 年新加坡华人人口的变化，见附录 1。

人口的变化固然与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关系，本研究所关注的新加坡战后至 1980 年外地出生人口的减少，也与本土政治社会教育经济的措施与发展密不可分，其中有诸多影

² 一些百日维新的支持者为了逃避满清政权的追捕，逃离中国。参马洪林《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一期，页 75-82。

³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1955* (Singapore: NUS Press, 1973), pp. 152-153; S. C. Chua,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57*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Printer, 1964), pp. 43 & 68. 于 1957 年，新加坡总人口为 1,445,929， 华人人口总数为 1,090,596， 占新加坡总人口的百分之 75.4。

⁴ 同上，页 72-73。

响华人身份认同的因素，华人如何回应这些措施与变迁？自治和独立后的新加坡华人人口仍居百分之 75 以上，其中当有许多在本地出生和成长的华人，他们又如何诠释自己的身份？本研究的两位出生本地的华文文人——苗秀和赵戎，深受中华文化的润泽，但也主张新华文学拥有其独特性，他们在许多外来文人的群体中，如何以理论及创作站稳立场？这一群本地和外地出生的，拥有众多读者的华文作家，如何在新加坡生活的岁月，建立新加坡文艺，对新加坡的文坛又做出了什么贡献？作为离散华文作家，他们是否展现了他们对中国和新加坡并行不悖的认同？这项研究将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第二节 研究背景

1. 战后至 1980 年的新加坡

战后至 1980 年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二战后的 1945 年至新加坡自治的 1959 年，以及自治后至 1980 年。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战后回到新加坡，但新加坡经历了英军在日军到来时的撤退和日治的残酷，人民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⁵ 终于在 1959 年成为自治邦，同年 5 月 30 日举行了第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在 51 个立法议院议席中赢得 43 席，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李光耀在 6 月 3 日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的首任总理。接下来到新加坡独立，从独立到 1980 年，新加坡经历了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挑战。

华人移民虽然从二战前已经南来，但在二战前他们只是侨居者，最终目标还是回归故里。在日侵中国及中国内乱时他们关心中国的命运，在新马日治期间他们和土生华人也都见证了日治的残酷，明瞭这片土地虽仍属殖民统治但又不能依靠英国人。加上中国政治的变化和对海外华人的政策，在当地英殖民政府对受华英文教育的不同措施，以及当地人们也正经历着朝向于掌握自己命运的愿望，使他们加倍感到他们的目标可能需要调整，以致不断地挣扎和寻找方向。战前华文教育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但华人还有中国可以依靠。然而战后日治的提醒、对殖民政府信心的动摇、随 1949 年中共

⁵ *Singapor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1941 -1984)*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新加坡文化部资料组编, 1984), 页 53.

政权的成立而颁布不利于华人往来与对海外华人的政策、殖民政府对大陆书籍的禁止，⁶ 以及 1955 年周恩来不承认华侨双重国籍的宣布，都使战后的新马华人为争取自己以及后代的福利与前途，更迫切地要寻找华人族群的方向。⁷ 与此同时，华人还继续与中国的亲人保持联系，关心中国的前途。受华文教育的华人，更无不受老师、书籍报章和其他非文字媒体的影响。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千丝万缕，在情感和文化上，有剪不断的纠结，使华人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

1957 年当华人选择成为公民时，虽然不能确切的说明这些华人已经认同他们的所居地，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居留的愿望，也是陪同新加坡走向自治的前奏。然而新加坡自治后及至独立，执政者对华文教育的举措，致使华校逐渐减少以及南洋大学在 1980 年停办。从自治后至华人寄望以华文教育华人子弟的最高学府的殒逝，对华人自然有相当的冲击。然而在华校式微的过程中，华文作家一直耕耘不懈，为新华文学开创自己的文艺场域。战后至 1980 年，除了教育政策的变化，新加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挑战也是华文作家的写作背景。

政治

在政治上，自从 1946 年来，新加坡都是英国直属殖民地，不论是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1946-1948）或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 1948-1957），新加坡都不被包括在内，而在这些殖民地中，新加坡的华人最多，也因此与中国的关系密切。英政府对中国势力对新马华人的影响非常关注，实行长期的反共措施。在此同时，反殖民浪潮此起彼伏，1954 年林德宪制的发布及 1959 年新加坡的自治，及至 1963 年 9 月新加坡脱离英国的统治正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两年后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后的新加坡，对外扩大贸易与金融网络，在内发展工业及从事国民教育，进入 1980 年代的新加坡，国

⁶ C. Mary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 - 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p. 248; 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2001），页 170。

⁷ 1955 年 4 月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与印尼签署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表明了新中国在所有海外华人问题上的根本性政策转变。该条约规定拥有双重国籍的侨民有权在两国间自由选择一个国籍，这标志着‘血统主义’国籍原则的终结。

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百分之 8，失业率低至百分之 3。⁸ 1980 年华人人口占全人口的百分之 76.90，⁹ 而从 1970 年至 1980 年间，华人公民人数增加了百分之 17.80。¹⁰ 与附录表 1 所记录的在 1980 年中国、香港和台湾出生的新加坡居民中占外地出生的新加坡人口的百分之 35.90 及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百分之 7.8 相比，1980 年的华人人口显示了随着华人的定居成为公民，及在本地成长和出生的华人的增加，新加坡本土社会逐渐成型。

教育

华人一向重视子弟的教育，但殖民政府为其殖民目的对不同的语言教育并不一视同仁。

¹¹ 然而华族先辈，不屈不挠，出钱出力，从私塾发展为书室、学堂，再进一步创办学校，最早的一间私塾经李业霖的考证为崇文阁。¹² 据统计，1929 年至 1941 年间，华文学校数目介于 190 至 351 之间，1941 年的华校学生数目为 37,500 人，占各种族学生总人数 72,000 的百分之 52.08。¹³ 日治时期，在日军铁蹄下，新加坡只有 21 所华校，学生 2081 人。¹⁴ 战后华校的数目和学生人数急速增长，在短短的一年内，即在 1946 年，华校的数目从 21 所回升至 284 所（注册学校有 124 所，未注册学校 160 所），华校数目虽少于 1940 年的 351 所，学生人数却为 46,312，占 1946 年各种族学生总人数 76,341 的百分之 60.66。¹⁵ 然而到了 1950 年代后半期，华校开始式微。

⁸ 新加坡历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A%A0%E5%9D%A1%E5%8E%86%E5%8F%B2>
浏览日期：2019 年 10 月 23 日。

⁹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p. 29.

¹⁰ 同上，页 52.

¹¹ D. D. Chelliah, *A History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System Based on Vernaculars*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London, 1940).

¹² 崇文阁位于直落亚逸街天福宫的左殿，于 1849 年福建帮的领袖人物陈巨川发起创办。五年后，陈巨川又领导同仁捐款购地，在厦门街创建萃英书院。见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页 215-220；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页 11 及 731.

¹³ 唐青编著《新加坡华文教育》（华文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台北：华侨出版社出版，1964）。页 29 及 79.

¹⁴ 同上，页 79.

¹⁵ 同上；*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ingapore, 1946-1960*（未注明出版详情和页数），转引自崔贵强《新加坡华人 - 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4），页 267. 唐青注明 1946 年注册与未注册学校数字，崔贵强则只注明已注册华校的数目，但学生总数与唐青同为 46,312 人。

从战后到 1953 年，英殖民政府实施的《十年教育方案》（The Ten-Year Programme, 1947）、《五年教育补充计划》（The Supplementary Five-year Plan, 1949）、《学校注册法令》（School Registration Order, 1950）、《学校一般条例》（General School Regulations, 1950）、《两种语文教育白皮书》（Bilingual Policy White Paper, 1953），目的都是在控制华校，¹⁶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到 1953 年，华校的数目和学生人数都高于英校。¹⁷ 1954 年至 1956 年，华校数目虽然仍高于英校，但学生人数已被英校超越。1956 年政府颁布了《立法议会一九五六年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Report of the All 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主要建议各民族学校平等待遇，包括学校津贴及教师待遇，但附有学生修读英文、教科书需于修订及董事部内部改组的条件。¹⁸ 接着同年 3 月，又颁布了《教育政策白皮书》（White Paper on Education Policy），除了修订及重复《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外，又规定“学校教育政策不得与政府所定之教育政策有任何冲突”，并强调政府将集中力量建设英校。¹⁹ 1957 年 2 月政府于在宪报上公布了新教育法令，在学校管理和注册以及教师注册上明文规定要符合政府条件。²⁰ 教育报告上显示，1957 至 1959 年，华校的数目和学生人数全被英校超越。²¹ 这样的环境下，加上 1955 年开始双重国籍的禁止，华侨子弟的升学成了迫切的课题。陈六使在 1953 年提出建设一所以华文为学习媒介的大学符合了华人的愿望，在他和福建会馆的带领下，新马各界华人出钱出力，排除万难，南洋大学于 1956 年正式开学。南洋大学的成立原以为会给华文教育开启新的篇章，然而南洋大学的道路坎坷。南大学位迟至 1968 年才被承认，1975 年李昭铭校长宣布从该学年开始，吸收来

¹⁶ Zhang Zhixiong,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 Untold Story of Conflict and Change* (E-book, Smashwords Edition, 12.2.2015), Accessed 8.3.2015.

¹⁷ 1953 年有 273 所已注册华校和 176 所英校，相应人数为 79,272 华校生与 71,003 英校生。见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ingapore, 1946-1960*。转引自崔贵强《新加坡华人 - 从开埠到建国》，页 267。

¹⁸ Chew Swee Kee, *Report of the All 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ingapore, 1956)。结论及主要建议见页 44-51。

¹⁹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 - 从开埠到建国》，页 267-271；T.R. Doraisamy, Gwee Wee Hian, Joseph Doray, K.M. Waldhau and Zahoor Ahmad,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TC Publication Board,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Paterson Road, Singapore, 1969), p.53。

²⁰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 - 从开埠到建国》，页 272。

²¹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ingapore, 1946-1960*。转引自崔贵强《新加坡华人 - 从开埠到建国》，页 267。

自各民族语文源流学生，除中华语文一科外，全部学科改为用英文教学。²² 1978 年，以华校生为主的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迁移到武吉知马的联合校园，南大的教学媒介语-华文，被英文取代。两年后两所大学合并，成为今天的新加坡国立大学。1980 年，这曾经是唯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南洋大学关闭，而新加坡的最后一所华校也在 1986 年停办，华校正式走进历史。²³ 其实新加坡独立后的 1966 年和 1969 年，已经分别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实施双语教学。到了七十年代，以英语为主的双语政策逐渐定型。²⁴ 1987 年起，英语成为第一语文和教学媒介语，早在 1980 年南洋大学的闭幕时已可预见。语言政策关乎政治话语权，本研究以 1980 年南洋大学的闭幕为下限，专注于这阶段华校系统的逐渐式微及至瓦解对华人的冲击，审视华文作家如何述诸于文艺。他们的声音，将是华人真切的回应。

社会

南洋大学的成立并非是英殖民政府所希望看到的。长期以来华校都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温床，各种教育措施都是控制华校的手段，²⁵ 但华人社群众志成城。几经周折的南洋大学是新马民间资源的结晶，历史事实触手可及。战后的社会满目疮痍，贫穷、失业、疾病是普遍的社会现象，²⁶ 英政府更是在 1948 年就实施紧急发令（Malayan Emergency），和马来亚共产党展开长达 12 年的斗争。在 1948-53 年间，约有 1200 人在紧急法令下被捕，²⁷ 1950 年因 Maria Hertogh 事件引起有关种族与宗教的暴乱。在 1950 年代，更发生了多起华校学生运动，其中一个 1950 年华侨中学的五·卅一事

²² 《南洋大学大事记》，新加坡文献馆网页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2839> (23.12.2018)，阅览日期：24.10.2019.

²³ *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1984/85 and 1987*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记录1987年的华校中小学数目为零。*Yearbook of Statistic Singapore 1987* 页266 并记：“Language medium schools have been phased out with effect from 1987. Therefore, figures for 1987 and thereafter no longer available.”

²⁴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Dec 6, 1996: Speech by Senior Minister Lee Kuan Yew to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on Dec 5, 1996: Our Past Has Shaped Our Present—Our Present Is The Base Of Our Future.

²⁵ Zhang Zhixiong,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 Untold Story of Conflict and Change* (E-book, Smashwords Edition, 12.2.2015), Accessed 8.3.2015.

²⁶ C. Mary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pp. 228-229.

²⁷ 同上，页 245-247;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 East Asia* (Second Edition)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80), p. 330.

件，导致华中的 6 位教师停职及 60 多名学生离校。²⁸ 当时杏影正在华中任教，受到的冲击不言而喻，也可能因此他的文字富与哲理且较为沉重。

1954 年的‘五一三事件’是另一个高潮。当年英殖民政府颁布《民众服务法令》，规定 18 至 20 岁的男性登记入伍，违反者将被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兼施。5 月 13 日，千多名学生准备向总督和平请愿，却被镇暴部队强行驱散，导致多名学生受伤和 48 名学生被逮捕。6 月 2 日至 24 日长达 22 日，学生在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集合抗议。在‘五一三事件’后华校的学潮并没有因此结束，为了保护学生的权益，中学生在 1955 年 10 月成立一个中学生联合会，然而政府不但在一年内的 1956 年 9 月撤销其注册，还接着开除及逮捕学生与关闭学校，致使学生再度在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集合抗议，之后被武装警察以催泪弹驱散。²⁹ 1961 年底，学生又因《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所决定推行的中学自三三制改为四二制而抵制第一届中四毕业会考。官方的意识形态将 1954、1956 和 1961 年的三个事件与左派活动挂钩，并因此将华校生与共产党画上等号，清楚地显示在史料上。³⁰

除了年轻人和学生的抗议与学潮，还有工潮和种族冲突。1955 年新加坡发生了福利巴士工友的三次罢工事件，³¹ 接着新马合并后的 1964 年又发生了几次华巫种族暴动，其中 7 月 21 日发生的‘7.21 华巫种族暴动’（Prophet Muhammad Birthday Riots）最为严重，总共有 23 人死亡，450 人受伤，3568 人被捕。³² 1969 年马来西亚在 5 月 13 日发生种族暴动，波及新加坡，致使新加坡也发生华巫冲突，造成华人和马来人的死伤。³³ 在此研究中的 4 位文人都曾受政治牵连，其中姚紫在 1954 年被捕，盘问 3 天 4

²⁸ 〈五·卅一事件〉《华中毕业刊 1950 年》（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高初中毕业刊联合编委会，1950），页 84-85；郑安仑〈华中记忆〉，《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创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页 145-147。（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编辑，1979）《华中毕业刊：1950》。

²⁹ 新加坡立法议院议案卷 1956 年第 53 号《解散〈中学联〉白皮书》（译本，出版社及日期不详，新加坡：星洲文联印务有限公司承印）；丁艾薇《论新加坡独立前的学生运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毕业论文。1999-2000），页 4-13；郑安仑〈华中记忆〉，《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创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页 147-151。

³⁰ 新加坡立法议院议案卷 1956 年第 53 号《解散〈中学联〉白皮书》（译本）；丁艾薇《论新加坡独立前的学生运动》，页 4-18。

³¹ 新加坡文献馆，《福利巴士工潮》，<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1>（19.2.2008）。阅览日期：25.10.2019，本论文只取其中史实。

³² 李国樑《在种族暴动中浴血诞生的新加坡》，<https://www.yan.sg/yuxuedansheng/>（新加坡眼 30.6.2014）。阅览日期：25.10.2019。

³³ 陈鸿瑜《新加坡史》（增订本）（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2017），页 116。

夜后才获释；连士升在 1959 年公民权曾被吊销，还差点被驱逐出境；李汝琳在 1959 年新加坡大选前夕被吊销公民权，两三年后才重新获得；李星可于 1971 年 5 月至 1973 年初，入狱 22 个月。除了李星可外，³⁴ 其他三人所受政治牵连的详情虽无可获知，然可见当时局势的敏感性与文人作家作为民众喉舌，岌岌可危的处境。政治与种族因素所造成社会问题，使独立后的新加坡致力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及各种族的和谐共处。华文作家如何回应社会的冲击及在多元种族氛围中对华族的定位，将在他们的文字中展现。

经济

经济需要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为了社会的安定与种族的和谐，新加坡政府独立以来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教育上推行国民教育，坚持以英文为主的双语教育让国民有共通的语言，公共设施上实行居者有其屋，增加国人的归属感，并发展国内外的经济，制造就业的机会。在经济上，1960 年 12 月 1 日的新加坡人均生产总值是 428 美元，³⁵ 1961 至 1967 年都徘徊在 500-600 美元左右，1968 年开始有显著的增长，到了 1980 年升至 5000 美元。这其中当然有薪金增加和货币贬值等因素，但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是事实。新加坡从战前的贫穷至 1980 年的经济发展，华文作家是否关切，在见证了新加坡的成长后，在他们的文艺创作中有何反映，都将是思考的内容。

³⁴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32-139，155-162；康吉父《胡文虎传》（香港：龙门文化事业公司，1984）页 136-150；孙源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2e2d6d0102x35b.html 附有李星可给孙源的信，内有一首打油诗，诗中记述李星可南来后事迹，包括南大的开办与闭幕以及他被监禁的始末。孙源博客现已加密，然笔者已存档；韩山元《从李星可谈到报史研究》，见 [李星可与华文报史 - 南洋古今 - 随笔南洋网 新加坡华文论坛 \(sgwritings.com\)](#)。梁秉赋于 23. 8. 2008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讲座《李星可其人其言》，见 [文化沙龙人物点评系列 4/2008-《李星可其人其言》 |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wordpress.com\)](#)；新加坡文献馆《回顾华文报业风暴是非》（本论文只取其中史实），<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312>。阅览以上网页日期：10. 7. 2019。

³⁵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称作“人均 GDP”，是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常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是人们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和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相比，就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新加坡 1960-198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见 CEIC《中国企业家投融资俱乐部》网页 <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indicator/singapore/gdp-per-capita>。阅览日期：25. 10. 2019。

这些称中国为‘祖国’的移民和本地作家，在新加坡的政治、社会、教育和经济的变化下，对他们作为离散华人的身份产生何种影响，他们又如何回应这些变化？他们如何为民众代言，表明态度和立场，直抒或委婉发抒心声，将于他们的写作中发掘。从散居者、侨民到定居者和公民，这些离散华人如何以文艺体现了这个过程，在 1945 年至 1980 年的新加坡华文场域里绽放离散文学的风采，是本研究希望达成的贡献。

2. 文坛现象与文学思潮

十九世纪末从中国南渡新马而知名的文人有邱菽园、黄乃裳、叶季允等，在各自的报章担任主笔，带来的是旧体裁和文字。³⁶ 1919 年五四运动以白话取代文言，内容重于形式的倡导，很快被新马文坛所接受，新马的一些报刊开始表示要提倡新文艺，宣扬新思潮，因此 1919 年被新马华文学史学者定为新马华文学的起点，并以此开始，尝试将新马华文学的文坛现象和文学思潮归类。³⁷《马华文学大系》的编者方修（吴之光）把新马华文学各主要体裁跨越 1919 至 1976 年的作品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其中根据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或主要现象再加细分，战前分期注重文学发展的起落，战后则注重文学现象。学者杨松年则以新马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的消长为主轴，细分新马华文文学的进程。王润华只注重分析某几个时期，但他的分期时段延至 1985 年，而黄孟文与徐迺翔将每个时期的跨度拉长再细分，除了初创期之外，以主要历史事件及一些文坛运动分期。本研究的上限是二战后的 1945 年，但追溯自 1919 年新马华文学的

³⁶ 邱菽园（1874-1941）于 1898 年为《天南新报》的主笔，见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页 81-104。黄乃裳（1849-1924）于 1899 年为《日新报》的主笔，见叶钟铃《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页 4-14。叶季允（1859-1921）为《叻报》主笔，并开创副刊《叻报附张》，见陈育菴《南洋第一报人》（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页 23。新加坡 1881 至 1917 年的中文报刊，见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³⁷ 方修、黄孟文与徐迺翔都以 1919 年 10 月为新马华文学史的起点，因为 1919 年 10 月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创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及另一些版位如《时评栏》、《新闻版》等，发表了具有一定数量，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章。但杨松年则引用郭惠芬的资料，认为新文学在 1919 年 10 月之前已在新马登场。郭惠芬指出，吉隆坡的《益群报》早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周，及 5 月 12 日已经表示要在南洋展开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接着刊登大量白话作品，宣扬新思潮。新加坡《新国民日报》的前身《国民日报》的副刊《国民俱乐部》也在 6 月 5 日的启事中表示要提倡新文艺，反对旧文学。见郭惠芬《新马新文学史起点的新界定：〈国民日报〉与〈益群报〉探析》，《亚洲文化》第 24 期，（2000 年 6 月），页 166-179；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页 12。

起点有助于了解新华文学在研究时段内如何延续前人的努力以及新华文学的发展进程。

方修³⁸、杨松年³⁹、王润华⁴⁰、黄孟文与徐迺翔⁴¹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分期见附录2。

从战前到战后，新马华文学从依附中国文艺，逐渐断奶，从表面的描绘本土情境到实质的回应国家社会的变化，进而主张建设新加坡文艺，在上述各学者的分期中可以窥见。⁴²在新加坡文艺建设的进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赵戎在1938年的提出《泛论新启蒙运动》其实已经开始扬弃侨民意识，是马华文学地方性和独特性主张的创始，但四位研究新马华文文学分期的学者并未提及。在接下来分期中，他们肯定了赵戎在1945年12月再首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学，⁴³以及他和苗秀在1947及1948年马华文学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中对马华文学独特性的极力支持，⁴⁴接着马芬于1955年12月首先提出爱国主义文学。⁴⁵在1950-1956年反对黄色文化的运动中，姚紫曾被冠以‘黄色作家’的称号，但他说明黄色作品应从作品的整体来批判、从作者的创作意识来了解。赵戎在1969年新加坡独立后写的〈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是新加坡自治及独立后爱国意识高昂期的作品。新加坡独立前，文人已经意识到编辑和整理出版的重要，因

³⁸ 方修的文学史分期为以下方修编著的综合：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三册（世界书局，1962）；方修《马华文学史补》（新加坡：春艺图书，1996）；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 戏剧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9）；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 小说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9）；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 散文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81）；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 诗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82）；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

³⁹ 杨松年的文学史分期为以下杨松年编著的综合：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杨松年主编《从选集看历史：新马新诗选析（1919-1965）》（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

⁴⁰ 王润华〈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阶段与方向简史〉，《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4），页3-17。

⁴¹ 黄孟文与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分期简要以其〈绪论〉页XVI-XX为主；黄孟文〈新加坡华文文学简史〉，《新华文学·世华文学：评论与史料选辑》（新加坡：云南园雅舍，2008），页6-8。

⁴² 新加坡文艺在二战前其实无论在作家、报社、文学团体、出版或文学产品各方面已经在新马华文文学场域里占主导地位。见游俊豪〈渊源、场域、系统：新华文学史的结构写作〉，《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三联书店，2014），页175-192。即使在新马分家后，新华文艺还一直潜藏在马华文艺的麾下。‘新加坡华文文学’，或‘新华文学’的名号一直到黄孟文（孟毅）在编撰《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品选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时才得以正名。

⁴³ 黄孟文〈新加坡华文文学简史〉，《新华文学·世华文学：评论与史料选辑》（新加坡：云南园雅舍，2008），页11-13。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页221-222。

⁴⁴ 苗秀〈导论〉，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页12-21；黄孟文与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页96。

⁴⁵ 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页252-255；苗秀〈导论〉，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页21-23；黄孟文与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页88。

此从 1958 开始，李汝琳已积极出版了《新马文艺丛书》、《南方丛书》及《新马戏剧丛书》三套，共 54 本的丛书。⁴⁶ 属于本地意识高涨期的成绩。新加坡独立后，作家学者更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史论的研究。1971 至 1974 年间，以李廷辉为总编辑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苗秀和赵戎都参与了编辑工作。苗秀负责编辑《理论》集、《小说》第二集，并与赵戎、钟祺合编《剧本集》。除与苗秀、钟祺合编《剧本集》外，赵戎也编辑了《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及《史料集》⁴⁷。此外，赵戎历时 7 年完成编著，在 1979 年出版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是对新马文艺的另一大贡献。⁴⁸ 这些作品都是新华文学史分期中的实例，而了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了解这些作家的思想意识与作品的时代意义。

第三节 研究对象

1. 华文作家可起的作用

本纳迪·安德逊（Benedict Anderson）以“想象的共同体”解释国族（nation）和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形成，因为国族的认同是一个集体认知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因为语言文字联系了人们对国族的情感，是构成国族意识的媒介，因此印刷文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⁴⁹ 印刷语言在三方面是国族意识的基础：首先，最重要的是它创造了统一的交流和传播的领域。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通过印刷和纸张，能够相互理解。这些被印刷语言所联系的读者同胞，形成了国族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其次，印刷语言有一种新的固定性（fixity），这固定性能为主观的国族理念塑造古老的意

⁴⁶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页 242。刘笔农〈作家、丛书编辑李汝琳〉，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怀庐书屋（出版地不详），1984），页 30-32；爱薇〈文艺长跑者李汝琳〉，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 33-34。

⁴⁷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共 8 集。苗秀编《理论集》（1973）、《小说二集》（1972），与赵戎、钟祺合编《剧本集》（1973）。赵戎也编辑了《散文一集》（1971）、《散文二集》（1972），及《史料集》（1974）。孟毅为《小说一集》（1972）的编选者，周聚为《诗歌集》（1972）的编选者。《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每集皆未注明出版日期，但赵戎在他编著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里则清楚注明每一集的出版年份，有些还包括月份。

⁴⁸ 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联合教育出版社，1979）。

⁴⁹ Benedict Anderson,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s 3 & 7”,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Verso, 1991).

象，而印刷书籍几乎可以不拘时空地被无限复制，增加了它的固定性。第三，印刷语言是一种和旧的行政语言不同的权力语言。由此可见，作为国族文化载体的语言，以印刷的形式所起的交流和传播的作用、固定性和所能发挥的权力，使中国输入的书籍对新马华人产生重大的影响，教科书的所采用的篇章更能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同样的，当时新加坡华文作家的作品，通过报章刊物的刊登⁵⁰和书籍的出版也可对民众读者产生在思想上的领导作用。王赓武也认为只要有人阅读他们的作品，马华人有权利用华文写作下去，而且马华文学在民族国家发展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它能激发千万华人效忠我们的国家，它将会替国家建立丰功伟业。⁵¹

本研究中的华文文人，不但是文艺创作者，也都是报馆的社论主笔或副刊编辑，研究他们所构成的群像，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描绘表达他们的思想意识，可以探知他们对当时华人的影响。此外，他们不但以文字耕耘，也是新加坡学校的老师（苗秀、姚紫、杏影、赵戎、李汝琳）或大专老师（李汝琳、李星可），他们的言传身教，能对国族的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2. 七位华文作家的选择

这七位华文作家是研究时段中文艺界认可的、重要及出色的作家。李星可和连士升不但是当时两大报章－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的社论主笔，⁵²也各有文艺创作。杏影、李汝琳、姚紫、苗秀和赵戎也同时是编者与作家。本研究以他们为研究对象，他们的华文书写是研究的内容。

⁵⁰ 二战后至自治前的报章至少有 12 种：新民主报、战友报、民声报、南桥日报、光华日报、中国报、中南日报、中兴日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公报、華僑日报。

⁵¹ 王赓武〈马华文学导论〉，收于赵戎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页 8-13。王赓武在该文前一部分提到马华年青作家接受马来亚为他们唯一的故乡，因此这里的‘故乡’应指马来亚。英文原文写于 1959 年，最先在发表于 T. Wignesana, *Bunga Ema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of Malaysian Literature, 1930-1963* (Kuala Lumpur: Blond/Rayirath (Raybooks) Publications, 1964). 英文稿亦收于 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pp. 281-286.

⁵² 李星可 1959 年底进入《星洲日报》，出任主笔，专写社论。1971 年 2 月，转投《南洋商报》。连士升则于 1948 年加入《南洋商报》，1949 年为主笔，1969 年升任为南洋商报总编辑。

在东南亚国家，甚至在中国以外有华人的国家中，新加坡场域中的华人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 1945 至 1980 年，是新加坡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段，新加坡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上都有重要的变迁（见绪论第二节）。其中语文问题在新加坡是一个敏感的领域，被称为‘语言政治’的语言政策牵动国家发展方向的功能在新加坡充分的体现。⁵³ 李光耀认为，懂得英语，可在英语系社会及发达国家挥洒自如，懂得华语则可以和崛起的中国联系，⁵⁴ 因此在独立后的第二年立即实施双语政策。最初的双语政策指的是学习两种语文（学校主要媒介语加上第二种语言），后来进一步发展为‘英文加上母语’的‘英语必知双语政策’（English-Knowing Bilingual Policy），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加上母语。⁵⁵ 这英语至上的语文政策实施的两个明显结果是，新加坡成了亚洲唯一采取前殖民者母语为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政体，并使这个华人为主体的社会成了东盟（ASEAN）中很可能唯一没有华文学校的国家。⁵⁶ 李光耀政府视语言为决定国家经济发展和种族和谐的社会政治文化资源而执行的语言规划政策，⁵⁷ 使英语成为社会用语，影响自然遍及国家各个层面。李光耀视实施双语政策为他一生的挑战，⁵⁸ 极力为他的双语政策辩护，甚至退为资政后，仍反对让传媒恢复方言的使用。⁵⁹ 纵使李光耀认为使用华文是华人“认识自己民族特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⁶⁰ 高姿态的英文对用华文书写，用华文代表自己种族的核心价值的华文作家，依然是

⁵³ 赵守辉 <“汉语拼音”在新加坡的实践—历史与现状>，《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1 卷 第 5 期（2010 年 10 月），页 31。

⁵⁴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traits times Press, 2013), pp. 296-298.

⁵⁵ Pakir 最先使用‘English-Knowing Bilingualism’一词。见 A. Pakir, Education and In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The Ca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Singapore. In J. Tan, S. Gopinathan and W. K. Ho (eds.),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 Book of Readings*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1997), pp. 54-74; 周维介 <华文成为英校科目的历史进程>，林清如总编辑《怡和世纪》第 38 期（2019 年 1 月）（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页 72-74。

⁵⁶ 新加坡教育部从 1984 年开始，逐步统一所有的学校源流，以英语为第一语文及教学媒介语，母语为第二语文，只有少数语文能力强的学生可以修读第一语文水平的华文，但必须兼顾英语为第一语文的水平。最后一所华校在 1986 年关闭，1987 年所有学校统一源流。见<我国各语文源流学校将全面统一>，《新加坡：联合早报》1983 12 月 22 日报道，页 2；梁荣锦 <华文华语的发展>，潘国驹主编《新加坡华社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页 137；赵守辉 <“汉语拼音”在新加坡的实践—历史与现状>，页 31。

⁵⁷ Lee Kuan Yew on bilingualism: *In his own words: English for trade; mother tongue to preserve identity*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November 24, 2004),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in-his-own-words-english-for-trade-mother-tongue-to-preserve-identity>. Accessed 17 December 2019.

⁵⁸ Lee Kuan Yew, *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2012).

⁵⁹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traits times Press, 2013), pp. 296-298.

⁶⁰ 李光耀致<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开幕词，见《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印，1990），页 1。

一种不胜负荷的压力。文人是时代的眼睛、时代的栋梁，新加坡作家如何看待语文和政治，又如何回应政府的政策？本研究将审视这一时代华族族群里最优秀的文人群，如何以华文为核心和以华族为本位，以何种姿态与政府互动。李星可、连士升、李汝琳和姚紫曾因政治牵连被盘问或甚至入狱；李星可、连士升、杏影和苗秀有一定的英语水平，李星可更精通法文。李星可、连士升和杏影都曾翻译英文著作并引用外国作家的著作或名言，苗秀更是受英文教育的英文老师。⁶¹他们的视野不但应该更具多元性，他们的翻译及引述也会给予读者多方面的思考。他们作为能动者和受影响者，在新加坡复杂的语文环境中，如何以他们的生存经验和精神体验，以感性的创作和理性的评论，为华人族群代言，为新加坡开辟离散华文文学的场域，是本论文所要探索的内容。

这七位作家——李星可、连士升、姚紫、杏影、李汝琳、赵戎和苗秀有相似处也各有他们的特点。他们是一群曾经在报馆工作，有编辑书报的经验，和文教界关系密切的华文作家，都是文教界认可的作者。他们也都是教育工作者，除了连士升的服务场地是在中国和越南，其他六位都曾在新加坡的教育机构服务。⁶²李星可和连士升是报章社论的主笔，文学创作亦琳琅满目，在报界和文艺界无人不晓；杏影、李汝琳、姚紫、赵戎和苗秀对新华文坛的贡献，促使新加坡文艺协会在众多作家中，为了肯定和表扬他们的成就，为他们出版研究专集，因为他们是“文学活动较长、创作较多、比较有成就者”。⁶³

⁶¹ 李星可 11 岁起就学法文，曾得奖学金在比利时和巴黎研读，并曾翻译韩素音的《餐风饮露》（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与《青山不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连士升曾翻译剑桥大学克拉判教授(Sir John H Clapham)的两本著作：《现代法德经济史》（“*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及《近代英国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见连士升《回首四十年》（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09）页 156 的编者按。出版社及出版日期不详）。杏影的《想想写写》里的〈读书偶译〉（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共翻译了 288 外国名人名言，其中除英文名言外，还包括了其他外国名言。在其他著作里——杨守默《读书与写作》（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4），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杏影《愚人的世纪》（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书与人》（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除了引用外国名人名言外，还有论述外国名人的专篇。

⁶² 连士升曾在岭南大学任教，在越南茶荣省隐居期间，用‘郑德华’的假名，任福建学校（华侨小学）校长两年。其他六人都曾在新加坡的教育机构服务：李星可曾在新加坡师资学院及南洋大学任教，李汝琳曾在华侨中学、新加坡师资学院及南洋大学任职，杏影曾在华侨中学任教，姚紫曾在新加坡道南小学及晋江学校任教，亦曾在马来亚宽柔中学任华文部主任，苗秀曾是华侨中学的英文老师，赵戎曾在裕廊小学及中正中学任教。

⁶³ 骆明〈新华文学的新起点——写在新华作家研究丛书出版前〉，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24。

他们之中，有五移民自中国，两位出生于新加坡，但都热爱中华文化。在 1945 至 1980 年之间他们都曾经在新加坡生活，在这期间他们有些曾受政治牵连，有些受环境的迫害，但最终都表达了对新加坡的认同。⁶⁴ 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个别离散华人的特质，也展现了集体群像，但至今尚无对他们七人的离散书写以及组成的群像的研究。本文将展现他们对他们深爱的‘祖国’⁶⁵的想望，他们对居留地新加坡的思考，以及他们作为新加坡离散华人所感受的原乡与新国的张力、新国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华人性中的中国性。

这七位作家的立身处世及写作风格的特色，可以如此概括地形容：直言强悍并自述有功于南大创建的李星可、温婉谦逊并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的连士升、积极培育提携后进以继承文化事业并主张大同世界的杏影、以编辑出版丛书推荐新进作者并以推广及保存新华文学为己任的李汝琳、曾被冠以黄色小说作家但捐赠遗产以传承华文文艺的姚紫、受英文教育但爱用粤语方言行文的英文教师苗秀、以及注重文论及建构新华文学典律的赵戎。他们各自对新华文艺作出独特的贡献，而他们的特色相互辉映，更建构成一副丰富多姿的新华文学拼图。这七位作家的比较见附录 3 及附录 4。

第四节 研究问题

本研究是以 1945 年二战后以及这七位作家中的移民作家杏影的抵新日期为上限，以南洋大学的闭幕为下限，目的是以这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的状况为时代背景，也由于这七位作家主要的创作阶段，是在 1945 至 1980 年之内。然而研究内容不局限于此段时间，首先承先启后是一个过程，这七位作家最年长的是出生于 1907 年的连士升，最晚为 1996 年离世的李星可，作家的思想意识不能以时间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或与他们的经历分割，而本地出生的苗秀与赵戎，更是一生居住于此。其中如李星可写于 1985 年后批评柏杨崇洋媚外的文章，是他一贯的观点，而赵戎写于 1938 年的《泛论新启蒙运动》，是他支持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前奏。

⁶⁴ 见本论文附录 3:李星可·连士升·杏影·李汝琳·姚紫·苗秀·赵戎的比较及附录 4: 新华七位华文作家经历简览。

⁶⁵ 这七位作家在作品中常称中国为‘祖国’，或因他们未仔细分辨‘祖国’的含义。由他们的作品内容可知他们缅怀的是国土与人民，而非政权。姚紫对此表达得更清楚，见第四章。

在此前提下，本论文包括了主要两个维度：这七位文人是华人华文作家，也是离散族裔，他们的文字展示了他们对时局的观点、对故国新家的思索、从侨民到公民的过程。他们以文字引导读者，见证了历史，也塑造了历史。本研究以中国心、本土情、新华人三个课题为轴心，于第四至第六章详细讲论他们曾经居留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新加坡对这七位华文作家的影响与他们的回应，以及他们如何以文字留住过去，见证当下，指向未来。他们以文字记录了移民和本土出生的华人如何调适自己进入当地多元的、以英语语境为主的国家社会，在缅怀故乡与探索新国之间，或挣扎、或双重认同，最终落地生根的过程。这过程的书写代表了新加坡离散文学，开辟了世界离散文学的新篇章。游俊豪认为马华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场域，⁶⁶新华文学亦然。这七位华文作家为新华文学，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场域。

第五节 研究方法

1. 文本细读与分析

本研究的对象是李星可、连士升、姚紫、杏影、李汝琳、赵戎和苗秀七位华文作家，他们每位都有丰富的创作（见附录 5-11）。通过文本细读与分析，我们可以探视他们的内心世界、国家意识、世界观。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主要的目的是除去以作者为本位的‘作者中心化’，将文本的阐释归于读者，而不同作品间的交织与参照才能释放作品的意义。⁶⁷作品的形成也不能无中生有，而是作者受了不同来源的文化代码，包括文字、图像、音乐等组成的一个互文空间，在读者的诠释下释放意义，否则这些作品只存留于文字的阶段。作为在这研究时段内生活的作家，他们承接母国和其他地域的生活经历与文化，继续与在地国多元文化交流融合，他们也互相认识，有些更有

⁶⁶ 游俊豪〈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页 153-174.

⁶⁷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See <https://newlearningonline.com/literacies/chapter-8/roland-barthes-on-the-death-of-the-author>. Accessed 4 April 2020.

深交，能互相影响。⁶⁸本论文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将抽丝剥茧，在时代背景下，一面解读他们个人的书写，再综合群像，理解他们从移民至定居者，从侨民到公民的过程。

2. 原始资料的搜索与应用

李星可、连士升，杏影、李汝琳、姚紫、苗秀和赵戎的作品都是原始资料，有些曾零散刊登在报章上，有些已结集成书。本研究先需搜索他们个人的作品，再以研究问题为轴心，寻找他们作为离散华人的轨迹；在筛出个别作家的体验时，再比照其他作家，并以理论与概念分析综合成一个群像的拼图。这七位作家的作品有不同体裁，且数量庞大。

李星可的政论文章主要收集在他的《政论选集》（165 篇）、《政论新集》（77 篇）及《政论近集》（84 篇）、《政论选集外篇》（28 篇）中；论文有语音研究、戏剧研究；文学创作有戏剧、传记、相声等。

连士升的政论文章收集在他的《慧眼静观》与《卓识思远》（各 52 篇）中；五大集的《连士升文集》包括了游记《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印度洋舟中》；散文《给新青年》、《闲人杂记》、《回首四十年》、《南行集》；传记：《泰戈尔传》、《甘地传》、《尼赫鲁传》、《西方英雄谱》；书信（2 集《海滨寄简》）之《物华集》、《天宝集》、《人杰集》、《地灵集》、《落霞集》、《孤鹜集》、《秋水集》、《长天集》。其他还有未收入在这五大文集集中的游记《祖国纪行》和《名山胜水》以及散文《春树集》。他还有翻译作品未能寻获。

⁶⁸ 例如李汝琳的三套丛书中包括了李星可、连士升、杏影、苗秀、赵戎的作品；赵戎认为他的《芭洋上》是因李汝琳的催促才得以出版，并对李星可的戏剧极为赞赏；连士升为李星可的《南洋与中国戏》作序，为李汝琳奔走和担保，保住了教职；姚紫曾在连士升的邀请下评述连士升及其游记《印度洋舟中》，姚紫和苗秀还有些小摩擦；杏影在印度期间认识了李汝琳等，互称‘印度同乡’；赵戎和苗秀更是好友，共同支持马华文学的独特性。

杏影的散文收集于《读书与写作》（19 篇）、《书与人》（54 篇）、《趁年轻的时候》（44 篇）、《愚人的世纪》（79 篇）、《想想写写》（142 篇）及《杏影散文选》（70 篇）中。⁶⁹

李汝琳可寻获的作品有诗歌集：《惜昨集》（3 辑，共 26 首）、《再生集》（11 首）、《叩门》（2 辑，共 11 首）、《金与沙》（22 首）；散文及杂文集《艰险的行程》（3 辑，共 13 篇）、《消夜集》（再版共 9 篇）；小说集有《悔》（2 篇）、《姐妹俩》（再版共 9 篇）、《新贵》（7 篇）、《漂浮》（8 篇）及长篇小说《漩涡》；戏剧有《五分钟内》、独幕剧《梦》及《李汝琳创作集》（包括诗歌 53 首、散文/杂文 23 篇和戏剧 2 齣，共 78 篇，不包括小说）。⁷⁰

姚紫生前的出版计有 11 本小说：中篇小说《秀子姑娘》、《乌拉山之夜》、《咖啡的诱惑》（与《咖啡底诱惑》同）、《阎王沟》，《风波》、《半夜灯前十年事》、《没有季节的秋天》，短篇小说集《窝浪拉里》（又名《兰娜》，2 篇）、《带火者》（3 篇）⁷¹、《马场女神》（6 篇）、《萍水记》（又名《葬情记》）；1 本散文集《情感的野马》（3 辑，共 13 篇），1 本杂文集《黑夜行》（31 篇），历史评论《西楚霸王 - 项羽》⁷²。其实他还有许多作品没有出版，在他离世后，他的好友兼遗产信托人，替他出版了 9 本书，包括 4 本小说：《新加坡传奇》（2 辑，共 21 篇）、《木桶鸭》（16 篇）、《九月的原野》（8 篇）、《潜龙记》（5 篇），一本散文集《九月的风》（4 辑，42 篇），2 本杂文集：《杂文 - 这支部队》（7 辑，58 篇）与《短长书》（3 辑，59 篇），一本新诗集《夜歌》（27 首）及一本旧诗词集《郑梦周诗词集》（139 首）。⁷³

⁶⁹ 《杏影散文选》中的散文与其他杏影的书籍有些重复。

⁷⁰ 李汝琳的作品集其中有些作品重复。

⁷¹ 1965 年由新加坡天马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窝浪拉里》收入《带火者》（又名《带火的女性》），而 1955 年由新加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带火者》除了收入《带火者》、《小黑子》外，也收入《窝浪拉里》。见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页 29；谢克〈姚紫小说内容提要〉，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284，300-303，308。

⁷² 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19-41；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⁷³ 郑梦周（姚紫原名）《郑梦周诗词集》（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1989）无目录。笔者以诗词集题目计算。

苗秀有短篇小说集《旅愁》（6 篇）、《第十六个》（10 篇）、《边鼓》（7 篇）、《红雾》（11 篇）、《人畜之间》（5 篇）、《苗秀小说选》（21 篇）；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年代和青春》、《小城忧鬱》；长篇小说《火浪》和《残夜行》；散文及杂文《文学与生活》（4 个部分，共 57 篇）；戏剧独幕剧〈夜〉。⁷⁴苗秀也著有文学评论《马华文学史话》（39 篇），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中，苗秀编《理论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及写导论，并与赵戎、钟祺合编《戏剧集》。⁷⁵

赵戎的作品也非常丰富，有短篇小说集《芭洋上》（5 篇），有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为他出版的，作为《中教文艺小丛书》的小说集《热带风情画》、《楼上花枝笑独眠》、《神媒》、《我们这一伙》、《周末篇》、《流浪行》，以及新加坡文艺协会为他出版的《赵戎小说选》（23 篇）⁷⁶；中篇小说《海恋》、长篇小说《马六甲海峡》；杂文《坎坷集》⁷⁷；文学评论《论马华作家与作品》（6 篇）、《赵戎文艺论文集》（4 篇）、在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中，赵戎编《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剧本集》和《史料集》。前三集赵戎写了导论，为《史料集》则写序例。在苗秀编的《理论集》中，赵戎发表了 11 篇评论。此外还有《赵戎文艺批评集》（13 篇）、《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13 篇）、《文艺月旦集》（29 篇）。《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更是包括了从战前至 1977 年 12 月止的书名、人名、语词、其他 4 大部分，共 5 千多条目，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除了这些书籍，李星可、苗秀和赵戎还有资料夹被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保存，其中包括他们的手迹。⁷⁸此外，本研究的原始资料还包括国家档案中的口述历史。与本研究有关的口述历史包括了新加坡国家历史档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和

⁷⁴ 独幕剧〈夜〉收于《边鼓》中。另有将《新加坡屋顶下》改成的多幕剧，但未能寻获。

⁷⁵ 刘笔农记苗秀也写过诗，有一首新诗在《星洲人》杂志上发表，见刘笔农〈关于苗秀和他的作品〉，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44，但未记新诗名称及其他详情。叶钟铃记苗秀（署名丘居竹）曾写《蜘蛛》一诗讽刺殖民地社会的剥削，于 1949 年 7 月 28 日在《晨星》发表，见叶钟铃〈苗秀与《晨星》副刊〉，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205-207 及《苗秀资料夹》中的《南洋教育》（1990 年 12 月）第 135 期，页 20。（Call Number: Chinese C810.092 MXZ, BRN: 12535866）然笔者未能寻获此诗。

⁷⁶ 赵戎小说集中有些作品也收于其他集子中。

⁷⁷ 据刘笔农〈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页 51 记《集锦集》是赵戎未出版的杂文集之一。刘笔农此文原刊于范北聆所编星洲日报《世纪风》，但未注明发表日期。《集锦集》尚未能于各大图书馆网站寻获。

⁷⁸ 《李星可资料夹》含：1 张彩色照片、作家简介、1 份为‘新马华文写作人辞典’填写的表格，以及作品‘一位汉学家之死’（Call Number: Chinese C810.092 LXX, BRN: 12536319）；《苗秀资料夹》含苗秀简介、亲笔署名信件、苗秀书目、苗秀生平与作品的座谈会通告及《南洋教育》第 135 期；《赵戎资料夹》包括作品手稿〈豆腐街 24 小时〉（Call Number: Chinese C810.092 ZRZ, BRN: 84550525）。

高凡与连士升夫人罗梅和他的子女连亮思、连侨思、连文思、连萧思、女婿高华岳的访谈，⁷⁹以及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所收录与李星可的访谈。⁸⁰李星可也将访谈记录完整地收录于《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之中。⁸¹口述历史是珍贵的文史资料，可用来说明作家的看法或写作背景。孔莉莎和黄坚立认为口述历史可能存在因口述者有意隐瞒某些对他们不利的事实而缺乏准确性，⁸²然而波尔泰利（Alessandro Portelli）则认为只要与事实没有冲突，口述历史表达的是另一种可信度，因为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向往，一种心理的现实，它的重要性其实就在于它的主观性。⁸³

国家档案也包括当时历史的原始文献，包括各类人口调查（不同年度、种族、性别、出生地等）及教育报告。其他原始资料还包括会馆记录以及学校纪念刊。从这些原始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轨迹，从细微的观察中看到世界大舞台的转换。通过这些资料和数据，可以更加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意识，并进一步印证、甚至拓展理论。

3. 跨学科的研究

这不是一项纯文学的研究，而是以跨学科的多元视角，审视离散华人的心态；从历史的视角，以作家的经历及他们的作品，在移民迁徙的历史脉络中，在新加坡多元种族和文化的社会环境中，看华文文人如何适应，如何成为新加坡人。与此同时，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甚至人文地理中有关移民与地域关系的研究都给予离散华文作家从侨民至公民的过程有效的指引。

⁷⁹ *National Archives, Literary Scene in Singapore (Chinese), NLB Accession Number 003126. LUO Mei @ Mrs Lien Shih Sheng 罗梅@连士升夫人; LIEN Lian Sze; LIEN Qiao Si; LIEN Wen Sze; LIEN Siao Sze.* All 8 Reels/Discs: 11 Mar 2007, Reels/Discs 1 & 2; 18 Mar 2007, Reel/Disc 3; 25 Mar 2007, Reels/Discs 4 & 5; 1 Apr 2007, Reels/Discs 6 & 7; 22 Apr 2007, Reel/Disc 8. Accessed 9.8.2019. 高凡与连士升家属的访谈，见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评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7），页185-199。

⁸⁰ *National Archives,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65-1985, Accession Number 000772. LY Singko 李星可.* All 9 Reel/Discs: 15 Apr 1987, Reel/Discs 1 -4; 16 Apr 1987, Reel/Discs 5 -9. Accessed 9.8.2019.

⁸¹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91。书中前言及‘答客问’都收于访谈第9卷中。

⁸² Hong Lysa and Huang Jianli, *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 Singapore and Its Pasts*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p. 70.

⁸³ Alessandro Portelli,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in Oral Histor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p. 50-51.

历史学重历史发展的轨迹，从事实、例证、考据说明历史现象。本研究将审视新加坡社会的状况及海外华人作为侨居者和定居者的过程，从事实、例证、考据，理解历史的概念和理论。

社会学关注社会的现象与规律，包括社会如何演进，不但注重描述现状，也注意社会变迁。中国知名社会学者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不单是有关社会结构的分析和描述，反映社会的宏观面貌和发展轨迹，还要研究社区里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希望和追求。前者是社会的生态，后者是社会的心态。⁸⁴，社会学有许多种类，其中的历史社会学更侧重对社会群体，以及历史比较的研究，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德国学者韦伯（Maximilian Emil Weber）主张以阐释和理解的方法来发现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

⁸⁵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更认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 — 或任何一项深思熟虑的社会研究 — 都需要一个社会视野的构想和对历史资料的充分利用”

⁸⁶在运用历史材料进行比较的研究中，可以用社会学的定性研究法。据德国社会史学家凯博（Hartmut Kaelble）的归纳，绝大多数历史社会学著作所用的都是分析性比较，他们试图“从历史环境和历史先决条件中去解释或对一定的社会结构、体制、心态、辩论、时间、决策进行模式归纳”。⁸⁷在本研究的时段中，历史环境将能解释社会形态的变迁及对侨民和国民的冲击。

文化研究没有单一的、统一的理论，而是一个多样化的研究领域，包含许多不同的方法和视角，如社会理论、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理论、媒体理论、

⁸⁴ 费孝通（1910 - 2005）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著名学者。参费孝通〈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http://oa.shxyj.org/UploadFile/20130926008/2015-09-12/Issue/yt4kfkfb.pdf>. 阅览日期：4.10.2019.

⁸⁵ Maximilian Emil Weber (1864—1920), 参 Kieran Allen, *Max Weber: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hapter 5: Methodology*. pp.68-80. (Pluto Press,2004). DOI: 10.2307/j.ctt18fs592; Guenther Roth and Max Weber,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7, No. 3 (Special Issue. History and Sociology) (Published by Wiley on behalf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Sep.,1976), pp.306-318. DOI: 10.2307/589618.

⁸⁶ Charles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1961), p.145. 转载自严飞〈历史、社会与历史社会学〉，王天夫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八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2月），页6。严飞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⁸⁷ 转引自李里峰〈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学海》，2018》，第三期，页4。参<http://www.sss.net.cn/106004/67141.aspx>. 阅览日期：4.10.2019. 李里峰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影视研究等。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焦点是阶级、种族、性别、文化认同、身份政治等，⁸⁸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研究范围都必须在一项研究内完成。本文在使用历史学、文学和社会学研究华文作者时，已包含了文化认同、身份政治的研究。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理论是现今最有影响力的论述之一，他有关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论述，也是本研究主要的概念之一。

第六节 前人研究

1. 个别作家的评论⁸⁹

对于本研究中的七位文人，不乏学者或其他文人对他们的评述，但都止于对他们的言行、作品和贡献。有些提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但欠缺深入的探讨，更非本研究探讨的有关他们作为离散华文作家的范畴。

对于李星可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他的戏剧创作和研究上。王赓武认为李星可是当时两位“最出色的剧作人”之一，⁹⁰赵戎给予李星可的戏剧创作与研究及小说翻译有高度的评价，并认为他的修辞简练明快，有高度的艺术性，是本地作家群里首屈一指的戏剧家和翻译家。⁹¹他更强调，除了几个历史剧外，李星可的戏剧创作都是取材于当地。詹道玉也指出李星可戏剧的四大特色之一是除历史剧外，一律描写本地现实。⁹²赖伯疆指出李星可的喜剧特色并以此揭示社会问题。⁹³赵戎也指出李星可曾与邵荃麟等组织国际性的‘中法文艺协会’，积极展开抗战宣传工作，厥功殊伟。⁹⁴对于李星可的民族意识，

⁸⁸ 张松建《中国现代文学专题 - 中国新诗研究》，2019年4月5日讲堂课大纲：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张松建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⁸⁹ 参附录5-11 七位作家的生平、著作、他人评论等。

⁹⁰ 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pp. 281-287. 另外一位剧作者是林晨。

⁹¹ 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98-123。（2005年为简体字版。繁体字版出版于1967年）。

⁹²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戏剧》，（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页121-122。

⁹³ 赖伯疆《东南亚戏剧概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页119-120。

⁹⁴ 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页98。

萧依钊以记述兼与李星可访谈的方式，时而让李星可以第一人称，表明他维护华文，以中华民族为傲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在评述中国民族迁徙的历史、澳洲、巴黎、美国华人移民的情况时，李星可呼吁华人团结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华巫团结以维持社会的稳定。⁹⁵近期的评论有鲁虎对李星可中国观的评述。鲁虎指出，李星可的中国叙说是‘隐约晦涩’的，以间接谈论文化及把中国与其他国家归类，避免单独讨论的方法论述。⁹⁶

连士升的《连士升纪念文集》收集了 27 篇文章，记录他的嘉言懿行以及对他的回忆哀思，只有两人略有批评的文字。⁹⁷对于他的评述较详细的有高凡的《连士升传·文学评述》主要指出连士升的思想为人和以文学分析为出发点的作品评述，⁹⁸郑嘉怡的学士论文《连士升与新马华人文化》⁹⁹提到他对中国的想望、教育观点和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其他还有单篇文章，如陈文彬、苏永明的《连士升史学初论》谈连士升对经济史的研究，¹⁰⁰蒋亭亭《南洋传家第一人 - 新加坡第一位职业传记家连士升》谈连士升对新加坡文化的贡献，¹⁰¹陶恒生的《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肯定连士升的文笔和治经济史的态度，¹⁰²许福吉〈长河日落圆〉，赞赏连士升书信散文所流露出以人为本的精神。¹⁰³也有一些文章如马夫之的《作家作品研究》与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7），散文一集》的〈导言〉，在肯定连士升的文笔时，也批判了他作品的深度和局限性。¹⁰⁴

⁹⁵ 萧依钊《一位传奇人物李星可》（星洲日报 1984. 4. 2），收于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71-186。

⁹⁶ 鲁虎《新马华人中国观之研究，1949-1965》（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及八方文艺创作室，2014），页 218-226。

⁹⁷ 连文思、连亮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新加坡：南洋学会，1976）。只有刘子政和蒲耀瓊略有批评的文字。

⁹⁸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评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7）。

⁹⁹ 郑嘉怡《连士升与新马华人文化》为郑嘉怡国大中文系 2002/2003 荣誉学位论文。

¹⁰⁰ 陈文彬、苏永明《连士升史学初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4 期）。

¹⁰¹ 蒋亭亭《南洋传家第一人 - 新加坡第一位职业传记家连士升》（现代传记研究，2018 年第 2 期）。

¹⁰² 陶恒生的《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

<http://www.hstao.com/Lien.pdf>。阅览日期：10. 8. 2019。

¹⁰³ 许福吉序〈长河日落圆〉，载连侨思、连文思、连亮思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八集 - 长天集》，（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7 年），页 8。

¹⁰⁴ 马夫之《作家作品研究》（评论集）（马来西亚：彩虹出版社，1996），页 97-105；方修〈导言〉，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7），散文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81），页 12。

新加坡文艺协会为杏影、李汝琳、姚紫、苗秀与赵戎各人出版了专集。内容包括他们的生平、选文、对他们的感念及评论。《杏影研究专集》由骆明主编，¹⁰⁵其他对杏影的评论主要有黎达材的专书《杏影作品的启示》¹⁰⁶以及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的《杏影 - 他不会寂寞》¹⁰⁷。

收集于《杏影研究专集》评论杏影作品的文字中，马夫之提到杏影大同世界的理想，但批评杏影不如萧伯纳的敢怒敢骂。¹⁰⁸李向认为杏影的作品虽然沉重，但并不‘灰色’；他关心人类的命运，却积极乐观。¹⁰⁹庄明萱总结杏影为哲理散文家、文艺评论家与思想家。¹¹⁰

黎达材《杏影作品的启示》以杏影的五本散文集《读书和写作》、《趁年轻的时候》、《书与人》、《想想写写》、《愚人的世纪》的内容，指出杏影对中国的情怀、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宗教观、通过飞禽走兽抒发的感情，杏影的乐观和苦恼、对新加坡的见解、感情、新加坡的生存之道和前景、以及世界大同的理想。虽然其中涉及杏影的思想意识，然而焦点分散，且有多处借题发挥。

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的《杏影 - 他不会寂寞》除了杏影的生平外，详细记录了他的作品总目，较少见的书信、手稿、诗歌、佚文及为别的作家写的序文，研究杏影的资料，他主编的副刊的内容，以及他的‘文风之友’在他逝世 40 年后为他举行的纪念会及展览的专辑，给杏影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反映了杏影的影响之深，对文坛的贡献之巨，以及对他研究之必要。¹¹¹

¹⁰⁵ 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

¹⁰⁶ 黎达材《杏影作品的启示》（新加坡：岛屿文化社，1993）。另一篇单篇文章：黎达材《羞把诗书问故人 - 试论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散文作家杏影的‘祖国’情怀》（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1991）与黎达材《杏影作品的启示》之第一篇〈羞把诗书问故人〉内容相同。

¹⁰⁷ 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的《杏影 - 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

¹⁰⁸ 马夫之〈论杏影〉，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49-62。

¹⁰⁹ 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63-82。

¹¹⁰ 庄明萱〈杏影论〉，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83-92。

¹¹¹ 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的《杏影 - 他不会寂寞》。《文风》为杏影主编的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之一。‘文风之友’为《文风》的作者。

新加坡文艺协会为李汝琳出版的专集中的评述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分析作品的思想意识和艺术特色。¹¹²其中苏卫红的〈李汝琳小说创作浅论〉，以李汝琳的〈内疚〉为例，指出他的小说“既具有热带南洋社会的色彩，又带着中国母体文化传统的胎记与印痕。”，但再无进一步的伸展。¹¹³

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是李汝琳的儿女于1984年为庆祝他们父亲的七十大寿而出版的专集，共有24篇。¹¹⁴其中15篇被收进2003年新加坡文艺协会为他出版的《李汝琳研究专集》中，其他的9篇止于对李汝琳的作品和编辑工作的分析与肯定。

《姚紫研究专集》中评论姚紫作品的部分有七篇，一篇是《郑梦周诗词集》的序言，其他六篇是对姚紫小说的分析。其中周宁以姚紫的《秀子姑娘》、《窝浪拉里》、《咖啡的诱惑》、《新加坡传奇》为例，认为姚紫在这些小说中都有一个‘拯救者的形象’，希望以爱来拯救现实，但总是失败，是新华现实主义小说的反映。¹¹⁵然而陈贤茂却认为姚紫的作品是时代的见证，¹¹⁶黄万华也认为姚紫的作品虽非全以南洋地域和社会为背景，却是‘地地道道的南洋华文小说’，‘以其人物、题旨的深厚的社会性表明了新马华文小说的现实主义内核’。¹¹⁷另外三篇在分析姚紫对爱情的描写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否定了姚紫为黄色作家的称谓，并坚持向往光明、追求真理是姚紫作品的基调。¹¹⁸同样的，这些评论可作为参考，但并非本研究的重点。刘秀珍的博士论文《姚紫小说文学语言研究》，以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姚紫小说文学语言的时代风貌、人物性格印记、地域色彩及姚紫小说的文体特色等”。¹¹⁹笔者则将结合姚紫对新加坡的认同，深入的讨论姚紫的方言艺术及作品中的地域色彩。

¹¹² 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

¹¹³ 苏卫红〈李汝琳小说创作浅论〉，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307-315。

¹¹⁴ 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怀庐书屋（出版地不详），1984）

¹¹⁵ 周宁〈拯救者形象与现实主义的命运〉，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178-183。

¹¹⁶ 陈贤茂〈论姚紫的小说创作〉，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165-177。

¹¹⁷ 黄万华〈姚紫小说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184-187。

¹¹⁸ 杨越〈追求和追求中的烦恼 - 姚紫小说简论〉，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157-164；郭惠芬〈青春风采丽人行 - 姚紫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188-198；苏菲〈姚紫与他塑造的殖民主义的小姐形象 - 短篇小说《窝浪拉里》〉，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199-204。

¹¹⁹ 刘秀珍《姚紫小说文学语言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3。引文见〈内容摘要〉，页4。

《苗秀研究专集》中对苗秀的评论包括了他的小说、诗歌、文艺批评及他的副刊编辑工作。¹²⁰其中陈世俊指出苗秀作品的历史性，以不同的年代为背景的小说有不同的题材。以四十年代为背景的小说，所关心的是当时在铁蹄下的人民及英勇的抗日分子；以五十年代初期为背景的小说，所关心的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及殖民地政府无能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及导致的小市民困苦的生活；以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为背景的小说，则主要以妇女、少女问题为题材。¹²¹赵戎不但称赞苗秀的每一篇都受得住历史的考验，还特别给予他的语言风格和艺术高度的评价，指出苗秀的作品充分的利用了方言艺术来表达。¹²²苗秀作品的时代意义与语言艺术将在本研究的问题中深入阐释。

赵戎不但欣赏苗秀的方言艺术，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使用了方言，重视语言艺术，更以理论推进，将‘吸收艺术语言’列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涵义之一。叶丽仪的《赵戎文学语言研究》及《热带的音符、节奏与旋律－赵戎华语文学语言勘察》，¹²³以文学语言的角度分析赵戎对语言的使用，指出“赵戎的文学语言既有大中华性，又具有很鲜明的本土性”。¹²⁴本论文对赵戎语言的使用及所呈现的思想意识，将结合他从华侨转换为离散的新加坡华人的过程，多角度的论述。

《赵戎研究专集》中的评论文字多数是讨论某些作品，有些讨论某种体裁或艺术手法。其中张长虹与潘亚瞰提到了赵戎作品中华人的双重认同。张长虹以赵戎的小说《在马六甲海峡》说明南洋华人不但怀念故乡，也和当地人民团结一心；以《海恋》为例，指出南洋青年要用文艺来启迪渔民，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指出这两部小说显示了从侨民文学向新华文学的过渡痕迹。¹²⁵潘亚瞰在说明赵戎如何擅长描绘南洋风情时，指出赵戎的《马六甲海峡》中在新加坡出生的华人的身上，体现出‘中国和新加坡两

¹²⁰ 见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中的下列文章：赵戎〈苗秀论〉，页 128-140；陈世俊〈苗秀小说中的题材与主题思想〉，页 141-159；陈世俊〈苗秀小说的艺术特色〉，页 160-178；陈实〈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页 179-192；林锦〈苗秀与《新野》〉，页 193-201；叶钟铃〈苗秀与《晨星》副刊〉，页 202-208；怀鹰〈苗秀的《文学与生活》〉，页 209-211。

¹²¹ 陈世俊〈苗秀小说中的题材与主题思想〉，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147。

¹²² 赵戎〈苗秀论〉，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1-19。

¹²³ 叶丽仪《赵戎文学语言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1；叶丽仪《热带的音符、节奏与旋律－赵戎华语文学语言勘察》（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9）。

¹²⁴ 叶丽仪〈内容摘要〉，《赵戎文学语言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1，页 i。

¹²⁵ 张长虹〈丹青妙笔话南洋－谈赵戎的长中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海恋》〉，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0），页 126-135。

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芭洋上》土生土长的华裔青年知识分子，自认是‘新加坡仔’，也是‘唐山’人，把中国人视为同胞。¹²⁶有关华人的双重认同，以及他们的华人性与中国性，将在研究问题中进一步开展。

对于前人对这七位作家的评述，有些可于参考，但都止于局部及个别的讨论，既无对他们个人全面的探索，亦无结合他们七人纵观的综述，更无以离散华人的视角，观察他们从以中国为‘祖国’的华人成为落地生根的新加坡华人的过程。

2. 王赓武《马华文学导论》¹²⁷

与上述的评述比较，王赓武的《马华文学导论》从历史的发展及作品的分析，评述马华文学的各种类型 - 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评论，有宏观的视野，也有细緻的分析。王教授的这篇文章最早在 1959 年发表，因此所评述的马华文学也包括新加坡的华文作品。

从历史的发展看，王教授追溯在 19 世纪末，已经有由本地居民执笔的有关马来亚的中文书写，但一直到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才有较严肃的作品。这些作品写得好的是古诗词，他们之中有一些革命志士推广中国的新文学，但其实是在宣传革命，不在写好作品。中日战争时，有一些作者以笔激起马来亚华人对中国的爱国热情，使本地华人关心中国的战争。但谈不上什么艺术手法。不过乳婴的《弗瑯工》、张曙生的《剪刀声里》以及韦晕的两篇短篇小说却是这时期的例外。日治时期，作者停止写作。战争结束后，作者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支持侨民文艺，另一方认为应创作新的马来亚

¹²⁶ 潘亚墩〈擅长描绘南洋风情的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160-162。

¹²⁷ 王赓武〈马华文学导论〉，收于赵戎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页 8-13。王赓武在该文前一部分提到马华年青作家接受马来亚为他们唯一的故乡，因此这里的‘故乡’应指马来亚。英文原文写于 1959 年，最先在发表于 T. Wignesana, *Bunga Ema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of Malaysian Literature, 1930-1963* (Kuala Lumpur: Blond/Rayirath (Raybooks) Publications, 1964). 英文稿亦收于 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pp. 281-286。

华文文学。结果因为报章和出版社都认为所有的创作都要为中国文艺服务，后者以失败告终。在战后的五年内，创作如火燎原，一些咒诅刚刚停止的法西斯战争，一些则有关正在开始的殖民主义斗争。不过，这些创作的艺术手法却没有改进。他们的感情掩盖了他们的艺术表现，他们的政治立场模糊了他们的写作目的。然而，在这五年中，自信在增长，文字的驾驭能力在提高。在这时候，两件事情发生了，一是马来亚的紧急法令，另一个是中共政权的建立。马来亚的紧急法令使活跃分子冷静下来，中共政权却禁止了最新文艺的输出。后者激发居留本地的作家创作，也使他们获得解放，无须再为上海或香港的编辑写作，也不必迎合中国境内的读者。他们可以自由地书写他们所熟悉的自己、家人、朋友和处境。他们最终可以为他们的马来亚读者服务。在笔者的研究中，将关注战后的作者，如何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如何为本地的读者服务，为他们表达心声。

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的独立和新加坡的自治肯定了文学中的马来亚性（Malayan-ness）。年长的海外华人被迫捍卫他们的看法，而年轻的马来亚人则开始寻找他们自己的身份。这年轻一代的作者中，有两位战前已经来马来亚，其中一位是已为人知的韦晕，另一位是苗秀。苗秀从小就南来而且在这里接受英文教育。他的华文大部分是艰苦自学的，他的风格没有韦晕那么严肃，但他对本地的情景掌握得当，故事生动，人物鲜明，他把战前数年和日治时期的情景融入他的作品中。苗秀对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的社会历史有很大的贡献。短篇小说的写作方式非常受欢迎。王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关注短篇小说的作者在未来十年里的创作，因为假以时日一定有更好的作品。至于现代诗歌，王教授认为现代诗歌形式上的自由其实需要更高的技巧和更完善的处理。散文方面王教授认为印尼华人威北华的印尼经历丰富了他的散文。虽然他的文句曲折，但有些创意。对于新加坡的戏剧，虽然现得较晚，也有几齣好创作。最出色的剧作人有两位，一位是李星可，另一位是林晨。王教授认为从他们的剧本中，这两位都很快可以从写独幕剧，进而写长剧。有关严肃的文艺评论，王教授认为在战后就开始有关于马来亚华文创作本质的讨论，但并未持续下去。只有在过去的五年中才有人对过去二十年的小说和诗句加以评论。方修和以多、赵戎和西樵都对本

地作品作出了有用的评述。¹²⁸ 王教授肯定马华文学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上，扮演重大的角色：

“他们用中文写作，因为这是他们熟悉的语文。只要有读者，他们有权利继续用中文写作。在这时期的国家发展中，马华文学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也要扮演关键的角色。如果它能成功的激发华人对马来亚的热爱以及对马来亚的全心认同，马华文学功不可没。如在目前的基础上马华文学继续发展，成为杰出的文学，那马来亚和我们都将引以为傲。”¹²⁹

王教授对马华文学从 20 世纪初到 1950 年代末的鸟瞰以及细緻的分析，提示了历史背景和文艺创作的关系，以及文艺所能扮演的角色。在王教授所赞赏的文人中，也有三位——苗秀、李星可和赵戎是笔者的研究对象。他们和其他四位作家的作品，将在本研究的目标和范畴内，除了观察历史发展对华文作家的影响，也将探索他们作为离散华人，如何适应多元文化的社会和语境与对新加坡的贡献。

3.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¹³⁰

崔贵强把 1945 二战后至 1959 年新加坡自治这 15 年间的历程分成三个阶段：1945-1949 年，1950-1955 年及 1956-1959 年，讲述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变过程。他认为第一阶段的新马华人多半眷恋中国，不过由于中国与新马政治的变化，开始关注新马的发展。第二阶段是中国移民及他们的后代国家认同转向的过渡时期。中共政权在 1949 年 10 月建立后，海外华人的政治倾向受到困扰，新马的政策也促使华人做出抉择。1950 年 1 月，中英建交，英国承认中国政权，但当时国民党势力仍在，对中共要介入的‘护侨’活动和设立领事馆的意图，激烈反对。1951 年马来亚联合邦颁布的人力动员条例，使适龄青年争相北归。1952 年，新加坡政府也决定以国民服务法令取代人力动员条例，不但造成青年北归，也爆发了 1954 年的五一三事件。随后周恩来在 1955 年万隆会议上和印尼签订的双重国籍条约，更给予华人重要的提示，只能选择一

¹²⁸ 其实以多和西樵都是赵戎的笔名。见马崙〈梅花香自古寒来〉，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96；刘笔农〈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52；黄梅雨〈赵戎的笔名〉，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86-93。

¹²⁹ 笔者意译自王赓武英文原文：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pp. 281-286.

¹³⁰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修订卷）（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个国籍。在第三阶段的 1956 年，马来亚和新加坡都积极为华人争取公民权，当时新马的中华总商会和马华公会的华社领袖也为华人争取权益。虽然过程曲折，马来亚联合邦在 1957 年独立，新加坡则在 1959 年成为自治邦。崔贵强的论述的历史进程可作为笔者的参考。

崔贵强再把 1945 年到 1949 年间的新马华人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包括国民党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以及两方面的支持者。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迥异，但都认同中国。第二个群体包括了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华人。他们不热衷于政治，但仍以中国籍民自豪。第三个群体是认同与当地政治的海峡华人、马共及其支持者。对于 1949 年后，崔贵强却没有再加以分类。崔贵强引述王赓武的论文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中把华人分成的三个群体 - 关注中国命运并与中国保持直接或间接关系；关注商业与社团利益，在政治上保持低姿态；以及一般上效忠于马来亚，由峇峇、英籍海峡华人、马来亚爱国主义者和其他动机不明的人组成的群体。¹³¹，他认为他讲述的 1945 年到 1949 年间新马华人的这三个群体能被包括入王赓武所讲述的，从 1942 年之前直到 1969 年的三个群体中。王赓武所讲述的是跨越长时期、不同阶段的三组华人的变化，崔贵强所讲述的，能够对 1945 年到 1949 年间的史料做一些补充，崔贵强和王赓武的华人类别，也能给予一些提示，然而是否能将华人如此明确区分，尚待探讨。

崔贵强引用了许多资料，包括原始档案、中英文报刊、人口数据，中华总商会章程，以及许多知名学者如王赓武、杨进发、陈志明、斯金纳（C. William Skinner）的论述。崔贵强主要是以历史的轨迹，论述新马华人国家认同意识的转变，他也举了一些作品为例，简单的叙述新马华文学反映了新马华人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意识，还未能充分说明这认同意识的表达。此外，崔贵强研究的时段是从 1945 到 1959 年，而笔者的这项研究下限为 1980 年。笔者将以 1945 年至 1980 年的社会、政治、教育、经济为历史背景，对这时段七位作家的华文作品加以细读和分析，了解这段时期的华人身份意识的转变，呈现当时文人的思想面貌。

¹³¹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1981), pp.173-200.

4. 新华文学史

多位学者为新华文学史进行分期整理及编撰作品集，其中包括方修、黄孟文、徐迺翔、王润华、蔡志礼、许通元、李金生、曾繁靖、李廷辉、柏杨、杨松年的研究。

方修的文学史分期及选集

方修是作者，更以编撰新马华文文学的第一人著称。¹³² 因为他是在没有系统化的前人研究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基础上发掘史料、从中寻找新马华文新文学的发展轨迹和特征，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根据统计，他自己写的书和文章共出版了 42 本，他编辑和编撰的书更达 64 本之多。¹³³ 他的编撰工作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文学史，重要的有《马华新文学大系》，包括战前（1919-1942）和战后（1945-1975）两大部分；¹³⁴ 另一组是马华文学作品的选集，如《马华新文学选集》以及《马华文学作品选》。方修从报章杂志收集了大量的属于原始资料的文学作品并从中抽绎出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轨迹和特征后，把这些作品结集成书，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参考。因此这些作品选虽可说是文学大系的附篇，却是检阅新马华文文学史的重要依据。

方修把战前的文学史分成 4 期：萌芽期（1919-1925）、扩展期（1925-1931）、低潮期（1933-1936）和繁荣期（1937-1942）。战后的文学史则分成 5 期：高潮期或战后初期（1945-1948）、紧急状态期（1948-1953）、反黄运动期（1953-1956）、复兴期（1957-1965）和低潮期或世界性思潮冲击期（1965-1976）。为了补充日治时期和新马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状况，方修在另一本文学史《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中，加入了沦陷时期（1942-1945）的作品。¹³⁵ 虽然战前战后的文学史都是以时段分期，但战前是以文学史发展的进程来分期，而战后则多以当时的特征或特殊状况来区别。沦陷时期则以种类来划分。方修把不同的文体以文学史的分期评述，加上方修为每个集子

¹³² 长河〈序二〉，于何炳彪、梁慧群主编，《方修编著资料辑录》（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8），页 ii。方修原名吴之光（1922-2010）。

¹³³ 何炳彪、梁慧群主编《方修编著资料辑录》（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8）。

¹³⁴ 战后的部分方修还另编辑《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99）、《小说二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99）、《诗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戏剧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

¹³⁵ 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沦陷时期的作品包括汉奸文学和顺民文学。

所写的导言，分开来看，就是新马华文文学各种文体发展轨迹的勾勒，整体来看，结合不同的文体类型，就能看出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是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总面貌的描绘。

黄孟文与徐迺翔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

黄孟文与徐迺翔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也将新华文学史分期。这本著作分成上下两篇，上篇自 1914 至 1964 年，下篇自 1965 至约 2000 年。¹³⁶ 此书除了以文学史分期，评述了每一期的文学现象与思潮，并论述了上下篇两个大时段内不同形式的文学创作，进一步说明各文学史分期的特色。这些不同形式的文学创作由不同的编者执笔评述，¹³⁷

本书的小说创作的讨论由黄万华执笔，他认为 1945 年至 1965 年的小说创作，经历了紧急状态、反黄运动、独立自主等政治风云，摆脱了稚嫩、转向成熟，并为 80 年代绚烂多姿的小说铺路，是新华小说史上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在量方面，新加坡作家出版的小说有 140 部之多，在内容上，小说敏锐地审视社会人生的各层面，总体是积极上进的，而且始终关注南洋的命运，“以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了从侨民社会到华人社会的历史发展”。在小说作者和著作上，黄万华把他们分为南来作家和本地作家两类。于南来作家群中，他包括了姚紫与李汝琳，而在本地作者中包括了苗秀与赵戎。在 1965 年至 1980 年发表作品的小说作者中，笔者研究的对象姚紫、苗秀、赵戎与李汝琳再度被肯定。¹³⁸

由王淑秧执笔的散文作者和著作部分，指出战后至 1980 年，还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到了 70 年代末，方出现现代主义的影响。对于战后的 1945 至 1965 年的作者，她包括了本研究中的杏影和连士升。这期的散文形式以杂文、随笔和记述散文为主，其中随笔

¹³⁶ 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企业公司可联合出版，2002）。这本著作分成上下两篇，上篇自 1914 至 1964 年，下篇只注明自 1965 始，未注下限。从文章〈后记〉页 459 所注的 2001 年 9 月 30 日及下篇内容推算，下限应约为 2000 年。

¹³⁷ 黄孟文、徐迺翔〈后记〉，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页 458。

¹³⁸ 黄万华执笔第四章〈本时期（1919-1964）的文学创作〉的小说创作一节及第七章〈本时期（1965-）的文学创作〉的小说创作一节，见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页 107-135，267-314 及 458。引文见页 113。页 114-116 写姚紫，页 120-121 写李汝琳，页 124-126 写苗秀，页 126-127 写赵戎。

和记述散文在 1965 至 1980 年间也一样丰富，但在独立后，游记散文日渐多了起来。独立后至 1980 年的作者，不包括杂文的散文作者已有近百人之多。¹³⁹

由马德俊与关辛秋执笔的诗歌创作，指出于 1954-1965 年间，新加坡经历了自治，走向独立，提倡作品要有本地意识和色彩的主张进一步发展，其中姚紫、李汝琳都是当时的诗歌作者。¹⁴⁰

本书的戏剧创作部分由岳玉杰执笔，他认为战后至独立前的新华剧作和演出经历了复苏、拓展和相对沉寂的发展阶段，指出这时期的较有影响力的剧作者有林晨、李星可、叶苔痕等，并对李星可剧作赞誉有加，认为他的剧作剧情生动、构思巧妙、对白精辟、人物动作性强。¹⁴¹

这些不同形式的文艺创作评论者，肯定了笔者将研究的七位华文文人的成就：小说作者姚紫、李汝琳、苗秀与赵戎，散文作者杏影与连士升，诗人姚紫与李汝琳，以及戏剧作者李星可。但因此书是以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为主轴，不能对每位作者深入的评论，也没评述这些作家所书写的其他体裁，更无意就笔者的研究主题进行探讨。笔者将参考此书所描绘的文学史分期及各类创作的作为笔者研究对象的七位华文作家的大环境，进而探索研究时段中他们作为离散华人从侨民意识到本土化的历程。

王润华、蔡志礼、许通元、李金生、曾繁靖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¹⁴²

由潘国驹策划，王润华、蔡志礼、许通元、李金生、曾繁靖主编的《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展现了从 1965 年至 2015 年间出现的作家、出版的著作、文学社团、期刊、

¹³⁹ 王淑秧执笔第四章〈本时期（1919-1964）的文学创作〉的散文创作一节及第七章〈本时期（1965-）的文学创作〉的散文创作一节，同上，页 135-158 及页 314-369。对杏影与连士升的评述见页 144-149。

¹⁴⁰ 马德俊与关辛秋执笔第四章〈本时期（1919-1964）的文学创作〉的诗歌创作一节及第七章〈本时期（1965-）的文学创作〉的诗歌创作一节，同上，页 150-183 及页 369-436。页 176 简单的提到姚紫和李汝琳。

¹⁴¹ 岳玉杰执笔第四章〈本时期（1919-1964）的文学创作〉的戏剧创作一节及第七章〈本时期（1965-）的文学创作〉的戏剧创作一节，同上，页 184-203 及页 436-448。对李星可的评述见页 202。

¹⁴² 潘国驹策划，王润华、蔡志礼、许通元、李金生、曾繁靖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艺创作室，2015）。

副刊、文学研究和学术研究论著，以多层面的文艺产品，通过不同的叙述了解国家和人民。因为新加坡虽然独立了，但“从国家权力形成的思想意识形态去了解一个国族是不完整的。文学艺术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历史记忆所创造出来的符号，在这里才可寻找到真正国族的声音”。¹⁴³

在这本书中，蔡志礼对新加坡 50 年来的文学先做了一个概述，提出了‘重英轻华’的教育政策对文学内容和出版事业的影响以及六七十年代政治的动荡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对新华华文文学所产生的冲击。¹⁴⁴ 许通元与曾繁靖列举了自 1965 年来 30 多个由写作人、表演艺术团体、学术机构（包括初院和大专）组成的社团，如何各自以不同的重点举办活动和出版刊物，但向同一拓展新华文艺的目标迈进，展现了新华文艺界燃烧薪火，生生不灭的热情。¹⁴⁵ 李金生所评述的新华 50 年的期刊和副刊，认为建国前期社会、政治、经济及教育变迁，造成文艺期刊的萎缩，然而新一代的文艺团体所出版的期刊，却逐渐成为文艺创作的中流砥柱。他进一步说明由文学团体、非文学团体和大专学生团体所出版的期刊和它们的特点，以及华文报章副刊和特色。¹⁴⁶ 李金生和曾繁靖的文章呈现了新华文艺界传承文化的坚持，而许通元与曾繁靖更以新加坡公民或居民 1965 年后已出版个人创作文集为标准，整理出 623 位华文作者的生平和著作，提醒读者这许多华文作者的努力耕耘。¹⁴⁷ 李金生再就这 1965 年来的三个研究系统——民间作家或独立研究者、新马两国的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的学术人员，以及外国的学术机构人员对新华文学研究的成果，作初步的整理；再评述了新华文学的演变、课题和研究范式，以及其中一些较具代表性的新华文学研究专著和论文在国内外的发展与贡献。¹⁴⁸ 在这本书中，李金生与许通元还选出并整理了这 50 年来的新华文学期刊以及有关新华文学的学术研究论著和学位论文。¹⁴⁹

¹⁴³ 王润华〈序：春耕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页 vi。

¹⁴⁴ 蔡志礼〈新加坡文学 50 年概述〉，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页 1-4。

¹⁴⁵ 许通元、曾繁靖〈新加坡华文文学社团 50 年〉，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页 5-28。

¹⁴⁶ 李金生〈新华文学期刊、副刊 50 年〉，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页 307-328。

¹⁴⁷ 许通元、曾繁靖〈新华文学 50 年：作家小传与创作书目〉，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页 29-306。

¹⁴⁸ 李金生〈新华文学 50 年：文学研究概况（1965-2015）〉，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页 337-360。

¹⁴⁹ 李金生、许通元〈新华文学期刊 50 年附录〉，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页 329-336；李金生、许通元〈新华文学 50 年：学术研究论著、论文选目〉，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页 361-409。

这许多篇文章以不同的角度描绘了建国 50 年以来的新华文艺风貌，给本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但本研究的研究，更希望能从新华文人的个案中，观察新华文人对时代的回应和自己身份的探索，充实新华文艺的研究。

其他资料

除了上述学者的文学史及作品集外，还可参考其他的集子，譬如以李廷辉为总编辑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8 集，收录了 1945-1965 年的各种文体；¹⁵⁰ 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共 5 集，有史料、诗歌、小说、散文和杂文，跨越 1945-1980 年。¹⁵¹ 另外还有新加坡文艺协会编的《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4 集收集了战后至 80 年代的小说、诗歌和散文，¹⁵² 杨松年主编的《从选集看历史：新马新诗选析（1919-1965）》，对每一个文学阶段先做概述，再选析诗歌，并选出一些诗作让读者自行阅读。¹⁵³ 王润华选出了从 1919 年至 1982 年 40 位作家的 64 首诗歌并就这段时期的马华文学写了一篇导论。¹⁵⁴ 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资料，也同样必须以批判的眼光研读。这些作品都有主编的导论或序言，都有参考的价值。

5. 离散书写

华人散居世界各地已久，描述他们的离散历程，包括以移居、离散或相关词语冠名与否的书写，难以统计。在这里的前人研究中，笔者取与新马华文文学有关，且以离散理论或概念解构作家或作品思想意识的书写作为例子。

¹⁵⁰ 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李廷辉总编辑，《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1974）。

¹⁵¹ 柏杨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1982）有史料集、诗歌集、小说集、散文集和杂文集，收集 1945-1980 年的作品。

¹⁵² 新加坡文艺协会编《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共 4 册 - 小说上下二册、诗歌、散文）（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¹⁵³ 杨松年《从选集看历史：新马新诗选析（1919-1965）》（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

¹⁵⁴ 王润华（Wong Yoon Wah）〈导论〉，见 Edwin Thumboo et al. eds. *Anthology of ASEAN Literatures: The Poetr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The ASEAN Committee on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ingapore National Printers Pte. Ltd., 1985), 页 196-207。

张松建的〈家国寻根与文化认同 - 谢裕民的离散书写〉, 结合 Robin Cohen, Willian Safran 的离散理论和概念, 王赓武的多重认同, Stuart Hall 的文化认同, 及至王德威的‘新三民主义’, 杜维明、李欧梵、周蕾、陈奕麟对中国性的去中心化和流动性, 王灵智落地生根的论述, 解读谢裕民的小说〈归去来兮〉、〈民国二十四年的荷兰水〉、〈三先生庙〉, 〈安汶假期〉及散文〈岛屿前身〉。张松建总结谢裕民离散书写的思考, 指出新加坡华人社群的文化认同是根植于‘社会流动和跨国离散的历史经验’, 与中国和本土邻里国家的横向联系; 文化认同经历祖辈到孙辈的世代交替, 不但具流动性, 也是一个‘去中国化’和‘去中心化’的过程; ‘一个族群文化认同的形成, 离不开与其他族群和文化的混血化 (creolization)、嫁接 (transculturation) 的过程’。

¹⁵⁵张松建以理论概念启示谢裕民的书写, 以谢裕民的书写说明理论, 游刃有余。

张松建与游俊豪以不同的角度解析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吕育陶的创作。¹⁵⁶张松建以吕育陶的三本诗集《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黄袜子, 自辩书》及《寻家》中的地方书写展开分析, 关系家园、离散和认同政治。游俊豪则以吕育陶的《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及《黄袜子, 自辩书》, 聚焦探索他如何回应马来西亚的国家、族群和公民等命题。游俊豪虽然未以离散入题, 但将吕育陶的作品置入国家结构的范畴内探索, 已经涉及离散书写中的中国性、华人性、族群性、公民性的思考。

高嘉谦的《遗民·疆界与现代性: 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 (1895-1945)》考察 1895 至 1945 年间中国南方、台湾、香港与南洋诗人的离散境遇, 其中包括了邱菽园的诗作。¹⁵⁷此书观察历史和文学的关系, 不同地域的差异以及邱菽园如何以传统华人的情怀融入南洋星洲的情境。高嘉谦研究的时段和人物与笔者不同, 但可作为参照。其他还有钟怡雯、黄锦树、许文荣、李有成等学者也在离散议题的范畴内讲论新马文艺创作。笔者的研究尚无学者涉及, 将能补充离散文学的论述。

¹⁵⁵ 张松建〈家国寻根与文化认同 - 谢裕民的离散书写〉, 张松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 - 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7), 页 1-31。

¹⁵⁶ 张松建〈家园、离散和认同政治 - 吕育陶的地方书写〉, 张松建《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政治 - 新马文学六论》, 页 153-182; 游俊豪〈负隅顽抗的公民性: 吕育陶诗作的特质与策略〉, 游俊豪《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 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 三联书局, 2014), 页 193-211。

¹⁵⁷ 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 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 (1895-1945)》(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16)。

第二章：理论与概念

第一节 离散的历史与扩展意义

华侨、海外华人、侨居者与散居者

华侨、海外华人、侨居者与散居者这些与离散相关的词汇具有不同的含义和寓意。华侨指暂时侨居国外但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人，华侨一词在 19 世纪晚期才出现，在 20 世纪的前十年才广泛使用。因为中国政府以及所有各种政治团体为了争取海外华人支持他们在中国的政治活动，这词很快的应用起来。结果是华侨这词取代了所有对国外的华人的称谓，并赋予一种以前所有称谓未有过的政治含义。华侨一词的重点是它用于任何一个有华族血统的人，而不论这人的祖先已经在中国以外居住了多少代。¹⁵⁸ 王赓武教授认为华侨的英文翻译是 Overseas Chinese，但我们不能用华侨 - Overseas Chinese 来概括所有在中国境外的华人，因此王教授用 Chinese Overseas 来指所有的海外华人。¹⁵⁹ Overseas Chinese 和 Chinese Overseas 两个相同的英文字的不同位置，却有如此不同的政治含义，因此在研究中区分华侨和海外华人是必要的。游俊豪教授也把华侨界定为‘居住在国外但拥有中国国籍的人’，把海外华侨华人（Chinese Overseas）界定为‘居住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外拥有中国血统、具有或不具有中国国籍的人’。¹⁶⁰

在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这篇文章中，王赓武教授提到侨居这个概念时，再次指出侨居虽指暂时居住，‘暂时’是表示有朝一

¹⁵⁸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as Immigrants and Settlers: Singapore”,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166-178.

¹⁵⁹ 除了上面一篇外。王赓武还有至少两篇文章论述华侨和海外华人的称谓：Wang Gungwu,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In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Kuala Lumpu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81), pp.118-127;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Anthony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and Unwin, 1996), pp.1-14; Wang Gungwu,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88.

¹⁶⁰ 游俊豪著，卢婷、谢文君、刘燕玲译《广东与离散华人：侨乡景观的嬗变》（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6），页 2-3.

日仍回归故土，但居住时间可长可短，甚至几代。然而，侨居可成为正式移民的前奏，侨居和正式移民的分别就在是否确定要回故乡的决定上。¹⁶¹他把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侨居经验分为四个阶段：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殖民与半殖民时期的过渡性国家阶段；20世纪后半期新兴民族国家阶段；再移民到美国和大洋洲的移民国家阶段；以及最新的将侨居延伸为全球化移民阶段的一部分。在这些阶段中，侨居者和母国继续保持联系。对这样的分法，刘宏教授认为“王赓武的历史学视野主要反映在他对长时段发展及其阶段性变迁的关注。由于他倾向于使用宏观的角度和定性的方法（qualitative）看待海外华人的历史，因此，他特别注意其历史不同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力。”¹⁶²王教授认为，这四个侨居阶段的发展，与开始的西方的殖民统治，接下来的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科技的快速发展及特别对国际贸易、交通和通讯和影响，所带来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有意义的是，王教授以侨居的概念对这四个阶段进程的解释，和 Kevin Kenny 解释 Diaspora 被广泛使用的原因相似。¹⁶³Kevin Kenny 对 Diaspora 一词所饱含的离散、散居的圣经和历史渊源解释得非常详细。¹⁶⁴从古希腊文 Diaspora 所指的‘瓦解的过程’，圣经中犹太人因违背上帝的旨意而被逐出以色列迦南地，到亚美尼亚人被奥托曼王朝的大屠杀，及至非洲黑人被大规模的贩卖到美国为奴，离散都有深沉厚重，饱含迫害、血泪、家国破碎的负面含义。但他也指出，在1980年后，Diaspora 一词被用来泛指各种类别的移民并被大量的使用，原因在于欧洲帝国的解体、亚洲和非洲多国的去殖民化、对难民的保护、国际移民数目的大量增加、新科技带来的交通和通讯的便利、以及国家政府不断以新的方式向他们的海外居民寻求政治和经济的支持。Diaspora 一词已经失去了它的独特性。Kevin Kenny 认为 Diaspora 在用法上应有一些规范：较适合用于非自愿移民；如自愿移民，他们或其后裔应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参与母国的事物；散居者不但和母国人民有沟通，也与其他同源的离散族群有所联系。

¹⁶¹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Anthony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pp.2 and 11.

¹⁶² 刘宏《王赓武教授与海外华人研究：方法论的初步观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3月第1期，页66。

¹⁶³ Diaspora 现多译为离散。王赓武译为散居（见《单一的华人散居着？》，于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集》，（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页3-31。

¹⁶⁴ Kevin Kenny, “What is diaspora?” -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Published onlin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p 2013. Doi:10.1093/actrade/9780199858583.001.0001. Accessed 1.8.2018.

然而王教授却对 Diaspora（王教授译为散居）一词的概念耿耿于怀。不安的原因“不是因为英语中这个词直到最近依然只用于犹太人（参见牛津英语词典），不是因为这个词指流离失所（希伯来语）或散居异邦（希腊语）——它们都是关于侨居和移民现象的特定概念。”¹⁶⁵ 而是散居这词在于对华侨一词的记忆，在于‘华侨’所表示的政治倾向，是怀疑他们不会效忠于居住国的根源。因此他怀疑“散居者一词是否会被用于恢复单一的华人群体的思想，而令人记起旧的华侨一词？这是否是那些赞同这个用词的华人所蓄谋的？”¹⁶⁶ 特别是如今海外学者开始使用‘分散的华人社群’描述海外华人，散居者一词也用于形容新加坡华人。这是否表示华人散居者可能和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爱尔兰人、非裔美洲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等人具有许多共性？在质疑散居者一词的定义和概念时，王教授认为他可以接受散居有时优于其他词汇的想法，但必须有不同的词汇解释不同的移民类型，他自己也区分了华侨（Overseas Chinese）和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的含义，毕竟已入籍居留国的海外华人再也不是华侨。¹⁶⁷

同是历史学者的 Adam McKeown 却着重于用离散的角度探索华人在 1842-1949 年这个时期的移民现象。他以离散的视角凸显一般在国别历史中常被忽略的移民全球化过程。离散对他来说有两个极端的意义，一个代表流亡，另一个则代表多样性，而他选择后者：“本文聚焦于迁移造成的转变与位移，使离散成为一个标志，代表多样性、流动性、不受拘束、血统混杂、现代性的错位、或后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失去中心的特点”。¹⁶⁸ 关于研究时段，McKeown 选择 1842 年至 1949 年，是随着清朝 1842 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割让香港及开放通商口岸，造成特别是中国南部华人大量向外移民的现象。而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则扭转了向外移民的情况。与王赓武教授对华侨（Overseas Chinese）和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英文用词的对调产生的不同意义相比，McKeown 认为 diasporic 作为名词的 Chinese diaspora（华人散居者）和

¹⁶⁵ 王赓武〈单一的华人散居者？〉，载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集》，页 4。

¹⁶⁶ 同上。

¹⁶⁷ 同上，页 20。

¹⁶⁸ 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2, May 1999, pp.306-337. See p.308 for citation. 陈晓光把“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译为《用概念思考华人裔群》。笔者译为《对华人散居者概念的思考》，因为首先裔群和 Diaspora 的离散含义不尽相同，而且这篇文章是对华人散居者这一概念做出思考，而非以概念的方式思考这一群体。陈晓光译文刊于周南京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总论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页 58-74。引文见页 59。

diasporic 作为形容词的 diasporic Chinese（散居的华人），虽然两者都描述同一群体，前者指在地理上散居，但以历史、文化和情感上维系一起的群体，不因地域或时间的隔离而解体。后者指散居的华人在不同地域上、不同机构间的讨论和联系。这离散视角，解放了以国界为主的历史论述，也同时对离散群体进行探索。然而笔者认为，使用散居作为名词或形容词时，应视内容或情境而定。有关移民的分类，McKeown 认为王赓武教授对华人移民的分类 - 华商、华工、华侨与华裔不很清楚，¹⁶⁹ 因华商、华工是以经济和职业的角度归类，而华侨是一种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认同，华裔则指出生于中国以外的华人。因此在他试图以离散的概念，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华人移民的肇端（Beginnings of Modern Chinese Migration）、劳工散居者（Diasporic Labor）、离散网络（Diasporic Networks）、散居者的民族主义（Diasporic Nationalism）、华族（Ethnic Chinese）、和离散文化（Diasporic Culture）时，除了解释现代华人移民的肇端外，其他都是以形容词来解释华人散居者的议题，对散居的华人在不同地域上、不同机构间的联系进行讨论，而不是直接对华人散居者重新分类。他强调跨国机构的作用、之间的流动和联系以及把本土的转变置于全球性过程中考量。他对跨国机构和人员流动的重视，以及全球性思考的视角，应与潮龙起所讨论的移民史中的跨国主义理论一致。¹⁷⁰

跨国主义

由于跨国主义有关移民课题，而且有些学者也用它研究离散华人以及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之了解及与离散区分。

用在移民研究上的跨国主义理论（transnationalism）是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全球化背景下移民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研究。

¹⁷¹ 开始将跨国概念引入移民学的三位美国人类学学者 - 贝丝（Linda Basch）、席

¹⁶⁹ Wang Gungwu,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imes Academic Press, Singapore, 1991), pp. 3-21.

¹⁷⁰ 潮龙起〈移民史中的跨国主义理论〉，《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7）第3期。

¹⁷¹ 潮龙起〈移民史中的跨国主义理论〉，页 52.

勒 (Nina Glick Schiller) 和布兰克 (Cristina Szanton Blanc) 在分别对美国的格林纳达 (Grenada) 和圣文森特 (St. Vincent)、海地、菲律宾移民进行研究时, 发现移民由于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技术。而经常穿梭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 积极参加故乡与定居国的活动。她们将跨国主义界定为“移民构建和维系连接他们出生地和定居地多重社会关系的过程”¹⁷² 这一理论之后不断地被修正, 但跨国主义理论学者们都特别强调, “不断进步的交通和通讯技术为移民的跨国流动和联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¹⁷³ 回顾王赓武、Kevin Kenny、McKeown 的分析, 不论是谈侨居或离散, 都和跨国主义理论一样, 一致强调通讯科技和交通对移民的影响。通讯科技和交通的发展与进步, 使移民在居住国和来源地之间的信息互动和实体往来快速而便利, 使跨国行动成为一个不太困难的选择。其实移民就是一种跨国行动, 而移民跨越民族国家疆界而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才是跨国主义研究的中心。那么, 这些‘跨国移民’ 应该也可以是侨居者、散居者, 因为侨居者和散居者都可不受国别限制进行各种政治、经济或文化活动。

然而在跨国主义的研究中, 却相对鲜见移民于居留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参与, 更多见的是移民与母国的互动, 是研究中不足之处。¹⁷⁴

此外, 研究跨国主义的学者所强调的移民和他们母国联系的固定性和持续性有其局限。

跨国主义的学者设定:

“为了建立一个新的考察范围, 我们最好把跨国主义概念, 锁定于那些跨越国家疆界之间实行起来需要固定性与持续性社会接触的职业和活动 …… 它排除了移民送给亲戚朋友的偶然性的钱财和礼物, 以及在其本身国家一次性 (非固定活动) 的房屋购买。”¹⁷⁵

¹⁷²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Cristina Szanton Blanc,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 7; William Safran,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eds. (Montreal; Kingston; London; Chicag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7-38; 潮龙起〈移民史中的跨国主义理论〉, 页 53.

¹⁷³ 潮龙起〈移民史中的跨国主义理论〉, 页 56.

¹⁷⁴ 潮龙起〈移民史中的跨国主义理论〉, 页 62-63.

¹⁷⁵ Alejandro Portes,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s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然而对海外华人而言，他们与原乡的关系，随时间的转移和政局的变化，已逐渐失去了固定性和持续性。特别是1949年后，以及当海外移民成为当地公民，更是如此。¹⁷⁶因此虽然有些学者也使用跨国主义的概念来研究离散华人，但难以固定性和持续性坚持这两项界定。在本研究中的离散华文作家，不但有种种对中国的想望与评述，还有许多对新加坡的支持和期待，因着他们拥有作为新加坡华人的体验与经历。以离散理论来解构，更能够涵盖这些离散华文作家的心路历程。

第二节 离散的界定

上述学者讲论了离散族群形成的过程，对于离散的界定，中外学者各有异同。James Clifford(1994), Paul Gilroy(1994), Robin Cohen(1997), Kim D. Butler(2001), Khachig Tölölyan (2007), Eliezer Ben-Rafael(2013), William Safran(2016), 都强调族群的认同与母国的关系。¹⁷⁷族群的认同不单与母国，也与族群中其他的人紧密联系。Cohen(1997)提出，离散族裔意识基于共享的历史和信念，而强有力的离散族裔意识的形成需要时间；Tölölyan (2007)指出，虽然所有离散族裔都是族群，但并非所有族群都是离散族裔。离散族裔保持与母国的关系，但这关系可以是实体的联系，也

22(2) (Special Issue: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March 1999), p. 219. 转引自游俊豪〈旧侨乡的转型：离散华人对番禺的影响〉，《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页 97。

¹⁷⁶ 游俊豪〈旧侨乡的转型：离散华人对番禺的影响〉，《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页 98。

¹⁷⁷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9, No. 3 (1994); Paul Gilroy,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niversity London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7);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Khachig Tölölyan, The Contemporary Discourse of Diasporic Studies,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 27, No. 3, 2007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647-655., Khachig Tölölyan, Stateless Power and the Political Agency of Diasporas: An Armenian case Studies, In Gloria Totoricaguena ed., *Opportunity Structures in Diaspora Relations: Comparisons in Contemporary Multilevel Politics of Diaspora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Center for Basque Studies (Navada, 2007), pp. 215-234; Eliezer Ben-Rafael, "Diaspora". *Current Sociology Review* 61, nos. 5-6 (2013); Safran, William.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edited by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Montreal; Kingston; London; Chicag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可能是一种想望。Clifford(1994)既肯定离散族裔与母国的关系,但认为离散族裔与母国共享的历史更为重要。Ben-Rafael(2013)也认为离散族裔会对母国文化和语言的逐渐消失产生抗拒。

除此之外有些学者再为离散族群界定更细的条件。Safran(1991, 2016) 特别注重与母国的关系。他设定离散族群必须是实体的从母国移出,分散到两个以上的国外地域,但继续保持对母国的记忆或想望,包括希冀回归及维护或重振母国的忠诚。可想而知,他们不认为居留国完全接受他们,因此和居留国的关系存在矛盾。¹⁷⁸然而 Clifford(1994)却认为 Safran(1991)的三个定义:对母国的强烈归属感、回归及维护母国会至少将大部分的犹太人以及许多离散族裔排除在外。他认为离散族裔具有许多流动性,对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变化、居留国的境遇等有不同的回应。族群共享的因去国而焦虑,或抗拒、或适应异国的经历比以某一移出国为中心更为重要。¹⁷⁹

Robin Cohen (2008)肯定 Safran(1991)为离散下的定义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开了一大步,但认为 Safran(1991)的界定有些重复,还有些不足,应加以补充。¹⁸⁰ Robin Cohen (1997, 2008, 2015)首先提出离散(Diaspora)源于希腊文的动词 *speiro* (to sow)与介词 *dia* (over)的组成。原义的遍地撒种,用于人类,成为因移居而拓展的行为。¹⁸¹他认为 Safran(1991)所指离散族群不但必须是实体的从母国移出,分散到两个以上的国外地域,他们之所以移出,还经常是源于某项惨痛记忆,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至于维护或重振母国的忠诚,这母国也应包括想望的母国。此外,Robin Cohen (2008)还加上4点:离散族群内应包括殖民及自愿移民;离散族群正因他们的族群性、国族性、跨国性而产生的张力,形成一种正面积极的身份价值;语言、宗教、文化和共同的命运感,联系及团结同一族群,形成集体的身份。还有一些少数的

¹⁷⁸ William Safran, "Diaspora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ume 1, Number 1, Spring 1991, pp. 83-84; William Safran,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Amitava Chowdhury, Donald Harman Akenson eds.,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2016, p. 32.

¹⁷⁹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p. 304-306.

¹⁸⁰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Routledge, 2008, pp. 6-8.

¹⁸¹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niversity London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7), p. ix;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Routledge, 2008, p. xiv; Robin Cohen, "Diaspora",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 6, 2015, pp. 353-356.

离散族群数度迁徙，以致不知原乡何处。维系这些离散族群的，另有异于原乡的因素。

¹⁸² Robin Cohen (2008) 加上的这些界定，其实意欲将所有的离散族群类型都包括在内，不论原因，也不计‘再离散’或‘后离散’的次数，力图将离散的意义一般化。

虽然有些离散族群‘再离散’或‘后离散’，然而大多数的学者还是接受以母国为离散源头的观点。只是离开母国原乡到他国的离散族裔是否只限于第一代，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许多学者没有明确的说明离散族裔不限于第一代。清楚说明的有如 Butler (2001)，主张离散族裔必须是两代以上才能形成，¹⁸³Tölölyan (2005, 2012) 更认为从散居的移民到成为离散族裔会至少延续三代。¹⁸⁴新马文史学者游俊豪 (2016) 也认为离散华人应指“居住在中国大陆政治体系之外的中国移民及其后代”，其中包括移居东南亚的移民及其后代。¹⁸⁵以马华文学为研究对象，张锦忠 (2011) 也认为“‘马华文学’为离散华人 (diasporic Chinese, 指十九世纪以来离开中国散居他乡的华人及其后裔) 的华文书写。”¹⁸⁶然而，张松建却认为在本地出生的华人不是离散族裔。张松建研究谢裕民的文学作品，说明他虽然将谢裕民的书写置于离散脉络，但因谢裕民是在新加坡土生土长，不属于离散族裔，谢裕民只是在文学虚构的世界里刻画了离散的现象而已。¹⁸⁷

研究马来西亚华语电影的许维贤 (2018) 则认为不能把所有的新马华人都包括在离散华人的旗帜下，因为‘离散和反离散的状态是同时并存于马华文学文化的各种不同时空’。¹⁸⁸他指出马华文坛自 1920 年以来，在讨论南洋色彩、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至 1963 年论述马来亚化的过程中，马华群体都或深或浅，但有意识地进行区分本土的

¹⁸²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pp.7-8, 123-139.

¹⁸³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189-219. doi: 10.1353/dsp.2011.0014.

¹⁸⁴ Khachig Tölölyan, “Armenian Diaspora”, *Khachig Tölölyan, Armenian Diaspora Entry in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2005, p. 36. Academia: [Tölölyan Khachig-ArmenianDiaspora-v2.pdf](#); Khachig Tölölyan, “Diaspora Studies – Past, Present and Promise”, IMI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55, April 2012, p.8. Academia: [Tölölyan WP55 Diaspora studies-with-cover-page-v2.pdf](#). Accessed both on 22.5.2022.

¹⁸⁵ 游俊豪著，卢婷、谢文君、刘燕玲译《广东与离散华人：侨乡景观的嬗变》，页 2-3。

¹⁸⁶ 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11），页 21。

¹⁸⁷ 张松建《家园寻根与文化认同 – 谢裕民的离散书写》，张松建《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页 31。

¹⁸⁸ 许维贤《华语电影在后马来西亚：土腔风格、华夷风与作者论》（台北：联经出版社，2018），页 182。

‘华人认同’与‘中国人认同’，如果把所有的这些马华前辈一概视为离散华人，‘恐怕会简化当时新马这些华人群体的社会结构、历史经验和观念意识的发展’。¹⁸⁹当时新马除了有一些左派群体，也有一些冷战年代从中国经过港、台，最终来到新马的右派知识份子出版友联教科书和刊物，以及右倾或无党派的知识群体包括艺术工作者，大力支持‘马来亚化’的国族政策。他们既是离散群体，又在1950年以降推广‘马来亚化’的文化，因此同时具有离散和反离散的特质。¹⁹⁰

许维贤不以华人离乡后到新马的‘代’数，却以‘马来亚化’与否来看待离散和反离散的意识并以此决定他们是否离散华人，进而提出离散和反离散同时并存于马华文学文化的各种不同时空中的观点，与史书美在2016年补充解释反离散是反对‘离散为价值’的观念一致。下一节有必要解析笔者对华语语系反离散论的观点，因这关乎本研究对离散族裔的界定与时限。

第三节 华语语系与反离散

华语语系是Sinophone的中译。¹⁹¹早在1988年，Ruth Keen用Sinophone Communities来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印度尼西亚、美国和新加坡的中文文学。¹⁹²1993年陈鹏翔把Sinophone（陈鹏翔译为华语风）这个词语，与‘世界华文文学’用于同一篇文章，虽然这两个词语‘能指’不同，其实可以是一个‘所指’。¹⁹³但直至史书美2007年出版专书《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后，‘华语

¹⁸⁹ 同上，页182。

¹⁹⁰ 同上，页182-184。

¹⁹¹ 王德威指出‘华语语系’是他对Sinophone的中译。见〈序言〉，《华夷风气：华语语系文学三论》（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页11。然而史书美也提出，‘华语语系’的中译是她为2004年的文章〈全球的文学，认可的机制〉，《清华学报》，34卷1号》的译者纪大伟提供的。见史书美〈导论：华语语系的概念〉，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页9脚注。

¹⁹²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视野下的“新华文学”——以《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为中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总215期），页4。

¹⁹³ 陈鹏翔在〈世界华文文学：实体还是迷思〉，一文中提出：“如果世界华文文学是华语风，则我想它应是一个松动的结合体，一个跟其他文学世界构成众声喧哗的标签。”（台湾《文讯》1993年5月革新第52期），转引自刘俊〈“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视野下的“新华文学”——以《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为中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总215期），页4。

语系’这一概念才形成具思辨向度的议题，指称为中国以外的华语语言文化和族群，以及中国地域之内的少数民族族群，而且这些群体都曾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她认为早期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华人移民迁徙都带有扩张的殖民特质，构成所谓的定居殖民（settler colonialism）。¹⁹⁴ 因此“华语语系的概念排斥单一语言制、民族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它呈现语言社群存在的开放性与流透性，并以具体普遍性作为目标”。¹⁹⁵ 这一概念在于语言的‘在地性’（placed-based）和时间性，以及与中国霸权的对抗。¹⁹⁶ 王德威肯定了史书美的某些论述并加以延伸，对某些论述也都进行了批判。他尖锐地指出史书美以“Sinophone 作为一种政治批判的策略运用远大于她对族裔文化的消长延续的关怀”¹⁹⁷

华语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使用的语言，而史书美将中国境内所使用的华语排除于华语语系之外，却将境内的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包括在内，主要是从殖民的视角以及去中国中心霸权的论述，与以中国为本位的汉语之一的华语抗衡。中国以外的华语语言文化和族群指的是海外华族移民族群，而境内的少数民族的迁徙，是大清帝国扩张版图的结果，使得这些少数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上被迫接受汉语。¹⁹⁸ 华语语系即是包括了这些曾被‘殖民’的族群所使用的各种汉藏语系中的与华语、方言，与当地土话，甚至与其他国家语言如英语、马来语及淡米尔语混杂了的‘华语’。¹⁹⁹

王德威认为华语语系文学可以帝国批判或后殖民的角度来理解，但也提出这样的理论框架未必全然有效，且未必适用于广义的海外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²⁰⁰ “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势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在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遗产的观念，延伸了以华语文学符号的创作方式”²⁰¹ 王德威以马华文学

¹⁹⁴ Shu-mei Shih, *Visibi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Calif.;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此书于 2013 年被译为中文：史书美著，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订《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¹⁹⁵ 史书美：〈导论：华语语系的概念〉，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页 25。

¹⁹⁶ 同上，页 23-25。

¹⁹⁷ 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新加坡经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4），页 34。

¹⁹⁸ Shu-mei Shih, “Introduction -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3.

¹⁹⁹ 同上，页 9。

²⁰⁰ 同上，页 41。

²⁰¹ 同上，页 21。

（含新华文学）为例，说明在马华社群无可避免地以汉语、方言、马来语、英语等来回交错，寻找适当的发言位置，却继续保持华族传统文化和语言命脉，并在文学创作上，一直以汉文创作。以英属后殖民的立场看，应该是英语语系文学为主，但华语语系在马华族群内却一枝独秀，与其他的殖民语系文学大不相同。²⁰²

史书美试图分割语言与国籍及族裔，她认为汉语不等同中国国籍，中文（中国的语文）不单单是汉语或普通话。只有在国籍与语言/族群分割的情况下，中文（中国的语文）才能通指所有中国境内使用的语文，包括汉语与非汉语。史书美以早期美国华人移民使用的汉语、香港和台湾文学以及马来西亚文学中所使用的汉语，试图说明华语与当地非华语的各种语言在地化和混杂化的过程后，产生了多音性（Polyphonic）和多文性（Polyscriptic）。史书美藉华语的多元性，批判了汉语中心主义。²⁰³

其实语言的变动不仅在中国境外，也在中国境内不断发生。史书美对汉语在地性的强调，恰恰忽视了中国在地数亿人，在中国境内各省各县各乡来回流转迁徙的碰撞，及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外籍人实体与虚拟的接触而产生的语言变动。

王德威一方面肯定华语语系在地性所展示的特色，却也同时不同意将中国排除在华语语系之外。他认为作为‘华夏的声音’的‘Sinophone’华语语系，应包括广义的中国，不限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人。²⁰⁴ 他也认为史书美对‘海外’和‘中国’的区分不但过于僵化，而且刻意区分中国与华语社群，实属不必要的敌我抗衡，因为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境内与境外产生了各种语境的变化，在正视帝国霸权和殖民威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境内境外华语语系国家、社群的合纵连横”，而且“刻意分梳殖民 / 后殖民语境，反而造成治丝益棼的结果”。因此他主张中国大陆境内的汉语 / 中文就是华语语系的一部分，华语语系的问题意识应该置入广大的中文 / 汉语语境里面。²⁰⁵

²⁰² 同上，页 22-23。

²⁰³ 史书美〈导论：华语语系的概念〉，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页 20-21。

²⁰⁴ 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新加坡经验》，页 17-18。

²⁰⁵ 同上，38-40。

语言的在地性使之与其他语言不断杂糅和变动。然而语言变动至当华族移民的后代不再使用他们祖先的语言时，史书美认为他们便不再是华语语系群体的组成部分了。因此她认为离散有其时间性的‘截止期’，当华族移民落地生根时，将因在地化而形成‘反离散’。她认为‘中国人的离散’隐含汉族中心主义，指向一个以中国为本位的意识形态，因此‘反离散’是从一个有限时间的在地性视角，肯定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当地人的机会。²⁰⁶ 其实以语言的使用决定华语语系群体、离散族群以及离散的时间性需予以质疑。以今日新加坡为例，绝大多数的华人都懂得华语，而其中的大多数只重视华语的实用价值，如沟通功能、经济效益，只以能说华语决定这一群人属于华语语系群体过于简化。另外有一些懂得英文和马来语，但只能说一些方言的峇峇和娘惹，又是否也属于华语语系群体？如果他们属于华语语系群体，由于他们在殖民地时代已经被在地政治认同，²⁰⁷ 他们是否早已‘反离散’？但我们又如何解释他们能说方言和继续保留华族传统习俗的事实？如何分割华语语系群体，离散和反离散族群，史书美尚需以众多实例论述。

史书美在2016年补充解释华语语系研究‘反离散’的立场。她指出，“反离散”的关键在于对“离散为历史”和“离散为价值”的区分。“离散为历史”指的是具体的华人散居世界各地的历史现象，而“离散为价值”指的是永远保持“侨居者”的心态，永远向往中国为原乡。因此‘反离散’反对的不是‘离散为历史’，而是‘离散为价值’的概念。²⁰⁸ 以向往原乡的“侨居者”心态作为‘离散为价值’的概念，与她之前以移民的后代不再使用他们祖先的语言作为不再是华语语系群体，已达离散终止期的概念产生矛盾，因为依据这样的逻辑但反过来说，当移民的后代继续他们祖先的语言（不论他们是否有“侨居者”的心态），他们还是属于华语语系群体，可以继续是离散族裔。这就和史书美的反‘离散为价值’的概念相悖了。

²⁰⁶ 史书美〈导论：华语语系的概念〉，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頁6-25；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頁27-51。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概念及‘反离散’的论述，亦见 Shu-mei Shih, “Introduction -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pp.1-15.

²⁰⁷ John R. Clammer, *The Ambiguity of Identity: Ethnicity Maintenance and Change Among the Straits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1979), pp.1-6.

²⁰⁸ 2016年5月中旬，史书美出席于新加坡举行的“华语语系国际论坛”之际，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张曦娜采访。〈从华语语系文学观点看新加坡华文文学——访史书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6年5月24日发布，见 <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160524-620695>。阅览日期：25.10.2019。

与其使用‘反离散’，王德威用‘后遗民’来解释海外族群。他将‘遗民’定义为‘拒绝融入移居的文化里’的海外华人，暗示了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主体，是‘在现代离散情境里不可思议的延续’。²⁰⁹而‘后遗民’更是在经历每一朝代或政治制度的裂变后，延续并对于遗民的身份及诠释方式更加复杂化。“所谓的‘后’不仅可暗示一个时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个时代的完而不了。而‘遗’，可以指的是遗‘失’，是‘残’遗，也可以指的是遗‘留’。……‘后遗民’不是‘遗民’的延伸，而有了创造性转化的意涵。”海外华语语系的子民在世代传衍之后，可能忘记中国情结，也可能仍然与中国相互参照，延续他们对中国的想象。²¹⁰

王德威以唐君毅的名言‘花果凋零、灵根自植’²¹¹来形容海外华人社群尽管经历家国离乱，总以华语作为文化遗产的标志，也创造出在地的特色。他以新加坡的经验为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南来作家的作品可视为中国文化延伸的海外插曲，根的繁衍；过去半世纪以来的新加坡华语文化形成的另一个谱系，却是自觉自植、独创一格的灵根。²¹²

许多学者对华语语系提出不同的意见。石静远指出华语语系是以反霸权、反中心的立场反驳大国沙文主义，将关怀面投向边缘与少数群体。然而作为一个理论，有许多不足之处，一方面由于华语语系是站在反大中国主义的立场，将中国排除于华语语系之外，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以中国的存在为论述的有力前提。²¹³

关注新马华文文学的朱崇科也在〈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的摘要中指出，华语语系有助于华文文学的研究，但其中不乏悖论与偏见：

²⁰⁹ 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页41-42。

²¹⁰ 同上，页42-43。

²¹¹ 唐君毅：〈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3月初版，2005年1月二版），页28-64。原载于《天风月刊》，1971年3月。

²¹² 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页16。

²¹³ 石静远于2015年1月10日，应‘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的邀请，呈现以〈华语语系研究及其对母语观念的重塑〉为题的公开演讲。见杨明慧〈华语语系研究及其对母语观念的重塑——石静远教授公开演讲概述〉，《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7卷第1期，2015年6月）。

“在 20 世纪以来的华文文学研究中，华语语系（Sinophone）新术语的出现，不只是语汇的更叠，而是有关中国文化/文学内部的权力话语组织结构和外部的国际化运作错综交织的结果，这里面既有推进我们自身研究的丰富可能性，又不乏悖论与偏见。作为置身其中的研究者，我们自然应有所回应，而且更要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关系，亮出观点，正本清源。”²¹⁴

朱崇科肯定华语语系去“国族文学”（去中心化）及为凸显本土性而呈现的反殖民色彩：

“‘华语语系’概念的提出，绝非一个新名词的浮现，它同时也具有更深层的功效，其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则是去中心化与反殖民色彩。”²¹⁵

他认为王德威和史书美都强调本土性，然而王德威的立场较‘包容及开放’，²¹⁶ 因为王德威所接受的华语语系文学是“在确立各区域华文文学主体性基础上包含了大陆文学的综合性指称”。²¹⁷

朱崇科不但引用王德威对史书美的批判：“她的 Sinophone 作为一种政治批判的策略运用远大于她对族裔文化的消长绝续的关怀……”，²¹⁸ 还用了严厉的词汇，直批史书美界定的华语语系，如‘矫枉过正’，将从已经的‘贫血’，到‘边缘化’，最终‘自生自灭’：

“华语语系剔除了中国大陆文学主体部分，而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贫血。众所周知，无论从文学生产数量（出版、读者、作家、学人培养等），还是华语文学的延续性、载体规模（如四世同堂等）等，中国大陆都是无可替代的中心之一。如果矫枉过正，那么“华语语系”就成了关起门来自己过家家的短命操作，它要么变成了和华人日益疏远的族群研究很可能被边缘化，要么闭关锁国、落入本土门户主义自生自灭的窠臼中。”²¹⁹

²¹⁴ 朱崇科〈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页146-152。
<https://chn.oversea.cnki.net/remotexs.ntu.edu.sg/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SJ201007024&dbcode=CJFD&dbname=CJFD2010&v=>。阅览日期：28.10.2021

²¹⁵ 同上，页148.

²¹⁶ 朱崇科〈再论华语语系（文学）话语〉，《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页16.

²¹⁷ 朱崇科〈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页147.

²¹⁸ 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页12；朱崇科〈再论华语语系（文学）话语〉，页18.

²¹⁹ 朱崇科〈再论华语语系（文学）话语〉，页17-18.

无可避免的，海外华人族裔由于进入和生活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之中，他们的主体性也逐渐杂糅而呈现多元性。离散族裔的多元主体性正是建立在时空性和地方性上。²²⁰ 落红不是无情物，花果凋零后滋润土地，化作春泥再发新苗，华语语系的对在地性的强调可加强离散族裔的论述，但海外华人作为离散族裔更宽广的多元视角，却能覆盖华语语系反离散论述的不足。

第四节 离散的特质

4.1 离散中的时空张力

Paul Gilroy (1994) 对离散有精辟的比喻和解释。他把离散比喻为撒种，离散族裔离开故国后散居世界各地，存在着在彼与在此、过去和现在的相互牵引的张力。²²¹ 离散族裔在离开原乡后，在理想和异位的张力中，仍然维系着社群、保留着传统，并在逆境中、在当地的语境下杂糅地重现母族的文化传统。²²² 因此离散族裔过去和他国（包括故国，下同）的经历，影响他们现在和居留国的体验；他们现在和居留国的体验，也使他们反思过去和他国的经历。他们在居留国现在的思考，是糅合了对过去他国记忆和想像的成分，包括了他们对过去、现在、他国、居留国的理解，也包括了他们对现在和居留国，甚至他国和世界的冀望。

²²⁰ 游俊豪〈转动罗盘：陈嘉庚和李光前的华人离散经验〉，《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族群的重层脉络》，页41-42。

²²¹ Paul Gilroy,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207-212.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²²²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317. 原文是：“....Some version of this utopic/dystopic tension is present in all diaspora cultures. They begin with uprooting and loss. They are familiar with exile, with the “outsider’s” exposed terror-of police, lynch mob, and pogrom. At the same time, diaspora cultures work to maintain community, selectively preserving and recovering traditions, “customizing” and “versioning” them in novel, hybrid, and often antagonistic situations.”

4.2 离散的在地性

Gilroy (1994) 强调的另一个离散特质是地域对离散族裔的影响。他以种子所撒在的环境, 如泥土、养料、授粉、害虫和其他的侵害、季节和气候塑造了它们的特性为比喻, 认为离散正可以解释生物与其周围环境的紧密关系的社会生态下的文化认同。随着政治与经济环境的改变, 当地域和宗族系谱有关的种族、民族和文化产生矛盾的时候, 文化认同也会因此而或持续或产生变化。²²³ Gilroy (1994) 离散族群因地域而不同的观点与 Butler (2001) 一致。Butler (2001) 也认为地域, 无论是移出国或居留国, 和离散族裔都有密切的关系, 都影响他们的态度, 同时这关系会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化。²²⁴ 王赓武在不只一篇文章里肯定地域与其运作方式影响观点与思维。他用许多实例说明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成长的人有明显的分别, 例如美国出生的华人和中国新移民或从东南亚再移民的华裔具有不同的世界观, 上海、香港、新加坡和旧金山的华人也把他们拉向不同的方向。华人对居留国的政治、文化、语言、价值观的适应也需要考量在内。²²⁵ 华人研究跨国移民的 Nina Glick-Schiller et al. (1994) 虽认为大多数的离散族裔生活的重心在居留国, 他们的身份由他们在居留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塑造, 但就算他们和母国的连系受到干扰, 他们离散族裔的身份不一定会产生必然的变化。这同样肯定了离散族裔和居留国的密切关系。²²⁶

²²³ Paul Gilroy,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208-209.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²²⁴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204. Doi:10.1353/dsp.2011.0014.

²²⁵ Wang Gungwu, 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Wang Ling-Chi &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 Selected Essays Vol.1*,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17; Wang Gungwu,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p.182-199; 王赓武〈海外华人与作为中国人〉, 《移民与兴起的中国》(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05), 页 181-200. 此篇未注明是否为译文或译者姓名。

²²⁶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Cristina Szanton Blanc,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p.7; Safran, William.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eds., p.37-38; 潮龙起 〈移民史中的跨国主义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3 期, 页 53.

研究人本主义地理学系统的学者段义孚 (Yi-Fu Tuan) 指出人和环境间的感情关系，即使是平常的地方，当人和它有了某种体验，它就会对那人产生特别不同的意义，使人的认知和情感与它联系起来，²²⁷ 并影响人的心态和价值观。²²⁸

文化学者 Ien Ang (洪美恩) 的亲身经历印证了王赓武认为地域与其运作影响思维及态度，以及段义孚人和环境间关系的论点。Ien Ang 是一个生长在印度尼西亚的华裔，后来随家人迁居荷兰，之后到澳洲生活，她会说多国的语言，但却不会说华语。她的母亲能说能写华语华文，但为要保护她而拒绝教她，因为当时印尼排华，华人急切撇清和中国的关系。不论在国家层面，在社会，在每天的生活中，因为他们是华人，即使他们希望归化并融入印尼社会，仍被嘲笑排挤，完全没有安全感，终于移民到荷兰。因她仍深爱印尼，在澳洲生活后，为了保留和印尼的情感‘联系’，她拥有荷兰护照，而没有入籍澳洲。她认同自己为华裔，对被成为‘假华人’时感到愤怒，她自嘲自己是‘华人-印尼人-荷兰人-澳洲人’ (Chinese-Indonesian-Dutch-Australian) 的综合。²²⁹ Ien Ang 研究华人离散族裔，而她自己正是被地域及其运作方式塑造的离散华人。

第五节 华人性与中国性

对于华人离散作家的研究，尚需探讨他们的华人性与中国性。Ien Ang 的上述观点是在讨论华人性时提出的。她不懂得华文华语，但不认为这表示她不是华裔。她提出了‘中国’不等同于‘华’的看法：

“离散族裔范式，摇撼了华人研究和中国研究之间简单而方便的等同关系。‘中国’不再局限于它几乎固定的官方空间和文化边界，也不再能帮助提供有关华人正宗的、权威的、毫无争议的衡量标准。相反地，任何‘确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中国

²²⁷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²²⁸ Yi-Fu Tuan, *Preface,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²²⁹ Sharmani Patricia Gabriel, “‘Migrations of Chineseness’: in conversation with Ien A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2, Number 1, 2011.

人/华人’已经成为必须提出的最起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是最急迫的。”

230

Rey Chow（周蕾）也认为‘Chineseness’不是单纯的概念，需要多面的、综合性的解构，但以英文书写这篇文章的 Rey Chow 没有区分中国性与华人性。²³¹然而 Rey Chow 却认为在中国和‘外国’，都可以有自己的中国论述：

“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申论：就是‘海外’的力量，例如亚裔美国的作品所体现的那样，使得中国作为一个‘起源’而被保留、被正宗化下来；外国，这个不是家的地方（the not-home），其实为我们提供一个特许而优先（privileged）的方式[尽管经常被贬低（belittled）和被菲薄（demeaned）]，来捕捉‘家’（home）和‘家乡’（homeland）的意涵”²³²

按照这样的论述，Rey Chow 的‘Chineseness’不是单一的中国性，把中国性和华人性分开来应该更加正确。继续英文学者对‘Chineseness’多元的探讨，学者发觉的确‘Chineseness’不能简单地翻译为中国性。²³³

王赓武认为中国特色和海外华人所谓的‘Chineseness’有其相同、相似的地方。无论是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这中国人和华人特色的核心是儒家的价值观。²³⁴王赓武明显的指出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有其‘华人属性’：

“（东南亚华人的）部分研究指出，一些人虽具有中国血统，但已不再认为自己是华人了。另一部分研究表明，有些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本对什么才算是华人知之甚少，但又重新发现了他们的华人属性，并一直在努力重新华化。然而其他研究

²³⁰ Ien Ang, “Can One Say No to Chineseness? Pushing the Limits of the Diaspora Paradigm”, in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38; 游俊豪〈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三联书店，2014），页156。

²³¹ Rey Chow,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Boundary 2*, Vol. 25, No. 3, Autumn, 1998), pp. 1-24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03586>. Accessed: 21.3.2017.

²³² Rey Chow. “Forward”, in Elaine Yee Lin Ho and Julia Kuehn (eds.), *China Abroad: Travels, Subjects, Spac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vii. 转引自游俊豪〈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页159。

²³³ 游俊豪〈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页156。

²³⁴ 王赓武〈终而复始：全球化的中国历史（傅斯年讲座 2005 之三）〉，《离乡别土-境外看中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页78。

提出，许多华人具有双重认同，他们既认同于入籍国，又仍然意识到自己是华人。”²³⁵

王赓武并未区分中国性与华人性，但对照王赓武中文版的〈海外华人与作为中国人〉与英文版的“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英文版的‘Chineseness’在中文版里‘中国性’与‘华人性’兼用，只是‘中国性’多用于讨论中国，包括上海和香港的情况，而‘华人性’则多用于新加坡、旧金山和整体的讨论。华人性对新加坡和旧金山的华人意味着文化认同，²³⁶ 而在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在谈到新加坡最初 150 年的历史时，他提到由于这时期的人是中国人，‘中国性’对他们不是问题。²³⁷ 笔者相信这不只是行文的方便，而是有意识的分辨这两个词语，因为究竟新加坡和美国的华人是海外华人，这些人还有些与异族通婚，用‘华人性’少了‘中国’的局限性。

在谈到华人身份认同与华人属性时，王赓武再指出华人属性并不比华人的身份认同易于界定，两者的定义又往往是同义反复。²³⁸ 他认为中国作为有长久历史的国家，一定有指向 Chineseness 的事物，而中国内外的华人也一定有共同之处。²³⁹ 而且虽然他认为不能量化华人性，但华人性的多寡不是绝对的，而且地域与其运作也影响中国性和华人性。²⁴⁰

²³⁵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之研究〉，《华人与中国 - 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页 294-295。

²³⁶ 王赓武〈海外华人与作为中国人〉，《移民与兴起的中国》，页 185。

²³⁷ Wang Gungwu,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p.182-199; 王赓武〈海外华人与作为中国人〉，《移民与兴起的中国》，页 181-200。此篇未注明是否为译文或译者姓名。

²³⁸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之研究〉，《华人与中国 - 王赓武自选集》，注 1，页 294。

²³⁹ Wang Gungwu,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pp.182-183.

²⁴⁰ ‘华人性’或‘中国性’的用词根据王赓武〈海外华人与作为中国人〉，《移民与兴起的中国》，页 183-198。

学者黄锦树将中国性界定为中国特性、中国特质与中国本色。²⁴¹但也有其他的称谓：

“‘中国性’是一个权宜性的称谓，英译为 Chineseness，也可译为‘中华性’或‘中国特质’，强调的是它在文化想象上的纯粹性，在这一点上有别于‘马华性’（Malaysian Chineseness）”²⁴²

黄锦树未进一步解释中国特性、中国特质与中国本色为何，但却认为‘中国性’也可译为‘中华性’。‘中华性’应该和‘华人性’相近。

其实就如中国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再分解出古典中国、当代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等多种符号，马华文学也应有自己对中国论述的场域，何况马华文学中还有‘非中国’的元素。²⁴³游俊豪教授还指出，马华文学的研究不能只着重于中国意象的‘复制’而忽视对它有创意的‘想望’，更准确地说，马华文学中的中国性是华人性中的中国元素，诉说“整个马华族群的忧患意识，对所处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反应和还击。”²⁴⁴

因此游教授认为华人性成为了一个和中国性即分割又重叠的术语，表达和中国性有关的层次感。他认为长久以来，华人性被包括于中国性中，但马华文学的研究需要作范式上的转移和调整，从“中国性中的华人性”转为“华人性中的中国性”：

“更具体地说，马华族群性作为中国性的一部分，转移到思考马华族群性包含中国性为一部分；从考察马华文学如何作为中国文学的构成与边缘，调整到研究中国文学如何进入马华文学的场域里面。采用了离散族裔的范式，马华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中国符号，不过是流动后进入华人性中的中国性，而且它仅仅是局部，不是全部。挪用了文化中国的概念，马华文学对中国意象的再现只是自己话语权的行使，不是从属中国的体现，而是在边陲里建构自己的场域。”²⁴⁵

²⁴¹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页15.

²⁴²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页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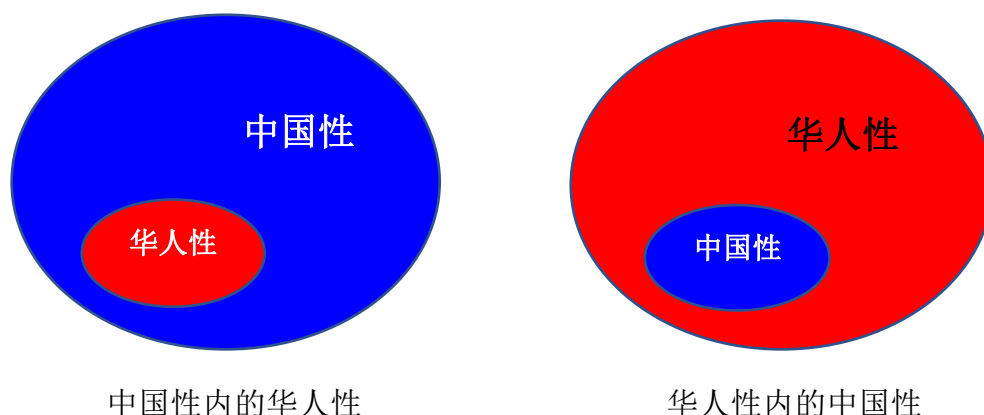
²⁴³ 游俊豪〈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群的重层脉络》，页157-158.

²⁴⁴ 同上，页159.

²⁴⁵ 同上，页156-157.

下面这两个并列的图表清楚地显示了中国性内的华人性与华人性内的中国性的区别：

246



虽然游教授所指的马华文学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但从中国性内的华人性转移为华人性内的中国性的概念，却可以用来考察同有中国移民、同处多元种族和文化中、同曾是英殖民地、新马人民流动频繁、还在新马分家前同属马来亚华文文学的新加坡在华文作家作品中，华人性和中国性的转移和调整。

游教授的中国性和华人性有分割也有重叠的论点，指出了华人性和中国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离散华人中的杂糅特性，有如 Gilroy (1994) 和 LeRoi Jones (1967) 所说的 ‘The Changing Same’。LeRoi Jones 先提出 ‘The Changing Same’ 的概念，²⁴⁷ Gilroy 将之扩展，指出离散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质，再用 von Koch 的雪花数学概念来比喻离散族裔的特质为 ‘The Changing Same’。²⁴⁸ von Koch 的雪花概念以一个等边三角形开始，取每边中间的三分之一，接上去一个形状完全相似的但边长为其三分之一的三角形，结果是一个六角形，再在这六角形的每边做同样的动作，并不断重复，出现雪花的形状。von Koch 雪花概念的特质是它一直在变化，但不会超过初始三角形的外接圆。²⁴⁹ 从三角形变成雪花，但又不超越原始范畴，笔者形容之为变中之恒，恒中之变。离散族裔不断地重组和重塑，不断地杂糅与变动，复杂而有活力。

²⁴⁶ 同上，页 157。

²⁴⁷ LeRoi Jones, *Black Music* (New York, Quill, 1967), pp. 180-211。

²⁴⁸ Paul Gilroy,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 208-209, 211-212.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²⁴⁹ von Koch 为瑞典数学家，全名为 Niels Fabian Helge von Koch，中译为科克或科赫。

第六节 多元身份认同

离散华人缅怀原乡、适应新家的过程，最终到底是落叶归根（回归原乡）、落地生根（认同本土），或斩草除根（完全同化）²⁵⁰，还要取决于他们的身份认同意识。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认同的界定。社会心理学者韦德芮（Margaret Wetherell）将传统的认同概念归纳为三类：从心理学的角度审视个人的自我理解和情感，从社会学的角度联系个人对群体的归属感，从政治和伦理的角度将政治秩序和道德伦理与对它们的认同相结合。²⁵¹ 如前所述，认同概念的研究不断延伸，离散族群（Diaspora）的认同研究已包括广义的移民研究，成为一个新的领域，²⁵² 而研究方向也从认同的定义转为认同意识的形成过程。²⁵³ 王赓武教授以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身份认同的概念和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形成历程。他认为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在 1950 年以前，华人将他们的认同意识视为中国民族主义认同（Chinese nationalist identity）与历史认同（historical identity）。在 1950 和 1960 年代，重视国家（当地）（national [local] Identity）认同、社区认同（communal identity）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1970 年代则注重种族认同（ethnic identity）与阶级认同（class identity）的讨论。²⁵⁴ 王教授认为华人可同时具有多重身份认同，有些身份相互重迭，只是这些认同意识可因事态的变化而有所改变。²⁵⁵ 他也指出 1950 和 1960 年代提出的文化认同的概念，将注意力集中在价值观，有助于消除不同群体间的矛盾。

²⁵⁰ 1992 年王灵智（Wang Ling-chi）与他的同事决定以‘落地生根’为主题，在旧金山召开海外华人国际会议。他在开幕词中指出认同本土的‘落地生根’，和回归故土的‘落叶归根’及与居留国完全同化的‘斩草除根’两个极端不同。‘落地生根’要求的是在融入居留国的社会时被平等公平的对待。See Wang Gungwu, ‘Preface’; Wang Ling-chi ‘On Luodi-shenggen’, in Wang Ling-chi &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Vol I & II (Times Media Private Limited, 2003), pp.vi-viii & pp.ix-xi respectively.

²⁵¹ Margaret Wetherell, “Introduction - The field of Identity Studies”, in M.Wetherell and C.T. Mohant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dentities* (Los Angeles, Sage, 2010), pp.3-4.

²⁵² 游俊豪〈转动轮盘：陈嘉庚和李光前的华人离散经验〉，页 40-42。

²⁵³ Margaret Wetherell, “Introduction - The field of Identity Studies” p.13.

²⁵⁴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ennifer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1. 此文在 1985 年在澳洲举行的会议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上首次呈现。

²⁵⁵ 同上，页 1。

大多数的东南亚华人在取得当地国家认同的同时，更加意识到自己作为华人的文化认同。²⁵⁶ 王教授的多重身份认同的理论在 1985 年呈现，14 年后，在 1999 年他重申了华人具有多重身份认同，并认为无论从历史、经济或文化的角度视察，华人的多重身份认同都不存在矛盾。²⁵⁷ 再 18 年后，在他 2017 年 6 月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王教授在再次强调华人没有单一，却有多种身份认同的同时，探讨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与忠诚的关系。他认为在五十年代，新加坡主流的华人认同是基于对语言文化的认同和忠诚。²⁵⁸ 多元身份认同的理论以及身份认同与忠诚的关系是否能由新加坡华文作家印证，将由他们的作品说明。笔者希望通过新加坡华文作家的作品，探讨新加坡华人在二战后至 1980 年的心路历程。

研究社会学、文化理论和媒体的学者霍尔（Stuart Hall），认为文化认同是一个共享的、本质性的集合体。²⁵⁹ 与王赓武的观点相似，他认为认同存在流动性，它是进行式的，一直在被塑造中。散居者在寻找为一个共有的历史文化时，他们也在寻找现在的自己，是‘身为’（being），也是‘成为’（becoming），可以是过去式，同时也是未来式。因此他认为身份是一种再现形式，可以将我们塑造成新的主体，使我们得以发现发言的立场。²⁶⁰ 同时霍尔也认为在文化认同的建构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们更不能凭空的谈文化认同，而是应置身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地点、时间中讨论。笔者将探索在 1945 至 1980 的时段间，新加坡七位包括本土出生与移民的离散作家，在当时的社会境况下，如何展现他们作为新加坡离散华人的身份及思想意识。

²⁵⁶ 同上，页 3、6 及页 10。

²⁵⁷ 王赓武〈再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见刘宏、黄坚立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 - 王赓武教授论文集》（新加坡：八方出版社，2002 年），页 97 - 116。

²⁵⁸ 王赓武〈十九、二十世纪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忠诚〉，刘宏、龙登高、武斌主编，游俊豪执行编辑《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八卷 第二期（2016 年 12 月），（英国：诺丁汉大学华人移民研究中心，及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八方文化创作室），页 1 - 12。doi:10.1142/S1793724816000146。

²⁵⁹ “一个共享的、本质性的集合体”原文是“one shared culture, a sort of collective ‘one true self’”。见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p. 223.

²⁶⁰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pp. 222-237.

第三章：新加坡七位华文离散作家的生命历程

这七位作家：李星可、连士升、苗秀、赵戎、姚紫、杏影和李汝琳的出生年代从出生最早的连士升（1907 年）到离世最晚的李星可（1996 年），他们都经历或见证了中日战争和中国内战，他们之中有 5 位 - 李星可、连士升、姚紫、杏影和李汝琳在中国出生，2 位 - 苗秀、赵戎在新加坡土生土长。在中国出生的 5 位，最早在 1945 年 9 月南来的是杏影，最晚是 1949 年抵达的李星可。在新加坡生活最短的是居住了 22 年的杏影，最长的是居住了 44 年的李汝琳。在新加坡本土出生的苗秀和赵戎经历过日治及日治前的英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也和其他移民的五位作家一样，经历和见证了新加坡日治后的殖民统治、自治至独立的过程以及期间的政治、社会、文坛的各种变动。由以下他们的生卒年和在新居住年日的简表，可显示他们和研究时段的关联：

	出生地	出生	逝世	抵新日期	在新年日
李星可	中国	1913	1996	1949	约 25 ²⁶¹
连士升		1907	1973	1947 ²⁶²	24
杏影		1911 ²⁶³	1967	1945	22
李汝琳		1914	1991	1947	44
姚紫		1920	1982	1947	35
苗秀	新加坡	1920	1980		60（一生）
赵戎	新加坡	1920	1987		67（一生）

表 1：新华七作家生卒年及居住新加坡年日

²⁶¹ 李星可 1949 年从西贡到新加坡，1973 年出狱后曾到日本，及法国，再到澳洲和儿女居住。虽时而回新，但长居新加坡时间应约为 25 年。

²⁶² 连士升在 1947 年 1 月抵达新加坡，原本只是想到新马考察两三个月，再作打算，没想到国内外局势多变，只好留在新加坡。连士升在南洋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兴日报》特派员，任内曾受命回中国作采访。1948 年 3 月他到中国多处两个月，写成《祖国纪行》（新加坡：南洋商报，1948）。1948 年 9 月，他为南洋商报到巴黎报道联合国第三届大会。过后到欧洲漫游数月。在欧洲采访期间写了大量游记，后来结集成《祖国纪行》、《欧洲纪行》之《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及《印度洋舟中》五部书，由《南洋商报》出版（后 4 册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再版）。1949 年他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商报。参连士升《回首四十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出版，2009），页 10；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http://www.hstao.com/Lien.pdf>，页 12。因此他虽 1949 年才开始定居新加坡，早在 1947 年已经开始居留。有关连士升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年份有两个说法，一为 1948 年，记于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士升纪念文集》（南洋学会纪念文集第二集）（新加坡：南洋学会，1976），页 146；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页 12；另一为 1949 年，记于连士升〈连士升走过的路〉《回首四十年》，页 10。本文采用 1949 年的说法，基于连士升《回首四十年》为最迟出版的集子，且原 1976 年记连士升于 1948 年任主笔的连亮思也是 2009 年版《回首四十年》的主编之一。

²⁶³ 杏影出生之年有三说：1910、1911 及 1912。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页 8 记杏影出生于 1911 年。此书由多位编者长时间努力搜索诸多原始资料完成，可信度高。

除了他们共同经历的大时代，这七位作家有他们各自的生命轨迹，造就了他们对事物、对家国的看法。他们个别的生活经历是认识他们在作品中所呈现的思想意识的必要背景。

第一节 直言强悍的李星可（1913-1996）²⁶⁴



李星可的一生多姿多彩，阅历丰富，并通晓中英法三种语文，对新马的社会、文化、教育都有贡献。他出生于 1913 年 4 月 21 日，²⁶⁵ 一家人，包括父母、他自己和他的儿女都是天主教徒。²⁶⁶ 他 11 岁开始学法文，就读于南堂法文专门学校，因父亲从事钟表业，希望他学成后到瑞士学习钟表。²⁶⁷ 于南堂法文专门学校毕业后，学校介绍他到‘度量衡制造厂’工作，开始与比利时结缘。所长为比利时留学生，容许他把工作带回家，一星期只需来厂两天，因此让他得以继续上大学。所长的善意与李星可日后对比利时的看法应有关系。²⁶⁸ 1933 至 1935 年他在北京中法大学修中法文学并在大学图书馆及天主教会的‘宠光通讯社’兼职。中法大学图书馆的兼职工作使他饱览许多珍贵藏书、写作并于中法大学月刊发表十数篇文章。他在‘宠光通讯社’的工作，是他‘正式进入新闻界’的开始，这工作及他在中法大学月刊发表的文章，使他得到奖学

²⁶⁴ 李星可于 1996 年离世，但月日不详。

²⁶⁵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91）页 3。他自言出生于公历 1913 年 4 月 11 日，然而许多其他记载记他出生于 1914 年。说他是出生于 1914 年者可能是误读了他对自己出生年份的解释。

²⁶⁶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3。

²⁶⁷ 同上，页 4、7、111。

²⁶⁸ 同上，页 7。

金到比利时鲁文大学读中古哲学。²⁶⁹ 一年后又得研究生奖学金（fellowship）到巴黎大学研读中古历史，同时得双份奖学金。²⁷⁰ 他在年轻时候打下的知识、学识基础及语文能力使他的视野得以扩展，在他日后写评论文章的时候，往往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内容宽广、言之有物。²⁷¹

当他在巴黎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他的身份。他想在郊区租房子，但房东一见他是中国人便大喊‘Chinois’，让他了解到因为国家不强大，不论国人的学问或外语掌握得多好，都会被人瞧不起。这是他后来一直反对‘二毛子’的起因。²⁷²

在他思索自己的身份、前途及何去何从的时候，他得陆徵祥的指点，认为英文比法文有用，决定转入英国伦敦大学。但到了伦敦后听闻中日战争爆发，又回去比利时。²⁷³ 他决定回国参战，得陆徵祥介绍，从比利时到巴黎，认识杨虎城将军，参加‘旅欧华侨第一次回国参战代表团’回去中国，目的为参战。他跟着代表团，途经新加坡。在香港下船后，随同行者的安排，从珠江到梧州、桂林、广西、汉口、郑州、西安。在西安，明白那不是参战之地，再到延安。在延安的鲁迅学院见到毛泽东，也发现延安的高级领导层和国民党政府一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每礼拜六开一次西洋式的跳舞会。²⁷⁴ 他觉得延安并非久留之地，便从延安到渝州，再到西安、周至、汉口寻找生计。1938 年在他走投无路、想自我了结之际，遇到了正在找他的‘法比瑞同学会’，请他加入法国空军志愿队。他当上了空军上尉、第四十一队的副队长，在汉口处理行政、人事以及翻译的工作。²⁷⁵ 在法国空军志愿队期间，他开始被调配到南洋，第一站是北越，再到缅甸，参加军需处，了解南洋机工在滇缅公路上的运输工作，并凭他的机智，解决了许多难题。²⁷⁶ 后来他到印度了解军需，并在那里住了一年。²⁷⁷ 在抗

²⁶⁹ 同上，页 13-15，171-172。

²⁷⁰ 同上；李星可〈纪念亡妻〉，《十八年后归去来》（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页 1，记他 1935 年‘负笈西欧’。

²⁷¹ 李星可评论文章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治国、文化、民生等。见其政论文集：李星可《政论选集》（李星可自印，1963）；李星可《政论新集》（新加坡：东方文化企业，1967）；李星可《政论近集》（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1967）。李星可《政论选集外编一十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远景》（新加坡：国际图书有限公司，1988）。另有一篇〈星加坡高等教育问题〉刊登于《南洋文摘》第 7 卷第 9 期，总 81 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6 年 9 月 30 日），页 595-596。

²⁷²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7-18。

²⁷³ 同上，页 16-18。

²⁷⁴ 同上，页 21-36。

²⁷⁵ 同上，页 36-44。

²⁷⁶ 同上，页 48-64。

战时期，李星可因兼通中法语文，“曾与邵荃麟等组织国际性的‘中法文艺协会’，积极展开抗战宣传工作，厥功殊伟。”²⁷⁸ 李星可的参战经历，可见李星可利用他的语文能力和学识报国的热忱。他的经历，包括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认识，也让他见识到政治的复杂性，对他日后有所警惕。

参战 6 年后他觉得是时候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便请辞准备到美国去。不过当戴高乐战斗法国代表团邀请他成为法国新闻处中英文部主任，并答应他一两年后会给他一个奖学金，他便接受了这工作，自言原因有二：法文是他的‘第二母语’，而且当时法国与中国一样，正处于苦难中，因此他对法国深为同情，要帮助法国。²⁷⁹

日本投降后他回到北京探亲及在农工银行负责稽查工作。²⁸⁰接着他被邀到济南交通部的总务处工作，在济南与擅长京剧的宁荣萱结婚。他在济南交通部的总务处工作一年，当时风气不良，通货膨胀情况非常严重。²⁸¹因此他加入中央社，为了生活要求去安南（越南古称），“因为那里是热带，一条裤子跟一件衬衫可以过一年，而且出产有名的‘贡米’，总会有的吃”。他接了家眷来到西贡，住了两年半，自此定居南洋。²⁸²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他和法国政府、越南人的‘独立政府’、越盟都有交往，关系复杂，加上中央社也关闭，他必须离开西贡。他得法国总领事的支持，在新加坡成立法新社分社。在法新社尚正式成立前，他已被聘用为法新社特约通讯员。1949 年，他也担任益世报的总编辑，但益世报因经费不足，只办了 4 个月就停刊。²⁸³他便到中正中学任教，并和庄竹林在 1950 年合办‘大学先修班’，但又因生源不足而

²⁷⁷ 同上，页 69-70。

²⁷⁸ 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98。（2005 年为简体字版。繁体字版出版于 1967 年）；李星可〈从《新社》想起南洋文艺问题〉，《十八年后归去来》（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页 77。据赖伯疆《东南亚戏剧概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页 119，李星可并曾“在重庆与老舍、茅盾、曹禺、曹靖等人组织国际性组织〈中法文艺联络社〉，开展对外文化联络工作”然年份及〈中法文艺联络社〉与〈中法文艺协会〉是否为同一组织皆不详。

²⁷⁹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70-72。

²⁸⁰ 同上，页 72-73。

²⁸¹ 同上，页 74-76。

²⁸² 同上，页 76-77，89。‘总会有的吃’为原文，应为‘总会有得吃’。

²⁸³ 《李星可资料夹》（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

停办。²⁸⁴ 法新社接着发展为东南亚总社，包括印尼、马来亚、曼谷和菲律宾。但后来他认为自己被上司抢功、陷害，一气之下离开法新社。²⁸⁵ 根据李星可自己的记录，从1950年至1961年，他在法新社担任主任长达11年。²⁸⁶

1959年李星可被胡蛟邀请加入星洲日报任副主笔，之后从1961年至1970年担任主笔。²⁸⁷ 《政论选集》的第一篇〈谨向全马华人进一言〉写于1959年8月1日，劝马来亚华人投票支持华巫联盟，保持马来亚的和平安定。²⁸⁸ 根据李星可的叙述，这一篇写于他加入星洲日报之前，当时马来亚认为星洲日报左倾，有意禁止星洲日报入口。李星可答应协助经营星洲日报的胡蛟解决他的燃眉之急，为他写了〈谨向全马华人进一言〉。当时马来亚正举行大选，这篇当时以胡蛟署名的文章，对当时以内阁总理东姑为首的选举大有帮助，也使得星洲日报得以在马来亚发展。²⁸⁹

李星可在星洲日报时与南洋商报对华文教育问题打笔战两三个月。²⁹⁰ 他同时在法国总领事馆担任顾问及南洋大学及师资学院的教席。²⁹¹ 1971年2月1日他离开星洲日报，加入南洋商报。离开星洲日报原因有：待遇低、认为胡蛟被美国收买、以及‘叶世芙’事件（指叶世芙贪污），因此不论南洋商报是否邀请他，都会辞职离开星洲日报。²⁹² 加入南洋商报三个月之后，1971年5月2日凌晨2时，他和《南洋商报》其他负责人－李茂成、全道章、公众关系经理郭隆生，一起被政府引用内部安全法令，以‘倾向共产党’、‘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²⁹³ 商报社长李有成本人也于1973年1月28日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据李星可《乱世沧桑》，他入狱原因主要是李光耀在

²⁸⁴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79及84；《李星可资料夹》（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

²⁸⁵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77-83。

²⁸⁶ 《李星可资料夹》（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

²⁸⁷ 同上。

²⁸⁸ 李星可《政论选集》（李星可出版，兴隆印务有限公司承印（出版地不详），1963），页1-6。

²⁸⁹ 康吉父《胡文虎传》（香港：龙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页113-116。康吉父即李星可（他两名儿子名康、吉）。

²⁹⁰ 李星可〈质问南洋商报〉，〈南洋商报为什么哑口无言〉，见《政论选集》页313-314，318-319；李星可〈难得的人情味〉，《十八年后归去来》，页15。

²⁹¹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99、151-152。

²⁹²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113-116；康吉父《胡文虎传》，页134-136。

²⁹³ 见新加坡南洋商报1971年5月3日的头版（NLB Microfilm Reel 6731）。其他报章也于同日以头版报道此事。见英文报 The Straits Times（NLB Microfilm Reel NL06749）和 Singapore Herald（NLB Microfilm Reel 6731），以及马来文报 Berita Harian（NLB Microfilm Reel NL6766）。阅览日期：3.7.2019。

一次公开演讲中对商报的言论提出警告，而他不应该在那时候写那篇回复李光耀的有敏感性语文问题的社论。然而他辩称那篇社论是他在社长李有成的指示下写的，李有成的吩咐则是出于陈振夏的主张。当时社论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社论委员会主任是陈振夏。社论委员会决定严辞声辩，指责政府对私营报纸威胁压迫。虽然李星可没有参加社论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但社长李有成吩咐他执笔，写完后让李有成看过才发表。他入狱 22 个月，直至 1973 年才获释。商报高层被捕事件，称为‘黑色行动’、‘黑色五月’或‘五月风暴’。²⁹⁴

无可置疑的是，在李星可讨论的课题中，教育课题是他所关注的。他的三本政论集中，每本都以大多数的篇幅谈论从小学到大学与华文教育、语文有关的问题。²⁹⁵他非常重视母语教育，²⁹⁶极力争取华校上课的天数，²⁹⁷并支持和维护南洋大学，²⁹⁸虽也因此而遭受牢狱之灾，却也显示了作为离散华人，对华人文化的爱护。他的理想教育是各源流教育平等，而平等的意义在于居民可选择以他们的语言为教学媒介语。²⁹⁹李星可在维护母族文化的同时，也多次鼓励各源流文化的交流。要真正的交流必须摒除语言的隔阂，通过多种语文的学习，促使各源流文化百鸟争鸣、百花齐放。³⁰⁰他还提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排斥‘移种的花朵’。‘只有在本地生长的新一代才能在本地产根’的观点是错误的。³⁰¹作为‘移种的花朵’，李星可在他的社评中，对新加坡有诸多的

²⁹⁴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32-139，155-162；康吉父《胡文虎传》，页 136-150；孙源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2e2d6d0102x35b.html 附有李星可给孙源的信，内有一首打油诗，诗中记述李星可南来后事迹，包括南大的开办与闭幕以及他被监禁的始末。孙源博客现已加密，然笔者已存档；韩山元《从李星可谈到报史研究》，见 [李星可与华文报史 - 南洋古今 - 随笔南洋网 新加坡华文论坛 \(sgwritings.com\)](#)；梁秉赋 23. 8. 2008 讲座《李星可其人其言》，见 [文化沙龙人物点评系列 4/2008 - 《李星可其人其言》 |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wordpress.com\)](#)；新加坡文献馆《回顾华文报业风暴是非》（本论文只取其中史实），<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312>。阅览以上网页日期：10. 7. 2019。

²⁹⁵ 李星可《政论选集》共收 165 篇社论，教育与语文课题占 60 篇。李星可《政论新集》共收 77 篇社论，教育与语文课题占 34 篇。李星可《政论近集》共收 84 篇社论，教育与语文课题占 17 篇。政论集的其他课题包括政治（与他国关系及内政）、治国、民生、经济、文化及媒体。学者鲁虎《新马华人中国观之研究》（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4）页 219 提李星可还有《政论今集》，然笔者遍寻不获。

²⁹⁶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52、153、154、159；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76。

²⁹⁷ 李星可《政论选集》中的 12 篇：123、124、135、137、143、144、145、146、147、148、154、160。都直接评论华校的上课天数。

²⁹⁸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85。

²⁹⁹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52。

³⁰⁰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37、41、59。

³⁰¹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5。

建议，在创作中，他主张“民族形式，地方内容”。³⁰² 他对新加坡做出的贡献，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

他虽然在新加坡曾被政府拘捕入狱，然而出狱后却因建议李光耀的巴黎之行，促进两国邦交，自言因此而得法国政府授予国家功勋骑士奖章。³⁰³ 他出狱后受邀到日本旅行，继而受法国国家科学院及巴黎大学邀请讲学，在法国住了 5 年，之后到澳洲与子女同住。³⁰⁴ 李星可于 1996 年离世。享年 83 岁，³⁰⁵ 是这七位离散作家中最长寿并离世最晚的一位。

第二节 温婉谦逊的连士升（1907-1973）



李星可以言辞犀利著称，而同为报社主笔的连士升却以截然不同的风格闻名。连士升出生于 1907 年 5 月 24 日，字伯棠，别号及笔名子云。³⁰⁶ 他父亲绶昌公为穆洋同文学

³⁰² 李星可《桥上》〈自序〉（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

³⁰³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87-88，99；李星可《十八年后归去来》中〈汉学家真死啦！〉，页 27 说明赴法年份为 1973 年，同书另一篇〈难得的人情味〉，页 16 说明在法国住了五年及得国家功勋骑士奖章原因。

³⁰⁴ 李星可〈难得的人情味〉，李星可《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16。

³⁰⁵ 梁秉赋《李星可其人其言》文化沙龙人物点评系列 4/2008。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讲座，23. 8. 2008。

<https://sgsocietyofasianstudies.wordpress.com/2008/08/19/%E6%96%87%E5%8C%96%E6%B2%99%E9%BE%99%E4%BA%BA%E7%89%A9%E7%82%B9%E8%AF%84%E7%B3%BB%E5%88%97-408%E2%80%93%E3%80%8A%E6%9D%8E%E6%98%9F%E5%8F%AF%E5%85%B6%E4%BA%BA%E5%85%B6%E8%A8%80%E3%80%8B/> 阅览日期：10. 7. 2019。

³⁰⁶ 连士升的文章一般用子云署名。据连士升女连文思告知笔者，连士升以子云表示他乃云孙之子。连士升的父亲绶昌公，字云孙，见连士升《回首四十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09），页

校国文老师，于他 8 岁时病逝，当时家徒四壁，只留下十一块大洋和几亩薄田。母亲日夜作针黹赚取家用，对他只有鼓励和督促，从未大声责骂。父母亲对他的教育对他人格的陶冶，特别是他与人无争的态度，起了一定的影响。³⁰⁷ 十五岁那年母亲故后，他变卖了父母遗下的几亩薄田，加上朋友的借贷，考上中华圣公会在福宁府（霞浦县）办的作元汉英学校中学二年级。共读了 4 年。校长邱约翰（John Curtis）牧师讲解和背诵兼重、提纲挈领的教学法，及热心布道、生活简朴、勤俭自持的为人方式给他很大的影响。他在作元汉英学校苦学英文，取得了好成绩。在 1926-27 年间，就读于福州英华斋高中三年级，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时常刊载陈独秀的文章的政治刊物《向导》。他在作元汉英学校和英华斋，学到了新知识，为中英文打下基础，也经历了当时的改革浪潮。³⁰⁸ 1927 至 1931 年他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对西方经济史很感兴趣。³⁰⁹ 于 1931 至 1937 年间，连士升大学毕业后，得国学大师顾颉刚的介绍，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得到一个特别研究室的席位，有很好的读书写作的方便，增加他读书的兴趣及写作的决心。他常在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政治大学图书馆读书、研究及写作。³¹⁰ 他同时为著名报章杂志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等撰写或翻译有关中外经济史的文章，自 1935 年起为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撰写或翻译有关经济的文章，共 11 篇，跨 20 期。³¹¹

1937 年 8 月七七事变后，连士升从北平携妻带女离开北京抵达香港，经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介绍，10 月进入《港报》，不料三个月后报馆因负债累累而倒闭。但他并不懈怠，趁此机会翻译完成了哈佛大学格拉斯（N. S. B. Gras）教授的《工业史》（Industrial Evolution）下半部，193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³¹²

21. 有关据连士升的字伯棠，连文思告知笔者，他的福州老乡会叫他伯棠。顾颉刚也称他为伯棠，见杨焄〈不知嫉忌为何事，但瞩光明益向前：关于郑侃嫒〉，<https://new.qq.com/rain/a/20221005A02OV000>。阅览日期：10. 5. 2022。

³⁰⁷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09），页 22；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亮思、连文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新加坡：南洋学会，1976），页 143。

³⁰⁸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32-33，44-47。

³⁰⁹ 〈连士升走过的路〉，载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0；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http://www.hstao.com/Lien.pdf>，页 3。阅览日期：10. 8. 2019。

³¹⁰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0，71-73。

³¹¹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页 3-4，24。

³¹²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96-97，100-101；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页 7。

1938年连士升的原配郑侃嫔去世³¹³。1940年陶希圣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连士升专写经济与国际问题并在岭南大学任教。同年连士升与燕京同学罗牧的胞妹，越南华侨罗梅结婚。³¹⁴

1941年，连士升被委任为港大校外考试委员。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2月连士升举家逃离香港，经河内、西贡，到茶荣省（TRA VINH）隐居至1945年。他在越南隐居期间，恐怕日本人注意，用了‘郑德华’的假名，并任福建学校校长两年，一面翻译克拉判教授（Sir John H Clapham）的两本著作：《现代法德经济史》（“*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及《近代英国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³¹⁵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准备回中国，途经柬埔寨、泰国、菲律宾、上海、重庆，后到南京。在南京住了半年，因严重通货膨胀，又返回西贡。1946年当他在南京时，《中央日报》曾聘他为特派员。³¹⁶

1947年1月他抵达新加坡，原本只是想到新马考察两三个月，再作打算，没想到国内外局势多变，只好留在新加坡。连士升在南洋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兴日报》特派员，任内曾受命回中国作采访。1948年3月他到中国多处两个月，写成《祖国纪行》。³¹⁷1948年9月，他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巴黎报道联合国第三届大会。过后到欧洲漫游数月。在欧洲采访期间连士升写了大量游记，后来结集成《祖国纪行》、《欧洲纪行》之

³¹³ 连士升原配郑侃嫔是一才女，深得顾颉刚赏识。连士升〈失业与失窃〉，《回首四十年》页96记“先室郑侃嫔一面为上海《申报》编辑《通俗读物周刊》，一面和顾颉刚先生合作，准备替上海某书局编辑高中历史教科书。”；连士升〈学习顾颉刚〉，《连士升文集》第二卷〈南行集〉，页418记“1935年间，先生就开始组织大众知识社，发行刊物，由先生任总编辑，由吴世昌兄，杨刚女生，先室郑侃嫔女士及我分任各部门的编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文中的‘先生’即顾颉刚；杨焄〈不知嫉忌为何事，但曙光明显益向前：关于郑侃嫔〉，记载顾颉刚对郑侃嫔的赏识以及她的文章。参<https://new.qq.com/rain/a/20221005A020VO00>。浏览日期：25.10.2022。

³¹⁴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10，96-97；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页6-7。

³¹⁵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7。罗牧〈到南洋去——连士升君挈眷到越南逃难的过程〉，连亮思、连文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页106；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152-156。

³¹⁶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10、192-196；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11-12。

³¹⁷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10及〈后记〉，页197；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12。

《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及《印度洋舟中》五部书，由《南洋商报》出版。³¹⁸1949年他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商报为主笔。³¹⁹

成立于1940年的南洋学会是东南亚最早研究南洋课题的学术团体。自1951至1971年的21年间的15届委员会中，连士升为南洋学会服务了20年或14届，其中担任了三届的主席，两届的副主席，一届的财政、一届的研究主任和八届的理事，备受文教界的肯定。³²⁰对于华人寄予厚望的南洋大学，他也义不容辞，于1953年出任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³²¹并于1959年受委为魏雅聆的七人检讨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审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南洋大学改组的建议。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于1959年正月委任一个南大评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评审南大的学术水准。评议委员会的主席是西澳大学校长白里斯葛教授（Professor S. I. Prescott, Vice-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评议会在1959年7月22日向新加坡政府提呈它的报告书。基于对大学的组织，行政和教学的审查，评议会的结论是南大没有达到国际学术水平，拒绝向新加坡政府建议承认南大学位。该报告书普遍的引起新马华人社会的不满和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评议会具有很大的偏见，不了解南大创校的历史和客观的环境。同时，他们批评评议员都是外国学术人员，根本不了解新马情况。为了平息社会人士对报告书的不满，新加坡政府再设立一个以新加坡大学医学院魏雅聆教授为首的委员会，它的任务就是审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大学改组的建议。魏雅聆的七人检讨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都是新马本地的学者，包括翁姑阿都阿芝，符气林先生，黄丽松教授，廖颂扬先生，连士升先生和B. R. 史林尼哇山先生。魏雅聆检讨委员会于1959年11月20日提呈

³¹⁸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10；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12。

³¹⁹ 连士升受聘于新加坡南洋商报的年份有两个说法，一为1948年，记于（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亮思、连文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页146；（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页12。另一为1949年，记于连士升〈连士升走过的路〉《回首四十年》，页10。综合资料，连士升应该是1948年受聘于南洋商报到巴黎及欧洲采访报道，1949年担任商报主笔。连士升〈连士升走过的路〉《回首四十年》为最迟出版的集子，且原1976年记连士升于1948年任主笔的连亮思也是2009年版《回首四十年》的主编之一。

³²⁰ 〈南洋学会历届理事名表〉，见南洋学会网站 <https://www.southseassociety.sg/about.php>。从第15届（1959年）后，每届任期为两年。阅览日期：09.11.2020。

³²¹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南洋大学大事纪〉，根据《纪念南洋大学创校25周年特刊》“南洋大学大事纪要”编录，<https://www.nandazhan.com/lishi/nljiaoyao.htm>。阅览日期：9.11.2020；南洋大学编〈南洋大学校史略〉，载《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特刊》（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页13。

报告书，建议南大大幅度改革它的结构和行政、大部分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被接纳和执行。³²²

然而也同样在 1959 年大选之前，连士升的公民权突然被吊销，还几乎被驱逐出境。但在之后的两三年，又重获公民权，³²³ 不过 1961 年，连士升受命为政府公众服务委员会委员，是委员会唯一的中文教育者，对那些从中文学府来的应征者，特别关照、当他们英文表达不流利时，帮助他们发挥其他的优点。³²⁴ 1963 年，连士升获新加坡元首颁赠功勋章。1969 年，出任《南洋商报》总编辑。³²⁵ 连士升深知以组织推动文教事业的重要性，在他的号召及一些文友的支持下，新加坡作家协会于 1970 年 8 月 1 日成立，连士升被推选为顾问。³²⁶ 1971 年，他因病辞去所有职务。³²⁷ 1973 年赴北京探望长女侨思及顾颉刚，³²⁸ 回新后不久即感不适，于 1973 年 7 月 9 日与世长辞。³²⁹

Butler (2001) 认为除了母国之外，居留国和离散族群本身是塑造离散族裔的关键之一，这包括居留国如何影响离散族裔和母国的沟通，与其他离散族裔，及与居留国多

³²² 颜清煌《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助教职位》，<http://www.nandazhan.com/huiyi/nydx1963.htm> 28.8.2019 浏览。

³²³ 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文思、连亮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142-147。连亮思记述连士升在报馆当主笔时，当时言论自由受限制，他有好几次“差不多被驱逐出境”，但因为他的缘很好，每次都有人从中帮助，化险为夷；李霖〈回忆连士升〉，《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99-100；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评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7），页 211 也提到连士升‘险被马政府驱逐出境’。陈雪锋〈红帽子险送走连士升〉，连文思、连亮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135-137 指出原因是当局认为他的思想有‘急进嫌疑’。然而没有资料确切明示是什么言论导致他公民权被吊销及险些被驱逐出境的遭遇。

³²⁴ 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146。

³²⁵ 同上。

³²⁶ 陈华淑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历届理事名单〉，《新加坡作家协会四十年，1970-2010：构建跨世纪的文学景观》（新加坡：理想印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10），页 58；〈新加坡作家协会简史〉，《华文文学》，1996 年第 1 期（未注明作者，汕头大学出版，1996）。黄孟文〈新加坡作家协会的肇始〉，《作协 50·继往开来 1970-2020：新加坡作家协会五十周年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作家协会，2020），页 2，将 1970 年新加坡作家协会的成立，归功于连士升及一些文友的努力，见<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50SAWtekan.pdf>。10.11.21 浏览。1970 年成立的新加坡作家协会，于 1976 年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再于 1987 年恢复旧名‘新加坡作家协会’。

³²⁷ 连文思、连亮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7-10。

³²⁸ 在〈学习顾颉刚〉一文中，连士升说：“在当代中国的学者中，我个人最钦佩的可以说是顾颉刚先生。”《连士升文集》第二卷〈南行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 417。连士升得到顾颉刚的教诲，但不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1929 年秋，先生初到燕京任教时，我已经在三年级，因为时间关系，并没有选到他的功课。”（同上，页 419）。

³²⁹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页 15-16；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0。

数人的关系。因此居留国对塑造离散族裔的认同意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³³⁰ 结合中国母国对连士升的塑造与居留国新加坡的环境，连士升通过文艺反映新加坡的变化，对其思索与回应，特别是政治及社会议题，如争取自治与独立、种族问题、学生运动；教育及语文议题，如华校的式微、南大的创立与幻灭。对于新加坡的独立和发展他更予以肯定和期待。

从连士升的经历可看出他百折不挠的精神，从社评中可看出他有匡时救世的理想。连士升的社评主要收集于《慧眼静观》和《卓识思远》两本集子中。《慧眼静观》包括国际和新马时事、经济建设、教育和文化艺术。《卓识思远》则专注于文化与教育，特别是有关新马的课题。³³¹ 在他的 4 集《海滨寄简》中，也可见他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看法。³³² 他对新加坡作为新兴国的期待，可见于他在新加坡独立前后写成的文章。在华人社会中，连士升作为南洋商报的编辑与主笔，他发表的社论及从 1949 至 1972 年频频寄出的书简等，都在影响着人们，领导着新马文化界，是离散族裔重要的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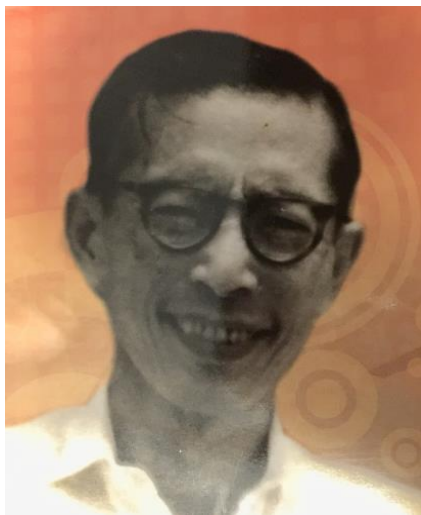
连士升的文字、编辑工作、文教事业对新加坡的社会发展、文艺地位都有卓越的贡献。作为一个离散华人，以他对中国的认识诠释中国的文化，并以此诠释润泽了居留国的离散族裔。有关论述将在后面章节详细讨论。

³³⁰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 207. Doi:10.1353/dsp.2011.0014.

³³¹ 连士升著《慧眼静观 - 连士升社评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及连士升著《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各有 52 篇社评。《慧眼静观》写于 1949-1970 年，《卓识思远》写于 1949-1971 年。

³³²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海滨寄简》共五卷。第一卷包括〈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印度洋舟中〉。第二卷包括〈给新青年〉、〈闲人杂记〉、〈回首四十年〉、〈南行集〉。第三卷包括〈泰戈尔传〉、〈甘地传〉、〈尼赫鲁传〉、〈西方英雄谱〉。第四卷包括〈海滨寄简一〉、〈海滨寄简二〉、〈海滨寄简三〉、〈海滨寄简四〉。第五卷包括〈落霞集〉、〈孤鹭集〉、〈秋水集〉、〈长天集〉。五卷《海滨寄简》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9 月再版。

第三节 杏影的大同世界（1911-1967）



杏影和李星可、连士升一样，都曾在报馆服务。李星可和连士升是社论的主笔，而杏影是多种副刊的主编。他和李星可和连士升都曾到过许多国家，接触多种文化，通晓多种语文，有宽广的视野，对时局不乏评论，都是有世界观的海外华人。

杏影原名杨芳洁，又名杨守默。³³³ 笔名另有钱杏影、公孙哲、里奇、爱欲生、芍红和杨杰等。³³⁴ 他的出生年有三说：1910、1911 年或 1912 年，但出生月日不详。³³⁵ 杏影出生于中国，原籍四川简阳县，但不是在四川出生。他的四川口音，是受了父亲杨草仙的影响，³³⁶ 但其他从出生至 14 岁的情况资料短缺，他在世时又绝少提及个人情况，

³³³ 〈杏影生平简介〉（未署名作者），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页 8。杏影原名应为杨芳洁，长大后自己改为杨守默。因为他幼年曾随一位说话不清楚的亲舅舅读四书五经，学到了说话结巴的习惯，长大之后深以为苦，以不在人前说话为原则，改名守默。见杏影〈读书和写作〉，杏影《读书和写作》（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4），页 90。

³³⁴ 〈杏影生平简介〉，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8。

³³⁵ 杏影何年出生有三说：1910、1911 和 1912。国大图书馆网页：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bank-xingying.pdf 记杏影出生于 1912 年；林臻〈杏影先生事略〉，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204 虽认为杏影可能生于 1911 年，但也不排除他生于 1910 的可能。他以杏影在 1950 年 1 月所写的〈谈不惑之年〉中说“四十岁是孔子说的‘不惑之年’”作为旁证参考。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8 的〈杏影生平简介〉记杏影出生于 1911 年。此书经多位编者长时间努力搜索诸多原始资料完成，可信度高，本文取此说法。

³³⁶ 李汝琳〈回忆杨守默〉，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华作家研究丛书）（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11。

因此这段时间的事迹不详。³³⁷ 他在中国上初中，14 岁时，由父亲杨草仙携往日本东京就读于高等中学，然后在早稻田大学接受大学教育。³³⁸ 杨草仙是清末“杰出的思想家、慈善家、诗人、狂草书法家”，在 1950 年他 112 岁时开了一个‘书展’，展示他二百多件书法。³³⁹ 由此可知杏影成长于诗书之家，影响他日后的思想及文艺倾向。

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杏影攻读的学科一说是英国文学，³⁴⁰ 另一说是教育。³⁴¹ 可以肯定的是，他精通中、日、英三种语文。他的〈读书偶译〉，³⁴² 里翻译了多过 250 个不同的外国文艺工作者、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改革主义者的文字，也在他的许多其他篇章中引用他们的名言或讲述他们的作品和思想。³⁴³ 在文学方面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莫里阿克（François Mauriac）、法国作家阿那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法国作家存在主义者萨尔脱（Jean Paul Sartre）；³⁴⁴ 俄国巨人托尔斯泰（Tolstoy）³⁴⁵；英国小说和剧作家戈斯卫塞（Galsworthy）、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作家兼牧者彭扬（John Bunyan）、小说家和诗人哈代（Thomas Hardy）、女作家乔治·艾留特（George Eliot）、³⁴⁶ 诗人腾尼孙（Tennyson）；挪威剧作家易卜生（Ibsen）；³⁴⁷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哲学方面有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美国哲学家和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音乐方面包括德意志作曲家和钢琴家贝多芬

³³⁷ 林臻〈杏影先生事略〉，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204。

³³⁸ 同上；〈杏影生平简介〉，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8。

³³⁹ 〈杨草仙小档案〉，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45。

³⁴⁰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20。此处记杏影在日本上的是早稻田大学，修读英国文学。

³⁴¹ 林臻〈杏影先生事略〉，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204 却记‘杏影大学专科似为教育系’；李汝琳〈忆故人〉，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38。杏影自述他在日本上的大学是‘现在的东京教育大学’，但未提所读学科。见杨守默〈走向一个伟大的日本〉，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140。

³⁴² 杏影〈读书偶译〉，杏影《想想写写》（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页 117-282。

³⁴³ 在杏影〈读书偶译〉中，共有 250 个注上名字的名人名言，另外有 38 位佚名的名言。其他还有圣经、阿拉伯、印度、德国、伊索寓言的翻译。在其他著作里－杨守默《读书与写作》（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4），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杏影《愚人的世纪》（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书与人》（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除了引用外国名人名言外，还有论述外国名人的专篇。

³⁴⁴ 杏影《愚人的世纪》就有对莫里阿克、阿那托尔·法郎士及萨尔脱的专篇，见页 139、200 及 207。

³⁴⁵ 杏影〈一个伟大的诞生〉，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32。托尔斯泰是另一个敢批评莎士比亚的文豪。

³⁴⁶ 乔治·艾留特（George Eliot）是笔名，本名为 Mary Ann Evans。

³⁴⁷ 除易卜生是挪威作家外，莎士比亚（Shakespeare）、彭扬（John Bunyan）、哈代（Thomas Hardy）、乔治·艾留特（George Eliot）都是英国作家。杏影〈一个伟大的诞生〉，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22-43。

(Beethoven)、莫扎特(Mozart)、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芬兰作曲家西贝辽士(Johan Julius Christian Sibelius)、波兰和法国作曲和钢琴家萧邦(Chopin),在绘画方面包括意大利画家达文西(Leonardo da Vinci)等等。在他塞的满满的书橱里,也有不少日文与洋文书。³⁴⁸由此看来,他的外文造诣应该很好。在翻译这些名人名言的时候,杏影也得到了他们的潜移默化,他说:“一些伟人所写的东西,虽然是只译了一两句-也等于是精读了那两句-却都能使自己得到多方面的启示。”³⁴⁹和连士升、李星可、苗秀一样,他们可说是那时代跨语系的华人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语言的优势开阔了他们的接触面。使他们的观点和评论更能从外而内的视野透视。由于对多国与多元文艺、不同的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认识,他有宽广的视野和胸襟,向往世界文化的交融,向往成为世界公民。³⁵⁰

1936年杏影由日本回返中国四川重庆后,便开始在文艺副刊发表文章。他从1936至1941年在中国生活约5年,加上他去日本的前14年,他大概在中国生活了19年。从1941至1945他旅居印度新德里,并在1945年受聘于印度加尔各答盟军总部以‘日本通’的身份被聘用。在旅居加尔各答期间,他结识了金克木、郭史翼、李汝琳,互称‘印度同乡’,并经常在当地的《中国周报》文艺版副刊发表散文。³⁵¹

1945年9月,他从印度到达新加坡。杏影刚到新加坡时,二战刚结束,许多作家回归文艺行列,但多数是南来作家,因此杏影急欲培养本地人才。³⁵²他抵新后初期在华侨中学执教,并于1947年任职于南洋商报担任翻译工作。在商报副刊和期刊如《星期六》、《文艺行列》上发表许多散文。³⁵³

³⁴⁸ 长谣〈回忆·怀念·寄望〉,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42。

³⁴⁹ 杏影《想想写写》后记,页283。

³⁵⁰ 杏影〈读书偶译〉,杏影《想想写写》,页125。

³⁵¹ 李汝琳〈回忆杨守默〉,页11;李汝琳〈忆故人〉,页37-39;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8记《中国周报》为《中国时报》。

³⁵²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bank-xingying.pdf; 忠扬〈文艺青年的导师、散文集杏影〉,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64。

³⁵³ 〈杏影生平简介〉,页8及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页8记杏影于1947年任南洋商报电讯翻译,兼任华侨中学教师,未提就职时间先后。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bank-xingying.pdf 记杏影开始在教育界服务,1947年才开始在南洋商报任职。

当他在南洋商报担任翻译工作时，被邀请编辑南方晚报的文艺副刊《绿洲》，但一方面他没有编辑的经验，怕编不好，另一方面他和本地作家‘几乎全不认识’，认为自己不能拉到稿件，就推辞了。直到1954年初，南洋商报发生人事变动，当时的文艺副刊编者姚紫‘急遽离职’，报馆便请杏影替上，从此开始了他的副刊编者生涯。³⁵⁴ 1954年1月18日至1967年1月5日，杏影主编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五种——《文风》、《新苗》、《南洋公园》、《文化》及《青年文艺》，近两千期，共主编副刊13年。在这段期间，杏影曾两次同时主编两个文艺副刊：1954年1月18日至1958年8月15日，他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文风》共828期，而在1958年的3月1日至1958年8月5日，他同时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新苗》，共45期。³⁵⁵ 1959年6月22日至1960年7月15日，他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南洋公园》共102期。³⁵⁶ 而在1960至1964年他也同时主编两种副刊：1960年7月17日至1964年2月26日，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文化》，共144期，《文化》较重视学术性的文章；³⁵⁷ 1960年7月20日至1967年2月6日，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青年文艺》共729期。³⁵⁸ 从1954年1月18日至1967年2月6日杏影主编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共计1848期。杏影主编的副刊种类及期数之多，可见杏影的编辑能力以及报馆对杏影的信任与器重。

杏影于1967年1月5日离世。如依据他的出生年为1911年，他在世仅56年。³⁵⁹ 他非常忠于职守，在他去世后，《青年文艺》还继续出版了10期才停刊，原来杏影入院就医前已编好十多二十期的《青年文艺》给排字房。他在医院初期，还托人从报馆拿稿给他审阅。³⁶⁰ 因此他虽于1月5日去世，他所编的副刊，一直到2月6日还在刊载他编好的文章。

³⁵⁴ 杨守默〈做一个副刊编辑的经验〉，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118；叶钟铃〈杏影与《文风》副刊〉，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同上，页93。

³⁵⁵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杏影——他不会寂寞》，页18。

³⁵⁶ 同上。

³⁵⁷ 同上；杏影〈致洪天赐信（60年8月16日）〉，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84。

³⁵⁸ 同上。

³⁵⁹ 林臻〈杏影先生事略〉，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204-209。

³⁶⁰ 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82。

杏影的文字主要收集在下列集子里：《读书和写作》（写作年代从 1947 年至 1952 年），³⁶¹《愚人的世纪》（写作年代从 1947 年至 1959 年），³⁶²《书与人》（写作年代从 1949 年至 1958 年），³⁶³《想想写写》（写作年代集中在 1952 至 1953 年），³⁶⁴《趁年轻的时候》（写作年代从 1950 至 1954 年）。³⁶⁵ 由此可知他写作的高峰时期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些集子里其中一些文章收录于《杏影散文选》³⁶⁶及《杏影研究专集》中。³⁶⁷ 其他还有一些诗歌和佚文收入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的《杏影 - 他不会寂寞》里。³⁶⁸

第四节 推动出版事业的李汝琳（1914-1991）



李汝琳以出版事业著称。杏影的《趁年轻的时候》散文集是李汝琳编撰的《新马文艺丛书》之一，他的散文集《书与人》、《愚人的世纪》也是李汝琳所主编的《南方文丛》出版的书籍。除了姚紫外，本研究的其他六位新华作家作品，包括李汝琳自己的著作都在他编辑出版的两套丛书《新马文艺丛书》及《南方文丛》之中，如下表：

³⁶¹ 杨守默《读书和写作》（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4）。

³⁶² 杏影《愚人的世纪》（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 简体字初版）。

³⁶³ 杏影《书与人》（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 简体字初版）。

³⁶⁴ 杏影《想想写写》（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³⁶⁵ 杏影《趁年轻的时候》（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 年三版）。

³⁶⁶ 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

³⁶⁷ 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

³⁶⁸ 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页 123-151。

	《新马文艺丛书》	《南方文丛》
李星可	戏剧《报穷》	戏剧《快艇》、李星可翻译韩素音的《青山不老》上下集
连士升		游记《名山勝水》、《春树集》
杏影	散文《趁年轻的时候》	散文《书与人》、《愚人的世纪》
李汝琳	中篇小说《姐妹俩》	长篇小说《漩涡》
苗秀	短篇小说《边鼓》	长篇小说《火浪》
赵戎	中篇小说《海恋》、短篇小说《芭洋上》	长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

表 2：李汝琳丛书中六位作家的作品

李汝琳原名李宏贲，笔名包括司徒克、李极光、李延辉、李霖、李曼丹。³⁶⁹ 李汝琳也曾以笔名崔岚、严晖、曹肃、丁宣在檳城星檳日报方北方主编的文艺副刊《文艺公园》和新加坡南洋商报谢克主编的文艺副刊《新年代》上发表有关中国新文学的评介作品。

³⁷⁰ 李汝琳再以笔名黄康著作共有 11 篇游记的《走马看花毗邻》。³⁷¹

李汝琳于 1914 年 7 月 5 日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沁阳县的书香世家，祖父是清代丙子科举人，祖母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孙女、工部尚书的女儿，父亲是丁酉科拔贡。³⁷² 他四、五岁时母亲去世，祖母抚养他并教他念旧诗，他在私塾也读古书，先习《千字文》、《初学琼林》、《龙文鞭影》，再读《古文观止》、《千家诗》、《四书》、《左传》等。他上省立第十三中学后，开始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初三时，祖母去世。他把新诗〈哭祖母〉寄到省城报纸副刊发表。初中毕业时，他写了一篇〈到光明之路〉给校刊，却被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里，教务主任附上赞语。这写这两首诗受到的鼓励对他日后热衷写新诗，影响很大。³⁷³ 升上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后，深受当时五四运动新诗的熏陶，喜爱五四文学，包括郭沫若、徐志摩、臧克家的作品。在 1930 年他 16 岁时以《风雪天》获得全班诗作比赛第一名，更增强了他写诗的信心。在高中最后一年，他已发表

³⁶⁹ 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载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怀庐书屋（出版地不详），1984），页 1；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新加坡作家研究丛书）（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页 239-245。李锦宗是马华文史学者，这两篇文章内容大致相同。后一篇写于 1991 年 4 月 5 日，应是修改后的稿件。

³⁷⁰ 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载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 7；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3。

³⁷¹ 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5 记《走马看花毗邻》此书于 1987 年 12 月由李建编，新加坡永康花园联谊会出版。然笔者未能寻获此书。

³⁷² 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39。

³⁷³ 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39；李汝琳 〈从读诗到写诗〉，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94。

许多诗歌，也先后主编了《寒雁》和《沁涛》两个文艺刊物，并在一家报章借版位主编诗刊《辛夷》，直到他去北平深造才停刊。³⁷⁴他在北平上大学的时候，发表小说并继续出版工作，与他的堂叔、三弟及好友联合出版《北斗季刊》、《北斗半月刊》及《巨浪》。在大学三、四年级时把自己的作品编成《惜昨集》《红叶集》与《苦寒集》。后来只有《惜昨集》得以出版。³⁷⁵这些出版经验都是他日后积极推动出版事业的基础。

1935 他休学一年，前往南京参加学生运动，请愿抗日。1936 年回北平上大学最后一年，出版诗集《惜昨集》，并通过老师介绍，加入北平作家协会。1937 年 6 月获学士学位。³⁷⁶1938 年 7 月 7 日，他再北上参与抗日的行列。在 1938 至 1944 期间曾任西北艺术学院图书馆主任，并与数友为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合编大西北著名文艺杂志《西线文艺》月刊，他的独幕剧《梦》也在这月刊上发表。这个时期他少写诗，多写剧本和小说。³⁷⁷

1944 年 9 月 2 日至 1947 年 12 月，李汝琳应同乡翟君的邀请，到印度加尔各答主编《中国周报》和《中国日报》的文艺副刊，并以李极光为笔名，发表诗歌和散文。³⁷⁸在印度期间，他认识了杏影和金克木、郭史翼，互称‘印度同乡’。³⁷⁹1947 年 12 月 24 日到新加坡后，起初没有工作，1948 年后半年被华侨中学聘为教务主任。之后数年因忙于公务，没有写诗，³⁸⁰然而也因工作的关系，1952 年 4 月与一些教师发起筹组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该会于同年 6 月成立，他被选为常任理事之一，一共连任三届。在 1952 至 1955 期间，他也曾任新加坡教师总会副理事长，并担任在南洋商报借版位出版的《南洋教育》的主持之一。新加坡南洋报社与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出版《南洋青年》半月刊，李汝琳也是为主持人和编委之一。³⁸¹1953 年他辞去华侨中学教务主

³⁷⁴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39-240；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95-97。

³⁷⁵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0-241；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97-98。

³⁷⁶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0-241。

³⁷⁷ 同上，页 241。

³⁷⁸ 同上，页 241；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98。

³⁷⁹ 李汝琳〈回忆杨守默〉，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11；李汝琳〈忆故人〉，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37-39。

³⁸⁰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1。

³⁸¹ 同上，页 241-242。

任一职，较有时间写作。1954 年加入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担任高级讲师兼华文系主任。他以对当时教育状况的认识及他在教育界的经历，反映在他的小说中。1956 年出版诗集《再生集》，开始以李汝琳为笔名，开始重新执笔写诗。1958 年开始为青年书局主编《新马文艺丛书》、《南方丛书》及《新马戏剧丛书》，并创作小说。³⁸² 在 1959 年新加坡大选前夕被吊销公民权，两三年后才重新获得，年份与原因不详。³⁸³ 于 1959 年至 1960 年，李汝琳以李霖为笔名，发表《长夜的黎明》、《路》、《荒》等诗作。1960 年至 1961 年，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漩涡》。这部小说写成后他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1965 年被推选为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全马剧本创作比赛的评选委员会主席，是对李汝琳剧本创作与编辑的肯定。他 1970 年任教于南洋大学中文系，1973 年退休。1976 年被推选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后改名为新加坡作家协会）顾问，至 1991 年逝世为止。³⁸⁴ 1979 年至 1987 年他发表创作和评介新文学的文章、出版作品单行本、讲演文学创作的理论等。后来他的视线逐渐减弱，于 1991 年 3 月 17 日因脑癌离世。³⁸⁵

李汝琳曾身处不同的国家，经历过不同的政治场景与时代。他的作品往往反映时代的特色和政局的变换。〈炸〉以印度为背景，刻画了中国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门之间的互相拆台以及国民党海外的内部斗争；〈内疚〉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因为丈夫被日军捡走而不得不改嫁的女子被儿子误解，又再被改嫁的丈夫遗弃的故事，对时代提出了控诉；〈漂浮〉则跨越了中国内战、新加坡的殖民地时代、独立，进而越南进军柬埔寨，继续南下的威胁的不同场景，谴责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漂浮’者三易国籍 - 英籍、新加坡籍，加拿大籍的投机、利己与无根的可悲形象。〈新贵〉也以新加坡要求独立自治为背景，讽刺不学无术、欺善怕恶的知识分子，在日治、殖民地时代及至独立自治时期，因懂得钻营取巧、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而成为‘新贵’。他对这些投机分子的鞭挞，正显现了他对新加坡的归属感和爱国意识。

³⁸² 同上，页 242。

³⁸³ 李汝琳〈回忆连士升〉，《李汝琳创作集》（香港：南方书屋，1987），页 282。

³⁸⁴ 陈华淑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四十年，1970-2010：构建跨世纪的文学景观》（新加坡：理想印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10），见其中〈新加坡作家协会历届理事名单〉，页 58-62 及黄孟文〈新加坡作家协会的肇始〉，页 10-14。

³⁸⁵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2-243。

李汝琳的作品种类有诗、杂文、小说、戏剧。他特别为人敬仰的是他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为青年书局主编 3 集 36 本《新马文艺丛书》、12 部《南方丛书》及 6 本《新马戏剧丛书》，使得许多作者的文稿得以发表、不至遗失，是对马华文学的一大贡献。

³⁸⁶ 赵戎的《芭洋上》是《新马文艺丛书》之一。他在后记里就特别提到这本书的出版是出于李汝琳的鼓励和催促：

“汝琳兄不放过我，像长辈般为我定下一个写作计划，一定要我交出货色来。故人爱我，鞭策、鼓励，双管齐下。疏懒成性的我，就算是木乃伊吧，也会感召而起的！”

末了，这集子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成就，也是汝琳兄所‘逼’出来的。”³⁸⁷

刘笔农也肯定李汝琳的编辑和出版事业，提拔过不少写作人，功不可没，更使新华文学史产生过异彩。他对李汝琳的热忱，十分敬佩：

“即使是晚年，当青年书局陈孟哲有意续出文艺书时，李汝琳年事已高，视力虽然大为减退，可是，他仍然很兴奋地力邀笔者和他联合主编，信心十足地准备为文坛再次献出黄昏的余晖。工作开始后，他无时无刻在挑选作家、约见作家、编审文稿，那份忘我的投入精神，让较他年轻的我十分汗颜。”³⁸⁸

方北方〈巴金与李汝琳〉甚至以李汝琳与巴金编辑的贡献相比，总结了李汝琳编辑这三套书对海内外文坛的影响：

“李汝琳先生主编的这三套，深具形象思维，反映马来亚社会一定的内容，厚薄薄计有五四册，字数共约三百万字的马华文学作品，自一九五八年络绎投入仍被视为‘文化沙漠’的新马文坛，使海外一般对马华文学还是很模糊的人士，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好些高级文化机构与著名大学，纷纷托香港和新马各大书局，搜购马华文学作品。而专门研究东方文化和印尼暨马来亚政经文教的，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于如伯教授和苏尔梦博士，以及日本的三本哲也、樱井明治、今富正巳、小木裕文等教授，也深入研究马华文学，甚至先后翻译马华文学作品。

马华文学写作人看到圈内的同行有不俗的表现，妄自菲薄的观念也逐渐淡化；一路来认为本地姜不辣的文人，也开始有了接受文学批评的倾向，而对马华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看法。

³⁸⁶ 原甸〈灵前焚诗 - 悼李汝琳先生〉，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2-243。

³⁸⁷ 赵戎《芭洋上》后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页 95。

³⁸⁸ 刘笔农〈序〉，刘笔农《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 10。

所以这五十四本具有水准的马华文学作品，所发出的光辉，使海外的文化人看见了华人社会的面貌，也照亮了马华写作人学习的文学道路，对马华文学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可见李汝琳先生主编的几套文学丛书，与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对促进现代中国文学成长所发挥的力量，是一样可以肯定地说对海外的华文文学运动，深具作用的张力。”³⁸⁹

李汝琳对出版工作充满了热忱，甚至在他的小说中也不忘推动出版工作。他把自己 1944 至 1947 年在印度的经历，取 1946 至 1947 年印度华人社会在中国内战、印度印回宗教纠纷的背景下写的《漩涡》，不但反映了教育界、报界的正负面，也把他的出版热忱交织其中。通过书中中华日报的主笔刘春明，他认为马来亚的报章在谈论马华文艺，印度华人也应开展印华文艺，把副刊上刊登的好文结集成书。这不但可以鼓励当地人写作，也可让中国内地了解海外作品。刘春明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长远的计划，每年出一本包括各种体裁的作品。³⁹⁰

由此可见李汝琳不但关注新马华文坛，也关注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理所当然，他熟悉中国的作家，写了〈从 19 世纪来的前辈作家〉、读〈中国现代作家注意译书目〉、〈浅评几本有关三十年代作家的书〉、〈再读“五四”小说作家〉。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学，他的〈认识香港作家〉、〈台湾老作家〉、〈认识美华作家〉，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当地的一些作家，鼓励文艺交流，并激励本地作者奋起直追名作家的成就。他的〈十九世纪小说巨匠〉，更介绍了法国、英国、俄国、美国、德国等的文豪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关于作家与作品〉评介了秦林的散文《芦苇集》。《芦苇集》里包括了对一些西方、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作家与作品的评论，而李汝琳的〈关于作家与作品〉则对这些评介表达了他的看法，从中可看出李汝琳阅读的广泛与深入。在这篇评介文章里，他也建议秦林多写一些散文，重新组织文章的内容，分成两本书出版。³⁹¹ 从他对外国作家的认识与推介，以及他以推动新马华文文学为宗旨的出版事业，都显示出他作为离散华人的宏观视野。

³⁸⁹ 方北方〈巴金与李汝琳〉，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166-168。。

³⁹⁰ 李汝琳《南方文丛》之一《漩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 简体字初版），页 147-148。

³⁹¹ 这几篇文章，见《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43-63。

第五节 ‘黄色作家’ 姚紫（1920-1982）



姚紫曾被冠以‘黄色作家’的称谓，因为他在文章里有许多女性和男女关系的描绘，³⁹²有比较露骨有关女性的体态，也有男女亲密的行为。在 1950 年代初至 1956 年，新马文坛上进行‘反黄色’文化运动。在紧急法令实施之后，严肃的文艺低沉，取而代之的是渲染色情、反映消沉情绪的文化，统称黄色文化。有些编者和作者则展开反黄运动。³⁹³姚紫在 1950 年刊登在《文艺报》上的〈窝浪拉里〉被套上黄色小说的称号，《文艺报》也被冠为黄色刊物。³⁹⁴姚紫激烈反击，以贺斧为笔名，引经据典分析黄色小说的定义。他指出，作品色情与否，不能断章取义，应该从作品的整体来批判、从作者的创作意识来了解，并以著名的小说家和作品，萧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罗曼罗兰在《哥拉·布勒尼翁》、拉甫列涅夫在《第四十一》、茅盾《小城春秋》里对女性胴体及性行为的描绘，来说明他的论点。³⁹⁵他认为读者应以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

³⁹² 如姚紫〈窝浪拉里〉，刘笔农主编《姚紫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1999），页 91、94 及 102；姚紫《咖啡底诱惑》（厦门：鹭江出版社，1987），页 218 及 232。姚紫〈九月的原野〉，姚紫《九月的原野》（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8），页 10-12，18-19；姚紫〈无罪的灵魂〉，姚紫《九月的原野》，页 106-107；姚紫〈昨宵又作江南梦〉，姚紫《九月的风》（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6），页 38-39。

³⁹³ 见附录 2《新华华文文学史分期详表》。

³⁹⁴ 贺斧〈正视‘反黄色文化运动’〉，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华作家研究丛书）（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257。贺斧即姚紫。

³⁹⁵ 贺斧〈正视‘反黄色文化运动’〉，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53-261。

家 A. K. 瓦西里耶夫的简明方法辨明黄色和非黄色小说。非黄色小说“（作家）所选择和表现的那些事物和情节，是要显示出被描写的事件后面的观念和逻辑。”他以‘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例，说明如果不描绘查泰莱夫人的出轨行为，便无法强调人性的存在和她如何挣脱传统礼教的锁链，因此爱慾的描绘是必须的。相反的，黄色小说则没有或没有健全的逻辑或观念。³⁹⁶

几段令他心碎的恋情也是令他在多篇文章里回忆、思念、悔恨、怅惘的原因。³⁹⁷ 其中他对 IC 和 JC 最为难忘，³⁹⁸ 以多首古诗词倾诉对 IC 和 JC（他从未道出她们的真实姓名）的爱恋和失望。在这两人中，在《郑梦周诗词集》中，清楚写有关 JC 的古诗至少有 10 首。³⁹⁹ 对 JC，他是‘梦断蓬山未断情’，‘痴痴惜别自凄迷’⁴⁰⁰，对先后失去 IC 和 JC，他觉得是被命运作弄，愤愤不平：“余素以善美而自策，游天下，正是非，求一心爱之偶，愿安份而生活，何今之不幸如是？昔逢 IC，今遇 JC，是我犯何阴谴也？胡纵欲横行之富贾权家，得天之厚佑也？”⁴⁰¹ 爱情不可得，事业也受挫，使他颓废了一段时期。他曾因‘余自吉隆坡返，即因命运颠沛，魑魅白眼经厌，遂纵情於物外，不与就亲友通音讯’，进而‘醉卧青楼’，⁴⁰² 还与两位青楼女子有情感的交集。⁴⁰³

姚紫是性情中人，他热情、真挚、认真和执着，然而他也敏感而易怒，稍不顺意，则形诸于色。知交蓝平昌形容他性格倔强耿直、脾气暴躁刚烈，神经过敏，许多朋友都不愿接近他，不过却赞赏姚紫的爱憎分明、热爱文艺、正直善良。⁴⁰⁴ 他也会为了朋友，

³⁹⁶ 姚紫〈什么是黄色小说〉，《杂文，这只部队》（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1987），页 13。

³⁹⁷ 如姚紫〈夜窗下〉，姚紫《九月的风》，页 76-77；姚紫〈魔恋〉，姚紫《九月的风》，页 78-79；姚紫〈怨妇吟〉，姚紫《九月的风》，页 91-93；姚紫〈夜简〉，姚紫《九月的风》，页 94-96。此文写于 1959 年 2 月 8 日夜三更；姚紫〈勿洛之夜〉，姚紫《九月的风》，页 109-112；姚紫〈虹 - 寄钰〉，姚紫《夜歌》（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9），页 8-9；姚紫〈给 JC〉，姚紫《夜歌》，页 10-11；姚紫〈爱底哀歌 - 写给亲爱的 IC〉，姚紫《夜歌》，页 12；姚紫〈夜歌 - 给 HK〉，姚紫《夜歌》，页 15-16。

³⁹⁸ 石门〈序〉，郑梦周（姚紫原名）《郑梦周诗词集》（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9），页 3；柳北岸〈‘郑梦周诗词集’序〉，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55-156；郑梦周《郑梦周诗词集》，页 47；姚紫〈给 JC〉，姚紫《夜歌》，页 10-11；姚紫〈爱底哀歌 - 写给亲爱的 IC〉，姚紫《夜歌》，页 12。

³⁹⁹ 郑梦周《郑梦周诗词集》，页 36、45、47、48-49。

⁴⁰⁰ 郑梦周《郑梦周诗词集》，页 36-37。

⁴⁰¹ 同上，页 47。

⁴⁰² 姚紫〈漫吟答讯〉，郑梦周《郑梦周诗词集》，页 18-19。

⁴⁰³ 郑梦周〈感慨〉，郑梦周《郑梦周诗词集》，页 40；郑梦周〈遣怀〉，郑梦周《郑梦周诗词集》，页 45。

⁴⁰⁴ 蓝平昌〈焚三柱香 - 我哭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30-133。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的童年同学侯贤辉每当受人欺负，他一定出面护卫。⁴⁰⁵认识姚紫 40 年的白寒形容他‘固执而天真、暴躁、粗犷’，并且‘急躁’⁴⁰⁶；姚紫的学生兼好友刘笔农指出，‘这一辈子，他为了那股骄强若狂的个性，不知道和多少人有过口角’；⁴⁰⁷曾协助姚紫出版《文艺报》的韦晕及邻居谢克也提到就算是朋友，姚紫也会因和他们言谈不和而起冲突，有一次姚紫和谢克、苗秀宵夜过后，开车回去。苗秀明明写好了曾答应姚紫的一篇有关纪念契诃夫的稿件收在裤袋里，却说他写不出来。姚紫气极，突然刹车，把苗秀赶下车，放他在独立桥畔，自行开车离去。⁴⁰⁸谢克更直接批评他‘性情刚愎，又多疑，三句不和就暴跳如雷，跟人争吵、动粗的事经常发生。’姚紫还曾因打架被人打伤。⁴⁰⁹他自己曾在一首古诗《啸歌》后注‘1955 年遭谗怒抛宽柔中学教鞭感作’，⁴¹⁰其实他的性格和他事业的不顺遂互为因果。他坚守原则和要求完美的性格使他易于树敌，而事业的挫折，加上爱情的坎坷，令他更愤世嫉俗。

姚紫原名郑梦周，1920 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安海镇。⁴¹¹ 郑梦周有许多笔名，如姚紫、黄槐、欧阳碧、上官秋、吴萍、贺斧、符剑、唐兮、向阳戈、淳于旭、武吉巴兄、西门风、舒仲、公孙龙、黑浪、吴笙、司徒然、赵旭、鲁明、毕三、胡加和胡笳等。⁴¹² 他用不同的笔名写不同的文体，用笔名的方式有些可归类如下：

写小说，用姚紫、黄槐、欧阳碧

写散文，用上官秋、吴萍

写杂文，用贺斧、符剑、唐兮

写诗，用向阳戈、淳于旭

写《新加坡传奇》，用武吉巴兄

写妇女文坛的文章，用西门风

⁴⁰⁵ 侯贤辉〈忆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15-116。

⁴⁰⁶ 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56、58。

⁴⁰⁷ 刘笔农〈悠悠终古 - 悼姚紫师〉，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62。

⁴⁰⁸ 谢克〈饮水思源忆前辈 - 纪念姚紫先生逝世 30 周年〉，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11），页 162；韦晕〈狂侠与向禅〉，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84。

⁴⁰⁹ 谢克〈姚紫与常凯法师〉，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72-73。

⁴¹⁰ 郑梦周《郑梦周诗词集》，页 20。

⁴¹¹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6，但只记姚紫出生于 1980 年，未提他的出生月日。

⁴¹² 刘笔农〈勇敢接过姚紫交下的棒〉，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42-43；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8 指出，郑梦周还有以下笔名：舒仲、公孙龙、黑浪、吴笙、司徒然、赵旭、鲁明、毕三等，但吴蒙未提郑梦周用这些笔名于何种文体。

他用许多笔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编辑副刊的需要，稿源不足时，他就用不同的笔名写不同形式的作品。当他在莆田主编福建新报副刊《新生代》时，有时整版都是他用不同笔名写的作品。⁴¹³ 有些笔名还有地方性，当他在福州永泰时常用胡加和胡笳为笔名，显示了他对曾经历过的地方的感情。

根据姚紫的学生刘笔农所述，姚紫是抗清名将郑成功的后人。父亲郑时雨是位西医兼国术名家。⁴¹⁴ 他自述母亲也是医生。⁴¹⁵ 他的童年同学侯贤辉也记述姚紫的父亲郑时雨是位西医，外祖父黄日增是基督教牧师，除传福音外，也热心公益。⁴¹⁶ 他毕业于基督教会开办的培元中学，应和这家庭背景有关。⁴¹⁷ 约 1939 年抗日战争前他已经是厦门《华侨日报》的副刊编辑，⁴¹⁸ 之后他曾在福建永泰税务局任职。在永泰时，也为莆田的《福建新报》编《新生代》文艺双周刊。1941，他进入泉州海疆学院就读。⁴¹⁹ 他热衷于编辑工作，但路程非常坎坷。来新加坡之前，他任厦门《江声日报》编辑，由于讽刺及抨击当时的政府而被通缉，但吴蒙根据姚紫的文件及他临终口述，姚紫曾自言一生未参加任何政党。⁴²⁰ 刘笔农是姚紫在晋江学校的学生，也记述姚紫在中国时为《江声日报》编文艺副刊时，因他的杂文犀利尖锐，“终不见容于当局，迫使他须弃家背乡南逃”。⁴²¹ 姚紫的知交柳北岸也记姚紫“在培元书院毕业后，即担任厦门江声日报编辑。郑君赋性耿直，常为文讥诮官吏，惟讽刺之祸，速於飞尘，终为当局所通缉。”⁴²²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1947 年底他来到了新加坡。1948 年开始在道南小学执教，1949 年转到晋江学校。⁴²³ 在《秀子姑娘》于报章连载及出版单行本之后，他加入

⁴¹³ 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56-57。

⁴¹⁴ 刘笔农〈三十年前伟丈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92。刘笔农是姚紫在晋江学校的学生，见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刘笔农《姚紫研究专集》，页 30；刘笔农〈姚紫又记〉，刘笔农《姚紫研究专集》，页 74-75。

⁴¹⁵ 姚紫〈‘明天又是一个好太阳’跋〉，姚紫《短长书》（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8），页 87。

⁴¹⁶ 侯贤辉〈忆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15。侯贤辉称他乃姚紫童年时的同学。

⁴¹⁷ 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55。

⁴¹⁸ 据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页 55-59 推算。白寒在记述姚紫 1975 年给他的信中提到 36 年前，姚紫自言他还是像永泰时期那样的孤剑江湖，因此他在永泰时期应是 1939 年左右。

⁴¹⁹ 同上，页 57；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刘笔农《姚紫研究专集》，页 38 记姚紫出身于海疆学院，据说读的是历史系。

⁴²⁰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6。

⁴²¹ 刘笔农〈勇敢接下姚紫交下的棒〉，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42。

⁴²² 柳北岸〈‘郑梦周诗词集’序〉，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55。

⁴²³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6 记姚紫在 1948 年先在道南小学，1949 年转晋江学校，而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页 31 则记姚紫先到晋江学校，后到道南小学。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6 和吴蒙的记述相同。

《南洋商报》担任资料室主任兼编辑。⁴²⁴在商报期间，他曾主编《家庭妇女》版，《星期六》周刊、《文艺行列》月刊（纯文艺期刊）和《世纪路》（文艺副刊），并兼任南洋商报所发行的《南方晚报》副刊《绿洲》编辑。⁴²⁵他在编《绿洲》时，提高了《绿洲》的水平，但为了鼓励青年写作，保留了《周末青年》周刊，并为他们修稿。《周末青年》重视内容却不重视技巧，鼓励年轻人发表接近他们生活的作品。⁴²⁶不过编了 32 期后，《绿洲》在 1953 年正月停刊，在〈告别‘绿洲’读者〉里，只是暗示‘文艺脱离不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状态’。⁴²⁷1953 年 10 月 8 日，他开始编《世纪路》文艺副刊，共编了 66 期。⁴²⁸离开了南洋商报后，他于 1954 年 2 月 15 日创办了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月刊。⁴²⁹离开商报之前，他还办了一份周刊《海报》，但因报馆不允许属下员工同时办报，因此只出版了半年就停刊。在商报期间，他培养了一批本地的年轻写作者，如杜红、陈凡、苗芒、谢克。⁴³⁰然而不久之后，因他‘卷入反英国殖民地统治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文艺阵线’，于 1954 年 9 月被殖民地政府拘捕，盘问了 3 天 4 夜后才被释放。⁴³¹1955 年《文艺报》的执照跟着被吊销，他只好到马来亚柔佛的宽柔中学担任高中部国文（华文）主任。⁴³²他出版刊物的热情不减，于宽柔中学任教时创办《社会新闻》周刊，只出版三期，执照又被吊销。1957 年主编《九月的风》，只出版 1 期。⁴³³1958 年 3 月创办《大地》十日刊，只出版三期即被查封。⁴³⁴1958 年 8 月应聘至吉隆坡任《钟声报》总编辑，出版 10 期后又令停刊，同年主编并出版特刊 17《新马工商考察团在北京》。⁴³⁵1959 年为生活所逼，他当上了海员，在来往新加坡和印尼的轮船上工作。⁴³⁶生活的挫折不能减灭他对编辑和出版的热爱，

⁴²⁴ 姚紫《秀子姑娘》于 1949 年 3 月在南洋商报发表，同年 5 月出版单行本，并因此加入南洋商报。见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6。

⁴²⁵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6。

⁴²⁶ 姚紫〈读者·作者·编者〉，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08-209。

⁴²⁷ 姚紫〈告别‘绿洲’读者〉，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15。

⁴²⁸ 姚紫〈告别读者〉，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06。

⁴²⁹ 同上；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6；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99。

⁴³⁰ 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刘笔农《姚紫研究专集》，页 33。

⁴³¹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6。

⁴³² 同上，页 27。

⁴³³ 同上。

⁴³⁴ 姚紫〈‘开张大吉’-《大地》杂志发刊词〉，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17-218。

⁴³⁵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7。

⁴³⁶ 同上。

1963 年，他创办了天马图书公司，出版了中国作家和自己的作品。⁴³⁷ 1965 年，他出版了《天马杂志》半年刊，但只出版了 3 期即停刊。⁴³⁸ 1967 年，又出版《华报》周刊。

《华报》销路不错，但出版一个短时期即自动停刊，因他觉得该报受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政治意识太浓。他认为中国应该是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共产党人的中国，继续出版《华报》会卷入中国政治中，变成支持共产党的中国。因此他自动关闭了能赚钱的《华报》，也停止了一切出版活动。⁴³⁹ 1969 年 4 月 1 日，他卷土重来，应聘主编《新明日报》副刊《新风》，至 1977 年 5 月 31 日离职止。这段期间，也培养了一批本地的年轻写作者，如君盈绿、蓝玉、冷若冰、蓉子等。⁴⁴⁰ 在编辑的过程中，他积极提拔后进、奖掖新秀：“如果他发现了哪一位投稿者是可造之材，他真的大喜若狂，他会给他打电话、写信、催他的稿、为他改文章，改得很用心，然后再为它设计版面，一定做到清新绝俗，真是求才若渴。”⁴⁴¹ 从 1939 年之前他在厦门编辑《华侨日报》的副刊开始至 1977 年，不包括天马图书公司的出版，他总共编辑了 20 种刊物。在这 38 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种刊物停刊了，他又开始编辑另一种。他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前仆后继的精神，难有其他编者能与之相比。

除了编辑之外，姚紫勤于写作。在他生前出版的计有 12 本小说：《秀子姑娘》（1949 年初版）、《乌拉山之夜》（1950 年初版）、《咖啡底诱惑》（1951 年初版）、《马场女神》（1952 年初版）、《阎王沟》（1953 年初版）、《风波》（1954 年初版）、《带火者》（1955 年初版）、《黑夜行》（1959 年初版）、《半夜灯前十年事》（1961 年初版）、《没有季节的秋天》（1963 年初版）、《萍水记》（又名《葬情记》，1964 年初版）、《窝浪拉里》（又名《兰娜》，1965 年初版）；2 本散文集《情感的野马》（1963 年初版）、历史评论《西楚霸王 - 项羽》（1964 年初版）⁴⁴²。其实他还有许多作品没有出版，在他离世后，他的好友兼遗产信托人，替他出版了 9 本书：小

⁴³⁷ 同上。他出版了曹禺的剧作《桥》、穆时英的小说《黑牡丹》、金玉明的《萧红的一生》、他自己的小说《窝浪拉里》、《没有季节的秋天》、《萍水记》，及历史评论《西楚霸王项羽》。

⁴³⁸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112。

⁴³⁹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7；韦晕记述《华报》的出版社为〈华报社〉，见韦晕〈狂侠与向禅〉，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86。

⁴⁴⁰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6-27；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38。

⁴⁴¹ 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37-38。

⁴⁴²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19-41；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8。

说《新加坡传奇》、《木桶鸭》、《九月的原野》、《潜龙记》、散文集《九月的风》、杂文集《杂文 - 这支部队》与《短长书》、新诗集《夜歌》、旧诗词集《郑梦周诗词集》。在病重时，他还在关心文艺工作。他要朋友替他开一个展卖会，把他的书籍都送去展卖，所得款项全部拨入“姚紫文艺基金”，基金设立的目的在于“鼓励自由、民主、正义与进步的文艺的发展”。他计划得很认真仔细：展卖会定名为《姚紫文艺工作展览兼作品义卖会》，地点要选在维多利亚礼堂，时间一定要在学校假期内，还列了工作人员名单，足见他心意的殷切。⁴⁴³ 在他离世前，他自知大限将至，即召集友好，并立遗嘱，委托吴俊刚、张道昉、林范平、郑捷浩为其遗产信托人，将其遗产（大部分为股票）适时变卖，设立文艺基金以鼓励本地文艺创作，也为他出版尚未出版的遗作，10年后若有剩馀，则平分给他在中国的5位弟妹。姚紫的遗产信托人成立了‘姚紫文艺基金会’不但替他出版了9本著作，也赞助出版其他作家不同文体(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的文艺书籍共38本，赞助经费共8万9千元。⁴⁴⁴ 姚紫文艺基金的设立，显示了姚紫作为新加坡离散华人对新加坡文艺的关切，更竖立了推己及人的楷范。如华之风所言，“姚紫文艺基金的贡献，绝不只限于他赞助了38本书的出版，更重要的是他为我国华文文坛树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典范，开创了文人以个人力量，协助其他文人的先河。”⁴⁴⁵

姚紫离世后还有许多作品等待出版，一方面是因为他勤于写作，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创作无比认真，对他的文章字字斟酌，非至满意不予出版。这在他的手稿中修改的痕迹处处可见。⁴⁴⁶ 刘笔农记述姚紫往往写了之后，搁在抽屉里，有空时拿出来一看再看，一改再改，看一次改一次，似乎没有满意过。还有几次因为他认为某些字非改不可，甚至要求印刷厂把印了一半的书弃置另印。⁴⁴⁷ 叶昆灿也记述姚紫对于排版、校正和设

⁴⁴³ 刘笔农〈悠悠终古 - 悼姚紫师〉，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64-65。

⁴⁴⁴ 同上；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126-133；张曦娜〈一朵落叶 叩响大地的胸膛〉，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313-314。李向〈开头·空白·结尾 - 我和姚紫的交往传奇〉，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记姚紫的遗愿，但记姚紫文化基金共赞助37本书的出版，页100-105。

⁴⁴⁵ 华之风〈深切的感谢〉，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135。

⁴⁴⁶ 见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17-47；《谢克捐赠姚紫手稿》（姚紫，1920-1982），藏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第11楼李光前参考书馆（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Level 11, 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姚紫手稿亦可见于其遗产信托人为他编的书籍，如《郑梦周诗词集》、《九月的风》与《九月的原野》中。

⁴⁴⁷ 刘笔农〈姚紫又记〉，刘笔农《姚紫研究专集》，页76；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刘笔农《姚紫研究专集》，页37。

计都亲力亲为，甚至在病中发表的组诗，在发排后，还要修改其中的两个字。⁴⁴⁸然而因为他对文艺的狂热，天天读书，夜夜写作，不论是否要发表或何时能出版，他都总是认真地写，因此他在世的时候，从 1949 至 1955 年，每一年都有一本书面世。1959 年至 1964 年也出版了 7 本书，其中 1963 年和 1964 年，每年出版了两本书。⁴⁴⁹

姚紫编辑刊物之多及创作文艺的热情，由此可见。他不但自己努力，更相信众志成城，呼吁作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推动马华文艺。他建议文艺界摆脱商人的控制，保有独立的出版路线，以期自由开展艺术活动、培养新作家、扩大读者群，也建议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促使社会健康、促使政府朝向人民文明生活的合理化改进。⁴⁵⁰对于他编的副刊和出版的著作都努力地介绍、解释编著的宗旨、作风、呼吁文艺界的朋友和读者共同开垦、耕耘，和读者互动。他编著工作的酸甜苦辣在这些文字里表露无遗。⁴⁵¹ Weber (1977) 的经典理论认为语文与宗教和历史都是组建社群的主要条件，⁴⁵² 本纳迪·安德逊 (Benedict Anderson) 也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国族文化的载体。因为语言文字联系了人们对国族的情感，是构成国族意识的媒介，因此印刷文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⁴⁵³ 姚紫的文字无疑促进了组建社群的工程。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姚紫外文的造诣，但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知道他阅读过不少外国文学。并积极鼓励他的读者和朋友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其中就包括不少外国名著。在 1950 年

⁴⁴⁸ 叶昆灿〈将毕生献给文艺 - 记姚紫先生〉，刘笔农《姚紫研究专集》，页 41。

⁴⁴⁹ 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19-41；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姚紫研究专集》，页 28。

⁴⁵⁰ 姚紫〈作家们联合起来！〉，姚紫《杂文，这支部队》，（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7），页 18-20；〈统一当前的文艺行〉，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16-17。

⁴⁵¹ 见姚紫〈卖花人自说花香〉，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37-39；姚紫〈编后话〉，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40-41；姚紫〈读者·作者·编者〉，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42-43；姚紫〈今天·明天〉，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44；姚紫〈告别《绿洲》读者〉，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45；姚紫〈写在‘文艺报副刊’编后〉，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46-47；姚紫〈一个理想，一个努力〉，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48-50；姚紫〈“九月的风”出版小跋〉，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51-52；姚紫〈“开张大吉” - “大地杂志”发刊词〉，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53-54；姚紫〈新风·“风”与裴多菲〉，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55-58；姚紫〈“新风”编后话 - 给萧子文友记南园一青年〉，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59-60。

⁴⁵² Eliezer Ben-Rafael, “Diaspora”. *Current Sociology Review* 61, nos.5-6 (2013), p.847. Doi: 10.1177/0011392113480371.: “Weber’s (1977) classic assessment that a sense of belonging forged by religion, history, or a language may be a major component of community formation.”.

⁴⁵³ Benedict Anderson,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s 3 & 7”,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Verso, 1991).

写的〈卖花人自说花香〉，就提到连士升在《文艺行列》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法国文学巨人-雨果〉一文，对现在和未来文艺的发展道路有所启示。⁴⁵⁴ 黄叔麟并记述：

“我是非常感激他把我带进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如果没有他的介绍，我不会认识屠格涅夫的《阿列霞》、大仲马的《基督山》、梅里美的《卡门》、狄更斯的《大卫考泊菲》……这些人物，后来都做了我的朋友，都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使我经得起任何对我的打击，至今还不曾倒下。”⁴⁵⁵

姚紫是一个热爱中外文学，古文新文学兼优，关心中国、关心新加坡、也关心世界局势的文人。他的文章内容丰富，对政治、社会、时局、文化、生活都有看法；文章形式也多样，不但小说、诗词、散文杂文都有，小说中还有中篇（如《秀子姑娘》）、短篇（如《九月的原野》）、寓言式（如《木桶鸭》）、历史小说（如《潜龙记》）；诗词有新旧诗词集（《夜歌》为新诗集，《郑梦周诗词集》为旧诗词集）；还有抒情式的散文（如《九月的风》）和评论式的杂文（如《短长书》、《杂文，这支部队》）。他的中篇小说《咖啡的诱惑》曾在1952年被邵氏电影公司拍成电影《蔷薇处处开》，他的短篇小说《窝浪拉里》还曾被翻译成英文，分别刊登在1962年的East Horizon杂志及1967年的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an Chinese Stories以及其他英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集里。⁴⁵⁶

被称为‘黄色作家’的姚紫，在他的时代中，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不但在文艺性或评论性的文章里都是如此直率和爱憎分明。后面的章节中将讨论他对中国的政局、国共的作为、以及外国局势的关注。他对新加坡的认同也毫不含糊。从个人到家国的论述，他的格局不是‘黄色作家’所能局限的。

姚紫多才多艺，不屈不挠，热情洋溢，但生活多蹇，情感多折，郁郁而终。甚至在他离世前两天，他还叫吴俊刚录下〈《风雪山夜店》跋〉，为待出版的《风雪山夜店》，

⁴⁵⁴ 姚紫〈卖花人自说花香〉，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37。

⁴⁵⁵ 黄叔麟〈姚紫与我〉，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108。

⁴⁵⁶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16。

讲述儒家思想中的侠义精神，可见他对创作的热爱与坚持。⁴⁵⁷也在他临终前两天，他自撰挽联，说尽了他一生的无奈，并以挽联横匾‘悠悠终古’，总结一生：

“五十始知非，原思有所奋发，修积寸功，补偿谬误；
风雨偏来恶，无奈落花狂飞，凄凉明月，空照篙蓬”⁴⁵⁸

姚紫感觉一生最遗憾的是没有成家，没有孩子。⁴⁵⁹然而他的副刊，培养了不少文艺幼苗；他的作品，启迪了无数读者的心灵；他的遗产，赞助了 38 本不同文体的文艺书籍；这些书籍的作者又接替他的棒子，发扬他‘文艺良心’的使命；⁴⁶⁰他对文艺执着的精神，牵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带火者’！⁴⁶¹如华之风所言，姚紫文艺基金的贡献，意义深远，为我国华文文坛树立典范，开创了文人推己及人的可贵先河。⁴⁶²他的离去，有如

一片落叶无声
无声地化尘
滋润了整座森林

一片落叶
沉重地叩响
整个大地的胸膛⁴⁶³

⁴⁵⁷ 姚紫〈《风雪山夜店》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51-252。

⁴⁵⁸ 刘笔农〈悠悠终古-悼姚紫师〉，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62-66。姚紫于 1982 年 2 月 18 日辞世。

⁴⁵⁹ 莫河〈记病中的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48。

⁴⁶⁰ 姚紫爱说的一句话是‘文艺良心’。见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57。

⁴⁶¹ 姚紫作为新马先驱编者与作者及对新马文坛的贡献，被誉为‘带火者’。‘带火者’也是姚紫一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由新加坡文艺出版社 1955 年出版。亦见黄叔麟〈姚紫与我〉，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08；列蒲〈我生平见过姚紫两次〉，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20。

⁴⁶² 华之风〈深切的感谢〉，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35。

⁴⁶³ 这是蔡欣在 1992 年 2 月 23 日姚紫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所朗诵的诗。见蔡欣〈落叶 - 悼姚紫〉，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125；蔡欣〈落叶 - 悼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23；李向〈开头·空白·结尾 - 我和姚紫的交往传奇〉，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04-105。

第六节 英文教师苗秀（1920-1980）⁴⁶⁴



苗秀原名卢绍权,和其他马华作家如杏影、李汝琳、姚紫一样,有许多笔名。其中笔名苗秀最广为人知,此外尚有军笏、文之流、闻人俊、苗毅、班毅、夏盈、夏凝霜、笠夫、贾村、史进等。还有鲜为人知的笔名如苍言、闻人进、费朗、尤俊、尤里、尤琴、尤毅、尤金、宋溪、白云天、于进、丘居竹、钱子遗等。他之所以用这么多笔名,因当时副刊版位有限,他将中篇和长篇小说分成几个独立故事,以不同笔名发表。⁴⁶⁵

在马华文坛上,谈到苗秀,就会联想他特殊之处:他上的是英校,创作的是中文;他的作品加入了马来语及许多方言,特别是广东话;他对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坚持。他的特殊之处与他的出生、幼年及少年的经历、殖民政府和日治,以及曾参与的工作密切相关。在笔者研究的文人中,苗秀、杏影、李星可与连士升都精通英文。苗秀曾在华侨中学教导英文 15 年(1956-1971),⁴⁶⁶ 杏影精通中、日、英三种语文,他的〈读

⁴⁶⁴ 苗秀出生于 1920 年,但月日不详。苗秀于 1980 年 9 月 10 日病逝。见〈苗秀年表〉,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212 及 216。

⁴⁶⁵ 苗秀〈写在《火浪》之前〉,《火浪》(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页 2;陈世俊〈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华作家研究丛书)(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 17。

⁴⁶⁶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金禧纪念特刊编委会《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金禧纪念特刊:1919-1969》(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69),页 57。

书偶译》，⁴⁶⁷ 里翻译了多过 250 个不同的外国文艺工作者、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改革主义者的文字，也在他的许多其他篇章中引用他们的名言或讲述他们的作品和思想。⁴⁶⁸ 李星可不单曾以英文写作及翻译，⁴⁶⁹ 而且还精通法文。⁴⁷⁰ 连士升也精通英语，曾翻译了工业史和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史。⁴⁷¹ 他们可说是那时代跨语系的华人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语言的优势开阔了他们的接触面。使他们的观点和评论更能从外而内的视野透视。

有关苗秀的出生地有两种说法。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⁴⁷² 记苗秀出生于中国广东，两岁时随父母来新，然未注明这说法出自何处。苗秀《旅愁》后记记述他父亲，是以‘闯关东’的精神只身南渡，⁴⁷³ 苗秀的好友赵戎也记苗秀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为广东三水，⁴⁷⁴ 因此苗秀出生于新加坡的说法较为可信。苗秀和赵戎二人是本研究七位新马华人中仅有的两位本地出生的文人。在后面的章节里将进一步探索他们的出生地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及与其他文人是否有异。作为本地出生的离散族裔，如 Butler (2001) 所论述的，他们的体验不止包括了父辈的离散记忆，也包含了居留国的在地实景与离散族裔下辈的社群，两者糅合而产生新的体验。离散研究也应包括这两类人的体验。⁴⁷⁵

⁴⁶⁷ 杏影〈读书偶译〉，杏影《想想写写》，页 117-282。

⁴⁶⁸ 在杏影〈读书偶译〉中，共有 250 个注上名字的名人名言，另外有 38 位佚名的名言。其他还有圣经、阿拉伯、印度、德国、伊索寓言的翻译。在其他著作里也常引用外国名人名言。

⁴⁶⁹ 李星可《政论选集外编—十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远景》（新加坡：国际图书（新）有限公司，1988）书后〈作者著作目录〉中，列出短篇小说：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hort Stories（London: Heinemann, 1967）与 Reunion and Other Stories（London: Heinemann, 1980），历史：Hanoi, Peking,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未列出版社，1976），杂文：The Fall of Madam Mao（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79）。

⁴⁷⁰ 李星可毕业于南堂法文专门学校，曾得奖学金至巴黎和比利时。参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7、13-15、171-172。亦曾得法国总领事的支持，在新加坡成立法新社分社。参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77-80。

⁴⁷¹ 连士升曾被翻译格拉斯《工业史》（N. S. B. Gras, *Industrial Evolution*），克拉判教授（Sir John H Clapham），《德法经济史》（“*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及克拉判教授（Sir John H Clapham）《近代英国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参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00-101，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页 11；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评述》页 60 与页 200 记这两本翻译手稿尚存于连家。

⁴⁷² 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5），页 188。

⁴⁷³ 赵戎〈苗秀论〉，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134。

⁴⁷⁴ 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及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1979），页 183。

⁴⁷⁵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192. Doi: 10.1353/dsp.2011.0014.

苗秀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穷苦，他父亲南来之前，在南中国西江流域做过长时期的戏班的‘衣箱’（管理戏子的服装和道具），在辛亥革命前夕，当了红坎士敏土厂的工人。在黄花冈事件后到新加坡，靠卖画为生。⁴⁷⁶ 1931 年世界经济不景气，父亲店铺倒闭，无业，一家靠典当过活，有一个时期还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敢上学。为了房租，他们搬了几次家，后来搬到贫民区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母亲筹了十几元，在骑楼下卖香烟。他的学费和买书钱也是父母亲典当借贷凑成的。楼房是一个大杂院，楼上楼下住了三十几家人，大人小孩一百多个，住户都是被生活践踏的贫民，包括占卜算命的、补鞋匠、人力车夫、妓女、拉皮条的、收买布鸡毛的、码头伥伥、机器卡、赌鬼、开鸦片间的、摆青菜摊的小贩、上街叫卖熟鸭肉的贩子、咖啡店的女招待等等。后来他所写的小说中，有许多人物、故事情节和背景都是这段生活的再现。生活环境也使他日后接近‘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⁴⁷⁷

苗秀的父亲是他的中文启蒙老师。他没进过华文学校，上午到英校上课，下午由父亲教导中文，以《三字经》、《成语攷》、《论语》，甚至陈蕴斋的传奇《燕山外史》为教科书。由于父亲在家的时间较多，苗秀以替父亲磨墨、洗画笔或其他小差使为交换条件，要父亲讲故事。他父亲的故事许多出自西游记。晚饭后，他父亲也常带他去大坡珍珠山脚大塌地，那里有‘讲古老’（讲故事的人）。他特别喜欢听‘讲古老’‘大粒烟’讲的《济公传》和《聊斋志异》的小说。‘讲古老’‘大粒烟’善于描摹人物的口吻，惟肖惟妙，对苗秀的小说人物的描绘不无影响。到了他能看小说的年龄，最先看的是《济公传》和《粉妆楼》后来又看了许多神怪剑侠小说。⁴⁷⁸

除了父亲外，苗秀也感激两个人对他的帮助。一位电版所的学徒阿全借给他许多新出版的中国作家的著作与译作，另外一位是照相馆的学徒郑照飞。郑照飞热爱文学，也曾在《新国民日报》发表作品。在他的指导下，苗秀以‘苍言’为笔名的散文〈苦闷〉被《新国民日报》的星期日副刊《星期美点》于 1933 年 9 月 17 日刊登。这是苗秀所

⁴⁷⁶ 苗秀〈少年时代〉，苗秀《边鼓》（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1-15。

⁴⁷⁷ 苗秀〈从听故事到讲故事〉，苗秀《文学与生活》（刘延陵主编《东方文化丛书》）（新加坡：星洲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57），页 151-156。

⁴⁷⁸ 同上。

发表的第一篇作品。⁴⁷⁹ 苗秀对这些曾经帮助他的小人物充满感激，对其他的底层社会的人物，无论是妓女或扒手、也往往以同情的语调描述他们，与他幼年和少年的生活背景不无关系。他丰富的阅历也丰富了他的作品。苗秀战前为银行书记，但战后开始就从事文化工作，曾任报馆编辑及主编，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及首届副主席，《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委员，负责《理论》集、《小说》第二集，并与赵戎、钟祺合编《戏剧集》。⁴⁸⁰ 1956年至1971年他曾在华侨中学教英文，⁴⁸¹ 1971年被南洋大学被聘为助理教授，并在同年获颁新加坡共和国公共服务勋章。⁴⁸² 苗秀没有高学历，却因他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热爱和努力而自学成功，受到学术界、文化界和国家的认可。

苗秀有不同形式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杂文、理论批评，甚至还写过一些诗歌，但最为人知的是他的小说。1970年当他总结新马华文坛的成绩时，说明新马华文坛产量最多也最有成就的是小说这种文体，比诗歌、散文、戏剧更能广泛和忠实的反映新马华社会各阶层社会面貌。他引用了美国小说家法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在《小说的任务》的一段话，说明小说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多以小说反映时代现实的原因：

“今天是小说的时代。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时期或任何工具能够像今天的小说这样充分表现时代生活。廿二世纪的批评家，在回顾我们这个时代，试着重建我们的文明时，他们所注意的将不是那些画家，建筑师或者戏剧家，他们将从小说家方面进行发掘我们的特点。”⁴⁸³

⁴⁷⁹ 苗秀〈我的师傅〉，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113-124；苗秀〈从听故事到讲故事〉，苗秀《文学与生活》，页154-156。

⁴⁸⁰ 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小说二集》，与赵戎、钟祺合编《剧本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2-1973）。孟毅为《小说一集》的编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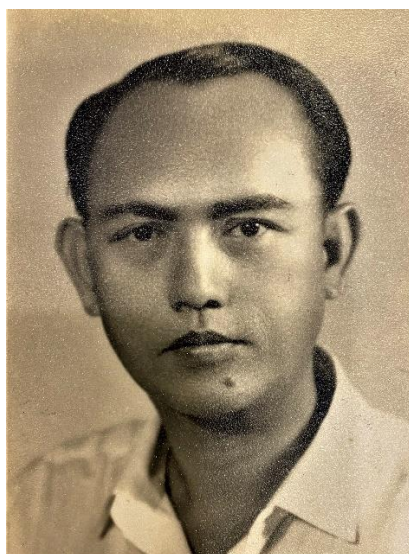
⁴⁸¹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金禧纪念特刊：1919-1969》（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69），页57。

⁴⁸²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金禧纪念特刊：1919-1969》，页57；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183；徐帆〈苗秀先生印象记〉，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39-41记1957年他念初二时苗秀担任他的英文老师，1965年还在华中见到他；尤今〈谈我师苗秀先生〉，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32-34记苗秀开〈文学概论〉课程；巴桐〈英校出身的华文作家－于苗秀一席谈〉，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35-38记苗秀于1974年5月13日接受采访时仍任教南大；陈世俊〈苗秀生平及其著作〉，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17及页20记苗秀于1956年曾在华侨中学任英文老师直到1971年为南洋大学聘为助理教授，开〈新马华文学〉及〈文学概论〉两门课程；谢克〈自学成功的作家－苗秀〉，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29记苗秀在南大任教之前，在华侨中学任英文教师。

⁴⁸³ 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页15。苗秀注《小说的任务》的作者为法兰克·诺里斯，写于1903年。

苗秀出生于 1920 年，1980 年离世。在他 60 年的短暂生命中，曾与中国的人们一起，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和新马人民一起，经历过日治的黑暗、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教育政策和待遇。因此苗秀的小说内容包括了市民和女性的生活、日军的暴行、教育问题、抗日的英勇事迹等。他也描写了当时年轻人向往中国的心态和行为。他的离散意识明显地呈现在他笔下许多青年北归的意愿与行动。Safran (1991) 认为离散族裔视回归祖国为终极目标，他们也以维持或回复祖国的原来风貌为己任。⁴⁸⁴ Butler (2001) 也提出，回归是离散族裔的一个基本概念，这概念或以保留文化传统为回归的表达方式，或实质的回归祖国。⁴⁸⁵有关苗秀对中国、新加坡，对语言艺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看法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第七节 建构新华文学典律的赵戎（1920-1987）



赵戎对新马文坛特出的贡献，是他为新马文学做了整理、归纳、分析和总结的工作，从中建立了法则和规律。1971 至 1974 年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新社新马华

⁴⁸⁴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 no.1 (Published by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Spring 1991): pp.83-84; Safran, William.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eds., 2016, pp.31-69.

⁴⁸⁵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p.204-205. Doi: 10.1353/dsp.2011.0014.

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共8集，收集了从战后1945年至1965年的新马华各文体作品，不但是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肯定，更有助于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委员之一的赵戎编辑了《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史料集》，再与苗秀、钟祺合编《剧本集》，是除了李廷辉为主席的五位编选者中，任务最重的一位，共负责了8集中的3集有余。⁴⁸⁶朱文斌《对新马华文文学史撰写及其文学大系编纂之研究》对《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导论更为重视：“新社编选的大系导论共7篇，由于撰写者也是当时新马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家、诗人，他们自身就是创作者，自然也很熟悉战后新马文坛的历史，所以他们撰写的各集导论便也成了很好的历史总结，对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赵戎所作的《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和《剧本集》的三篇导论对散文、戏剧的梳理可谓精当，较好地把握了这两种体裁的发展脉络，尤其注重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述和总结。”⁴⁸⁷其实赵戎编选的《史料集》以‘序例’代替导论，清楚的把史料归纳为七大种类，再细分七大类的内容，说明选材的原则和标准，归纳和分析的功力不亚于他写的导论。⁴⁸⁸

赵戎历时7年完成编著，在1979年出版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是对新马文艺的另一大贡献。《新马华文文艺词典》〈编辑凡例〉说明：词典分成书名、人名、语词、其他4大部分，共5千多条目，从战前至1977年12月止，但文言著作不录。书名部分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诗文集、研究与评论、游记与传记、丛刊、杂著、翻译、非本地题材作品等。人名部分包括中国南来作家和本地作家。“凡中国南来作家与当地有文学因缘者，均录其人与书目，以示关系。……非谓其人即马华作家的，凡当地人出国深造或任职，尚未回来者。其在外出版作品均录，以存鸿爪。”语词部分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二百多著作中辑条而成，几占全书一半，“以为研究新马作家修辞遣字及解析之用。亦可从中窥知星马华文文艺底独特性之一面。”‘其他’部分则包括文艺团体、纯文艺或综合性刊物、副刊及丛书。⁴⁸⁹这本词典范围的广度与力

⁴⁸⁶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编选者为：苗秀《理论集》、《小说二集》，孟毅《小说一集》，周燊《诗歌集》，赵戎《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史料集》，并与苗秀、钟祺合编《剧本集》。

⁴⁸⁷ 朱文斌《对新马华文文学史撰写及其文学大系编纂之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总第117期，页78-79。

⁴⁸⁸ 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赵戎编《史料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序例’见页1-7。《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每集皆未注明出版日期，但赵戎在他编著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里则清楚注明每一集的出版年份，有些还包括月份，如他注明《史料集》出版于1974年12月（页136）。由此可见他对核实史料的努力和尽责。

⁴⁸⁹ 引文皆见赵戎〈编辑凡例〉《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首页。

求对作家作品了解的深度，功力不比寻常。研究该时段马华文艺的学者都必须参照此书，称他为马华文学典率的建构者，赵戎当之无愧。

赵戎原名赵大成，又名赵笔平，有许多笔名。除赵戎外，还有巨星、赵心、以多、孔怀、芸窻、笔奴、西樵、史忱、白丁、丁戎、田丁、田风、白玉堂、西门柳、西门汉、宋游、公治文、刁斗、施舟、金瓯、东门雪等。⁴⁹⁰ 他和苗秀是同一时期的人，他们之所以用这么多笔名，因当时副刊版位有限，作者往往将中篇和长篇小说分成几个独立故事，以不同笔名发表。⁴⁹¹ 赵戎还自述他用不同的笔名写不同类别的文章，如用以多写文艺理论，用西樵写文艺批评，用赵心、西门柳、西门汉、宋游写小说，用笔奴、田丁、白丁、白玉堂写杂文。⁴⁹²

赵戎和苗秀是好朋友，写了许多肯定苗秀的评论，⁴⁹³他和苗秀、铁戈都是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坚决支持者。他和苗秀一样，出生于新加坡。⁴⁹⁴准确的地点是新加坡当时的豆腐街，今日的珍珠街上段(Upper Chin Swee Street)，豆腐街和邻近的一些地区是早期华族移民的集中地。⁴⁹⁵ 赵戎家的状况有可能还比苗秀窘迫，因为苗秀勉强还能上学，而赵戎幼年只上过两年课。⁴⁹⁶ 在 1930 年代，世界不景气，他父亲因年事已高，回国养老，一家生活的重担由他八哥一人负担。父亲去世后赵戎便自动辍学当学徒，当过雪

⁴⁹⁰ 黄梅雨〈赵戎的笔名〉，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新华作家研究丛书）（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0），页 86-93。

⁴⁹¹ 赵戎（1920-1987），苗秀（1920-1980）。苗秀〈写在《火浪》之前〉，《火浪》（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页 2；陈世俊〈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 17，都解释当时作者用许多笔名的原因。

⁴⁹² 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95-296。

⁴⁹³ 赵戎〈苗秀论〉，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128-140；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183 对苗秀的评论是“文笔多采细致，清新特出，自成一家。著作丰富，为我国著名小说家及散文家。”

⁴⁹⁴ 赵戎于 1920 年 3 月 21 日出生，见马崙〈梅花香自苦寒来-敬悼赵戎先生〉，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96-96。他离世的日期有数说。一为 1987 年 8 月 27 日，参骆明〈赵戎生平简介〉，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1 记于此日赵戎因胃癌离世。然而骆明于另一文〈一个值得怀念的人 - 悼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41 则记赵戎于 7 月 27 日离世，但未注明何年。另外白荷〈寂寂传薪者〉，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8 也记赵戎于 7 月 27 日离世但也未注明何年；叶苗〈忆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34 则记赵戎于 1988 年 7 月 27 日病逝。以 1920 年 3 月 21 日至 1988 年 7 月 27 日计算，应在世 68 岁余。因骆明、白荷、叶苗都记赵戎享年 69，赵戎于 1988 年 7 月 27 日离世较为可信。

⁴⁹⁵ 林孝胜等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 年 4 月），页 241-245；柯木林（Kua Bak Lim）博客〈豆腐街昔日繁华今何在，2013 年 7 月 8 日〉。

http://kuabaklim.blogspot.com/2013/07/blog-post_4066.html。阅览日期：4.10.2019。

⁴⁹⁶ 赵戎自述“少时失学，全靠自修”，见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197；马崙〈梅花香自苦寒来〉，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96。

厂学徒、码头工人、机器学徒、小贩、报馆校对。他在雪厂认识一个工人尹根，和他成为好友。尹根借了很多书给他看，和他谈文艺。尹根认为只读了几个月的书的高尔基也能写作，给了赵戎很大的鼓励。⁴⁹⁷这也和苗秀的际遇相似－苗秀所认识的电版所学徒阿全借给他许多新出版的中国作家的著作与译作，照相馆的学徒郑照飞还指导和鼓励苗秀向《新国民日报》投稿。⁴⁹⁸

赵戎自述‘少时失学，全靠自修’，绝非虚言。在文坛上他是著名的书痴，他不单看文学创作，也看了许多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的书籍，甚至知识和语文辞典，使他的眼界大开。数十年后，他费时七年，于1977年终完成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或许源自青年时曾受惠于词典的启发。⁴⁹⁹因为他阅读的深和广加上生活的磨练，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发表了诗歌、小说和散文，⁵⁰⁰

1936年左右，他靠自修开始文学创作，⁵⁰¹首次发表了纪念鲁迅逝世的诗篇《巨星》。当时鲁迅刚逝世，《新国民日报》要出纪念特刊，他的诗被选上，受到很大的鼓舞。接着《沙滩上》（几首诗）和《卖花声里》（短篇小说）、《在月台上》（散文）也被刊登了。他认为他有“与人不同的生活体验、不同的创作态度与不同的写作题材”，是拜他的‘低贱’出生所赐，也使他永远记住劳苦人民的生活要求。⁵⁰²自此，作品陆续发表于：星洲日报苗秀主编的《晨星》，星洲日报姚紫主编的《绿洲》、《世纪路》、《文艺报》以及其他刊物《南洋教育》、《新野》、《新社文艺》、《新加坡青年》与《新加坡文艺》。⁵⁰³

⁴⁹⁷ 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286-293；赖伯疆〈我印象中的新华作家－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36。

⁴⁹⁸ 苗秀〈我的师傅〉，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113-124；苗秀〈从听故事到讲故事〉，苗秀《文学与生活》，页154-156。

⁴⁹⁹ 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286-297。

⁵⁰⁰ 同上，页290。

⁵⁰¹ 赵戎《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9）封底。

⁵⁰² 刘笔农〈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页52；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289-292。

⁵⁰³ 赵戎《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封底；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296。

1937 年起，他开始文艺活动，与郭松林、赵正荣等发起组织‘怒吼话剧社’，但不久即停办。⁵⁰⁴1938 年，身为南洋华人，参与了筹赈工作，和友人复办‘国风幻境剧社’，以文艺协助各种筹赈救亡的筹赈工作。⁵⁰⁵同于 1938 年，与白荻、刘思、拉音、呢喃、林秋等发起当时新加坡唯一的诗人团体‘吼社’，借南洋商报及总汇报版位出版多期诗刊。⁵⁰⁶吼社是新加坡第一个诗歌团体，直接受到‘中国诗歌会’的影响，主张诗歌大众化，为了成了全民族的吼声，除了借报章发表诗作，诗社也出版了‘大众诗歌专页’5 期诗刊。⁵⁰⁷

赵戎不但年仅十八岁就已经发表了评论文章《泛论新启蒙运动》，还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现实，应该从那地方探求出理论原则来实践”，接着发表的《马华思想的新路向》、《关于帮派的二三问题》、《论南洋文学运动》及《一九三八年的马华思想运动》，都是关注本地华文文艺的评论。⁵⁰⁸赵戎认为马华文艺应有在地性的思想，应早于苗秀支持 1947 年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主张。⁵⁰⁹

1945 年 9 月 1 日日本投降后，他再接再厉，又与苗秀、梁天、于沫我等人组织了‘九一社’文艺团体，后改为‘绿社’，和上官彥，文之流、夏怀霜、大白等出版《「南方文艺」》纯文艺刊物。⁵¹⁰此外，他自述曾主编《琼潮报》及《爱华周报》。《琼潮报》为陈平所创办的报纸。1946 年 8 月，《琼潮报》以周报的形式正式出版发行。这份报纸的宣传重点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着重报道新加坡琼籍进步人士、工人学生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1948 年 4 月，《琼潮报》的办报条件变得艰难，遂改为月

⁵⁰⁴ 马崙〈梅花香自苦寒来〉，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96。马崙未注明原资料出处。

⁵⁰⁵ 同上。马崙未注明原资料出处；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96；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434。

⁵⁰⁶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197 及 433；〈赵戎生平简介〉，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1。

⁵⁰⁷ 黄孟文、徐迺迪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页 169。

⁵⁰⁸ 同上，页 292-295。

⁵⁰⁹ 苗秀〈一九四七年的马华文艺概况〉，《文学与生活》，页 1。这篇文章末记写作日期为 1946 年 12 月 24 日，极有可能是 1948 年的笔误。因内容记述 1947 年的马华文艺概况，以及‘去年十一月’《马华文艺独特性》座谈会的记录。

⁵¹⁰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432 及 436。

刊，接着7月13日被迫停刊。⁵¹¹《爱华周报》为报纸性综合性刊物，由爱华社于1948年8月28日创刊，出版数十期，先后由丁家瑞、以多（即赵戎）等人主编，最后改为「爱华报」，终被封禁。⁵¹²由赵戎筹赈救亡、持续的努力办报、组织诗社、剧社等文艺团体、推进文艺事业，都是关心故国、支持本土文艺的表现。

他的出版事业六十年代后期再重振旗鼓，他和张金燕、苗秀、韦晕、于沫我等人组织‘新野社’，于1967年出版《新野》纯文艺刊物。⁵¹³接着负责编辑《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史料集》，再与苗秀、钟祺合编《戏剧集》，于1971至1974年出版。又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编著在1979年出版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

虽然赵戎没有学历，但曾任教于裕廊小学，在小学教了8年。当时的教育部姚国华视学官认为他的学问‘已达大学水准’请准调任中学执教。⁵¹⁴他被派往中正中学多年。⁵¹⁵但因为他的学历不高，虽在中学任教，有很长一段时间，赵戎的薪酬是根据小学教师的待遇。⁵¹⁶赵戎在《海恋》〈后记〉中自言在1959年“曾经受过两次最严重的生活底迫害，几乎使我发疯。”⁵¹⁷赵戎在〈文学生活底一页〉也自言他“多年来遭受小人的奚落、嘲笑、辱骂，与踩踏。”但这些详情都无从获知。⁵¹⁸

⁵¹¹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197；〈赵戎生平简介〉，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21；海南日报25.4.2018刊载《琼侨革命先驱陈平：回乡报国尽此心》（作者：蔡葩、周梦旒；责任编辑：杜汶纹）提《琼潮报》为陈平于1946年所创办。见

http://www.81.cn/jsdj/2018-04/25/content_8014787_2.htm。阅览日期：4.10.2019。

⁵¹² 爱华社成立于战前，原名爱华音乐社，后加戏剧二字成爱华音乐戏剧社，最后改为爱华社。主持人为吴盛育，积极推动音乐戏剧等活动，更办学校及教师别墅，最后办「爱华报」，终被封禁，吴盛育被遣送出境。参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435及446。

⁵¹³ 陈世俊〈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页16；苗秀〈〈新野〉发刊私语〉，《文学与生活》，页202-203；谢克〈自学成功的作家-苗秀〉，页29；林锦〈苗秀与新野〉，《苗秀研究专集》，页193。

⁵¹⁴ 据刘笔农及君绍所记推算，赵戎应于1945开始在小学任教。刘笔农〈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页51记赵戎在小学任教8年。君绍〈忆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60记1952年他与赵戎同班（据上下文，应是指师训班），数月后，赵戎提早毕业，被调往中学（以1952年赵戎被调往中学及刘笔农所记推算）。

⁵¹⁵ 赵戎〈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9）封底。

⁵¹⁶ 刘笔农〈〈赵戎小说选〉编后语〉，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123；骆明〈一个值得怀念的人〉，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43-44。

⁵¹⁷ 赵戎〈后记〉，《海恋》，（李汝琳主编，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简体字初版，页179）。

⁵¹⁸ 赵戎在〈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296。

无顾荣辱、不计学历，赵戎都积极推动新马华文艺事业，坚决支持新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作为离散华人，他的努力过程及成果，他对吸收中国文艺的营养，建立新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对新加坡的归属感，都将在后面的章节论述。

这七位新马华文作家，不论是否来自中国，都因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关心中国的政局与文坛的发展。他们起先都以中国为祖国，自认为侨民。南来的五位作家，自 1945 年陆续抵达新加坡，和其他两位本土出生的作家，一同见证了日治后、英殖民统治、自治及独立的过程，他们如何在文字中表达他们对时局、对中国和对新加坡的看法，作为离散华人，他们如何从侨民身份转换为认同新加坡，并在作品中表达他们的爱国意识，都将结合他们的生命经历，分析论述。

第四章：中国心

这七位新华作家，有来自中国的五位：李星可、连士升、杏影、李汝琳、姚紫，也有本地出生的苗秀和赵戎，但不论他们的出生地，尽管他们的表述不同，他们都关注中国的状况，都对中国的感情。这一章将讨论这七位作家所呈现的中国美德和精神，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感情和对中国的期待。第一至第七节的小标题取自作家曾用的词句，代表他们的中国心。Safran（1991，2016）强调离散族群与母国的关系，⁵¹⁹Johnson Nadja C. 研究跨国移民和离散族裔的异同，引用 Anteby-Yemini & Berthomiere（2005）及 Vertotec（1999）的研究，说明他们都是跨疆域和国界的族群，⁵²⁰ 只是离散族裔对母国总有实质或想象的深切的关联。⁵²¹ Butler（2001）认为离散族裔离开了故乡，但不代表终止了和故乡的关系。这关系以不同的方式维系着，或以实质的回归，或以艺术化的情感的表达，或将故乡的文化在离散的范畴内重新阐释。⁵²²这七位作家对中国的感情正说明了离散华人作家和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

⁵¹⁹ William Safran, "Diaspora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ume 1, Number 1, Spring 1991, pp. 83-84; William Safran,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Amitava Chowdhury, Donald Harman Akenson eds.,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2016, p. 32.

⁵²⁰ "Diaspora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theories, primarily in the sense that both refer to the idea that nations are "unbound" " (Anteby-Yemini & Berthomiere, 2005; Vertotec, 1999), cited by Nadja C. Johnson, "Global Journeys: from transnationalism to diaspo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Studies* 4, no. 1 (2012): 41+. *Gale Academic OneFile*. Accessed 7 June 2020.

<http://link.gale.com/apps/doc/A359999192/AONE?u=nantecun&sid=AONE&xid=e6fb78dc>, p. 48.

⁵²¹ Nadja C. Johnson, "Global journeys: from transnationalism to diaspo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Studies* 4, no. 1 (2012): 41+. *Gale Academic OneFile*. Accessed 7 June 2020.

<http://link.gale.com/apps/doc/A359999192/AONE?u=nantecun&sid=AONE&xid=e6fb78dc>, p. 47.

另外，许多研究离散族裔的学者如 Butler（2001），Safran（1991，2016）都肯定离散族裔与母国的关系。

⁵²²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 205-206. Doi: 10.1353/dsp.2011.0014.

第一节 李星可：‘我认为，身为华人不应该「数典忘祖」’⁵²³

李星可在 1936 年左右到了伦敦，听闻中日战争爆发，又回去比利时，并得陆徵祥介绍，从比利时到巴黎，认识杨虎城将军，参加‘旅欧华侨第一次回国参战代表团’回去中国，目的为参战。⁵²⁴ 他曾在延安的鲁迅学院见到毛泽东，也发现延安的高级领导层和国民党政府一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每礼拜六开一次西洋式的跳舞会，大失所望，觉得延安并非久留之地。⁵²⁵ 1938 年他加入法国空军志愿队。曾经在北越、缅甸、印度的军需处工作，在缅甸他协助解决了许多滇缅公路运输工作上的难题。⁵²⁶ 抗战期间他曾与邵荃麟等组织国际性的‘中法文艺协会’，“积极展开抗战宣传工作，厥功殊伟。”⁵²⁷ 可见李星可以他的语文能力和学识报国的热忱。

尽管中国人有缺点，但李星可反对不确实的批评。在〈丑陋的新加坡人〉及〈华人不是丑陋的中国人〉两篇文章中，他指出新加坡的中文畅销书，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⁵²⁸及《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对中国人的批评是错误的。⁵²⁹ 柏杨统称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为‘酱缸文化’，因为五千年的‘封建遗毒’，每个中国人都感染了‘酱缸’的劣根性。柏杨对‘酱缸文化’的定义是：

“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是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 中国人在这个酱缸中酱的太久，…… 设我们大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不再思考，一切

⁵²³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18。

⁵²⁴ 同上，页 16-18。

⁵²⁵ 同上，页 21-36。

⁵²⁶ 同上，页 48-64。

⁵²⁷ 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98。（2005 年为简体字版。繁体字版出版于 1967 年）；李星可〈从《新社》想起南洋文艺问题〉，《十八年后归去来》（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页 77。据赖伯疆《东南亚戏剧概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页 119，李星可并曾“在重庆与老舍、茅盾、曹禺、曹靖等人组织国际性组织〈中法文艺联络社〉，开展对外文化联络工作”，然年份及〈中法文艺联络社〉与〈中法文艺协会〉是否为同一组织皆不详。

⁵²⁸ 察客〈下午察：《丑陋的中国人》应‘功成身退’？〉，发布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即使·中国》2021 年 11 月 19 日，2021 年 11 月 20 日更新。笔者于 2022 年 1 月 1 日阅览。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11119-1215151>。根据此文，柏杨于 1984 年 9 月 24 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发表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1985 年 8 月与其他数十篇杂文一起出版。此书一版再版，最近一版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出版。于 1984 年 9 月 24 日发表的《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稿见 <https://www.99csw.com/book/1400/38196.htm>。

⁵²⁹ 李星可〈丑陋的新加坡人〉，《十八年后归去来》（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页 43-50；李星可〈华人不是丑陋的中国人〉，《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51-55。

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⁵³⁰

李星可反对柏杨统称中国文明为酱缸文化，斥责柏杨数典忘祖，小看自己的母国。对柏杨的斥责，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在另一篇也是批评柏杨的文章《华人不是丑陋的中国人》中，李星可进一步肯定中国文化的辉煌：英国还没有远洋航舰时，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刚完成；当英、法、西班牙在大西洋东岸不断海战时，中国正当大明中叶的嘉、隆盛世；在公元 8、9 世纪左右，当欧洲还在‘黑暗时代’，在中国却是赫赫唐朝。李星可承认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都有长处和短处，主要是了解弱点而不自卑。几千年来有许多民族被淘汰，许多国家不复存在，但中国仍然屹立，说明中国的长处和优点，经得起历史的考验。⁵³¹

在另一篇文章〈崇洋而不媚外？〉中，⁵³²李星可继续批评柏杨自认崇洋的说词。柏杨认为英国对全人类的贡献最大，因为英国创立了议会和陪审制度，而中华民族最近五百年来却没有贡献。……“中国人呈现的特征是粗野、恶毒、不诚实、心胸狭窄。”李星可认为这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说法，因为有更多的人“文雅、忠厚、老实、大度”⁵³³。柏杨“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人家的礼仪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⁵³⁴关于礼仪，李星可没有正面地反驳，但指出现代的科学文明源于中国，因众所周知，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枪炮所需的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柏杨说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的光荣已属过去，漠视历史事实，实属不可理喻，更是崇洋媚外的明证。

柏杨再说，中国自孔子以来，没再出现过一位思想家，李星可认为这正说明柏杨没读过中国思想史，因此他无知、武断、荒谬、他的说法是为了取悦蔑视中国的西洋人，再以此说明柏杨的崇洋与媚外。

⁵³⁰ 李星可〈丑陋的新加坡人〉，页 46。

⁵³¹ 李星可〈华人不是丑陋的中国人〉，页 54。

⁵³² 李星可〈崇洋而不媚外？〉《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56-64。

⁵³³ 同上，页 56。

⁵³⁴ 同上，页 58。

柏杨还说：“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权思想，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是从外国来的，哪一个传统传下来的？”⁵³⁵ 李星可批评柏杨强词夺理，哗众取宠，不但崇洋，而且媚外。姑且不论柏杨的说法是否有所依据或正确，李星可的苛责反映了他维护中华文化的殷切。

李星可斥责柏杨崇洋媚外、数典忘祖。在他的社论里，他极力提倡以母语教学，坚持华人应该掌握母语，维护华文教育，也因为他认为华人不应该数典忘祖，沦为二毛子。作为星洲日报的主笔，“星洲的立场力主华人不应该数典忘祖，极力提倡华语，维护华文教育。”⁵³⁶ 维护华文教育，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是他的信仰：“我的社论偏重华文教育问题，是我认为，身为华人不应该‘数典忘祖’，而且每个人至少应该有一种信仰。……所以我不单维护华文教育，更一向维护华人的传统文化价值，在‘星洲日报’如此，在‘南洋’也是如此。这是我的个人信仰。”⁵³⁷ 他更进一步的认为英语并非绝对不可放弃，举出日本、西德与荷兰的国际贸易不比英国差，苏联的太空实验也不靠英语。反过来，印度从未放弃英语，不但成不了强国，还要靠外援度日。⁵³⁸ 在政府积极推行英语的当时，提出这样的说法需要有相当的勇气，也可由此看出他维护他的母族语言——华语的积极和热情。

李星可直言、敢言的勇气在他的议论中屡见不鲜。他不但提出英语并非不可替代的看法，还曾主张放弃方块字，支持汉字拼音化。他认为这样才能摒除发展中文电脑的障碍，以提前实现‘四化’⁵³⁹ 且不论他的意见是否正确，他敢于在促进中国发展的前提下，大胆建议，足见他敢言的勇气。

⁵³⁵ 同上。

⁵³⁶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153。

⁵³⁷ 同上，页118。

⁵³⁸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47、57、58，《政论选集》篇155。

⁵³⁹ 李星可《政论选集外编：十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远景》（新加坡：国际图书（新）有限公司出版，1988），页117。‘四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现代化。

李星可通过《标准华语》及《标准普通话》的出版，指出他对华语的读音及用法的重视，也用以纠正本地华语的读音及用法。⁵⁴⁰ 他还在师资训练学院教了十年的华语语音，⁵⁴¹并纠正史马对他儿音的批评，⁵⁴²都因为他对标准华语的坚持。他也通过对戏剧的介绍如《我谈京戏》、《怎样欣赏中国戏》、《南洋与中国戏》以及一篇文章〈谈谈哑剧〉，还给《中國現代獨幕劇選》做選註，并在南大教授‘中国戏剧史’，宣扬华族传统文化。⁵⁴³

第二节 连士升：‘离开故乡……，我爱它，我想它……’⁵⁴⁴

连士升以他的行动和文字认可了 Butler (2001) 的观点，⁵⁴⁵与中国以多种方式维系感情及想望。极有意义的是他以所敬仰的中国历史人物为七位儿女中的六位命名。侨思、亮思、仁思、藩思、棠思、文思、依次为纪念公孙侨（子产）、诸葛亮、王守仁（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与孙文，这些历史人物的共通之处他们都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也都维护中国的传统价值。儿女的名字寄托了父母的希望，连士升期望儿女学习中国的传统价值，身体力行的报效国家。连士升的儿女中，只有侨思出生于中国，但对出生于其他地区的子女，他仍以中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命名，因为他要儿女效法的，是中国的传统美德、爱国爱民的精神。⁵⁴⁶

⁵⁴⁰ 李星可《标准华语》（新加坡：新马文化事业公司，1964）；李星可《标准普通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3，第二版）。

⁵⁴¹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85-86。

⁵⁴²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97-99。

⁵⁴³ 李星可《我谈京戏》（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55）；李星可《怎样欣赏中国戏》（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李星可《南洋与中国戏》（新加坡：南洋学会，1962）。〈谈谈哑剧〉收于李星可《绿洲》（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1），页 95-97。《中国现代独幕剧选》为歐陽予倩等著，李星可選註（香港：宏智书局，1966）。

⁵⁴⁴ 连士升〈可爱的故乡〉，连士升《回首四十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出版，2009），页 14。

⁵⁴⁵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 206. Doi: 10.1353/dsp.2011.0014.

⁵⁴⁶ 连亮思出生于香港，仁思、藩思和棠思都出生于越南（资料源自笔者认识的连先生家人），文思和萧思则出生于新加坡。连士升为幼女取名萧思，以学习及纪念萧伯纳，唯一的非中国人。但萧伯纳所主张的世界大同也是连士升的理想。

他到新加坡以后，虽然不再到中国定居，但他 1954 年送大女儿侨思回北京念书时，已经知道根据当时的条例，侨思一旦回中国，不能再回来新加坡，⁵⁴⁷ 送侨思回国念书一方面是因为本地环境学习的局限，当时南大尚未成立，罢课学潮持续。另一方面他对北京学习环境的肯定也是对故国的信心与期许。⁵⁴⁸ 他的多篇文章，记录了故国的名山胜水，风俗习惯、美味佳肴，他到新加坡后还是念念不忘。⁵⁴⁹ 在《回首四十年》及《南行集》里的多篇文章中，他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他的故乡福建省福宁府福安县，他的学校作元汉英学校及校内的校长、老师，燕京大学的校景。

在离开他的故乡二十多年后，他以《可爱的故乡》⁵⁵⁰ 深情描绘了他故乡福建省福宁府福安县的地理、历史、风景、街道、建筑、交通、生产、风俗、娱乐、人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在篇首这样写：“离开故乡二十多年了，不过故乡的景物历历如在目前。……我爱它，我想它，好像我永远纪念我的已故的慈祥和蔼的母亲一样。”在篇尾他再写他对故乡念念不忘：“故乡可爱的地方很多，但是现在我不能回去。因此，一切甜蜜的滋味与美妙的印象，只能在回忆中慢慢咀嚼。”⁵⁵¹

《福州的享乐》⁵⁵² 进一步描绘了他的母校所在地仓前山的西洋式建筑，万寿桥左岸的福州青年会的建筑的雄伟、风景的美妙以及设备的齐全；万寿桥右边的台江泛，在闽江上与好友饮酒听乐，不论洞箫或琵琶，都不能不动情。由台江泛南下便到魁岐，协和大学的所在地。协大处于鼓山的山麓，背山面江，气象万千，加上红墙绿瓦，地基点缀大块的石子，美丽极了。他再描写了福州城里还有三山 - 乌石山、于山和闽山，以及福州的戏剧、乐器、茶叶、小食。谈到饮食，他在异地品尝福州菜的时候，总觉

⁵⁴⁷ 连士升家人（罗梅、连侨思、连亮思、连文思、连萧思）口述历史，NLB Literary Scene in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3126, 25 Mar 2007 Reel/Disc 5 of 8. 笔者于 9.8.2019 收听。

⁵⁴⁸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二》，页 136，写于 1959 年 4 月 14 日。连士升认为北京是道地的中国文化中心，北京学术艺术的造诣是‘尽美至善’。同卷另一篇则说北京可爱的地方太多，主要得力于气候、历史、山水、人情。页 103，写于 1958 年 8 月六日。

⁵⁴⁹ 《南行集》中多篇描绘和记述其故国的种种，如〈月是故乡明〉、〈福州的温泉〉、〈福州的享乐〉、〈凭吊圆明园〉、〈西湖比西子〉，写于 1947、1948 及 1951 年，见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南行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 453-464，469-478。

⁵⁵⁰ 连士升〈可爱的故乡〉，连士升《回首四十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出版，2009），页 13-18；连士升〈可爱的故乡〉，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页 69-73。

⁵⁵¹ 连士升〈可爱的故乡〉，页 18。

⁵⁵² 连士升〈福州的享乐〉，连士升《南行集》，页 461-464；连士升〈福州的享乐〉，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 100-104。

得“橘逾淮为桔”，道地的故乡菜已被打了折扣。⁵⁵³在种种描述中充溢他对福州风土的怀念，细腻而深邃。不过即使在国外，他还是想念中国菜。以日记体写法国的游记《塞纳河两岸》还讲他被请吃中国菜时的欣喜。法国佳肴对他没有诱惑，他只对中国饭菜情有独钟，更对中国人的热情和中国菜的关系，有这样的领悟：

“吃饭问题，在国内不觉得什么，但是一出国门，我就念念不忘故乡风味了。谁也知道中国人富于热情，但我直至今天才发现中国人的热情和吃饭很有关系。中国人请客，茶是热的，饭是热的，菜饭是热的，连酒也是烫热的，有时还加上热烘烘的普通火锅或油炸的辣椒。你瞧，一个客人吃了你这一顿从头到尾都是热的茶酒饭菜，……普通健康人更是无疑地油然而生出热烈的感情。”⁵⁵⁴

在写《凭吊圆明园》⁵⁵⁵前，他仔细查考了乾隆九年（1745年）唐岱和沈源奉命绘制的“圆明园图”，把圆明园的盛景以文字描绘出来，其中包括了正大光明殿、勤政殿、月云开殿、碧桐书院的特色，以及花园里的走廊、长堤、石桥、亭台、湖水、花草树木的无数美景。这既有冠冕堂皇的宫殿，又有雅淡清幽的别墅；既有艳丽花卉，又有高雅的青松古柏；既有雕栏玉砌，又有小桥流水的皇家御苑，却被洋人的一把火烧成残垣断壁，令他无限感慨。他不但慨叹世事无常，也怨恨统治者的穷奢极侈；他以文字还原圆明园的盛景，更为这盛景的凋零叹息。

除了景物，连士升也怀念故人。《我想学洋务》⁵⁵⁶叙述了他在作元汉英学校学习的经过，并特别感谢他的校长爱尔兰人邱约翰（John Curtis）牧师。邱牧师教书认真，说得一口福州话，不但教圣经，也教莎士比亚和西洋史。他生活简朴、勤俭自持，数十年如一日。他不但让连士升教低年级的学生以抵消学费，解决了他的学费困难，还关心连士升毕业后的就业问题。邱牧师的人格教育，是连士升怀念作元学校的重要原因。饮水思源的中华传统美德，更在连士升身上体现。

⁵⁵³ 连士升〈月是故乡明〉，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95-99。

⁵⁵⁴ 连士升〈塞纳河两岸〉，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一卷 - 塞纳河两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45。

⁵⁵⁵ 连士升〈凭吊圆明园〉，；连士升《南行集》，页469-472。连士升〈凭吊圆明园〉，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110-115。

⁵⁵⁶ 连士升〈我想学洋务〉，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27-34；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74-79。

中学毕业后于 1927 年连士升 20 岁时进了北京燕京大学。《记燕京大学》⁵⁵⁷讲述了燕大的历史、校景、建筑、自由研究精神、奖学金制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学生的政治活动、校园娱乐、体育运动等。他对塑造燕大的校风的师生，十分敬重，因为“燕京的师长和同学们的追求真理、争取自由、彻底为人群服务的精神”，正是中国所需要的。⁵⁵⁸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南洋的中秋，连士升以〈月是故乡明〉⁵⁵⁹回忆了童年在故乡提灯、玩耍的快乐以及月饼和家乡蛭饼的滋味，甚至当一些顽皮的小孩偷柚子，妇人的咒骂也成了打破寂寞的声响。他青年时期在北京度过十个中秋，每个都有不同的滋味。当时他常和朋友一起逛北海公园，数人同乘小船，一面闲谈，一面吃着新鲜的莲子与菱角，在荷花丛中游来游去，写意之极。这种美好的回忆让他无条件的爱他的故乡：“故乡好像母亲，母亲也许目不识丁，说不定还有许多怪癖，这些事情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但我们绝不计较，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最需要的是温暖的人情味，而这种东西只有故乡能够无限制地赐给我们。”⁵⁶⁰

连士升多篇有关故乡的风光、事物、饮食、人物的文章，都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思念。他以母亲比喻故乡，故乡纵有缺点他还是无条件的爱她，而他所需要的温暖，故乡也源源不绝地赐给他。他在故乡所积累的学问，所养成的学习习惯和所受的人格教育所打下的基础，都成了他在南洋写的文章的宝贵资源。

他离开家乡后，仍不断学习，“总觉得孔、孟、老、庄的哲学，左、国、马、班的史学，屈、宋、韩、柳的文章，李、杜、苏、陆的诗篇，可以和任何国家的哲人相抗衡。”⁵⁶¹ 这些先贤先圣的道德、学问和思想，深植于他的心中，广引于他的笔下，他的中国情显而易见。中国的文化的传承，要靠后辈，因此他认为儿童应养成背诵的

⁵⁵⁷ 连士升〈记燕京大学〉，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57-66；连士升〈记燕京大学〉，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 80-86。

⁵⁵⁸ 连士升〈记燕京大学〉，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66；连士升〈记燕京大学〉，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 86。

⁵⁵⁹ 连士升〈月是故乡明〉，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 95-99。

⁵⁶⁰ 同上，页 99。

⁵⁶¹ 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 183。

习惯，牢记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⁵⁶²。他对中华文化的维护和情感，不言而喻。

除了对家园、学校、景物、故人的怀念、对先贤先哲的敬仰，他在 1948 年写的《祖国纪行》，更在谈论政局时，显示了他对中国的责之深爱之切。这本集子除了自序和后记外，有四篇文章：〈华侨普遍的要求〉是他出发到中国前写的，⁵⁶³〈祖国纪行〉是以日记体记录他在中国两个多月的见闻和感想，⁵⁶⁴回到新加坡后总结为〈中国的前途〉和〈论收拾人心〉两篇文章。⁵⁶⁵

《中国的前途》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象、困境，包括国共斗争，高官商贾的营私舞弊，富者愈富、穷人愈穷，通货膨胀，是非不明，社会动乱。他认为问题的症结是贫富不均及是非不明。贫富不均是由于高据要津的“红人”利用政府的外汇和进出口贸易统制大肆敛财；利用堂而皇之的剿匪、抗战、戡乱、建国等大题目囊括平民财产；利用滇缅公路以及红十字会的车辆走私；更在战后与日本移交物资的过程中，让日本少报以便他们多拿，使战胜国在战败国面前颜面尽失。他们所得到的好处，分了些给他们的宗族、乡党、知交。这些人成了暴发户，普通百姓却穷愁潦倒。在〈祖国纪行〉的日记中，他指出裙带关系是封建思想的一种，不但没被打倒，当前反而更浓厚。在南京，没有关系的人，休想做大官，反之，有裙带关系的人，都是不倒翁。⁵⁶⁶

通货膨胀更使民不聊生。币值一日之内就可损失百分之二十，他形容“国币好像一块冰，冰放在手里，不到二十分钟，完全化为水。”⁵⁶⁷在贫富极端的情况下，社会必乱，不仅如此，战后是非不明的事件层出不穷，令人发指。汉奸的银弹使他们免于罪责，被庇护，功罪倒置，民心因而大失。⁵⁶⁸

⁵⁶² 同上，页 182。

⁵⁶³ 连士升〈华侨普遍的要求〉，连士升《祖国纪行》（南洋商报丛书）（新加坡：南洋商报，1948），页 1-7。

⁵⁶⁴ 连士升于 1948 年 3 月 5 日离新，5 月 24 日返抵家门，共 81 日。见连士升〈祖国纪行〉，《祖国纪行》，页 128。

⁵⁶⁵ 连士升〈中国的前途〉，连士升《祖国纪行》，页 8-12；连士升〈论收拾人心〉，连士升《祖国纪行》，页 13-17。

⁵⁶⁶ 连士升〈祖国纪行〉，连士升《祖国纪行》，页 80。

⁵⁶⁷ 连士升〈中国的前途〉，连士升《祖国纪行》，页 10。

⁵⁶⁸ 同上，页 11-12。

他在〈祖国纪行〉的日记中，也见识到了政局的混乱。他指出：“中国之所以闹到这一步，完全由于不诚不公，上行下效，谁都会假公济私。个人肥了，国家瘦了；国土丢了，大官飞了，吃亏的全是无辜的老百姓。”⁵⁶⁹ 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园里，学生用三丈白布写的四句标语：“特务横行，非宪无法；物价飞涨，虽学难生”，可见当时学生的处境和心情。⁵⁷⁰

连士升在痛心疾首之余，提出收拾民心的十项建议：以身作则，政要送儿上前线；献出十分之一外国存款；献出十分之一田产收获；赏罚分明、待遇平等、不中饱私囊；不与人民争利，维持物价稳定；确保人民吃饱穿暖；言论自由；海关协助归侨便利通过；政府自省；政府言而有信，兑现承诺。他相信这十项建议是收拾民心的切实方法，民心安，则社会平。⁵⁷¹

《华侨普遍的要求》是他在出发到中国前写的文章。⁵⁷² 他指出华侨和他们祖国的关系，从战前到战后已发生急剧的变化。华侨为抗战出钱出力，但外患除后，同胞互相残杀的内乱却使华侨心寒。因此他亲自与南洋各阶层华侨谈话，总结内容，向中国政府表达华侨的心声和期望。他提出 4 个建议：1，和平谈判、共商国是。内乱使中国失去同胞，失去国际地位，与其两败俱伤，不如以谈判解决问题。2，少派大员、多派专家。战后两年半间，中央派遣大员到南洋“宣慰”——宣扬中央的政德，慰问华侨的疾苦，结果其实是劳民伤财。不如拿这笔开销，聘请法律专家、经济专家、教育专家协助及指导华侨解决问题。3，豪门资本，悉数充公。豪门大户利用政府的政策，操纵经济，垄断资源。人民的土地被收买，贫农成为流氓，留在乡村的为非作歹，跑到都市的造成社会不安。要解决土地问题，还要先解决豪门敛财的问题，如能征用豪门国内外的财产，将能安民心、平动乱。4，宽宏大量，接受批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出于关心，政府应慎重考虑，也应多阅读报章有关民间疾苦的报道，看清民心向背。他觉得他的这篇文章，也许会触犯忌讳，但他已无暇顾及，⁵⁷³ 因为他“爱

⁵⁶⁹ 连士升〈祖国纪行〉，连士升《祖国纪行》，页 74。

⁵⁷⁰ 同上，页 76。

⁵⁷¹ 连士升〈论收拾民心〉，连士升《祖国纪行》，页 13-17。

⁵⁷² 连士升〈华侨普遍的要求〉，连士升《祖国纪行》，页 1-7。

⁵⁷³ 连士升〈华侨普遍的要求〉，连士升《祖国纪行》，页 7。

之深，言之切”，他要通过丑恶的现实，“哀矜勿喜地直谏是非，希望促进当局的醒悟”。⁵⁷⁴

连士升对中国还是充满希望。他以深情的笔触回忆祖国种种，以沉重的言辞指出中国的时弊，他知道国家严重的局面，但认为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希望读者继续关注时局，也希望华侨不要灰心，他“诚恳地希望寄居海外的万千华侨负起爱护、监督、指导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的权利，望侨胞不要因暂时的失望遽而灰心”。⁵⁷⁵ 在他写《祖国纪行》时他仍是华侨，而在写《回首四十年》及《南行集》里回忆家园、学校、景物、故人的文章时他已是新加坡的居民和公民。不论他是什么身份，他对中国的感情不变，只是成为居民和公民后，他多以新加坡的视角考量种种问题，这将在下章加以讨论。

第三节 杏影：‘在潜意识里的所好，究竟还是中国的那一套’⁵⁷⁶

杏影 14 岁就到了日本，只有童年及少年时期在中国度过。离开日本后他回到中国生活了 5 年，然后到印度 4 年，再到新加坡。虽然他只在中国生活了 19 年，但他一直喜欢吃中国菜，他对中国菜的喜好，与他对中国的情感一样不变。他在日本生活了 12 年，在身体发育的阶段，要靠‘味增汁’（酱汤）和‘泽庵’（咸萝卜）和海苔、秋刀鱼长大，却不觉得日本的‘割烹’（庖厨）好。在印度 4 年，他也吃印度食物和上等西餐，但还是喜欢中国食物的味道：“生在中国，和最初吃下去是中国的食物，这事实就决定了人的好恶。”⁵⁷⁷ 不但是食物，其他方面也是中国式先入为主。在他大约 40 岁时，在 1950 年写的〈新年怀思〉里，他算了算“在中国过活的日子，大约不过三分之一左右，可是在潜意识里的所好，究竟还是中国的那一套。从待人接物，以及日常生活的习惯作风，或甚至于是连写文章，不时也会从那‘起承转合’的文章法则开始。”

⁵⁷⁴ 连士升〈自序〉，连士升《祖国纪行》（无页数）。

⁵⁷⁵ 连士升〈自序〉，连士升《祖国纪行》；〈后记〉，连士升《祖国纪行》，页 130。

⁵⁷⁶ 杏影〈新年怀思〉，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 12。

⁵⁷⁷ 同上。

⁵⁷⁸ 不过作为游子，他有被视为‘蛮子’的感伤和乡愁。只不过他感到这种乡愁有时“也会是相当的甜，像甜得很纯正的新鲜葡萄。奇怪的是，当你真正感到有点怜悯之时，你反而会十分眷爱这妙味无穷的人生，像在奇葩怪卉多的异国，受到人们的欺负或狗咬之后，才格外眷恋故乡一样。”⁵⁷⁹ 他的这种感觉，既苦亦甜，欲拒还迎，爱恨交织，像是矛盾，互相抵制，却又互相调和，细腻地描写了无数离散华人的心境。

当他在写有关印度的事物时，也往往想到中国，和中国作对比，并以离散华人的视角，从对居留国的体验，表达对异地他族的观点。如果杏影不是出生于中国的华人，他对异地他族及其事物，应该有不同的体会。比如谈到印度的雀鸟，描写这些雀鸟因为印度人不杀生，它们就常常大胆地进屋啄食，进到中国人的屋里时也一样，因为它们不晓得中国人什么都吃，当然也爱吃鸟和雀蛋。但作为中国人的杏影，由于印度人的爱鸟，更看过一位印度仆人甚至把糖放在蚂蚁洞口以喂食，也受了影响，让鸟儿在他窗户的夹缝处筑巢，不时以观看鸟儿从鸟蛋孵为雏鸟，母鸟喂食雏鸟的有趣过程为乐。他说明了，人的习性，也能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有所改变，微妙的表达了什么都爱吃、什么都能做成美味佳肴的中国人，在与宽遇动物虫鸟、甚至给蚂蚁吃糖的印度人之间生活，也受到了感化，善待别的生物，以致“觉得自己比在中国的时候要好多。”⁵⁸⁰

和连士升想念中国菜一样，杏影在新加坡，常常会想起的东西是中国茶馆里的盖碗茶。喝着那一次又一次的滚水往茶杯里冲的味道比喝洋茶有滋味，心情也更闲适。⁵⁸¹ 新加坡的‘世界’里曾有‘清唱’的项目，⁵⁸² 对于‘清唱’的词句，杏影一个也听不懂，但听着那‘呵……呵……呵……’的音调，许多忘记了的中国的景物，却一幕幕地展开，使他想起小时候在城墙垛子上放风筝、在阴沟里放纸船、在门楼上抓石子、在小

⁵⁷⁸ 同上。

⁵⁷⁹ 同上，页 13。

⁵⁸⁰ 杏影〈印度的麻雀〉，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69-77。引文见页 71。

⁵⁸¹ 杏影〈听清唱〉，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123。

⁵⁸² 新加坡曾有三个‘世界’——新世界、大世界与快乐世界（后易名为繁华世界）。是一九二零至一九七零年代的娱乐场所，开始成立和运行的时段有重叠也长短不同。里面的设施有歌台、舞厅、电影院、剧院、游乐场、商店、餐馆等，甚至还有体育场（快乐世界），供各种族各年龄层消遣，但非每个‘世界’都有同样的设施。参 <https://vimeo.com/220316759>;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E35MSBL05148HD5.html>.

山旁捉蟋蟀的往事。这‘呵……呵……呵……’似断了气的歌声里，有一股淡淡的哀愁，让他看到了‘许多中国人的可怜的相貌’，包括他自己。他慨叹新加坡华人，包括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似乎不爱听清唱。新加坡的清唱式微，“可能是因为在这里的中国人人都想忘记，或已经忘记了他自己的面目的缘故。”⁵⁸³

不过杏影没有忘记他的中国心。他在异邦为异客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的故乡，他故乡的味道和音调，他也没有忘记他故乡曾遭受的苦难，特别是日本的侵略，因此消灭战争、建设和平，以致世界大同，是他许多文章的主题。他相信文字的力量，他相信中国人所能掌握的语言是理解他人的优势。爱情与仇恨是相对的，但文艺却能‘在仇恨的沙漠中培育爱情的花朵’。他相信文艺能化解纷争：“在结合人类的工作上，在其要在爱情里培育理性，在其要向理性中注入爱情的工作上，文艺还没有失败过。”

⁵⁸⁴ 艺术有镇压暴力的力量。艺术的目的是要在这世上实现一个爱的王国。⁵⁸⁵ Weber (1977) 的经典理论认为语文与宗教和历史都是组建社群的主要条件，⁵⁸⁶ 本纳迪·安德逊 (Benedict Anderson) 也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国族文化的载体。因为语言文字联系了人们对国族的情感，是构成国族意识的媒介，因此印刷文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⁵⁸⁷ 与他们的理论一致，杏影相信语言能促进民族间的沟通和理解，要使人类成为一个大家族的装备。“中国因为做过很多国家和很多民族的半殖民地，而使不少的中国人学会了很多国家很多民族的语言 - 那个最重要的理解别人的‘装备’。为了实现人类大家族的理想，为了全世界的人类去建设一个世界国家，在将来，中华民族所能做的贡献，是可能很大的。”⁵⁸⁸ 因此杏影以身作则，以作者、译者和编者的身份，积极推动文艺，利用艺术的语言，要为人类做出贡献。杏影精通中、日、英三种语文，他要他作为一个能掌握多种语言的华人的优势，向他的读者介绍中外思想，特别是他所主张的世界大同。

⁵⁸³ 杏影〈听清唱〉，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123-125。

⁵⁸⁴ 杏影〈我们还有文艺〉，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87-88。

⁵⁸⁵ 杏影在〈读书偶译〉中引托尔斯泰的话，杏影《想想写写》，页 190。

⁵⁸⁶ Eliezer Ben-Rafael, “Diaspora”. *Current Sociology Review* 61, nos. 5-6 (2013), p. 847. Doi: 10.1177/0011392113480371.: “Weber’s (1977) classic assessment that a sense of belonging forged by religion, history, or a language may be a major component of community formation.”

⁵⁸⁷ Benedict Anderson,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s 3 & 7”,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Verso, 1991).

⁵⁸⁸ 杏影〈理解的‘装备’〉，杏影《愚人的世纪》，页 133-134。

第四节 李汝琳：‘永远不会忘记，那永远诉不尽的恩情！’⁵⁸⁹

李汝琳曾经积极参与抗日行动。1935 他在北平上大学的时候，曾休学一年，前往南京参加学生运动，请愿抗日，1936 年再回北平上大学最后一年，并出版诗集《惜昨集》，并通过老师介绍，加入北平作家协会，以文报国。1937 年 6 月获学士学位后，⁵⁹⁰于 1938 年 7 月 7 日，他再北上参与抗日的行列。在 1938 至 1944 任西北艺术学院图书馆主任期间，与数友为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合编大西北著名文艺杂志《西线文艺》，再次以文艺的力量支持抗日工作。⁵⁹¹

写于 1943 至 1944 年的《艰险的行程》⁵⁹²与他的抗日背景与对中国内战的认识有关。《艰险的行程》内的第 1 辑共有 6 篇文章，其中〈潜行记〉、〈转进〉和〈艰险的行程〉写他和同伴们走向黄河渡口，偷渡黄河，穿过日军和汪政权占领的区域，再到敌后国军的根据地的过程。在涉水爬堤，走山脊、过山谷、枪林弹雨的行程中，他看到了被劫掠焚烧的房舍、疾病猖獗的山村、在饥饿中挣扎的老百姓，但也感受到了一路上被护送的热情、游击队的勇敢、百姓和游击队的合作与爱国的情。⁵⁹³另外一篇〈归途 - 还乡记之一〉，写他如何数次被日军盘问，冒险回家，但回到家里欢迎他的却是一半荒芜、一半被日军霸占的田地，以及已被‘伪军’驻紮的房宅。他已经无家可归。〈团圆 - 还乡记之二〉写他还乡时见到了亲人 - 他的三妹、二伯母、二婶母、大侄女和外甥。在团聚欣喜之余，更为他们遭受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水旱蝗灾、艰辛困苦的生活而心痛。在他离乡三个月后，接到了父亲离世及参加游击队的三弟被杀害的噩耗。他父亲的离世主因是‘伪军’统治下的生活艰苦困顿，他的三弟更是被‘伪军’枪杀。李汝琳哭喊：‘血债终有清算的时候啊！’⁵⁹⁴

⁵⁸⁹ 李汝琳 〈谢恩情〉，李汝琳《金与沙》（新加坡：万里书局，1980），页 6-10。〈谢恩情〉写于 1961 年 7 月 22 日。

⁵⁹⁰ 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0-241。

⁵⁹¹ 同上，页 241。

⁵⁹² 李汝琳《艰险的行程》（新加坡：青年书局，1956）。

⁵⁹³ 高峰认为李汝琳《艰险的行程》第 1 辑是报告文学，所记载的是作者“在敌后的实际生活情况”，表现了游击战士的战斗精神、人民的爱国情绪和敌后现实生活最凄惨的一面。见高峰 〈《艰险的行程》与《再生集》〉，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 80-81。

⁵⁹⁴ 李汝琳〈团圆 - 还乡记之二〉，李汝琳《艰险的行程》，页 77。

离开了中国后，他继续关注中国的政局。1944年9月2日至1947年12月，李汝琳到了印度加尔各答主编《中国周报》和《中国日报》的文艺副刊，也继续写作。〈炸〉以印度为背景，刻画了中国抗战时期国民党部门之间的互相拆台以及国民党海外的内部斗争，他深切的表达了他的愤怒，对受害的底层的人民，更感到心痛。⁵⁹⁵〈内疚〉以太平洋战争为背景，因为丈夫被日军捡走而不得不改嫁的女子被儿子误解，又再被改嫁的丈夫遗弃的故事，对时代提出了控诉。⁵⁹⁶

来到新加坡后，他深深地怀念他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亲友，在作品中不时流露出他对家族各成员及朋友的怀念。他在叙述家庭背景时，不以自家成员排行，却把整个亲叔伯包括在内排长幼辈分，其中充满了对祖母的爱和感激、⁵⁹⁷对早逝的母亲的不舍、⁵⁹⁸对早丧胞弟双鹤的哀悼、⁵⁹⁹对族弟被敌人杀害并索价赎尸的悲愤、⁶⁰⁰对族中失联的两位姐姐和四位妹妹及他们家人的牵挂、对于同学友人的追忆。他把家人、族人和亲友的照片，分门别类，整理成15本相簿。缅怀思念不已。⁶⁰¹李汝琳念旧的心态，和他在搬家时对家中用了二十七年的书桌、转椅、躺椅、橱柜、书籍、旧报纸的不舍，如同与亲人告别一样，说明了他是一个这么可爱的感性的人。⁶⁰²

对于他的师长、好友，他都细细描述，充满了怀念和感激之情。他记述了与冰心、宗白华同被称为‘小诗时期’代表作家的文学老师何植三先生。何植三先生虽然不是他初中班上的老师，却给予他不少的鼓励，提高了他对新文学的兴趣。他也记述了高中时期对他有影响的老师——作家黎锦明先生、万曼先生、陈治策先生——的作品、习

⁵⁹⁵ 李汝琳〈炸〉，李汝琳《新贵》（香港：海洋出版社，1979），页1-29。《新贵》为小说集，收〈炸〉、〈巢〉、〈懊悔〉、〈内疚〉、〈泡沫〉、〈宝岛的来客〉和〈新贵〉共7篇，为《海洋文艺丛书》之一。

⁵⁹⁶ 李汝琳〈内疚〉，李汝琳《新贵》，页88-107。

⁵⁹⁷ 李汝琳念初三时，祖母去世。他母亲早逝，被祖母带大，而且祖母是最早教他旧诗的人。他写了一首新诗〈哭祖母〉悼念她，并寄到省城报纸副刊发表。见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香港：南方书屋，1987），页287。

⁵⁹⁸ 李汝琳用他母亲与几位亲戚合照的相片，截图重拍并放大，成为他母亲的独照。他在日战潜行到后方时把母亲的相片带出，三十多年来一直带在身边，然后再请画家根据相片画了一张油画，挂在小厅里，“每晚和她儿子、儿媳、孙儿、孙女一同看电视”。见李汝琳〈得偿宿愿〉，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183；李汝琳〈母亲的声音〉，李汝琳《金与沙》，页64-68，于“元宵深夜，家人俱各安睡，独坐母亲像前。如闻叮咛嘱咐，感而成此”，以母亲的口吻，说出母亲对他儿子、孙子、重孙的关爱，有不能实体相聚的遗憾，也有母亲永活心中的温暖。情深意切。

⁵⁹⁹ 李汝琳〈母亲的声音〉，李汝琳《金与沙》，页66、68注四。

⁶⁰⁰ 李汝琳〈弔歌〉，李汝琳《叩门》（香港：万里书局，1961），页3-7。

⁶⁰¹ 李汝琳〈得偿宿愿〉，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180-186，记述相簿的分类和整理以及对亲友的记忆与思念。

⁶⁰² 李汝琳〈故居〉，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190-195。

性、贡献和对他的影响。⁶⁰³ 与黎锦明先生阔别 50 年后，李汝琳一看到《黎锦明小说选》的出版，马上与他联系，还和黎锦明的女儿及孙女通信，给黎锦明的孙女指导及鼓励。⁶⁰⁴ 至于他的大学老师，他举出了三位——曹靖华先生、孙席珍先生和高滔先生。曹靖华先生谦逊诚恳，精通俄文，是当时被公认为中国翻译俄文作品最多、最好的学者；孙席珍先生写了许多出色的小说，是他的文艺习作导师，不但给他许多指导，还时常把他的习作交给北平作家学会的会刊《文学周报》发表；一只脚有缺陷但乐观的高滔先生是小说作者，也翻译了几部世界名著。高先生教的世界文学史和孙先生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使他对世界文学有比较系统的认识。对于这些恩师，他都不直呼名字，而尊称为先生。⁶⁰⁵ 这种种，都是他中国性和华人性的表现。

理所当然，他熟悉中国的作家，写了〈从 19 世纪来的前辈作家〉、读〈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浅评几本有关三十年代作家的书〉、〈再读“五四”小说作家〉，向读者推介中国优秀作品。李汝琳除了写作外，以出版事业著称。他为青年书局主编的 3 集 36 本《新马文艺丛书》、12 部《南方丛书》及 6 本《新马戏剧丛书》，使得许多作者的文稿得以发表、不至遗失，不但对推广马华文学有功，也是对延续他所热爱的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

对于他在新加坡认识的好友的友情与恩义，他也不敢忘记。对知心好友丘絮絮，他详细地讲述了他们从同事到好友的过程，丘絮絮的一本散文集、四本诗集、十本小说创作和当时尚未出版的戏剧集与旧诗词的内容，所主编的《南洋教育》和《南洋青年》的辛勤耕耘以及他对家庭的付出。知友凋零，他更对不烟不酒、生活严肃的丘絮絮患上肺癌从发现到逝世，表达了自己绵绵的哀痛以及对丘絮絮未能完成的心愿，感到深切的遗憾。⁶⁰⁶

⁶⁰³ 李汝琳〈我的文学老师〉，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 253-261；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0。

⁶⁰⁴ 黎丰〈作家师生情〉，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169-170。

⁶⁰⁵ 李汝琳〈我的文学老师〉，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 253-261；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0。

⁶⁰⁶ 李汝琳〈回忆丘絮絮〉，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 267-276。

滴水之恩，泉涌以报是华人所重视的传统美德。李汝琳主编的《南方文丛》包括了连士升的散文集《名山胜水》⁶⁰⁷ 和《春树集》⁶⁰⁸。李汝琳非常敬重及感激连士升。他和连士升同在 1947 年来到新加坡，只是连士升是年头来，他是年尾到。他列举了连士升的各类著作，对他的学问、言论和为人更为钦佩。在回忆和连士升的友谊和境遇时，他讲述了他和连士升同在 1959 年大选前公民权被吊销，两三年后又重获。他更提到在 1961 年当他几乎失去教职的时候，连士升替他向有关当局查询，并为他担保，才能保住他的教职。连士升对他的恩义，他毕生难忘。⁶⁰⁹

对亲人、朋友都感念感恩的李汝琳，对他的故乡更是如此。李汝琳出生于 1914 年，1944 年离开中国。他在 1961 年 7 月写的〈谢恩请〉写的是对在曾经生活 30 年的中国的感谢和赞扬。他虽然已经迁居异国，也感激新的国家，但饮水思源，对中国的恩情始终不能忘却，永远不能尽诉：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母亲啊，我想起了您，
您生我而又养育了我，
在您的怀抱，在您的膝下，……
那三十年不平凡的岁月！
在这遥远的土地上，
如今我又想起了您，
那连绵的青山，
那潺潺的流水，
那辽阔而美丽的田野，
和风轻翻着阵阵的麦浪，
那善良的兄弟姐妹，
那亲切淳厚的人情。
我没有忘记您啊，
母亲，我的亲人，
我没有忘记您的恩情，您的爱！

⁶⁰⁷ 1959 年 8 月初版的《名山胜水》包括《祖国纪行》以及连士升文集第一卷中的 4 本游记 - 《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印度洋舟中》。

⁶⁰⁸ 《春树集》除〈自序〉及〈后记〉外，包括上（15 篇）、中（7 篇）、下（18 篇）三卷。下卷中含〈李星可著：[我谈京剧]〉一文。《春树集》为李汝琳所编《南方文丛》之一（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

⁶⁰⁹ 李汝琳〈回忆连士升〉，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 277-284。

今天，我投在另一个怀抱里，
唉，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我带着赤血淋漓的心，离开您，
走向遥远遥远的南方。
我寂寞的到处流浪，
最后安居在这土地上，
我爱上了这美丽的所在，
这儿有辽阔无边的大海，
这儿有终年长青的树，
这儿有四季盛开的花，
这儿有急待开发的荒野，
母亲啊，我投向另一个怀抱。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母亲啊，我想起了您，
那用在记忆里的
生我育我的恩情！
我知道这些年来
您更健壮，更快乐，
您有那么多好儿女，
那么多能干的好儿女，
为您重建起家业，
使千千万万人刮目相看，
我爱您，我却无缘享受
兄弟姐妹所创造的一切，
从奋斗中，用血和汗换来的。

今天，我投在另一个怀抱里，
不是忘恩，不是负义，
这些年来远离您的膝下，
您不会觉得少了一个儿子，
因为我有那么多好兄弟，好姐妹；
如今我离开您
没有一丝儿挂虑，
您会更快乐，更健壮。
母亲啊，我的亲人，
您生我又养育了我，
我永远的、永远不会忘记

那永远诉不尽的恩情！”⁶¹⁰

在这首诗中李汝琳刻意的澄清了他离开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不是忘恩负义，因为他没有忘记祖国的恩情。他笔下忘恩负义的人物是不懂得感恩的小人，如小说中恋栈殖民地政府、朝秦暮楚的短视人物赵兴隆、⁶¹¹ 助纣为孽、欺善怕恶、趋炎附势的投机份子洪国良，⁶¹² 唯利是图、毫无归属感、换了四次国籍，被冠以忘恩负义名号的秦天达。

⁶¹³ 他讥讽这些人物品格的低下，因为他们不懂得饮水思源，不晓得珍惜居留国的赠与，只知道汲取所有而不舍得付出。他离开故国，是带着悲痛的、不得已的、‘赤血淋漓的心’，他对故国的恩情，永誌不忘。

第五节 姚紫：‘祖国的孩子永远是爱着祖国的’⁶¹⁴

姚紫作为抗清名将郑成功的后人，父亲郑时雨是位西医兼国术名家，⁶¹⁵ 母亲也是医生，⁶¹⁶ 外祖父黄日增是基督教牧师⁶¹⁷。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姚紫从小受到良好的国学教育，由他杂文中历史典故可见他国学根底的深厚。姚紫认为杂文要写的好，就要多读历史，历史知识越丰富就会越少犯错误，而且能以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不但能提出问题，又能不太直接的触犯现实的禁忌。⁶¹⁸ 〈安得谓孝〉一文以曾子被父亲暴杖，醒来后却恐其父因用力过猛受伤而鼓琴娱之的记载，指出一味顺从、不分是非、不思谏正、姑息助虐的弊病。⁶¹⁹ 他的国学也用在现代经济学上。在 1947 年，中国成为国际货物的倾销场，

⁶¹⁰ 李汝琳〈谢恩情〉，《金与沙》，页 6-10。〈谢恩情〉写于 1961 年 7 月 22 日。

⁶¹¹ 李汝琳〈泡沫〉，《新贵》，页 108-136。〈泡沫〉写于 1970 年 9 月。

⁶¹² 李汝琳〈新贵〉，《新贵》，页 190-210。〈新贵〉写于 1978 年 12 月。

⁶¹³ 李汝琳〈漂浮〉，《漂浮》（香港：海风出版社，1987），页 100-140。〈漂浮〉写于 1980 年 8 月。

⁶¹⁴ 姚紫〈桥〉，姚紫《九月的风》，页 11-13。

⁶¹⁵ 刘笔农〈三十年前伟丈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华作家研究丛书）（新加坡：新华文艺协会，1997），页 92。刘笔农是姚紫在晋江学校的学生，见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刘笔农《姚紫研究专集》，页 30；刘笔农〈姚紫又记〉，刘笔农《姚紫研究专集》，页 74-75。

⁶¹⁶ 姚紫〈‘明天又是一个好太阳’跋〉，姚紫《短长书》（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8），页 87。

⁶¹⁷ 侯贤辉〈忆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15。侯贤辉称他乃姚紫童年时的同学。

⁶¹⁸ 陈凡〈忆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69。

⁶¹⁹ 姚紫〈安得谓孝〉，姚紫《短长书》，页 204。

输入远超输出，姚紫以诗经‘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质问外国人的图谋，并恐怕财枯民竭时，连国土也会被‘贸’出去。⁶²⁰ 1949 年左右写的〈蒙蔽〉，以春秋时代子产令放生活鱼，但下人阳奉阴违把鱼宰了吃，子产不知被蒙蔽反称赞下人的典故，喻今人亦是如此阳奉阴违及易于蒙蔽。⁶²¹姚紫对时弊以古喻今、借古讽今的例子不胜枚举，包括个人、社会、国家各个层面。这些例子都是有感而发，以他的亲身经历及对周遭事务的观察，发泄心中的郁闷，并希望中国和这世界变得好一些。

对于中国，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他一直都关注它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1947 年在厦门所作的许多短文，有些直接讥讽时政，有些指桑骂槐；有些指出一般社会现象，有些凸显某项社会现实。〈死得冤枉〉批评军警在武汉大学‘六一’血案中，伤害手无寸铁的学生，讽刺地方政府‘深表同情’之虚伪；⁶²² 〈面子胡为〉批评厦门建设科为了‘市容’（面子），不顾市民生计，下令拆除鹭江道茅屋；⁶²³ 〈奴才走狗〉以《水浒传》石秀骂语‘奴才的奴才’，指桑骂槐；⁶²⁴ 〈小丑者也〉嘲笑拍马屁拍到大腿的小丑；⁶²⁵ 〈鱼与熊掌〉指出伪君子的野心；⁶²⁶ 〈空排架子〉以阿 Q 假冒共产党，原形毕露，讥笑纸老虎不堪一戳；⁶²⁷ 〈杀人后世〉以古籍《两般秋雨盦随笔》所载宋刘十功答友人书的四恶：‘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之后世’严肃地指出最后的一恶非靠‘主义’完成不可；⁶²⁸ 〈国粹政策〉写中国厉行查禁书刊、统制思想、但作家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越受压迫，越有好文章出现，讽刺为一个‘意外的收获’！⁶²⁹ 〈训练人才〉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原本鼓励刻苦上进的话，讽刺现在成为有效的训练人才的藉口；⁶³⁰ 〈废话少说〉指出在劳动节滔滔演讲的人，却忘了拉他到会场的黄包车车夫；⁶³¹ 〈心腹溃疮〉指出民生凋敝，官僚资本却仍从人民身上吸

⁶²⁰ 姚紫〈氓〉，姚紫《短长书》，页 208，编者（姚紫遗产信托人）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⁶²¹ 姚紫〈蒙蔽〉，姚紫《短长书》，页 158，编者按此文约作于 1949 年。

⁶²² 姚紫〈死得冤枉〉，姚紫《短长书》，页 190，编者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⁶²³ 姚紫〈面子胡为〉，姚紫《短长书》，页 196，编者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⁶²⁴ 姚紫〈奴才走狗〉，姚紫《短长书》，页 190，编者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⁶²⁵ 姚紫〈小丑者也〉，姚紫《短长书》，页 192，编者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⁶²⁶ 姚紫〈鱼与熊掌〉，姚紫《短长书》，页 193，编者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⁶²⁷ 姚紫〈空排架子〉，姚紫《短长书》，页 191，编者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⁶²⁸ 姚紫〈杀人后世〉，姚紫《短长书》，页 199，编者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⁶²⁹ 姚紫〈国粹政策〉，姚紫《短长书》，页 192，编者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⁶³⁰ 姚紫〈训练人才〉，姚紫《短长书》，页 194，编者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⁶³¹ 姚紫〈废话少说〉，姚紫《短长书》，页 196，编者按此文写于 1947 年。

吮脓血，养活自己；⁶³²〈教育者何〉悲痛地报道上海报纸广告栏出现青年学生‘寻求义父母’、‘寻求富孀’启事的社会现实；⁶³³也有正面劝告的，如〈善政〉劝为政者先行善，则会使人民归心。⁶³⁴1947年在来新加坡之前，他任厦门《江声日报》副刊编辑，由于讽刺及抨击当时的政府而被通缉。他之所以必须离开厦门，和这许多批评脱不了关系。在致吴天才的信中，他也自述在1946年至1947年当他在厦门《江声日报》任副刊编辑时，因副刊和当时的文艺热流汇合在一起，抨击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致使他被迫逃离中国大陆。⁶³⁵

1948年当他刚到新加坡不久，他曾在居留和归去之间徘徊挣扎。⁶³⁶1949年，他这‘逃亡在外漂泊’的游子，在这‘椰风蕉雨的岛屿’，‘瞭望远方’，牵挂着他的祖国，告诉他的祖国，‘祖国的孩子永远是爱着祖国的’，希望‘绿色的风’越过深洋和重山，把他的期望与祝福带到他的故土。⁶³⁷与杏影看到印度的雀鸟就和中国雀鸟比较一样，⁶³⁸姚紫在1950年，看到新加坡的麻雀，便联想他故乡的麻雀、还有“那山、那水、那原野、那树林，任是一块褐色的石子，和一棵小草，在遥远的思念中，都化作万千发光的梦景，使我含着眼泪，嗅着故乡那芬芳的泥土的气息……。”⁶³⁹1951年，在离开他的家乡三年后，他还怀念家乡的塔、海港、郊野、小巷、校门旁的大松树、小溪，体会王粲‘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的深意。⁶⁴⁰直到1973年，他仍然在写他童年的故事、家乡的秋天。写童年时‘心里像喝了一杯苦蜜，甜中带着几分酸楚’，一想到故乡的秋色，‘心里像喝了酒醉似的，迷迷幻幻地记起了那苍黄的山野、红叶的树林、澄碧的小溪，以及那永在心头的一只孤雁。’他把自己比喻为飘洋过海的一只孤雁，‘多少辛酸、多少眼泪，那是故乡的亲人们不知的。而这况味，也是无数与我一样的南洋华人所经历过的。’⁶⁴¹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在喜庆的新年、

⁶³² 姚紫〈心腹溃疮〉，姚紫《短长书》，页197，编者按此文写于1947年。

⁶³³ 姚紫〈教育者何〉，姚紫《短长书》，页198，编者按写于1947年。

⁶³⁴ 姚紫〈善政〉，姚紫《短长书》，页197，编者按写于1947年。

⁶³⁵ 姚紫〈姚紫书简-致吴天才的信〉，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271。

⁶³⁶ 姚紫〈寂寞〉，姚紫《九月的风》（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6），页3-6。

⁶³⁷ 姚紫〈桥〉，姚紫《九月的风》，页11-13。

⁶³⁸ 杏影〈印度的麻雀〉，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69-77。

⁶³⁹ 姚紫〈黄昏底叹息〉，姚紫《九月的风》，页14。〈黄昏底叹息〉写于1950年。

⁶⁴⁰ 姚紫〈怀乡草〉，姚紫《九月的风》，页23-24。〈怀乡草〉未注明写作日期，但文中叙述他离开故乡安海已经三年。姚紫于1947年尾抵新，因此此文应写于1950年末或1951年。

⁶⁴¹ 姚紫〈铜镗黄犍忆儿时〉，姚紫《九月的风》，页25-29。此文写于1973年12月。

⁶⁴² 团圆的中秋，⁶⁴³ 或在怀旧的岁末、⁶⁴⁴ 思亲的清明，⁶⁴⁵ 他都浓浓的思念家人、怀念故土。

在新加坡，他思念他的故乡、他的祖国，不过明显的表示对共产党的不满。以 1951 年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白华的女儿〉，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的遭遇，控诉共产党声称为人民服务，却对人民清算、斗争。她的父亲出身贫苦，但因为聪明与努力，考得奖学金到美国修读土木工程，回乡后置了田地，成了地主绅士，然而也因为她的成功，成了被清算被斗争的对象。她申诉：“五十年前以封建势力残害我们的人，五十年后他们的子孙，又依靠共产党的势力残害我们！”“一百年前、五十年前被压迫的那些人，现在变成被清算和被斗争的对象！”结果她的父亲不但被打死，田地、房屋都被没收，作为她父亲后人的‘反动家属’，也因此无家可归。她对共产主义彻底幻灭。她曾经寄望共产主义创造新的历史，“人们没有私有的制度，没有贫富不均的现象，生活受到共同福利的保障，那就是‘大同世界’。”然而“共产党来了之后，他们不是把旧的一切终结起来，而是追寻旧的一切矛盾，煽动旧的阶级仇恨，挑拨斗争，他们不把历史的渣滓埋在地下，而是重新发掘。”对共产主义彻底幻灭之后，她出卖了清白的身体，到了香港，住进木屋区，成了‘白华’。她把‘白华’定义为“白色的‘白’，华侨的‘华’，……像过去从苏联逃出来的白俄那样，失去了祖国，没有国籍，到处流浪，像一只被打出门的癞皮狗，谁都可以踢他一脚。”⁶⁴⁶ 姚紫对共产党的深恶痛绝，也可见于他 1969 年的一篇手迹。他以‘地狱’形容中国，为中国的人民深切哀恸。⁶⁴⁷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姚紫对中国的形容，应是源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人民的生活。

除了小说，姚紫也写了许多短文批评共产党。1949 年写的〈自绝〉，抨击中共的‘新土地改革政策’在华北华东欺骗了广大的农民；⁶⁴⁸ 在 1969 年写的〈中秋，情感的季节〉

⁶⁴² 姚紫〈惆怅忆江南〉，姚紫《九月的风》，页 21-22。此文写于 1953 年春节后三日，1968 年元旦翻出抄正。

⁶⁴³ 姚紫〈中秋，情感的季节〉，姚紫《九月的风》，页 58-59。写于 1969 年 9 月。

⁶⁴⁴ 姚紫〈岁暮草〉，姚紫《九月的风》，页 46-54。写于 1953 年 2 月 12 日。

⁶⁴⁵ 姚紫〈清明·忧郁〉，姚紫《九月的风》，页 56-57。写于 1969 年 4 月。

⁶⁴⁶ 姚紫〈白华的女儿〉，姚紫《九月的原野》（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8），页 112-113。

⁶⁴⁷ 姚紫手迹，姚紫《夜歌》（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9），收录于目录前，无页数。根据内容，应写于 1969 年的首日。

⁶⁴⁸ 姚紫《短长书》，页 162。

中，他怀疑当海外华人庆中秋的时候，中秋节起源的中国大陆，在毛泽东思想的统治下，是否再有中秋节，能吃月饼，更是否还有中秋赏月的逸兴？⁶⁴⁹ 1977 年写的〈‘明天又是一个好太阳’跋〉，指出以前的中国贫苦黑暗，但从 1949 年至 1977 年的 28 年来，他的弟妹每人每年只配给三尺布，连‘初一’‘十五’都没有肉吃。他更严厉的批评中国大陆实行的是变相的封建思想，毛泽东是皇帝，他所言是金科玉律，即使他死后他的毛泽东思想还继续统治人民。共产党是高于一切人的特殊阶级，只有党员的子女才有资格升入大学，普通人民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却成为对外宣传的‘民主橱窗’。由于媒体对新中国的宣传，许多人‘隔江观火’，看到火烧得多狂多亮，而看不到在共产党统治下人民的悲惨。⁶⁵⁰

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成功，不是基于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为当时人们对共产主义，十之八九并不清楚。真正给予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在帝国主义和统治阶层的剥削、压迫下所积累的屈辱、痛苦与贫穷。在现实生活中点点滴滴积累的不满，提炼为顽强的革命意识。横竖是死，不如拼死开拓活路，如老子《道德经》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他认为“革命的产生，不是决定于人的意志，而是决定于人所生活的现实状况。先有‘民不畏死’的悲惨的现实状况，然后有‘不畏死’的‘民’；先有客观的矛盾存在，发展为强烈的矛盾、破裂、冲突，又产生大破裂、大冲突之后，就是一边压倒一边的形势，产生了新的局面。”因此‘不畏死’革命群众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凭书本中的主义或理论就会有满腔热血进行革命。⁶⁵¹

对于国民党，姚紫也是深恶痛绝。在 1940 年抗日战争的时候，他记述国民党表面喊着‘统一阵线，一致抗日’，实际上却时常伺机偷袭新四军，仿佛和日军一起，目的在歼灭新四军，分散抗日游击队的力量。甚至在抗日胜利之后，以征服者自居，抢掠、杀虐、奴役百姓、扩大内战，还变本加厉，以美式飞机大炮轰击共军，老百姓也跟着

⁶⁴⁹ 姚紫〈中秋，情感的季节〉，姚紫《九月的风》，页 58-59。〈中秋，情感的季节〉写于 1969 年九月。

⁶⁵⁰ 姚紫〈‘明天又是一个好太阳’跋〉，姚紫《短长书》，页 87-89。

⁶⁵¹ 姚紫〈谈革命与耍猴戏〉，姚紫《短长书》，页 100-103。页 101 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应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姚紫《短长书》记此句出自孔子，其实是老子《道德经》第 74 章中的句子。

遭殃。⁶⁵² 在他 1949 年左右写的文章里，〈此路不通〉讽刺南京政府在战事醞着的时候和战事恶化的时候，都大呼美援，但都吃了闭门羹；⁶⁵³ 〈因狗毙人〉讲述孔祥熙的二小姐在香港沦陷前夕，为救几只爱犬，驾走了政府留下的所有飞机，以致许多要员无法撤退而被日寇杀害的本末倒置；⁶⁵⁴ 〈南京南京〉比较蒋氏下台的前后光景；⁶⁵⁵ 〈时去不返〉劝告国民党不必留恋褪色的光荣；⁶⁵⁶ 〈意外的恩典〉质疑上海监狱把十年徒刑以下的汉奸数十名交保释放的原由；⁶⁵⁷ 1964 年写的〈善后专家〉继续嘲讽台湾政府事先不善防护，事后仅能守住小岛的善后‘特色’。⁶⁵⁸ 其实，他要维护的是人民、国家而不是某些政党或集团。在《阎王沟》后记里他声明：“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危害中国人民的政党或集团，就是危害我们祖国的公敌。……………我们更应该分别历史上的光明面和黑暗面，爱那光明的，憎那黑暗的。否则，我们单爱那抽象的政府，爱那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或集团，就是维护那剥削自己兄弟姐妹利益的政党或集团。”⁶⁵⁹

姚紫批评共产党，排斥国民党，他爱的不是政府或政党，而是人民的中国。不论是借古喻今或直贬时弊，他只希望中国更好。

第六节 苗秀：‘他的脚从来没有接触过那儿的土地，但他是个中国人……’⁶⁶⁰

在马华文坛上，苗秀以及赵戎和铁戈都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坚实支持者。苗秀坚决认为马华文艺应反映本土性与在地性，在 1947 至 1948 年展开的了马华文艺和‘侨民文艺’的论争中，他们认为重视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并非抹杀中国文艺的作用和贡献，只是强调马华文艺的在地性和个性。苗秀并不否定马华文艺始于侨民文学：

⁶⁵² 姚紫 〈忽听春雨忆江南〉，姚紫《九月的原野》，页 80-97。

⁶⁵³ 姚紫《短长书》，页 151。

⁶⁵⁴ 姚紫《短长书》，页 166。

⁶⁵⁵ 姚紫《短长书》，页 165。

⁶⁵⁶ 姚紫《短长书》，页 154。

⁶⁵⁷ 姚紫《短长书》，页 157。

⁶⁵⁸ 姚紫《短长书》，页 173。

⁶⁵⁹ 姚紫 〈‘阎王沟’后记〉，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29-232。

⁶⁶⁰ 苗秀 〈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 219。

“我们不能完全抹杀移民文学在马华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移民文学是华侨的侨民意识形态的反映，因而有它存在的条件，也是马华文学的史的发展上应有的阶段，再来，它使得马华文学得以继承中国新文学的优良传统－现实主义的精神。”⁶⁶¹

侨民文学是马华文学史的一个应有的发展阶段。Safran (1991) 及 Safran (2016) 都强调离散族裔对他们的祖国或来源国保持集体的记忆和想像。⁶⁶² 中国华商、华工、⁶⁶³ 及文人南来，文人书写他们的集体的记忆和想像，构成了侨民文学。追本溯源，马华文学始于侨民文学，但随着历史进程，马华文学不能停留于侨民文学。

苗秀也写与中国有关的状况与事件，与同样出生于新加坡的赵戎一样，他们对中国的叙述和其他五位作家有明显的不同。⁶⁶⁴ 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支持救亡工作，也描写了当时年轻人向往中国的心态和行为。⁶⁶⁵ 在苗秀 1940 至 1950 年代的小说中，描写了一批批的青年北归。⁶⁶⁶ 他们包括：业余话剧演员，⁶⁶⁷ 在山芭学校没有注册的教师，⁶⁶⁸ 在新马上过小学和初中的青年，⁶⁶⁹ 许多要到中国上大学的朋友，⁶⁷⁰ 有一位甚至把树胶园产业留给妻子，只身回中国上大学。⁶⁷¹ 还有追求理想，觉得不属于这土地的女青

⁶⁶¹ 苗秀〈论文艺与地方性〉，苗秀《文学与生活》（新加坡：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67），页 37，写于 1963 年。目录标题为〈论文艺与地方性〉，页 38 的标题为〈论文艺与地方性－马华文艺运动史的考察〉。本论文取其目录标题〈论文艺与地方性〉。

⁶⁶²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ume 1, Number 1, Spring 1991, p. 83; Safran, William.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eds., 2016, p. 32.

⁶⁶³ 王赓武把南来的华人分为华商、华工、华侨及华裔四大类型。见王赓武〈华人移民的历史剖析〉，《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4），页 5-14。笔者认为除了华商、华工外，还有文人，而这三类都可被华侨及华裔包括在内。

⁶⁶⁴ 苗秀《旅愁》（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53）后记记述他父亲，是以‘闯关东’的精神只身南渡，虽然有可能他父亲像许多其他有家眷的男子只身南来，然苗秀并未说明，而且他的好友赵戎也记苗秀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为广东三水。见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页 183。

⁶⁶⁵ 苗秀《火浪》（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2004），页 154、296、304。

⁶⁶⁶ 苗秀〈雨〉，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199：“他又送走了好几批朋友。一些认识的跟不认识的，都一批批的走了。”〈雨〉写于 1950 年。

⁶⁶⁷ 同上，页 201。

⁶⁶⁸ 同上，页 201。

⁶⁶⁹ 同上，页 201；苗秀〈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17。〈边家的人们〉写于 1951 年。

⁶⁷⁰ 苗秀〈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18。

⁶⁷¹ 苗秀〈雨〉，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199。

年——一个穷教师的妻子蓉，走到家庭以外的世界之后，不但参加剧运、游行，最后还响应了北方的召唤，“离开‘这毫无生气的土地’，投奔‘一个新的理想’”。⁶⁷²

这些人大多没有到过中国，但仍然对之向往，有如《边家的人们》中的边建立所说的：

“他老的一颗心跟了叶紫那一番话飞到北国的广大原野去了。那个国度对他这个海外侨生是陌生的，他的脚从来没有接触过那儿的土地，但他是个中国人，所以对他有着一种神秘的吸引力。”⁶⁷³

有些人想走却走不了，因为他们需要养家，家中父母妻小都要靠他生活。这些人向往北归，却因家累不得不留下，往往在现实和理想间的挣扎，有诸多的无奈。⁶⁷⁴ 回到中国的还包括被遣走的人们，他们是在日军战败后的在本地参加反殖运动的人们。⁶⁷⁵ 除了被遣走的人们以外，都是自愿回归的。Safran (1991) 认为离散族裔视回归祖国为终极目标，他们也以维持或回复祖国的原来风貌为己任。⁶⁷⁶ Butler (2001) 也提出，回归是离散族裔的一个基本概念，这概念或以保留文化传统为回归的表达方式，或实质的回归祖国。⁶⁷⁷ 苗秀的离散意识明显地呈现在他笔下许多青年北归的意愿与行动。

1940 和 1950 年代的华人，有许多是以华侨的心态侨居于此，他们北归报国并非不可想象。除了北归的人群外，留在这里的人许多参加了救亡工作。比如区老叔的儿子黑三，卖花筹赈，唱救亡歌，演白话剧，积极支持抗日救亡。⁶⁷⁸ 忠于事实的苗秀也描绘各种华侨的心态，除了北归、在本地救亡抗日的人群，也有自己顾自己，甚至不愿花一块钱买赈灾花的熨斗工人财叔。然而财叔也怀念家乡，存钱的目的就是回家乡养老，不客死异乡。这是苗秀 1940 年的作品《浮渣》。⁶⁷⁹ 但在 1940 年后，华侨还是有浓厚的落

⁶⁷² 苗秀《火蝇》，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195：“……春天向我号召，我是不能不走的。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属于我们过去生活过来的土地的。” 写于 1950 年。

⁶⁷³ 苗秀《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19。

⁶⁷⁴ 苗秀《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20；苗秀《雨》，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02。

⁶⁷⁵ 苗秀《忌日》，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32。《忌日》写于 1946 年。

⁶⁷⁶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 no.1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Spring 1991): pp.83-84; William Safran,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eds., 2016, pp.31-69.

⁶⁷⁷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p.204-206.

⁶⁷⁸ 苗秀《红雾》，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157-170。

⁶⁷⁹ 苗秀《浮渣》，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34-241，写于 1940 年。

叶归根的意识。新马是‘番邦’，来这里的目的是赚钱寄回中国的家乡，照顾亲人。写于 1953 年的〈上一代的女人〉，描绘了红头巾女工为中国家人牺牲的悲惨命运。⁶⁸⁰同是在异乡的中国人要同舟共济，因此当〈新加坡屋顶下〉的陈万帮赛赛拿回钢笔而赛赛要给他咖啡钱的时候，对她说：

“小意思，千祈唔好讲咖啡镪呢件事，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在人家地头搵食，有了事情能够帮忙都该帮忙哇……”⁶⁸¹

不单是底层社会的人物，知识分子如丁主任也一样认为华侨应该明哲保身，因为在异邦的目的只是赚钱而已。他批评华侨义勇军：

“自己送死不打紧，不要教那些鬼子对我们华侨发生恶感，那就累死别人了。……其实我们华侨不远千里来番邦，也不过是为了捞世界，归根到底都系在别人家地头上做客，谁做皇帝老子都一样嘛，我们犯不上出头出角……。”⁶⁸²

写于 1945 年的《红雾》，藉着抗日志士黑三父亲区老叔的口，总结了当时许多华侨的想法：

“我们是华侨，辛辛苦苦的渡洋过海来这番邦，还不是为了赚钱，这地头谁当主人翁关我们屁事！哪一个皇帝老子，老百姓照样纳粮……”⁶⁸³

从中国南来的华人的侨居心态可以理解，但也有一些在本地出生，但没有归属感的人们。写于 1950 年的〈雨〉，莉莉，一个咖啡店的女工，在这里土生土长，连在中国的家乡在哪里都不晓得，写出了感觉‘无根’的人的迷惘。文中的‘我’－龚秋冷虽晓得他的祖籍，但在这里土生土长，“他生活在这热带的土地上，却每一分钟，不，每一秒钟都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⁶⁸⁴ 这 1950 年的作品，苗秀藉着莉莉和文中第一人称的‘我’，反映当时许多华人非此非彼，不知身归何处的漂浮感。他们对故乡不熟悉，也还未对居留国产生深厚的感情。居留国要建设国家社会，不论是对侨居者或本地人，都必须做出一番努力。

⁶⁸⁰ 苗秀 〈上一代的女人〉，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81-93，写于 1953 年。

⁶⁸¹ 苗秀 〈新加坡屋顶下〉，柏杨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小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页 59。篇末注此文最初于 1951 年 11 月由南洋印刷厂出版。

⁶⁸² 苗秀〈火浪〉，页 181。苗秀在《火浪》末页记他于 1950 年 6 月 6 日完成初稿，1959 年 7 月 17 日重改。

⁶⁸³ 苗秀《红雾》（新加坡：新马文化事业公司，1963），页 12。

⁶⁸⁴ 苗秀 〈雨〉，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04，写于 1950 年。

第七节 赵戎：‘华人慎终追远的传统，和不忘故土的精神……’⁶⁸⁵

赵戎和苗秀是好朋友，写了许多肯定苗秀的评论，⁶⁸⁶他和苗秀、铁戈都是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坚决支持者。赵戎和苗秀一样，出生于新加坡，和苗秀一样，他支持中国的抗日行动，也支持南洋的救亡工作。他还指出支持中国的行动中，不单有华人，还有马来族和印度族，不单有马来亚化的峇峇和娘惹，也有在这里住了两三代，从未踏足中国的年轻人。他以长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说出离散华人对中国的爱，以及与其他种族一起，共同反对侵略者的愿望。

《在马六甲海峡》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马六甲海峡的美丽、和蔼、雄壮、浩瀚、庄严、磅礴、活动、作用、历史，⁶⁸⁷并通过在船上发生的事和倒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来写“战前救亡运动的风貌”，⁶⁸⁸也再现了新加坡在日治之下的史实。在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日，海外华人积极响应，不但成立了南洋筹赈总会，以金钱和物资支持中国抗战，甚至还亲身到中国参加抗战。《在马六甲海峡》里，琳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响应了这一号召，报名参加了南桥筹赈总会主办的司机回国服务团。其他的文艺青年老梅、老石、老铁、冰等除以他们的笔杆宣传抗日外，还组织剧运演出救亡剧。

在叙述好友琳响应中国的呼唤，参加司机回国服务团的这一段情节中，赵戎这样写：

“他这次回国服务，完全出于一片救国热忱，在国亡家也不保的前提下，——虽然，琳的家是在南洋——他愿意牺牲一切。”⁶⁸⁹

⁶⁸⁵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页10。

⁶⁸⁶ 赵戎〈苗秀论〉，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128-140；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183对苗秀的评论是“文笔多采细致，清新特出，自成一家。著作丰富，为我国著名小说家及散文家。”

⁶⁸⁷ 其中一部分见《在马六甲海峡》，页38-43。

⁶⁸⁸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后记，页290。

⁶⁸⁹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页78。

琳还觉察到在他的队伍里，有两个队长的母亲是说马来话、‘穿沙龙’、用手抓饭，马来化的娘惹，他们生活优越，却愿意为中国效劳。他相信在其他队里也有不少峇峇。在前一批的队伍里，还有印度同志。⁶⁹⁰ 赵戎以第一人称的‘我’，对在这里生活了两三代，多数没踏足中国的华人，以及其他愿意为中国出钱出力的民族喝彩：

“时代的感召力，多么巨大呀！这次回国服务的全是些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年人。他们有八十巴仙是没有踏过中国土地的，他们远在天涯海角，已经住了两三代了，生活习惯，都已或多或少的马来亚化了。然而，他们却毫不犹豫，毫不畏惧地参加这个神圣的救亡工作。琳，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还没有嗅过中国泥土的气味。从前，当地的娘惹峇峇们，简直是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中国人了，他们除了逢年过节，仿效中国人外，一切都和当地同化了。当七七抗战爆发后，他们以为这个东亚病夫的中国，一定会灭亡的，但由于这多难的国家能够和最强大的敌寇——日本法西斯长期坚持下去，使他们也改变了对中国的观念，从此，对筹贩卖花等，他们也有帮襯的了。时代的影响力，真是不可思议的呵！

连那些印度和马来民族的优秀儿女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了。中国啊，你是不孤立的！”⁶⁹¹

Safran (1991) 与 Butler (2001) 都主张离散族裔以回归祖国为目标，只是 Safran (1991) 认为离散族裔以维持或回复祖国的原来风貌为己任，⁶⁹² 而 Butler (2001) 则提出回归有实体的或以保留文化为方式表达。⁶⁹³ 从祖国离散到他域再回归不难想象，但没踏足过中国的土地，而且已经住了两三代，生活习惯已经马来亚化的华人，却自愿‘回归’，应该是如 Safran (1991) 及 Safran (2016) 所强调的，离散族裔对他们的祖国或来源国保持着集体的记忆和想像。⁶⁹⁴

《在马六甲海峡》里的‘我’——张浪萍在马六甲海峡的轮船上和从中国探亲回来的妈姐谈话，说出了华人饮水思源的美德，但探亲后仍旧回来，始终是土生离散华裔的双重立场：

⁶⁹⁰ 同上，页 96-97.

⁶⁹¹ 同上.

⁶⁹²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 no.1, 1991, pp.83-84.

⁶⁹³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p.204-206.

⁶⁹⁴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1991, p.83; Safran, William.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eds., 2016, pp.31-69.

“我常常想，战前和战后，那些工人阶级的华人，为什么把数年积下的血汗钱，花在回乡一转的上头去？而这就正是我们华人慎终追远的传统，和不忘故土的精神呵！我们的祖先终生劳碌地遗下这份可怜的业绩和财产给我们，使我们不能抛弃它，这就是以南洋作为第二故乡的前因后果了。华人是有着这两重关系的。”⁶⁹⁵

‘慎终追远’、‘不忘故土’，是赵戎所尊崇的中国传统精神。他尊崇鲁迅，1936 年左右，首次发表了纪念鲁迅逝世的诗篇《巨星》。⁶⁹⁶ 1937 年他 17 岁时就开始文艺活动，与郭松林、赵正荣等发起组织‘怒吼话剧社’。⁶⁹⁷ 1938 年，身为南洋华人，参与了筹赈工作，和友人复办‘国风幻境剧社’，以文艺活动协助各种筹赈救亡的筹赈工作。⁶⁹⁸ 同于 1938 年，与白荻、刘思、拉音、呢喃、林秋等发起的新加坡第一个及当时唯一的诗人团体‘吼社’，直接受到‘中国诗歌会’的影响，主张诗歌大众化，为了成了全民族的吼声。⁶⁹⁹ 1945 年他曾主编《琼潮报》及《爱华周报》。《琼潮报》为陈平所创办的报纸，宣传重点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着重报道新加坡琼籍进步人士、工人、学生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爱华周报》后改为「爱华报」，终也因报道内容被封禁。⁷⁰⁰ 由赵戎筹赈救亡、持续的努力办报、组织诗社、剧社等文艺团体、推进文艺事业，都是关心故国、支持本土文艺的表现。在以下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赵戎如何通过文艺理论、创作、编辑与出版，发展本土文艺。

⁶⁹⁵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页 10-11。

⁶⁹⁶ 赵戎〈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学会，2009）封底。

⁶⁹⁷ 马崙〈梅花香自苦寒来〉，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新加坡作家研究丛书）（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0），页 96。马崙未注明原资料出处。

⁶⁹⁸ 同上，马崙未注明原资料出处；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96；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434。

⁶⁹⁹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197、433；〈赵戎生平简介〉，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1。

⁷⁰⁰ 爱华社成立于战前，原名爱华音乐社，后加戏剧二字成爱华音乐戏剧社，最后改为爱华社。主持人为吴盛育，积极推动音乐戏剧等活动，更办学校及教师别墅，最后办「爱华报」，终被封禁，吴盛育被遣送出境。参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435、446。

第五章：本土情

Gilroy (1994) 强调地域对离散族群的影响,⁷⁰¹Butler (2001) 认为地域,无论是移出国或居留国,和离散族裔都有密切的关系,影响他们的态度,同时这关系会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化。⁷⁰²研究跨国移民的 Nina Glick-Schiller et al. (1994)⁷⁰³认为大多数的离散族裔生活的重心在居留国,他们的身份由他们在居留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塑造,就算他们和母国的连系受到干扰,他们离散族裔的身份不一定会产生必然的变化。⁷⁰⁴王赓武在多篇文章中也肯定地域影响观点与思维。他指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成长的人有明显的分别。例如美国出生的华人和中国新移民或从东南亚再移民的华裔具有不同的世界观。⁷⁰⁵在这章里我们将讨论这七位作家对他们居留国的思考。其中五位移民作家中在新加坡生活最短的是杏影(22年),最长的是李汝琳(44年),他们谈论了与新加坡有关的种种议题,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语文教育,表达了对新加坡的感情。两位本地出生的作家更是用他们的一生对新加坡提出建议,积极发扬新加坡文化。每位作家都有他们的侧重面和描述方式,以不同的视角显示他们对新加坡的认同。

第一节 李星可：‘全民大团结’、‘华巫团结’⁷⁰⁶

李星可有不少文艺性的创作,以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他对新加坡社会的看法。但他以报章社论所发表的评论文章知名,以直言强悍的风格著称。李星可的社论主要收集在

⁷⁰¹ Paul Gilroy,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208-209.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⁷⁰²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204. Doi:10.1353/dsp.2011.0014.

⁷⁰³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Cristina Szanton Blanc,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7.

⁷⁰⁴ William Safran,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eds., 2016, p.37-38.

⁷⁰⁵ 其中一篇见Wang Gungwu, 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Wang Ling-Chi &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 Selected Essays Vol.1*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17.

⁷⁰⁶ 取自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185。

《政论选集》、《政论近集》及《政论新集》里。其他还有《政论选集外编一十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远景》以及零散篇章。⁷⁰⁷ 主要课题包括教育、政治、治国、经济、民生和文化。这些评论文章，代表了他对新加坡的观点，也说明了他对新加坡发展的期待。

708

评论：

教育课题

新加坡作为一个以华人人数占大多数的多元种族社会，因马来族被认为是土著，人民接受以巫语为国语。在殖民地时代，虽然政府未给予各源流学校平等待遇，日治后的 1945 至 1953 年，华族父母为了弥补子女于日治时期缺失的教育，华校数目急速增长。

⁷⁰⁹ 华校数目的增长得到几方面的协助。1946 年在新加坡的中国领事馆联合华社领袖成立‘战后复校辅导委员会’，向中国咨询华侨教育政策方针，请求经济及师资支援，并向当地政府请求提供教育津贴。⁷¹⁰ 在殖民地时代华人的身份是华侨，接受中国的帮助无可厚非，不过，新加坡地缘会馆、血缘宗祠和大商家也出钱出力，在 1945 至 1949 年间，复办了 20 所华校，并丛 1945 至 1954 年，新建了 8 所华校。⁷¹¹

⁷⁰⁷ 李星可《政论选集》（李星可自印，1963）；李星可《政论新集》（新加坡：东方文化企业，1967）；李星可《政论近集》（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1967）；李星可《政论选集外编一十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远景》（新加坡：国际图书（新）有限公司，1988）。在此书后列出《政论今集》（1971），鲁虎于《新马华人的中国观之研究》（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与八方文化创造室，2014）页 219 提及李星可在 1971 年出版《政论今集》（未提出版社），然笔者未能寻获此集。另有一篇〈星加坡高等教育问题〉刊登于《南洋文摘》第 7 卷第 9 期，总 81 期（香港：南洋文摘社，1966 年 9 月 30 日），页 595-596。

⁷⁰⁸ 李星可的社评及文艺创作屡用‘星加坡’。除了引文保留‘星加坡’原词，以及当他称当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为‘星加坡大学’或简称‘星大’外，笔者一律改用目前官方的称谓：‘新加坡’。

⁷⁰⁹ 唐青编著，《新加坡华文教育》（华文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台北：华侨出版社，1964），页 79。

⁷¹⁰ 周聿娥《东南亚华文教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页 79；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8），页 112-113；南洋商报 1948 年 7 月 25 日社论，引自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页 113、132；唐青编著《新加坡华文教育》，页 74-77。

⁷¹¹ 主要由地缘会馆如福建会馆复办，血缘宗祠如陈氏宗祠和大商家如义安公司。见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页 114-115。

然而由于殖民地政府积极扶掖英文教育，从 1954 至 1957 年，虽然华校数目仍多于英校，但人数却少于英校。从 1958 年起，华校数目与学生人数都已被英校超越。⁷¹² 据统计，在 1960 至 1964 的五年间，华校学生人数减少了百分之 5.46。⁷¹³

李星可收集在《政论选集》里所收的社论写于 1959 至 1963 年间，正值华校数目日益减少之际，新加坡自治至与大马合并前的阶段。李星可看到了华文教育走向没落，通过社论积极呼吁维护华文教育，欲挽狂澜。他数次提问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数字，并主张强制性的母语小学教育、改进英校华文教学、各源流教育平等。1962 年当新加坡教育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临时报告书提出各源流学校统一每周一至五每天上课半天（他称之为每周‘五个半天’），星期六的半天为课外活动，李星可极力反对华校也做出这样的改变，因为上课时间缩短，学生学习和自习及节与节之间休息的时间都受影响。他主张上课五个全天加上星期六的半天，退而求其次是五个全天，再退而争取五个‘半天’加星期六的半天上课。在教育与语文课题的 60 篇里，从 1962 年 4 月至 1963 年 1 月，共有 11 篇有关华校上课天数减少的弊病，并不惜与教育部、华校教师总会、华文中学教师会及南洋商报针锋相对。⁷¹⁴ 在辩论的过程中，双方的立场得以澄清，对读者也起了引导作用。

除了上课天数集中在《政论选集》评论外，李星可在他的三本政论集中，每本都以大多数的篇幅谈论从小学到大学与华文教育、语文有关的问题。⁷¹⁵

小学教育问题始于母语教育。李星可一再强调强制性的母语小学教育将为华文学习奠定牢固的根基。他关注小学新生入学人数，看到华校人数从 1954 年起逐年减少，他一再呼吁政府正视这个问题。他抓紧每个机会提出小学教育不但应是母语教育，还更应该是强制性的；不但欢迎时任李光耀总理提供 6 年免费小学教育，还建议延长至 7 年；

⁷¹² 同上；新加坡教育部 1946-1960 年常年报告（Singapor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nual Reports* 1946 - 1960）。引自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4），页 267。

⁷¹³ 新加坡南洋商报 1966 年 3 月 27 日报道。引自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页 268、281。

⁷¹⁴ 李星可《政论选集》中的 11 篇：123、124、135、137、143、144、145、146、148、154、160，都直接评论华校的上课天数。

⁷¹⁵ 李星可《政论选集》共收 165 篇社论，教育与语文课题占 60 篇。李星可《政论新集》共收 77 篇社论，教育与语文课题占 34 篇。李星可《政论近集》共收 84 篇社论，教育与语文课题占 17 篇。政论集的其他课题包括政治（与他国关系及内政）、治国、民生、经济、文化及媒体。

不但要让每个适龄儿童有入学的机会，还建议在上学时可以足岁的儿童也在当年入学。

716

上课天数的多寡影响学生学习华文的质和量，李星可为华文教育一再争取较多的天数。强制性的母语小学教育将为华文学习奠定牢固的根基，也是他坚持始终的信念。

中学教育的问题主要有关当时的三三制（初中高中各 3 年）改为四二制（初中 4 年，高中 2 年）。在三三制下，从初中升高中看学校成绩即可，四二制则要通过一个统一的中四会考，达不到标准就会被拒于高中门外。李星可认为智力发展速度不同，不能升上高中的中四毕业生将失去上进的机会，而且因年纪轻，就业困难，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他也反对过度重视考试的制度，因“严格的考试只能创造奴才”。⁷¹⁷ 他对在四二制下的华校高中面对以华语授课时间减少的问题提出质疑。⁷¹⁸ 他对学习质量的重视及为更多学子争取升学的机会，爱护华文教育的热情毋庸置疑。

高等教育的问题关系南大、星大、义安学院的各种问题。⁷¹⁹ 在高等教育的课题中他提出有关南大的问题最多。⁷²⁰ 包括南大成立的背景和目的、南大的课程、学制、教学媒介语、学术水平、生源、师资、学位、地位和发展，不断提醒政府对南大保留为华文大学的承诺；解释华文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能与民众沟通，才符合社会的要求；督促政府早日承认南大学位。⁷²¹ 他明白多元种族社会的考量，但指出就因南大是以华文为主要媒介语的大学，而被涂上种族主义色彩是错误的，因为“华文大学并不就是华人大学，尤其并不就是种族主义的大学，因为南大……的大门敞开，不单是各民族的，甚至可以说是国际的。”⁷²² 他支持和维护南大，也因为他认为新加坡不能只有一间大学：“南大……我永远是站在旁观的地位的，虽然我写的社论里一直是拥护南大，

⁷¹⁶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52、153、154、159；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76。

⁷¹⁷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66，页 130-131。

⁷¹⁸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页 6-8。

⁷¹⁹ 李星可称新加坡的国立大学为星加坡大学，简称时也用星大。

⁷²⁰ 直接或间接有关南大的文章，占《政论选集》60 篇有关教育与语文课题中的 15 篇，占《政论新集》35 篇有关教育与语文课题中的 8 篇，《政论近集》17 篇有关教育与语文课题中的 4 篇。

⁷²¹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2、15、23、28、34、46、47、61、103、107、120、125、134、149、150（15 篇）；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8、49、54、57、59、62、65、68（8 篇）；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6、32、55、81（4 篇）。

⁷²²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5。

抗拒它被消灭 - 因为大学教育，需要竞争，‘单一制’只能制造 yes-men，毁灭人才，销毁创造力。这对于学术研究没有好处，对国家社会也没有好处。”⁷²³

因此他不排斥星大。他支持星大应打开门户，收取不同源流的学生，而且建议加强本地土语方言（即母语）的学习以便与地方人民大众沟通。他引述时任教育部部长王邦文的话，由于学校将第二语文列为必修科，大学也须在课程上做出调整；由于南大两种语文并重，星大则须在这方面迎头赶上。他支持王邦文的呼吁，星大与南大应开诚交流，分工合作，调整课程，避免重复。⁷²⁴

义安学院成立于 1963 年 5 月 25 日，原本有望成为另一大专学府，但 1965 年义安学院的内部发生矛盾，义安公司董事部与义安学院董事部在学院扩建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闹得满城风雨，接着一些学生罢课，要求义安逐步发展为大学城，义安学院面对停办的危机。李星可连连发文，呼吁学生冷静，指出当时创办义安是为了‘提倡华教，促进高等教育的正义’。⁷²⁵，希望各方妥善解决问题。1966 年义安学院又发生学潮，学生不满汤寿柏报告书把义安学院降为初级学院，罢课一个多月。政府把义安学潮和南大的学生运动（学生要求彻底明瞭政府对王赓武报告书的態度），以及这些学生可能与社阵的‘街头活动’一起考虑，除了开除和驱逐出境许多南大学生外，也将许多义安学生记大过、开除、甚至逮捕。李星可一面劝导学生冷静思考，以大局为重，也向政府指出南大、社阵事件应与义安学潮分开，给学生自新之路，在在体现了他对华教的爱护。⁷²⁶

从小学到大学教育，李星可持续关注英校中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水平、方法与师资。他为政府于 1965 年决定把第二语文列为必修科鼓掌，认为英校的第二语文教学存在问题，要求英校校长重视并切实执行第二语文教学、教师研讨教学方法、家长认真监督。⁷²⁷ 1965 年末当王邦文宣佈 1966 年起各源流中小学校的第二语文不但将是必修科，也是各级会考的必考科，李星可肯定了这项措施的重要性，称之为新加坡教育史

⁷²³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85。

⁷²⁴ 有关星大与南大合作的社论，见《政论选集》篇 94、103，《政论新集》篇 68，《政论近集》篇 81。

⁷²⁵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12。其他评论义安的文章见《政论新集》篇 6、7、9、10、18、60、61、62。

⁷²⁶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60，61、62。

⁷²⁷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2、3、22、37。

上的里程碑，‘结束殖民地时代的教育政策的第一步，也是在实际行动上融汇一个多元社会的开宗明义之举’，并对王邦文称赞有加，因他‘懂得实在的情形，也知道实在的需要’，‘有见解、有魄力、有作为’，⁷²⁸ 对于吝于赞誉的李星可，对王邦文的称赞不只是对王邦文的肯定，更展现了他自己对华教的热情。

李光耀于 1966 年 9 月建议在华校中，数理用英文，在英校中，史地用华文。李星可称之为‘星加坡的文化革命’与‘星加坡的文艺复兴’，因为双语教育才能保障文化传统不致丧失，是对‘原有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造’，对殖民地教育余毒的肃清，是实现多元文化社会的基础。⁷²⁹ 李光耀的建议或能平衡华英校的中英文教学，但李星可崇高的赞誉或许具策略性的目的，以提升华文教学的课时和地位。

从小学到大学教育，李星可一直强调各源流教育应有平等发展的机会。他注意到 1954 年后华校小学新生入学数目不及英校，质问教育政策的实行是否平等，质问是否因政府机关任用人员时偏重英文的现实考量而使华校人数减少。⁷³⁰ 既然华巫英印同为官方语文，四大源流学校的待遇应该完全一致，新学校的设立须有原则，政府公文不能仅限一种语文，大学教学媒介语应配合中学毕业生的来源，政府公务人员的任用与高等学府应平等收纳四大源流学生。⁷³¹

李星可懂得多种语文，除中文外，还精通法文，曾得奖学金到比利时和巴黎留学，也曾任法新社任职和法国大使馆顾问。⁷³² 他的译诗〈母亲〉写不变的母爱，译自法国 JEAN RICHIPIN 原著。⁷³³ 他也兼通英文，翻译韩素音的《餐风饮露》及《青山不老》。⁷³⁴ 在这样的语文背景下，他始终认为母语最重要，母语是人文素养的基础、是文化的根本。他更进一步的认为英语并非绝对不可放弃，举出日本、西德与荷兰的国际贸易不

⁷²⁸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22。

⁷²⁹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7、57、58。

⁷³⁰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53、72。

⁷³¹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1、42，《政论选集》篇 72、152。

⁷³²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3-15，77-80，171-172；李星可〈纪念亡妻〉，《十八年后归去来》（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页 1，记他 1935 年‘负笈西欧’。

⁷³³ 〈母亲〉（译诗）收于《桥上》（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印行，1957），页 1-2。作者以此诗纪念他的母亲，诗中的母亲对杀了她以取悦他所喜欢的女人的儿子，仍然关心呵护，非常感人。作者自认为这首译诗的音节腔调保留了原作的精神，是他满意的作品。

⁷³⁴ 韩素音著，李星可译《餐风饮露》（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韩素音著，李星可译《青山不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

比英国差，苏联的太空实验也不靠英语。反过来，印度从未放弃英语，不但成不了强国，还要靠外援度日。⁷³⁵ 在政府积极推行英语的当时，提出这样的说法需要有相当的勇气，也可由此看出他维护他的母族语言——华语的积极和热情。然而他因“那时候儿的华校风气很坏，整天罢课”，把孩子从华校转到圣约瑟书院，自己在家里教他们华文。后来他的孩子移民澳洲，变成他曾笔伐的‘二毛子’，不过在思想上还是和他一样的‘沙文主义’。⁷³⁶ 被李光耀指出：“撰写社论的李星可送五个儿子到澳洲受教育，我的子女全在新加坡接受华文教育”，⁷³⁷ 对他是一种讽刺，更是一种遗憾。

政治

在政治课题上，《政论选集》收入的是 1959 至 1963 年的社论，当时新加坡自治后面临英军撤退，与马来亚寻求合并。但李星可认为新加坡争取合并并不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新马在历史、地理、政治、社会、人种、经济上都有合并的基础，合并则能共存共荣。他以瑞士为例，反驳中峇鲁议员李德欣认为新加坡地小、人口不多，哪能独立的看法。他说新加坡能达到当时的成绩，也不是因它地大人多，而是因为它有独立的自信才争取脱离英国的统治，寻求合并因新马原本一家。但他也意识到合并将会产生的问题，如种族和谐、公民权利、商业法则、教育政策、语言使用等，人民应该参与讨论，表明立场，政府也应说明阐释，争取人民的支持。⁷³⁸ 60 年前李星可对新加坡独立以及发达繁荣的信心，以及合并带来的问题，60 年后的今天证明了他正确的判断。

《政论选集》的第一篇〈谨向全马华人进一言〉写于 1959 年 8 月 1 日，劝马来亚华人投票支持华巫联盟，保持马来亚的和平安定。根据李星可的叙述，当时马来亚正举行大选，这篇当时以胡蛟署名，因为对当时以内阁总理东姑为首的选举大有帮助，也使得星洲日报得以在马来亚发展。⁷³⁹

⁷³⁵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7、57、58，《政论选集》篇 155。

⁷³⁶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10。

⁷³⁷ 李光耀《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2011），页 50。

⁷³⁸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55、56、69、87、88、97、127、138、140、142、162、163、164、165。有关反驳中峇鲁议员李德欣的社论写于 1961 年 12 月 5 日，见篇 88。

⁷³⁹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2。

到了 1965 年，新加坡能不能独立求存的课题再度出现。在《政论新集》中李星可举出国小但昌隆的先例，如古代的腓尼基，中古时代的威尼斯，现代的瑞士。新加坡可能成为它们的貂尾之续，原因有二。其一是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经济贸易，其二是从历史的角度，目前香港有如东南亚的瑞士，但在国际政治上不如新加坡。因此如新加坡力争上游，有可能与香港平分秋色，甚至取代香港。⁷⁴⁰ 同样的，经过了 50 多年，新加坡的繁荣和稳定，在许多方面还胜于香港，证明了李星可的远见。

1963 年至 1965 年新加坡经历了新马合并然后分家，《政论新集》中有关新加坡生存和前途的议题一再出现。⁷⁴¹ 尤其是对分家后新加坡前途的肯定。他于 1965 年 8 月 10 日即分家的第二天及接下来的几天，连续报道 8 月 9 日新马协议分家，新加坡成为独立国的生存与前途，阐明两年前的合并与现今的分道扬镳都是为了两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将来两地的关系也应继续友好合作。这样的报道对面对当时突如其来的变动的两地政府和人民都是正面的鼓励，有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国外舆论担心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占大多数，可能成为东南亚的古巴，中国的俘虏。李星可认为首先，新加坡不像当年古巴的贫乏。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其实是后者的损失。其次，新加坡在外交上将采取不结盟政策的中立立场。唯一的优先考量是维护马来西亚这近亲毗邻国家的利益。他进而建议新加坡能独立求存，应在‘天时’‘地利’的基础上，加上‘人和’的五项基本原则：（1）善与邻邦，外交中立，（2）工商并重，经济自由，（3）福利社会，安定政局，（4）选贤任能，唯才是用，（5）开放言路，彻底民主。1967 年，在新加坡独立两年后，削减英军数目与军事设备的问题再度出现。因为一向有英军的驻守，英军的撤退前对国家的内部治安和外在防务须有时间安排填补空缺，英军的撤退也会带走国家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但李星可自信地认为英军的撤退对社会一定有影响，但不至于影响新加坡的前途。不论英军是否撤退，只要新加坡实行这三大原则：（1）建立在国际性和平秩序之上，无保留的善邻政策及绝对的政治中立；（2）内部绝对民主；（3）施行自由经济，不能严格统制经济，那么 50 年甚至 5 百年后都一定能独立生存。⁷⁴²

⁷⁴⁰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16，写于 1965 年 8 月 16 日。

⁷⁴¹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13、14、16、17、23、64、77。

⁷⁴²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2；《政论新集》篇 77。

到了 1968 年，英军的撤退的问题还不能解决。在《政论新集》中，李星可纠正一些人认为新加坡争取英军延迟撤退是为了英军在新加坡基地的开销占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的看法，指出新加坡担心的是这个地区的安全问题，这地区也还没有一个国际安全公约的合作机构，维持这地区的势力平衡。在有些关英军撤退的文章里，李星可旁征博引，分析英美过去和当下的经济状况，已是盛极而衰，而新加坡唯一的生存之道是自力更生。⁷⁴³

在东南亚华人常被冠以中共的第五纵队的标签，⁷⁴⁴ 新加坡可能成为第三中国或南中国海中的‘新古巴’，⁷⁴⁵ 以及因为新加坡华人众多而被当成是中国一部分的议论，⁷⁴⁶ 李星可一再指出其错误，以及这样的标签将造成的种族问题，甚至排华行动以及国际间对新加坡的猜疑和打压。

治国

治国的内容包括内政。内政和治国的课题很多样化，从人口问题⁷⁴⁷ 到当时的政局（如行动党的内部斗争、芳林和安顺区的补选、工潮、劳资纠纷）⁷⁴⁸，到对新政府新国会的期待。⁷⁴⁹ 对新国会的基本期待他总结为三个重点：（1）其命维新、有所作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2）议员走向民间，当仁不让，成为人民的声音；（3）国会议员以身作则。由于 1968 年的选举行动党独赢，易润堂在一次庆祝会上致辞，新加坡的民间团体即可作为反对党，反映民意。⁷⁵⁰ 李星可一向鼓励人民参政、或投票表明民意与立场、或发表意见反映事实。⁷⁵¹ 为鼓励人民参政，他曾引用星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的演讲，鼓励人民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许多亚洲新兴国家把民主与国会等量齐观。政府有了民选国会，便认为人民已付于无条件的委托，可以为所欲为。这样背叛了民

⁷⁴³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33、34、36、61、62、65、79、84。

⁷⁴⁴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9、24、36。

⁷⁴⁵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21。

⁷⁴⁶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61。

⁷⁴⁷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4，29。

⁷⁴⁸ 有关行动党的内部斗争，见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70 及 71；补选的议题，见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49、50、51、52、54、57、58、64、65、66；工潮见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84、90、91、117。

⁷⁴⁹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71、72、73。

⁷⁵⁰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72。

⁷⁵¹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20、39，《政论选集》篇 86、100、101、129、165。

主的国家，人民也难辞其咎，因为他们认为参与投票选举便已足够，不再过问国事。接着国家便会陷入混乱和独裁。要防止这样的社会病癌，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人民积极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⁷⁵² 在支持易润堂发言新加坡的民间团体即可作为反对党的社论中，李星可进一步提出国会能否代表民意的先决条件：（1）政府为政不在多言，应少说话多做事，（2）为鼓励人民多言，应广开言路，扩大言论自由的基础，（3）执政当局应放开胸襟，纳听人言。⁷⁵³ 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不止一次提出扩大言论自由的呼声。在经济课题上谈到新加坡达成重整旗鼓致力繁荣的目标的四个前提条件中，彻底尊重言论自由就是其中一项。言论自由关系外地和本地资本是否乐意投资于他们能发表意见的地方，因此与经济发展有关。⁷⁵⁴

经济

新加坡的经济状况与政治息息相关。写于 1959 至 1963 年，从自治到成为马来西亚一份子的前夕的《政论选集》，反映了在内外政治不安的环境下对新加坡经济前途的担忧，但仍然对新加坡的工商业的前景、包括旅游业、海事工业、炼油业充满信心，强调新加坡的地理优势，只要劳资合作、社会稳定，外国投资必定纷至沓来。⁷⁵⁵ 写于 1963 年末至 1967 年中的《政论新集》仍强调在内外政局安定的前提下，应工商并重，施行自由经济，不能严格统制经济。特别是在新马分家后，呼吁新加坡重整旗鼓致力繁荣有四个前提条件：（1）恢复自由港口地位，（2）解除经济活动的人为羁绊，（3）竭尽一切所能，大力吸取游资，（4）彻底尊重言论自由。因为外地和本地资本将乐意投资于他们能发表意见的地方，他进一步详细的指出找寻经济的出路有两个方向：同时努力发展工业和争取国外市场，并以相关的制度支持，如所得随率、汇兑便利、移民限制等。不变的前提是‘尽其在我’。⁷⁵⁶ 到了 1967 及 1968 年，《政论近集》里的经济课题仍然与工商业有关，不过这时多谈论建立制度、签署协定以保护及扩展工商业及海洋事业，以不结盟政策的政治立场与多国建立友好关系。⁷⁵⁷

⁷⁵²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39。

⁷⁵³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72。

⁷⁵⁴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19。

⁷⁵⁵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6、13、35、36、63、68、77、91、96、102、106、111、112、132、133。

⁷⁵⁶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15、17、19、23、77。

⁷⁵⁷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6、7、9、14、18、45、48、52、54。

民生

李星可多方为不同的弱势群体与低层人民发声请命。1965 年新加坡独立后就新加坡国会最新通过的两项新法案《国民登记法案》与《就业条例法案》发表看法。居民须有出生证申请成为公民，但当时仍有许多人拥有没有姓名的出生证。社论认为政府不应为了少数假冒者而使大多数无姓名的出生证持有者遭受池鱼之殃。希望政府提出具体方法，尽量不使无辜人民受累。就《就业条例法案》，他也质疑低收入的非新加坡公民申请工作准证的必要与相关细节。主张无条件颁发准证于在新马分家前已在新加坡工作或寻职者。⁷⁵⁸ 新马分家后，未取得居留地公民权，而长期居留两地的公民的生活及子女教育问题因新马突然分家受到影响。他主张“凡大马公民已在星加坡或者马来亚住居若干年限以上者，只要经过申请登记，应该马上自动成为星加坡或者大马的本地公民”。⁷⁵⁹ 在上一篇他提出无姓名的出生证持有者申请者的困境后，他重提在本地出生，然却在出生纸上无登记姓名的‘无国籍公民’的问题。质询政府承诺使无辜人民不致受到不应有的不便，究已如何兑现，⁷⁶⁰ 他再三以情以理，提出建议为这类群体请命。这类群体曾在 1948 年被登记承认，1957 年被豁免登记，曾经参加过多次大选投票。却现在需要申请登记，否则将成为无国籍的浪人，比外国人还不如。他建议政府设立一个特殊委员会处理这问题，以及与伦敦磋商如何解决，因为这些人在 1948 年曾被登记承认为英籍（British Subject），伦敦当局不能对他们的国籍置若罔闻。⁷⁶¹ 直到 1967 年中，他又以一宗因新马分家后无国籍，也因无法申请工作准证而失业，为此自杀的事件殷请当局反省新马关系，再提出建议解决人民的切身问题。⁷⁶² 与此有连带关系的外侨工作准证、雇佣法令他也一一关注。提出具体建议。⁷⁶³

除此之外，他也为德士及霸王车请命、⁷⁶⁴ 为典当业者诉苦，⁷⁶⁵ 告诉执政者因物价波动与上涨、⁷⁶⁶ 银行利率提高、⁷⁶⁷ 汽油起价、⁷⁶⁸ 脚踏车零件供应⁷⁶⁹ 对消费者民生造成的影响。

⁷⁵⁸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25、27。

⁷⁵⁹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32。

⁷⁶⁰ 同上。

⁷⁶¹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34。

⁷⁶²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83。

⁷⁶³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69、77、78。

⁷⁶⁴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36、76。

⁷⁶⁵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3。

对汽油起价，他连续写了 7 篇。提出理由及具体建议坚决反对汽油起价，因为汽油起价‘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其他货品起价的影响更大。在交通业方面除了汽油起价，他也关注脚踏车零件供应的问题，不止因为脚踏车是一般市民的交通工具，脚踏车零件的供应还关系到扶助本地制造业的经济发展。

李星可在民生课题上谈得很细。除了大的课题，他也关注柴米油盐的课题，并将他们与发展本地工业的重要性联系起来。当时新加坡的入口统制官署通告实行调味粉固打制，为了扶植本地工业而限制外地输入，李星可提出三个当局应考虑的问题：（1）本地消费者的利益，（2）原有外货输入者的利益及（3）输入限制施行后的后果，并建议成立一个专司责成的部门，处理有关这限制的意见及商人与消费者的申诉。⁷⁷⁰同样的，当时的政府于 1967 年 1 月 31 日宣布，罐头食品入口必须领取准证，使外汇不轻易流失，使鱼肉果菜不被罐头食品取代。社论指出罐头食品是人民主要食品之一，这措施将影响人民生活指数，特别是低薪阶层。不应该为了少数当地几家罐头工厂而影响民生。⁷⁷¹谈到物价的时候，他认为应该以物品的质和量来制定标准，如酱油的咸度（质）一盒火柴的数量（量）都加以计算，否则细琐的疏忽会促使物价波动，进而造成社会不安。⁷⁷²他对谈论的课题往往做足了功课，再如“银行不应藉口英镑贬值提高利率”社论中对英国、加拿大、日本、瑞典、美国、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瑞士与西德的银行利率一一列出，指出这些国家的利率都低于新加坡。当时新加坡银行利率是百分之十，甚至比英国还要高出百分之二。⁷⁷³这些细节的挖掘，不厌其烦的凭事实与数据说服当事者，显示李星可对本地人民认真实在的爱护与关切。

文化

李星可积极推动新马的文化事业，他本身热爱戏剧，特别是京剧，因此欢迎国家剧场的建设并对其设计提出具体建议。他提出剧场的设备需考虑三方面：舞台、演员与观

⁷⁶⁶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8、20。

⁷⁶⁷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50、56、58。

⁷⁶⁸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5、11、12、23、25、28、29。

⁷⁶⁹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37、38。

⁷⁷⁰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31。

⁷⁷¹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69。

⁷⁷²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20。

⁷⁷³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50。

众。他还考虑到在新加坡，观众群包括四大种族，剧场设计要配合各种族的需要。同时，在舞台剧以外，也希望剧场能适合音乐演奏。除了硬体设施，他同时主张国家能设立音乐、舞蹈、戏剧的专校训练艺术人才及培养专业主持人，才能提升并延续本地的文化事业。⁷⁷⁴ 电视和电台广播是两个除了提供资讯的平台外的文娱管道。李星可认为它们应多播本地节目及发挥教育民众的作用。⁷⁷⁵ 对于当时筹组的国家语文局，李星可建议它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熔铸崭新的国家文化的过程中，有计划地鼓励写作及出版当地各语文的创作。⁷⁷⁶ 他为出版事业的缺失和疲滞感到失望，希望书刊发展理事会的成立能带来新的气象。⁷⁷⁷ 他欢迎放宽文化资料的限制，但亦同时建议划一尺度，平等对待各种语文的资料、加速审查的速度、提供复查上诉的管道及避免中途撤销已通过的资料。⁷⁷⁸ 在推动文艺的同时，李星可不忘照顾文艺工作者的生活。他呼吁提高及厘定稿酬，立法保护出版版权。⁷⁷⁹ 在 1960 年响应当时文化部政务次长李炯才讨论马来亚艺术的创造和发展时，他再度强调培育马来亚艺术工匠须有专门的美术、音乐、舞蹈及戏剧学校。除此之外还须有国家美术馆展示及鼓励艺术创作。同样的，他接着呼吁政府照顾艺术工作者的生活，因为只有政府能鼓励及扶持，爱好艺术的社会风气才能形成。⁷⁸⁰ 七年后于 1967 年当艺术理事会会长李炯才筹款建立国家艺术学院及美术馆的时候，李星可分享李炯才的喜悦，再度肯定建设新加坡文学艺术的重要性。⁷⁸¹ 国家图书馆是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设施，李星可认为新的国家图书馆应有明确的政策，同时照顾学术和通俗的需要，也应该在政策上纠正华文书籍不足的情况。⁷⁸² 李星可在维护母族文化的同时，也多次鼓励各源流文化的交流。他同意当时国家剧场信托委员会主席吴宝星医生的看法，表面上的文化混合如华族女子穿着印度服装，配合西方音乐跳马来舞，只是形式上肤浅或表面的混合。要真正的交流必须摒除语言的隔阂，通过多种语文的学习，促使各源流文化百鸟争鸣、百花齐放。他还提出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排斥‘移种的花朵’。‘只有在本地生长的新一代才能真正在本地生根’

⁷⁷⁴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3、17、45。

⁷⁷⁵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1、22、25。

⁷⁷⁶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2。

⁷⁷⁷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4；《政论选集》篇 12。

⁷⁷⁸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78。

⁷⁷⁹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8、12。

⁷⁸⁰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6。

⁷⁸¹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53。

⁷⁸²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26。

的观点是错误的。⁷⁸³ 新加坡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更要有独立的民族性、真正的‘硬骨头’。民族性可通过文化艺术来塑造，‘硬骨头’里所坚持的‘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甚至‘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这些华族传统节操也该立为新一代、新社会的目标。⁷⁸⁴

综论上述，李星可的社论课题从政治外交到治国民生，从文化建设到经济发展，从小学到大专教育；从大处如国家前途、民族性，到细微处如调味粉固打制、罐头食品准证，无一不见其敏锐的观察和认真的态度。他对课题往往做足功课，而且对大部分的议题都提出具体建议，或建议设立工作委员会解决问题，而且往往引用政要或曾经写过的社论来加强论点。在众多的议题中，不论从篇数或内容而论，他最关注的是华文教育。有许多和华文教育不直接相关的话题，峰回路转，最后还是与母语教育的必要性有关连。如在新马合并的课题上，语言的使用是合并前应达到共识的重点，⁷⁸⁵对‘新年的愿望’，其中一个愿望是理想的教育。他的理想教育是各源流教育平等，而平等的意义在于教学媒介语‘应以建立所在的居民语言为准’。⁷⁸⁶谈到人民作为新加坡的资源，在‘人无弃才’的前提下，应‘唯才是用’，去除英语之上的观念，不能使语言成为选才的藩篱。⁷⁸⁷

创作

在社论里李星可积极推动新马艺术的成长，对国家剧场的设计提供建议，呼吁成立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专校，充实国家图书馆的华文书籍，并希望当局照顾艺术工作者的生活，在为塑造新加坡的文艺而努力。他也关注新加坡社会状况，一般人民的生活，李星可在社论中评论许多民生问题，对柴米油盐的课题写得很细，不时为穷人请命。文学创作中则以文学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人们的生活困境以及他的人生哲学和思考。通过文学创作，他同样表达了对新加坡的关心。他除了用真名发表作品

⁷⁸³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5。

⁷⁸⁴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47、39。

⁷⁸⁵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87、97、101。

⁷⁸⁶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52。

⁷⁸⁷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53。

外，也用笔名康吉父、蒂若、赵瑞写作。⁷⁸⁸ 赵戎对李星可的剧本创作有很高的评价。他将李星可与南来的戏剧家吴天和夏衍相比，认为他们在以新马题材的创作上，都不及李星可：

“李氏则除了几个历史剧外，都是取材于当地的，所以李氏的创作在马华文坛上是一份重要的果实，他是以马华文艺家的身份而实践的。虽然，一个马华作家不一定要写当地题材，不过我们须知马华文艺的建立及其现在情况，——当马华文艺正在踏出自己的路来，正在负起时代任务发掘当地题材的时候，那么反映当地现实的作品底重要性是不难明白的。而且，在文艺领域里——如小说诗歌散文等——都深具有马来亚气派，作风和内容，唯剧本创作上稍嫌落后，所以，李氏为马华文艺创作这么多的当地题材的剧本，是值得喝彩和赞美的。”⁷⁸⁹

日治过后，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另一波的混乱之中。《政论选集》谈到马来亚在 1948 年 6 月 17 日开始实施的‘紧急行动’于 1960 年 7 月 31 日正式结束。⁷⁹⁰ 日军撤退后英政府重新掌握政权，左倾的抗日军逃入森林，以游击战术和英殖民政府对抗。英殖民政府迫使约 50 万乡村地区的居民，由丛林边缘的棚屋区迁移到不同地区的新村，于新村周遭设置铁丝藩篱，设立规条，限制行动，以利于控制。〈借沙笼〉（仿河南坠子）写的就是英殖民政府设立新村的目地：英军 “追剿既然难生效，剿匪不如先清乡。匪区一律要封锁，四周新村遭了殃。政府派来运送队，男女老幼车上装。风驰电掣车开去，一开开入铁丝网。铁丝网内是新村，新村家家要开荒。” 以及新村里华人的生活：“紧急法令限制严，未出村门先搜身，带水不能充肚饿，带吃就要犯规条。饥肠辘辘肠为断，汗水淋淋舌头焦。艳阳当空不容情，赤道阳光似火烧。日曝风吹无处躲，回程月亮上星梢。而且村中一发生事故，便实行戒严，没有‘准字’，行动即是犯法。

⁷⁹¹

在新村以外居住的人日子也不好过。出版于 1957 年的广播剧〈桥上〉和 1958 年的独幕剧〈独立桥〉写人们在生活的压迫下，对和自己一样穷的人也不放过。⁷⁹² 广播剧〈桥上〉

⁷⁸⁸ 《李星可资料夹》（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

⁷⁸⁹ 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99-100。

⁷⁹⁰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31。

⁷⁹¹ 〈借沙笼〉（仿河南坠子）收于《桥上》（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页 3-12。

⁷⁹² 〈桥上〉（广播剧本）收于以《桥上》为名的著作内。除了此剧外，《桥上》还包括〈母亲〉（译诗）、〈借沙笼〉（仿河南坠子）、〈生财之道〉（仿北京对口相声）、〈大众顾问〉（独幕剧）（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桥上》所收〈桥上〉（广播剧本）与《绿洲》所收〈桥上〉（广播剧）为同一剧；

和独幕剧〈独立桥〉内容相同，只是表现形式有些差异，都是写一个想寻死的失业教员在一座桥上碰见了一个女扒手，教员对她说了很多生活的苦楚——家中妻儿全靠他生活、现在又因生病而失业、没钱医治。女扒手比较‘乐观’的开导他，却假装跳河自杀将他的钱扒走。一个流氓跑过来，在知道教员的钱已被扒走后，还下手把他仅剩的表和笔也扒走。通过他们的对话，作者有意表达了他对这社会的讥讽。在教员和扒手之间，作者选择通过扒手说出他的人生‘哲理’。他认为事情都有两面性，正经人自以为聪明，看得明白，其实他们才是糊涂人。他们拒绝作不正经的事，他们的世界就越变越小，而不正经的人的活动更自由了。同样的，愈是糊涂的人愈聪明，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睁开眼睛，所以什么都是光明的。教员以为他的世界是黑暗的，只有星星一点点的亮光，女扒手却认为黑暗和光明都属于她，因为光明借着黑暗出现，如果没有黑暗，点点星光也显不出来。教员以为他有学问，最后他的钱却被女扒手以及一个假装同情他的流氓扒走。因此正反两面不一定对立；“愚者”可能是“智者”，反之亦然。

写于 1957 年的独幕剧〈荒岛〉是另一篇以视角决定事物的正面或反面的剧本。⁷⁹³通过在摩鹿加群岛中的一个荒岛上，甲乙丙三个日本兵的对话及所发生的事件，说出他对战争、对人类文明的看法。不是每个日本兵都是残暴的好战者，被迫征兵而来的日本兵甲反对杀生、反对暴力、反对战争。他认为文化的起点在理智。人类和禽兽的分别在于人类能以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欲。人是高等动物，应以理智解决争端。如单凭武力，便与禽兽无异。就整个人类而言，愈能控制自己便是愈文明。日本兵乙相反，是日本‘大东亚文明’的拥护者。他认为作战的目标是为了拥护‘大东亚文明’，是不能避免的，所以打仗也是文化。不过最后他被没有文化的野兽—老虎咬死，是李星可对日本‘大东亚文明’侵略者宣告的立场。更具讽刺性的是他借着日本兵丙的看法对人类的当头棒喝。日本兵丙认为野兽才是文明的，他们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伤害人，不像人类，不但随时伤人，还预谋伤人。野兽打杀是以武士道精神公平决斗，不像人类不择手段，甚至大规模屠杀，所以人类还不如野兽。

与《报穷》所收〈独立桥〉（独幕 PARADOX）内容相同，只因一为广播剧一为舞台剧，在形式上稍有差异。〈独立桥〉（独幕 PARADOX）是李星可到马来亚后发表的第一个戏剧剧本（见《十八年后归去来》（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页 98）。李星可一些作品收于不同版本，本论文注明版本以参页数。

⁷⁹³ 〈荒岛〉收于独幕剧选《绿洲》（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1），页 31-41。

另一以讽刺性的手法反映社会现实的剧本是独幕剧〈月饼〉。⁷⁹⁴ 剧中的父亲身为父亲却不负责任，带着两个年少的兄弟靠女儿当舞女生活。当舞女的女儿虽陪舞陪笑却坚持不卖身。两个弟弟中的一个在学校因衣服肮脏而被同学取笑，而老师不但怂恿学生取笑他，还给他处罚。读书是改善生活的途径，但穷孩子却因家境，甚至学校本身被拒于校门之外。那两个年少的兄弟，认为姐姐因为读了英文，就能赚钱、穿漂亮的衣服，却不知道她所受的屈辱。这剧本反映了社会现实，更抨击人们崇尚英文的态度。

三幕剧〈报穷〉⁷⁹⁵ 以新加坡当时不安的社会环境 - 学潮、工潮为背景，不但通过一个‘头家’从富有到即将报穷的困境反映商界的竞争与黑暗，也指出受华文教育与英文教育者思想、价值观与行为上的差异。在这个家庭里，除了一个受华文教育的儿子外，其他人，包括妻子及其他子女，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受英文教育的女儿坦言不喜欢华人，要到澳洲居住。所喜欢的洋人对象以分得其父的产业为结婚条件，她却视为当然。受英文教育者认为共党即将到来，而受华文教育的儿子不希冀父亲的钱财，却想回归中国。

〈大众顾问〉（独幕剧）⁷⁹⁶ 通过有如今日咨询公司的‘大众顾问’给予的意见，描绘南洋的社会面貌，讽刺南洋社会的怪现象，比如富商希望有人上门募捐，以充场面、出风头，但又不想真正出钱。有钱人为侨领，而做不成侨领的人可以做沟通人际关系的桥梁。做桥梁也是一种赚到饭吃的职业。李星可还通过商人娶多位姨太太为的是替他管理产业的描绘，反映南洋社会对女性的蔑视及女性的附属地位。

日治后社会的不安以及身份地位的急速更替也呈现在他的三幕喜剧〈快艇〉里。⁷⁹⁷ 〈快艇〉以日治后，商业萧条，工潮屡屡，社会不安为背景，对富人穷人更替，日治时的富人在日治后换人，苦力还成为头家的现象加以戏剧化的讽刺。〈快艇〉中的商人就是一个例子，他从富有到败落，从雇主变为雇佣，从别墅屋主成为寄人篱下的可怜虫。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商人空置别墅以充场面，争取信用，沽名钓誉，借着与文艺界

⁷⁹⁴ 收于李星可《报穷》（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页 21-35。

⁷⁹⁵ 同上，页 37-104。

⁷⁹⁶ 收于李星可《桥上》（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页 37-60。

⁷⁹⁷ 李星可《快艇》（南方文丛）（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1-82。2005 年版为重印版。首版为 1960 年。无个别剧目日期。

的往来提高自己身份。有的商人以不正当的途径，以损人利己的方式发财 – 走私、贩卖鸦片、包赌、包娼，被揭发后逃之夭夭。暴发的穷人因攀附富人但自己无真本事，最终还是被富人利用了。

不能把表面现象认定为事实的真相是李星可不断要传达的思想。在商场如此，教育界如此，在报社、艺坛上也一样。五幕喜剧〈钓金龟〉⁷⁹⁸ 通过一个画家想利用他的女儿钓金龟，在对白里说出作者的看法：“在星加坡靠文字吃饭比当汽车司机更没出息”。在报社，办报的老板目的是赚钱。编辑也染上一身铜臭。投稿人要对编辑登门拜谒，有时还要看嘴脸。或除非受编辑邀稿，否则投稿卖文章往往迟迟不得刊登，甚至当成废纸。在艺坛上，卖画要靠有钱人捧场。因此画家也要识时务，并且要跟得上潮流。画作是艺术品，但有许多看画、买画的人目的是附庸风雅，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形象。李星可在报社多年，也出版著作、参与文艺界的活动，他得出的结论是文化界的悲哀。

独幕剧〈绿洲〉⁷⁹⁹ 不但反映教育界、文艺界的现象，也影射自己曾被打压。题目〈绿洲〉表面上描写星洲是文化绿洲，其实要表达的相反，星洲是文化沙漠。‘文化人’ 参加聚餐，参与者每人有不同目的，但都希望从中得到好处。他们主张组织一个文化协会，因为有了组织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地位，才能定出自己的标准。‘文化’就是随机应变，入乡随俗，所以标准可以由他们决定。他们认为艺术要靠团结吹捧，靠侨领提携。文化协会邀请大富商当名誉会长，是想藉他的社会关系筹钱和提高知名度。有许多大商家都没有好的学历，因此虽然学而优则仕，但‘学而不优则博士硕士’，‘留洋镀金是专门为了招摇撞骗吓唬人的’，并映射‘洋博士’林语堂以高薪聘请教师，不如商人‘土博士’⁸⁰⁰。李星可也通过这些文化人的对话，影射自己被人打压，因为他认为星洲是文化沙漠，连个合乎理想的剧场戏台都没有，还有他主张讲标准华语，被人认为他有政治目的，不是亲共便是亲国民党，因此不被这些‘文化人’认同。

他对社会的批判和讥讽反映了他对社会、对人民的关切，以及作为新加坡华人对居留国的期望。在《桥上》1957 的〈自序〉里，他自言在南洋已经住了十五六年。战前是南

⁷⁹⁸ 收于《快艇》（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83-156。

⁷⁹⁹ 收于李星可《绿洲》（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1），页 71-94。

⁸⁰⁰ 李星可《绿洲》（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1），页 86-87。

洋华侨的过路之宾，现在已经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份子。不过由于性格的关系，他‘永远好像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捕捉到了‘乍生乍熟的精彩镜头’。作为海外华人，他主张‘民族形式，地方内容’。因此在《桥上》这集子里，他收录了译诗〈母亲〉，仿河南坠子〈借沙笼〉，仿北京对口相声〈生财之道〉，广播剧本〈桥上〉，和独幕剧〈大众顾问〉，以不同的形式，写南洋生活的见闻和感受，也希望以不同的形式，抛砖引玉，让南洋的文艺工作者考虑创造新的文艺道路。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他写的最多的是剧本。包括广播剧（〈桥上〉）、独幕剧（〈大众顾问〉、〈月饼〉、〈鬼〉、〈荒岛〉、〈绿洲〉）、⁸⁰¹两幕剧（〈绑票〉）、⁸⁰²三幕剧（〈报穷〉、〈快艇〉）、五幕剧（〈钓金龟〉）⁸⁰³和哑剧（〈赌徒〉、〈哲学家〉、〈割胶〉、〈降头〉、〈梦〉）⁸⁰⁴，这和他对戏剧的热爱有关。王赓武也认为李星可是两位‘最出色的剧作人’之一：“新加坡也有几齣好的戏剧创作，但出现得较晚。最出色的剧作人有两位，一位是李星可，他虽在中国已是剧作的老手，但也很快的投入了马来亚的戏剧创作中。”⁸⁰⁵除了以创作形式呈现他的戏剧功力，他也曾写了三本有关戏剧的专论，《我谈京戏》⁸⁰⁶《怎样欣赏中国戏》⁸⁰⁷、《南洋与中国戏》⁸⁰⁸以及一篇文章〈谈谈哑剧〉，⁸⁰⁹还给《中国现代独幕剧选》作选注，⁸¹⁰并在南大教授‘中国戏剧史’。他也将自己对戏剧的喜爱，用在他最关心的华文教育中。他不但以戏剧的形式，描绘中英文教育者价值观的差异及英文教育的经济价值，⁸¹¹还曾发动新马平社（新加坡、檳城、柔佛平社）于1953年7月25-27日为南洋大学

⁸⁰¹ 独幕剧〈大众顾问〉收于《桥上》（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页37-60；〈月饼〉收于《报穷》（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页21-35；〈鬼〉、〈荒岛〉、〈绿洲〉收于《绿洲》（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1），页19-41，71-94。

⁸⁰² 收于李星可《快艇》（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157-196。

⁸⁰³ 李星可《快艇》（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

⁸⁰⁴ 收于李星可《绿洲》（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1），页99-120。

⁸⁰⁵ 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pp. 281-287. 王赓武提到另一位出色的剧作人是林晨。

⁸⁰⁶ 李星可《我谈京戏》（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55）。

⁸⁰⁷ 李星可《怎样欣赏中国戏》（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

⁸⁰⁸ 李星可《南洋与中国戏》（新加坡：南洋学会，1962）。在序言中，连士升认为李星可不但在理论上谈原则，可贵的是他能举实例说明。难能可贵的是他把中国戏剧的姻缘牵连到南洋：“在时间上，他把中国戏剧的源流远溯到春秋、战国。他把中国戏剧的姻缘牵连到南洋，尤其印度、扶南、印尼、马来西亚。‘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贾谊这两句话，用在学术的发展上，倒相当恰当。”（页2）。

⁸⁰⁹ 收于李星可《绿洲》（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1），页95-97。

⁸¹⁰ 歐陽予倩等著，李星可選註《中国现代独幕剧选》（香港：宏智书局，1966）。

⁸¹¹ 李星可〈报穷〉，《报穷》（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页37-101；李星可〈月饼〉，《报穷》（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页21-35。

筹款义演京剧，李星可妻宁荣萱挑大梁，筹得叻币二十七万元。⁸¹² 这种种都反映了他对中国及南洋的感情。他希望为南洋，或更具体一些，对新马的文化建设贡献学识，也通过推动京剧的具体呈现，为华文教育、为海外华人出一份力。因此他不止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第三者，更是一个置身事内的局中人。

虽然李星可写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剧本，1988 年他自言除了〈独立桥〉外，没有其他的剧本上演。⁸¹³ 他认为基本原因是“因为‘派系之争’，以及当权派对出版和发行的垄断，没等到伟大作品的出现，已经先把不少作者与著作一律活埋，一笔勾销。”⁸¹⁴ 在他的作品里所提到的文艺界怪现象，自然影响文艺的发展。⁸¹⁵ 李星可曾在社论中多次提到对出版事业的疲滞感到失望，但积极提出有计划出版各语文学创作的具体建议。⁸¹⁶ 他的建议包括了不只是华文的出版事业，而是各语文源流。他认为新加坡社会的一个亟待克服的严重缺陷是华巫印英四大语文源流几乎是‘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虽然休戚相关，却不互通声气，有如四大隔离的社会。⁸¹⁷ 因此他不但主张华人团结，以保持自己的地位，在更大的层面上他主张‘华巫团结’、‘全民大团结’，因为这样才能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稳定。⁸¹⁸ 他的社论和创作，都直接或间接的积极表示了对新加坡的关切。

“李星可的一生多姿多彩，也多灾多难。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位有才华的长辈”⁸¹⁹ 这句话说的不错，但还未说尽李星可的特色。读过他文章的人都会一致认为他敢怒敢言，且得理不饶人，辞锋犀利。不过他之所以有激烈的反应，是因为他爱之深、责之切。在语文及华文教育的课题上他尤其不妥协。关于标准华语，他和史马辩论‘儿’音的问题；关于华文教育，他不但在每个社论集子中都谈论，而且

⁸¹²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82-84。

⁸¹³ 李星可〈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自言“十年以来，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式：长的，短的；现实的，超现实的；舞台剧、广播剧、哑剧、电影剧；样式的，或者中国式的民谣与相声……大大小小，已经发表的大约二十余种。可是，没有人上演。”《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94-95。

⁸¹⁴ 李星可〈从《新社》想起南洋文艺问题〉，《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93。

⁸¹⁵ 李星可〈快艇〉、〈钓金龟〉，皆收于《快艇》、〈绿洲〉，收于《绿洲》。

⁸¹⁶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4；《政论选集》篇 8、12。

⁸¹⁷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4。

⁸¹⁸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85。

⁸¹⁹ 区如柏《云南园里的李星可》（新加坡联合早报 2013 年 10 月 21 日发表），见早报网

<https://www.zaobao.com.sg/social/crossroads/leisure/story20131021-266932>，阅览日期：26.6.2019.

不惜与教育部、华校教师总会、华文中学教师会针锋相对，并与商报打笔战，⁸²⁰对南大的学位，他努力为之争取，对有辱中文报业记者的南大校外考委也言辞激烈地代表中文报业记者要他“滚回你的美国‘老家’去”。⁸²¹他的认真和细腻之处也在他的社论和创作中呈现，几乎每一篇社论都有具体的建议，或者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讨论和解决问题，有许多文章对世界各国的情况都做了比较分析。他比较了 11 个国家的银行利率，指出这些国家的利率都高于新加坡，⁸²²在民生的课题上，从调味粉的固打制谈到关税保护，⁸²³从罐头食品的入口准证谈到生活指数，⁸²⁴从铁钉缺乏说到工商业均衡失调，⁸²⁵都是以小见大的例子。

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李星可所喜欢的名句，他更珍藏一枚刻上‘寸心千古’的图章。⁸²⁶李星可在他社论和创作里展现的理想与才华，引领了读者和社会，也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和家庭的变故，⁸²⁷但在他晚年手腕不灵的时候，还孜孜不倦，‘不肯将衰朽借残年’，用电脑写作。⁸²⁸他的文章所给他带来的得失荣辱，都藏于他亘古不变的寸心中。

第二节 连士升：‘南洋文化的远景’⁸²⁹

连士升的作品主要有 5 大类：社评、书简、传记、游记及日记。连士升的社评主要收集于《慧眼静观》和《卓识思远》两本集子中。《慧眼静观》包括国际和新马时事、经济建设、教育和文化艺术。《卓识思远》则专注于文化与教育，特别是有关新马的

⁸²⁰ 李星可《政论选集》中的 12 篇：123、124、135、137、143、144、145、146、147、148、154、160。都直接评论华校的上课天数。

⁸²¹ 李星可《政论近集》，页 131-133。

⁸²²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50。

⁸²³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31。

⁸²⁴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69。

⁸²⁵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45。

⁸²⁶ 李星可《政论选集外篇：十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远景》，页 2。

⁸²⁷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43。

⁸²⁸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44、186。

⁸²⁹ 取自连士升〈南洋文化的远景〉《连士升文集第二卷闲人杂记》，页 233。

课题。⁸³⁰他的 4 集《海滨寄简》以书信的方式，发表对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看法。⁸³¹他的传记写他所敬仰的人物——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等的思想与精神，他的游记如《名山胜水》，写世界名胜，也写中国和新加坡的风土人情。《祖国纪行》以日记体书写，揭露了中国的政局的混乱，官商营私舞弊、通货膨胀、贫富不均等现象，但他呼吁海外的万千华侨不要灰心，但要对中国“负起爱护、监督、指导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的权利”。⁸³²在他定居新加坡后，他关注新加坡的发展，在政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都提出诚恳的建议。从连士升的经历可看出他百折不挠的精神，从社评中可看出他有匡时救世的理想。

政治及社会议题

连士升的儿子连亮思记述连士升年轻时对改革社会，从事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兴趣，曾在他的纪念册上写下‘为民先锋’四个字，并希望儿子能如‘小彼得’，为他一偿夙愿，但是对着丑恶的政治以及言论的限制，他只好专心在治学与做人上下功夫。⁸³³他以所敬仰的中国历史人物——公孙桥（子产）、诸葛亮、王守仁（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与孙文为七位儿女中的六位命名，而这些历史人物的共通之处是他们都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他为么女取名萧思是为学习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萧伯纳是爱尔兰人，但主张的世界大同正是连士升的理想。因此虽然他不从政，但还是希望他的子女报效国家，实现世界大同的愿景；⁸³⁴虽然他不直接改革社会，他却以文字谏国，宣讲他的政治主张和理想。

⁸³⁰ 连士升著《慧眼静观——连士升社评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及连士升著《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各有 52 篇社评。《慧眼静观》写于 1949-1970 年，《卓识思远》写于 1949-1971 年。

⁸³¹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共五卷。第一卷包括〈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印度洋舟中〉。第二卷包括〈给新青年〉、〈闲人杂记〉、〈回首四十年〉、〈南行集〉。第三卷包括〈泰戈尔传〉、〈甘地传〉、〈尼赫鲁传〉、〈西方英雄谱〉。第四卷包括〈海滨寄简一〉、〈海滨寄简二〉、〈海滨寄简三〉、〈海滨寄简四〉。第五卷包括〈落霞集〉、〈孤鹜集〉、〈秋水集〉、〈长天集〉。五卷《海滨寄简》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1 年 9 月出版。

⁸³² 连士升〈自序〉，《祖国纪行》；〈后记〉，《祖国纪行》（南洋商报丛书）（新加坡：南洋商报，1948），页 130。

⁸³³ 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亮思、连文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南洋学会纪念文集第二集）（新加坡：南洋学会，1976），页 142-147；连士升〈大学脱离不了政治〉，《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00-102 也提及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1783 年时他获任首相，仅年 24 岁。时至今日，仍然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

⁸³⁴ 连士升女儿连文思告诉笔者，连士升在卡片上写了‘世界大同’四个大字，教连亮思长子伯伦认字。

1959 年新加坡刚成为自治邦，是成为独立国的前奏。写于 1960 年初的〈建立共同生活〉，就已开始呼吁外来人士做一个严肃的选择，成为公民或继续为侨民。选择成为公民者除了应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活动外，还必须承诺履行三个条件：不二的效忠、除母语外努力学习当地语文、以及与其他居民和衷共济。不二的效忠是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除母语外努力学习当地语文是与其他种族沟通的渠道，与其他居民和衷共济才能和睦相处，建立共同的文化与社会，促进国家的繁荣。

835

生活在南洋，就应该对南洋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华侨问题有所认识。他自述早在 1942 年当他在越南的时候，就想组织一个‘中南学会’，研究南洋和中国的关系。⁸³⁶ 1949 年他从欧洲考察回来之后，在〈文化的交流〉一文中，重提成立‘中南学会’，以新加坡为总部，再在南洋各地成立分会。他建议这学会进行三项主要工作：翻译和编纂、调查和研究、演讲和参观，达到中国与南洋文化交流，互相谅解的目标。⁸³⁷ 1956 年南大成立之初，连士升立刻提出南洋大学应负起研究南洋文化的使命，从各个角度，各部门，以科学的立场对南洋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他指出马来亚大学已经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出版了专题册子，也有杰出的研究马来亚花卉和地理的著作。南洋大学应奋起直追。⁸³⁸ 这篇文章发表后，南洋研究室随之成立。⁸³⁹ 然而 1958 年他慨叹他所憧憬的中南学会仍然是个空中楼阁。⁸⁴⁰ 当时法国和日本是两个研究中国与南洋问题的中心，作为南洋华人却要向他国请教自身的问题，他感到痛心。1958 年及 1959 年他再提出南洋大学作为一所大学，除了教授一般大学课程外，还要以南洋研究为中心，聘请专任研究员，充实设备，广置图书，实地调查。南大也将因南洋研究的成果

⁸³⁵ 连士升〈建立共同生活〉，《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1-13，写于 1960 年 1 月 4 日。

⁸³⁶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页 80，写于 1958 年 1 月 18 日。

⁸³⁷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南行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页 502-507。写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

⁸³⁸ 连士升〈南洋大学与南洋文化〉，《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60-62，写于 1956 年 11 月 10 日，然而未清楚说明南洋研究室是否附属于南洋大学。

⁸³⁹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一》，页 80。写于 1958 年 1 月 18 日。

⁸⁴⁰ 同上。

而提升其学术地位。⁸⁴¹ 当时华侨问题被视为中国问题的一部分。1960 年连士升提出南洋文人对华侨问题的研究比国内的学者有较深入的认识，但还是有许多缺点，如范围太窄、材料不够、孤陋寡闻。因此他主张研究中国问题的各方面，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过程及结果，以及问题与问题间的关系。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参与者应该放胆发言或质问，通过辩论深入了解问题。战前的日本对中国问题下过苦功，法国也对汉学颇有研究，战后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研究可见于他们的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出版。作为南洋的文人，更应该奋起直追。⁸⁴² 从 1942 年到 1960 年他一再强调南洋研究的重要性，可见他对中国和南洋关系的重视。他曾为李星可的《南洋与中国戏》写序，认为李星可对南洋与中国戏关系的研究很深入、很有价值。李星可所研究的唐代‘参军’一词源于扶南，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中国戏自有其来源，但其突飞猛进，却是受了罗唖戏的影响。有关南洋与中国戏的关系，李星可从古代叙述到现代，而且把中国戏剧的姻缘牵至南洋，尤其是印度、扶南、印尼、马来亚。⁸⁴³ 李星可对南洋与中国戏关系的深入研究，是南洋研究的一部分。连士升予以肯定是自然的。

连士升曾担任南洋学会会长近十年，通过演讲、出版书籍及筹款活动推动南洋研究及协助作家出版著作。他还曾为南洋学会的筹款而延迟就医。当时他患上心脏病，须即刻入院，然而他坚持筹募一笔捐款后才就医，一到医院即须输氧。在他的努力下，南洋学会从负债到有足够的会费资助出版，可见他对本地作家的爱护及对南洋研究的重视。⁸⁴⁴

连士升非常重视人才，无论是本地或外地人才，都鼓励政府提拔征聘。他主张提拔本地的决策人才。因为他们精通两三种语言，也熟悉本地的人情风俗。录取后给他们实际经验和培训，培养他们为接班人。他更提出决策人才应具的素质和他们应该注意的问题，认为决策人才不单应对他们的行业有深入的认识，同时应知人善用，并与部属沟通，本身也要不断提升专业知识和水平。有了优秀的决策人才，新马的工商业当会

⁸⁴¹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 - 第四卷，海滨寄简一》，页 81-83，写于 1958 年 1 月 19 日；连亮思、连文思编选《连士升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页 171-173，写于 1959 年 9 月 7 日。

⁸⁴² 连士升〈南洋文人的使命〉，《慧眼近观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95-198，写于 1960 年 4 月 18 日。

⁸⁴³ 连士升〈序〉，李星可《南洋与中国戏》，页 1-6，写于 1962 年 3 月 22 日。罗唖戏在柬埔寨、泰国、印尼、马来亚都有。参 李星可〈什么是‘爨’？〉，《南洋与中国戏》，页 179。

⁸⁴⁴ 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146；刘蕙霞〈我所认识的连士升先生〉，《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66。

如花似锦。⁸⁴⁵ 连士升在担任政府公众服务委员会委员时，就肩负了选拔人才的任务。他的观点和李星可相似。李星可在谈论新马分家后新加坡的前途时，也建议‘选贤任能，唯才是用’⁸⁴⁶

连士升不但主张善用本地人才，也欢迎外来人才。早在 1955 年，他已强调外来人才的贡献。他列举新加坡的李光前、陈六使、高德根、李俊承，槟城的林连登与叶祖意，印尼的黄仲涵，菲律宾的李清泉，越南的黄仲训，及开发婆罗洲的黄乃裳这些对当地有极大贡献的人，都是从中国来的。如果只要求他们纳税而不给予他们选举和被选举权，则不但有欠公平，还会将其他人才拒于门外，对社会进步是极大的损失。⁸⁴⁷ 对于当地人才的任用，也应选贤与能，不能徇私。待遇不能低得无法养廉，也不能高得使人民增加负担。对于‘海外官员’，合约期满后应加筛选并重新拟定合约。⁸⁴⁸ <吸取外资与尊重客卿>一文以美国和苏联广纳人才，英国流失人才的正反例子，以及中国历史中萧何在汉高祖打到关中后，着重户口及重要图籍，为的是从户口中找出人才，让人才推行从图籍中找到的计划书的灼见，说明外来人才的重要性，建议政府重视客卿、优待客卿，挽留他们在合约期满后继续留在新马，先给他们永久居留证，再给他们公民权，长期为我们服务。⁸⁴⁹ 同样的，<训练优秀的公民>一文，在强调拥有优秀公民的重要性时，也欢迎外来人才成为公民。训练公民将使他们时时关注时局的进展、政党的分析、民心的向背。因言之有物，政府处理事务也会小心翼翼，如此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国家富强，人民素质也会日益提高。他也引用英国、美国和澳洲移民的贡献，建议新马政府在训练本地公民的时候，也应敞开大门，欢迎外地人成为本地公民。⁸⁵⁰ 他欢迎外来人才的想法与李星可不能排斥‘移种的花朵’的主张一致。⁸⁵¹

⁸⁴⁵ 连士升 <工商业界的决策人才>，《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35-138，写于 1967 年 12 月 15 日；<再论工商业界的决策人才>，《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39-142，写于 1967 年 12 月 19 日。

⁸⁴⁶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13、14、16、17、23、64、77。

⁸⁴⁷ 连士升 <人民不再是奴才>，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闲人杂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页 111-112，写于 1955 年 8 月 4 日。

⁸⁴⁸ 连士升 <任用当地的人才>，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闲人杂记》，页 147-148，写于 1955 年 10 月 21 日。

⁸⁴⁹ 连士升 <吸取外资与尊重客卿>，《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51-154，写于 1969 年 8 月 19 日。

⁸⁵⁰ 连士升 <训练优秀的公民>，《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78-180，写于 1968 年 9 月 12 日。

⁸⁵¹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5。

连士升应该在 1959 年之前已经成为新加坡公民。⁸⁵² 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华人，而是和李星可一样，是移种的花朵、离散的族裔。他们对于华裔移民的社会位置和可做出的贡献，有深刻的体会。Butler（2001）认为除了母国之外，居留国和离散族群本身是塑造离散族裔的关键之一，这包括居留国如何影响离散族裔和母国的沟通，与其他离散族裔，及与居留国多数人的关系。因此居留国对塑造离散族裔的认同意识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⁸⁵³

教育语文与文化议题（包括华校的式微、南大的创立与幻灭）

Ben-Rafael, Eliezer（2013）引 Weber（1977）的经典理论，认为宗教、历史和语文是组建社群的主要条件。⁸⁵⁴ 连士升坚持华侨学校应注重中文的看法也是包括李星可在内的当时许多华人的看法。也是由于这种坚持，南洋大学才能在众志成城，群策群力下，在 1956 年成立。

连士升在写于 1949 年的〈华侨学校应注重中文〉，他用华侨二字，因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这篇社评的重点是，他认为华侨学校注重中文，其实不是问题的问题，而认为华侨学校应注重英文的人，是从现实但短视的观点考量。他们认为英文的应用范围较广，是政府机关通用的语言，也是求学和谋生的工具，但这些人眼光短浅。当时中国的人口众多，加上同文的日本和越南，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中文的活动范围更广。对本地而言，华侨的数目占人口的二分之一，华侨注重中文，不但回国升学方便，又有助于东西文化交流。各民族发展其方言文学是自然发展的规律，各有其贡献。⁸⁵⁵

⁸⁵² 李霖〈回忆连士升〉记述他的公民权在 1959 年大选之前突被吊销，但 1959 年后的两三年，又重获公民权证书。李霖〈回忆连士升〉，载《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99-100。

⁸⁵³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 207. Doi:10.1353/dsp.2011.0014.

⁸⁵⁴ Eliezer Ben-Rafael, “Diaspora”. *Current Sociology Review* 61, nos. 5-6 (2013), p. 847. Doi: 10.1177/0011392113480371.: “Weber’s (1977) classic assessment that a sense of belonging forged by religion, history, or a language may be a major component of community formation.”

⁸⁵⁵ 连士升〈华侨学校应注重中文〉，《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57-160，写于 1949 年 10 月 21 日。

Eliezer Ben-Rafael (2013) 认为离散族裔离开了母国终将失去他们的母语优势。⁸⁵⁶ 尽管如此, 连士升和李星可一样, 极其重视母语教育, 他们都坚持要先学母语, 再学外文, 他们捍卫母语的立场贯彻始终。⁸⁵⁷ 连士升强调, 学习母语, 还重在学习母语的内涵。“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精通母语之后, 在华洋杂处的社会才不会不知所措。⁸⁵⁸ 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话, 只有母语才最通畅,⁸⁵⁹ 在梦境中说的话, 往往只有道地的母语。应该先精通母语, 才治外国语。精通母语, 对于学习外国语也大有帮助。而且文字的功用在于表情达意。不单作为工具, 内容更重要。⁸⁶⁰ 对华人来说, 精通母语, 即精通中文, 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文学、史学和哲学进行专门的研究, 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⁸⁶¹ 他在 1960 年写的一篇《海滨寄简》中认为母语学通之后, 再学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五、六种语文都不是困难。⁸⁶² 1963 年写的〈注重母语及普及教育〉, 认为学童应从学习母语开始, 精通母语之后, 再学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种语文都不是难事, 因此母语教育利于普及教育。对于新马华人, 学习华文之后, 还应当学习英文及马来文。他支持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的呼吁, 推动华人子女进入华校, 学习母语不但节省时间和精力, 还更容易深入。他指出罗马教皇不论晓得几种文字, 演讲或写作时主要使用母语; 泰戈尔通晓英文, 但主要的著作却是以他的母语-孟加拉语写成的。⁸⁶³ 1965 年, 他重申语言是先入为主的, 在母语之后学习的语文都会略逊一筹, 反映了他对中文的热爱。⁸⁶⁴ 在 1968 年的一篇〈海滨寄简〉里他同意《中国文化人类学》的作者有关母语教育的观点, 重申母语最方便使用, 当母语用得很纯熟, 就能用同一方法学习其他语文。他驳斥欧美因为中国语言不统一, 文字难学而应学英文的

⁸⁵⁶ Eliezer Ben-Rafael, “Diaspora”. *Current Sociology Review* 61, nos. 5-6 (2013), p. 849. Doi: 10.1177/0011392113480371.

⁸⁵⁷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59, 152、153、154;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76.

⁸⁵⁸ 连士升〈乡音无改鬓毛衰〉,《连士升文集第一卷 - 给新青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页 52-53, 写于 1955 年 9 月 4 日。

⁸⁵⁹ 连士升〈多种语言的便利〉,《连士升文集第二卷 - 闲人杂记》, 页 196, 写于 1956 年 2 月 2 日。

⁸⁶⁰ 连士升〈梦里难忘的母语〉,《连士升文集第二卷 - 闲人杂记》, 页 197-198, 虽未注写作日期, 但根据内容引述, 应写于 1956 年。

⁸⁶¹ 连士升著, 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二》, 页 111-112, 写于 1958 年 12 月 28 日。

⁸⁶² 连士升著, 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页 237, 写于 1960 年 9 月 28 日。

⁸⁶³ 连士升〈注重母语和普及教育〉,《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 页 176-179, 写于 1963 年 10 月 10 日。

⁸⁶⁴ 连士升著, 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落霞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页 134-136, 写于 1965 年 1 月 15 日。

谬论。⁸⁶⁵ 他也认为在学习中文之余，应多注重英文。要提高华校的英文水平，师资、设备和教学法是关键。他主张聘用胜任愉快的教师，如能聘请英国、澳洲、加拿大的英文专家更好。至于教学法，应用直接教学法，而非一面教英文，一面用华语讲解。应该鼓励学生多讲多写，通过视听教材提高学习兴趣。他也认为学习英文不是为了做洋奴，而是为了谋生就业甚至旅游的方便。⁸⁶⁶ 谈到〈怎样提高华校的语文程度〉，举出英国史学兼文学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和马皋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学习外语的方法为例，帮助学生学习。吉朋先把外文译为英文，再译为外文，比较自己外语的高低。马皋莱则以熟读圣经来研究欧洲语文，因为圣经是经过权威学者的字斟句酌后才印行，译文的可靠性很高。他以圣经的译文学习，省却了翻字典的功夫。同样的，学子从中国名著的英文译本学英语，也可以省却翻字典的时间。老师应以各种教学媒介，学校应以各种设备，达到鼓励学生多看、多读、多听、多写的目标。⁸⁶⁷

虽然连士升认为华人应重视中文，支持南洋大学，他也寄望于新加坡大学发展一所东方语文学院，广招著名学者教导中文、巫文、印文、日文、阿拉伯文。新加坡大学也应与外国著名大学进行学术合作，巩固新加坡大学的地位。⁸⁶⁸ 在新加坡大学扩展中文系的时候，他认为须考虑几个问题：首先是中文系的性质问题。中文系不会办一个类似欧美大学所办的东方研究院的中文系，通过翻译来学中文。就因如此，绝不会聘请不会讲中文的汉学家，或者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学者主持中文系。相反的，应聘请中英兼通、广孚众望的著名学者当系主任，以及教授中国哲学、史学和文学各部门的讲师，以赶上香港大学中文系，并进一步发展为东南亚的学术中心。⁸⁶⁹

⁸⁶⁵ 连士升 《秋水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七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10），页 17-20，写于 1968 年 10 月 22 日。此篇为致《中国文化人类学》的作者，但未注其姓名。

⁸⁶⁶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孤鹜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页 170-172，写于 1965 年 3 月 24 日；连士升〈提高华校的英文水准〉，《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80-182，写于 1963 年 12 月 19 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页 372，写于 1962 年 10 月 30 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四》，页 379-381，写于 1962 年 11 月 20 日。

⁸⁶⁷ 连士升〈怎样提高华校的语文程度〉，《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83-186，写于 1964 年 4 月 16 日。

⁸⁶⁸ 连士升〈庆祝新加坡大学的诞生〉，《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69-172，写于 1961 年 12 月 31 日。

⁸⁶⁹ 连士升〈正在扩展中的新大中文系〉，《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73-175，写于 1962 年 7 月 1 日。

离散族裔中也有第一代与其后裔的区分。不同类型的离散族裔会形成和他们居留国不同的关系。同一离散族裔间的沟通和彼此的关系也是离散族裔体验的重要内容，是塑造离散族裔的身份、结构和网络的关键。⁸⁷⁰ 作为华人离散族裔的华侨和侨生的关系是连士升所关心的。连士升解释华侨为是来自中国的华人，而侨生是华侨的子女，在本地生长。华侨与侨生的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导致思想、意志和行为不同，彼此产生许多误会。他认为要二者沟通，必须普及华校，充实华文和历史的教材，同时也要加强华校的英文教学，协助华侨谋生及参与政治活动。他也提出政府给华校的津贴有限，主要靠侨领的支持。在侨领的支持下，华校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加强华侨与侨生的联系，如果他们密切合作，将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华人进而与其他民族互通互补，使马来亚欣欣向荣。⁸⁷¹ 五十年代初期，华校和教师的情景堪怜。华校的经费不足，校舍不足且简陋。教师的薪酬菲薄，必须兼任两三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因公共图书管设备不良及藏书匮乏，教师一无时间二无好书可看，思想学术将落后于人。连士升在慨叹之余，大力呼吁社会人士努力改善这种情况，⁸⁷²

在 1950 年，连士升在〈华侨的文化与教育〉中赞扬陈六使关心华教，慨捐 30 万元与马大，又立志创办中文大学。在马来亚需要一间英文大学的同时，也需要一所中文大学，中国人多学中文和英国人多学英文一样，是自然的需求。两类大学通过教授和学生的交换，介绍及翻译中英典籍，中英文化将融会贯通，形成道地的马来亚文化，进而开花结果，立足于世界。他鼓励南洋文化和教育的斗士，任重道远，勿因环境的恶劣而退缩。⁸⁷³ 1954 年，连士升在〈重申创办南大的宗旨〉，重复陈六使创办南大的宗旨时，再度强调南大的教学媒介及课程须以中文为主体。虽然在新加坡应中英文并重，但就如马来亚大学偏重英文，南洋大学应偏重中文。校务稳定之后可兼顾英文、马来文和印度文，甚至东南亚地区的其他语文。他主张以有远见、有计划，但务实、量入为出的策略办大学，也主张学校应理论和实践并施，本体与效用兼顾，造就能学以致用用的

⁸⁷⁰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 207. Doi: 10.1353/dsp.2011.0014.

⁸⁷¹ 连士升 〈华侨与侨生〉，《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83-87，写于 1951 年 11 月 18 日。

⁸⁷² 连士升 〈尊师运动的重要性〉，《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09-112，写于 1950 年 11 月 7 日。

⁸⁷³ 连士升 〈华侨的文化与教育〉，《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05-108，写于 1950 年 9 月 19 日。

人才。⁸⁷⁴ 南大成立之后，他也常常对南大的学生和活动予以鼓励。⁸⁷⁵ 在南大第一届毕业生毕业的那一年，连士升鼓励毕业生继续深造，学有专长后更能为南大的发展、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⁸⁷⁶ 他对于自己曾用半年的时间，参与南大初期的筹备工作，以及在‘南大检讨委员会’服务了四个月感到开心，对于南大毕业生在国际学术界显露头角，感到欣慰。⁸⁷⁷ 除了南大，连士升也支持义安学院的成立，因为现有新加坡的大学已经不能容纳更多的学生。连士升认为义安学院从一间学院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大学，是脚踏实地的做法。他并呼吁政府、社会人士及慈善家给予义安学院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发展本地的高等教育。⁸⁷⁸

在〈重申创办南大的宗旨〉里以及《海滨寄简》中连士升还鼓励大学人才毕业后应参与当地的政治，与他另一篇社评〈大学脱离不了政治〉的意见相同。他主张公民应该充分了解政治，国家才能稳定，政府才能有效的实施政策。大学生已到法定年龄，知识水准较一般人高，在政治上应该处于领导地位。只是在学习阶段，应把重心放在功课上，课余才注意国内外大事的发展。⁸⁷⁹ 在 1958 年写的〈大学生的使命〉中，他清楚说明大学生不但要有学术上的使命，打好学问的基础，还要有政治和社会上的使命。大学生虽不必马上参加政治活动，但必须留意国际问题和当地政治，以免毕业后被人牵着鼻子走。大学生还肩负社会使命，在校时期要加强移风易俗的决心。⁸⁸⁰ 他认为学生应留意政治的看法与他较早期的论点一致。早在 1950 年当他谈到〈华侨的文化与教育〉时，认为当年的 5 月，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被包围及停课是小题大做。因为学生关心政治表示他们很有抱负。与其打压，教职员或教育局应因势利导，通过时事的讨论，以具

⁸⁷⁴ 连士升 〈重申创办南大的宗旨〉，《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13-159，写于 1954 年 11 月 17 日。

⁸⁷⁵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海滨寄简二》，肯定南大学生的出版以及作品的质量（页 99，写于 1958 年 7 月 17 日）。鼓励社会人士出版大规模的杂志并给南大学生带路（页 145，写于 1959 年 5 月 11 日）。

⁸⁷⁶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海滨寄简二》，页 174-175，写于 1958 年 8 月 25 日。

⁸⁷⁷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孤鹜集》，页 173-175，写于 1965 年 3 月 28 日。

⁸⁷⁸ 连士升 〈义安学院开学典礼〉，《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24-127，未注写作日期。依照义安学院成立的记载，应写于 1963 年。

⁸⁷⁹ 连士升 〈重申创办南大的宗旨〉，《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13-159，写于 1954 年 11 月 17 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海滨寄简二》，页 174-175，写于 1958 年 8 月 25 日；连士升 〈大学脱离不了政治〉，《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00-103，写于 1961 年 6 月 12 日。

⁸⁸⁰ 连士升 〈大学生的使命〉，连亮思、连文思编选《连士升文选》，页 130-134，写于 1958 年 3 月 16 日。此篇也收于《春树集》（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页 43-48。

体事实，分析利害，同时指导他们阅读好书，才不致‘民免于无耻’。⁸⁸¹ 这样的言论，是属于言辞较激烈的，在连士升的社评中并不多见。

有关华人对南洋的贡献，他肯定南洋华人靠自己的聪明和努力谋生，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成为公民后，又竭尽所能，为社会服务，促进国家的繁荣。⁸⁸² 〈华人对南洋的贡献〉一文指出，华人在当地所积聚的资产，除了汇出少数接济家属与乡亲，多数都投入当地的建设，而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集合群体的力量兴办教育。在文化方面，他认为报章对政府做建设性的批评，已著成效。有关美术的作用，他引用前任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Malcolm Macdonald）的话，认为“南洋本来是‘文化沙漠’，但经过十年来美术界的努力，已经把‘文化沙漠’四个字送进历史博物馆了”⁸⁸³ 在这里他和李星可的看法不同。李星可认为在美术界，许多看画、买画的人目的是附庸风雅，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形象，⁸⁸⁴ 独幕剧〈绿洲〉不但反映教育界、文艺界的不良现象，也影射自己曾被打压。题目〈绿洲〉表面上描写星洲是文化绿洲，其实要表达的却相反——星洲是文化沙漠。⁸⁸⁵

然而在 1968 年写的〈文化事业需要特别奖励〉，连士升却认为出版、戏剧、音乐、美术这些文化事业都不发达。出版业因考试制度的影响，有书没人看，接下来便无书可看；本地的画家除了少数的例外，无法以绘画生存；靠几间中学演出的戏剧，没有市场，也得不到应有的报酬；音乐家要靠在家招收学生解决生活问题。文化事业被冷落的现象，连士升虽未明言南洋社会为文化沙漠，其实与之无异。⁸⁸⁶ 新马书业和印刷业的凋零和考试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在〈救救书业和印刷业〉中，连士升说明过于重视考试的制度影响了读书的风气，因此书店要靠卖课本与考试有关的书籍，兼卖其他用品才能生存。连士升呼吁新上任的文化部部长易润堂先生鼓励学生多读书、支持学人写作、指导印刷业改良技术及减低成本。只有在政府的领导，大专学府人员的支持，在学术

⁸⁸¹ 连士升 〈华侨的文化与教育〉，《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05-108，写于 1950 年 9 月 19 日。‘民免于无耻’出自《论语·为政》，意如以政令与刑罚为主导，人民将不知羞耻，只求免于刑罚而服从。

⁸⁸²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海滨寄简四》，页 391。写于 1962 年 12 月 28 日。

⁸⁸³ 连士升 〈华人对南洋的贡献〉，《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88-91，写于 1956 年 8 月 22 日。

⁸⁸⁴ 李星可五幕喜剧〈钓金龟〉，收于李星可《快艇》（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83-156。

⁸⁸⁵ 收于李星可《绿洲》（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1），页 71-94。

⁸⁸⁶ 连士升 〈文化事业需要特别奖励〉，《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96-99，写于 1968 年 10 月 14 日。

文化上力争上游时，本地的书业和印刷业才可改观。否则国人将被贴上‘识字而没有文化’的标签。⁸⁸⁷

过分重视考试不但使学生不读与考试无直接关系的书籍，偏重考试也会失去学习的目的。与李星可一样，连士升也反对为会考而读书。李星可反对过度重视考试的制度，因‘严格的考试只能创造奴才’，⁸⁸⁸连士升说明‘读书的目的在于启迪愚昧、鼓励思维，增进技能知识，充实生活情趣’，考试只是督促学生学习的手段而非学习的目的。因此他反对初中会考，也反对高中会考增加国英算以外的科目。他举出科举考试是愚民政策的锁钥，光为考试而死记硬背，不探求学问的真理，不培养读书的能力和习惯，会使学生脑筋迟钝，妨碍他们的身心发展。⁸⁸⁹对于国家发展，偏重考试也会因创造和革新思维不得发展而成为工业发展的绊脚石，因为长期的考试，只会制造‘御用人才’只会做传声筒，不会‘造反’，不会革新。对于统治者似有保障，但却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⁸⁹⁰

除了学术科目，连士升也重视体育，锻炼人民的体魄以及培养体育精神。⁸⁹¹他喜欢音乐，自认为有音乐的天分，关注乐坛的发展。⁸⁹²他非常欣赏音乐指挥家朱晖，称朱晖为‘马来亚的国宝’，希望国人给他应有的重视和爱护。⁸⁹³在肖邦百年纪念时他为文主张除了学校发展音乐教育之外，政府应设立较大规模的音乐学院，广聘名师，教导中西乐，汇集中西乐的菁华，塑造南洋的独特风格。音乐学院可提高音乐水平，而音乐会能普及音乐，时常举行音乐会，民众将能享受积极正面的音乐，陶冶性情。⁸⁹⁴这

⁸⁸⁷ 连士升〈救救书业和印刷业〉，《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89-92，写于1968年4月18日。

⁸⁸⁸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66，页130-131。

⁸⁸⁹ 连士升〈会考与读书〉，《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51-154，写于1955年11月2日。

⁸⁹⁰ 连士升〈考试制度与创造思想〉，《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98-201，写于1970年10月6日。

⁸⁹¹ 连士升〈读书不忘体育〉，《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81-184，写于1970年11月14日。

⁸⁹²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三》，页272-274，写于1961年8月27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四》，页311-312，写于1962年3月1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四》，页341-343，写于1962年7月15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孤鹭集》，页219，写于1965年9月11日；页266-268，写于1968年5月9日。

⁸⁹³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三》，页238-240，写于1960年10月5日。

⁸⁹⁴ 连士升〈肖邦百年纪念与南洋音乐运动〉，《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91-193，写于1949年11月8日，是最早期的作品之一。

篇文章写于 1949 年 11 月，10 年过后，于 1960 年 1 月，他在新加坡艺术剧场蓝图绘就时，肯定了新加坡文化部的努力，并相信政府将进一步创办音乐、美术、戏剧等专门学院，为艺术发展铺路。⁸⁹⁵ 他的建议与李星可在 1959 至 1961 年有关建设国家剧场写的社论一致，李星可认为在舞台剧以外，也希望剧场能适合音乐演奏。除了硬体设施，他同时主张国家设立音乐、舞蹈、戏剧的专校训练艺术人才及剧场主持人，这样才能提升并延续本地的文化事业。⁸⁹⁶

在强调人才的重要性的时候，连士升特别重视教师的素质。在〈制度与人才〉中他认为制度培养人才，人才实行制度，比较两者，树立制度不难，难在网罗能有效执行制度的人才。在学校里，有课程标准，课本相当一致，但不同老师的素质就会成就不同程度的学生。与此同时，本地的中学和大学，还面对师资缺乏的困境，连士升督促政府彻底解决问题。⁸⁹⁷ 连士升认为老师不单须教导文化，还须注意学生的生活。老师应常学生沟通，以便学生‘就正于有道’。学生自治会也是锻炼学生组织能力的渠道，学校应指导他们而不是限制他们的活动。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寓教育于生活中，在生活中学习是他的教育理念。⁸⁹⁸ 人才是提高文化水准的关键。在〈怎样提高文化水准〉里，连士升提出了 4 要点：吸收现有人才、培植未来人才、欢迎外来艺术家、出国访问。⁸⁹⁹ 其中欢迎外来艺术家，和李星可的看法一致。⁹⁰⁰

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之后，电视也随之普及。在 1962 年写的〈电视教育的前途〉一文中，连士升认为在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方面，电视有巨大的功能。在提高教育水平，增进学习兴趣方面，电视更能发挥它的作用，比如在医学上，可用电视指导外科手术。然而电视也能减少阅读的时间，不良的电视内容更容易荼毒青少年。⁹⁰¹ 他积极呼吁公私文化机构，包括电视、电台、报纸杂志都应负起教导民众欣赏健康文娱的责任，并

⁸⁹⁵ 连士升 〈开辟新的艺术途径〉，《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208-211，写于 1960 年 1 月 18 日。

⁸⁹⁶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3、17、45。

⁸⁹⁷ 连士升 〈制度与人才〉，《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70-173，写于 1965 年 3 月 2 日。

⁸⁹⁸ 连士升 〈教育与生活〉，《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57-160，写于 1951 年 12 月 25 日。

⁸⁹⁹ 连士升 〈怎样提高文化水准〉，《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16-119，写于 1961 年 3 月 13 日。

⁹⁰⁰ 李星可 〈如何促成各源流文化的交流〉，《政论近集》篇 15，页 35-37，写于 1967 年 8 月 25 日；李星可 〈如何迎接‘漫游东方年’？〉，《政论选集》篇 38，页 82-84，写于 1960 年 10 月 25 日。

⁹⁰¹ 连士升 〈电视教育的前途〉，《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65-169，写于 1962 年 8 月 27 日。

让这些健康文娱在公共场地如人民协会、民众联络所演出。在古典音乐和美术佳作方面，应有专家指导，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既要禁止不良的作品，又要推出富有文化和教育意义的剧本。学校应从小学开始帮助学生养成欣赏和参加健康文娱的习惯。数管齐下，人民耳濡目染，健康文娱自成风气。⁹⁰² 李星可在 1960 年也写了两篇有关电视作用的社论，认为电视除了提供资讯的平台外的文娱管道。应多播本地节目及发挥教育民众的作用。⁹⁰³

艺术表演能促进文化交流。学术展览也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在〈促进文化的交流〉中他举美国和苏联通过展览会，认识及赏识彼此的文化，又举杜甫‘白也诗无敌’赞扬李白的诗句，说明杜甫的自信和自知，一面肯定朋友的地位，一面警惕自己努力前进。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智，就能消弭许多无谓的纠纷。⁹⁰⁴

翻译是促进文化交流的必要渠道。〈重视翻译工作〉提出中国、美国、苏联和日本，甚至印尼，都非常重视翻译工作。语言也有时代性，随时间的推进，语言须不断改进，因此重新翻译前人的译作才更容易被读者接受。连士升以这些例子，建议通过“政府与社会的鼓励、学人的慎重从事，出版机构的积极推销”，本地的翻译工作才能有果效。⁹⁰⁵ 连士升认为文化的交流（communication）是〈新文化的创造〉的基本阶段，文化交流是文化的混合（mixture）和文化的化合（compound）的前提，先有文化交流才能使不同文化开始欣赏彼此的文化，因此翻译工作是促进文化交流的必要渠道。⁹⁰⁶

对独立后新兴国发展的肯定与期待

连士升本来不打算在新加坡长住。1947 年 1 月他抵达新加坡，原本只是想到新马考察两三个月，再作打算，没想到国内外局势多变，只好留在新加坡。他曾批评南洋的饮

⁹⁰² 连士升 〈积极促进健康文娱活动〉，《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220-223，写于 1970 年 7 月 21 日。

⁹⁰³ 李星可 〈星马筹办国营电视〉，《政论选集》篇 11，写于 1960 年 3 月 17 日；〈星加坡决定创办电视〉，《政论选集》篇 22，写于 1960 年 5 月 31 日。

⁹⁰⁴ 连士升 〈促进文化的交流〉，《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212-215，写于 1960 年 7 月 27 日。

⁹⁰⁵ 连士升 〈重视翻译工作〉，《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216-219，写于 1967 年 3 月 16 日。

⁹⁰⁶ 连士升 〈新文化的创造〉，《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93-95，写于 1968 年 8 月 29 日。括弧中的英文取自连士升原文。

食和住所缺乏风雅；⁹⁰⁷ 南洋青年有的是热情，但缺乏含蓄、积聚和素养；⁹⁰⁸ 他们多数聪明又热情，但‘外诱太多，精力分撒’。⁹⁰⁹ 而且南洋的人度量狭窄，很难找到知心朋友。⁹¹⁰ 南洋的铜臭味重，利禄所在，人人如附膻的蝼蚁，争之唯恐不及，却赶跑了文学、艺术和学术，没有一个华文作家能靠写稿为生。⁹¹¹ 南洋不重视读书人，但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做政治家、社会事业家、甚至教育家。纯粹以读书为终身事业的人，最多是帮闲，什么家都做不成。⁹¹² 他也抱怨过南洋炎热，而且由于政府对书籍有诸多限制，影响他的阅读和研究。社会不给作家学者应有的鼓励，但他又不会像南洋伯一样会做买卖。学问做不成，发财又无望，《南行集》的大部分文章是以这种无奈的心情写成的。⁹¹³ 他对于书籍的缺乏，⁹¹⁴作家和出版业的困境，文化水准逐渐低落，以及新加坡人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到了建国之后依然如此还是耿耿于怀，⁹¹⁵ 他也慨叹南洋文化舞台不但狭小，南洋社会里有许多‘倾轧、陷害、造谣、污蔑等手段，却无所不用其极’⁹¹⁶ 他的不满、不适和无奈，有如 Clifford (1994)所指离散族裔在居留国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⁹¹⁷ 但离散华人和大部分的离散族裔相似，也有如 Clifford (1994)所指出的，在理想和异位的张力中，仍然维系着社群、保留着传统，并在逆境中、在当地的语境下杂糅地重现母族的文化传统。⁹¹⁸ 因此虽然环境不尽如人愿，我们看到他从 1948 年至 1973 年的文字中，他的看法、他的建议，反映在更大部分的文字里，却

⁹⁰⁷ 连士升〈南洋太缺乏风雅〉，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 - 闲人杂记》，页 67-68，写于 1955 年 8 月 1 日。

⁹⁰⁸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三》，页 200，写于 1960 年 5 月 5 日。

⁹⁰⁹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四》，页 298，写于 1961 年 11 月 13 日。

⁹¹⁰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四》，页 395，写于 1963 年 1 月 10 日。

⁹¹¹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孤鹭集》，页 218-220，写于 1965 年 9 月 23 日；页 264，写于 1968 年 4 月 18 日；页 264，写于 1968 年 4 月 18 日。

⁹¹²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二》，页 113，写于 1959 年 1 月 3 日。

⁹¹³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二》，页 148，写于 1959 年 5 月 24 日；

连士升〈南行集〉自序，写于 1963 年 5 月 24 日，收于连亮思、连文思编选《连士升文选》，页 93-94。

⁹¹⁴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三》，页 276，写于 1961 年 9 月 1 日。

⁹¹⁵ 连士升《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页 60，写于 1972 年 7 月 9 日；页 161，写于 1972 年 7 月 29 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孤鹭集》，页 273-274，写于 1968 年 6 月 1 日。

⁹¹⁶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一》，页 6，写于 1957 年 1 月 24 日。

⁹¹⁷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310. Clifford 用 'dwelling-in-displacement' 形容离散族群对自己处境的惶惑。

⁹¹⁸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317. 原文是：
“....Some version of this utopic/dystopic tension is present in all diaspora cultures. They begin with uprooting and loss. They are familiar with exile, with the "outsider's" exposed terror-of police, lynch mob, and pogrom. At the same time, diaspora cultures work to maintain community, selectively preserving and recovering traditions, "customizing" and "versioning" them in novel, hybrid, and often antagonistic situations.”

是积极和乐观的。当他指出一些缺点的时候，是本着爱之深、责之切、或恨铁不成钢的态度提出批评和指正。在新加坡独立之后，肯定了新加坡的成绩，更对新加坡这新兴国充满了期待，在个人、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艺术各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协助新兴国更上一层楼。

1969 年新加坡庆祝开埠 150 年。在〈新加坡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一文中连士升肯定了新加坡先人的努力和成绩：从渔村到第四大港、从渔民到学者专家、从亚答屋到市镇、从自给自足的生活到通商惠工的大都会。他也感到荣幸能成为新加坡公民，因为这里种族和谐、信仰自由、用人唯才、公平竞争。他期待世界各国人士来这里观光或长居，并随着本国教育水准的提高，也有优秀人才聘为他国的顾问。缅怀过去，瞻望将来，国人有责任把新加坡的历史推进一步。⁹¹⁹

写于 1969 年〈公民应尽的责任〉，连士升具体建议作为公民要从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做起。除了要注意卫生、遵守纪律外，还要自力更生，利用本国的资源制造特产，打进国际市场，以免一直依赖进口而无输出。⁹²⁰ 〈健全学风的提倡〉能协助达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目标。个人要脚踏实地、不屈不挠，不能眼光短浅、急功近利，社会也要给予支持和鼓励，才能造就国家的栋梁。⁹²¹ 在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兴趣上，最好是两者结合，但如不能兼得，则要以国家需要为先。⁹²²

在政治外交上，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他建议〈开展多元的外交〉，支持小国走中立路线。‘存在决定意识’，在新马的生存条件下，必须展开多元外交，争取友邦，以促进对外贸易。新马的外交政策有两个相同点，即通商惠工及促进文化交流。大马有许多土产，可与多国发展公平的多元贸易；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但有优良海港，可拓展定制船只和修船业、工业和旅游业。作为独立国家，也应促进文化交流，提高本国的文化水平。⁹²³

⁹¹⁹ 连士升 〈新加坡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46-149，写于 1969 年 2 月 7 日。

⁹²⁰ 连士升 〈公民应尽的责任〉，《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43-145，写于 1969 年 2 月 4 日。

⁹²¹ 连士升 〈健全学风的提倡〉，《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50-153，写于 1969 年 10 月 9 日。

⁹²² 连士升 《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页 173-176，曾刊登于 1972 年 9 月 1 日南洋商报副刊。

⁹²³ 连士升 〈展开多元的外交〉，《慧眼近观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08-111，写于 1968 年 7 月 2 日。

连士升是燕京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对西方经济史很感兴趣，也曾撰写和翻译有关中外经济史的文章，⁹²⁴ 在他的社评中就有不少有关经济的分析文字，以他的经济观点，促进国家的进步和繁荣。

他主张东南亚小国必须合作，这样它们才能〈同舟共济，自力更生〉。比如在原料输出上，维持一定的价格，就能避免采购国的抑低价格；设立船务公司自己运送原料出口，就不必受制于外国船务公司的价格；多任用本地人才，让本地人有发挥的机会，也能防止人才外流。⁹²⁵ 〈世界经济展望〉提到国际货币和黄金抢购的国际金融问题。这虽然是大国的问题，但他认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小国寡民更应该留意国际经济的发展。而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如能开源节流，人民还是能过安定的日子。⁹²⁶ 〈停止黄金抢购的治本方法〉也是基于当时黄金抢购浪潮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而提出的建议，他认为停止抢购黄金只是一个对策。真正治本的方法，要从收支平衡入手。对于美国，维持收支平衡最有效的方法是提前结束越南战争，杜绝最大的漏洞。⁹²⁷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英国将在 1971 年撤军的背景下，连士升在 1969 年已提出了加强日本问题的研究的建议，因为当时日本已是美国、苏联、中国以外最富强的国家，在经济上对新马的攻势凌厉。这是因为日本精通新马的内情，而“我们对日本的内情却一窍不通，……而且对本国的内情也是所知有限”。因此他建议新马有志之士研究日本的情绪与志愿，包括组织日本问题研究会、观光团到日本考察日本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工业与商业，然后以座谈会的方式讨论考察的结果，这样才不会英军还未撤退，日本已经在经济上入侵，政治独立将虚有其表。⁹²⁸ 同样是报人的李星可也谈了许多和英军撤退有关的问题，分析了英美的情况，建议新加坡政治中立、内部民主、自由经

⁹²⁴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

<http://www.hstao.com/Lien.pdf>，页 3-4，24。阅览日期：10.8.2019。

⁹²⁵ 连士升〈同舟共济，自力更生〉，《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16-119，写于 1968 年 2 月 15 日。

⁹²⁶ 连士升〈世界经济展望〉，《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47-150，写于 1969 年 2 月 20 日。

⁹²⁷ 连士升〈停止黄金抢购的治本方法〉，《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43-145，写于 1968 年 3 月 19 日。

⁹²⁸ 连士升〈加强日本问题的研究〉，《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12-115，引文见页 114。写于 1969 年 12 月 23 日。

济。⁹²⁹ 连士升建议加强日本问题的研究，是对英军撤退后日本的经济入侵的对策和防范。

在教育课题上，〈中小学历史须重新检讨〉讲出了连士升的历史观。当时各国中小学的历史课本，都以历代帝王的朝代为经，以文官武将的事迹为纬，结果内容是一战连着一战，讲的是攻城略地、拓土开疆的事，崇拜的是帝王将相。在学生自我陶醉之余，却培养了狭隘的国家主义，加强了仇恨意识，不利于世界和平。因此他建议各国的历史教科书应重新检讨，冲淡王侯将相的功业，重视人民生活的历史，即社会经济史。在了解了本国及他国的生活习俗后，也尊重他人的生活习俗。除此之外，也发扬各地顶天立地的宗教家、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精神和成就，因为他们才是能打通国界、释戾气为祥和的真正的英雄。更有效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能放宽政策，使各国都能加入，并在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鼓励各国在编纂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时候，把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学术史，使青少年早日养成爱护祖国、尊重他国的健全心理。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世界各国才能和平共存。⁹³⁰ 他指出政治人物有如太史公所说“当时则荣，殁则已焉”，但文学家、史学家的作品却是日月经天、万古长青。⁹³¹

杨振宁教授曾为南洋大学校外考委，当他 1971 年到访新加坡时，连士升为文热烈欢迎杨振宁教授，也引用杨振宁教授的演讲，再次肯定中文的实用性不亚于英文。杨政宁教授认为中文绝对适合科学的应用，大家应该在科技上多用中文。杨教授也认为我们不但要重视理科，也要注重文科，不但要关注比较实用的科学和技术，也要关注理论科学。杨教授希望新加坡能培养出国际知名的理论科学家，连士升鼓励新加坡以此为目标。⁹³²

⁹²⁹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2、33、34、36、61、62、65、79、84；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77。

⁹³⁰ 连士升〈中小学历史须重新检讨〉，《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94-197，写于 1969 年 9 月 25 日。

⁹³¹ 连士升〈热烈欢迎杨振宁教授〉，《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202-205，写于 1971 年 1 月 21 日。

⁹³² 同上。

连士升一直关注南大的发展，催促毕业生继续深造，表扬南大的成绩，为南大学位从第一届起被新加坡政府承认感到特别兴奋，并鼓励校友继续努力。⁹³³ 1969 年，他为黄丽松出任南大校长而欣喜，认为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美事。因为远在 1959 年，黄丽松已经对南大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而且黄丽松在马来亚大学的 18 年间曾任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马大代副校长，了解大学的运作，在大学教职员中有许多旧交新识，并与新马其他大学保持良好的关系。当时新加坡政府及国外多所大学也已承认南大学位，加强了南大的信心。加上他本身是新加坡公民，更是发展南大的优势。他在文中也斥责之前南大毕业生的中文优势被政府官员抹杀的行为，表示他对南大教学语的关注。他期望国内外爱护南大的人士给予南大经济上的支持，协助南大校长执行任务。

⁹³⁴ 1972 年他叙述了南大艰难发展的路程后，必须致力于‘人和’。其中包括争取政府的支持、与社会合作以培养学以致用的人才，以及鼓励校友的参与。⁹³⁵ 他也说出当时华校生进大学的困难，南大文科生深造的局限，并在肯定南大毕业生的努力和成绩的同时，也鼓励南大校友为南大作出贡献。⁹³⁶ 连士升重视历史，曾经建议中华总商会特辟一楼展示文物但未能如愿。当南大得到李氏基金会的支持，开设‘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时，他更建议收藏家把个人收藏捐出，一则有专人照顾保管，再则能丰富国家的文化。南大李光前文物所编印的《文物汇刊》对他来说，不但代表了南大的骄傲，也洗脱了南洋‘文化沙漠’的恶名。⁹³⁷

针对当时文人间争论作家或写作人协会名称的时候，他认为我们不怕新加坡小国寡民，文化背景不够深厚，只怕人民甘于小就，没有远图。他以意大利曾出现了三位伟大的艺术家 - 达文西、米开兰基罗和拉斐尔，及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但丁，却造成了文艺复兴时代，风靡欧洲为例，说明我们只要认清目标，埋头苦干，互相鼓励而非互相毁谤，将会有辉煌的成绩。他一面指出文艺界不要在名称上纠结，要实事求是，一面鼓

⁹³³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二》，肯定南大学生的出版能力以及作品的质量，页 99-100，写于 1958 年 7 月 17 日；敦促社会人士出版大规模的杂志并给南大学生带路，页 145，写于 1959 年 5 月 11 日；鼓励南大毕业生先在南大做助教并作专题研究，然后到外国读研究院，学成后服务南大，页 174-175，写于 1958 年 8 月 25 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孤鹭集》，为南大毕业生在国外留学取得的优异成绩而欣喜，页 173-175，写于 1965 年 3 月 28 日；致函祝贺一南大校友的成就，并鼓励所有南大校友为南大做出贡献，页 286-288，写于 1968 年 7 月 5 日。

⁹³⁴ 连士升《秋水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七集》，页 29-32，写于 1969 年 1 月 19 日。

⁹³⁵ 连士升《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页 149-152，写于 1972 年 7 月 23 日。

⁹³⁶ 连士升《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页 138-140，写于 1972 年 7 月 18 日。

⁹³⁷ 连士升《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页 185-188，写于 1972 年 7 月 23 日。

励文人有宽广的胸怀，共同向目标迈进。这篇写于 1972 年 6 月的书信，表达了他对新加坡文艺界的期望。⁹³⁸

同一年 6 月写的两封书信，他在新加坡的音乐指挥家朱晖感到骄傲。他详细记述了朱晖的学习过程和指挥的成绩，并且建议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播放朱晖在雅典指挥的纪录片，并介绍朱晖在欧美各国的音乐指挥造诣，让新加坡人提升眼界，也建议出版图文并茂的纪念册，把朱晖介绍给国际人士，因为这一方面可加强新加坡人的自信，另一方面可使欧美国家知道，‘勿谓秦无人’。⁹³⁹ 对于美术，他也极力推动。他欣赏喜爱音乐和文学的画家刘抗，曾为他的画册作序。于 1972 年他不但鼓励刘抗再开一次画展，给新马艺术家有欣赏和观摩的机会，还希望 15 年后刘抗能开第三次画展，呈现他壮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的画风。⁹⁴⁰ 对于文化事业，尤其是写作、音乐、绘画、雕刻，他也呼吁政府和社会人士大力支持，在在表达了他对新加坡文化发展的关切。⁹⁴¹

新加坡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离散族裔。他们生活在新空间，在互相碰撞、互相适应的过程中彼此的文化也进行糅合，甚至创造出新的文化，有如 Wittgenstein (Schatzki, 1996) 所称的，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上形成‘家族式的相似面’ (family resemblance)。因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面向同一主流文化，难免相互影响，认同于共同的国家。

⁹⁴² 1964 年当新加坡还在大马的时候，连士升已指出由于商业、住房、教育制度的变化，减少了华人对乡缘和血缘的依赖，使新加坡各族易于融合。虽然他还是强调学校的媒介语要充分注重母语，和他以往的看法一致，但在混合学校里找不到帮派的痕迹，是训练新国家公民的必要步骤。⁹⁴³ 不但如此，种族、国籍、语言、宗教都不应该是人与

⁹³⁸ 连士升 《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页 97-100，曾刊登于 1972 年 6 月 24 日南洋商报副刊。

⁹³⁹ 连士升 《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页 105-112，共两篇。一篇写于 1972 年 6 月 7 日，另一篇写于 1972 年 6 月 10 日。6 月 7 日篇 106 页记朱晖为新加坡公民。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AS), *The Second Decade, Nation Building in Progress, 1975-1985* 《继往开来 - 新加坡建国第二个十年》(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10) 在记述新加坡的文化成果时，也称朱晖为新加坡人 (Singaporean)。见

https://www.nas.gov.sg/1stCab/7585/travel_exh_Sec7.html. 阅览日期：17.12.2018。

⁹⁴⁰ 连士升 《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页 121-128，以两封书信记述刘抗的美术造诣，写于 1972 年 7 月 2 日及 4 日。

⁹⁴¹ 连士升 《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页 105-112。

⁹⁴² Eliezer Ben-Rafael, "Diaspora". *Current Sociology Review* 61, nos. 5-6 (2013), p. 854. Doi: 10.1177/0011392113480371.

⁹⁴³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落霞集》，页 71-73，写于 1964 年 8 月 8 日。

人之间的阻碍。到了 1968 年新加坡成为独立国之后，连士升在〈新文化的创造〉中，更提出新文化的创造须经过三个阶段：文化的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的混合（mixture）和文化的化合（compound）。文化的交流指的是不同文化开始欣赏彼此的文化，文化的混合包括了不同文化精华的兼收并蓄，而文化的化合才是五味调和，‘有美皆备、无善不臻’的满汉全席。⁹⁴⁴ 这才是连士升是‘天下一家’、‘社会大同’的理想世界。

第三节 杏影：‘上帝给人类的这一个「地上天堂」’⁹⁴⁵

杏影的副刊

杏影肯定文艺的功能，他要通过文艺来化解纠纷、注入理性、培养善良、打开人们的视野，为世界和平与大同而努力。以这个信念为宗旨，他不遗余力推动文艺工作，并积极提携后进，使文艺事业得以传承，使他的目标得以达成。杏影从 1954 年 1 月 18 日至 1967 年 1 月 5 日，主编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五种－《文风》、《新苗》、《南洋公园》、《文化》及《青年文艺》，共主编副刊 13 年，近两千期。在他离世后至 1967 年 1 月 5 日，副刊还一直刊载他提前编好的 10 期副刊。由此可见以他的为人以及他对副刊编辑的热情与对文艺的信念的坚持与执着。

杏影的真诚、善良，及对后辈的爱护和鼓励，在许多缅怀杏影的文章中都可见到。他关心投稿者的健康，⁹⁴⁶ 支持文艺界的团结，⁹⁴⁷ 灌溉文艺新苗，⁹⁴⁸ 是‘公认的一位沉笃的马华文艺园地的灌溉者’，⁹⁴⁹ 对于投稿人，杏影不但是一位可敬的编者，也是一位亲切的长辈。⁹⁵⁰ 他不懈地替年轻作者看稿、改稿、提供意见，尽量发表他们的作品，

⁹⁴⁴ 连士升〈新文化的创造〉，《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93-95，写于 1968 年 8 月 29 日。

⁹⁴⁵ 杏影〈在高楼窗口看海〉，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 133。

⁹⁴⁶ 叶苗〈怀念杨守默先生〉，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6-7。

⁹⁴⁷ 冰梅〈迟来的悼念－怀念杏影兄〉，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14-16。

⁹⁴⁸ 杜运燮〈怀念守默兄〉，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25。

⁹⁴⁹ 杜运燮〈怀念守默兄〉，引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中对杏影的描述，见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24-25。

⁹⁵⁰ 柳舜〈他不会寂寞〉，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26-28。

与他们会面谈生活、工作、文艺等，为了给一位年轻作者回信，他曾甘心放弃观看他所喜欢的电影。他对所有投来的稿件都非常认真，不论认识与否、不论作者已否成名，可用的稿件他仔细审阅，不用的稿件则加以修改或提意见，然后一一归还，这样被退稿者也依然得着教诲。如果有不适合他用的稿件，他会说明原因，或会推荐给其他地方发表。即使他的做法不被报馆赏识，他还是照旧苦干。他特别注意来稿中的人名和事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他常替稿中的角色更名，也非常注重事件的真实和合理性。⁹⁵¹ 这种种都说明了他的尽心尽责、推动文艺和爱护后进的热情，以使他最终的理想—人类大同世界通过文艺得以迈进。

无论在什么政治情况下，杏影都积极推进新加坡文艺。杏影在 1945 年 9 月到达新加坡，1967 年 1 月离世，在新加坡居住了约 22 年，经历过日治后的新加坡、在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以及新加坡走向自治及独立的过程。文兵在〈恍见前头挑灯人〉里，叙述了五十年代的政治社会情况，文艺青年的热情、杏影的默默耕耘及为文坛做出的贡献：

“那个时代殖民地政府压制着大伙，贫穷事业不民主是大伙们的生活内容，民族教育危机，黄色文化泛滥，华族青年都要与当地认同，下定决心把殖民地政府推翻，改革社会，维护民族教育文化，消灭黄色文化，建立健康有生命的文化。我们这群五十年代的青年就是在这时代的大熔炉中成长，我也是在这时代背景下和杨先生认识的。

.....

杨先生主编《文风》并不仅是把它当为一口饭吃，一份职业，他是要培养当地文艺工作者的接班人，他是以推动当地的文艺运动为己任。他在中国受当时腐败的国民政府的迫害，又经过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来到了新加坡建立自己的家园，就立即与当地的运动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认同。他是个知识分子，他是在黑暗中单独挑灯照耀道路的人，他单独地分辨大是大非默默地工作，因此他碰上了许多困难与阻力。记得有个时期，他被报馆‘冷冻’了七八个月，什么工作都没给他做，只命他准时‘上工’和‘放工’。他并不气馁，他始终能不甘寂寞，能以浩然正气单独坚守岗位，是令人十分敬佩的。

⁹⁵¹ 林臻〈追忆点滴〉，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20-22；文兵〈恍见前头挑灯人〉，骆明《杏影研究专集》，页 31-33；李汝琳〈忆故人〉，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38；长谣〈回忆·怀念·寄望〉，骆明《杏影研究专集》，页 43。

五十年代后期，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是跟杨先生不懈地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他以《文风》为阵地培养和联系了许多文艺爱好者与写作者，因此给当地青年杂志奠定了基础，使文坛有了足够的文艺读者和写作者，当时的青年杂志编辑与写作者也遵循他所提倡的分辨大是大非的原则举起反殖与反黄旗帜，走向现实主义的总方向。”⁹⁵²

杏影自己也说：

“爱好文艺的朋友，倘我们对一切都失去了希望的时候，不要紧，我们还有文艺。只要我们能够忠实的走文艺之路，我们就会把一切无目的盲目的斗争的力量导向有目的的合作。”⁹⁵³

杏影在新加坡居住 22 年，在他居留过的国家中，度过最长的岁月。他通过他的编辑工作、他的文章，直接或间接地，或褒或贬，表达对新加坡的期望。

新加坡·南洋

杏影对新加坡有恶有爱，有贬有褒。他批评新加坡是一个文明城市，但在重要的地区里却“有可能躲藏怪蛇怪虫的森林，有没有阴沟、没有水电、甚至连厕所都没有的‘山芭’存在，……硬像是有着一种任务：它在提醒着相信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顶卫生的都市，可以尽量享受热食冷饮的新加坡人，这个都会是一个在华贵里有肮脏的都会，看不见的细菌实在很多，倘你不及时注意到它的特质，不小心的话，那脏就可能染污你的灵魂，也可能使你生病。”⁹⁵⁴

他也批评新加坡的‘凉’：“新加坡实在有凉意，到处都觉得凉。实在，连在那热哄哄的恳亲会上，连在朋友的夹缝中也凉，有时简直就是过道风的要人生病的凉！赤道下面的这个都市的舞场、餐厅、咖啡店以及什么艺术会或文化晚会里的那种凉意，真好像是别的地方 - 即令是在寒冷的地方 - 所没有的。”⁹⁵⁵ 这‘凉’应该是指‘冷漠’或人情的淡薄。他认为新加坡人是幸运的、幸福的，但新加坡人可以聪明些。他

⁹⁵² 文兵〈恍见前头挑灯人〉，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31-33。

⁹⁵³ 杏影〈我们还有文艺〉，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87-88。

⁹⁵⁴ 杏影〈暴风雨中的晴朗〉，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95-96。

⁹⁵⁵ 同上，页 95。

觉得新加坡人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过于冷漠，希望新加坡人可以多关切别地方的灾祸，而不是只关注胶锡行情。⁹⁵⁶

然而和其他地方四处硝烟相比，新加坡人还是幸福的。新加坡是上帝给人类的‘地上天堂’，偶然发生一件杀人事件便是头条新闻。他希望在人命如鸿毛的世界，新加坡人永远幸福如斯。⁹⁵⁷

诚然新加坡也曾经遭受战争的磨难。他委婉地指出日治和殖民政府对新加坡造成的伤害。他说新加坡曾经是朴素的，现在虽然社会摩登了、进步了，但新加坡人还是有很古板的倾向，保持着“上一代的中国人的那种规矩、朴素和严谨之风，真有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味道。……在大陆的大都会里面的或即令是镇市上的、县城里面的中国人，他们一天的生活，大概都不会像这里这样的单纯。”⁹⁵⁸这种古板和谨慎和日治下的沦陷时期有关，一直影响当前的新加坡。新加坡没有夜生活，甚甚至连下午也没有，吃食店下午3点就关店，街上5、6点就只有稀疏的行人。虽然战前新加坡曾有过热闹的夜晚，但在沦陷时期，一切改观，因为“在沦陷时期中，统治者在这里实施了嫖赌、抢劫、离间、仇恨、贪馋等等的新秩序，使人们养成一种新的习惯之后，夜不闭户不仅不可能了，同时更因为怕日本人拉夫，怕日本人打耳光或甚至怕叫鞠躬之故，人们从太平洋战争的时代起，白日晚间还养成了不出门的习惯，门几乎都是虽设而常关，而且关得很谨慎。……光复之初，星洲街面上，真是劫匪如毛。”⁹⁵⁹他不直接写新加坡人对日治的回应，却婉转地说：“日本‘皇军’虽然可恨，但新加坡人似乎不是长于恨的人，他们毋宁很有着宽容敌人的雅量。”⁹⁶⁰他提到紧急法令实施之后，虽然歹徒比较收敛，但晚上路人还是不多，和人们没有闲散的情绪有关。所以新加坡曾有过的光耀的夜晚，是回不来了。然而他乐观地说，经历过黑暗的新加坡人，却是成长了。他相信新加坡终会克服它成长的复杂性，繁华的日子一定会到来。⁹⁶¹

⁹⁵⁶ 杏影〈在高楼窗口看海〉，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134。

⁹⁵⁷ 同上。

⁹⁵⁸ 杏影〈新加坡长大了〉，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16。

⁹⁵⁹ 同上，页18。

⁹⁶⁰ 杏影〈在高楼窗口看海〉，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132。

⁹⁶¹ 杏影〈新加坡长大了〉，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15-21。

虽然新加坡人古板，但也正因此，新加坡人现实、爽快和单纯。在 1952 年写的一篇文章里，他提到新加坡的人情淡薄，不过却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因为一切都照章行事，‘Business is Business’；是一个爽快的社会，因为做事直接明白，不含糊；是一个单纯的社会，一切简单明了，罪恶也只在表面，容易除去。⁹⁶²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却实实在在具体地称赞新加坡的‘不单纯’。在新加坡，东西南北来的人都在这里聚会，而且还忘了东西南北的区别，每个人可以赤诚相待，不须穿着肤色和信仰的衣裳。人们相见相识，不须知道姓名，能做朋友就行。他很感性的这样描写新加坡：

“不通姓名可以成为朋友，这确是新加坡的特色，也是新加坡的希望。在这个地球上，新加坡只是一个小黑点，但它正像在这宇宙中的一颗黑点的地球一样有价值。像地球上宇宙中的一切物质，新加坡也有这世上的一切东西。新加坡是一个什么都不缺乏的地方。

这里有最古老的人类的一切宗教，有最新的人类的一切主义。送子娘娘的庙、天主教堂、兴都寺院、回教徒礼拜堂、红木砖铺地的跳舞厅，人迹未到的原始林、不朽的古典音乐、明天就要被忘记的歪歌、最不卫生的新加坡河、最宜保健的赤道下的海滨 ……

有什么东西没有？一切民族的文化结晶都在这个小岛上，人的一切灵智的产物都聚集在这个地方。看了新加坡就看到了这世上的一切，到了新加坡就用不着去其他的地方。

这里有清洁的思想、有肮脏的泥塘，这里有唯心论和唯物论、有僧侣、有和尚、有念佛居士、有甘地主义者、有新的和旧的民主主义、有文艺工作者、有新现实主义的批评家、有‘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斗士 ……

新加坡一点也不单纯，新加坡真是个异常复杂的地方。最可贵的是它的有调和的复杂。在这种复杂里，我瞥见了人类的希望。”⁹⁶³

杏影一直寻找矛盾中的和谐，欣赏新加坡调和的复杂，也认为新加坡面积的小也正是它的长处。⁹⁶⁴ 他描写新加坡是一个集首都、港口、商埠、工业区、甚至农园为一处的大都会。以莱佛士坊为中心的一个小方块和它的周围，就是一个都市国家全部神经的总汇，把政府、银行、邮政、文化机构、百货公司、商店餐厅、戏院舞厅等都压缩在

⁹⁶² 杏影〈新加坡是一个爽快的城市〉，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171-172。

⁹⁶³ 杏影〈东就是东，西就是西〉，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184-185。

⁹⁶⁴ 杏影〈人生大学的新加坡〉，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59。

这一个市区中心。他为它的丰富自豪，又为它的面积而可怜。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一块小面积却是多个民族的集中地：

“这一块地方里面所有的东西，还不只是一个民族的压缩体，而且是几多个民族的东西，而且是世界上的历史久名声大的一些民族的精华的集中哩。新加坡市区，说丰富实在是丰富，说自豪也实在值得自豪，然而说可怜却又是多么可怜！正像一个身体虽小五脏倒是很齐备的小麻雀那样的值得骄傲，又那么值得人怜惜一般。

.....

.....正因为有这样小的地方容纳了这样的人，而且还是各种不同的民族，.....正因为有这样基本上不同的东西被压缩在这样小的一个区域里，所以在新加坡才有了像今天这样的一种可贵的调和，才有了这样难得的一个国际都市或不如说一个‘国际国家’的出现。这里是几多个民族所共有的一个家园，.....这真是多么难得的事，多么美的景象！这些不同的民族，不在这里生活即罢，要在这里生活就得和和气气的挤在一块儿，好歹都非喜欢、理解或宽容对方不可。这种精神，倘能真的予以发扬光大，倘新加坡的‘小’和‘挤’能够造成这样的一种好的结果，那么，.....就让新加坡再挤一点，使这世上的每一个民族都再派来若干代表，在这个窄小的区域中拼命的多挤一下，好去彻底学习一番，为什么在这个都市里面的许多不同的种族能够这样和谐、能够这样相亲相爱的秘诀。这点确是这个无双的都会的一个了不起的秘密。”⁹⁶⁵

新加坡是“东西的文明的十字路口，要冲突的许多‘文明’，居然在这文明的交错的路口，融融泄泄。”⁹⁶⁶ 他常常担心人类会用自己建设的文明毁灭自己，⁹⁶⁷ 也担心文明会把人类带进一个要毁灭它自己的原子武器竞争的时代。”⁹⁶⁸ 但新加坡却能融合各种族文化，使不同的宗教、新旧的思想、对立的观点都能兼收并容，和平共处。因此他给新加坡至高的赞美：新加坡为上帝赐予人类的‘地上天堂’。⁹⁶⁹ 这正是他思想里所欣赏的离散文化的杂糅特质。在新加坡，他看到了文化融合、思想并容、宗教调和、种族和谐的体现，他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⁹⁶⁵ 杏影〈人生大学的新加坡〉，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58-60。

⁹⁶⁶ 杏影〈在高楼窗口看海〉，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133。

⁹⁶⁷ 杏影〈威尔斯的关怀〉，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143-144。

⁹⁶⁸ 杏影〈文明断想〉，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84-85。

⁹⁶⁹ 杏影〈在高楼窗口看海〉，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133。

第四节 李汝琳：‘我爱上了新加坡！’⁹⁷⁰

编辑和出版

李汝琳最为人知的是他的编辑和出版的热忱。李汝琳主编的《南方文丛》包括了散文集连士升的《名山胜水》和《春树集》，杏影的《书与人》和《愚人的世纪》；长篇小说苗秀的《火浪》、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韦晕的《浅滩》、林参天的《浓烟》与《热瘴》、李汝琳的《漩涡》和李星可翻译韩素音的《青山不老》上下集，再加上一本戏剧集——李星可的多幕剧集《快艇》。《南方文丛》的出版目的是协助长篇和大型的书籍出版。新加坡作者当时长篇写得少，因为即使写了也少有机会出版，因此李汝琳希望由于《南方文丛》的出版，能鼓励长篇的写作。⁹⁷¹

《南方文丛》，顾名思义，是有关南方国家的作品，但更确切地说，是南洋作者的创作。李汝琳本来是想把他的《泥泞》作为丛书之一，但因《泥泞》是以中国社会为背景，他觉得并不适合放在以南方社会为背景的丛书里，便以《漩涡》取而代之。⁹⁷²

《南方文丛》非《南洋文丛》，但都是南洋作家的作品。因此李星可翻译韩素音以尼泊尔为背景的《青山不老》，李汝琳以印度为背景的《漩涡》，以及连士升的散文集《名山胜水》都是《南方文丛》的丛书。《名山胜水》包括了三卷：上卷回忆中国与香港，中卷描写新加坡、越南和印度，下卷讲述欧洲的许多国家，因此《南方文丛》应该是南洋作者的创作，南洋作者是李汝琳鼓励创作的对象。

李汝琳积极地推动新加坡的出版工作，除了《南方文丛》外，他还用三年的时间，从1958至1960年每年一集，编辑及出版了三集，每集12本的《新马文艺丛书》。这套丛书，目的不但是不让作品流失，也因为他看到新马的书籍数量少得可怜，作者士气低落，还被外地人视为马华文艺贫瘠。他希望藉着《新马文艺丛书》的出版，能鼓励新马写作人努力创作，更希望能培养新作者继承并发展马华文艺。他的选稿原则首先

⁹⁷⁰ 李汝琳〈诚挚的爱〉，《金与沙》（新加坡：万里书局，1980），页11-15。〈诚挚的爱〉写于1966年7月20日。

⁹⁷¹ 李汝琳〈关于《南方文艺》〉，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300-305。

⁹⁷² 同上，页303。

是作品的素质、避免作者重复、不限于出过书的作者、收纳不同体裁。因此《新马文艺丛书》包括了长、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杂文；作者也包括了文坛上的老、中、青。⁹⁷³不仅如此，《新马文艺丛书》反映了新马在不同时段的历史－华人南渡、日据前后、殖民统治及自治初期，不同阶层、职业的人民的生活－学生、老师、校长、商人、扒手、舞女、码头工人、胶工、园主等。在人民中包括了不同的种族－新马从事割胶工作的淡米尔族，⁹⁷⁴ 在荷兰人的统治下的印尼人⁹⁷⁵ 以及学校里与华文教师一样，面对教育问题的巫文教师。⁹⁷⁶《新马文艺丛书》三集的作者及书目见附录 8。

这套丛书出版时他拒绝在封面或扉页印上编者姓名，只同意在版权声明上用小号字印上自己的名字。他还谢绝编书酬劳，只接受一百本书，其中 50 本赠与作者，另外 50 本赠与文艺界朋友。李汝琳为了出版这套丛书，花了两年的时间，先蒐集各类体裁的作品，了解当地作家的成就，然后看稿、选稿。以 36 本《新马文艺丛书》共约 240 万字，有的书看了两遍计算，看了近四百万字，这数目还不算选余的稿子和看了却没选上的稿子。⁹⁷⁷ 他清楚的说明他积极推动书籍出版的原因：

“我的目的旨在为马华文艺贡献微薄的力量，出版更多的书，促进马华文艺的繁荣，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个人的得失事小，整个马华文艺的繁荣事大，因此所有的严肃的马华作家，我都敬而爱之，即使是素不相识，也会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⁹⁷⁸

除了《南方文丛》、《新马文艺丛书》外，李汝琳还编了《新马戏剧丛书》，⁹⁷⁹ 收集了两部四幕剧－朱绪改编的《海恋》与史可扬的《生活的旋律》；四部戏剧集－

⁹⁷³ 李汝琳〈一套丛书的诞生〉，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 294-299。

⁹⁷⁴ 貂问湄《金马梭胶园》（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

⁹⁷⁵ 骆起东《翡翠带上》的三篇短篇小说〈翡翠带上〉、〈失去春天的高原〉、〈小天下〉（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都是以印尼棉兰为背景，写在荷兰人的统治下印尼人的悲惨。

⁹⁷⁶ 丁冰《芭野上的春天》中的〈未了情〉刻画了华文与巫文教师如何通过教导孩子来促进两个民族的团结，共同努力建国。

⁹⁷⁷ 李汝琳〈一套丛书的诞生〉，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 294-299；马汉〈李汝琳与“新马文艺丛书”〉，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页 256-261。

⁹⁷⁸ 李汝琳〈一套丛书的诞生〉，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 298。

⁹⁷⁹ 方北方〈巴金与李汝琳－记“文学丛刊”和“新马文丛”〉，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167；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109。

叶苔痕的《第二街》⁹⁸⁰、陈征雁的《封锁线》⁹⁸¹、罗大章的《第一代》⁹⁸²以及关新艺的《学店》。⁹⁸³加上在《南方文丛》为李星可出版的多幕喜剧《快艇》，⁹⁸⁴他对于戏剧的编写和推动，出了不少力。

《南方文丛》、《新马文艺丛书》及《新马戏剧丛书》这三套丛书共计 54 本。为新马华文教界津津乐道。方北方还甚至将李汝琳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媲美：

“如果说巴金先生，是促进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大师之一，同样的，我们也认为李汝琳先生，一生对马华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应受重视，认为他是今日马华文学新收获的功臣。

.....

李汝琳先生主编的这三套，深具形象思维，反映马来亚社会一定的内容，厚厚薄薄既有五十四册，字数共约三百万的马华文学作品，自一九五八年络绎投入仍被视为‘文化沙漠’的新马文坛，使海外一般对马华文学还是很模糊的人士，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马华文学写作人看到圈内的同行有不俗的表现，妄自菲薄的观念也逐渐淡化；一路来认为本地姜不辣的文人，也开始有了接受文学批评的倾向，而对马华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看法。

所以这五十四本具有水准的马华文学作品，所发出的光辉，使海外的文化人看见了华人社会的面貌，也照亮了马华写作人学习的文学道路，对马华文学的发展起着良好的作用。

.....

总之，李汝琳先生一生对马华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巴金先生的促成现代中国文学的进步，同样具有发扬中华文学的意义。”⁹⁸⁵

⁹⁸⁰ 叶苔痕《第二街》收录〈第二街〉、〈渔岛风云〉、〈无灵的杯琖〉、〈密云里的太阳〉与〈终身大事〉（新加坡：青年书局，1962）。

⁹⁸¹ 征雁（陈征雁）的《封锁线》收录〈父与子〉、〈新的课程〉、〈别后〉、〈封锁线〉与〈楼上人家〉（新加坡：青年书局，1962）。

⁹⁸² 罗大章《第一代》收录〈新一代〉、〈门庭〉与〈血腥的人〉（新加坡：青年书局，1962）。

⁹⁸³ 关新艺《学店》收录〈穷途〉、〈退学〉、〈学店〉、〈危险分子〉与〈太太们的会议〉（新加坡：青年书局，1962）。

⁹⁸⁴ 李星可《快艇》收录三幕喜剧〈快艇〉、五幕喜剧〈钓金龟〉与四幕喜剧〈绑票〉（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

⁹⁸⁵ 方北方〈巴金与李汝琳－记“文学丛刊”和“新马文丛”〉，《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166-168。

他当时还在师资训练学院任教，出版工作只能在工余的时间进行。但他不辞劳苦，为了出版事业，他细筹划、勇执行，为了培养新血，他立原则、定目标，为了马华文艺，他任劳任怨、尽心竭力。他的视野是宽广的，他认为通过这个途径，才能振兴马华文艺，才能使新加坡文艺在中国文坛、世界文坛上吐气扬眉。表现在出版事业上他的努力，与他在创作上所表达的对新加坡的爱和认同，完全一致。

由新马文人创作的《南方文丛》、《新马文艺丛书》与《新马戏剧丛书》，内容丰富而多样化，在展现了新马华人离散族裔对中国的记忆和想像的同时，也反映南洋及世界许多地方的历史和社会场景，及对居留国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进行思考与探索。

创作

李汝琳也在自己的创作中呈现对他居留国的思考。以印度为背景，但却是在新加坡写成的《漩涡》里，李汝琳表达了他对海外华人侨居的看法和对中国的态度。⁹⁸⁶当时印度的华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侨民，是印度‘少数的客人’。⁹⁸⁷他以印度的华人和缅甸的华人以及加拿大的华人作比较，认为当殖民地成为独立国之后，居民应该与他们的居留国认同：

“仰光……那边的华人……虽然热爱祖国，也同样热爱他们生根居住的土地，在日军占领时期，跟缅甸人站在一起，反抗侵略。缅甸独立之后，他们不再认为他们是远离故国的侨民了，有许多华人青年热烈的参加了国家的建设工作，他们已经快乐的成为缅甸的公民了。他们的处境，一样没有什么困难。

……过去他们始终自认为侨民，主要是他们居住的国家，总把他们当作是外人，精神上难免是倾向于祖国的。今天不同了，殖民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他们不再受到歧视，而且在实际生活上，跟居留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生活在这个土地上，在这个土地上有他们的父母妻子，有他们的财产事业，有他们的祖宗坟墓，如果这个国家有了外侮，当然会勇敢的跟这个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成为他们的

⁹⁸⁶ 李汝琳《漩涡》后记，李汝琳《南方文丛》之一《漩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年简体字初版），页246-247。

⁹⁸⁷ 李汝琳《漩涡》，页145；《漩涡》后记，页247。

一份子，共同抵抗外侮，一方面为了道义，另一方面也为了自己的家人财产，这是很自然的道理，这是老老实实的，无可置疑的。

…… 战后东南亚各殖民地国家，逐渐独立之后，侨民的观念就有很大的改变。就像许多原是英国移民法国移民的加拿大人一样，把世代居住的土地，忠实的看做是自己的国家。中国有六万万人口，不会拉住他们不放，就像中国有一千万方公里的土地，不需要侵占别人的土地一样，双重国籍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988

Butler (2001) 认为居留国是塑造离散族裔身份的重要成分。⁹⁸⁹ 李汝琳认为从原来的侨民成为建设居留国的一份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国家独立之前他们被视为外人，但在逐渐和居民融合，共同生活，建立家园，参加国家建设之后，他们和居留国的感情产生了变化，关系可能更加密切。他对其他离散族裔的观察，以及他自己的体验，都给予了 Butler (2001) 的理念有力的支持。Gilroy (1990) 坦言他要同时被认同为黑人和英国人，⁹⁹⁰ 这也同样是李汝琳认同为即是中国族裔也是本地华人的立场。

李汝琳的《漩涡》把 1946 至 1947 年印度华人社会的状况写了进去，他也不忘把新加坡写进《漩涡》里。他说明新加坡华文报章的水准不逊于中国省会的报章，而且是海外华文报章的佼佼者。⁹⁹¹ 《漩涡》在 1961 年下半年完成，应该是他重获公民权的时段。

根据 1957 年新加坡公民权条例，新加坡自治政府从 1957 年 11 月日起至 1958 年 1 月 31 日止颁发公民权予合乎条件的居民。出生于新加坡或马来亚，或在新加坡居住两年以上的英籍居民、十年以上的其他居民，愿意放弃原国籍而效忠新加坡者，都能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⁹⁹² 李汝琳于 1947 年终来到新加坡，根据条例，应在 1957 年终或

⁹⁸⁸ 李汝琳《南方文丛》之一《漩涡》，页 145-146。

⁹⁸⁹ 同上，页 207。

⁹⁹⁰ Paul Gilroy,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Ethnic Absolutism." *History Workshop*, no. 30 (1990), p.116.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289014.

⁹⁹¹ 李汝琳《漩涡》，页 159。

⁹⁹² C. Mary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 - 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p.268. (Call no.: RSING 959.57 TUR-[HIS]); [Citizenship offer to 250,000 aliens. The Straits Times](#), 27 August 1957, p.7. Accessed NewspaperSG on 9.8.2019.

1958 年初已获得公民权。然而不知何故，他的公民权在 1959 年突然被吊销。⁹⁹³ 不过，就在 1959 年，他表达了对新加坡的归属感和期待：

“.....

如今又生活在城市里，
这儿已是我的家乡，
文明使人类节省了脚力，
但不远也有着破落的甘榜。

在那儿居住着勤苦的农夫，
那儿还有着坎坷的黄土道路，
路途是这样的难行啊，
但必须走往我们要去的地方！

平坦的公路会不断的伸展，
好像年代会永远向前，
到那时再不会看到坎坷与不平，
人们会欢欢喜喜走在宽阔的路上。

我走过很长很长的路，
也仍然要走向辽阔的远方，
前人从荒野走出了道路，
我们从这小径走向欢呼的广场！”⁹⁹⁴

他 1959 年被吊销的公民权，两三年后才重获。1961 年他的教职也发生了问题，但在连士升的奔走和担保之下，才保住了教职。⁹⁹⁵ 难能可贵的是即使他经历了这些磨难，在 1961 年 7 月写的〈谢恩请〉写的是对中国的赞扬和感谢，却也同时肯定了他对新加坡的认同。上一章引用了全首，这里只主要截取他对新加坡的赞美：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母亲啊，我想起了您，
您生我而又养育了我，
在您的怀抱，在您的膝下，

⁹⁹³ 李汝琳〈回忆连士升〉，《李汝琳创作集》，页 282-283。李汝琳未说明原因。

⁹⁹⁴ 李汝琳〈路〉，《叩门》（香港：万里书局，1961），页 52-56。此诗作于 1959 年 8 月 7 日黎明。

⁹⁹⁵ 李汝琳〈回忆连士升〉，《李汝琳创作集》，页 282-283。

.....

今天，我投在另一个怀抱里，
唉，那不堪回首的岁月，
我带着赤血淋淋的心，离开您，
走向遥远遥远的南方。
我寂寞的到处流浪，
最后安居在这土地上，
我爱上了这美丽的所在，
这儿有辽阔无边的大海，
这儿有终年长青的树，
这儿有四季盛开的花，
这儿有急待开发的荒野，
母亲啊，我投向另一个怀抱。”⁹⁹⁶

我们不清楚李汝琳的大喜的日子所指为何，又或许只是用来表达一种单纯的喜悦。查阅李汝琳 1961 年的喜事，在他的年表中提到《叩门》于 1961 年 9 月于香港万里书局出版，⁹⁹⁷ 他在《漩涡》后记中记述了他于 1961 年学校的第二个假期完成《漩涡》。⁹⁹⁸ 但这些事应该不比重获公民权和保住教职事大。如果不是家庭的喜事或单纯的诗意表达，他应该是为了能继续做新加坡的儿子而感到无比的喜悦。在这首诗中李汝琳刻意的澄清了他离开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不是忘恩负义，因为他没有忘记祖国的恩情，他也说明了他对新加坡的肯定与赞美，表明了他的新身份 - 新加坡的儿子。

李汝琳诗歌和小说中所呈现的是对故国土和新家园的并行不悖的情感，有如 Butler (2001) 所论述的，本地出生的离散族裔的体验不止包括了父辈的记忆，也包含了居留国的在地实景与离散族裔社群的面貌，两者糅合而产生新的体验。⁹⁹⁹，也有如王赓武所提出的，他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可同时存在。¹⁰⁰⁰

⁹⁹⁶ 李汝琳 〈谢恩情〉，李汝琳《金与沙》（新加坡：万里书局，1980），页 6-10。〈谢恩情〉写于 1961 年 7 月 22 日。

⁹⁹⁷ 骆明主编 〈李汝琳年表〉，《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10-13。

⁹⁹⁸ 李汝琳 《漩涡》后记，，页 246-248。

⁹⁹⁹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192. Doi: 10.1353/dsp.2011.0014.

¹⁰⁰⁰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ennifer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在新加坡独立之后，于 1966 年他再直接明白地表达了对新加坡诚挚的爱：

“我说：我爱新加坡！

从三藏取经的古国而来，
可不只为了歇一歇行脚；
想当年从北而南，
十八年前又从西到东，
结束了天涯流浪的生活。

新加坡是年轻的，
我曾亲眼看见它摆脱了枷锁，
一天天在成长、在变，
它像一个年少英俊的武士，
有如它的人民一样生气勃勃！

.....

我说：我爱上了新加坡，
又敬爱那永具信心的人民，
别以为它太小，太贫乏，
只要一个理想，一条心，
黄土就会变成金！

我不是在这儿歇一歇行脚，
这儿有过不完的长远的生活。
我不会见一个就爱上一个，
绝不像朝三暮四那般轻薄。
我说：我走过很多很多地方，
我却爱上了新加坡！”¹⁰⁰¹

他用直白朴素的语言，恳切清楚地说明对新加坡的感情和认同。到了 1978 年，他用比较委婉的方式 - 以新加坡一些地标的发展，表达了建设新加坡的决心和他对新加坡的支持。认识新加坡地理的人都知道武吉知马、武吉班让、万礼都是新加坡地区的名字，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1;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研究〉，《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页 234-262。

¹⁰⁰¹ 李汝琳〈诚挚的爱〉，李汝琳《金与沙》，页 11-15。〈诚挚的爱〉写于 1966 年 7 月 20 日。

乌敏岛是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一座只有 10.2 平方公里的小岛，而德光岛在乌敏岛以东，面积有 42.3 平方公里：

“.....

东方有个岛国，
像一颗发光的钻石，
又像一粒晶莹的明珠。
他要想西方低地国看齐，
他要征服那跳荡的海洋。
大哥和二哥不断争吵，
它们都要投入大海，
他们要近海变成陆地，
以身负载更多的子民，
使黄土变成了绿野。
武吉知马说它最高，
可以贡献更多土壤。
武吉班让说大哥要显示雄伟，
以身保留原始的森林，
老二你就矗立到千秋万代，
我决定要粉身下海！
乌敏说我的北面还有水道，
我要投入本土的怀抱，
孤悬海上已经太久，太久，
却又不像德光那么遥远。
老三万礼说那就让我下海拉你过来，
大哥二哥也就不再争吵。
东岸南岸只是利用一些无名山丘，
三个弟兄都说使它们难堪。
市内群山一起出声抱怨，
然我们负载了这么多的房舍花园。
好像上了枷锁桎梏不能动弹。
四面八方的山丘一起叫喊：
向东伸展，向南伸展！
那是一望无际的海洋，
我们情愿粉身碎骨，
使我们的钻石更大，明珠更圆。”¹⁰⁰²

¹⁰⁰² 李汝琳 〈山丘的呼号〉，《李汝琳创作集》，页 129-131。诗末注：武吉知马，山名，意为锡山。新加坡最高的山；武吉班让，山名，意为长山；万礼为万礼山。

第五节 姚紫：‘死也要死在新加坡’¹⁰⁰³

对于新加坡，姚紫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在 1975 年给白寒的信中这样写：“我有一个衷心的想法，中国孕育我三十四年，而新加坡生活我三十二年。没有父母之邦的中国，就不会有我的生命，但如果没有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恐怕在三十二年前就给枪毙了”。白寒记述在 1947 年，姚紫任厦门《江声日报》编辑，也在这一年，姚紫来到新加坡。信的内容说明了他一定要离开中国是为了躲避灾祸，并对能在新加坡生活的感激。¹⁰⁰⁴不过，他也指出新加坡一些政治和社会上的弊端。〈善良别名〉以战后澳洲民众对德国大使抵澳的示威抗议，反射新加坡人对日本曾加诸新加坡更极端暴行的容忍。日本记者青木繁赞新加坡人善良，姚紫称此善良为无能的别名。¹⁰⁰⁵〈何自圆其说〉指出新加坡一些叫嚣自由解放和民主的政党中人，却是妻妾成群的大头家。¹⁰⁰⁶然而他也不能容许外人污蔑新加坡，以〈幽默猴子〉反击某作家对新加坡人的污蔑。此作家自新回港后在香港发表一篇‘幽默’小说，说只要有汽车、懂得英巫语，人人都可和马来亚的‘太太’上床。姚紫讥讽说据此逻辑，因猴子与那作家都有两条腿，所以那作家也是猴子。¹⁰⁰⁷他有几篇文字谈到新加坡的住屋问题。〈居不易哉〉慨叹新加坡住房之不易，一间小房子，租金和‘茶钱’就占了受薪阶级三分之二的薪金；¹⁰⁰⁸〈奇迹〉以改良信托局局长不了解现实，批评买屋者付‘茶钱’以迅速获房为傻瓜，却不知这正是改良信托局所制造的‘奇迹’。¹⁰⁰⁹《新加坡传奇》里还有两篇——〈住屋的喜剧〉和〈我讨‘政府’的房子〉，都是反映小市民对房屋的需求与困难。¹⁰¹⁰

¹⁰⁰³ 刘笔农〈悠悠終古－悼姚紫师〉，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62-63。

¹⁰⁰⁴ 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哭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58。然而姚紫所写中国孕育他 34 年似与他 1920 年出生，1947 年抵新之记录有矛盾，因他抵新时应为 27 或 28 岁，非 34 或 35 岁。这其中不是有错误，就可能有年数的重叠。

¹⁰⁰⁵ 姚紫〈善良别名〉，《短长书》页 182，写于 1953 年前后。

¹⁰⁰⁶ 姚紫〈何自圆其说〉，《短长书》页 157，写于 1949 年。

¹⁰⁰⁷ 姚紫〈幽默猴子〉，《短长书》页 178，写于 1953 年前后。

¹⁰⁰⁸ 姚紫〈居不易哉〉，《短长书》页 166，写于 1949 年。

¹⁰⁰⁹ 姚紫〈奇迹〉，《短长书》页 178，写于 1953 年前后。

¹⁰¹⁰ 姚紫〈住屋的喜剧〉，《新加坡传奇》（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姚紫遗产信托人编，1985），页 13-22，姚紫〈我讨‘政府’的房子〉，《新加坡传奇》，页 23-26。后两篇皆未注明完稿日期。

他对故国的缅怀也不间断。从 1948 年来到新加坡不久，一直到 1973 年，姚紫不断地诉说对故国的思念和祝福，¹⁰¹¹ 他对故国的爱不会因生活的舒适与否而改变，¹⁰¹² 尤其是在岁末、¹⁰¹³ 在新年、¹⁰¹⁴ 在中秋、¹⁰¹⁵ 在清明，¹⁰¹⁶ 他更思念家人、怀念故土。然而姚紫在思念故乡的同时，也不忘为新加坡服务。姚紫祖籍福建泉州，而晋江隶属泉州。姚紫南来后曾在晋江学校执教，也曾为晋江会馆（创立于 1918 年）服务，任其第六届理事（1957-1958）的文书一职以及第八届（1961-1962）的常务监察委员之一。¹⁰¹⁷ 他不但在许多文章中表达对新加坡的热爱和期许，病重时还坚持要埋骨于新加坡，更立遗嘱继续发扬新加坡的华文文艺事业。

他在作品中也以方言、土语、俗语及外语融入南洋社会的场景。他用的虽然比苗秀和赵戎少，然而也和他们一样，都是按情境的需要使用。《窝浪拉里》是在印尼发生的故事，他使用了具有南洋色彩的常用词，如：‘暗牌’（便衣警察）、¹⁰¹⁸ ‘阿答屋’（用阿答叶做屋顶的简陋房屋），¹⁰¹⁹ 还用了‘氓刹’（文中自注为流氓）¹⁰²⁰。在《新加坡传奇》中，他用了‘孟咖厘’（闽粤人对印度人的称谓）¹⁰²¹、‘马打’（马来语，意警察）、¹⁰²² ‘马打厝’与‘马打寮’（前者马来语加闽语，后者马来语加粤语，意警察局）、¹⁰²³ ‘沙拉’（马来语，这里指问题）。¹⁰²⁴ 哈罗（英语）、‘密司脱李’、‘密司陈’（英语加华语），¹⁰²⁵ 另外还有〈番客牛〉里的‘头家’（闽语，意老板）和

¹⁰¹¹ 姚紫〈桥〉，姚紫《九月的风》，页 11-13。〈桥〉写于 1949 年；姚紫〈黄昏底叹息〉，姚紫《九月的风》，页 14。〈黄昏底叹息〉写于 1950 年；姚紫〈铜镗黄犊忆儿时〉，姚紫《九月的风》，页 25-29，此文写于 1973 年 12 月。

杏影〈印度的麻雀〉，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69-77。

¹⁰¹² 姚紫〈怀乡草〉，姚紫《九月的风》，页 23-24。〈怀乡草〉未注明写作日期，但文中叙述他离开故乡安海已经三年。姚紫于 1947 年尾抵新，因此此文应写于 1950 年末或 1951 年。

¹⁰¹³ 姚紫〈岁暮草〉，姚紫《九月的风》，页 46-54。此文写于 1953 年 2 月 12 日。

¹⁰¹⁴ 同上；姚紫〈惆怅忆江南〉，姚紫《九月的风》，页 21-22。此文写于 1953 年春节后三日。

¹⁰¹⁵ 姚紫〈中秋，情感的季节〉，姚紫《九月的风》，页 58-59，写于 1969 年 9 月。

¹⁰¹⁶ 姚紫〈清明·忧郁〉，姚紫《九月的风》，页 56-57。此文写于 1969 年 4 月。

¹⁰¹⁷ 彭丽儿主编〈历届理事名录〉，《世纪晋江，百载辉煌：新加坡晋江会馆百年庆，1918-2018》（新加坡：新加坡晋江会馆，2018），页 A9。

¹⁰¹⁸ 姚紫《窝浪拉里》（新加坡：天马图书出版公司，165），页 28。

¹⁰¹⁹ 姚紫《窝浪拉里》，页 58。

¹⁰²⁰ 姚紫《窝浪拉里》，页 49。

¹⁰²¹ 姚紫〈我遇到了霸王妖姬-新加坡传奇之三〉，《新加坡传奇》，页 34。

¹⁰²² 姚紫〈扒手拳下开传奇-新加坡传奇补一章〉，《新加坡传奇》，页 7。

¹⁰²³ 姚紫〈她走入猪圈里去了-新加坡传奇之七〉，《新加坡传奇》，页 60。

¹⁰²⁴ 姚紫〈娼妓·钱·姨太太-新加坡传奇之九〉，《新加坡传奇》，页 75。

¹⁰²⁵ 姚紫〈我做了小姐的跟从-新加坡传奇之二〉，《新加坡传奇》，页 29。

‘估里’（可能源自印度、巴基斯坦的 Kuli。英文为 Coolie）。¹⁰²⁶在《马场的女神》里用了不少英文，包括马场的马的名字，马场的叫喊‘Come on! my dear! Come on……’，描写‘马场女神’穿的黄‘blouse’和红‘skirt’及形容她的‘charming’，穿着马场制服的‘BOY’，八张‘Place’和八张‘Win’的马票等，¹⁰²⁷都贴切地营造了中外人士聚集的马场的氛围，呈现了本土色彩。

《风波》写土生峇峇和娘惹的生活，用了不少英文如‘party’、‘Partner’、‘sweetheart’、¹⁰²⁸‘Lower Class’、¹⁰²⁹‘picnic’¹⁰³⁰、‘One Piece’、‘Two Pieces’¹⁰³¹、‘Frock’¹⁰³²，或英文和华语及方言同用，如“几多？How much?”，“‘Too dear!’ 他嚷道：‘太贵了!’”。¹⁰³³这些中英语夹杂的方式不但是峇峇和娘惹的语言习惯，作者姚紫在说故事时也用了许多，使整篇小说多了许多当时南洋的韵味，峇峇和娘惹生活圈子的氛围。最传神的是娘惹洪太太的这句话：‘Excuse me，我要去放尿’。¹⁰³⁴‘放尿’是闽南语的‘小便’，虽然洪太太用了‘Excuse me’，但这样的组合不但呈现了上下文的不调和，更凸显了她不自觉的粗俗。整篇小说讽刺性的描绘了对语言似懂非懂，生活热闹却苍白，外表光鲜却思想齷齪的一群人，是当时一些有钱有闲阶级的写照。在描写这些人的生活时，《风波》中出现了许多新加坡的地标，如后港、¹⁰³⁵勿洛及勿洛海滨、¹⁰³⁶红灯码头、¹⁰³⁷棋樟山（现在的圣约翰岛）、巴丝班让、¹⁰³⁸莱佛士坊、罗敏申律、邮局大厦¹⁰³⁹等，都增添了本土的色彩。

¹⁰²⁶ 姚紫〈番客牛〉，姚紫《短长书》，页104。

¹⁰²⁷ 姚紫〈马场的女神〉，刘笔农主编《姚紫小说选》，页115-117，124。

¹⁰²⁸ 姚紫《风波》（新加坡：新加坡文艺报出版社刊行，1954），页1-3。

¹⁰²⁹ 姚紫《风波》，页8。

¹⁰³⁰ 姚紫《风波》，页15。

¹⁰³¹ 姚紫《风波》，页28。正确的‘两截式泳衣’（比基尼，bikini）的英文是‘two piece’，‘piece’不需复数。

¹⁰³² 姚紫《风波》，页59。

¹⁰³³ 同上，页9。

¹⁰³⁴ 同上，页2。

¹⁰³⁵ 姚紫《风波》，页5。

¹⁰³⁶ 姚紫《风波》，页41、页9。

¹⁰³⁷ 姚紫《风波》，页17。

¹⁰³⁸ 姚紫《风波》，页20。

¹⁰³⁹ 姚紫《风波》，页33。

除了在语言上用心，他在特别的日子，也鼓励读者思考它们的意义和启示，并献上对新加坡的祝福。¹⁰⁴⁰ 比如在 1961 年，新加坡刚成为自治邦，在一年之始，他说：

“我们该为我们的温暖的土地而欢呼！
我们该为我们的绿色的邦国而更热爱！
我们的绿色的邦国正在过尽历史的漫漫长夜，挣脱囚徒的枷锁，走向自由，
走向光明！
……
1961 年来了！
…… 跨在这年的门槛，我们需要更大的忍耐和坚决，负起这开邦建国的伟大的
历史任务。”¹⁰⁴¹

在 1969 年的第一天，他从思念故国的睡梦中惊醒：

“‘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弟妹们的哭声混合在大陆同胞一片震天撼地的哀
恸声中——那是地狱！地狱！地狱！只教你痛苦的思念，绝望的惦记，但将永
远不敢回去的血腥的祖宗的坟场！成千上万的华人将成为‘白华’在海外流浪，
徘徊在国门外痛苦，而他们将惶惶恐恐地以取得外国国籍和居留权作为生命寄
存的目的。
…… 这是什么年代？”

然而紧接的下一句是

“新加坡的公民成为东南亚最值得羡慕的人民！
新加坡只是一个弹丸般的小小的岛之国！华人占八十五巴仙，是海外华人的天
堂！”¹⁰⁴²

对痛苦绝望的‘白华’，新加坡是他的希望、他的天堂。

他肯定新加坡的快速成长，肯定新加坡在 1962 年至 1972 年的 10 年里，已经发展得焕
然一新。¹⁰⁴³ 在 1970 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的除夕夜，他渴望能知道，如何使孩子脱离贫穷，
如何使这岛国的人们过上快乐幸福的日子，不受邻人凶狠无礼的欺凌，如何使人与人

¹⁰⁴⁰ 姚紫〈中秋，情感的季节〉，姚紫《九月的风》，页 58-59，写于 1969 年 9 月；姚紫〈几日又中秋〉，姚紫《九月的风》，页 60-61，写于 1969 年 9 月；姚紫〈清明·忧郁〉，姚紫《九月的风》，页 56-57，写于 1969 年 4 月；姚紫〈时间的旅路〉，姚紫《九月的风》，页 62-65，写于庚戌年元旦。姚紫所指的庚戌年为 1970 年。

¹⁰⁴¹ 姚紫〈迎接一九六一年〉，姚紫《九月的风》，页 52-53。

¹⁰⁴² 姚紫手迹，姚紫《夜歌》，收录于目录前，无页数。

¹⁰⁴³ 姚紫〈江湖浪子寻梦录〉，姚紫《九月的风》，页 107。

和平共处；在大年初一，他感受到‘春天来到了新加坡！’他的愿望是新加坡人效忠于新加坡，认为‘那边好’的人可以离开。新加坡人要使自己、孩子、亲人和朋友过着幸福的生活，就要共同努力，建立一个合情合理、幸福进步的社会，一个强健有力、踏实美好的国家。他强有力地呼吁：

“历史的道路尽管迂回曲折，真理的发现规律，终于使我们找到了新的故乡，那就让我们聚居下来，蕃殖下来吧！”¹⁰⁴⁴努力耕耘，辛勤播种，‘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并且以血和汗，精神和肉体，坚决地捍卫它——直到万世！”¹⁰⁴⁵

姚紫对新加坡有着极浓郁的感情。就在他病重要往中国求医时，还告诉他的学生刘笔农等，“他是要回来的，不论病能否医好，即使一病不起，他也要拖命回来新加坡，死也要死在新加坡。”¹⁰⁴⁶在他临终前，他把写于壬戌年（1982 年）的最后诗作〈华侨子弟在天涯〉交由《新加坡文艺》发表：

“梦回故国已无家，浩气磅礴砥暮霞
箫鼓楼台海上起，华侨子弟在天涯

华侨子弟落天涯，跃虎腾龙飞月槎
联合客观成大用，其中有国号新加

赤手奇功夸四海，华侨子弟满天涯
能忍辛茹惊世眼，金潮银涛钓鳌家

故国荒烟绕暮鸦，血泪纵横遍鬼蛇
十亿人民都苦难，华侨子弟在天涯”¹⁰⁴⁷

在这首诗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故国虽曾是他魂牵梦绕之处，却成了不忍卒睹之所；华侨子弟虽流落天涯，却在付出努力、经历艰辛之后，协助他们所居住在海外的一个国家——新加坡，取得成功。这是他最后的诗作，也是他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对他的故土希望的幻灭，以及对他的新的家园的期许。

¹⁰⁴⁴ ‘蕃殖’为原文。

¹⁰⁴⁵ 姚紫〈时间的旅路〉，姚紫《九月的风》，页 62-65，写于庚戌年（公历 1970 年）元旦。

¹⁰⁴⁶ 刘笔农〈悠悠终古——悼姚紫师〉，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62-63。

¹⁰⁴⁷ 刘笔农〈三十年前伟丈夫——姚紫先生逝世半年祭〉，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94。

姚紫前仆后继的编撰副刊，在 1939 至 1977 年的 38 年中，总共编辑了 20 种刊物。他的创作生前出版的计有 12 本小说，2 本散文集。他在临终前仍不忘传承新加坡的文艺事业。他立下遗嘱，设立文艺基金以鼓励本地文艺创作，也为他出版尚未出版的遗作。在他离世后，他的好友兼遗产信托人，替他出版了 9 本书，也赞助了 38 本不同文体的文艺书籍。以他对新加坡的爱与贡献，被正名为‘文艺带火者姚紫’¹⁰⁴⁸，是最贴切的。

第六节 苗秀：‘培养国家意识，发扬爱国精神’¹⁰⁴⁹

苗秀记述其父从中国‘只身南渡’，好友赵戎也记苗秀出生于新加坡。¹⁰⁵⁰在马华文坛上，谈到苗秀，就会联想他的特殊之处：他上的是英校，创作的是中文；他的作品加入了马来语及许多方言，特别是广东话；他对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坚持。他的特殊之处与他的出生、幼年及少年的经历、殖民政府和日治，以及曾参与的工作密切相关。

在日军侵华及南侵的背景下，苗秀 1940 至 1950 年代初的小说中，描写了一批批的青年北归。¹⁰⁵¹有些人向往北归，却因家累不得不留下¹⁰⁵²除了北归的人群外，留在这里的人许多参加了救亡工作。¹⁰⁵³苗秀也借着自动留下来不走的人，说明他不但不认为回归是唯一报国的看法，而且他们居留国的土地也需要被捍卫。在苗秀著名的长篇小说《火浪》中，有一些人认为在这里也可以支持中国的抗日行动，如姚红雪，一位积极

¹⁰⁴⁸ 姚紫作为新马先驱编者与作者及对新马文坛的贡献，被誉为‘带火者’。‘带火者’也是姚紫一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由新加坡文艺出版社 1955 年出版。亦见黄叔麟〈姚紫与我〉，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08；列蒲〈我生平见过姚紫两次〉，《姚紫研究专集》，页 120。

¹⁰⁴⁹ 苗秀〈建国时期的文艺方向〉，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124。写于 1978 年 8 月。

¹⁰⁵⁰ 苗秀《旅愁》后记（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53）；赵戎〈苗秀论〉，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134；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183。

¹⁰⁵¹ 苗秀〈雨〉，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 199：“他又送走了好几批朋友。一些认识的跟不认识的，都一批批的走了。”〈雨〉写于 1950 年 7 月。

¹⁰⁵² 苗秀〈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20；〈雨〉《苗秀小说选》，页 202。

¹⁰⁵³ 苗秀〈红雾〉，《苗秀小说选》，页 157-170。

的抗日女性，“从一只任人摆布的羔羊锻炼成一个坚毅的救亡工作者”，¹⁰⁵⁴ 决定留下来，因为：

“这儿一样的需要人工作。如果大家都拿枪杆去了内地，这里的工作谁来干？我觉得把这里丢下不管，是不对的。就我个人来说，我熟悉这里的情况，工作起来比较方便，容易收效。”¹⁰⁵⁵

姚红雪留下了来是要在这里展开救亡工作。另一位女性林玲，从一个只关注自己的小天地，到觉悟自己也可救亡尽一份力的女性。她认为留下来、也是为了这土地，为大众的幸福贡献力量：

“这儿也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干。在这里工作，也一样有意义。同样是为着捍卫这土地，围着最后胜利，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¹⁰⁵⁶

苗秀在这里清楚地表达了这片他们居住的土地需要有人留下来捍卫的看法。他再通过夏恩（夏财副）想法的转变，说明了他关注本地的意识。夏恩（夏财副），起初一心想离开这城市的银行书记和救亡工作者，在经历了日本飞机轰炸阿答屋，他的朋友阿庄被机关枪击中身亡的时刻，他感觉到了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呼呼的夜风，卷起了巨大的火柱，花拉花拉的啸着，还夹杂了凄厉的哭声。大地、山峦、谷间，浴在无边的火浪里。”

火，摧毁一切。

但火却在夏财副的心头燃起了崇高的情感的火花。他有生以来第一回觉得他是多么爱这受难的土地——这孕育他的土地！他年青的心，因为这土地的受难，给敌人蹂躏而剧烈地痛苦着……”¹⁰⁵⁷

苗秀的这部小说以《火浪》为名，这部分描绘火浪烧毁本地人的家园，夺走生命，因人祸造成的惨痛现实与书名最为直接。然而火浪也激起了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清楚的表达了苗秀要为本地人服务的思想意识。苗秀表明《火浪》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这段历史中人民的精神世界：

¹⁰⁵⁴ 苗秀《火浪》（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页154。

¹⁰⁵⁵ 苗秀《火浪》，页296。

¹⁰⁵⁶ 苗秀《火浪》，页304。苗秀在《火浪》末页记他于1950年6月6日完成初稿，1959年7月17日重改。在《火浪》的〈写在《火浪》前面〉，苗秀在1959年8月24日记述这本有关1941年前后的时代的小说，是从1949年开始写起，至1950年完成。

¹⁰⁵⁷ 苗秀《火浪》，页204。

“我要写的，绝不是单纯的历史记录。我还要刻画出那贯串在这些历史事变中间的整个精神世界的汹涌的波澜，写出人民的欢乐与痛苦，表现人们的愿望，说明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¹⁰⁵⁸

接下来，夏财副又看到了这城市的污秽、凌乱和塌陷，觉得自己实在应该为这苦难的土地出一份力，要离开这座城市想法不再带给他欢欣和鼓舞。¹⁰⁵⁹在小说结束之前，苗秀再一次藉着夏财副、林玲和其他人的留下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观点——留在本地的人的艰辛，还胜于游击队：

“……留在那个陷落了的城市，为着苦难的人民工作着，用各种各样隐蔽的方式，和那个自以为征服了这个城市的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斗争。比起那些在大芭拿了枪杆，手榴弹，跟鬼子作战的，这些人有着更少自由，而又忍受着更大的屈辱。这斗争是艰苦的。

不过，凡是正义的斗争，没有不艰苦的。”¹⁰⁶⁰

自动留下来不走的，更有如〈边家的人们〉里山芭小学的张校长，因为他要帮这里的人读书识字，而且他觉得要做事情，哪里都可以，所以虽然许多人想走，他却‘连想都没有去想’。¹⁰⁶¹张校长单纯的要让这片土地的孩子念书识字，应该是身为老师的苗秀的心声。

北归或在本土抗日救亡是侨民报效祖国的表现，但为本地民众服务的目标更是苗秀极为强调的。无论文艺创作上或是理论上他都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坚实支持者。他记述〈一九四七年的马华文艺概况〉时，主张为了要服务本地人，文艺的形式就应该大众化：

“文艺是应该服务于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是大众的代言人。因此我们首先肯定文艺大众化这一要求，把一向局限于小圈子里的马华文艺推广到广大的群众中间，创造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完成文艺普及的任务，从而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¹⁰⁶²

¹⁰⁵⁸ 苗秀 〈写在《火浪》前面〉，苗秀《火浪》，页1。

¹⁰⁵⁹ 苗秀《火浪》，页297。

¹⁰⁶⁰ 苗秀《火浪》，页305。

¹⁰⁶¹ 苗秀 〈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217-219。

¹⁰⁶² 苗秀 〈一九四七年的马华文艺概况〉，苗秀《文学与生活》（新加坡：星洲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印行，1967），页1。

他也指出一路受中国文学影响的侨民文学，再也‘无法负起现阶段马华社会的特殊历史任务的’，因此‘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口号于1947年第一次被提出，扬弃了侨民文学，在马华文学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因为‘新的真正的马华文艺诞生’了。¹⁰⁶³苗秀引述‘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座谈会记录，指出马华文艺在内容方面，有其‘特殊任务’、‘特殊的具体内容’；新马华人的生活，随时空的转移也产生了变化：

“华人社会的生活，虽然还带着八九十巴仙是固有的中国式，但历史（时间）和环境（地域），已经使它部分地改变了。”¹⁰⁶⁴

这期间马华社会感染了马来、印度及英欧人的生活及艺术，因此

“马华的生活方式与祖国社会生活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根据这样的社会基础创造的艺术，自应有其特殊性。”¹⁰⁶⁵

在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华人和其他的种族相处，生活习惯和语言都彼此相互影响。他观察当时在创作中语言的应用：

“作品的语言，却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华社会大众的口语，尤其是在小说方面，更显示了相当的成绩，这点是值得珍视的，因为这是健康的发展。”

苗秀除了肯定其他作家在创作里使用其他种族的语言，特别是马来语，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由地使用方言和马来语。他认为新马方言很多，他也用了福建话。¹⁰⁶⁶有些学者指出他曾用的‘头先’、‘头路’，‘千猜’是福建方言，¹⁰⁶⁷然而笔者认为‘头先’、‘头路’闽粤语都通用，‘千猜’还是马来语借词。苗秀用得多的还是粤语方言，特别是在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时，例子不胜枚举，如用粤语的‘睇’代替华语的‘看’，‘渠’代替‘他’，‘扣’代替‘块’（钱），‘搵’代替‘找’，‘唔’代替

¹⁰⁶³ 同上。

¹⁰⁶⁴ 同上，页2。

¹⁰⁶⁵ 同上。

¹⁰⁶⁶ 苗秀〈写给一位青年的信〉，赵戎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 散文一集》（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1971），页27。此散文集未注出版年份，然根据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53，此集于1971年出版。

¹⁰⁶⁷ 陈世俊〈苗秀小说的艺术特色〉，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174。

‘不’，‘乜’或‘乜野’代替‘什么’，‘呢个’代替‘这个’，如这个短句：
‘呢个时势，有乜办法啦，你唔去唔得架……’。¹⁰⁶⁸ 其他还有：

方言或俗语：

‘落雨’（粤语。华语的‘下雨’）¹⁰⁶⁹

‘后生仔’（粤语。华语的‘年轻人’）¹⁰⁷⁰

‘细佬’（粤语。华语的‘年轻人’或‘小弟’）¹⁰⁷¹

‘细蚊仔’（粤语。华语的‘小孩子’）¹⁰⁷²

‘细佬哥’（粤语。华语的‘小孩子’）¹⁰⁷³

‘千祈’（粤语。华语的‘千万’）¹⁰⁷⁴

‘点解’（粤语。华语的‘为什么’）¹⁰⁷⁵

‘仆街’（粤语。直意为横尸街头，是咒人和自咒的词语，也有‘倒霉’、‘活该’的意思）¹⁰⁷⁶

‘财副’（粤语。苗秀自注‘书记’。¹⁰⁷⁷《火浪》中的夏恩，被称为夏财副。¹⁰⁷⁸）

‘容乜易’（粤语，意即太容易了）¹⁰⁷⁹

‘红牌老举’（粤语‘老举’即华语的妓女）¹⁰⁸⁰

‘种番薯’（粤语。苗秀加注释‘死了下葬’）¹⁰⁸¹

‘含家铲’（粤语，诅咒对方全家死光）¹⁰⁸²

‘吉宁婆’（印度妇女）（这是粤语用来形容印度女子的用词）¹⁰⁸³

‘沙尘’（粤语。苗秀加注释‘骄傲’）¹⁰⁸⁴

¹⁰⁶⁸ 苗秀〈太阳上升之前〉，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4。

¹⁰⁶⁹ 苗秀〈最末一个离开的〉，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95。

¹⁰⁷⁰ 同上，页90。

¹⁰⁷¹ 同上，页96。

¹⁰⁷² 同上，103。

¹⁰⁷³ 苗秀〈我的师傅〉，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119。

¹⁰⁷⁴ 苗秀〈最末一个离开的〉，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96。

¹⁰⁷⁵ 苗秀〈第十六个〉，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111。

¹⁰⁷⁶ 苗秀〈乔迁喜〉，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152。

¹⁰⁷⁷ 苗秀〈深渊的城〉，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41、61；苗秀〈青春素〉，《苗秀小说选》，页185。

¹⁰⁷⁸ 苗秀《火浪》，页204。

¹⁰⁷⁹ 苗秀〈太阳上升之前〉，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6。

¹⁰⁸⁰ 同上，页5。

¹⁰⁸¹ 苗秀〈二人行〉，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13。

¹⁰⁸² 同上；苗秀〈挂红〉，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69-70。

¹⁰⁸³ 苗秀〈女人的故事〉，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27。

¹⁰⁸⁴ 同上，页29。

方言加华语：

‘粒声不出’（意为不说话，粤语一般用‘粒声唔出’。‘不出’是华语用词。）

1085

方言加马来语：

‘契妈她老人家痧结，马上要我出坡’（‘契妈’即粤语的干妈。‘痧结’是马来文 sakit 的翻译，意为生病。）¹⁰⁸⁶

‘马打，马打，抢野呀！’（‘马打’由马来语 mata 而来。马来语的 mata 意为警察。）¹⁰⁸⁷

‘工镙’（工钱。‘镙’粤语音 loi，其实源自马来语的 duit，而马来语的 duit，又借自荷语。）¹⁰⁸⁸

‘喊多隆’（‘多隆’是马来语 tolong 的翻译，意为乞求。‘喊’华语粤语皆可。）¹⁰⁸⁹

英语（加或不加中文）：

‘蜜丝苏’、‘蜜丝沈’（‘蜜丝’为英文 Miss。即苏小姐、沈小姐。）¹⁰⁹⁰

也有直接用英文的，如用‘BOY’指 Office Boy，办公室的杂役。）¹⁰⁹¹ 或用翻译的名词，如‘奥迪安’，即 Odean 电影院。）¹⁰⁹²

在方言的使用上，不单是方言单字单词的使用，有许多句子在语气上也是方言式的。

这句广东口语：

‘唉，有乜相干啦，我们大家都是苦人，重使乜客气哇！’¹⁰⁹³

‘重使乜客气哇！’意思是‘还需要那么客气吗？’但用了这‘哇’语气助词（广东音是‘wo’），语气更为诚恳。

另外这一句：

‘15 皮（元）嘛，唔使咁巴闭哇！伯爷过两日还你！’¹⁰⁹⁴（‘唔使咁巴闭哇’意即不须这么嚣张或了不起。‘伯爷’是他对自己的尊称。）也是传神的方言句。

¹⁰⁸⁵ 苗秀〈最末一个离开的〉，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96。

¹⁰⁸⁶ 苗秀〈太阳上升之前〉，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1。

¹⁰⁸⁷ 同上，页 16。

¹⁰⁸⁸ 苗秀〈女人的故事〉，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8。

¹⁰⁸⁹ 苗秀〈在途上〉，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171。

¹⁰⁹⁰ 苗秀〈女职员日记抄〉，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125-140。

¹⁰⁹¹ 同上，页 126。

¹⁰⁹² 同上，页 127。

¹⁰⁹³ 苗秀〈二人行〉，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12。

下面这一句是妓女黑凤为了使老鸨八婆放松防范，让八婆认为她会考虑服侍日本军而说的话：

‘哼，个的矮瓜咁好死，重会有银纸给我们嘛，想死易过！’（‘重会’即华语的‘还会’。‘想死易过’意为‘死还比这容易’）¹⁰⁹⁵

方老太为了使儿子镇定下来以广东话的口语说的这一句，配合她的身份和当时描述的情况，比用华语来得贴切：

‘撞鬼你么！边道有巷战，你听下，边道重有枪声！’（意即‘你是否见鬼了？哪里有巷战，你听听，哪里还有枪声？’）¹⁰⁹⁶

苗秀认为他所使用的方言和土语，其实是‘大众语’，有助于提高作品的艺术真实性：

“我以为一个作家除了创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以外，还有提炼和创造新语言，使原有语言更加丰富的责任。作家应该懂得怎样从广大复杂的群众口语中，选择最明确最生动的语言，提炼加工，使成为艺术的语言。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广大的群众包括广东人、福建人、马来人等；作家的任务就是怎样从各种广大流行的‘大众语’中，选出最生动明确的语彙，经过艺术的加工以后，运用於自己的作品里；不管是方言俚语，广东话也好，福建话也好，只要它有助于提高作品的真实性的，便应该采用。我在<新加坡屋顶下>这本小说中大量运用了‘大众语’（注意：不是方言），就是基於这样的原则的。”¹⁰⁹⁷

苗秀认为‘大众语’有别于方言，‘大众语’是人民大众的语言，有助于提高作品的艺术真实性。早在1948年，苗秀在支持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时候，已经认为‘大胆地运用人民大众的口语，形成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有力说明。¹⁰⁹⁸当时支持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有铁戈、赵戎和苗秀。苗秀还以闻人俊为笔名写了<论‘侨

¹⁰⁹⁴ 苗秀 <第十六个>，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105。

¹⁰⁹⁵ 苗秀 <太阳上升之前>，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6。

¹⁰⁹⁶ 苗秀 <换朝>，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37。

¹⁰⁹⁷ 苗秀 <写给一位青年的信>，苗秀《文学与生活》（新加坡：星洲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印行，1967），页27-28。

¹⁰⁹⁸ 苗秀 <一九四七年的马华文艺概况>，苗秀《文学与生活》，页3；苗秀 <写给一位青年的信>，苗秀《文学与生活》，页193。

民意识’与‘马华文艺独特性’>一文支持这一立场。¹⁰⁹⁹ 赵戎没有区分‘大众语’和方言，但称苗秀的方言使用为‘方言艺术’，给与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使用方言艺术需要充分的自信和大胆、需要勇气才能成功。¹¹⁰⁰

苗秀等所致力的马华文艺创作，正是要反映此时此地的社会现实。语言是工具，马来亚社会是素材和内容。苗秀用本地语言，就是要更贴切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

“马来亚社会是个多元民族构成的社会，在这里生活是多彩多姿的，它向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单就我们这些华侨在海外的艰苦斗争的生活来讲，便不晓得有多少可歌可泣的题材，供我们的作家去发掘。”¹¹⁰¹

新马社会丰富的素材，反映在苗秀的作品中，苗秀注重写实，以四十年代为背景的小说，描绘的是日军的暴行、日治下的人民的生活，新马英勇的抗日分子以及中国的救亡工作，如<红雾>（写于 1945 年 12 月），<在途上>（写于 1946 年），<火浪>（1949 年始作，1950 年完稿，1959 年修稿后 1960 年初版），<忌日>（写于 1946 年 12 月），<小城忧郁>（首次于《南洋月报》第二卷第四期，1951 年刊登）。¹¹⁰² 以五十年代初期的小说背景，在题材上他所关心的是战后的种种社会问题，包括工潮、失业问题、私会党，小市民生活的困苦，而人们生活的不幸源于‘社会的罪恶’造成的¹¹⁰³，而这些是‘社会人吃人的现象’¹¹⁰⁴ 在<新加坡屋顶下>（1951 年 7 月）、<二人行>（1952 年 12 月）、<深渊的城>（1953 年 8 月）、<挂红>（1953 年 9 月）都有充分的反映。五十年代下半期谈到教育问题，如<人畜之间>（1958）、<还乡>（1957）、<门槛>（1959），对当时的教育政策、教学环境、教育者，包括校长的素质都提出了批评与控诉。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苗秀也关注妇女、少女问题的题材。描绘下层女性的生活如<女人的故事>（1951 年 12 月）里女招待的悲哀，<上一代的女人>（1953 年

¹⁰⁹⁹ 苗秀<论‘侨民意识’与‘马华文艺独特性’>，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新加坡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教育出版社出版，未注出版年份），页 257-260。苗秀记此集的<导论>完稿日期为 1971 年 3 月 7 日（页 24），而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134 记此集出版于 1973 年 11 月。然《论‘侨民意识’与‘马华文艺独特性’》一文，据苗秀于篇末（页 260）所记，此文原载 1948 年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署名闻人俊。

¹¹⁰⁰ 赵戎<苗秀论>，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页 5。

¹¹⁰¹ 苗秀<论文艺与地方性>，苗秀《文学与生活》，页 40，写于 1963 年。

¹¹⁰² 苗秀《小城忧郁》（海鸥书局，1962）。但据苗秀<写给一位青年的信>页 29，《小城忧郁》原名为《小城之恋》。曾在《南洋月报》第 2 卷第 4 期发表过，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资料显示此期于 1951 年出版。

¹¹⁰³ 苗秀<写给一位青年的信>，苗秀《文学与生活》，页 28。

¹¹⁰⁴ 苗秀<前记>，《新加坡屋顶下》（新加坡：南洋商报社，1951），页 2。

11月)中的红头巾为中国亲人的牺牲,中层阶级女性如<女职员日记抄>(1955年2月)里女职员的职场困扰,还有上流社会女性的生活和心理如<狗、女人>(1967年5月)、<笼>(1968年9月)等。在七十年代,苗秀发表的小说不多。1970年当他主编《新社文艺》时,刊登了几篇短篇小说如<等候副船长>、<金剪>、<晚景>。倒是在七十年代,他为新社新马华文大系编撰委员会编撰了《理论》集、《小说》第二集以及与赵戎、钟祺合编《戏剧集》。¹¹⁰⁵

在新加坡,教育和语文政策一直困扰着华人。虽然英殖民政府对华校有不平等待遇,但早期的华校本身也存在许多令人寒心的教育现象。完稿于1958年末的<人畜之间>,写一位勤奋尽责的费老师,却因为遗失了文凭,不会讨好校长及校长太太,甚至因为替校长做了很多本来校长应做的事,并知道校长营私舞弊而使校长对他有了顾忌而要除掉他,藉着不许他收养流浪狗而赶他搬离宿舍。从位高但无能的校长与低下却温暖的畜生的对比,对校长的讽刺不言而喻。其中还揭露了政府对华校的津贴,却使得校长的权利增加,使得那些缺少一纸文凭的好老师被打压,使教员因为不再有额外收入不愿意再兼课,凸显了老师的素质。最后费老师因为肺病而被停职。他教了快二十年书,有三四千学生,却没有一个学生探问,只有他曾经养过的流浪狗寻回故主,与他做伴,讽刺地道出了与原本人为尊、畜为卑相反的现实,倾诉为人师表的悲哀。¹¹⁰⁶<门槛>也是写一个颞颥无能的校长,表面上办教育,其实假公济私,与视学官做表面工作,最感兴趣的是到联合邦做生意。¹¹⁰⁷<群姐>写的是教员之间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现象。<晚景>和<金剪>则是写退休教师的生活。¹¹⁰⁸苗秀在1956年至1971年在华侨中学担任英文科老师,1971至1974在南大教授马华文学,长达18年在教育界的经历让他看尽了教育界的各种现象。虽然<人畜之间>,有勤奋尽责的费老师,<边家的人们>中,有要服务南洋社会的山芭小学校长,¹¹⁰⁹但他笔下的教育界,却多数是消极和黑暗的。不管是教师或校长,一般上都不是以育人为教学目的,这或许和他们的待遇和当时的制度有关:

¹¹⁰⁵ 苗秀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之《小说二集》(1972)、《理论集》(1973),与赵戎、钟祺合编《剧本集》(1973)(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2-1973)。孟毅为《小说一集》(1972)的编选者。

¹¹⁰⁶ 苗秀<人畜之间>,苗秀《人畜之间》(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页17-55。

¹¹⁰⁷ 苗秀<门槛>,苗秀《人畜之间》(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页40-60。

¹¹⁰⁸ 苗秀<群姐>、<晚景>和<金剪>,刊于苗秀主编《新社文艺》,1970年15-16期。

¹¹⁰⁹ 苗秀<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217-219。

“过去南洋的教员，待遇一般都很差，所以在有钱的头家眼中，所谓‘人类灵魂工程师’不过是‘斯文乞儿’而已。结果许多人只是把教师的位置当作找不到其他更佳的饭碗时的一种临时性的短工，一有别的机会便立即溜之大吉的。校长是一校之长，所有教员都得受他指挥，供他调遣，地位当然跟普通教员不可同日而语……”¹¹¹⁰

无论是母国或居留国，一个国家的政策当然影响它的人民。Safran (1991, 2016) 非常强调离散族裔和母国的关系。¹¹¹¹ 在谈到居留国的时候，认为离散族裔和居留国往往有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而且不完全被居留国接受。¹¹¹² 固然居留国的政治和文化氛围影响着离散族裔，而民主国家的文明社会给予离散族裔组织和文化表达，比专制极权国家较为宽容。¹¹¹³ 虽然当时新马不重视华文及华文教育，但还是有热爱华文的知识分子如苗秀，在努力的笔耕下，以多样的题材反映社会现实。

苗秀强调作家应描绘的是新马社会的现实，不只是地方景物。1929 年陈炼青曾提出《文艺与地方色彩》，号召作家多写本地景物，但苗秀认真地指出，马华文艺的地方性不等于风景的描绘：

“把‘地方色彩’缩小，仅限于指某一特殊地区的风景，这是错误的见解。‘地方色彩’该是某一特定地方的自然背景，跟社会生活特殊风貌的综合，有着本身的特殊的色调。

强调马华文艺的地方性是正确的，但是仅仅风景描写不就是等于地方性。”¹¹¹⁴

¹¹¹⁰ 苗秀〈论马华教育小说〉，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90-91。

¹¹¹¹ Safran, William.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1991) ; Safran, William.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eds., 2016.

¹¹¹² Safran, William.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2016), pp. 32 & 35.

¹¹¹³ Ibid, pp. 44 & 67. (The persistence of diaspora depends 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hostland. Democratic countries with strongly autonomous civil societies tend to be more permissive of diasporic organization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than authoritarian ones. (p. 67)).

¹¹¹⁴ 苗秀〈论文艺与地方性〉，苗秀《文学与生活》，页38。写于1963年。

苗秀对新加坡的景物的描写，往往嵌缀在行文中，以景物衬托出时代背景、主题和人物。比如写人不如畜生——有些人不如畜生会感恩，也有人的生命如畜生一样的悲惨的〈人畜之间〉，以赤道的闷热的气候及干燥的土地带出学堂老师的郁闷：

“八月的赤道，连向晚的风也是焦闷的，热带竹沙沙的呻吟，干燥的黄泥芭路给晚风刮起一阵阵的尘埃，使得暮色更迷朦了。……这山芭小学堂老师的一颗心，也跟这黄昏的天气一样焦燥。”¹¹¹⁵

《火浪》这部控诉日军侵略新马的长篇小说也以景物带出人们焦闷的心情。小说一开始，日军南侵新马前的这一段明显地为故事的发展做了铺垫：

“白天，这热带的大城整个的浴在火样的热浪里，在喘息着。

……

这不平静的七月，赤道流火烤着森林，烤着大海，烤着市街，连人的心头也给烤得更加焦躁了……。”¹¹¹⁶

当日军不分昼夜发炮轰击新加坡时，

“士里打军港区，日日夜夜，大火燃烧着，火焰结成一堵墙，上面是冲天的浓烟，半月天给遮黑了。这浓烟像一个巨大的魅影，覆盖了那个热带的大城市；这魅影也压在每个人的头上。”¹¹¹⁷

除了士里打军港区外，苗秀的作品还有不少地标，如丹戎巴加、¹¹¹⁸大马路、¹¹¹⁹牛车水、¹¹²⁰水仙门、¹¹²¹大世界、¹¹²²四排坡、¹¹²³恭锡街、¹¹²⁴快乐世界、¹¹²⁵等等，增加了本地色彩及地域感。苗秀以自己的文字支持他对马华文艺地方性的要求。他的马华文艺独特性

¹¹¹⁵ 苗秀〈人畜之间〉，李过主编《星月文艺丛刊》《人畜之间》（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页 17-55。

¹¹¹⁶ 苗秀《火浪》，页 1-2。

¹¹¹⁷ 苗秀《火浪》，页 185。

¹¹¹⁸ 苗秀〈换朝〉，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37；苗秀〈深渊的城〉《苗秀小说选》，页 55。

¹¹¹⁹ 苗秀〈女人的故事〉，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7。

¹¹²⁰ 苗秀〈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15。

¹¹²¹ 苗秀〈深渊的城〉，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55；苗秀〈第十六个〉《苗秀小说选》，页 108。

¹¹²² 苗秀〈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15。

¹¹²³ 苗秀〈深渊的城〉，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55；苗秀〈第十六个〉，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107；苗秀〈我的师傅〉，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117、123。

¹¹²⁴ 苗秀〈边家的人们〉，刘笔农主编《苗秀小说选》，页 214。

¹¹²⁵ 同上。

的观点是基于他的历史观、文学价值观和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他认为马华文艺必须负起新的历史任务 - 民族自主运动：

“战后，客观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民族的觉醒，如火如荼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方面。过去，华侨效忠对象是中国，这当然没有错的，中国人难道不关心中国吗？不过目前，还有一个更迫切的，关系着华侨本身利益的任务 - 献身于当地的民族自主运动。……历史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华文艺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阶段了，否则便要 and 现实脱节。马华文艺必须负起新的历史任务；这任务就是完成民族自主运动。那旧的属于侨民意识的移民文学，自然不能负起这重大的任务的。新的马华文艺首先应该否定本身的‘侨民意识’，作家得站在马来亚人民立场从事创作有浓厚地方性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是以实现马来亚人民民主为其具体内容的。这样才能产生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¹¹²⁶

一直到新加坡建国后，苗秀还是关注如何充实新华文艺的内容，认为改进写作技巧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目前的文艺作品……除少数外，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不够充实的，不少是犯了公式化的毛病。作品反映现实面不广，观察不够深刻。至于写作技巧，水准不高，……难怪本地的文艺作品不受读者欢迎。……只要大家肯努力，新加坡文艺是有无限的前程。缺点是可以克服的。”¹¹²⁷

他主张新加坡的文艺创作必须配合建国事业。我们要建立的国民文学应该有这些性质：

“首先，写作国民文学的作家的创作立场是效忠本国，他的作品为我国读者而服务的。……我们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侨民文学’自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的文学必须效忠本国，服务于本国的利益，贡献于本国的社会建设。……国民文学因此必定是反映现实的。作家创作态度是严肃的。他必须深入生活，和我国的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共同努力社会建设工作，如此方能创作出有意义有价值的文艺作品。”¹¹²⁸

“其次，鉴于我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独立国家，在建国的过程中，培养国民使具有国家的意识和爱国思想，这是顶重要的而且是急不容缓的工作。……文艺作品是最好的最有效的宣传武器，利用文学向我国人民灌输国家观念，教育他们爱自己的国家，必须收得预期的效果。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国民文学的创作的首要宗旨，是教育群众，培养起他们具有国家意识，使他认识到…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密切

¹¹²⁶ 苗秀 <论文艺与地方性>，页 39-40，写于 1963 年。

¹¹²⁷ 苗秀 <建国时期的文艺方向>，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121，写于 1978 年 8 月。

¹¹²⁸ 同上，页 123。

地连在一起的。他必须参加全体共同努力于社会建设工作，国家方能壮大，方有前途。由此我们进一步认识国民文学实则就是爱国文学的文学。……培养国家意识，发扬爱国精神，这是当前我国文艺创作的方向。”¹¹²⁹

苗秀作为第二代的离散族裔，爱国的热情跃然纸上。他要唤起的不是个体的爱国意识，而是群体的爱国意识。他要以文学团结国民，培养国家的意识和爱国思想，共同为建设社会、为壮大国家而努力。他已经不是华侨，而是道道地地的新加坡华人。王赓武教授的多元认同理论，说明华人的身份认同是多元的，而且一直在变动中。在国家层面上，许多华人具有双重认同，既认同居留国，也意识到自己的华人属性。¹¹³⁰ 苗秀对居留国和自己作为华人的身份的双重认同印证了王教授的理论。在探讨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忠诚时，王教授又指出，二战结束后，新加坡人强烈的寻找他们现在的身份。新加坡独立后，塑造新的国家认同的目标是清晰的。人民也以忠于国家为主。虽然民族和种族认同能威胁多元主义的价值观，但战后的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华人已把新加坡当成他们的家，所关注的是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不是中华民国或共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¹¹³¹ 苗秀对新加坡不单是单纯的认同，他的爱国热情，已达到忠诚的境界。

第七节 赵戎：‘我们不爱这个国家还爱什么呢？’¹¹³²

本地出生的赵戎在 1938 年，年仅十八岁时，在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现实，应该从那地方探求出理论原则来实践” 的认识上，发表了评论文章《泛论新启蒙运动》。

¹¹³³ 接着发表的《马华思想界的路向》、《关于帮派的二三问题》、《论南洋文学运动》

¹¹²⁹ 同上，页 123-124。

¹¹³⁰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ennifer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1;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研究〉，《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页 234。

¹¹³¹ 王赓武〈十九、二十世纪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忠诚〉，《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八卷 第二期（2016 年 12 月），页 1-12. Doi:10.1142/S1793724816000146.

¹¹³² 赵戎〈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第五章〈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赵戎《赵戎文艺论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页 68-69。

¹¹³³ 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94。

及《一九三八年的马华思想运动》，都是关注本地华文文艺的评论。¹¹³⁴ 赵戎于 1945 年 12 月首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主张。这主张有三大特征：（1）它不单是马华文学运动，而是综合各民族的文化成果，发扬各民族各阶层的文学，（2）它是反奴役与反压迫的文学，（3）它是反独裁反封建的文学。赵戎认为马华文艺应有在地性的思想，更早于苗秀 1948 年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支持。¹¹³⁵

赵戎在 1938 年提出的《泛论新启蒙运动》其实已经开始扬弃侨民意识，是马华文学地方性和独特性主张的创始。他追溯 1936 年中国思想界掀起中国新启蒙运动的辩论，揭发‘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的意义后，1938 年马华知识分子转载有关中国新启蒙运动的文章，或加以复述，然并无创见。¹¹³⁶ 在对中国新启蒙运动的认识上，他对马华的启蒙运动做了一番探索，于 1938 年发表的《泛论新启蒙运动》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我认为马华启蒙运动向新的阶段的发展，它决不止限于‘华’了，而是包括了各民族的及马华过去工作成果的综合。因此，它有着愈广泛的具体的内容与性质，所以我称这回启蒙运动是‘马来亚新启蒙运动’。”¹¹³⁷

对于马华启蒙运动不止限于‘华’的说法，他基于本地多元文化的特质，赋予新的阶段宽广及具前瞻性的视野：

“新启蒙运动是建立国际新文化运动：它不单是推进马华新文化，而是推进各民族的文化；它是各民族文化单位的综合，建立起国际新文化运动。”¹¹³⁸

赵戎承认马华文艺曾经受中国文艺的影响，侨民文艺有其贡献和成就，但它也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如果没有中国文艺的哺养与栽培，则马华文艺是不能成长与壮大的。然而，并非忘本，在它长大中，客观现实已急激转变，有了新的要求与任务要它负担了。谁

¹¹³⁴ 同上。

¹¹³⁵ 苗秀曾于 1948 年 2 月 25 日发表〈论‘侨民意识’与‘马华独特性’〉，见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页 257-260。苗秀〈一九四七年的马华文艺概况〉，苗秀《文学与生活》，页 1 的文章末记写作日期为 1946 年 12 月 24 日，极有可能是 1948 年的笔误，因内容记述 1947 年的马华文艺概况，以及‘去年十一月’《马华文艺独特性》座谈会的记录。1947 年有两场 - 1 月及 11 月有关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座谈会，苗秀指的应该是 1947 年 11 月的座谈会。有关这两场座谈会，见方修《新马华文文学六十年》（下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页 48-54。

¹¹³⁶ 赵戎〈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05-206。

¹¹³⁷ 同上，页 206。

¹¹³⁸ 同上。页 206。

都知道，文艺已不是消遣品，而是反映现实、暴露现实的，要是我们的文艺拿来反映几千里远的中国，那简直是多余无谓的。”¹¹³⁹

赵戎作为本地出生的离散族裔，肯定马华文艺的基础以及新的使命，有如 Butler (2001) 所论述的，本地出生的离散族裔的体验不止包括了父辈的记忆，也包含了居留国的在地实景与离散族裔后辈的社群的需要，两者糅合而产生新的体验。¹¹⁴⁰

赵戎认为侨民文艺到马华文艺的转变有如华人从华侨到认同为当地人民的过程：

“所谓侨民文艺亦即移民文艺，它是随着华侨移植南洋而生下根的，当时华人只以寄居的姿态生活在南洋，则文艺活动亦只限于侨民文艺底性质了。历史是发展的，时间是向前的，百年来华人在各地区中辛勤垦殖，繁荣南洋，也从此深深地热爱这土地，意识上已有作为永久家乡的念头，也就是说华侨已经不能与当地分开，要永远作当地人民了。”¹¹⁴¹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赵戎对马华文艺以及对华人与本地身份的认同的积极，比同样本地出生的苗秀表达得更为清晰。他更具体提出了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含义：

1. 马华文艺在实践上反映现实、有空间的地方性色彩，有时间性的要求，具有深厚的教育意义而非超然的或供玩赏的。因此马华文艺作家秉承现实主义传统，写的是当地现实，百分之百效忠于本地的人民、社会和国家。
2. 马华文艺在创作内容上包罗了各民族多姿多彩的生活习性。我们应多方面去发掘，写下每一个时代的历史面貌，每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
3. 马华文艺应吸收艺术语言。“唯有从人民大众中吸收他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加以整理或经过艺术加工的铸造，才能丰富我们的写作词汇，也只有这样才能活灵活现的表达人物底个性。”他以沙汀充满四川话的作品和老舍的北京话让读者体会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及从端木蕻良的语言中感受充满东北大草原的韵味和风貌，说明吸收当地丰富的语言艺术能有效地加强作品里的地方色彩。¹¹⁴²

¹¹³⁹ 同上，页 205。

¹¹⁴⁰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192. Doi: 10.1353/dsp.2011.0014.

¹¹⁴¹ 赵戎〈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04。

¹¹⁴² 同上，页 210-213。

赵戎所提出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另一个含义是它对艺术语言的吸收。在《芭洋上》的后记中，赵戎认为除了吸收艺术语言外，还应该创造艺术辞句。他认为中国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以‘大地的海’形容东北土地的广漠无际，外国旅行家形容婆罗洲的绿林为‘森林的海’，都是创新的艺术语言。¹¹⁴³〈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提出了艺术语言的运用是必须不断创新的艺术技巧，主要目的是更好的反映社会现实：

“每个文字都有它的一定意义与范围。通过作家的吸收与熔炼，使它成为活泼的艺术词句，用来表现多彩多姿的社会生活地风貌。作家以其丰富的艺术辞藻，灵活地去反映现实、暴露现实、教育人民。同时，作家还时时刻刻的注意社会大众中的语言发展，从中吸收新鲜的、明朗的、活泼的、意义深长的、为人民所喜闻乐道的语句，来创造新的词藻，藉以写出更灵活的更完善的作品。诸如茅盾、老舍、沙汀、艾芜、欧阳山、萧军、端木蕻良等等都是，……。在我们这里，……如苗秀，就曾大量地吸收广东方言和马来方言，而韦晕，也把客家的广府的潮州的马来的艺术语言运用在作品中。我们读了，不但不会感到烦琐、离奇，反而生出亲切的愉快之感。”¹¹⁴⁴

在这段话里，赵戎强调了语言需要提炼和创新，方言作为当时人民大众日常使用的语言，加以整理或经过艺术加工的铸造，也是方言艺术。理所当然，赵戎自己的作品运用了不少方言艺术。赵戎自言《芭洋上》收录的〈古老石山〉，是完全用方言写的，不只是用于对话上，而且“我虽不是第一个用方言写小说，但能大胆地彻底去运用，只有我而已。”¹¹⁴⁵ 其实他不但用方言，还用了底层社会的行话、俗语。在〈古老石山〉的叙述里用的例子如下：

“他明白自己过去的光荣与威武，跟着他的手足一同捞，三道‘炮寨’都有‘老契’，钟意边个就去渠处睡，晚晚疏肝，享福，大饮大食，边个茶花唔识，比有钱的太子爷还够威呢，行起来蟹咁手，但自从那个手足走了路，自己好似一只无爪螯蜞，不知如何是好。”¹¹⁴⁶

这里面有粤语（‘捞’、‘钟意边个’、‘唔识’、‘蟹咁手’、‘走了路’）及本地俗语（‘炮寨’、‘老契’）。

¹¹⁴³ 赵戎〈《芭洋上》后记〉，赵戎《芭洋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页93-95； 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71-72。

¹¹⁴⁴ 赵戎〈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264-265。

¹¹⁴⁵ 赵戎《芭洋上》后记，赵戎《芭洋上》，页94。

¹¹⁴⁶ 赵戎〈古老石山〉，赵戎《芭洋上》，页41。

“虽然，单单都很顺利，没有撞过板。可是日子一长，就穿了大煲……。”¹¹⁴⁷

粤语‘单单’即‘每一件’，‘撞过板’即‘遇过麻烦’，‘穿了大煲’即‘错事被发现了’。

“他一来，人们就急急脚避开，激到渠生虾咁跳。”¹¹⁴⁸

‘激到渠生虾咁跳’是粤语，形容那人生气得如虾子乱跳。‘渠’也做‘佢’，意‘他’或‘那人’。

这些例子的叙述语气不但是粤式的口吻，而且为了配合人物身份和小说内容，绝不文雅。然而不文雅不等于不真实。研究方言的朱建颂认为中国汉语文学有雅俗之分，许多隔代的方言，因其古奥，反而‘雅’了起来。¹¹⁴⁹ 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的郭绍虞更认为，雅文学是雅的成分胜于真的成分，提倡方言文学，可使真的成分胜于雅的成分。¹¹⁵⁰

文学贵于真实。赵戎真实的反映人物的性格、行为，故事的情景，通过人物在对话中方言、俗语、行家语的使用，更是明显，如：

“丢，旧时我同一个手足拍档，唔捞水蟹，专搵大单架！有一排，半夜深，我地一齐穿着成套光鲜西装，带一只手电筒，去作致一个做‘也加’慨望加里，你睇渠睡在门口，唔上眼，渠就专放大耳窿（放高利贷），大把货，全部家财就绑身上，我地吊准渠个一晚饮醉酒来泡制，先用手电筒照住渠双眼，照一阵，睇渠醒唔醒，如果好似死一样，就用刀割断绑紧系身上个条布带，钱就全在里面。”¹¹⁵¹

这段‘古老石山’的作案经过，有马来和印度语的音译（‘也加’是马来文 Jaga，守门的意思，‘望加里’指印度孟加拉人 Bengali。），有粤语（意为‘找’的‘捞’和‘搵’，意为‘看’的‘睇’，意为‘他’的‘渠’，意为‘我们’的‘我地’，意为‘有一次’的‘有一排’）以及俗语（‘水蟹’肉少水多，比喻小钱或小买卖，

¹¹⁴⁷ 同上，页 45。

¹¹⁴⁸ 同上，页 46。

¹¹⁴⁹ 朱建颂〈方言和文学〉，《方言与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页 21。

¹¹⁵⁰ 同上。朱建颂转引郭绍虞 1948 年《谈方言文学》的看法。

¹¹⁵¹ 赵戎〈古老石山〉，赵戎《芭洋上》，页 45。

‘大单’指大金额的‘交易’）。赵戎替大耳窿做了注释，可能他认为读者不一定懂得这是当地对放高利贷的俗语。他的其他小说中也用了许多俗语，但他不全加注释。

音译马来语的还有：

‘结埃’为马来语 kedai 的音译，意小杂货店。¹¹⁵²

‘呀罗’音译马来语 gaduh，吵嘴的意思，¹¹⁵³

‘宋巴’音译马来语 sumbah，意为发誓。¹¹⁵⁴

俗语加马来话的例子有：

“我不是说过么，红毛‘打限’呀，叫我有乜办法……”¹¹⁵⁵

红毛是当地人对洋人的俗称。¹¹⁵⁶‘打限’是马来文 dahan 的音译，意为忍受和限制或阻止，在此意为限制或阻止。

“今日未发过市呀，荷包‘个桑’逗住两巴嚟。”¹¹⁵⁷

‘个桑’源自马来语 Kosong，意空。‘逗’为广东俗语，意给。‘巴’是本地用语‘巴掌’的简称。一‘巴掌’为五元。‘嚟’为广东音的‘来’。

当然用的最多的是广东俗语或俚语：

“拿，四巴掌，拿去使！”¹¹⁵⁸

“有鬼行呀，逗泥到死，搵占钱都无！”¹¹⁵⁹‘逗泥’是广东俗语，穷困的意思。

“咦咁牙烟，如果佢醒左，就撞大板？”¹¹⁶⁰‘牙烟’意危险。‘佢’是广东话的‘他’。‘佢’也作‘渠’。

“开玩笑么？像我们这种人，不‘饿死老婆熏臭屋’才怪！”¹¹⁶¹

¹¹⁵² 赵戎《海恋》（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页6。在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与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1979）中还指出其他作者所用的‘吉拉’、‘吉埃’、‘吉莱’，都是马来语小杂货店的意思。见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260-261及364。

¹¹⁵³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页21及页282。赵戎〈语词之部〉，《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275列‘呀罗’及‘牙罗’为同义。

¹¹⁵⁴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页274；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274。

¹¹⁵⁵ 赵戎〈码头上〉，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23。

¹¹⁵⁶ 赵戎〈语词之部〉，《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310。

¹¹⁵⁷ 赵戎〈芭洋上〉，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46。

¹¹⁵⁸ 同上，页42。

¹¹⁵⁹ 同上，页40。

¹¹⁶⁰ 同上，页45。

除了马来语、印度语和粤语之外，赵戎也用福建和潮州话：

“经过一番参详后，……。”¹¹⁶² ‘参详’意为商量

“哦，我明白，她是食醋你行运呀！汝免巴留理，这间厝又唔是她介，汝惊是咪呢？”¹¹⁶³ 翻译成白话是：哦，我明白，她是妒忌你行好运呀！你不用理她，这间屋子又不是她的，你怕什么呢？

“你是谁？胆敢来‘狗索’（调戏）！”¹¹⁶⁴（调戏）是赵戎自注的。

“他无缘无故的‘狗索’我的爱人，我不能不出手打他。”¹¹⁶⁵。赵戎自注 ‘狗索’意为调戏。在《新马华文文艺词典》中，他把其他作者如絮絮所用的‘狗沙’也解为福潮俗语调戏的意思，与广东话的‘索油’相同。¹¹⁶⁶ 在他的小说《海恋》和《在马六甲海峡》里都用了‘索油’和意为警察或警长的潮州和福建俗语的‘大狗’。

“这成什么样子呀？靓的就留来索油！哼！”¹¹⁶⁷

“你以为人家睇唔出你嘅诡计，你不过见房间有女人，向索油吧喇，吓……”¹¹⁶⁸

“他有个亲戚是做‘大狗’的呀，他常常叫他上来助威。唬吓山芭佬。”¹¹⁶⁹

“这是我的地头，我马上叫‘大狗’来捉你坐监！”¹¹⁷⁰

赵戎提倡方言艺术，不但在自己的作品中用了许多方言土语，也在他编著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里开辟了〈语词之部〉，仔细收录了许多自己和其他作者在本地作品中使用的词汇，以及广东方言、广东俗语、福潮俗语、江湖暗语、音译马来语、马来语加方言、音译英语。举例如下：

- 本地作品中用的词汇，亦即本地特殊用语：如‘大伯公’不单指‘福德正神’。也在南洋特殊用语中指老虎，而‘大伯公山’则指坟山。‘大先生’则指校长。‘巴葛’意勾结，源自马来语 pakat；‘卡周’，意找麻烦，源自马来语 kacau。后二词已各族通用。
- 广东方言：如‘弄’调阴平，意烧焦；¹¹⁷¹

¹¹⁶¹ 赵戎〈章婆〉，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209。

¹¹⁶²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页198。

¹¹⁶³ 赵戎〈狗的故事〉，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57。

¹¹⁶⁴ 赵戎〈梦游人〉，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164。

¹¹⁶⁵ 同上，页165。

¹¹⁶⁶ 赵戎〈语词之部〉，《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287。

¹¹⁶⁷ 赵戎《海恋》（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页171。

¹¹⁶⁸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页20。

¹¹⁶⁹ 赵戎《海恋》，页70。

¹¹⁷⁰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页282。

- 广东俗语：如‘走路’，意私逃；身纪，意怀孕，‘细蚊仔’即小孩子。
- 广东口语，如‘塞窦洞’意个子矮小的人；‘搵’意找；‘搵食’即找生活。
- 福建俗语：如福建音的‘水’，漂亮的意思；‘夭寿’，咒骂人短命；‘仙头’指吹牛。
- 福潮俗语：如‘淡薄’，意些少；‘大狗’，指警长；‘土豆’，指花生；‘下衰’即丢脸；‘生理’即生意；‘交关’指交易；‘查某’指女人；‘高’指聪明。¹¹⁷²
- 客家俗语：如‘自己人’，表示如同乡或亲人般的亲切；‘死猴哥’是骂男人的话。客家语‘晏’意为‘这样’，和广东话的‘咁’同义。
- 江湖暗语：如‘介板’，广东江湖黑语，指物件—一般指偷窃的物件—过了手；‘车轮’指手表或荷包；‘八字脚’，指马共救亡组织。八字为共字的下面两划。
- 音译马来语：如‘莫罗’，源自 bodoh，意呆笨；‘三马’，源自 sama，意全部；；‘野鄙’译自 J.P. 为英文 Justice of the Peace, 和马来文 Jaksa Pendamai 的简称, 意为太平局绅。¹¹⁷³
- 马来语加方言：如‘马打厝’，即警察局，‘马打’原自马来文 Mata，‘厝’是福建话的‘屋子’‘建筑物’。
- 音译英语：如‘不碌架’和‘博咯卡’，源自英文 broker，指经纪人；‘依吉’，自英语 Acre，意亩；‘沙烟’英语 sign 签名的音译。

每一个词语赵戎都从新马作品中列出例子，而且例子往往多个。在编辑凡例中，他解释对这一部分的用心：

“本词典词语之部条目，几占全书一半，乃从二百多种作品中辑条而成者，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著作，凡有可取，不分派别，尽量收容，以为研究星马作家修词遣字及解析之用。亦可从中窥知星马华文文艺底特殊性之一面。

本词典编辑费时七年，单语词之部，增修数过，殚精竭力，莫此为甚。博雅通人，有匡不逮，则不胜幸甚！”¹¹⁷⁴

¹¹⁷¹ 赵戎〈语词之部〉，《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278 中，只把‘弄’（调阴平）注为广东方言，其他的广东语词都只注为俗语、口语或暗语。

¹¹⁷² 赵戎〈语词之部〉，《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317 把‘高’列为潮语谐音词，其实与福建话的‘高’同为聪明的意思。

¹¹⁷³ 参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stice_of_the_peace.

¹¹⁷⁴ 赵戎〈编辑凡例〉《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首页。

其实〈语词之部〉占了全词典页数的一半以上，¹¹⁷⁵由此可见他的认真、尽责，以及对‘方言艺术’和新马华文文艺特殊性的信念与坚持。赵戎认为中国作家如茅盾、老舍、端木蕻良等，有些灵活地运用方言，有些创造新的词句；本地作家如苗秀和韦晕也把方言和马来话融入作品中，都是大众的艺术语言，不属于某一民族或某一地方：

“经过作家有机的吸收的语言，已不是狭隘的某一民族或某一地方的语言了，而是成为了当地社会大众所喜闻乐道的语言了。早年中国文艺界先进何凝，他提倡‘大众语’，就是这个意思。”¹¹⁷⁶

赵戎视方言为艺术语言的观点，与时俱进，不断深化。他不但在创作中使用方言，也不断在理论上推进。从他 1938 年的《泛论新启蒙运动》指出马华启蒙运动不止限于‘华’而是多元文化的综合开始，¹¹⁷⁷到 1953 年，称苗秀的方言使用为‘方言艺术’，¹¹⁷⁸是经过洗练的‘大众语’。到了 1960 年，他不但进一步将‘吸收艺术语言’列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涵义之一，同时强调这样的艺术语言从人民大众中吸取之后，必须经过作者有机地吸收与艺术加工的锤炼，才能‘加强作品里的地方色彩’¹¹⁷⁹，而这样的方言，“已不是某一地方的方言，而是大家所能领略的艺术语言了”。张长虹认为赵戎所指的方言不是一般的中国地方方言，而是“长期以来，马来亚华人在当地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新鲜语言。”¹¹⁸⁰叶丽仪也认为“这其实是华人在多种族、多元文化的新马长期生活中，以华语为主，浑融当地多种方言与马来语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鲜语言。”¹¹⁸¹笔者则认为方言应有地方依据，否则新加坡语码夹杂，杂糅式的语言应干脆称为本土化语言。¹¹⁸²到了 1975 年，赵戎重申吸收本地艺术语言及创造新语词的重要性。他在〈新马华文文学概论〉中所举的三大特征，把‘艺术语言的吸收与创造’与‘创作内容’及‘建立国家和爱国的思想意识’并列，认为‘形式是指艺术语言的运用’，而‘一部作品的成功，应该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清楚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社会，语言作为载体，能‘创造新的民族形式和艺术风格’，‘推动各

¹¹⁷⁵ 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除凡例、目录及后记外，共 456 页，而〈语词之部〉占了 236 页。

¹¹⁷⁶ 赵戎〈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64-265。

¹¹⁷⁷ 赵戎〈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05-206。

¹¹⁷⁸ 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页 5。

¹¹⁷⁹ 赵戎〈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12-213。

¹¹⁸⁰ 张长虹〈新马华文作家赵戎论〉，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150-151。

¹¹⁸¹ 叶丽仪《热带的音符、节奏与旋律－赵戎华语文学语言勘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页 27。

¹¹⁸² 见本论文页 246-247；参尚国文、赵守辉〈华语规范化的标准与路向－以新加坡华语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 年 第 3 期。

民族社会向上发展’。¹¹⁸³ 从 1938 年至 1975 年，近 40 年赵戎通过创作及理论，长期的推广方言艺术，可见他对方言艺术信念的坚实。他对方言艺术的坚持是以塑造国家意识为前提。

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赵戎也体现了新马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他通过对不同的人物——知识份子以及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描绘，带出主题思想，反映了新马的社会现实和时代历史。在知识份子中，有积极向上、富有理想的文艺青年，¹¹⁸⁴ 有名无实的‘老前辈’，¹¹⁸⁵ 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目标的教师，¹¹⁸⁶ 也有教育界不学无术，通过学校贩卖部牟利的校长。¹¹⁸⁷ 在《海恋》的〈后记〉中，他解析他对《海恋》中知识分子的刻画：

“在知识分子型的刻画上，我分成两类，一类是前进的活泼的富有朝气的新兴阶级的知识分子，如主角汉英、红薇、剑平、浪萍，以及前一辈的 C 先生等等都是，他们在过渡时期里，在新的历史阶段里，都能实现了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的；在另一类上则属于腐败的无耻的反动的一群，我便着重在钟日清这个半桶水的身上。于是，两型的代表无可避免的展开无情的斗争。……在旧的社会里，前者常常受到后者的压迫和陷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着狼狈为奸的黑暗势力支持的原故。”¹¹⁸⁸

除了知识份子外，赵戎也刻画了其他各色各样的人物，有正面和负面的渔民和农民，¹¹⁸⁹ 以分期付款充面子的工头、¹¹⁹⁰ 贪婪狠毒的校长太太、¹¹⁹¹ 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父子、¹¹⁹² 专做非法勾当，欺善怕恶的地痞兼汉奸、¹¹⁹³ 装神弄鬼、骗财骗色的‘道人’、¹¹⁹⁴ 假借工运干部之名而骗色骗婚骗财的色狼、¹¹⁹⁵ 知识贫乏以致有病得不着医治的‘梦游

¹¹⁸³ 赵戎〈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13。

¹¹⁸⁴ 赵戎刻画了许多这类的文艺青年，见赵戎《在六甲海峡》；赵戎《海恋》；赵戎《芭洋上》；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中的〈楼上花枝笑独眠〉，页 74-84、〈书的故事〉，页 107-116、〈友妈这一家子〉，页 117-124、〈我们这一伙〉，页 216-231、〈探监记〉，页 232-240。

¹¹⁸⁵ 赵戎〈流行性感冒〉，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 179-186。

¹¹⁸⁶ 赵戎〈追求一二三四〉，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 99-106。

¹¹⁸⁷ 赵戎《海恋》；赵戎〈狗的故事〉，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 40-74。

¹¹⁸⁸ 赵戎《海恋》后记，页 177-179。

¹¹⁸⁹ 赵戎《海恋》。

¹¹⁹⁰ 赵戎〈分期付款〉，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 135-144。

¹¹⁹¹ 赵戎〈狗的故事〉，页 40-74。

¹¹⁹² 赵戎〈父子同科〉，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 85-98。

¹¹⁹³ 赵戎〈友妈这一家子〉，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 117-124；赵戎〈本地番鬼〉，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 134。

¹¹⁹⁴ 赵戎〈神媒〉，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 143-157。

¹¹⁹⁵ 赵戎〈玉花姑娘〉，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 199-207。

人’和村民、¹¹⁹⁶ 被压迫甚至丧命的工人、¹¹⁹⁷ 代表海外华人辛苦了一辈子最后仍一贫如洗的老头、¹¹⁹⁸ 当然还有残暴的日本军人。¹¹⁹⁹ 不过他笔下也有残而不废的村妇、¹²⁰⁰ 见义勇为，帮助妇女走出不幸婚姻的女子，¹²⁰¹ 被剥削但仍努力勤奋、渴求新知识的学徒。¹²⁰² 这些故事，写出社会的各种正面和负面的现象、青年人的理想、日治下人民的生活、人性的贪婪、教育和知识的缺乏，有待纠正的教育制度和现象等，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他的爱与憎，在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和反面人物的同时，表达了他的理想和愿望以及对新马新社会的期待。

赵戎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他对热带景物的描绘。他不仅以热带景物为背景，把新马本土的现实和历史，通过对不同的题材和人物呈现出来，还通过对热带景物的赞美，表达了自己对本土的热爱和归属感。

以〈芭洋上〉为例，赵戎把‘芭洋’解为热带森林原野。¹²⁰³ 他非常喜爱这个词，因为

“酷爱它是非常適切地表达热带原野底浩瀚、无垠、与壮大的新词。‘芭洋’，这是多么动听的咧！”¹²⁰⁴

他从热带景物中取得勇气、得到启发：

“今天的夕阳也份外美艳，温柔，抹着淡淡的胭脂，雪白的云彩也镶着金边咧！呢喃细语的燕子，满天翱翔；马来孩子以掌拍树叶的声音，也更加悦耳了。我爱屋前那株槟榔树，高高地直立着，尤其在暴风雨里，它挥舞着巨大的扇叶的雄姿，使我神往，增加勇气。我更爱那漫山的树林，它是那么青葱郁绿，它是我们的生命线！当大地尚在沉睡时，勤劳的胶工们，已经挂上风雨灯在干活了。它启示我，生活需要劳动！”¹²⁰⁵

¹¹⁹⁶ 赵戎〈梦游人〉，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158-167；赵戎〈罗知和她的娘〉，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168-178。

¹¹⁹⁷ 赵戎〈码头上〉，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21-23。

¹¹⁹⁸ 赵戎《芭洋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¹¹⁹⁹ 日军的暴行在赵戎的作品里多方面的刻画，如《在马六甲海峡》、《芭洋上》、〈书的故事〉、〈探监记〉等。

¹²⁰⁰ 赵戎〈章婆〉，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208-215。

¹²⁰¹ 赵戎〈玉花姑娘〉，页199-207。

¹²⁰² 赵戎〈阿仔的故事〉，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241-260；赵戎〈流浪行〉，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页261-279。

¹²⁰³ 赵戎〈语词之部〉，《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289。

¹²⁰⁴ 赵戎〈芭洋上〉后记，赵戎《芭洋上》，页93。

¹²⁰⁵ 赵戎〈狗的故事〉，赵戎《芭洋上》，页86。

〈芭洋上〉写的是 1944 年，三个知识青年，为了躲避日寇爪牙的追捕，在马来亚彭亨州的小市镇云边逗留之后，穿过芭洋，先到兴楼，再到新加坡寻找生活。他生动的绘画了芭洋的美与丑，再由芭洋野生的状况和情景，凸显了他们到新加坡的艰辛过程。丛他们遇到的一个也是要到新加坡的独行老头的过往和遭遇，说出了华人在南洋生活的苦楚，做了许多粗话，辛苦了一辈子还是连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非如所粉饰的南洋遍地黄金。最后老头还被洗劫，要回到原点找生活，重新来过。不过，赵戎还是认为中国的日子比南洋更苦，战争导致家破人亡，粮食缺乏，又因有秋冬季，衣物不足以保暖。¹²⁰⁶与此同时，战争的苦难不限于中国，赵戎记述在上吡叻路上，许多印度和中国同胞活活饿死。日军对新马人民的暴行也在〈芭洋上〉有所描述。从这些描述可以知道赵戎往往对比中国和南洋，对中国和新马的苦难感同身受。

除了方言艺术外，赵戎在一般语言的使用上也非常用心，从他对新马华文文艺词典的认真编辑可见他对词语使用的重视。在作品里，赵戎对新加坡的景物也有许多细致的描绘。植物园的草坪、曲径、凉亭、花草、树木，池塘、虫鸟、小动物，都描写得令人神往。¹²⁰⁷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他也加入了新加坡的许多路标和街道，如禧街、实淡福河、卡必多大厦、圣安德烈座堂、市政府、欧战人民纪念碑、域多利亞纪念堂、新加坡河口、大钟楼、莱佛士坊，¹²⁰⁸红灯码头、安德逊铁桥、¹²⁰⁹国泰大厦、¹²¹⁰实叻律¹²¹¹等，增加了本地色彩。当然，本地色彩不能止于景物的描述，在长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里，赵戎常常有意识地提醒读者新马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特色。《在马六甲海峡》一开始，赵戎就描述了新加坡的雨，这雨给这里的各种族带来喜悦：

“雨，给这大城里热情的人们：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英国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土生混种人，带来了清新的、洁净的、爽快的感觉和喜悦。”¹²¹²

¹²⁰⁶ 赵戎 〈芭洋上〉，页 13。

¹²⁰⁷ 赵戎 《在马六甲海峡》，页 85-879。

¹²⁰⁸ 同上，页 106-115。

¹²⁰⁹ 同上，页 24。

¹²¹⁰ 同上，页 33。

¹²¹¹ 同上，页 153。

¹²¹² 同上，页 1。

赵戎一早就认可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他不歇地、努力地以文艺协助塑造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他还建议“新加坡建立一间四种语文的编译所，选取于国家民族有利的作品，译为各种语言的文字，编入课本内（如把华文作品译为英巫印文字），使各源流学校有共同的课文内容，则青年一代便会有坚强的牢不可破的国家意识，而不为离心运动者所诱惑与煽动了。”¹²¹³这清晰和明确的国家意识有力的在他的理论批评中展现。他在 1945 年写的〈现阶段的民主主义文学论〉强调以各种族的共同利益为大前提：

“当全马各民族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受了三年半的血的教训，都共同地意识到具有实行民族独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民主生活，决不能再受任何殖民地政策的统治了。所以，新民主主义运动正适合于马来亚的现实环境的发展，它是以各民族各阶层的利益为前提，负起建设新的马来亚的伟大任务。”¹²¹⁴

“新的马来亚的社会发展，决不能囿限于某一民族利益的范围，它应该以中印马三大民族各阶层的利益为前提而实践的。”¹²¹⁵

这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有以下的特征：

1. 它是属于各民族各阶层的文学，综合了各民族原有的文化成果，并发扬各民族的文学。
2. 它是反奴役反压迫的文学，日本统治被推翻后，我们再也不能被任何恶劣势力控制。相反的，三大民族应该在自由平等的原则下，共同建立政治机构。
3. 它是反独裁反封建的文学。法西斯主义是独裁政治，封建是保守和盲从的代表，都是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绊脚石。¹²¹⁶

他在 1969 年新加坡独立后写的〈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重申了他在 1959 年写的〈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的主张：¹²¹⁷

¹²¹³ 赵戎〈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第五章〈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赵戎《赵戎文艺论文集》，页 75。

¹²¹⁴ 赵戎〈现阶段的民主主义文学论〉，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页 28。

¹²¹⁵ 同上。

¹²¹⁶ 同上，页 29。

¹²¹⁷ 赵戎〈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第五章〈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赵戎《赵戎文艺论文集》，页 66-75。〈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完稿于 1969 年，见页 84。赵戎〈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赵戎《赵戎文艺论文集》，页 1-27。页 27 注此文于 1959 年完稿。

1. 爱国主义文学是发扬各民族阶层一致爱护这新马来亚国家的文学。华人跋涉千里，以血和泪开垦建立马来亚，以这里为我们唯一的故乡，后人也热爱这个国家。印人和华人相似。不过，我们欢迎任何一个奉公守法和爱护这个国家的侨民成为这里的公民。
2. 爱国主义文学是团结各民族各阶层和平共处的文学。文学活动要注重发扬各民族文化的美德，教育人民清除民族主义的余毒，消除隔阂，促使各民族和平共处。
3. 爱国主义文学是反奴役反压迫的文学。我们处于东南亚的中心，要小心应付国际关系，也要反对外来的侵犯和内在不平的压迫。因此我们的文学要团结各民族各阶层，发扬这方面的精神。
4. 爱国主义文学是建立马来亚新文化的文学。各民族文化各有优缺点，我们应该去芜存菁，建立起适合各民族的新文化。建立新文化得工程必须经过相当时日，而马华文学界对此责无旁贷。

对于这在 1959 年写的论述，赵戎于 1969 年澄清它仍然适用，因为虽然 1969 年新马已经分家，但两国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点，第一个实践原则可改为‘爱国主义文学是发扬各民族各阶层一致爱护这新兴的新加坡国家的文学’，而第四个实践原则可改为‘爱国主义文学是建立新加坡国家意识的文学’。¹²¹⁸

赵戎还具体的提出写作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作家应有的修养：¹²¹⁹

1. 具有正确、进步和积极思想和世界观
2. 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
3. 具有高度的创作技巧，刻画出人物的心理与事物的本质，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他特别提到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包括吸收和熔炼文字，“时时刻刻的注意社会大众中的语言发展，从中吸收新鲜的、活泼的、明朗的、意义深长的，为人民所喜闻乐道的语句。来创造新的词藻，藉以写出更灵活的更完善的作品。”他特别指出本地作家苗秀和韦晕，大量吸收马来语和方言，创造了当地社会的艺术语言。
4. 应反映国家社会的变化。当地社会从殖民地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经历了抗日救亡运动、三年八个月的苦难、独立自主的斗争与实现。我们的作家只描绘了一些点滴和轮廓，还有许多题材可以发掘和处理，以创造出更深刻更具体的，有时代风貌的作品。

¹²¹⁸ 赵戎 〈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第五章〈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赵戎文艺论文集》，页 72-73。

¹²¹⁹ 赵戎 〈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第六章〈爱国主义作家底修养〉，《赵戎文艺论文集》，页 78-81。

他以新加坡为荣为傲：

“在东南亚各国中，我们的新加坡，就像一颗永恒的太白星，金光灿烂的闪耀着。在生活水准上，它是仅逊于日本的高水准的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它是个最主要的据点；在社会秩序上，它比各国更具安全感。也有于此，所有各国都乐意来投资，也有于此，外地人民都希望能迁移到这里来，申请成为公民。从各方面看，我国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的。那么，走在时代前头起领导作用的作家，就应该积极展开爱国主义的文学运动了。”¹²²⁰

他明确地说出了对新加坡的爱和归属感：

“我们既以做新加坡公民为荣，亦应以具有爱国思想为荣。我们生于斯、食于斯、终老于斯，我们不爱这个国家还爱什么呢？”¹²²¹

Butler (2001) 认为离散族裔和祖籍国的关系存在动态的变化，这关系也会因理想与现实的考量，包括与居留国的情感而产生身份认同的变化。¹²²² 因此，居留国是塑造离散族裔身份的重要成分。¹²²³ 赵戎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和提倡书写爱国主义文学作品，服务本土社群的本土意识，以及他明显的爱国意识，说明了出生本地的离散族裔对居留国的感情，甚至认为有肩负建设居留国责任，给予了 Butler (2001) 的理念有力的支持。Gilroy (1990) 坦言他要被同时认同为黑人和英国人，¹²²⁴ 这也同样是赵戎认同为即是中国族裔也是本地华人的立场。

¹²²⁰ 赵戎〈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第五章〈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赵戎文艺论文集》，页 67。

¹²²¹ 同上，页 68-69。

¹²²²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 205-206. Doi: 10.1353/dsp.2011.0014.

¹²²³ 同上，页 207。

¹²²⁴ Paul Gilroy,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Ethnic Absolutism.” *History Workshop*, no.30 (1990), p.116.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289014.

第六章：新华人

前面两章以学者对离散族裔与母国和居留国的关系论述这七位新加坡华文作家的中国心和本土情。这一章则集中以他们在作品中呈现的，离散族裔在彼与在此、过去和现在的相互牵引的张力，¹²²⁵地域对离散族裔的影响，¹²²⁶以及华人性内的中国性，¹²²⁷说明他们作为新加坡华文离散作家——新华人的特质。这些特质有重叠的地方，也有异与其他特质之处。这七位作家的作品内容，如曾在前面的章节讨论，本章则主要是提取及简述与这三个特质有关的部分，否则将较详细的分析，旨以这三个特质建立他们作为新华人的形象。

本论文讨论的五位南来华人和两位在本地出生的华人，都曾受中国文化的滋润，都承认中国对他们以及新马华文学的影响，他们也爱新加坡，都对新加坡做出贡献。他们都有中国心、本土情。他们在新加坡生活了22年至67年，随着时间的移动与生活的历练，使他们对人、事、物有不同的体会，使他们不是单纯的爱中国和爱新加坡，而是杂糅了不同的思考和感情，以新加坡离散华人的视角，看中国、看新加坡、看世界。他们是新加坡华人，离散的新华人。

这七位华人都是作家。他们用文字表述了他们作为离散的新加坡华人的思考和感情。Benedict Anderson 的印刷语言创造了统一的交流和传播领域的理论，让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通过印刷和纸张，能够相互理解。这些被同一印刷语言所联系的读者同胞，形成了国族想像的共同体的胚胎。¹²²⁸著作等身的这七位华人作家对华人的影响自不在话下。他们的国族想像和对居留国的思考和期待，如何以印刷语言呈现，是本论文的书写目的。

¹²²⁵ Paul Gilroy,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207-12.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 317.

¹²²⁶ Paul Gilroy,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207-12.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204. Doi:10.1353/dsp.2011.0014.

¹²²⁷ 游俊豪〈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页153-174。

¹²²⁸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Verso, 1991). Introduction, Chapters 3 & 7.

Paul Gilroy (1994) 与 Robin Cohen (1997, 2015) 都把离散比喻为撒种。离散族裔离乡背井后在居留国定居, 甚至数代后, 在适应现实环境时, 仍不免缅怀实质或想象的原乡, 因此存在着在彼与在此、过去和现在的相互牵引的张力。¹²²⁹ 并如 James Clifford (1994) 所指出的, 在这张力中, 甚至在逆境中, 仍杂糅地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母国、居留地及他们的曾经和现在的经历。¹²³⁰ ‘彼’与‘此’, ‘昔’与‘今’有因果关系 - ‘彼’与‘昔’为‘此’与‘今’的因, ‘此’与‘今’为‘彼’与‘昔’的果。然而‘此’与‘今’也将成为‘彼’与‘昔’, 不是静止的存在 (being), 而是一种流动, 不断地塑造 (becoming) 的过程。

地域塑造了不同的离散族裔。在地性、本土性的重要性是许多研究海外族裔的学者如王赓武 (2001, 2003)、¹²³¹ Gilroy (1994)¹²³²、Butler (2001)¹²³³、华人研究跨国移民的 Nina Glick-Schiller et al. (1994)¹²³⁴、人本主义地理学系统的学者段义孚 (Yi-Fu Tuan) (1990, 2001)、¹²³⁵文化学者 Ien Ang (洪美恩) (2011)¹²³⁶ 所肯定

¹²²⁹ Paul Gilroy,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207-212.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¹²³⁰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317. 原文是: "....Some version of this utopic/dystopic tension is present in all diaspora cultures. They begin with uprooting and loss. They are familiar with exile, with the "outsider's" exposed terror-of police, lynch mob, and pogrom. At the same time, diaspora cultures work to maintain community, selectively preserving and recovering traditions, "customizing" and "versioning" them in novel, hybrid, and often antagonistic situations."

¹²³¹ Wang Gungwu, 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Wang Ling-Chi &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 Selected Essays* Vol.1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17; Wang Gungwu,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p.182-199; 王赓武〈海外华人与作为中国人〉, 《移民与兴起的中国》, 页 181-200。

¹²³² Gilroy, Paul.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208-209.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¹²³³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p.206-207. Doi:10.1353/dsp.2011.0014.

¹²³⁴ Linda Basch, Nina Glick Schiller, Cristina Szanton Blanc,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Gorden and Breach,1994), p.7; William Safran,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eds.,2016, pp.37-38.; 潮龙起〈移民史中的跨国主义理论〉, 《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页53。

¹²³⁵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Yi-Fu Tuan, *Preface,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的。本论文的第五章说明了地域 – 无论是移出国或居留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语言、教育都不断地塑造离散族群，而第六章主要聚焦于他们从中国心到成为新华人—新加坡离散华人的体验。本论文中五位南来的作家 – 李星可、连士升、杏影、李汝琳、姚紫，南来到新加坡后，在新加坡居留的时间有 22 年至 44 年之久，¹²³⁷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中国的思念和感激，比较中国与新加坡的体验，更把本地的情况纳入他们的思考中。他们之中有许多也到过许多别的国家才到新加坡定居，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经历，也丰富了他们作为离散华人的体验。本地出生的苗秀和赵戎更是生于斯、长于斯，并在此终老。¹²³⁸他们在新加坡的长久岁月所经历的，必然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以文字回应地域对他们的塑造的成果。

讨论新加坡的七位离散华文作家，必须探讨他们的中国性与华人性。本文第二章已提出学者如 Ien Ang（洪美恩）、Rey Chow（周蕾）、王赓武、黄锦树、游俊豪的有关论述。作为新马文史学者，游俊豪的论述更贴近新马的现实。游俊豪主张马华文学的研究，应从“中国性中的华人性”范式转为“华人性中的中国性”，把中国性包含在涵盖性更广的华人性里。这不但因为马华文学还有其他国家和族群的‘非中国性’的元素，而且马华族群的华人性诉说了“整个马华族群的忧患意识，对所处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反应和还击。”¹²³⁹游俊豪颠覆了长久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论述，以更宽广的视角重新审视华人性。游俊豪的论述虽以马华文学的族群性为讨论内容，但可应用于考察新加坡或其他有相似背景的国家。新马同有中国移民、同处多元种族和文化中、同曾是英殖民地、新马人民流动频繁、还在新马分家前同属马来亚华文文学，因此游教授对华人性和中国性的论述也适用于新加坡华文作家的讨论。

游教授以中国性和华人性有分割也有重叠的论点，指出了华人性和中国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也是离散华人的杂糅特性，¹²⁴⁰有如 Gilroy（1994）和 LeRoi Jones

¹²³⁶ Sharmani Patricia Gabriel, “‘Migrations of Chineseness’: in conversation with Ien A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2, Number 1, 2011.

¹²³⁷ 杏影在新加坡居住了 22 年，李汝琳 44 年。见附录 4 ‘新华七位华文作家经历简览’，此论文页 312。

¹²³⁸ 指苗秀与赵戎。苗秀在世 60 年，赵戎 67 年。

¹²³⁹ 游俊豪〈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页 157-158。

¹²⁴⁰ 详见本论文第二章。

（1967）所形容的 ‘The Changing Same’，离散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质。新加坡离散华文作家的作品，呈现了杂糅与重塑的活力。

第一节： 离散族裔在彼与在此、过去和现在的相互牵引的张力

李星可

李星可的中国心，通过他的行动和文字表现。在中日战争爆发时，李星可决定从法国回中国参战报国。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情况让他失望后，仍在缅甸军需处协助解决了许多滇缅公路运输工作上的难题，以及通过‘中法文艺协会’，积极展开抗战宣传工作。他到了新加坡之后在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任职，以文字捍卫中华文化，也以文字促进新加坡社会的发展。¹²⁴¹他在 326 篇的社论中，积极和新加坡读者谈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民生、治国各方面的课题。¹²⁴²他往往做足了功课，提出具体的建议。在教育课题上他谈得最多。¹²⁴³他呼吁维护华文教育，数次提问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数字，要求各源流教育平等，改进英校华文教学。他并主张强制性的母语小学教育，极力反对华校每周上课五个半天，主张五个全天制，退而求其次则是五个半天加星期六的半天上课。李星可为华文教育一再争取较多的天数。因为上课天数的多寡影响学生学习华文的质和量，而强制性的母语小学教育将为华文学习奠定牢固的根基，是他坚持始终的信念。对于中学教育他反对把三三制改为四二制，因他不愿智力稍迟发展的学生不能升上高中而失学。李星可持续为华文教育争取地位，不惜妥协至可接受的底线。当他称赞李光耀于 1966 年 9 月建议在华校中，数理用英文，在英校中，史地用华文为‘星加坡的文化革命’与‘星加坡的文艺复兴’时，其实与此举能提高华

¹²⁴¹ 李星可于 1959 至 1971 年在星洲日报任职，在这期间的 1961 至 1970 年担任主笔。1971 年 2 月 1 日他离开星洲日报，加入南洋商报。但加入南洋商报三个月后，于 1971 年 5 月 2 日，他和南洋商报其他负责人 - 李茂成、仝道章、公众关系经理郭隆生，一起被政府引用内部安全法令，以“倾向共产党”、“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¹²⁴² 李星可《政论选集》共收 165 篇社论；李星可《政论新集》共收 77 篇社论；李星可《政论近集》共收 84 篇社论。三集共 326 篇。学者鲁虎于《新马华人的中国观之研究》页 219 提及李星可 1971 年出版《政论今集》（未提出版社），然笔者未能寻获此集。

¹²⁴³ 李星可《政论选集》的 165 篇社论中，教育与语文课题占 60 篇；李星可《政论新集》的 77 篇社论中，教育与语文课题占 34 篇；李星可《政论近集》的 84 篇社论中，教育与语文课题占 17 篇。在 326 篇社论中，教育与语文课题共 111 篇，占了百分之 34。

文教学的课时与地位有关。¹²⁴⁴ 对于高等教育，他不断提醒政府对南大保留为华文大学的承诺，解释华文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能与民众沟通，才符合社会的要求，并督促政府早日承认南大学位。¹²⁴⁵ 他期望“南大毕业同学出身于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府，他们正可以因此将其母族的文化遗产吸收传递于他们的新兴祖国，对于马来亚国族文化的灿烂繁荣多所贡献。”¹²⁴⁶ 李星可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维护，一方面是捍卫中国传统价值，一方面正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传统价值是‘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处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局限下，他不能与当局对立，他只希望尽力使中国传统价值能造福在新加坡这块新的土地上的人民，¹²⁴⁷ 显示了 Gilroy 离散理论中在彼与在此、过去和现在的张力。

李星可坚持标准华语，通过《标准华语》及《标准普通话》的出版，不但极力还原华语的正确读音和应用，更志在纠正和提高本地华语的水准，¹²⁴⁸ 举例时不忘用本地的实例。¹²⁴⁹ 他还在师资训练学院教了十年的华语语音，自觉努力没有白费。¹²⁵⁰ 他创作不同形式的戏剧 - 历史剧、悲剧、喜剧、哑剧与广播剧，¹²⁵¹ 也通过对戏剧的介绍如《我谈京戏》、《怎样欣赏中国戏》、《南洋与中国戏》以及一篇文章〈谈谈哑剧〉，给《中國現代獨幕劇選》做選註，并在南大教授‘中国戏剧史’，不但以理论和实际创作宣扬华族传统文化，他的内容还往往以新马现实为中心。¹²⁵² 王赓武认为李星可是当

¹²⁴⁴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7、57、58。

¹²⁴⁵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2、15、23、28、34、46、47、61、103、107、120、125、134、149、150（15 篇）；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8、49、54、57、59、62、65、68（8 篇）；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6、32、55、81（4 篇）。

¹²⁴⁶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5。

¹²⁴⁷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18。

¹²⁴⁸ 李星可《标准普通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3，第二版）；李星可《标准华语》（新加坡：新马文化事业公司，1964）。李星可编写这两本书的用意，见李星可〈序言〉《标准普通话》，页 1-4 及李星可〈序〉《标准华语》，页 1-3。

¹²⁴⁹ 如教导轻重音时以‘马来亚’、‘新加坡’、‘共和国’、‘南洋大学’、‘华侨银行’为例。见李星可《标准普通话》，页 18 及 73。

¹²⁵⁰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85-86。

¹²⁵¹ 李星可的历史剧如《乱世春秋》（包括 4 电影剧本：〈乱世春秋〉、〈齐宫外史〉、〈同室干戈〉、〈东墙祸〉），悲剧如《报穷》，喜剧如《快艇》、《钓金龟》、《绑票》，哑剧如《赌徒》、《哲学家》、《割胶》、《降头》、《梦》。《桥上》是广播剧，内容与独幕舞台剧〈独立桥〉（独幕 PARADOX）相同，只是形式有些差异。

¹²⁵² 李星可《我谈京戏》（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55）；李星可《怎样欣赏中国戏》（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李星可《南洋与中国戏》（新加坡：南洋学会，1962）；〈谈谈哑剧〉收于李星可《绿洲》（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1），页 95-97；《中国现代独幕剧选》为欧阳予倩等著，李星可选註（香港：宏智书局，1966）。

时马来亚出色的剧作人之一；¹²⁵³ 赵戎肯定李星可是马华文艺家，因为李星可的戏剧“除了几个历史剧外，都是取材于当地的。所以李氏的创作在马华文坛上是一份重要的果实，他是以马华文艺家的身份而实践的。”而且在文艺创作中，剧本的创作比较落后，所以“李氏为马华文艺创作这么多的当地题材的剧本，是值得喝彩与赞美的”。不但如此，赵戎还认为李星可的修辞有高度的艺术性，会给马华青年剧作家带来帮助和影响。¹²⁵⁴ 在《南洋与中国戏》的序言中，连士升认为李星可不但在理论上谈原则，可贵的是他能举实例说明。更难得的是他把中国戏剧的姻缘牵连到南洋：

“在时间上，他把中国戏剧的源流远溯到春秋、战国。他把中国戏剧的姻缘牵连到南洋，尤其印度、扶南、印尼、马来西亚。‘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贾谊这两句话，用在学术的发展上，倒相当恰当。”¹²⁵⁵

李星可也将自己对戏剧的喜爱，用在他最关心的华文教育中。他曾发动新马平社（新加坡、檳城、柔佛平社），以妻子宁荣萱挑大梁，于1953年7月25-27日为南洋大学筹款义演京剧，筹得叻币二十七万元。¹²⁵⁶ 他所热爱的传统京剧，成为他对南洋的贡献。他希望为南洋，或更具体一些，对新马的文化建设贡献学识，也通过推动京剧的具体呈现，为华文教育、为海外华人出一份力。

在创作中，他主张“民族形式，地方内容”。¹²⁵⁷ 〈借沙笼〉（仿河南坠子）写的是英殖民政府设立新村的的目的以及在紧急法令下新村里华人的艰苦生活，然而它是以传统上河南坠子以说唱相间方式演述长篇连回故事写成的。¹²⁵⁸ “民族形式，地方内容”，明确描述了李星可如何实现了把‘在彼’‘过去’所积累的学识，用于塑造‘在此’和‘现在’的居留地，正是 Gilroy 理论中离散族裔的实例。

¹²⁵³ 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pp.281-287.

¹²⁵⁴ 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页98-123。

¹²⁵⁵ 连士升〈序言〉，李星可《南洋与中国戏》，页2。

¹²⁵⁶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82-84。

¹²⁵⁷ 李星可《桥上》〈自序〉（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

¹²⁵⁸ 李星可〈借沙笼〉收于《桥上》（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页3-12。

连士升

在华人社会中，连士升作为南洋商报的编辑与主笔，他发表的社论，以及从 1949 至 1972 年频频寄出的书简等，都在影响着人们，领导着新马文化界，是离散族裔重要的一员。和李星可一样，他也是把‘在彼’‘过去’所积累的学识，用于塑造‘在此’和‘现在’的居留地。他还认为生活在南洋，就应该对‘在此’－南洋与‘在彼’－中国的关系以及华侨问题有所认识。早在 1942 年当他在越南的时候，就想组织一个‘中南学会’，研究南洋和中国的关系。¹²⁵⁹ 1949 年他从欧洲考察回来之后，在〈文化的交流〉一文中，重提成立‘中南学会’，以新加坡为总部，再在南洋各地成立分会，以期达到中国与南洋文化交流，互相谅解的目标。¹²⁶⁰ 1956 年南大成立之初，连士升立刻提出南洋大学应负起研究南洋文化的使命，对南洋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¹²⁶¹ 南洋研究室随之成立。¹²⁶² 然而 1958 年他慨叹他所憧憬的中南学会仍然是个空中楼阁。¹²⁶³ 1958 年及 1959 年他再提出南洋大学应该积极落实以南洋研究为中心的目标。¹²⁶⁴ 1960 年连士升提出南洋文人对华侨问题的研究比国内的学者深入，但应该扩大范围、敢于质疑、了解问题间的关系。¹²⁶⁵ 1962 年他肯定了李星可对南洋与中国戏关系的研究深入与价值。¹²⁶⁶ 从 1942 年到 1962 年他一再重提并强调南洋研究的重要性，可见在他的心中对中国和南洋关系的重视。

在此时此地，对于过去的故国，如 Clifford (1994)所指出的，离散族裔在离开故乡后，在理想和异位的张力中，仍然维系着社群、保留着传统，并在逆境中、在当地的语境下杂糅地重现母族的文化传统，适用于解释连士升的体验。¹²⁶⁷ 连士升曾埋怨南洋

¹²⁵⁹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一》，页 80，写于 1958 年 1 月 18 日。

¹²⁶⁰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南行集》，页 502-507，写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

¹²⁶¹ 连士升〈南洋大学与南洋文化〉，《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60-62，写于 1956 年 11 月 10 日，然而未清楚说明南洋研究室是否附属于南洋大学。

¹²⁶²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一》，页 80，写于 1958 年 1 月 18 日。

¹²⁶³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一》，页 80，写于 1958 年 1 月 18 日。

¹²⁶⁴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一》，页 81-83，写于 1958 年 1 月 19 日；连亮思、连文思编选《连士升文选》，页 171-173，写于 1959 年 9 月 7 日。此篇也收于《天宝集》。

¹²⁶⁵ 连士升〈南洋文人的使命〉，《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95-198，写于 1960 年 4 月 18 日。

¹²⁶⁶ 连士升〈序〉，李星可《南洋与中国戏》，页 1-6，写于 1962 年 3 月 22 日。罗喷戏在柬埔寨、泰国、印尼、马来亚都有。参 李星可〈什么是‘爨’？〉，《南洋与中国戏》，页 179。

¹²⁶⁷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317. 原文是：“....Some version of this utopic/dystopic tension is present in all diaspora cultures. They begin with uprooting and loss. They are familiar with exile, with the “outsider’s” exposed terror-of police, lynch mob, and pogrom. At the same time, diaspora cultures work

的气候炎热、¹²⁶⁸食住缺乏风雅、¹²⁶⁹文化工作不被重视、¹²⁷⁰铜臭味重、¹²⁷¹书籍缺乏、¹²⁷²不重视读书人，¹²⁷³没有一个华文作家能靠写稿为生。¹²⁷⁴南洋人，包括青年还欠缺素养、度量狭窄。¹²⁷⁵他也慨叹南洋文化舞台不但狭小，南洋社会里有许多互相陷害的手段。¹²⁷⁶《南行集》的大部分文章是以这种无奈的心情写成的。¹²⁷⁷到了建国之后，他对于文学、艺术、学术仍受奚落与鄙视、¹²⁷⁸没有一个华文作家能靠写稿为生、¹²⁷⁹作家和出版业的困境、¹²⁸⁰文化水准逐渐低落，以及新加坡人对物质文明的追求依然如此热切，还是耿耿于怀。¹²⁸¹

相对的，他对他的家乡福州的种种，包括山水、建筑、戏剧、乐器、茶叶、小食，只有赞美和怀念。¹²⁸²，在他离开他的故乡二十多年后，他还详细并深情地描绘了他故乡福建省福宁府福安县的地理、历史、风景、街道、建筑、交通、生产、风俗、娱乐和人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¹²⁸³在中秋佳节，他不但想起中秋提灯，中秋的月饼、柚子和蛭饼，更感慨自己的逃亡生涯。¹²⁸⁴在此时此地，对于过去的他方故国，“一切甜蜜的

to maintain community, selectively preserving and recovering traditions, "customizing" and "versioning" them in novel, hybrid, and often antagonistic situations."

¹²⁶⁸ 连士升〈南行集〉自序，写于1963年5月24日。收于连亮思、连文思编选《连士升文选》，页93-94。

¹²⁶⁹ 连士升〈南洋太缺乏风雅〉，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 - 闲人杂记》，页67-68，写于1955年8月1日。

¹²⁷⁰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二》，页148，写于1959年5月24日。

¹²⁷¹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孤鹭集》，页218-220，写于1965年9月11日。

¹²⁷²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三》，页276，写于1961年9月1日。

¹²⁷³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二》，页113，写于1959年1月3日。

¹²⁷⁴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孤鹭集》，页218-220，写于1965年9月23日。

¹²⁷⁵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三》，页200，写于1960年5月5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四》，页298，写于1961年11月13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四》，页395，写于1963年1月10日。

¹²⁷⁶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一》，页6，写于1957年1月24日。

¹²⁷⁷ 连士升〈南行集〉自序，写于1963年5月24日。收于连亮思、连文思编选《连士升文选》，页93-94。

¹²⁷⁸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孤鹭集》，页264，写于1968年4月18日。

¹²⁷⁹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孤鹭集》，页218-220，写于1965年9月23日。

¹²⁸⁰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落霞集》，页273-274，写于1968年6月1日；连士升《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07），页60，写于1972年4月9日。

¹²⁸¹ 连士升《长天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八集》，页161，写于1972年7月29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孤鹭集》，页264，写于1968年4月18日。

¹²⁸² 连士升〈福州的享乐〉，连士升《连士升文集第二卷 - 南行集》，页461-464；连士升〈福州的享乐〉，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100-104。

¹²⁸³ 连士升〈可爱的故乡〉，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13-18；连士升〈可爱的故乡〉，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69-73。

¹²⁸⁴ 连士升〈月是故乡明〉，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95-99。

滋味与美妙的印象，只能在回忆中慢慢咀嚼。”¹²⁸⁵ 连士升的不满、不适和无奈，有如 Clifford (1994)所指离散族裔在居留国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¹²⁸⁶ 但连士升也和大部分的离散族裔相似，肯定了 Clifford (1994)所指出的，尽管在逆境中、离散族裔仍在当地的语境下多方重现母族的文化传统。¹²⁸⁷ 因此虽然环境不尽如人愿，我们看到连士升从 1948 年至 1973 年在更大部分的文字中的看法、批评和建议，却是正面、积极和乐观的。在新加坡独立之后，在肯定了新加坡的成绩之上，再提出多方面的具体建议，对新加坡充满了期待并协助这新兴国更上一层楼。在故国和新家的张力中，连士升以积极的建议作为回应。

中国与南洋是‘在彼’与‘在此’的关系，离散族裔中包括的第一代与其后裔是‘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同类型的离散族裔会形成和他们居留国不同的关系，而同一离散族裔间的沟通和彼此的关系也是离散族裔体验的重要内容，是塑造离散族裔的身份、结构和网络的关键。¹²⁸⁸ 离散族裔从‘在彼’到‘在此’，从‘过去’到‘现在’，都和他们的居留国，无论是祖国或现今的居留地有关系，因此 Gilroy (1994) 和 Butler (2001) 的理论并行不悖。连士升谈到‘过去’曾生活在他们的祖国的华侨，到了新加坡，与作为‘现在’侨生的华侨的后代，由于生长的环境不同，导致思想、意志和行为不同，因此产生许多误会。连士升承认‘真是环境决定一切’，因此他建议，华侨要多懂一些英文，侨生要多受一点中文教育，彼此将能密切合作，不但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进而与其他民族互通互补，更能使多元种族的马来亚欣欣向荣。

1289

¹²⁸⁵ 连士升〈可爱的故乡〉，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8。

¹²⁸⁶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310. Clifford 用 'dwelling-in-displacement' 形容离散族群对自己处境的惶惑。

¹²⁸⁷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317. 原文是：“....Some version of this utopic/dystopic tension is present in all diaspora cultures. They begin with uprooting and loss. They are familiar with exile, with the "outsider's" exposed terror-of police, lynch mob, and pogrom. At the same time, diaspora cultures work to maintain community, selectively preserving and recovering traditions, "customizing" and "versioning" them in novel, hybrid, and often antagonistic situations.”

¹²⁸⁸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207. Doi: 10.1353/dsp.2011.0014.

¹²⁸⁹ 连士升〈华侨与侨生〉，《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83-87，写于 1951 年 11 月 18 日。

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的国家，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离散族裔。他们在互相适应和磨合的过程中彼此的文化也互相渗透和糅合，形成‘家族式的相似面’（family resemblance），甚至产生新的文化。¹²⁹⁰ Ben-Rafael（2013）认为离散族裔离开了母国终将失去他们的母语优势。¹²⁹¹ 尽管如此，连士升和李星可一样，极其重视母语教育，他们都坚持要先学母语，再学外文，他们捍卫母语的立场贯彻始终。¹²⁹² 连士升呼吁华侨要多懂一些英文，侨生要多受一点中文教育；强调学习母语，还重在学习母语的内涵，在华洋杂处的社会才不会不知所措。¹²⁹³ 母语的内涵在价值观，因此他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¹²⁹⁴ 在母语的实用性方面，他数次强调母语学通之后，就能用同一方法学习其他语文，因此再学第二、第三、甚至第四、五、六种语文都不是难事。¹²⁹⁵ 因此母语教育利于普及教育。对于新马华人，学习华文之后，还应当学习英文及马来文。¹²⁹⁶ 他也驳斥欧美因为中国语言不统一，文字难学而应学英文的谬论。¹²⁹⁷ 从他的建议，可见他在捍卫母语文化的同时，也关注多元种族融合相处的社会要素。如 Clifford（1994）所指出的，在母族文化和在地文化碰撞交流时，杂糅的新文化将产生。经过了文化的交流（communication）、文化的混合（mixture）后，将达至文化的化合（compound），不同文化精华兼收并蓄的境界。¹²⁹⁸ 在此在彼的张力中，产生的杂糅的新文化，是最大的收获。

¹²⁹⁰ Eliezer Ben-Rafael, “Diaspora”. *Current Sociology Review* 61, nos. 5-6 (2013), p. 854. Doi: 10.1177/0011392113480371.

¹²⁹¹ Ibid, p. 849. Doi: 10.1177/0011392113480371.

¹²⁹²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59, 152、153、154；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76。

¹²⁹³ 连士升〈乡音无改鬓毛衰〉，《连士升文集第一卷 - 给新青年》，页 52-53，写于 1955 年 9 月 4 日。

¹²⁹⁴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二》，页 111-112，写于 1958 年 12 月 28 日。

¹²⁹⁵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 - 海滨寄简三》，页 237，写于 1960 年 9 月 28 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落霞集》，页 134-136，写于 1965 年 1 月 15 日；连士升《秋水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七集》，页 17-20，写于 1968 年 10 月 22 日。

¹²⁹⁶ 连士升〈注重母语和普及教育〉，《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76-179，写于 1963 年 10 月 10 日。

¹²⁹⁷ 连士升《秋水集 - 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七集》，页 17-20，写于 1968 年 10 月 22 日。

¹²⁹⁸ 连士升〈新文化的创造〉，《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93-95，写于 1968 年 8 月 29 日。

杏影

杏影和李星可、连士升一样，都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居住过不短的时间才到新加坡定居。杏影曾在日本留学及生活 12 年，印度工作 4 年才来新加坡。杏影在日本与印度的经历，日后糅合沉淀在他在新加坡所写的多篇反思日本和印度文化的优缺点以及反战的文章里。

他 14 岁至 26 岁在日本，却始终不喜欢日本料理，他在印度的 4 年，吃了不少印度美食和西餐，却始终钟情于中国菜。他自己意识到，他潜意识里的所好，还是中国的那一套。然而他也不断地把他在日本和印度的体验，思考中国与新加坡。他在 1960 年有关日本文化的广播稿里，说明中国习俗对日本的影响及如何日本化；¹²⁹⁹ 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也被日本化而具有与中国和印度佛教不同的，配合天皇制并强调现世修行的特性；¹³⁰⁰ 孔子学说更曾被利用来鼓吹极右的‘王道精神’和‘日本精神’。¹³⁰¹ 他也分析了日本的优点和矛盾。日本人生活中接受新旧共存；日本经济复兴快速，然生活素朴单纯；教育普及，对各种文化的好奇而形成文化都会。另一方面，东方的精神文明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的不调和、农村的穷困、明治维新只是天皇政治权利的复活也是事实。¹³⁰²

除了对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进行比较，杏影更批判日本的军国主义。¹³⁰³ 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是杏影文章的主题思想之一。杏影曾见识过 1931 年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他在 1945 年抵达新加坡，也了解新加坡在这之前日治下的苦难，他对日本的好战深恶痛绝，¹³⁰⁴ 肯定了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民的反战思想。¹³⁰⁵ 作家五味川纯平民以反战为主题，于 1956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的条件〉，赤裸裸地暴露了日军在中国大陆的罪行，鲜明地

¹²⁹⁹ 杨守默〈日本的风俗习惯〉，页 142-148。

¹³⁰⁰ 杨守默〈日本的佛教〉，页 155-159。

¹³⁰¹ 杨守默〈孔子学说在日本〉，页 149-154。

¹³⁰² 参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bank-xingying.pdf，亦见杨守默〈日本文化的新与旧〉，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122-128；杨守默〈明治维新和现代日本〉，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129-125；杨守默〈走向一个伟大的日本〉，页 136-141。这些文章是 1960 年他在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日本文化系列讲座”的讲稿。见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页 208。

¹³⁰³ 杨守默〈走向一个伟大的日本〉，页 136-141。

¹³⁰⁴ 杏影〈日本人・德国人〉，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126。

¹³⁰⁵ 杏影〈人的条件〉，杏影《愚人的世纪》，页 244-254。

描绘了日本宪兵的残暴以及同谋的恶行。¹³⁰⁶ 这书在当时的日本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是当时最畅销的书。五味川纯平民要藉着这本小说追究战争的责任，责问为何天皇、日本内阁、协助了战争的人，却全未担负战争的责任。他说这等于“日本这个国家是作为一种无责任的体系而存在了”。¹³⁰⁷ 日本的老作家正宗白鸟认为这本书的畅销，说明了“现代的日本人是被一些什么事物牵动了他们的心。”¹³⁰⁸ 杏影认为战后的日本文坛有一种好的倾向，就是富于自我批评、自省的精神，而这种精神能使日本人民享受和平和自由。〈人的条件〉之所以破纪录畅销，就是自省精神的萌芽和体现。¹³⁰⁹ 不过，关于日本的军国主义，他认为日本已经吸取了教训，大多数的人民已经清醒，不会要回到过去。他赞同东京大学日本思想史教授家永三郎在《朝日新闻》所刊载的文章〈论日本文化的正当评价〉中，对日本的人种优越感的否定，对日本大多数勤劳民众推进历史的力量的肯定，以及“对于日本人发挥在自由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劳动运动，以及表现在推动社会主义方面的活力，却全然被漠视了。这真是首末颠倒。”的评论。¹³¹⁰ 对古代和现代日本的了解和认识，与他在新加坡写的多篇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文章的思想一致。杏影对日本的批判和肯定是他多年后在新加坡看日本，对日本的过去与现在的反思和沉淀。在日本的经历让他从日本人民的视角看待日本的境况，但他也以一个人和新加坡人的体验对日本文化或肯定或批判，说明了 Gilroy (1994) 离散族裔在彼与在此、过去和现在的相互牵引的张力所获得的更具高度的思考。¹³¹¹

杏影在印度的四年，也对他有很多启发。杏影从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出发，和连士升一样，钦佩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他离开印度后还时时关注印度的动向，在 1950 年代的文章里，不但通过对印度的风土、人情、宗教、古迹的描绘，写出对印度的关怀，还多次提到甘地和尼赫鲁，称赞尼赫鲁为一个懂得中庸之道的诚实的领袖，¹³¹² 更景仰甘地敢死的、大无畏的、和平的、以安静制骚动、以和平抗暴力、以善良会邪恶的精神。¹³¹³ 他曾说的‘战争是真理的否定，是人类的否定’就是从甘地精神体会来的。

¹³⁰⁶ 杏影 〈人的条件〉，杏影《愚人的世纪》，页 244-254。

¹³⁰⁷ 同上，页 252。

¹³⁰⁸ 同上，页 244。

¹³⁰⁹ 同上，页 253-254。

¹³¹⁰ 杨守默 〈走向一个伟大的日本〉，页 140-141。

¹³¹¹ Paul Gilroy,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207-12.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¹³¹² 杏影 〈大无畏的和平精神 - 尼赫鲁与甘地〉，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109-119。

¹³¹³ 同上。

¹³¹⁴ 印度的圣雄甘地在 1920 年就开始对英国殖民政府的非暴力抵抗的不合作运动。1949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疆域纠纷，印回两教教徒互相屠杀，“甘地先生身披一条白布，手无寸铁，独自在涨满了怒潮的乡村中走过去，……甘地先生足迹所在，杀人杀得很起劲的印回人民，看到甘地先生走过去，都自动地放下屠刀，不杀了，杀的疯狂，平伏下去了，平伏的空气，一经弥漫，要杀人的，也举不起刀来了。”¹³¹⁵ 甘地这样做，因为他相信人类的善良。他的哲学就是“建筑在人人都有一颗良善之心的确信之上；他要以完全不设防的态度，以自己的生命做资本，使每个奸恶的心变成良善，使每个良善的心能以他的良善改变这个世界。”¹³¹⁶ 尼赫鲁敬重甘地，明白所谓没有战略的甘地，实质是一位罕有的战略家。这一位罕有的战略家的战略里没有暴力，但却是能够击败所有以暴力为基础的战略。在甘地之后尼赫鲁以他自己的方式“走一条诚实的和平的路”。¹³¹⁷ 杏影举尼赫鲁的话说：“印度人民正朝向明天的那个‘世界一家的世界’前行着，在那种世界里面，一切的民族文化将和人类的国际文化交融起来的。”¹³¹⁸ 杏影相信，“和平的路怎样走都行，只要那路的方向是导向‘人类一家’和‘世界大同’。”¹³¹⁹ 杏影对甘地和尼赫鲁的描述，对他们追求世界大同，人类一家思想的推崇和认可，正是他自己对世界和人类的信念和愿景。作为一个曾经在日本和印度居住多年，见识了中国的内乱外侵、经历过日治后仍在殖民统治下的新马，正因为杏影对于自己离散族裔游子的身份有深切的体会，对大同世界有无限的向往。‘人类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和愿望，一直持续及贯穿在他的文章中。离散族裔的经历与对其他国家的认识，丰富了他们作为离散华人的体验，让他们结合他们定居的国家以及世界局势，有更宽广的思考。对于杏影，过去和现在，故国、他国和居留国的经历相互牵引，也相互参照，这些经历不再互相制衡，却形成了糅合的智慧。

¹³¹⁴ 杏影〈在高楼上看海〉，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134。

¹³¹⁵ 杏影〈大无畏的和平精神—尼赫鲁与甘地〉，页 112-113。

¹³¹⁶ 杏影〈大无畏的和平精神—尼赫鲁与甘地〉，页 112。

¹³¹⁷ 同上，页 110。

¹³¹⁸ 同上，页 111。

¹³¹⁹ 同上，页 110。

李汝琳

李汝琳曾经积极参与的抗日行动，包括 1935 从北平大学休学一年，前往南京参加学生运动，请愿抗日，以及获学士学位后，于 1938 年再北上参与抗日的行列。¹³²⁰ 他在 1936 年曾加入北平作家协会，以文报国。在 1938 至 1944 任西北艺术学院图书馆主任期间，与数友为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合编大西北著名文艺杂志《西线文艺》，再次以文艺的力量支持抗日工作。¹³²¹ 1943 至 1944 年，他把抗日经历以及他对中国内战的认识，写进了他的作品《艰险的行程》中的六篇，¹³²² 他青年时期的写作和编辑工作，也为他日后的创作和出版工作打下了基础，指引了方向。

李汝琳在 1944 年至 1947 年的两年多，在印度加尔各答主编《中国周报》和《中国日报》的文艺副刊并写作。¹³²³ 他把自己在印度的经历，取 1946 至 1947 年印度华人社会在中国内战、印度印回宗教纠纷的背景下，在 1961 未完稿的《漩涡》，反映了教育界、报界的正负面以及华人的社会和生活。他认为当时印度的华侨和马来亚的华人不同：

¹³²⁴

“印度的华侨，不像我们马来亚的华人，我们已经忠诚的把马来亚看做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乡，印度华人却仍然认为自己是侨民。因此在这部小说里，便出现了一些‘华侨’，‘侨胞’这一类字眼。……”

这虽然是以印度华人社会为背景的小说，有些场景却不见得完全和马来亚华人社会无关。特别是华校中的情况，在马来亚一样有类似之处，这是不难理解的。”

¹³²⁵

李汝琳也在书中称赞新加坡中文报章的水平，认为它们不比中国省会的报章逊色。¹³²⁶ 他进而显示了把他的出版热忱，通过书中中华日报的主笔刘春明，他认为马来亚的报章在谈论马华文艺，印度华人也应开展印华文艺，把副刊上刊登的好文结集成书。这不但可以鼓励当地人写作，也可让中国内地了解海外作品。他藉着刘春明和他志同道

¹³²⁰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 240-241。

¹³²¹ 同上，页 241。

¹³²² 李汝琳《艰险的行程》（新加坡：青年书局，1956）。高峰认为李汝琳《艰险的行程》第 1 辑是报告文学，所记载的是作者“在敌后的实际生活情况”，表现了游击战士的战斗精神、人民的爱国情绪和敌后现实生活最凄惨的一面。见高峰〈《艰险的行程》与《再生集》〉，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 80-81。

¹³²³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 241；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页 98。

¹³²⁴ 1959 至 1963 年新加坡是自治邦，李汝琳没有仔细区分马来亚和新加坡。

¹³²⁵ 李汝琳《漩涡》后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 简体字初版），页 247。

¹³²⁶ 李汝琳南方文丛之一《漩涡》，页 159。

合的朋友每年出版一本包括各种体裁的作品的长远计划，表达了他推动海外华文文艺的热忱。¹³²⁷

李汝琳是一个极其念旧的人。他来到新加坡后，深深地怀念他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里家族的各成员及朋友，特别是对他的祖母、母亲、胞弟、族弟、姐妹的爱和牵挂。¹³²⁸他把对亲友的照片整理收藏，搬家时也不舍得丢弃家中的旧物。¹³²⁹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他在 1957 或 1958 年选择成为新加坡公民的心情——他乐意成为新加坡公民但绝非对故国忘恩负义。他在作品中对此多次解释，如在 1961 年 7 月写的诗歌〈谢恩情〉，说出了对祖国的感谢和他现在选择，其中有回忆、感恩、心酸、希望，但绝没有忘恩负义。¹³³⁰他在多篇小说中，也严厉批判忘恩负义，不懂得感恩的小人，这些人朝秦暮楚、¹³³¹趋炎附势、投机、¹³³²唯利是图、毫无归属感、忘恩负义，还有人换了四次国籍。¹³³³他讥讽这些人物品格低下，不懂得饮水思源，只知道汲取而不舍得付出。其实这些人不单是对它们的祖国忘恩负义，他们对他们当前的居留国也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李汝琳以自己对过去的缅怀与感恩，以及对现在居留国的归属感和肯定，批判了他们。不过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挣扎。他的解释，他对忘恩负义的小人的责备，其实是为自己辩护，是离散族裔离开故国，要在居留国定居之时，甚至定居后，对过去的、在彼的故国与此时此地的新家的相互牵引的张力的反映。¹³³⁴

李汝琳不要像印度华人般把自己当作侨民，他要做一个忠诚的居留国的国民；在做了选择，成为新加坡国民之后，他殷切澄清自己不是忘恩负义。他相信他的故国没有他，

¹³²⁷ 李汝琳《南方文丛》之一《漩涡》，页 147-148。

¹³²⁸ 李汝琳念初三时，祖母去世。他母亲早逝，被祖母带大，而且祖母是最早教他旧诗的。他写了一首新诗〈哭祖母〉悼念她，并寄到省城报纸副刊发表。见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李汝琳创作集》，页 287。

¹³²⁹ 李汝琳〈故居〉，《李汝琳创作集》，页 190-195。

¹³³⁰ 李汝琳〈谢恩情〉，《金与沙》，页 6-10。〈谢恩情〉写于 1961 年 7 月 22 日。

¹³³¹ 恋栈殖民地政府、朝秦暮楚的短视人物赵兴隆，见李汝琳〈泡沫〉，《新贵》（香港：海洋文艺社，1979），页 108-136。〈泡沫〉写于 1970 年 9 月。

¹³³² 助纣为孽、欺善怕恶、趋炎附势的投机份子洪国良，见李汝琳〈新贵〉，《新贵》，页 190-210。〈新贵〉写于 1978 年 12 月。

¹³³³ 唯利是图、毫无归属感、换了四次国籍，被冠以忘恩负义名号的秦天达，见李汝琳〈漂浮〉，《漂浮》（香港：海风出版社，1987），页 100-140。〈漂浮〉写于 1980 年 8 月。

¹³³⁴ Gilroy, Paul.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 207-12.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还有其他许多好孩子，他也祝福他的祖国更健壮。在倾诉之余，其实更凸显他在故国新家间的张力之下，离开后的牵挂，乐观中的无奈，祝福声里的心酸。

姚紫

姚紫和李星可、连士升一样，都是把‘在彼’‘过去’所积累的学识，用于塑造‘在此’和‘现在’的居留地。他有很深的国学根底，在他的杂文、诗词及小说中，都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来说明他的论点。如1975年写的〈洛阳才子他乡老〉，用了魏王曹操所渴求的人才最终流落江湖，用了李白、陆游的有志不得申、有才不得用，以致英雄老去，为国效忠的力量废置的史实，借喻世代（当然也包括现代）庸才自私贪婪误国、俊彦报国之路无门的悲哀。¹³³⁵同年写的〈凤凰浪迹成凡鸟〉，他用郁达夫流亡时的诗句‘凤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比喻艺术人才流落江湖被当成赚钱工具的悲辛。商业社会里混杂牛鬼蛇神，他最怕的是艺术人才遭遇到和韦庄一样的叹息：‘白额频频夜到门，水边踪迹渐成群；我今避世栖岩穴，岩穴如何又逢君？’¹³³⁶

1948年当他刚到新加坡后不久，他曾在居留和归去之间徘徊挣扎。¹³³⁷1949年，他这‘逃亡在外漂泊’的游子，告诉他的祖国，‘祖国的孩子永远是爱着祖国的’，¹³³⁸1950年，她还在梦里‘含着眼泪，嗅着故乡那芬芳的泥土的气息……’¹³³⁹1951年，在离开他的家乡三年后，他还怀念家乡景物，体会王粲‘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的深意。¹³⁴⁰直到1973年，他仍然在写他幼年的故事、家乡的秋天，‘而这况味，也是无数与我一样的南洋华人所经历过的。’¹³⁴¹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岁末、¹³⁴²在新年、¹³⁴³在中秋、¹³⁴⁴在清明，¹³⁴⁵他都不断的思念家人和故土。姚紫和杏影、连士升

¹³³⁵ 姚紫〈洛阳才子他乡老 - 江湖篇之一〉，姚紫《短长书》，页59-61，写于1975年。

¹³³⁶ 姚紫〈凤凰浪迹成凡鸟 - 江湖篇之二〉，姚紫《短长书》，页62-64，写于1975年。

¹³³⁷ 姚紫〈寂寞〉，姚紫《九月的风》，页3-6。

¹³³⁸ 姚紫〈桥〉，姚紫《九月的风》，页11-13。

¹³³⁹ 姚紫〈黄昏底叹息〉，姚紫《九月的风》，页14。〈黄昏底叹息〉写于1950年。

¹³⁴⁰ 姚紫〈怀乡草〉，姚紫《九月的风》，页23-24。〈怀乡草〉未注明写作日期，但文中叙述他离开故乡安海已经三年。姚紫于1947年尾抵新，因此此文应写于1950年末或1951年。

¹³⁴¹ 姚紫〈铜镛黄犊忆儿时〉，姚紫《九月的风》，页25-29。此文写于1973年12月。

¹³⁴² 姚紫〈岁暮草〉，姚紫《九月的风》，页46-54。此文写于1953年2月12日。

¹³⁴³ 同上；姚紫〈惆怅忆江南〉，姚紫《九月的风》，页21-22。此文写于1953年春节后三日。

¹³⁴⁴ 姚紫〈中秋，情感的季节〉，姚紫《九月的风》，页58-59，写于1969年9月。

一样，从一些事物，就会想到从前，想到故乡。杏影在新加坡听到清唱，中国的景物就一幕幕地在他眼前展开；¹³⁴⁶看到印度人善待雀鸟，就和中国人吃鸟和鸟蛋作比较。¹³⁴⁷连士升在异地吃福州菜，总和故乡的味道相比，觉得和故乡的味道不同；¹³⁴⁸在中秋佳节，连士升不但想起在故乡中秋提灯，中秋的月饼、柚子和蛭饼，更感慨自己的逃亡生涯。¹³⁴⁹姚紫在 1950 年，欣喜的发觉新加坡的麻雀，和他故乡麻雀的啼声一样；他在梦里含着眼泪，嗅着故乡芬芳的泥土的气息”，¹³⁵⁰这些相似的情感，正是离散华人在此时此地，回忆并思念故国的情怀。他们缅怀故乡，却又不能或不想回去久居，在万般无奈的中，只好藉物思人，或托著梦境释放思念之情。

姚紫曾以‘白华’形容无根的、漂泊的海外华桥，是‘逃亡、流浪、失去了家、失去了祖国’的人，¹³⁵¹然而他排斥‘逃难作家’和‘侨民作家’的称谓。当时有些自称为‘马华作家’的人，称“离开祖国又怀念祖国的文人”为‘逃难作家’，及“不能生根立足地自认为‘马来人’的文人，是‘侨民作家’”。他提出两点驳斥这些称谓：高尔基与拜伦流亡在外并不羞于承认自己的祖国，也不用‘脱离祖国’取得文艺或政治上的荣誉。再者，这些讥讽他人的作家，自己的祖先又来自何处？¹³⁵²

他不以承认中国为他的祖国为耻，然而于 1969 年中国文革期间他为中国哭泣，并称中国为‘地狱’、为‘坟场’。与此同时，他认为新加坡的公民是东南亚最值得羡慕的人民！作为一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弹丸小岛，新加坡是海外华人的力量，是海外华人争取公民权和居留权的地方。¹³⁵³

由此可见身为离散华人，姚紫对故国和新家复杂的感情。他关心他的故国，也爱他的新家。对回不去也不愿回去的故国，他哀恸，对弹丸小岛的新家，他充满了期待。他的感情并行于‘彼’与‘此’之间。

¹³⁴⁵ 姚紫〈清明·忧郁〉，姚紫《九月的风》，页 56-57。此文写于 1969 年 4 月。

¹³⁴⁶ 杏影〈听清唱〉，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123-125。

¹³⁴⁷ 杏影〈印度的麻雀〉，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69-77。引文见页 71。

¹³⁴⁸ 连士升〈福州的享乐〉，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 100-104。

¹³⁴⁹ 连士升〈月是故乡明〉，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页 95-99。

¹³⁵⁰ 姚紫〈黄昏底叹息〉，姚紫《九月的风》，页 14。〈黄昏底叹息〉写于 1950 年。

¹³⁵¹ 姚紫〈白华的女儿〉，姚紫《九月的原野》，页 110-133。引文见页 132；姚紫手迹，姚紫《夜歌》，收录于目录前，无页数。根据内容，应写于 1969 年的首日。

¹³⁵² 姚紫〈逃难作家〉，姚紫《杂文，这支部队》，页 3-4。

¹³⁵³ 姚紫手迹，姚紫《夜歌》，收录于目录前，无页数，根据内容，应写于 1969 年的首日，于文革期间。

姚紫不但以写作及副刊编辑发展新加坡的文艺，也和他的族人一起，参与建设和增进晋江和新加坡的联系。他在 1957 年至 1958 年担任晋江会馆的文书，以及 1961 年至 1962 年担任常务监察员，¹³⁵⁴ 这些服务一般上是义务性质，姚紫给予会馆的服务，不但让新加坡族人之间，也让新加坡和国内的族人有更好的联系，使两国的关系得以拓展，使离散族裔在彼与在此、过去和现在，相互牵引，并继续维系社群、重现母族的文化传统。¹³⁵⁵

苗秀与赵戎

这里将一起讨论苗秀和赵戎的共同点和个别的特点。他们与上述五位移民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们的出生地是在新加坡。虽然他们不在中国出生，他们的家庭背景和所受的教育都对中国的种族和文化上的认同。他们都关心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救亡工作，然而他们对中国，比其他五位移民作家的实际体验，更多的是想象，也因此对离散族群在彼与在此，过去和现在的张力，有不同的呈现。例如在姚紫、杏影和连士升的笔下，对他们故乡的种种，都有细致的描述、深切的思念，而对土生土长的苗秀和赵戎，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对中国有爱护和关心，但也感到迷惘和无根。这些人没到过中国，但仍然对之向往，有如苗秀〈边家的人们〉中的边建立所说的，虽然他的脚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的土地，但只因他是个中国人，中国对他有着一种神秘的吸引力。¹³⁵⁶ 由于对中国没有实际的体验，有些土生土长的华人，即使知道祖籍，但不知家乡何处；生活在这热带的土地上，却每一秒钟都觉得自己是异乡人。¹³⁵⁷ 这类异乡人有许多挣扎，他们对于他们出生的国家，缺乏归属感，但也想为居留地的人们做些事情。有如苗秀〈雨〉中的龚冷秋，当他听到莉莉说她是土生土长的华人，但不知家乡何处时，他觉得很扎心：

¹³⁵⁴ 彭丽儿主编〈历届理事名录〉，《世纪晋江，百载辉煌：新加坡晋江会馆百年庆，1918-2018》（新加坡：新加坡晋江会馆，2018），页 A9。

¹³⁵⁵ Paul Gilroy,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207-12. Accessed 3 July 2020.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 317.

¹³⁵⁶ 苗秀〈边家的人们〉，《苗秀小说选》，页 219。

¹³⁵⁷ 苗秀〈雨〉，《苗秀小说选》，页 204，写于 1950 年。

“我是这边土生土长的，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小刀，一直插进他的灵魂深处。是的，自己也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也许他命里该留下来。他该为这地带的人民例如像莉莉这些给生活压扁了的人们做一点什么有益的事情。可是最糟糕的，是他生活在这热带的土地上，却每一分钟，不，每一秒钟都有一种异乡人的感觉。”¹³⁵⁸

当他不能和大伙一起回中国时，他还‘差点没哭出声来。’¹³⁵⁹的确，他对中国有一份感情，也想为他居住的新加坡尽一份力。

苗秀笔下有许多人一直认同中国为他们的国家，他们在居留地只是找生活而已，中国人之间也应该互相照顾。前者如〈浮渣〉中的熨斗工人财叔¹³⁶⁰以及《火浪中》的知识分子丁主任；¹³⁶¹后者如当〈新加坡屋顶下〉的陈万帮赛赛拿回钢笔而赛赛要给他咖啡钱的时候，对她说同是中国人，都在异乡找生活，帮助她是应该的。¹³⁶²苗秀也写了许多人除了北归抗日，也在本地参加救亡，¹³⁶³但还有许多人认为应该参加本土建设，其中有男有女，有小职员也有学校校长。¹³⁶⁴他通过梅挺秀，说出了他的看法：

“看看这些中国人吧，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在这里了，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在这土地生了根，谁也赶不走他们。但是现在东洋鬼子来了，他们的亲人给鬼子的炸弹炸死了，他们辛辛苦苦种起来的树胶园给烧掉了，他们的住屋给炸坏了。我问问你，这些人不应该起来保卫他们的财产，保卫这土地吗？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马来亚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这话一点不差。”¹³⁶⁵

从‘马来亚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他再通过夏恩（夏财副）从起初一心想离开这城市参加救亡，到感到他对这土地的热爱，并要为这苦难的土地出一份力的转变，有力地说明了离散华人思想转变的过程。¹³⁶⁶从苗秀小说中的种种描绘——一心想还乡的中国人、‘异乡人’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感情、乐意参加本地建设的人们、认为‘马来亚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以及已经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可见苗秀的挣扎、对华侨与华人的

¹³⁵⁸ 苗秀〈雨〉，《苗秀小说选》，页204。

¹³⁵⁹ 苗秀〈雨〉，《苗秀小说选》，页203。

¹³⁶⁰ 苗秀〈浮渣〉，《苗秀小说选》，页234-241，写于1940年。

¹³⁶¹ 苗秀《火浪》，页181。

¹³⁶² 苗秀〈新加坡屋顶下〉，柏杨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小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页59。

¹³⁶³ 苗秀《火浪》，页296、334。苗秀在《火浪》末页记他于1950年6月6日完成初稿，1959年7月17日重改。

¹³⁶⁴ 苗秀〈写在《火浪》前面〉，苗秀《火浪》，页1；苗秀《火浪》，页204、297、305；苗秀〈边家的人们〉，《苗秀小说选》，页217-219。

¹³⁶⁵ 苗秀《火浪》，页139。

¹³⁶⁶ 苗秀《火浪》，页204。

理解，以及对中国和新加坡同时具有的认同。然而不变的是在他的文艺理论上，他始终认为侨民文艺虽有其历史价值，但也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他不但认为本地人应该开展本地的文艺，而且要认定培养国家意识，发扬爱国精神，是国家文艺创作的方向，以教育群众，培养人民的国家意识为宗旨和目标。”¹³⁶⁷

赵戎和苗秀一样不曾亲身体验中国 1940 年代的苦难，但他想像的中国是比南洋更苦的。战争的蹂躏、物资的匮乏、气候的严峻，都使中国人民深受其苦。他对比这时期的新马人民，也有饿死和遭受日军暴行的，但不比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¹³⁶⁸他在彼与在此的对比，显示了离散华人一面心系他族群祖辈的来源国，一面也关心他居留国的人民。

赵戎和苗秀一样，笔下有回归报效中国，也有在本地救亡的人们。他书中本地救亡的人们中，还比苗秀多了马来族和印度族的异族同胞。¹³⁶⁹赵戎认为华人慎终追远的传统和不忘故土的精神，呼唤他们接济中国亲人，并到中国探望，但探亲后仍然回来，是把本地认同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对中国和新加坡的双向认同。¹³⁷⁰

在文艺理论上，赵戎和苗秀持同样的立场。他们不但承认马华文艺曾经受中国文艺的影响，侨民文艺有其贡献和成就，也已完成了其历史任务，赵戎还比苗秀更早的认为应开展‘马来亚新启蒙运动’，而这运动不单推进马华新文化，也推进各民族的文化。它是各民族文化的综合，是国际性的新文化运动。”¹³⁷¹他形容侨民文艺发展为新马华新文艺的过程，有如寄居的华侨转变而成为热爱和这土地的华人一样。¹³⁷²他们清楚中国文艺滋润了新加坡文艺，而后者在时代的进程中，也应有其独特的场域。它们曾有的张力与碰撞，之后成为继往开来与多元性的新华文艺。游俊豪将新华文学史的发展归之为华人离散族裔的历程，解释得更为精辟：

“叙事性的新华文学史，…… 结合来看就是某个华人离散族裔的历程。离开中国抵达新地，继承与接收中国，进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多元主义的环境中不断追求和重塑主体性。中国、南洋、马来亚、马来西亚、马华等概念，相继涌入

¹³⁶⁷ 同上，页 122-123。

¹³⁶⁸ 赵戎〈芭洋上〉，页 13。

¹³⁶⁹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上》，页 97-98。

¹³⁷⁰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上》，页 11。

¹³⁷¹ 赵戎〈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赵戎研究专集》，页 205-206。

¹³⁷² 同上，页 204。

新华场域，最后新加坡叙事聚焦了新华文学的想望与想象。从单面的中国渊源出发，到复系统的互动、跨文化的穿越，新华文学史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曲折的线条、庞杂的关系。”¹³⁷³

第二节： 地域对离散族裔的影响

研究离散族群的 Gilroy (1994) 及 Butler (2001) 都肯定地域对离散族裔的影响；对海外华人有深入研究的王赓武 (2001, 2003) 也肯定地域，包括其运作，影响观点与思维；研究跨国移民的 Nina Glick-Schiller et al. (1994) 认为跨国移民的身份由他们在居留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塑造；甚至研究人本主义地理学系统的学者段义孚 (Yi-Fu Tuan) (2001) 也指出环境影响人的心态和价值观。论文中的这七位作家以他们的作品说明了地域如何影响离散华人。本论文的第五章详细讲论了这七位作家的本土情，他们对时局的回应及对新加坡感情的建立。这一章主要集中在他们由侨民成为新华人的过程中，多元种族和文化的新加坡对他们的塑造以及他们的回应。

综合这些学者的论述并观察论文中的这七位作家，笔者认为这七位作家的作品说明了离散族裔过去和他国（包括故国）的经历，影响他们现在和居留国的体验；他们现在和居留国的体验，也使他们反思过去和他国的经历。他们在居留国现在的思考，是糅合了对过去他国记忆和想象的成分，包括了他们对过去、现在、他国、居留国的理解，也包括了他们对现在和居留国，甚至他国和世界的冀望。

¹³⁷³ 游俊豪〈渊源、场域、系统：新华文学史的结构写作〉，《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群的重层脉络》，页 191-192。

李星可

在许多方面，李星可的社论和文艺创作说明了居留国对离散华人的影响。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李星可认识现实情况。他维护华文教育，但他也知道，多源流教育和多种语文共存是必然的，作为华人，他强调的是华人对华文的学习。当他为华校争取较多的上课天数时，也对英校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水平、方法与师资加以督促，他并且肯定李光耀 1966 年 9 月的建议，在华校中，数理用英文，在英校中，史地用华文，称之为‘星加坡的文化革命’与‘星加坡的文艺复兴’，因为双语教育才能保障文化传统不致丧失，是实现多元文化社会的基础。¹³⁷⁴ 他在维护母族文化的同时，也多次鼓励各源流文化的交流。要真正的交流必须摒除语言的隔阂，通过多种语文的学习，能促使各源流文化百鸟争鸣、百花齐放。¹³⁷⁵

李星可重视英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但不主张英语至上的观点。独幕剧〈月饼〉¹³⁷⁶中的舞女因为读了英文，就能穿漂亮的衣服，还能赚钱，其实过的是一种受屈辱的生活，是对英语教育的讽刺。三幕剧〈报穷〉¹³⁷⁷ 以新加坡当时不安的社会环境 - 学潮、工潮为背景，指出受华文教育与英文教育者思想、价值观与行为上的差异，受英文教育的妻女只注重利益，但华文教育的儿子却不希冀父亲的钱财，李星可又藉此把他的价值观融进了当时语文教育的背景中。独幕剧〈大众顾问〉¹³⁷⁸ 反映南洋社会对女性的蔑视及女性的附属地位，五幕喜剧〈钓金龟〉¹³⁷⁹ 反映文化界的悲哀。在文字工作上，投稿人要看编辑的嘴脸，编辑也一身铜臭；在艺坛上画家也要跟得上潮流，而看画、买画的人目的是附庸风雅，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形象。当时这些负面的社会现象，被李星可一一指出。独幕剧〈绿洲〉¹³⁸⁰ 不但反映教育界、文艺界的现象，也影射自己曾被打压，其中也映射当时南洋大学校长‘洋博士’林语堂以高薪聘请教师。题目〈绿洲〉表面上描写星洲是文化绿洲，其实要表达的相反 - 星洲其实是文化沙漠。

¹³⁷⁴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7、57、58。

¹³⁷⁵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37、41、59。

¹³⁷⁶ 收于李星可《报穷》（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页 21-35。

¹³⁷⁷ 同上，页 37-104。

¹³⁷⁸ 收于李星可《桥上》（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页 37-60。

¹³⁷⁹ 收于《快艇》，页 83-156。

¹³⁸⁰ 收于李星可《绿洲》（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1961），页 71-94。

要使文化沙漠成为绿洲，李星可积极推动新马的文化事业。对于当时筹组的国家语文局，李星可建议它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熔铸崭新的国家文化的过程中，有计划地鼓励写作及出版当地各语文的创作。¹³⁸¹他欢迎放宽文化资料的限制，但亦同时建议划一尺度，平等对待各种语文的资料。¹³⁸²李星可认为新的国家图书馆应有明确的政策，同时照顾学术和通俗的需要，也应该在政策上纠正华文书籍不足的情况。¹³⁸³他本身热爱戏剧，尤其是京剧，但在国家剧场的设计上，考虑到在新加坡，因观众群包括四大种族，剧场设计要配合各种族的需要。他同意当时国家剧场信托委员会主席吴宝星医生的看法，不主张形式上肤浅或表面的文化混合，要真正的交流必须通过多种语文的学习，促使各源流文化绽放光彩。要使文化兼收并容，就不能只维护本地生长的人而排斥外来人才。¹³⁸⁴新加坡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更要有独立的民族性、真正的‘硬骨头’。民族性可通过文化艺术来塑造，而塑造‘硬骨头’的民族性是在‘利’之前，坚持刚正不阿、坚持‘仁’与‘义’的华族传统节操。这些华族传统节操也该立为新一代、新社会的目标。¹³⁸⁵李星可了解新加坡社会的情况，用他自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积极促进新加坡的发展，正是离散族裔对居留国的回应。

李星可非常关注他的居留国新加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写于 1959 至 1963 年从自治到成为马来西亚一份子的前夕的《政论选集》，写于 1963 年末至 1967 年从自治至刚独立的《政论新集》，以及到了 1967 及 1968 年独立后的《政论近集》，都对当时有关自治、新马分家、独立、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内政、治国、民生各种问题提出建议。

在政治上，李星可认为 1959 年新加坡争取合并并不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新马在历史、地理、政治、社会、人种、经济上都有合并的基础，合并则能共存共荣。1963 年至 1965 年新加坡经历了新马合并然后分家，李星可肯定分家后的新加坡前途，而且举出国小但昌隆的先例。当时新加坡局势不稳定，面对国内外的许多压力。1963 年写的〈星加坡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认为印度当时因为和中国的‘紧急状态’而规定凡华族要

¹³⁸¹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2。

¹³⁸²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78。

¹³⁸³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26。

¹³⁸⁴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5。

¹³⁸⁵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47、39。

入境印度或取道印度到他处都要办理特别签证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能因为新加坡华族众多而被当成是中国的一部分。¹³⁸⁶ 1965 年写的〈美国与星加坡〉，指出美国害怕星加坡会成为南中国海中的‘新古巴’的错误，¹³⁸⁷1967 年写的苏联报道东南亚的华籍移民，正在充当中美两国的‘第五纵队’，苏联其实和美国一样，都患有‘恐华病’。这样的标签将造成的种族问题，甚至排华行动以及国际间对新加坡的猜疑的打压。¹³⁸⁸ 1967 至 1968 年，在英军撤退的问题上，李星可旁征博引，指出新加坡唯一的生存之道是自力更生。¹³⁸⁹ 很显然的，李星可采取的立场是也是新加坡的立场。作为华裔，他为海外华人说话，作为新加坡的华裔，他肯定地说东南亚，包括新加坡的华人，随着国家的独立，获得了公民权，对祖国的观念已经有实质上的改变。¹³⁹⁰ 身处东南亚的新加坡，作为海外华人中的新加坡华裔，都在在使他对周围环境及居留国本身的政治氛围作出回应。

在经济上，他反映了 1959 至 1963 年，在内外政治不安的环境下对新加坡经济前途的担忧，但强调新加坡的地理优势，只要劳资合作、社会稳定，外国投资必定纷至沓来。¹³⁹¹1963 至 1967 年他进一步详细的指出找寻经济的出路有两个方向：同时努力发展工业和争取国外市场，并以相关的制度支持。不变的前提是‘尽其在我’。¹³⁹² 到了 1967 及 1968 年，多谈建立制度，以不结盟政策的政治立场与多国建立友好关系。¹³⁹³

在民生议题上，李星可多方为不同的弱势群体与低层人民发声请命。他为德士及霸王车请命、¹³⁹⁴ 为典当业者诉苦，¹³⁹⁵ 特别为新马分家后在本地出生，然却在出生纸上无登记姓名的‘无国籍公民’的困境以及他们的就业问题屡屡发声并提出建议。除了大

¹³⁸⁶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161。

¹³⁸⁷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21。

¹³⁸⁸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9、24、34、36。

¹³⁸⁹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33、61、62、65、79、84。

¹³⁹⁰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24。

¹³⁹¹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6、13、35、36、63、68、77、91、96、102、106、111、112、132、133。

¹³⁹²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15、17、19、23、77。

¹³⁹³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6、7、9、14、18、45、48、52、54。

¹³⁹⁴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36、76。

¹³⁹⁵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3。

的课题，他也关注柴米油盐的细节，告诉执政者因物价波动与上涨、¹³⁹⁶ 银行利率提高、¹³⁹⁷ 汽油起价、¹³⁹⁸ 脚踏车零件供应¹³⁹⁹ 对消费者民生造成的影响。

对国内的政务和治国，李星可也敢于提出问题和建议。他从人口问题¹⁴⁰⁰ 谈到当时的政局（如行动党的内部斗争、芳林和安顺区的补选，工潮、劳资纠纷）¹⁴⁰¹，以及对新政府新国会的期待。¹⁴⁰²

李星可的社论和文艺创作反映了他对社会、对人民的关切，以及作为新加坡华人对居留国的期望。在《桥上》1957 的〈自序〉里，他自言在南洋已经住了十五六年。战前是南洋华侨的过路之宾，现在已经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份子。不过由于性格的关系，他‘永远好像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捕捉到了‘乍生乍熟的精彩镜头’。¹⁴⁰³ 其实他这‘移种的花朵’，能以宏观的视野，分析时局，也能以小见大的从调味粉的固打制谈到关税保护，¹⁴⁰⁴ 从罐头食品的入口准证谈到生活指数，¹⁴⁰⁵ 从铁钉缺乏说到工商业均衡失调。¹⁴⁰⁶ 在文艺创作上为使文化沙漠成为绿洲，李星可积极推动新马的文化事业。他希望为南洋，或更具体一些，对新马的社会和人民出一份力。因此他不止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第三者，更是一个置身事内的局中人。

¹³⁹⁶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8、20。

¹³⁹⁷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50、56、58。

¹³⁹⁸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5、11、12、23、25、28、29。

¹³⁹⁹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37、38。

¹⁴⁰⁰ 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4、29。

¹⁴⁰¹ 有关行动党的内部斗争，见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70 及 71；补选的议题，见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49、50、51、52、54、57、58、64、65、66；工潮见李星可《政论选集》篇 84、90、91、117。

¹⁴⁰²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71、72、73。

¹⁴⁰³ 李星可〈自序〉《桥上》（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

¹⁴⁰⁴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31。

¹⁴⁰⁵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69。

¹⁴⁰⁶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45。

连士升

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李星可亲身经历过因国家不强大而被人瞧不起的遭遇。¹⁴⁰⁷ 连士升也曾讨论侨生的态度与国家地位的关系。他称华侨的子女为侨生，他们因在本地生长，也被称为峇峇。¹⁴⁰⁸ 侨生曾因中国割地赔款的耻辱而有严重的自卑感，以说中文为耻。但到了日本南侵后，日文和中文同被重视，侨生开始看重中文。后来中国日渐强大，侨生逐渐恢复了自尊和自信，准备做当地的公民。¹⁴⁰⁹ 从他的叙述可见他认为国家的地位和侨生的态度密切相关。随着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说明不再允许双重国籍的立场。连士升支持这一立场，认为作为公民，应效忠本邦，而效忠的方式之一就是挺身而出，参与公共事业和社会的建设，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尽责，而且谨慎选举出人民的代议士。¹⁴¹⁰ 他对于双重国籍的否定、对公民效忠居留国的坚持，说明他接受了自己新的身份。在语言的问题上，他更明言以前居民作为过客，只需学些普通的应酬话，但现在作为本地公民，应熟悉本地的语文。他认为星马迟早会合并，到时华文将与巫文等量齐观。因此华人和马来人应学习对方的语文，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发扬马来亚文化。¹⁴¹¹ 对新加坡的现实，连士升以务实的态度及前瞻性的观点作出回应。

连士升主张训练公民，更具体地建议如何善用外来人才，无论是本地或外地人才，都以素质为主导的选才方式，才能使国家富强，¹⁴¹² 和李星可的建议‘选贤任能，唯才是用’一致。¹⁴¹³ 由于连士升和李星可都是外来人才，是李星可笔下的‘移种的花朵’，他们对于华裔移民的社会位置和可做出的贡献，都有深刻的体会。¹⁴¹⁴ 作为离散华人，

¹⁴⁰⁷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7-18。

¹⁴⁰⁸ 连士升〈华侨与侨生〉，《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83-87，写于 1951 年 11 月 18 日。

¹⁴⁰⁹ 连士升〈侨生地位的今昔〉，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闲人杂记》，页 71-72，写于 1955 年 5 月 10 日。

¹⁴¹⁰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页 73-75，写于 1958 年 1 月 9 日。

¹⁴¹¹ 同上，页 88-90，写于 1958 年 3 月 17 日。

¹⁴¹² 连士升〈人民不再是奴才〉，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闲人杂记》，页 111-112，写于 1955 年 8 月 4 日；连士升〈任用当地的人才〉，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闲人杂记》，页 147-148，写于 1955 年 10 月 21 日；连士升〈吸取外资与尊重客卿〉，《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51-154，写于 1969 年 8 月 19 日；连士升〈训练优秀的公民〉，《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78-180，写于 1968 年 9 月 12 日；连士升〈工商业界的决策人才〉，《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35-138，写于 1967 年 12 月 15 日；连士升〈再论工商业界的决策人才〉，《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39-142，写于 1967 年 12 月 19 日。

¹⁴¹³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13、14、16、17、23、64、77。

¹⁴¹⁴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15。

他们都体会到和其他种族互相融合的重要性。他们的思考，正如 Butler（2001）所强调的，塑造离散族裔的关键之一包括离散族裔与其他离散族裔及与居留国多数人的关系。¹⁴¹⁵ 连士升多方鼓励文化交流 – 通过艺术表演与学术展览以期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智；¹⁴¹⁶检讨历史教科书以使青少年在了解本国及他国的生活习俗后，也尊重他人的生活习俗，早日养成爱护祖国、尊重他国的健全心理；¹⁴¹⁷学习当地语文以利与其他种族沟通。¹⁴¹⁸最终的目的是与其他居民和衷共济、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建立共同的文化与社会。¹⁴¹⁹

连士升在不同的地方喝香片，味道不同，领悟到其实是环境影响味觉：

“在福州百合汤房洗温泉的时候，我爱喝香片，在西湖灵隐寺的凉亭里，我爱喝雨前的龙井。到了南洋后，也偶尔买些龙井香片到家里来冲，可是喝来喝去，总不是那么一回事，喝了等于没喝，这时我才真正觉悟，环境变了，心情变了，同样的饮料或食品，却有不同的味道。”¹⁴²⁰

连士升的这段文字对时空差异而产生的不同体验做了非常贴切的比喻。新马华文文艺里呈现的中国元素，因为地域的差异，政治社会场景所造成的不同体验，在居留地所渴望的中国，甚至对故土的回忆定有差异。

连士升自从在 40 岁南来新加坡后，以他的文字回忆中国的种种，以他对中国的认识诠释中国的文化并期望此文化润泽居留国的离散族裔。结合中国母国对连士升的塑造，居留国新加坡的环境，连士升通过文艺反映新加坡的变化，对其思索与回应，特别是政治及社会议题，如争取自治与独立、种族问题、学生运动；教育及语文议题，如华校的式微、南大的创立与幻灭；华人的身份议题，如华侨和侨生的关系、本地和外来人才的作用，多元种族共处和文化交融的必要，以及对于新加坡的独立和发展更予以

¹⁴¹⁵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 207. Doi:10.1353/dsp.2011.0014.

¹⁴¹⁶ 连士升〈促进文化的交流〉，《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212-215，写于 1960 年 7 月 27 日。

¹⁴¹⁷ 连士升〈中小学历史须重新检讨〉，《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94-197，写于 1969 年 9 月 25 日。

¹⁴¹⁸ 连士升〈注重母语和普及教育〉，《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76-179，写于 1963 年 10 月 10 日。

¹⁴¹⁹ 同上；连士升〈建立共同生活〉，《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1-13，写于 1960 年 1 月 4 日。

¹⁴²⁰ 连亮思、连文思选编《连士升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页 346。

肯定和期待。¹⁴²¹连士升的叙事说明了离散族裔与母国的关系不因离开母国而终止。相反的，这关系不但会继续，还会同时以不同的形式，在居留国对母国文化重新诠释。

1422

杏影

杏影的作品也见证了学者对地域及居留国的运作影响离散族裔，包括他们的世界观的论述。¹⁴²³杏影在新加坡居住了 22 年，比他在中国（19 年）、日本（12 年）和印度（4 年）更为长久，也是他写作最丰富的岁月。在这 22 年里，他经历过日治后的新加坡、在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以及新加坡走向自治及独立的过程。

杏影的文友文兵记述在五十年代，“殖民地政府压制着大伙，贫穷事业不民主是大伙们的生活内容，民族教育危机，黄色文化泛滥”，在这样的环境下，杏影要培养当地文艺工作者的接班人，以推动当地的文艺运动为己任。五十年代后期，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跟他不懈地工作有很大的关系。¹⁴²⁴因此他不但被新加坡的环境所塑造，他也和其他作家一起，塑造了新加坡文化。

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使他对世界和平更有信心。他在新加坡的大街上走着，看到了许多善良、温顺、和蔼的马来人，他在新加坡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对他横眉怒目的印度人，在这里的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也非常客气和乐于助人。因为“人类本来是一个大家族。大家族的人类要重新结合，使‘天下’成为‘一家’，这只是时间问题吧了”。¹⁴²⁵新加坡是“东西的文明的十字路口，要冲突的许多‘文明’，居然在这文明的交错的路口，融融泄泄。”¹⁴²⁶新加坡能融合各种族文化，使不同的宗教、新旧的

¹⁴²¹ 连士升〈新加坡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46-149，写于 1969 年 2 月 7 日。

¹⁴²²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 205-206. Doi: 10.1353/dsp.2011.0014.

¹⁴²³ 参前面王赓武（2001, 2003）, Butler（2001）, Gilroy（1994）, Basch et al.（1994）, 段义孚（Yi-Fu Tuan）（2001）, Ien Ang（2011）的论述与脚注。

¹⁴²⁴ 文兵〈恍见前头挑灯人〉，骆明《杏影研究专集》，页 31-33。

¹⁴²⁵ 杏影《想想写写》，页 48。

¹⁴²⁶ 杏影〈在高楼窗口看海〉，《杏影散文选》，页 133。

思想、对立的观点都能兼收并容，和平共处。因此他给新加坡至高的赞美：新加坡为上帝赐予人类的‘地上天堂’。¹⁴²⁷

在这‘地上天堂’，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得以发挥。在 1950 年代，他写了许多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期望世界大同的文章，其中对英国/爱尔兰剧作家、音乐和文学评论家、社会主义者萧伯纳（Bernard Shaw）非常钦佩。在〈读书偶译〉里有 250 位署名的名人中引用他的名言 45 次，更在其他文章中多次讨论他的思想。¹⁴²⁸ 杏影不但欣赏萧伯纳的真实、善良，不断追求更高的文明，更好的社会和生活，更钦佩萧伯纳对塑造人类文明的坚持和人类对文明的信念。萧伯纳说“即令是原子弹毁灭了这个文明，我们也是要重新把它再建起来的。”¹⁴²⁹ 杏影厌恶战争，希冀和平，他要以萧伯纳“对人类的这种希望做我们的努力的指标，让我们从今天起能做一点于人类文化也就是于我们自己有益的事情，让我们拼命去追求知识、克服愚蠢、赢得长生。让我们相信那些正是为了想消灭战争改造文明而受难的善良的人们，必将获得在这地球上的酬报。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要和平，我们就一定会有和平；只要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大同世界，一个大同世界就一定会出现。”¹⁴³⁰

这个大同世界里有的是世界公民，世界公民不属于一个国家。杏影说：“我们是不能够孤独生活的。我们已经懂得了我们的幸福是依附于离开我们远远的那些国家的人民的幸福之上的。……我们已经学到了要做世界的公民，要做人类大家族中的一员。”

¹⁴³¹ 世界公民是跨国界的，不受疆域拘束的公民，里面糅合了各种文化、各种文明。作为一个曾生活在中国、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的离散华人，对中文、日文及英文的语文及文化有深度的认识，他要做一个属于世界的，能欣赏杂糅文化的公民。新加坡给予他实现理想的条件，因为在新加坡，他看到了文化融合、思想并容、宗教调和、种族和谐的体现，正是他思想里所欣赏的离散文化的杂糅特质。不同的种族与文化其实容易产生许多矛盾和冲突，但新加坡却能在‘这文明交错的路口，融融泄泄’¹⁴³² 杏影看

¹⁴²⁷ 杏影 〈在高楼窗口看海〉，《杏影散文选》，页 133。

¹⁴²⁸ 杏影 〈一个伟大的诞生〉，《杏影散文选》，页 22-43；杏影〈读书偶译〉，杏影《想想写写》，页 117-282。

¹⁴²⁹ 杏影 〈一个伟大的诞生〉，页 42。

¹⁴³⁰ 同上，页 43。

¹⁴³¹ 杏影 〈读书偶译〉，页 125。

¹⁴³² 杏影 〈在高楼窗口看海〉，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133。

到从‘彼’到‘此’，不同种族带来的文明，不再对立，却能在学习适应、包容的过程中，在磨合、融和之后，达致互相欣赏的境界。

李汝琳

李汝琳坚持对居留国效忠。他认为当时印度的华人不应该把自己当做侨民，反观缅甸的华人，在缅甸独立之后，却以自己的新国民身份，热烈参加了国家建设。小说《漩涡》里夏麟说的一番话，其实就是李汝琳的观点。他清楚地说明在缅甸独立之前，缅甸华人被当作外人，他们在精神上难免倾向祖国。但独立之后，他们不再受到歧视，成了国家的一份子，拥有家庭和事业，和缅甸的其他人民，共同抵御外侮。东南亚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移民侨居的观念也跟着改变，和加拿大的许多英国和法国的移民一样，把居留国看做是自己的国家。中国有众多人口，他不认为中国会拉住他们不放，中国疆域广袤，更不需要侵占别人的土地。¹⁴³³

与其他六位作家不同的是，李汝琳更勇于直抒他对新加坡的情感。即使他也在 1959 年失去公民权，也在 1959 年，他坦言‘这儿已是我的家乡’，¹⁴³⁴ 1961 年他在重获公民权之后，他再歌颂这里的热带风光，‘爱上了这美丽的所在’并‘最后安居在这土地上’。¹⁴³⁵ 1966 年，他的〈诚挚的爱〉，第一句就是强有力的‘我说：我爱新加坡！’，接着列出了对新加坡的赞赏：国家摆脱了枷锁，生气勃勃，人民年轻而有自信。在结尾时再重申：‘我说：我走过很多很多地方，我却爱上了新加坡！’¹⁴³⁶ 可见新加坡对他的影响的深刻有力。他在 1947 年从印度来到新加坡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外，还不断写作和编辑出版。他见证了新加坡成长的过程，热爱这片土地，也以出版事业，不断把新加坡的文艺推广国外。他不仅爱新加坡，更为新加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南方文丛》、《新马文艺丛书》及《新马戏剧丛书》这三套共计 54 本的丛书，反映了新马社会和社群的面貌，让读者对新马文坛和华人社会与社

¹⁴³³ 李汝琳《漩涡》（《南方文丛》之一），页 145-146。

¹⁴³⁴ 李汝琳〈路〉，《叩门》（香港：万里书局，1961），页 52-56。此诗作于 1959 年 8 月 7 日黎明。

¹⁴³⁵ 李汝琳〈谢恩情〉，《金与沙》（新加坡：万里书局，1980），页 6-10。〈谢恩情〉写于 1961 年 7 月 22 日。

¹⁴³⁶ 李汝琳〈诚挚的爱〉，《金与沙》（新加坡：万里书局，1980），页 11-15。〈诚挚的爱〉写于 1966 年 7 月 20 日。

群有比较清楚的认识。¹⁴³⁷ 李汝琳虽不是本地出生的作家，但他的作品和所出版的丛书所呈现的，是对故国土和新家园的并行不悖的情感，也包含了居留国的在地实景与离散族裔社群的面貌，两者糅合所产生的新的体验。¹⁴³⁸

姚紫

姚紫感谢新加坡，因他是在厦门《江声日报》编辑时由于讽刺及抨击当时的政府而被通缉，到了新加坡才安定下来。¹⁴³⁹ 在新加坡定居之后，他见证了新加坡的成长，也在多篇诗歌里赞美新加坡，如 1961 年，新加坡刚成为自治邦时，他为新加坡经历了黑暗，走向光明献上祝福，同时鼓励大伙儿以“更大的忍耐和坚决，负起这开邦建国的伟大的历史任务。”¹⁴⁴⁰ 1969 年，他坚定地认为“新加坡的公民成为东南亚最值得羡慕的人民！新加坡只是一个弹丸般的小小的岛之国！华人占八十五巴仙，是海外华人的天堂！”¹⁴⁴¹ 在 1970 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的除夕夜及年初一，他想的是如何让这岛国的人民过得更好，他的愿望是新加坡人效忠于新加坡，认为‘那边好’的人可以离开。他鼓励新加坡人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以血和汗捍卫国家。他的词句慷慨坚定，称呼新加坡为‘新的故乡’，而且呼吁人民对这新的故乡的耕耘，要辛勤努力，‘直到万世！’。¹⁴⁴² 是新加坡给了他写作和出版的环境，让他能为新加坡文艺辛勤耕耘，前仆后继地编撰副刊并不停写作。不计他在中国编的刊物，他在新加坡的 30 年里，¹⁴⁴³ 总共编辑了 17 种刊物。¹⁴⁴⁴ 他生前出版 12 本小说，2 本散文集，离世后他的好友兼遗产信托人，替他出版了 9 本书，也依照他的遗嘱所设立的文艺基金，赞助了 38 本不同

¹⁴³⁷ 方北方〈巴金与李汝琳－记“文学丛刊”和“新马文丛”〉，《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166-168。

¹⁴³⁸ Kim D. Butler,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192. Doi: 10.1353/dsp.2011.0014.

¹⁴³⁹ 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哭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55。

¹⁴⁴⁰ 姚紫〈迎接一九六一年〉，姚紫《九月的风》（陈龙玉出版，姚紫遗产信托人编，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6），页 52-53。

¹⁴⁴¹ 姚紫手迹，姚紫《夜歌》，收录于目录前，无页数。

¹⁴⁴² 姚紫〈时间的旅路〉，姚紫《九月的风》，页 62-65，写于庚戌年（公历 1970 年）元旦。

¹⁴⁴³ 姚紫于 1947 年尾抵达新加坡，1955 年他曾在柔佛办《文艺报》及在宽柔任教，1958 年应聘至吉隆坡任《钟声报》总编辑，出版 10 期，1959 年又当海员，往返印尼和新加坡。除了这 5 年，姚紫至少在新加坡生活了 30 年（1947-1955，1960-1982），比他在中国生活的 27 年长久（1920-1947）。

¹⁴⁴⁴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6-29；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页 30-39。姚紫于 1977 年 5 月 31 日离开新明日报，之后没再从事出版工作。

文体的文艺书籍，姚紫被誉为‘带火者’，¹⁴⁴⁵是非常贴切的，姚紫对新加坡的认同与情感，也在这里表露无遗。

居留国的社会环境影响了姚紫的创作。他感谢新加坡，但他也要新加坡更好，在文章里直接或间接的，以历史典故反映新加坡的社会现象。他的国学根底深厚，擅写古诗词，收于在《郑梦周诗词集》的古诗中蕴含许多历史典故。¹⁴⁴⁶除了古诗词，他的杂文也有许多历史典故，从个人、社会、国家各个层面以古喻今或借古讽今，提出问题而又避免触犯现实的禁忌。¹⁴⁴⁷和如〈洛阳才子他乡老〉，借喻世代（当然也包括现代）庸才自私贪婪误国、俊彦报国无门的悲哀；¹⁴⁴⁸〈凤凰浪迹成凡鸟〉，比喻艺术人才在商业社会被当成赚钱工具。¹⁴⁴⁹他不单用东方的典故，也以西方国家西德的放纵的社会风气，立法使通奸、同性恋、鸡奸合法化的当代事件，对新加坡这东西方文化兼收并容的国家提出警戒。¹⁴⁵⁰他还有几篇文字直接谈到新加坡面对的问题，如人民的住屋需求，¹⁴⁵¹中四毕业生羡慕白领工作的思想偏差，¹⁴⁵²都是新加坡急需解决的问题。他更直言新加坡人对日本曾加诸新加坡更极端暴行的容忍，看似善良，其实是无能的别名。¹⁴⁵³

姚紫有几部著名的小说：《秀子姑娘》（1949 年发表）、《咖啡的诱惑》（1950 年至 1951 年发表）、《阎王沟》（1952 年发表）、《窝浪拉里》（1954 年发表）、《新加坡传奇》（1985 年出版）。¹⁴⁵⁴秀子姑娘以中日战争为写作背景，从一个中国人和日

¹⁴⁴⁵ 姚紫作为新马先驱编者与作者及对新马文坛的贡献，被誉为‘带火者’。‘带火者’也是姚紫一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由新加坡文艺出版社 1955 年出版。亦见黄叔麟〈姚紫与我〉，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08；列蒲〈我生平见过姚紫两次〉，《姚紫和研究专集》，页 120-122。

¹⁴⁴⁶ 郑梦周《郑梦周诗词集》（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姚紫遗产信托人编，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9）；郑梦周〈夜窗吟草〉，《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 1918-1978》（新加坡晋江会馆特刊出版委员会出版，1978），页 488-492。

¹⁴⁴⁷ 姚紫《短长书》（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姚紫遗产信托人编，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8）中多篇文章都以历史典故以古喻今或借古讽今。

¹⁴⁴⁸ 姚紫〈洛阳才子他乡老 - 江湖篇之一〉，姚紫《短长书》，页 59-61，写于 1975 年。

¹⁴⁴⁹ 姚紫〈凤凰浪迹成凡鸟 - 江湖篇之二〉，姚紫《短长书》，页 62-64，写于 1975 年。

¹⁴⁵⁰ 姚紫〈西德的挑战 - 通奸、同性恋、鸡奸合法化？〉，姚紫《短长书》，页 40。未注写作年份。

¹⁴⁵¹ 姚紫〈居不易哉〉，姚紫《短长书》，页 166，写于 1949 年；姚紫〈居不易哉〉，姚紫《短长书》页 178，写于 1953 年前后；姚紫〈住屋的喜剧〉，姚紫《新加坡传奇》（新加坡：陈龙玉出版，1985），页 13-22，姚紫〈我讨‘政府’的房子〉，姚紫《新加坡传奇》，页 23-26。后两篇皆未注明完稿日期。

¹⁴⁵² 姚紫〈男儿何者为英雄〉，姚紫《短长书》，页 19。未注写作年份。

¹⁴⁵³ 姚紫〈善良别名〉，姚紫《短长书》，页 182，写于 1953 年前后。

¹⁴⁵⁴ 姚紫《秀子姑娘》最早在 1949 年在南洋商报发表，后由新加坡南洋报社出版，见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页 78-79；《窝浪拉里》最早在 1954 年在《文艺报》发表，后于 1965 年由新加坡天马图书出版，见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36 及 75；《咖啡的诱惑》于 1950 至 1951 年在南洋商报发表，1951 年由南洋印刷社出版，见黄惠龄、王烨主编

本女子的感情纠葛带出各自的爱国立场；《咖啡的诱惑》以新加坡为背景，写了新加坡的都市风情，但还是称中国为祖国；《阎王沟》里的‘我’虽还是中国人，但却是帮助中国抗战的爱国华侨；《窝浪拉里》写在日本侵略的背景下一个中国人保护一个荷兰女子但最后被背叛的故事，因场景在印尼，对印尼的乡村生活、南洋风景有诸多描述。后三部小说都有融入南洋社会的意识。《新加坡传奇》是姚紫遗著，写作年份不详，但内容写的是一个‘峇峇’对新加坡社会的体会。在现实生活中他是第一代的离散华人，但在《新加坡传奇》中的‘我’是一个‘峇峇’，¹⁴⁵⁵把父亲在武吉巴嫂（Bukit Basoh）的房子卖掉后，因无了‘嫂’，成了光棍，便以‘武’为姓，‘吉巴兄’为名，自称为‘武吉巴兄’。他再这样解释他的名字：

“分析起来，姓是中国百家姓中的姓，‘吉巴’是中国式的名，底下那个‘兄’字也是中国式的称呼。但是把四字联唤起来，有点洋化又有点马来意味，这正适合我的‘峇峇’身份。”¹⁴⁵⁶

他的解释其实具有离散华人杂糅的身份。他并刻意以这样的身份来描述及反映新加坡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心态，包括贫富不均、屋荒、申请房子手续的不合理、¹⁴⁵⁷物价高涨的社会问题，¹⁴⁵⁸所谓团结华侨的公会、俱乐部、公馆，其实只是娱乐、赌博、甚至嫖娼的场所。¹⁴⁵⁹他特别反映了一般人金钱至上、学问无用的态度，甚至母亲为了钱要女儿成为女儿表哥的四姨太，¹⁴⁶⁰还有为了利益而甘戴绿帽以逢迎日本兵的老板。¹⁴⁶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怪现象也让他痛心：同班学生年龄差异大、课室简陋、课时量大、有后台的学生仗势欺人、一校之长趋炎附势。总结教育界里，“校长是经理，校董是头家，学生是顾客”，老师只是伙计，怎可得罪顾客。¹⁴⁶²

《姚紫文学历程》，页 62-63；《阎王沟》最早在 1952 年在南洋商报发表，1953 年由新加坡南洋商报社出版，见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27；姚紫《新加坡传奇》为姚紫遗产信托人 1985 年为他出版的遗著之一，出版人为陈龙玉。

¹⁴⁵⁵ 姚紫〈扒手拳下开传奇-新加坡传奇补一章〉，姚紫《新加坡传奇》，页 3-5。

¹⁴⁵⁶ 同上，页 5。

¹⁴⁵⁷ 姚紫〈住屋的喜剧〉，姚紫《新加坡传奇》，页 13-22；姚紫〈我讨‘政府’的房子〉，《新加坡传奇》，页 23-26；姚紫〈她走入猪圈里去了-新加坡传奇之七〉，《新加坡传奇》，页 64。

¹⁴⁵⁸ 姚紫〈学店辱命记-新加坡传奇之十〉，《新加坡传奇》，页 80。

¹⁴⁵⁹ 姚紫〈‘公馆’与‘菜头’-新加坡传奇之六〉，《新加坡传奇》，页 53-59。

¹⁴⁶⁰ 姚紫〈他有一个‘好’爸爸-新加坡传奇之五〉，《新加坡传奇》，页 47-52；姚紫〈她走入猪圈里去了-新加坡传奇之七〉，《新加坡传奇》，页 64。

¹⁴⁶¹ 姚紫〈戴绿头巾的英雄-新加坡传奇之八〉，《新加坡传奇》，页 66-71。

¹⁴⁶² 姚紫〈学店辱命记-新加坡传奇之十〉，《新加坡传奇》，页 80-89。

姚紫以一个离散华人的视角，将华侨比喻为〈番客牛〉，道尽华侨的心酸，他的用词用句肯定而有力。¹⁴⁶³他慨叹华侨是不断被挤奶的外来客，他们南来后不断汇款接济家乡的亲人，中国抗战时更通过会馆和社团向中国作政治捐款，还有不少南洋青年出力支持，甚至北归报国，南洋因此流失了不少人才和资金。华侨对于中国，只有经济价值，除了侨汇，回国探亲的华侨被继续压榨物资，有些被视为‘可能性的敌人’，不但带来资产阶级的毒素，还有可能是间谍，有被扣押的危险。另一方面，华侨在居留地的政治上，却是没有政治权力的番客，排华事件发生时，一纸驱逐令下，他们马上没有容身之地。华侨寄望中国到南洋护航的幻想，只能让他们更加失望。对于华侨和华人这两个词，他刻意指出它们的分别：华人不等同于华侨，华人的乡土观念也不等于爱国意识，更不是爱共产主义的中国。这也是他对作品中故国情郑重的澄清。他指出华人思想的转变，一方面是在居留国生存，以华人身份改变命运的必须选择，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绝望。这几年从中国返回新加坡的华人，都更加明白作为新加坡公民的喜悦，“决定死心塌地地生活在新加坡，为我们新生的国家效忠，直到老死。”

¹⁴⁶⁴ 这篇文章写于1973年末，‘番客牛’的历史已趋尾声，他呼吁：

“我们能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开国公民，参与这新生国家的创始工作及一切建国发展，应该从心酸的生活中感到喜慰，……我们也愿意怀着兴奋的心情，以全部的心力来耕耘它，以全部的血汗来浇灌它，使它成为我们终生的乐园！不但为了我们的孩子，也为了他们的子孙！”¹⁴⁶⁵

姚紫1982年的最后诗作〈华侨子弟在天涯〉中的两段对新加坡赞美及肯定：¹⁴⁶⁶

“华侨子弟落天涯，跃虎腾龙飞月槎
联合客观成大用，其中有国号新加

赤手奇功夸四海，华侨子弟满天涯
能忍辛茹惊世眼，金潮银涛钓鳌家”

可见新加坡对姚紫的意义。姚紫这离散华人，也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新加坡人。

¹⁴⁶³ 姚紫 〈番客牛〉，姚紫《短长书》，页104-121。

¹⁴⁶⁴ 同上，页113。

¹⁴⁶⁵ 同上，页121。此文写于1973年12月31日。

¹⁴⁶⁶ 刘笔农 〈三十年前伟丈夫 - 姚紫先生逝世半年祭〉，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94。

苗秀与赵戎

苗秀和赵戎将在这一节中一起讨论，因为他们不单是好朋友，他们的文艺思想接近，有相似的语言主张，也都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坚实支持者。他们都肯定侨民文艺的贡献，但认为侨民文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马华文艺应取而代之，为新马华人服务。

苗秀指出新马华人的生活，随着历史（时间）和环境（地域）的转移已经产生了变化，¹⁴⁶⁷作为多元种族的居留地，马华社会感染了马来、印度及英欧人的生活及艺术，与中国的社会生活方式有所不同，文艺自应有其特殊性。¹⁴⁶⁸ 其实赵戎在 1938 年提出的《泛论新启蒙运动》，比苗秀更早主张扬弃侨民意识，提倡马华文学地方性和独特性的主张。和苗秀一样，基于本地多元文化的特质，他认为马华新启蒙运动包括了各民族的及马华过去工作成果的综合，决不止限于‘华’了，而且不单是推进马华新文化，而是推进各民族的文化，更是建立国际新文化的运动。¹⁴⁶⁹

在语言的应用上，华族和其他种族相处，也受到了影响。苗秀和赵戎以新马社会素材为内容，以语言为工具，用华语加入他们故乡的方言、本地的俗语、马来语、印度语及英语，形成特殊的具有本地风味的作品。苗秀称这种语言为‘大众语’，指的是人民大众的语言，¹⁴⁷⁰ 赵戎称之为‘方言艺术’。¹⁴⁷¹ 赵戎还自言他大胆地彻底去运用方言，在《芭洋上》所收录的〈古老石山〉，是完全用方言写的，不只是用于对话上而已。

¹⁴⁷²

苗秀的‘大众语’和赵戎的‘方言艺术’，其实是一种杂糅的语言。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语言融合的现象早已存在。由于不同种族间的接触，语码混合（Code Mixing）和语码转换（Code Switching）成为普遍的沟通模式，语码混合指同一句子

¹⁴⁶⁷ 苗秀〈一九四七年的马华文艺概况〉，苗秀《文学与生活》（新加坡：星洲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印行，1967），页 2。

¹⁴⁶⁸ 同上。

¹⁴⁶⁹ 赵戎〈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赵戎研究专集》，页 205-206。

¹⁴⁷⁰ 苗秀〈写给一位青年的信〉，页 27-28。

¹⁴⁷¹ 赵戎〈苗秀论〉，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页 5。

¹⁴⁷² 赵戎《芭洋上》后记，（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页 94。

中不同語言的使用，而語碼轉換指不同的句子中語言的轉換。¹⁴⁷³ 不过也有学者不加区分語碼混合和語碼轉換，称这些杂糅语言现象为語碼轉換、語碼夹杂或語碼掺杂。¹⁴⁷⁴ 因为这杂糅的华语已经是語言的變體，¹⁴⁷⁵而形成語言變體的原因是社會環境。研究新加坡华语變動的學者指出：

“不同的社會環境會對語言的趨異傾向產生不同的影響。因為不自覺地遵照自己的文化、語言習慣，或者有意識地要維護自己的文化、語言習慣，在應用語言時便自然地出現變異。……所以，新加坡華語的趨異自然是难以避免的。”¹⁴⁷⁶

“華語雖然在全球各地的華人社區中保持着大致相似的核心面貌，但在不同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影響下，常常發展出形色各異的變體形式。”¹⁴⁷⁷

尚國文與趙守輝從社會方言（sociolects）的角度，把新加坡所使用的華語分為規範華語和大眾華語兩類。¹⁴⁷⁸ 規範華語指的是華文教材和官方媒體的新聞播報以及正式場合（如演講）所使用的華語，而大眾華語則是新加坡華族社群溝通時一般使用的口頭用語，因受多種接觸語言的影響、體現出較鮮明的本土華語特色。¹⁴⁷⁹ 研究新加坡話語的特色已經成為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這在苗秀和趙戎把方言土語寫在他們小說中的時候，應該是始料未及，只是單純的認為這樣的寫法更能凸顯人物特色、更好的配合社會場景和寫實的目的。殊不知他們的寫法是新加坡變異華語的先驅。

在內容上，苗秀在每一個年代都忠实地反映當時的社會現象。四十年代寫了新馬日治下的場景及對中國的救亡工作；五十年代寫了戰後人吃人的社會所造成的種種民生問題，其中也包括了教育界的寒心現象。五十至六十年代寫了不少上、中、下層婦女和

¹⁴⁷³ Sridhar, S. & Sridhar, K. The Syntax and Psycholinguistics of Bilingual Code-switching.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34, 1980, pp.407 - 416. DOI: 10.1037/h0081105. Accessed 23 May 2021; Eyamba G. Bokamba, Code-mixing, Language Variation and Linguistic Theory: Evidence from Bantu Languages. *Lingua* Vol 76, 1988, pp.21 - 62. Accessed 23 May 2021.

¹⁴⁷⁴ 尚國文、趙守輝〈華語規範化的標準與路向－以新加坡華語為例〉，《語言教學與研究》，2013 年第 3 期。

¹⁴⁷⁵ 同上。

¹⁴⁷⁶ 周清海〈新加坡華語變異概說〉，周清海《全球化環境下的華語文與華語文教學》（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 14。

¹⁴⁷⁷ 尚國文、趙守輝〈華語規範化的標準與路向－以新加坡華語為例〉，《語言教學與研究》，2013 年第 3 期。

¹⁴⁷⁸ 同上。

¹⁴⁷⁹ 尚國文、周清海〈新加坡華語的語音與流變〉，《國際漢語學報》第 7 卷第 1 輯（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學林出版社專題資料匯，2016），頁 215-226. Doi: 10.14095/b.cnki.jics.2016.01.021.

少女的问题。华校教育是当时华人所关注的，苗秀虽是一名英文教师，但他对华文的热情不亚于其他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老师。他的笔下有正面的、积极的教育工作者，但更多的是负面的人物——无能又贪污的校长，互相排挤的教师，以及退休老师的悲哀。他认为这现象和当时的制度，包括老师的待遇有关。

和苗秀相似，赵戎通过对不同的人物——知识份子以及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描绘，反映了新马的社会现实和时代历史。其中有日治下残暴的日本军人，有正面和负面的底层人物；有前进的和消极的知识份子，也有教育界的败类；有残而不废、帮助其他妇女的女子，还有代表海外华人辛苦了一辈子最后仍一贫如洗的老人。¹⁴⁸⁰ 苗秀和赵戎在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和反面人物的同时，表达了他们的理想和愿望以及对新马新社会的期待。

固然南洋色彩不止于景物的描绘，在讲述新加坡的故事时，苗秀和赵戎无可避免的把许多新加坡的地标和风景纳入，增添了本地色彩。¹⁴⁸¹ 人本主义地理学学者段义孚（Yi-Fu Tuan）指出即使是平常的地方，当人和它有了某种接触和体验，它就会对那人产生特别不同的意义。¹⁴⁸² 一般的景物尚且如此，当作者把地方性的地标和风景纳入作品中，更能增加地域感。除了景物外，苗秀和赵戎也常常有意识地提醒读者新马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特色。苗秀的小说里有马来站长、印度人转辙手¹⁴⁸³和辜加兵，¹⁴⁸⁴赵戎的小说里除了有马来和印度族同胞，还有峇峇和娘惹。¹⁴⁸⁵ 峇峇和娘惹虽也是华裔，但因为他们是南洋土生土长的华裔，对他们的描写也增进了新马多元文化的风味。

苗秀和赵戎都不否定侨民文艺的历史价值，但侨民文艺应该转变为马华文艺，为此地服务。苗秀主张新加坡的文艺创作必须配合建国事业，培养国民的国家的意识和

¹⁴⁸⁰ 见赵戎《在马六甲海峡》（新加坡：青年书局，1961）；赵戎《海恋》（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赵戎《芭洋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赵戎《赵戎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

¹⁴⁸¹ 如苗秀《火浪》（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2004），赵戎《在马六甲海峡》（新加坡：青年书局，1961）。

¹⁴⁸²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¹⁴⁸³ 苗秀〈在途上〉《苗秀小说选》，页173。

¹⁴⁸⁴ 苗秀〈青春素〉《苗秀小说选》，页184。

¹⁴⁸⁵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页1、79、97-98。

爱国思想，¹⁴⁸⁶ 赵戎也建议实践爱国主义文学以建立新加坡国家意识，¹⁴⁸⁷ 并明确地说出了对新加坡的爱和归属感。¹⁴⁸⁸ 从侨民文艺到马华文艺，正如华侨转换为当地人一般，是自然的发展，他们的居留地已经是他们永久的家乡。¹⁴⁸⁹

第三节： 华人性中的中国性

游俊豪教授提出中国性和华人性有分割也有重叠，是一直在不断地建构和重构的概念，而且华人性包含中国性。笔者也认为华人性应该包括中国内外的中国性和华人特性。这并非以量化比较中国性与华人性，而是中国以外的华人在异地与当地种族和文化交融之后，无可避免的与传统的中国性不尽相同。此外，土生华人的华人性又是在华人性里的另一种表述。

王赓武认为中国性/华人性受地域的影响，他虽然认为中国性/华人性不能量化，但也认为华人性的多寡不是绝对的。¹⁴⁹⁰ Ien Ang 的早年背景不让她多接触华族文化，她甚至对自己的华裔身份有所排斥和恐惧，但出生在中国饱受中国文化浸濡，或在本地出生但热爱中华文化与语文的华文作家，又完全不同。本论文中所论述的七位华文作家，则是呈现了丰厚的中国性和华人性，或更多的是华人性中的中国性。虽然华文不是新加坡的主导语文，但仍有一席之地。他们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观察本地的需要，开展在新加坡的文化工作，并说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思想和视野再不局限于中国。

¹⁴⁸⁶ 苗秀〈建国时期的文艺方向〉，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 121-123。写于 1978 年 8 月。

¹⁴⁸⁷ 赵戎〈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第五章〈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赵戎《赵戎文艺论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页 66-84。〈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完稿于 1969 年，见页 84。

¹⁴⁸⁸ 赵戎〈泛论当前我国文学运动〉第五章〈爱国主义与文学运动〉，赵戎《赵戎文艺论文集》，页 67-69。

¹⁴⁸⁹ 赵戎〈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刘笔农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04。

¹⁴⁹⁰ Wang Gungwu,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p.182-199.

李星可

李星可的创作和社论，都直接或间接的积极表示了对新加坡的关切。他的社论主要课题包括教育、政治、治国、经济、民生和文化。这些评论文章，代表了他对新加坡的观点，也说明了他对新加坡发展的期待。

在他的社论里，他讨论了许多教育课题，有些观点他始终坚持，有些他愿意作出调整。对于强制性的母语小学教育，他不妥协，因为母语小学教育是华文学习奠定牢固的根基。对于上课天数，在 1962 至 1963 年初他反对将各源流学校统一缩短至每周一至周五上课五个半天，他主张五个全天制，在无可奈何之下，退而求其次的五个半天加星期六的半天上课。¹⁴⁹¹1965 年他也对在四二制下的华校高中面对以华语授课时间减少的问题提出质疑。¹⁴⁹²他坚持母语教育，但也支持双语教育，¹⁴⁹³主张改进英校华文教学、把各源流中小学校的第二语文列为必修科及各级会考的必考科，更肯定李光耀在 1966 年 9 月的建议在华校中，数理用英文，在英校中，史地用华文，因为这些举措都能增加华文学习的质量，双语教育才能保障文化传统不致丧失。他不断为华教争取最大的权益，也权衡得失，不惜在底线之上调整要求，在在表达了他对华文教育做出的努力与爱护。¹⁴⁹⁴

在高等教育的课题中他提出有关南大的问题最多。¹⁴⁹⁵他支持和维护南大，但也鼓励星大和南大合作，打开门户，收取不同源流的学生，而且建议在大学课程中加强本地土语方言（即母语）的学习以便与地方人民大众沟通。¹⁴⁹⁶这些意见说明了他了解本地情况，并愿意适应本地需要。

在政治课题上，李星可综合了新马在历史、地理、政治、社会、人种、经济上合并的基础，支持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并意识到合并将会产生如种族和谐、公民权利、商

¹⁴⁹¹ 李星可《政论选集》中的 11 篇：123、124、135、137、143、144、145、146、148、154、160，都直接评论华校的上课天数。

¹⁴⁹²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页 6-8。

¹⁴⁹³ 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7、57、58。

¹⁴⁹⁴ 同上，篇 47、57、58。

¹⁴⁹⁵ 直接或间接有关南大的文章，占《政论选集》60 篇有关教育与语文课题中的 15 篇，占《政论新集》35 篇有关教育与语文课题中的 8 篇，《政论近集》17 篇有关教育与语文课题中的 4 篇。

¹⁴⁹⁶ 有关星大与南大合作的社论，见《政论选集》篇 94、103，《政论新集》篇 68，《政论近集》篇 81。有关大学生学习方言土语，见《政论选集》篇 94。

业法则、教育政策、语言使用等问题，建议政府与人民对话。他也对新加坡的独立有信心。在新马合并后又分家之后，再来看他的建议和对新加坡的信心，显示了他对时局了解的深度与广度。

除了在政治的高度上看新加坡的前途，李星可也和不同阶层的人民在一起，仔细了解民生的问题。他努力为无姓名的出生证持有者请命，并从银行的汇率，到柴米油盐，都以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他们争取最大的利益。他的细致和认真，如建议将酱油的咸度（质）一盒火柴的数量（量）都加以计算，以确定物价制定的标准；¹⁴⁹⁷他为了反对银行加息，对英国、加拿大、日本、瑞典、美国、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瑞士与西德的银行利率一一列出，与新加坡的高利率对比。¹⁴⁹⁸李星可以他的方式，既强悍争取，又细腻透析，如非用心对本地深入了解，不能写出这些情理兼具的文章。

李星可热爱中国文化，他热衷于中国戏曲，并以戏曲演出为南大筹款；在文艺创作上，他的作品以戏剧为主，剧本以本地取材，如〈报穷〉和〈月饼〉，都是以戏剧的形式，描绘中英文教育者价值观的差异及英文教育的经济价值；¹⁴⁹⁹广播剧本〈桥上〉，和独幕剧〈大众顾问〉，以不同阶层的人物，写南洋生活的见闻和感受。作为海外华人，他主张‘民族形式，地方内容’，因此在《桥上》这集子里，他收录了译诗〈母亲〉，仿河南坠子〈借沙笼〉，仿北京对口相声〈生财之道〉。他希望以不同的形式，抛砖引玉，让南洋的文艺工作者考虑创造新的文艺道路。

然而他的剧本除了〈独立桥〉外，没有其他的剧本上演。¹⁵⁰⁰他认为这是文艺界的怪现象，影响了文艺的发展。¹⁵⁰¹因此积极提出有计划出版各语文创作的具体建议。¹⁵⁰²他的建议包括不只是华文的出版事业，而是各语文源流。在当时的语文环境下，单单只为出版华文书籍争取是无效的，而且李星可还认为当时的华巫印英四大语文源流没有交流的

¹⁴⁹⁷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20。

¹⁴⁹⁸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50。

¹⁴⁹⁹ 李星可〈报穷〉《报穷》（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页 37-101；李星可〈月饼〉《报穷》（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页 21-35。

¹⁵⁰⁰ 李星可〈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自言“十年以来，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式：长的，短的；现实的，超现实的；舞台剧、广播剧、哑剧、电影剧；洋式的，或者中国式的民谣与相声……大小，已经发表的大约二十余种。可是，没有人上演。”《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94-95。

¹⁵⁰¹ 李星可〈快艇〉、〈钓金龟〉，皆收于《快艇》；〈绿洲〉收于《绿洲》。

¹⁵⁰²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4；《政论选集》篇 8、12。

现象亟待纠正。除了华人团结外，在更大的层面上他主张‘华巫团结’、‘全民大团结’，因为这样才能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¹⁵⁰³这不但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他在考量了当时环境后所做的建议。

在维护母族文化的同时，李星可也多次鼓励各源流文化的交流。¹⁵⁰⁴他自己是‘移种的花朵’但认为‘移种的花朵’也能在本地生根。¹⁵⁰⁵他鼓励新加坡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以中国价值观中的仁、义等华族传统节操为建立新社会的目标，¹⁵⁰⁶使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新的地域有了新的意义。

连士升

连士升和李星可同样以写社论著称，同样以新加坡的立场与利益为出发点，为人民的喉舌。在文艺作品中，李星可擅长戏剧，而连士升的散文见于他的书简、日记、杂记、游记和名人传记中。他们虽都是‘移种的花朵’，但都将他们积累的学识和能力，观察和分析居留国和国际局势，引导凡接触他们文字的读者。他们视野的广度，延伸到了中国之外。

和李星可一样，在语文的课题上，连士升重视母语教育，认为应该先精通母语，才治外国语。学好了母语，再学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种语文都不是难事。而且文字的功用在于表情达意。不单作为工具，内容更重要。¹⁵⁰⁷他更驳斥了欧美因为中国语言不统一，文字难学而应学英文的谬论。¹⁵⁰⁸他也了解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需要，新马华人学习华文之后，还应当学习英文及马来文。努力学习当地语文是与其他种族沟通的渠道，种族间互相了解才能和睦相处，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促进国家的繁荣。¹⁵⁰⁹对于英文的学习，他的看法与李星可不谋而合，他也认为在学习中文之余，应多注重英文，

¹⁵⁰³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185。

¹⁵⁰⁴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15。

¹⁵⁰⁵ 同上。

¹⁵⁰⁶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39、47。

¹⁵⁰⁷ 连士升〈梦里难忘的母语〉，《连士升文集第二卷－闲人杂记》，页197-198，虽未注写作日期，但根据内容引述，应写于1956年。

¹⁵⁰⁸ 连士升《秋水集－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七集》，页17-20，写于1968年10月22日。

¹⁵⁰⁹ 连士升〈建立共同生活〉，《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1-13，写于1960年1月4日。

而且要提高华校的英文水平，师资、设备和教学法是关键。¹⁵¹⁰在华人群中，他也重视与华侨的子女－侨生的交流。他称他们为峇峇，因为所受的教育不同，导致思想和行为上的差异，容易产生误会。¹⁵¹¹他认为要协助沟通华侨与侨生，必须普及华校，充实华文和历史的教材，同时也要加强华校的英文教学。文字的功用在于表情达意。不单作为工具，内容更重要。¹⁵¹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的中心思想。¹⁵¹³他引用了中外名人学者如《中国文化人类学》的作者、¹⁵¹⁴罗马教皇、泰戈尔、¹⁵¹⁵英国史学兼文学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和马皋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的实例以说明他的看法。¹⁵¹⁶

与李星可的看法一致，连士升支持南洋大学，并曾受委为魏雅聆的七人检讨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审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南洋大学改组的建议。他主张南洋大学应偏重中文，就如马来亚大学偏重英文一样，而两类大学通过教授和学生的交换，介绍及翻译中英典籍，中英文化将融会贯通，形成道地的马来亚文化，进而开花结果，立足于世界。他鼓励南洋文化和教育的斗士，任重道远，勿因环境的恶劣而退缩。¹⁵¹⁷他也呼吁新加坡大学与外国著名大学进行学术合作，巩固其地位，¹⁵¹⁸扩展新大中文系，聘请中英兼通、广孚众望的著名学者当系主任，以及教授中国哲学、史学和文学各部门的讲师，并进一步发展为东南亚的学术中心。¹⁵¹⁹他更建议新加坡大学发展一所东方语文学院，

¹⁵¹⁰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孤鹜集》，页170-172，写于1965年3月24日；连士升〈提高华校的英文水准〉，《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80-182，写于1963年12月19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四》，页372，写于1962年10月30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四》，页379-381，写于1962年11月20日。

¹⁵¹¹ 连士升〈华侨与侨生〉，《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83-87，写于1951年11月18日。

¹⁵¹² 连士升〈梦里难忘的母语〉，《连士升文集第二卷－闲人杂记》，页197-198，虽未注写作日期，但根据内容引述，应写于1956年。

¹⁵¹³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二》，页111-112，写于1958年12月28日。

¹⁵¹⁴ 连士升《秋水集－连士升文集典藏版：海滨寄简第七集》，页17-20，写于1968年10月22日。此篇为致《中国文化人类学》的作者，但未注其姓名。

¹⁵¹⁵ 连士升〈注重母语和普及教育〉，《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76-179，写于1963年10月10日。

¹⁵¹⁶ 连士升〈怎样提高华校的语文程度〉，《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83-186，写于1964年4月16日。

¹⁵¹⁷ 连士升〈华侨的文化与教育〉，《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05-108，写于1950年9月19日。

¹⁵¹⁸ 连士升〈庆祝新加坡大学的诞生〉，《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69-172，写于1961年12月31日。

¹⁵¹⁹ 连士升〈正在扩展中的新大中文系〉，《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73-175，写于1962年7月1日。

广招著名学者教导中文、巫文、印文、日文、阿拉伯文。¹⁵²⁰他指出翻译是促进文化交流的必要渠道，因语言随时间而变动，前人的译作还需重新翻译才会被读者接受。因此需要政府与社会的鼓励、学人的慎重从事和出版机构的积极推销，本地的翻译工作才能有果效。¹⁵²¹连士升对语文学习及教育课题的见解和建议，除了基于他学识的深度、对中文的热爱、对新加坡人文环境与地理优势的掌握，他在欧洲的数月漫游和采访，离开中国后又回去采访两月，加上新加坡给予他易于接触世界各地的信息的优良环境，促成了他广阔并具前瞻性的视野，使他在了解中国的基础上，更能以离散华人的角度，纵观中外，审时度势，提出诸多具有建设性的观点。

虽然连士升热爱中国，他也认同新加坡。1954 年他送大女儿侨思回北京念书的原因包括对北京学习环境的肯定和对故国的期许。¹⁵²²他爱他的故乡有如爱他慈祥和蔼的母亲，常常在回忆中慢慢咀嚼甜蜜的滋味。¹⁵²³对于新加坡，他为能成为新加坡公民感到荣幸，因为这里种族和谐、信仰自由、用人唯才、公平竞争，并期待国人把新加坡的历史推进一步。¹⁵²⁴他自己不但在语文和教育课题上以社会和文化的高度加以敦促和引导，也在政治和经济课题上以新加坡的立场讨论和建议。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他建议〈开展多元的外交〉，支持小国走中立路线；¹⁵²⁵东南亚小国必须合作，多任用本地人才；¹⁵²⁶选贤与能，肯定外来人才对居留国的贡献；¹⁵²⁷在经济上开源节流，收支平衡。¹⁵²⁸为了防范英军撤退后日本的经济入侵，连士升的对策是知己知彼，加强日本问

¹⁵²⁰ 连士升〈庆祝新加坡大学的诞生〉，《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69-172。

¹⁵²¹ 连士升〈重视翻译工作〉，《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216-219，写于 1967 年 3 月 16 日。

¹⁵²²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二》，页 136，写于 1959 年 4 月 14 日。连士升认为北京是道地的中国文化中心，北京学术艺术的造诣是‘尽美至善’。同卷另一篇则说北京可爱的地方太多，主要得力于气候、历史、山水、人情。页 103，写于 1958 年 8 月六日。

¹⁵²³ 连士升〈可爱的故乡〉，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8。

¹⁵²⁴ 连士升〈新加坡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46-149，写于 1969 年 2 月 7 日。

¹⁵²⁵ 连士升〈展开多元的外交〉，《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08-111，写于 1968 年 7 月 2 日。

¹⁵²⁶ 连士升〈同舟共济，自力更生〉，《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16-119，写于 1968 年 2 月 15 日。

¹⁵²⁷ 连士升〈人民不再是奴才〉，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闲人杂记》，页 111-112，写于 1955 年 8 月 4 日；连士升〈吸取外资与尊重客卿〉，《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51-154，写于 1969 年 8 月 19 日。

¹⁵²⁸ 连士升〈世界经济展望〉，《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47-150，写于 1969 年 2 月 20 日；连士升〈停止黄金抢购的治本方法〉，《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43-145，写于 1968 年 3 月 19 日。

题的研究。¹⁵²⁹同是报人的李星可谈了许多和英军撤退有关的问题，分析了英美的情况，建议新加坡政治中立、内部民主、自由经济，¹⁵³⁰与连士升殊途同归。

在新加坡的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连士升的评论都以新加坡人的立场，或于肯定，或于建议。周恩来于 1955 年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连士升不但支持，还鼓励国人建设新社会，效忠居留国。¹⁵³¹1959 年新加坡自治邦后，连士升于 1960 年初就已开始呼吁外来人士做一个严肃的选择，成为公民或继续为侨民。选择成为公民者必须对国家不二的效忠，除母语外努力学习当地语文，及与其他居民和衷共济，促使社会安定、国家繁荣。¹⁵³²新加坡独立之后，他不但肯定了新加坡的成绩，更对新加坡这新兴国充满了期待，在个人、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艺术各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协助新兴国更上一层楼。¹⁵³³

他往往把中国和南洋，特别是中国和新加坡放在一起思考，从 1942 年到 1960 年他以多篇文章一再强调南洋研究及了解华侨问题的重要性，可见作为一个华人，他对中国和南洋关系的重视。¹⁵³⁴他强调外来人才，特别是中国来的移民对他们居留国的贡献，列举了对新加坡、槟城、印尼、菲律宾、越南、婆罗洲有极大贡献的名人，建议对他们的贡献予以肯定，赋予他们选举和被选举权。¹⁵³⁵在他的文字中，更不乏对国与国之间、各种族之间、国内各源流文化之间、国内外的文化之间，需要沟通、合作、交流

¹⁵²⁹ 连士升〈加强日本问题的研究〉，《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12-115，写于 1969 年 12 月 23 日。

¹⁵³⁰ 李星可《政论近集》篇 2、33、34、36、61、62、65、79、84；《政论新集》篇 77。

¹⁵³¹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页 73-75，写于 1958 年 1 月 9 日。

¹⁵³² 连士升〈建立共同生活〉，《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1-13，写于 1960 年 1 月 4 日。

¹⁵³³ 连士升〈新加坡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46-149，写于 1969 年 2 月 7 日。

¹⁵³⁴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四卷－海滨寄简一》，页 80-83，写于 1958 年 1 月 18 及 19 日；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南行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页 502-507，写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连士升〈南洋大学与南洋文化〉，《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60-62，写于 1956 年 11 月 10 日，然而未清楚说明南洋研究室是否附属南洋大学；连亮思、连文思编选《连士升文选》，页 171-173，写于 1959 年 9 月 7 日。此篇也收于《天宝集》。连士升〈南洋文人的使命〉，《慧眼近观－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95-198，写于 1960 年 4 月 18 日；连士升〈序〉，李星可《南洋与中国戏》，页 1-6，写于 1962 年 3 月 22 日。罗喷戏在柬埔寨、泰国、印尼、马来亚都有。参李星可〈什么是‘罽’？〉，《南洋与中国戏》，页 179。

¹⁵³⁵ 连士升〈人民不再是奴才〉，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二卷－闲人杂记》，页 111-112，写于 1955 年 8 月 4 日。

的提醒与鼓励。对新加坡的华人，他还提出应减少对血缘和乡缘依赖，通过以母语为学校的媒介语，使各帮派消除隔阂，都成为新国家的公民。¹⁵³⁶

和衷共济、世界和平是连士升的理想。要达成这理想不是一个国家或某些国家能够完成的。他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能组织所有国家，检讨各自的历史教科书，重视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史，并发扬世界级的宗教家、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成就与贡献，使青少年早日养成爱护祖国、尊重他国的健全心理。只有在了解自己，理解他人的基础上，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世界各国才能和平共存。¹⁵³⁷连士升宏观的视野，融合了对世界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认识，是离散华人立足本土，放眼天下后的成绩。

杏影

当王赓武肯定地域影响观点与思维时，他也强调无论华人身在何处，中国辉煌过去依旧缠绕在第一代多数海外华人的想象中。‘Chineseness’存在于受过一定教育的第一代海外华人身上。¹⁵³⁸不单是中国辉煌的历史一直是中国人的骄傲，中国文化习俗也一直在影响着华人，包括海外离散华人。新华作家之一杏影自认：

“生在中国，和最初吃下去的是中国的东西，这事实便决定了人的好恶。其实，若把直到现在为止的自己的生命时间，计算一下，在中国过活的日子，不过三分之一左右，可是在潜意识里的所好，究竟还是中国的那一套。从待人接物，以及日常生活的习惯作风，或甚至于是连写文章，不时也就会从那‘起承转合’的文章法则开始。‘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在我的生命行程上，我所寄寓的旅栈原是在叫做中国的那块土地。先入为主，在思想方面如此，在吃的方面亦然。”

¹⁵³⁹

¹⁵³⁶ 连士升著，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五卷 - 落霞集》，页 71-73，写于 1964 年 8 月 8 日。

¹⁵³⁷ 连士升〈中小学历史须重新检讨〉，《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页 194-197，写于 1969 年 9 月 25 日。

¹⁵³⁸ Wang Gungwu, 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Wang Ling-Chi &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 Selected Essays Vol.1*,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14.

¹⁵³⁹ 杏影〈新年怀思〉，《书与人》（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12。

杏影在饮食、思想上以中国先入为主，但他推动新加坡文艺和爱护后进的精神，他对新加坡社会能对各种族文化兼收并容的肯定，他的视野所展示的对人类的关切，对世界和平的热爱，已不单是中国性的表现了。

杏影出生于中国，在中国上初中，但在其他地方 - 日本、印度、新加坡都有长时间居留的经历，还曾在日本受过高中和大学教育，精通中、英、日文。他的〈读书偶译〉，¹⁵⁴⁰里翻译了多过 250 个不同的外国文艺工作者、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改革主义者的文字，并在他的许多其他篇章中引用他们的名言或讲述他们的作品和思想。¹⁵⁴¹在翻译这些名人名言的时候，杏影也得到了他们的潜移默化。¹⁵⁴²他的阅历之广，语言的优势、对多国与多元文艺、不同的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参照，都成就了他世界性的视野。他的华人性里展现的是对世界大同的向往。¹⁵⁴³

反对战争，歌颂和平是杏影散文的主题之一。他举出宗教及人权领袖、科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话语来说明他的看法。他同意牧师及人权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将战争比喻为瘟疫，因为战争破坏了家庭、毁坏了宗教、破碎了国家。¹⁵⁴⁴他也同意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所说的，国家主义其实是‘小儿科’，是人类害着的麻疹，¹⁵⁴⁵为防止科学变成杀人武器的奴隶，世界上所有国家应克服疆域的障碍，和平共存。¹⁵⁴⁶

理性的科学可以成为国家间的桥梁，感性的音乐更可以做到无国界的融合。杏影欣赏莫扎特（Mozart），因为他是“在大音乐家里面，最具有世界性的，最没有‘国家’或‘民族’色彩的作曲家”，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他属于全人类。虽然莫扎特有沉痛的调子，但他整体的音乐特色是阳光，他肯定了“生命即令不是太阳，它

¹⁵⁴⁰ 杏影〈读书偶译〉，杏影《想想写写》（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页 117-282。

¹⁵⁴¹ 在杏影〈读书偶译〉中，共有 250 个注上名字的名人名言，另外有 38 位佚名的名言。其他还有圣经、阿拉伯、印度、德国、伊索寓言的翻译。在其他著作里也常引用外国名人名言。

¹⁵⁴² 杏影《想想写写》后记，页 283。

¹⁵⁴³ 杏影〈读书偶译〉，杏影《想想写写》，页 125-126。

¹⁵⁴⁴ 同上，页 159。

¹⁵⁴⁵ 同上，页 243。

¹⁵⁴⁶ 同上，页 277。杏影注此出自爱因斯坦《晚年随笔录》。

也是‘有月光的夜晚’，是‘名贵的画图’。他相信他的乐章‘有一天是会给自由的快乐的人们唱的。’”¹⁵⁴⁷

音乐这没有国界的世界语言，能创造一个充满爱的大同世界。杏影爱听赞美诗，在印度的时候他常去教堂，不是去听教，而是听信徒们的合唱。他看到素昧平生的人一起站起来颂唱一首首向善的歌，‘那光景是和谐美丽的’。在那合唱的时刻，他看到了人类的善良，看到了‘人应该有的一种社会’；在那和谐的歌声里，他相信人类有一颗会哭的良心，要去实现真正的宗教精神，那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爱。¹⁵⁴⁸

莫扎特要为自由的快乐的人们奏乐，而爱因斯坦要以科学为人类造福、克服国界的壁垒，消除武器和战争，组织一个世界政府，天下一家。通过音乐和科学造福人群，是莫扎特和爱因斯坦的期望，也是杏影的心愿。¹⁵⁴⁹此外，杏影也佩服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氢气弹发明之前，就想象出第三世界大战结束百多年后的未来世界，作为对人类的提醒。赫胥黎描述第三世界大战后，因为放射作用，人畜草木都无法生存，直到百多年后，幸存的人们才战战兢兢地寻求新大陆。¹⁵⁵⁰写了一部世界史纲的历史学者兼作家威尔斯（H. G. Wells）赞美人类建设了文明，但更害怕人类会自己建设的文明毁灭自己。因此他呼吁人类和谐团结，创造人类的大同世界。¹⁵⁵¹他再引用了美国哲学家和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话：“The triumph of culture is to overpower nationality”。他把 culture 译为文明，强调文明的力量在于克服民族间的隔阂、国与国之间的壁垒。¹⁵⁵²文明是让人类享受的，“所谓文明也就可以说是‘享受’”，人类建设了文明，也享受文明，但文明却把“人类带进了一个要毁灭它自己的原子武器的竞争时代了。”¹⁵⁵³战争能摧毁文明，战争和文明是不能同时存在的。

¹⁵⁴⁷ 杏影〈莫扎特〉，杏影《书与人》，页 212-215。‘名贵的画图’为原文。

¹⁵⁴⁸ 杏影〈新年怀思〉，刘笔农《杏影散文选》，页 13。

¹⁵⁴⁹ 杏影〈爱因斯坦先生〉，杏影《愚人的世纪》，页 152-156。

¹⁵⁵⁰ 杏影〈补白杂记〉，杏影《想想写写》，页 80-81。

¹⁵⁵¹ 杏影〈威尔斯的关怀〉，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143-144。

¹⁵⁵² 同上，页 144。

¹⁵⁵³ 杏影〈文明断想〉，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84-85。

杏影往往利用对立的两面阐明他的观点。战争和文明是对立的、矛盾的，但真正文明的人类会放弃战争，而没有战争，人类会更文明。国家观念像是民族该有的，但歌德说，但如果民族能超越国家观念，便能够感受他邦人民的悲与喜，民族间将不再彼此仇视。¹⁵⁵⁴ 杏影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往往从矛盾的事物中寻求和谐，化解矛盾，指引方向。再比如石头和生命，对于一般人而言，前者是死的，后者是活的。然而石头是永恒的，人的生命却有限；有限的生命结束后经过亿万年，骨灰化为尘土重新凝结变成石头。因此‘我’就是石头，石头就是‘我’。但有时‘我’还不如石头，因为‘我’会为了毫无道理的事情而打闹、嫉妒、贪馋，最终又还原到石头里去，而石头永远屹立，沉默地看着生命愚蠢地喧闹、斗争，沉默地记录历史，见证人类历史的更替。原本生命有理性，生命被创造的目的与石头不同，然而石头经过高热，能化为熔岩，烧尽阻挠它发挥的一切；与石头相比，有理性的人类，却能固执的抗拒理性。杏影以石头与生命的对比，讽刺人类的愚蠢，抨击人类互相争斗的冥顽不灵。¹⁵⁵⁵ 人类互相争斗只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历史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强权就是公理，但林肯说：我们要把这句话翻转过来，我们要说：公理就是强权。¹⁵⁵⁶

作为一个曾生活在中国、日本、印度和新加坡的离散华人，对中文、日文及英文的语文及文化有深度的认识，也经历不同年代、政治和社会变革，杏影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他以历史、哲学、科学、音乐为内容，以正面的、反面的说明，以直接的、对立的方式，阐述他华人性中世界大同的理想。

李汝琳

饮水思源的美德在李汝琳的文章中时时闪烁。他感激先辈对他的恩情，¹⁵⁵⁷ 初中、高中、大学老师对他的指导，贡献和对他的影响。对于这些恩师，他都不直呼名字，而尊称

¹⁵⁵⁴ 杏影《想想写写》，页 153。

¹⁵⁵⁵ 杏影〈我看石头〉，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页 99-103。

¹⁵⁵⁶ 杏影〈读书偶译〉，杏影《想想写写》，页 176。

¹⁵⁵⁷ 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李汝琳创作集》，页 287。

为先生。¹⁵⁵⁸他对故友及对他有恩的人都铭记于心，表彰以文。¹⁵⁵⁹他热爱中国文学，不遗余力推动新马中文书籍的出版，发扬马华文艺，对所有严肃的新马华作家，不论相识与否，都敬爱他们，对他们都有亲切感。¹⁵⁶⁰为了出版共计 54 本的三套丛书 - 《南方文丛》、《新马文艺丛书》及《新马戏剧丛书》，他不为名利，却用尽精力与眼力，单单《新马文艺丛书》就看了约四百万字。这些传统的华人美德，通过他的出版工作，实践于他的新的家乡。

这三套丛书收集了本论文的六位作家 - 李星可、连士升、杏影，苗秀、赵戎和李汝琳自己，以及其他许多新马作家的作品。《南方文丛》包括了散文集连士升的《名山胜水》¹⁵⁶¹ 和《春树集》¹⁵⁶²，杏影的《书与人》和《愚人的世纪》；长篇小说苗秀的《火浪》、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韦晕的《浅滩》、林参天的《浓烟》与《热瘴》、李汝琳的《漩涡》和李星可翻译韩素音的《青山不老》上下集，再加上一本戏剧集 - 李星可的多幕剧集《快艇》。《南方文丛》的出版目的是协助长篇和大型的书籍出版。当时长篇出版写得少，因为即使写了也少有机会出版，因此他希望由于《南方文丛》的出版，能鼓励长篇的写作。¹⁵⁶³

在这些作品里，可见到这些作家的文化背景以及在融合了不同地域生活的体验后的华人视角。李汝琳、杏影、连士升、李星可都有除了在新马、中国外，居住在其他国家的体验，他们以离散华人的视角，表达对异地他族的观点。以李汝琳和杏影为例，他们都因工作的关系，曾在印度居留多年，对印度的风土民情有诸多的体会。《南方文丛》之一，杏影的《书与人》散文集中的〈印都杂记〉不但描绘了印度的新旧德里、历史、古迹、帝皇、宗教、建筑艺术、生物（雀鸟、虫豸、蝗虫、苍蝇）、各季节的气候、风沙等等，且常与中国人、中国的文化和生活相比。¹⁵⁶⁴ 杏影的〈印度麻雀〉还微妙

¹⁵⁵⁸ 李汝琳 〈我的文学老师〉，《李汝琳创作集》，页 253-261；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0；黎丰 〈作家师生情〉，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169-170。

¹⁵⁵⁹ 李汝琳 〈回忆丘絮絮〉，《李汝琳创作集》，页 267-276；李汝琳 〈回忆连士升〉，《李汝琳创作集》，页 277-284。

¹⁵⁶⁰ 李汝琳 〈一套丛书的诞生〉，骆明编选《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77。

¹⁵⁶¹ 1959 年 8 月初版的《名山胜水》包括《祖国纪行》以及连士升文集第一卷中的 4 本游记 - 《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印度洋舟中》。

¹⁵⁶² 《春树集》包括〈自序〉、〈春到人间〉、〈大学生的使命〉、〈艺术与人生〉、〈忠与恕〉、〈我理想中的记者〉。

¹⁵⁶³ 李汝琳 〈关于《南方文丛》〉，《李汝琳创作集》，页 300-305。

¹⁵⁶⁴ 杏影 〈印都杂记〉，《书与人》，页 16-30。

的表达了在和宽遇动物虫鸟的印度人接触后，对什么都爱吃、什么都能做成美味佳肴的中国人之一，也受到了感化，善待别的生物，以致“觉得自己比在中国的时候要好多。”¹⁵⁶⁵。李汝琳的《漩涡》写的是 1946、1947 年有关印度华人的社会与生活，特别是以文化界、教育界的情况为背景的小说。他说明有些场景与马来亚华人社会，特别是华校中的情况类似。¹⁵⁶⁶他也把新加坡写进《漩涡》里，称赞新加坡华文报章的水准是海外华文报章中的鳌头。¹⁵⁶⁷《南方文丛》包括了本地出生的作家苗秀的《火浪》与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他们以本地华人的身份，表达了对中国和新加坡并行不悖的情感。

《南方文丛》的出版目的是协助和鼓励新加坡作者出版长篇和大型的书籍。¹⁵⁶⁸《新马文艺丛书》共三集，每集 12 本，出版的目的是和《南方文丛》相似，除了不让作品流失，还希望鼓励新马写作人努力创作，培养新作者继承并发展马华文艺。¹⁵⁶⁹《新马文艺丛书》反映了新马在不同时段的历史－华人南渡、日据前后、殖民统治及自治初期，不同种族、阶层、职业的人民的的生活。¹⁵⁷⁰除了包括了本研究中的五位新华作家作品－李星可的戏剧《报穷》及翻译韩素音的长篇小说《餐风饮露（上）》、杏影的散文《趁年轻的时候》、苗秀的短篇小说《边鼓》、赵戎的中篇小说《海恋》、短篇小说《芭洋上》和李汝琳的中篇小说《姐妹俩》外，还包括了其他 25 位新马作家的 28 本创作。¹⁵⁷¹这些作者的笔下讲述了不同种族的际遇，如貂问湄的《金马梭胶园》描绘了和华工一样也从事割胶工作的淡米尔胶工所受的不平等待遇；骆起东《翡翠带上》中的三篇短篇小说：〈翡翠带上〉、〈失去春天的高原〉、〈小天下〉都以印尼棉兰为背景，写印尼在荷兰人的统治下的悲惨情景；陈全《小城之夜》五篇短篇小说中的〈马打古晋〉

¹⁵⁶⁵ 杏影〈印度的麻雀〉，《书与人》，页 119-128。引文见页 121。

¹⁵⁶⁶ 李汝琳《漩涡》后记，页 247。

¹⁵⁶⁷ 李汝琳《漩涡》，页 159。

¹⁵⁶⁸ 李汝琳〈关于《南方文丛》〉，《李汝琳创作集》，页 300-305。李汝琳记《南方文丛》中的书每本的字数在 20 万字左右。

¹⁵⁶⁹ 李汝琳〈一套丛书的诞生〉，《李汝琳创作集》，页 294-299。

¹⁵⁷⁰ 貂问湄《金马梭胶园》（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骆起东《翡翠带上》的三篇短篇小说〈翡翠带上〉、〈失去春天的高原〉、〈小天下〉（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都是以印尼棉兰为背景，写在荷兰人的统治下印尼人的悲惨；丁冰《芭野上的春天》中的〈未了情〉刻画了华文与巫文教师如何努力通过教导孩子来促进两个民族的团结，共同努力建国。

¹⁵⁷¹ 参 enanyang.my/商余/【南洋文艺】“新马文艺丛书”与“南方文丛”：

<https://www.enanyang.my/%E5%95%86%E4%BD%99/%E3%80%90%E5%8D%97%E6%B4%8B%E6%96%87%E8%89%BA%E3%80%91%E2%80%9C%E6%96%B0%E9%A9%AC%E6%96%87%E8%89%BA%E4%B8%9B%E4%B9%A6%E2%80%9D%E4%B8%8E%E2%80%9C%E5%8D%97%E6%96%B9%E6%96%87%E4%B8%9B%E2%80%9D>. 浏览日期：21. 04. 2022.

反映了被日军强掳到北婆服役的爪哇劳工的辛酸；丁冰的〈未了情〉则刻画了华文与巫文教师如何通过教导孩子来促进两个民族的团结。这些对异地异族，以及与异族相处的书写，是海外文人的独特体验，是单一的中国性所不能概括，却能于更宽广的离散华人的华人性里表露出来。从中国视角，这三套丛书展现的是‘海外’华人的体验和经历；从新加坡的视角，它们展现的是离散华人对中国、对其他国家、民族的认识和期望。这些作家所书写的离散华文文学，是一个既有中国图像与元素，也有对异族人民及文化的理解、包容与同情，对世界其他国家场景的解读，以及对居留国的人民和国家的想望和期待的独特的场域。李汝琳这些丛书的出版，虽然原意可能只是鼓励和发扬海外华文文艺，但却让读者对离散华人的华人性有更多的认识，功不可没。

姚紫

与赵戎一样，姚紫为新加坡华人族裔里的土生华人‘峇峇’和‘娘惹’发声，显示了异于单一的中国性的，却包含中国性在内的华人性。

姚紫是第一代的离散华人，但他关注生活在新加坡已有几代的土生华人的心态和他们的转变，为他们说话，也了解他们对中国的希望和对新马的贡献。在〈新加坡传奇〉中，他认同男性土生华人被称为‘峇峇’，女性为‘娘惹’，而‘峇峇’与‘娘惹’的定义却是“你这人是中国人！但又不是中国人！”¹⁵⁷² 因为有些土生华人早已忘记他们是中国人，他们习惯把伦敦称为‘祖家’，一口流利的英语，说起中国话反而伊伊唔唔；¹⁵⁷³ 然而“‘峇峇’中有许多像中国人的，更有许多是十足的中国人！他们关心祖国的兴衰，关心祖国的灾难，虽然连他们的祖父母都没见过祖国的影子，但是他们的爱国心，像一道彩虹般的桥，遥长地越过黑浪滔天的七星洋，飞架在祖国土地的边缘。”¹⁵⁷⁴ 华侨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子孙，百分之九十九是迫不得已才离家背井到异国谋生，在异国，有些成功，有些倒下，因此“七星洋上，流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泪水，马来西亚的泥土上，浸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血液。”¹⁵⁷⁵ 另一篇〈呵！祖国〉，通过一个对中

¹⁵⁷² 姚紫 〈扒手拳下开传奇-新加坡传奇补一章〉，姚紫《新加坡传奇》，页3。

¹⁵⁷³ 同上。

¹⁵⁷⁴ 同上。

¹⁵⁷⁵ 同上，页4。

国认识不深的马来亚土生华人，却因为一个爱慕中华文化的洋女，重新认识中国，学习中华文化并决定报效中国。这土生华人曾经因为祖父形容中国脏乱与中国的贫苦感到羞耻，他到英国留学，努力结交英国青年，然而但他感觉到英国青年因他的肤色对他的冷淡。直到他遇到一个倾慕中国文化的英国少女罗蒂，使他为自己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识的贫乏感到羞愧，开始充实自己。然而罗蒂的祖父和他认识的英国青年一样，也歧视有色人种，拆散了他们。土生华人认识到他的肤色是和他的国家不可分割的：“有色种人在世界没有地位，主要是他们没有强盛的祖国，更多的有色种人是奴隶，殖民地的属民，或者是失去自主权的国家。”他的国家观念被唤醒，他放弃了外国文学的学习，转而修读土木工程，渴望积极参加祖国的建设。这故事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道出姚紫对土生华人的寄望。¹⁵⁷⁶ 再一篇〈莉娜的舞会〉则描绘了不同的土生华人。莉娜和她的母亲同是土生华人，她的母亲对中国文化没有追求，对中国一知半解，但莉娜却仰慕中华文化。莉娜希望中国强盛，不但使她不必自卑，而且产生了爱慕：“自从新中国强健起来，她对那遥远的，只有爸爸到过的祖国，渐渐由零碎的，模糊中的幻想中明朗起来，使她感觉趣味、兴奋，和说不出为什么而爱的爱。”“祖国强盛起来，……在学校里，她也不必再自卑自己是黑眼睛扁鼻子的黄种人了。”¹⁵⁷⁷ 姚紫的观点有如 Ien Ang 所提出的‘中国’不等于‘华’的看法。¹⁵⁷⁸ 峇峇和娘惹对中国语文可能一知半解，但都承认自己的华族血统，有许多还保留了中国传统，尽管其中可能糅合了当地色彩。他们对中国性的保留，应该形容为华人性更为合适。

在《阎王沟》的后记里，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华侨都有一个单纯而又崇高的观念，就是：希望祖国兴盛，希望祖国的人民安乐！谁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谁就是祖国的救星！”¹⁵⁷⁹ 《阎王沟》写的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南洋侨生回国当机工参加救亡当运输机工与一曾为娼妓的女子的故事，在政军贪污腐败的现象中，凸显了南洋机工救亡的热情以及底层人物如娼妓的爱国情操，南洋机工也表明了抗战结束就要回南洋的意愿。

¹⁵⁷⁶ 姚紫 〈呵！祖国〉，姚紫《九月的原野》，页 51-63. 引文见页 61。

¹⁵⁷⁷ 姚紫 〈莉娜的舞会〉，姚紫《九月的原野》，页 51-63. 第一节引文见页 67，第二节见页 69。

¹⁵⁷⁸ Sharmani Patricia Gabriel, “‘Migrations of Chineseness’: in conversation with Ien A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2, Number 1, 2011; Ien Ang, “Can One Say No to Chineseness? Pushing the Limits of the Diaspora Paradigm”, in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38; 游俊豪 〈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三联书店，2014），页 156。

¹⁵⁷⁹ 姚紫 〈‘阎王沟’后记〉，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29-232。

这短篇小说完稿于 1952 年，反映的是当时华侨爱中国，但却不以中国为家的心态。他们希望祖国兴盛，人民安乐，但始终是以一个南洋人的身份抒发情怀。¹⁵⁸⁰

姚紫是在七位作家中唯一曾出版旧诗词集的作家。他的国学根底深厚，常在作品中引经据典，说明他对新加坡、对世界的观点。即使不用典故，他也是以离散华人的视角，评论远近国家的情况。

作为与世界接轨，并是东南亚‘小红点’的新加坡，姚紫关心新加坡周遭的国家及世界局势。他多次提到印尼。〈瞎打把势〉讥讽印尼国库空虚、饥殍遍地、官僚舞弊、民不聊生，却叫嚣欲‘粉碎大马’，有如清代《梁同书·直语补正》所云：“无所凭藉，而妄自炫耀，为之‘瞎打把势’”。¹⁵⁸¹ 〈做人的疑问〉以孟子的‘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质问荷兰人进攻印尼、轰炸中国船、杀戮中国人、洗劫华侨财产，是否是不是人？¹⁵⁸² 〈收锣时候〉嘲笑荷军进军印尼时狼吞虎咽，气焰高扬，但当印尼游击队开始反攻时，荷军却似银样镗枪头，惊慌失措；¹⁵⁸³ 〈屍位素餐〉质疑安理会的功能，是否下得‘停战令’，因为战事仍在苏岛和爪哇剧烈进行；¹⁵⁸⁴ 〈卑鄙手段〉批评苏联的东南亚政策，供应武器与印尼，并训练他们打击大马，再借大马对印尼反击，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¹⁵⁸⁵

他也关心邻国马来亚的状况，在一篇未注明日期但称邻国为‘马来亚’的散文中，他走访了马来亚西海岸的几个城市。他欣喜的看到马来人和中国人的孩子快乐的一起玩耍，他欣赏如画的风光，他歌颂胶林的贡献，也为被齐根砍断的胶树悲鸣，为被炮轰烧焦的山头不值，为在‘失去自由的地区’生活的人们感到愤怒，为被集中在‘新村’的人民感到痛苦。¹⁵⁸⁶ 他在多篇文章中表达了对马来亚人民生活的关注。〈时髦问题〉指责吉隆坡交通咨询会为裁减三轮车夫，要他们通过地理位置、马来语及交通规则的检查

¹⁵⁸⁰ 姚紫 〈阎王沟〉，刘笔农主编《姚紫小说选》，页 165-221。

¹⁵⁸¹ 姚紫 《短长书》页 173。

¹⁵⁸² 姚紫 《短长书》页 149。

¹⁵⁸³ 姚紫 《短长书》页 148。

¹⁵⁸⁴ 姚紫 《短长书》页 151。

¹⁵⁸⁵ 姚紫 《短长书》页 172。

¹⁵⁸⁶ 姚紫 〈西海岸去来〉，姚紫《九月的风》，页 113-123。

测，形同意欲改良失业者的肚皮，使他们觉得吃饭是多余。¹⁵⁸⁷〈两种价值〉以 3 名外国旅客在伦敦夜总会一夜的消费，与同在英联邦的马来亚因车祸丧生的 14 名割胶少女每人每日的工资对比，生命的两种价值，不言而喻。¹⁵⁸⁸

他也观察较远的国家。在〈活人献祭堂〉他痛心地揭露 20 世纪 60 年代的朝鲜存在‘活人献祭堂’，人命如草芥，殉葬者达 500 万以上。¹⁵⁸⁹政治家玩弄政权，〈总统总桶〉嘲笑南韩时任总统李成晚逮捕反对党，擅自延长总统任期。¹⁵⁹⁰ 1953 年前后写的〈日本小姐〉则讥讽参选世界小姐的日本小姐自言因身高，在日本难觅郎君，希望在美国能找到配偶，一如日本‘争取美元、土产外销’的贸易政策。¹⁵⁹¹此外，他在〈白澳政策〉里对澳洲的种族歧视非常不满，¹⁵⁹²，在〈心理比较〉以娼妓对嫖客的要求，如同有些国家对美国美援与军援的索求，讥讽这两类国家，¹⁵⁹³更在〈喜剧内幕〉指出美国工业带来的死亡与残疾，犹如‘繁华’后面的呻吟。¹⁵⁹⁴ 写于 1947 年的〈死灰复燃〉提醒中国，日本已迅速走上复兴之路，还要求与美国共管琉球，及移民台湾的特权，然而中国还在内战，前景堪忧。¹⁵⁹⁵

和杏影一样，姚紫对战争深恶痛绝，向往和平。他在许多评论政局与时事的文章里，已经屡屡指出战争的残酷。〈战争戒语〉进一步总结上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提醒当时东南亚战云密布、印支半岛局势紧张的好战者，哪一个士兵，不是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¹⁵⁹⁶ 〈剃头常识〉更以美国一面加紧试验原子弹的威力，一面积极演习预防原子弹的空袭，嘲笑美国虽明瞭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的道理但仍持续进行武器的研发。¹⁵⁹⁷他还以自创的寓言故事〈三千年后〉，讥讽人类‘残酷、凶狠、无耻、下流’，比野兽还坏，发明了原子弹，毁灭了文明和人类自己。¹⁵⁹⁸ 〈会说话的猩猩〉以一个梦境，批

¹⁵⁸⁷ 姚紫《短长书》页 159。

¹⁵⁸⁸ 姚紫《短长书》页 172。

¹⁵⁸⁹ 姚紫《短长书》页 177。

¹⁵⁹⁰ 姚紫《短长书》页 182。

¹⁵⁹¹ 姚紫《短长书》页 182。

¹⁵⁹² 姚紫《短长书》页 160。

¹⁵⁹³ 姚紫《短长书》页 172。

¹⁵⁹⁴ 姚紫《短长书》页 182。

¹⁵⁹⁵ 姚紫《短长书》页 193。

¹⁵⁹⁶ 姚紫《短长书》页 169。

¹⁵⁹⁷ 姚紫《短长书》页 180。

¹⁵⁹⁸ 姚紫〈三千年后〉，姚紫《木桶鸭》（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7），页 34-47。

评人类虽然头脑越来越灵敏，胸怀却越来越狭隘，以科学和文明，发明了原子弹、火箭，还要发明氢气弹，制造战争，自相残杀，毁灭文明。¹⁵⁹⁹

姚紫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思想，早已在 1949 年发表的《秀子姑娘》中出现。《秀子姑娘》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不同的手法、人性的角度来写这场刚结束的战争，目的是从人性的挣扎中揭露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在个人情感和国家意识的冲突中反映对和平的向往。秀子姑娘是日军电讯员，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思想，当她发觉自己无意间泄露军事机密的时候，她把枪对准了她的爱人。书中的‘我’虽对自己利用爱情套取情报感到内疚，也是以国家为主；虽试图以爱化解仇恨，却最终失败。¹⁶⁰⁰姚紫以秀子的死作为战争的牺牲品，以秀子的死控诉战争：“人类的祖先用爱来继续后代的生命，为什么子孙们要用血和泪来栽培仇恨的花果呢？第二次残酷的大战刚刚过去，血迹未干，尸骨未寒，而‘华尔街’的战争贩子又在吹动着死亡的号角了，又在制造着第三次人和人之间的大屠杀了。举目四顾，国际间弥漫着沉沉的火药气息，宁不叫人痛心吗？”¹⁶⁰¹当姚紫决定在南洋商报上发表《秀子姑娘》的时候，他引“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希望这作品能对多元种族和国籍的南洋群岛上的读者，对异族、异国、异阶级的男女有启迪的作用。¹⁶⁰²《秀子姑娘》在南洋商报连载之后，受到读者欢迎，同年由南洋商报出版单行本，3 个月内连印 3 版，共销行 1.6 万册，成为新加坡当时空前的畅销书。¹⁶⁰³姚紫希望这部小说作为春泥，应该能起一定的作用。

除了杂文、寓言故事、小说，他再以诗歌发出〈人民的怒吼！〉。在这首新诗里，他反对战争，也反对不利于人民的各种手段；他冀望世界的和平，更关心马来亚的安危。人民站在一条阵线上，对制造战争的人民公敌发出怒吼：

“要他们放下原子武器
要他们放下军事诡计
要他们放下政治鞭子
要他们放下经济压挤

¹⁵⁹⁹ 姚紫〈会说话的猩猩〉，姚紫《木桶鸭》（姚紫遗产信托人编，新加坡：陈龙玉出版，凯胜印刷企业公司印刷，1987），页 54-59。

¹⁶⁰⁰ 姚紫〈秀子姑娘〉，刘笔农主编《姚紫小说选》，页 40-88。

¹⁶⁰¹ 姚紫〈《秀子姑娘》初版后记〉，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23。

¹⁶⁰² 同上；姚紫〈《秀子姑娘》后记〉，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20-221。

¹⁶⁰³ 陈贤茂〈论姚紫的小说创作〉，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66。

要他们把大西洋的舰队调开
要他们把太平洋的禁运解除
要他们把马来亚的和平安排
要他们把全世界的局势和缓下来”¹⁶⁰⁴

这首诗写于 1955 年末。1950 年代的后半期，美苏继续争夺霸权，印度支那战争不断，殖民地纷纷要求自治自主，马来亚联合邦也在 1955 年举行了一次选举，选出了 52 名马来亚联合邦立法会的议员，为马来亚 1957 年的独立铺路。姚紫关心时局，不希望马来亚受到国际纠纷的影响，更希望世界和平。

姚紫是海外华人，也是属于世界的离散华人。他关心祖籍中国、关心他的居留之地、也关心世界人民的福祉。他不但对新马华文坛有所贡献，更犹如他所喜欢的龚定庵的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¹⁶⁰⁵ 他的作品惠及中外千万读者。他的创作里不单有中国性，更有包含中国性在内的华人性。

苗秀与赵戎

苗秀与赵戎这两位在新加坡出生的作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也互相欣赏、支持对方的见解。他们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也感染了包括了峇峇和娘惹及多元种族的在地文化。李汝琳的《南方文丛》包括了苗秀的《火浪》与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两部长篇小说。苗秀的《火浪》叙述了在许多青年北归救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青年自动留下来建设他们居住的这片土地，因为他们认为这里需要他们。留在本地的人的艰辛，还胜于游击队。赵戎的《在马六甲海峡》也呈现了在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日，海外华人的积极响应，不但以金钱和物资支持中国抗战，甚至还亲身到中国参加抗战。其中有百分之八十在本地出生，没有踏过中国的土地，却毫不犹豫的回国参加救亡工作。还有“当地的娘惹峇峇们，简直是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中国人了”，

¹⁶⁰⁴ 姚紫〈人民的怒吼！〉，姚紫《夜歌》，页 46-48，写于 1955 年 12 月 6 日。

¹⁶⁰⁵ 姚紫〈《秀子姑娘》后记〉，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20；姚紫〈《秀子姑娘》初版后记〉，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23；君盈绿〈姚紫小说世界中的滢光丽影〉，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187；黄叔麟〈姚紫与我〉，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109。

也支持中国抗战。¹⁶⁰⁶ 这些人所表达的思想意识，反映在地现实及对中国的想望，既有中国性，也有华人性，有分割也有重叠，其中娘惹峇峇所表达的有中国性的华人元素，是华人性中中国性的呈现。

在语言的应用上，苗秀和赵戎都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本地杂糅的语言，苗秀的‘大众语’和赵戎的‘方言艺术’，也鼓励以这种语言为载体来说新加坡的故事。这故事里不但有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人，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族裔，形成了新华文学独特的论述，其中不单有对中国的想望、有对新加坡现实的反映，更有对新加坡及世界的憧憬。

Safran (2016) 指出现代以色列的希伯来语字词的组织、形态和音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在圣经希伯来语言中成长的以色列离散族裔难以了解，然而这不影响离散族裔的身份认同。¹⁶⁰⁷ 依地语 (Yiddish Language) 是以德语为基础融合了多种语言的犹太语，Safran (2016) 以依地语为例，被依地语吸收的传统希伯来词，会在调整后再现于以色列的希伯来文中。¹⁶⁰⁸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苗秀和赵戎以方言、马来语、英语融入他们的小说语言，相信在中国的中国人，或在其他国家的离散华人，或是现代不懂得方言的新加坡华人也不一定看得明白，然而，这不影响他们所要表达的思想意识，作为离散族裔所反映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要在居留国建立一个独特的新马文艺的理想。

Safran (2016) 引用 Khachig Tölölyan (2007) 的研究，指出由于共同的文化和集体认同而形成的离散族裔所保留的语言、宗教、社会或文化习俗，随着时间的转移，也会产生双文化的杂糅。¹⁶⁰⁹ 其实笔者认为，新加坡长久以来是交通的枢纽，来自多国的人民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习俗。在多元文化、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如新加坡，文化的杂糅应不限于双文化而是多文化。他们作品所展现的，不单是中华文化，而且是

¹⁶⁰⁶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页 97-98。

¹⁶⁰⁷ William Safran,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eds., 2016, p. 56.

¹⁶⁰⁸ 同上，页 44. 原文为：“Among the reimports are numerous Hebrew back formations via the Yiddish language, for example, a classical Hebrew word incorporated into Yiddish and reintroduced in its adapted form into Israeli Hebrew.”

¹⁶⁰⁹ 同上，页 33。

与其他文化接触后的新华文化，里面包含了中国性和更宽广的华人性，就如游俊豪教授所说的：

“马华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场域，拥有自己的中国论述，在自己特定的轨道上进行着中国各种图像的想望，形成自己特别的系统里的模塑。它不是‘大中国’，是马华族群性里的‘中国性’，更准确的说法是华人性里的中国元素。”¹⁶¹⁰

游教授以马华文学为例，但华人性中的中国性概念，其实适用于曾与马华文学一家，同曾为英殖民地、同处多元种族和文化的新华文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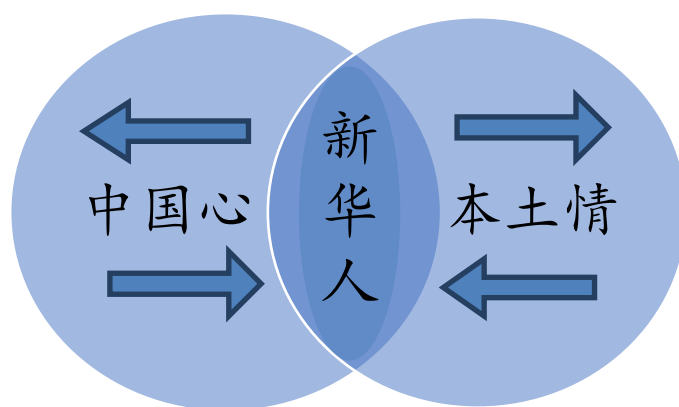
本研究中的五位移民作家 - 李星可、连士升、杏影、李汝琳和姚紫，从移民到定居，从肯定新加坡到对新加坡做出贡献。另外两位作家 - 苗秀和赵戎，虽在本地出生及成长，也不忘中国文化对他们的恩泽，再在这基础上，坚持及发扬新加坡文艺的独特性。他们都是离散华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述他们的观点，但他们都有同一个目标 - 新加坡的繁荣与进步。他们于在彼与在此、过去和现在的张力中表述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们不但被新加坡的环境所塑造，也和其他作家一起，共同塑造了新加坡文化。

¹⁶¹⁰ 游俊豪〈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三联书店，2014），页 159。

第七章：总结

这七位离散华文作家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他们新加坡的故事。他们既爱中国也爱新加坡，他们不再希冀落叶归根，更不斩草除根，而是实实在在的落地生根。他们是新加坡离散华人，是新华人。在本研究的中国心、本土情及新华人这三个轴心中，这七位离散华文作家与学者的理论得以互相辩证。对当时的华人的认同意识有代表意义。

下图显示他们在这三个轴心中，有不同的表述，有交叉也有重叠。中国心和本土情的共存、润泽与启迪，使他们成为新华人。在承受张力的同时，张力也促使他们思考如何调协和适应新的环境，甚至改善新的环境，以致张力成了助力。



在第四章〈中国心〉里，这七位离散华文作家说明了 Safran (1991, 2016) 所坚持的离散族裔和母国的关系，以及 James Clifford(1994), Paul Gilroy(1994), Robin Cohen(1997), Kim D. Butler(2001), Khachig Tölölyan (2007), Eliezer Ben-Rafael(2013)所肯定的，无论想像或实质，离散族裔和母国的关系都不可磨灭。这七位离散华文作家具有对故乡的缅怀和想望，也以实际行动维护华族文化和语文。李星可为南大筹款、推动京剧、教导标准华语、维护华文-母语教育、肯定中华文化的辉煌。连士升细数记忆中的故乡美景美食，提醒中国应正视贫富不均、贪污走私、裙带关系、不诚不公的弊病并提出收拾民心的建议。杏影只在中国生活了他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时

间，但潜意识里的所好，还是中国的那一套。他从印度的雀鸟，想到中国人的习惯；

在新加坡喝茶时想的是中国茶馆里的盖碗茶；在听清唱的时候，许多像是遗忘了的中国景物，却一幕幕地展开；他厌恶战争，向往和平，主张世界大同，也是源于他不曾忘记故乡曾受的苦难。饮水思源是李汝琳的美德，他细数亲人朋友对他的恩义，真诚回报；当他选择成为新加坡公民时，他没有忘恩负义，仍然感激如母亲般的中国对他的恩情。姚紫看到新加坡的麻雀，也联想中国的麻雀；一直到 1973 年，他还在回味他家乡的故事；他借古喻今，针砭时弊，也只是希望中国更好。苗秀描述并肯定新加坡人民，包括了未曾踏足中国的新加坡人，以回归或在地活动的方式对中国抗日救亡的努力和牺牲。他反映了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生活在这土地上却感身在异乡，也反映了他们感觉‘无根’的迷茫。赵戎更为土生土长的峇峇、娘惹，生活了两三代的华人都一起参加抗日活动而喝彩。他曾以文艺活动协助各种筹赈救亡的筹赈工作，并持续的努力办报、组织诗社、剧社，推进华文文艺事业，发扬‘慎终追远’、‘不忘故土’的中国传统价值和精神。

无论他们是移民或在本土出生，无论他们是否曾踏足中国的土地，无论中国是他们希望的中原或实际的故乡，虽然他们已经决定不落叶归根，而是落地生根，但中国传统价值和精神，都通过中国文化和语言，渗入这七位华文文人的思想意识，紧紧相系。

这七位华文作家中的五位移民作家的后半生在新加坡度过，在新加坡终老，两位本土作家更是一生在此。论文的第五章〈本土情〉论述了他们对新加坡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的回应，以及对新加坡所作的巨大贡献。他们不但肯定了 Butler（2001）、Gilroy（1994）、王赓武等学者的地域影响思维的论述，还以他们的文艺，引领及影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李星可明白在多元种族的社会，双语教育才能保障文化传统不致丧失。他对新加坡的独立以及发达繁荣深具信心、反驳把新加坡当成中国一部分的谬论、鼓励人民参政、为弱势群体与底层人民的生活发声请命、鼓励各源流文化交流、指出生活在多元种族的社会和谐共处的重要。连士升指出除母语外，国人还需努力学习当地语文，与其他居民和衷共济，对国家效忠不二。他和李星可一样，欢迎外来人才协助本地发展，也主张培养本地的决策人才。他肯定了新加坡独立之后的成绩，庆幸自己是新加坡公民，也提出许多建议，协助新加坡更上一层楼。杏影相信文艺的力量，积极推动本地文艺，

栽培新进作者，以文字感染读者向善向上。他对新加坡有褒有贬，但指出它的短处也是它的长处，譬如因为新加坡古板，照章行事，因此容易除去罪恶。新加坡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多种民族，但在复杂和矛盾中却存在单纯和调和。他还对新加坡致以最高的赞美：上帝赐予人类的‘地上天堂’。李汝琳对新加坡的认同展示在他对本地编辑与出版事业的积极推动，发扬本土文艺，也明明白白的显示在他的诗歌里，直白地说他要在这儿长久居住，因为他爱上了新加坡。与杏影一样，姚紫同样称赞新加坡是海外华人的天堂，新加坡人是东南亚最值得羡慕的人民。他感谢新加坡的收留，否则就没有今天的他。生病时他回国寻医，但交代他无论如何都要回来，‘死也要死在新加坡’。他以新加坡为他新的家乡，遗愿还不忘润泽新加坡文艺。苗秀以培养国民精神、发扬爱国意识为文艺创作的方向；赵戎以热带景物的描绘，表达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归属感。苗秀和赵戎对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坚持和伸展，对方言或大众语的应用，为收集、整理、编撰新马华文文学做的努力，是最早肯定及开拓新马华文文学场域的作家中的两位。

比较五移民作家和两位土生作家，土生作家依凭的是他们对中国的想望和在中国文艺中吮吸的营养，与移民作家的直接体验有所不同，也因此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开展马华文艺独特场域的重要性，以理论加以巩固，以创作身体力行。

第六章〈新华人〉揭示了作为新加坡离散华文作家，这七位华文作家感受到原乡和居留国之间的张力，在故国和本地的情感中，在中华语言文化和居留国的现实之间，寻找调和与平衡，在捍卫母语语言文化的同时，关注多元种族融合相处的社会要素，同时也把‘在彼’与‘过去’所积累的学识，用于塑造‘在此’和‘现在’的居留地，成为新华人。苗秀与赵戎虽出生于此，但他们吮吸了中华文化的营养，将它们应用并发扬于本地文艺，贡献不亚于其他五位。他们之中到过其他国家的李星可、连士升、杏影、李汝琳，更把他们在这些国家的学习，融入他们的思考。有如 Clifford (1994) 所指出的，离散族裔在理想和异位的张力中，仍然维系着社群、保留着传统，并在逆境中、在当地的语境下杂糅地重现母族的文化传统。¹⁶¹¹

¹⁶¹¹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 317.

一个国家的主导语文决定其话语权。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教育和语文政策迫使华族文人作出调整。作为新加坡两大报章的社论主笔，李星可和连士升在为华文教育和南洋大学奔走请命之余，同意双语政策，并多次鼓励各源流文化的交流；他们强调族人应精通母语，连士升驳斥中国语言不统一，文字难学而应学英文的谬论，李星可更认为英文不是不可替代的语文，然而他们最终都主张置国家利益于个人之上，建立共同的文化与社会。杏影、李汝琳、姚紫、苗秀、赵戎坚持文艺的力量，以副刊或期刊培养新秀、引领读者。此外李汝琳以编辑丛书回应书籍匮乏的现实，苗秀、赵戎以编辑整理新马华文文艺使读者有宏观的认识，赵戎以词典制定文艺典律，姚紫以遗产延续新华文艺，都有承先启后的意义，都是对新华语文文艺的现实张力的回应。这新华七子在故乡与居留地之间，选择了成为居留地的公民，但他们始终对两国有并行不悖的感情。他们在矛盾中寻找和谐，在冲突中寻求理解，使不同的文化成为资源，使张力成了动力，共同拓展新加坡文化。

这七位作家不论是否来自中国，都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而他们曾到过的国家，也对他们有所启发和润泽，地域对他们的影响屡屡刻画于他们的笔下。其中如杏影和李汝琳都曾到过印度，李汝琳比较印度的华人与缅甸及加拿大的华人，肯定新兴国家独立后，需要侨民态度和身份的改变。杏影身处印度更能体会甘地和尼赫鲁的言行，深化他对世界和平的向往。连士升的游记，是他游历了许多国家后得到的启迪，李星可和连士升能够以宏观的角度剖析时局，也和他们行过万里路，见识的宽广不无关系。

然而这些作家最后落脚的地方还是新加坡，在新加坡的年月有 22 年至 44 年之久。他们在 1945 至 1949 年之间抵达新加坡，直到他们终老，经历了日治后的殖民统治，自治、独立的过程以及独立后新加坡的发展，出生于此的苗秀和赵戎自不在话下。新加坡的政策让他们作出思考、作出回应。身为社论主笔，李星可与连士升对时事触觉敏锐。李星可对新加坡自治、新马分家、独立、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内政、治国、民生各种问题都提出了建议；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不止一次提出扩大言论自由的呼声，呼吁当局彻底尊重言论自由。李星可一般直言，但有时也以间接的方式达到他的信息，¹⁶¹²

¹⁶¹² 如褒扬李光耀 1966 年 9 月的建议，在华校中数理用英文，在英校中，史地用华文。李星可称之为‘星加坡的文化革命’与‘星加坡的文艺复兴’，以期保住华文的教学与位置。见李星可《政论新集》篇 47、57、58。

连士升早期的言论比较激烈，¹⁶¹³后期一般温婉，在母语逐渐式微的境况下，仍然持续先精通母语，再学其他语文的坚持。李星可认为新加坡是文化沙漠，连士升不以为然，但他们都一致为这片文化土地努力耕耘，使之成为绿洲。

甘地和尼赫鲁，以及印度人对雀鸟的宽待都对杏影有所启发，新加坡多元种族的共处模式也给杏影世界大同的理想带来希望，以致称誉新加坡为上帝赐予人类的‘地上天堂’。新加坡摆脱殖民地的枷锁、生气勃勃、人民的自信都给予李汝琳许多激励，直言他走过很多地方，但他却爱上了新加坡。姚紫多篇文章以借古喻今的方式谏言，他把华侨比喻为‘番客牛’，自称为有华、巫、洋味的‘武吉巴兄’呈现了许多新加坡社会的怪现象、不健康人民的心态、教育问题，但他仍然决心全心全意的浇灌这片土地。苗秀、赵戎在马华文学萌芽期已经敏锐地理解马华文艺应脱离侨民文艺，建构自己的文学场域，他们也明白华人必然要适应多元种族的社会，在素材上反映新加坡的特色，及语言文字上使用杂糅的新加坡语。

无论他们是否来自中国，身处多元种族的社会，接受并推广多元文化，他们呈现了比中国性更宽阔的华人性。李星可鼓励新加坡在自己独特的文化中，以中国价值观中的仁、义等华族传统节操为建立新社会的目标；连士升敬佩的人物中，不但有中国的公孙侨、诸葛亮、王守仁、曾国藩、孙文，也有印度的尼赫鲁、英国的萧伯纳，还有他欣赏的许多中外艺术家；杏影以中外历史、哲学、科学、音乐为内容，以正面的、反面的说明，以直接的、对立的方式，阐述他华人性中世界大同的理想；李汝琳走过了很多地方，以他积累的见识，宏观地推动新加坡文艺；姚紫、苗秀和赵戎的笔下还有峇峇和娘惹的形象与声音，书写他们的心态，为他们说话。他们许多人虽然在思想意识、饮食习惯上都以中国先入为主，但身处异国，与不同种族相处的体验，他们所表现的，结合了对居留地的关怀，是更多于中国性的华人性才能表述的。和衷共济、世界和平是这些离散作家共同的理想。他们的文字和行动，形成新加坡独特的文化景观，

¹⁶¹³ 1950年当他谈到〈华侨的文化与教育〉时，认为当年的5月，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被包围及停课是小题大做。因为学生关心政治表示他们很有抱负。与其打压，教职员或教育局应因势利导，通过时事的讨论，以具体事实，分析利害，同时指导他们阅读好书，才不致‘民免于无耻’。见连士升〈华侨的文化与教育〉，《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页105-108，写于1950年9月19日。‘民免于无耻’出自《论语·为政》，意如以政令与刑罚为主导，人民将不知羞耻，只求免于刑罚而服从。

并使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新的地域有了新的意义。这些作家所书写的新加坡离散华文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场域，一个既有中国图像与元素，也有对异族人民及文化的理解、包容与同情，对世界其他国家场景的解读，以及对居留国的人民和国家的想望和期待。

这七位离散华文作家也有王赓武所提出的国家、文化与族群认同。在国家认同中，其实这七位作家有着对中国和新加坡的双重认同，他们对中国和新加坡的感情并行不悖，不过在适应新的环境的过程中，他们已经落地生根。他们不但认同于他们的居留国，也认同于他们多元种族与文化的社会，乐意与其他国人共同建设国家。他们的文化认同显而易见，说明了霍尔（Stuart Hall）与王赓武相似的论述，即认同存在流动性，它是进行式的，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地点、时间中，一直在被塑造。他们的族群认同不但呈现在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共同认同里，以中国心饮水思源，也叮咛于他们的创作中，如苗秀呼吁中国人应互相照顾。他们的族群认同并出现在他们彼此在新加坡文艺工作上的相互扶持中，其中如李汝琳除了姚紫之外，为其他五位都出版过书籍；连士升曾协助李汝琳度过生活的困境，为李星可的书写序；姚紫的文艺版发表了许多苗秀的散文和杂文；¹⁶¹⁴苗秀与赵戎支持共同的文艺观及新马华文学的独立性。这七位新加坡离散华文作家既维护中华文化，为华文教育与语文尽心尽力，又都为扩展新华文艺持续努力，在文艺中呈现对新身份的探索，使乡土记忆与在地文化不断杂糅，在重复（iteration）、重组（recombinant）、重塑（ceaselessly re-processed）的过程中产生恒中之变、变中之恒（changing-same）。

本研究的七位作家是当时文艺界认可的、重要的及出色的作家，当然，优秀的作家不仅这七位。赵戎 1979 年出版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从战前至 1977 年 12 月止，列出了约 731 位作家，¹⁶¹⁵与本研究的七位作家同时段的，应当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对更多作家进行离散华文作家书写的研究，定能丰富离散作家的群像，扩展对新华文学场域的认识。其次这些作家中，也有第一代与第二代的离散华文作家，如能对第一代、第二代，甚至更多代的离散族裔进行比较研究，这些族裔的中国心是否会因时空的间隔而逐渐递减而相对的本土情更加浓郁，将更加清晰。苗秀和赵戎是第二代的离散族

¹⁶¹⁴ 姚紫主编《文艺报》，1954 年第一卷 1-6 期。

¹⁶¹⁵ 赵戎〈编辑凡例〉，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

裔，但他们自幼浸濡于中国文化之中，深具中国心，但也极早意识到马华文艺对读者的影响力。其他本土作家是否与他们不同，或不同的因素何在，将研究扩展包括更多的本土作家，应对移民和本土作家的认同意识和他们身份有深一层的认识。其三，加入比较时段下不同地域和环境对他们的影响，进行交叉研究，将由另一层次加深对离散华文作家的了解和认识。

本研究的对象是新加坡离散华文作家，而比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离散族裔可作为另一项有意义的研究。新马都曾被殖民，都曾经历日治，还曾同属于马来西亚。华人南来，也有许多移民至马来西亚，在那里生根。然而马国的政治、社会 and 语文教育的措施与新加坡迥异，比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离散族裔的中国心、本土情和他们成为当地公民的选择过程，能进一步了解地域对离散作家能起的作用；将他们组成群像研究，更能探索‘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¹⁶¹⁶ 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场域开拓新的篇章。

¹⁶¹⁶ 取自游俊豪《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三联书局，2014）书名。

附录

附录 1：1921 年至 1980 年新加坡华人人口的变化

	新加坡华人人口 占总人口比例 ¹⁶¹⁷	外地出生的新 加坡华人人口 占总华人人口 比例 ¹⁶¹⁸	出生在中国、香港 和台湾的新加坡居 民占外地出生的新 加坡人口比例 ¹⁶¹⁹	新加坡总人口 ¹⁶²⁰
1921 年	75.3% (315,151)	76.4% (240,673)	(缺乏记录)	418,358
1931 年	75.1% (418,640)	64.2% (268,607)	(缺乏记录)	557,745
1947 年	77.8% (729,473)	42.3% (308,225)	68.5% (282,088)	938,144
1957 年	75.4% (1,090,596)	32% (349,372)	54.1% (278,755)	1,445,929
1970 年	76.2% (1,579,866)	23.4% (369,447)	45.9% (243,682)	2,074,507
1980 年	76.9% (1,856,237)	19.7% (366,172)	35.9% (189,262) . 仅占新加坡总人口的 7.8%	2,413,945

¹⁶¹⁷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Third Edi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2), p. 29.

¹⁶¹⁸ 战前华人主要来自中国。战后除中国外，还来自马来（西）亚、印尼、香港和台湾。见 Saw Swee-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p. 62.

¹⁶¹⁹ 同上，页 66.

¹⁶²⁰ 同上，页 9-14，页 29.

附录 2：新华华文文学史分期详表

	方修 ¹⁶²¹		杨松年 ¹⁶²²		王润华 ¹⁶²³		黄孟文与徐迺翔 ¹⁶²⁴			
1	1919 — 1925	萌芽期： 在支持新文学新思想的同时，也刊登了旧思想旧道德的文章。	1919 — 1924	侨民意识浓厚时期： 文学作品呈现华人因政治或经济因素而不能或不敢回乡的心态。他们所关心的问题除了日常生活之外就是中国的时局，他们身居南洋，心系中国，想尽速还乡，落叶归根。副刊的文章，讨论许多中国的社会、教育、文化、民生的问题，在中国的节日来临时，更怀念中国，充满浓厚的侨民意识。然而这时期也开始表示对本地的关心，出现了一些对南洋社会的评论。			1919 — 1937	初创时期： 从大量移植中国新文学侨民意识浓厚的时期到出现反殖意识和强调本土化、具‘南洋色彩’的作品和新兴文学的创作	1919 — 1925	萌芽时期

¹⁶²¹ 方修的文学史分期为以下方修编著的综合：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三册（新加坡：世界书局，1962）；方修《马华文学史补》（新加坡：春艺图书，1996）；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 戏剧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9）；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 小说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9）；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 散文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81）；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 诗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82）；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

¹⁶²² 杨松年的文学史分期为以下杨松年编著的综合：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0）；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杨松年主编《从选集看历史：新马新诗选析（1919-1965）》（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

¹⁶²³ 王润华〈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阶段与方向简史〉，《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4），页 3-17。

¹⁶²⁴ 黄孟文与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分期简要以其〈绪论〉页 XVI-XX 为主；黄孟文〈新加坡华文文学简史〉，《新华文学·世华文学：评论与史料选辑》（新加坡：云南园雅舍，2008），页 6-8。

2	1926 — 1931	扩展期： 新刊物、新作者，此起彼伏。作品质量提高，多种文学思想、文学运动、文学风格，争妍斗艳。	1925 — 1926	南洋思想萌芽时期： 叻报与新国民日报的副刊编者呼吁改造南洋社会，刷新南洋文坛。	1927 — 1929	南洋文艺的提倡： 1927 年有一些编者开始对创造具有本地色彩的文学发生兴趣，主张‘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			1926 — 1930	拓展时期
			1927 — 1933	南洋色彩提倡时期： 1927 年南洋色彩的口号被提出。数位编者呼吁把南洋色彩置入文艺界。这时期的南洋色彩结合了‘新兴文学’（现实主义的革命文学），作品中反映了南洋社会中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然而南洋色彩萌芽和提倡并不代表他们不再关心中国事务。还有些作者以新兴文学（革命文学）作为文艺方向，以及‘穿上地方色彩的衣裳而向着伟大潮流的普罗文艺’前进。					1931 — 1934	低潮时期
									1935 — 1937	复苏时期
3	1932 — 1936	低潮期： 文艺刊物普遍消沉，文坛充满歪风邪气，形式主义抬头，趣味主义泛滥。正派作者虽曾努力，难挽颓势。 不过方修也认为，这时期在理论批评方面有两方面的建树：一是马来亚本位概念的形成，二是‘大众语’和‘拉丁化新文学运动’的推行。	1934 — 1936	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提的马来亚文艺的用词，及有关 1934 年及 1935 年马来亚文坛的总结性评述。当时对搬用中国文学理论产生论争，结论是中国文学理论可以加以介绍和讨论，但不可抹杀马来亚的地方特殊性。	1934 — 1936	‘马来亚地方文艺’的提倡： 主张以新马地区人民为服务对象，不盲从中国文艺。				

4	1937 — 1942	繁盛期： 1937 年初，新一批的南来文人加强了文艺阵容；1936 年尾，中国内战结束，局面好转；接着抗日的热情，展开抗日救亡的文艺运动，文坛百花齐放。1941 年太平洋战争，日军南进，马华文艺热潮再度高涨，至 1942 年 2 月新加坡沦陷才沉寂下来。	1937 — 1942	侨民意识腾涨、本地意识挫折时期： 1937 年 7 月中国全面抗日，新马华人的中国意识受到激发，发展中的本地意识被压抑，侨民意识急速腾涨。编者作者及文艺团体纷纷呼吁抗日救亡。当时有作者小红提出‘战时文学’的用词不适合新马，因战争场地并不在新马，因此他建议以‘华侨救亡文学’取代，引起了一番南洋文学特殊性的论争，凸显了侨民意识和本地意识的对峙。			1937 — 1945	抗日战争时期： 1937 年日本侵华，新加坡华人激烈声援抗日，“‘南洋抗战文艺’口号的提出、文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开展、救亡运动的兴盛、文艺通讯员运动的推动、乃至‘反侵略文学’的创导，使这个时期新华文学的思潮、理论与创作，形成鲜明的时代特色”（页 XVIII）	1937 — 1939	以抗日为主调，思潮理论和文学创作蓬勃发展
									1939 — 1941	英殖民政府实施战时法令。抗日文学被压抑
									1941	面临日军南进，抗日文学高涨

									1942 – 1945	新加坡沦陷，文坛沉寂。
5	1942 – 1945	沦陷期： 许多文艺作者殉难。日本政权大力扶植汉奸文学及顺民文学。								
6	1945 – 1948	战后初期： 创作基本主题是反殖及民族自主。1947 年开始讨论‘马华文艺独特性’，1948 年展开‘马华文艺独特性’和‘侨民文艺’的论争，促使文艺工作者及读者深切反思马华文艺服务的对象以及华人与中国的关系。赵戎（西樵）与苗秀（闻人俊）都是‘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支持者。	1946 – 1949	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马华文艺独特性提倡时期： 赵戎于 1945 年 12 月首先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主张。这主张有三大特征：（1）它不单是马华文学运动，而是综合各民族的文化成果，发扬各民族各阶层的文学，（2）它是反奴役与反压迫的文学，（3）它是反独裁反封建的文学。 一些知识分子关注文学的建设工作，重视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另有一些作者认为马华文艺应该追随中国文艺，展开了马华文艺和‘侨民文艺’的论争。也有作者认为重视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并非反对中国，只是强调马华的在地性和个性。	1947 – 1948	马来亚意识和中国意识的对峙	1945 – 1965	战后时期： <u>质与量</u> 与前一时期对比，战后大批华文报刊创办、文学新人涌现、文学社团建立、文学作品专集的质与量明显提高。 <u>主题思想：</u> 反殖民地统治。 在‘马华文艺独特性’和‘侨民文艺’的论争中，赵戎（西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	紧急法令时期：进步文学陷入低谷，黄色或消极文化趁虚而入。

7	1948 — 1953	紧急状态时期： 1948 年 7 月英政府实行紧急法令，限制言论、出版及集会，一般作品避免反映本地重要现实。	1950 — 1954	本地意识的拓展时期、反对黄色文化时期： 在紧急法令实施之后，严肃的文艺低沉，取而代之的是渲染色情、反映消沉情绪的文化，统称黄色文化。有些编者和作者则展开反黄运动。 在紧急法令之后留下来的侨民作者逐渐建立马来亚意识，本地的作者也逐渐成长，书写马来亚社会与人民。				樵）与苗秀（闻人俊）都支持‘马华文艺独特性’。	50 年代初至中期	反黄运动：倡导健康的文化与生活
8	1953 — 1956 年底	反黄运动时期： 反黄运动开始是由青年学生发起，刺激了社会风气，从反黄到反殖，到职工运动崛起要求改善人民生活。文艺作品反映了这些社会现实。	1955 — 1959	本地意识的腾涨时期：爱国主义提倡时期： 1955 年的大选、1957 年马来亚建国、1959 年新加坡自治，都促进了新加坡出版事业的再度繁盛以及本地意识的腾涨。随着反殖和独立自主的呼声，产生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口号，主张团结各民族、建立国家观念、反映人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参与使文坛获得丰收。 马芬于 1955 年 12 月首先提出的‘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口号，在 1956 年开展，获得多方响应。					1955 年始	爱国主义文学运动：随马来亚争取独立而开展
9	1957 — 1967	反黄运动退潮期： 在反黄运动高潮期后，仍有抨击腐朽现象、赞扬健康生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品着重描写小市民生活以负面的社会现象。	1960 — 1965	本地意识继续腾涨、后新加坡自治时期： 1959 年新加坡自治后，于 1963 年加入马来西亚，又于 1965 独立，对新马是一个变动极大的时段。文艺作者关心文艺的新动向、颂扬所居住的土地、强调各民族的和谐共处。当时的大多数作者也坚持以现						

				实主义为创作方向。关注社会问题，但这时期现代主义文学也开始崛起，给文坛带来另一番景象。						
1 0	1967 — 1976	世界性思潮冲击期： 随着世界局势的转变，不同风格与内容的作品出现。出现了吟咏国际时事、抒发爱国情怀的诗歌、反映劳动阶级生活、批评现实的作品，但也有些倾向闲适情趣、追求创意的现代派、时代气息比较淡薄的作品。	1965 — 1980	独立后华文文学蓬勃发展 ¹⁶²⁵ ： <u>1965-1979</u> 除创作外，重视史料整理。不同风格门派的文艺工作者共同推动文艺。 <u>1980 开始</u> 文学团体和出版社共同努力建设新加坡华文文艺，提高质量，加强普及工作。	1965 — 1985	朝向具有新加坡传统的新华文学： 年轻一代作者崛起文坛。少数继续继承以前的文学传统，但多数作者引进世界各国文学潮流和写作技巧、题材城市化、工商业化，及其他族群的生活，视野大大开阔。	1965 起	新加坡共和国时期： 初期较沉寂，从1970年代开始，从复苏走向繁荣。 建国后的新华文学有下列现象： 1. 文学新秀涌现 2. 创作求新求变 3. 文艺杂志纷纷出现 4. 文艺副刊百花齐放 5. 文艺作品数量可观 6. 文学活动日趋活跃。	较彻底摆脱侨民意识、女性作家增加、作品内容城市化、提倡‘建国文学’开始史料的整理和史论的研究。	

¹⁶²⁵ 杨松年对于这一期的评述只见于杨松年〈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过去与现状〉，《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页248-253。

附录3: 李星可·连士升·杏影·李汝琳·姚紫·苗秀·赵戎 七位作家的比较

	出生地/ 抵新日期	生卒 年日	新加坡和中国以外曾到之处	语文能力	教学、报社、编辑经验	生活遭遇/政治牵连	处世为人	与其他6人的关系
李星可	中国河北冀东丰润县/ 1949年抵新。然在新长居时间约25年。 1626	11.4. 1913 - 1996. 在世83载。	比利时、法国（求学）、香港、越南、缅甸、印度（约1942，工作一年）。	李星可懂得多种语文，除中文外，还精通法文，曾得奖学金到比利时和巴黎留学，也曾在新加坡任职和法国大使馆顾问。 ¹⁶²⁷ 他的译诗〈母亲〉写不变的母爱，译自法国 JEAN RICHIPIN 原著。 ¹⁶²⁸ 他也兼通英文，翻译了韩素音的《餐风饮露》及《青山不老》。 ¹⁶²⁹	1. 李星可1959年底进入《星洲日报》，出任主笔，专写社论。1971年2月，转投《南洋商报》。 2. 李星可离开法新社后曾任南洋大学及师资训练学院教席。李星可自记他于1950-1961年任法新社主任。 ¹⁶³⁰	于《南洋商报》时以社论褒贬时政。在1971年5月，因言获罪，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直至1973年始获释。（梁秉赋《李星可其人其言》： 文化沙龙人物点评系列4/2008-《李星可其人其言》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wordpress.com))	笔锋犀利，与多人结怨，如 1. 在《乱世沧桑》中谈报馆五月风暴时，指陈振夏的女婿是一名部次长人物。因此，李星可针对性的指证陈振夏所扮演的角色，并颇费周张重复他的人脉关系（新加坡文献馆（未注作者名）《 回顾华文报业风暴是非 》21/02/09， https://www.sginsig	<u>曾称连士升为变色龙</u> ： 李星可记述1971年报界‘五月风暴’事件，仝道章、李星可被捕后，李有成社长继续主张强硬立场，但要有人执笔。当时在南样商报的连士升辞职。李星可认为这是因为连士升“胆小如鼠”：“一向有‘变色龙’之称的连士升被吓走了，告老退休。”（李星可〈答

¹⁶²⁶ 李星可 1949 年从西贡到新加坡，1973 年出狱后曾到日本，及法国，再到澳洲和儿女居住。虽时而回新，但长居新加坡时间应约为 25 年。

¹⁶²⁷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3-15，77-80，171-172；李星可〈纪念亡妻〉，《十八年后归去来》（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页1，记他1935年‘负笈西欧’。

1628 <母亲> (译诗) 收于《桥上》(新加坡: 星洲世界书局, 1957), 页 1-2。作者以此诗纪念他的母亲, 诗中的母亲对杀了她以取悦他所喜欢的女人的儿子, 仍然关心呵护, 非常感人。作者自认为这首译诗的音节腔调保留了原作的精神, 是他满意的作品。

¹⁶²⁹ 韩素音著，李星可译《餐风饮露》（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韩素音著，李星可译《青山不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4）。

						) ht.com/xjp/index.php?id=2312)。 2. 李星可和当时民报社长黎国华对质（史马《过河卒子李星可》上篇，刊于联合晚报 1987 年 4 月 12 日）。 3. 作《胡文虎传》（康吉父著。康吉父即李星可）（香港：龙门文化事业公司，1984），对胡文虎有诸多负面的评述。	客问》，《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91），页 159）。 引用赵戎对他的评价及自己的著作，对《猎户》编者及作者对他的批评：“李星可被认为是政治评论家，严格说来，不是作家。”加以详尽的反驳。（李星可〈从《新社》想起南洋文艺问题〉，《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76-79）。
连士升	中国闽东福安县福宁府泰溪乡/1948	24. 5. 1907 – 9. 7. 1973. 在世 66 年	到过香港、越南（工作）、欧洲多国、印度（1956 年被印度政府邀请）。柬埔寨、泰国、	中学时他在作元汉英学校苦学英文，取得了好成绩。在 1926-27 年间，就读于福州英华斋高中三年级。他在作元汉英学校和英华斋，学到了新知	1937-42 年期间，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介绍进入《港报》工作，之后在《国际通讯社》任编译，专写经济与国际问题，翻译。1938-	他的公民权在 1959 年大选之前突被吊销，连士升和另一位 SM 也和他一样。但 1959 年后的两三年，他们又先后重获公民权证	1. “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散文中，看他散文中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谦让、宽容、刚毅、敦厚的思想感情。”（许福吉〈长河日落圆〉，《连士升文集

¹⁶³⁰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99、151-152；《李星可资料夹》（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

	/49年抵新。在新约24年。	余。	菲律宾（短暂逗留） （连士升〈多难的越南〉，《回首四十年》，页166 - 170）。	识，为中英文打下基础，也经历了当时的改革浪潮。 ¹⁶³¹ 连士升精通英语，曾翻译了工业史和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史。 ¹⁶³² 大学毕业后他常在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政治大学图书馆读书、研究及写作。 ¹⁶³³ 他同时为著名报章杂志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等撰写或翻译有关中外经济史的文章，自1935年起为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撰写或翻译有关经济的文章，共	1940年并在岭南大学（香港校址）任教。（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 http://www.hstao.com/Lien.pdf ；连士升〈记岭南大学〉，《回首四十年》，页104）。 • 1942-1945年他在越南隐居期间，恐怕日本人注意，用了‘郑德华’的假名，并任福建学校校长两年。 • 1946年在南京时，《中央日报》	书。（李霖〈回忆连士升〉，《连士升纪念文集》，南洋学会，1976，页95-101）。 连士升在南洋商报负责社论时，险些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他的思想有‘急进嫌疑’。（陈雪锋〈红帽子险送走连士升〉，《连士升纪念文集》，页135-137）。 连士升在报馆当主笔时，当时言论自由受限制，他有好几次“差	第八集 - 长天集》页8）。 • 连士升为《南洋学报》筹集出版费用，费心费力（黄望青〈橄榄的味道——忆念连士升兄〉，《连士升纪念文集》，南洋学会，1976，页30-31）。 • 他的谈吐谦卑却有定见、为人热心、鼓励新进（魏雅聆〈怀念连士升先生〉，同上，页32-33）。 • 连士升诚恳、和蔼、不分地位、职业、身份，热心助人（刘蕙霞〈我所认识的连士升先生〉，同	

¹⁶³¹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32-33，44-47。

¹⁶³² 连士升曾被翻译格拉斯《工业史》（N. S. B. Gras, *Industrial Evolution*），克拉判教授（Sir John H Clapham），《德法经济史》（“*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及克拉判教授（Sir John H Clapham）《近代英国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参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100-101，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页11。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页60与页200记这两本翻译手稿尚存于连家。

¹⁶³³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10，71-73。

				11 篇，跨 20 期。 ¹⁶³⁴ 曾聘他为特派员。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11-12）。 • 连士升在南洋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兴日报》特派员，任内曾受命回中国作采访。（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12）。 • 1969 年，连士升出任《南洋商报》总编辑。（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士升纪念文集》，页146）。	不多被驱逐出境”，但因为他的 人缘很好，每次都有人从中帮助，化险为夷。 （连亮思〈连士升生平〉，同上，页 42-147）。	上，页 63-67）。 • 连士升信守承诺，替他找兼职的文墨工作，也邀他写稿。 （林熙〈纪念一位文化战士-连士升在香港的一段日子〉，同上，页 72-78）。 • 他的为人“温文蕴藉，待人和气，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因他常为人排忧解难，戴淮清戏称他为鲁仲连。他有“容人的胸襟，更喜奖掖后进”。他立身处世，深受其师顾颉刚的影响。（戴淮清〈悼亡友连士升〉，同上，页 92-94）。 • 以“温、良、恭、俭、让”形容连士升。（陈雪锋〈红	

¹⁶³⁴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页 3-4，24。

							帽子险送走连士升>，同上，页 135-137)。	
杏影	中国。原籍四川简阳县，但不在四川出生/1945年9月抵新。	1911-5.1.1967.在世56载。	日本（中学及大学，居住十多年）（杏影《书与人·新年怀思》转引自林臻〈杏影先生事略〉，页204）。印度（1941-45，约4年）旅居印度新德里，并在1945年以‘日本通’的身份受聘于印度加尔各答盟军总部。	曾在日本留学，精通中、日、英三种语文，也略懂拉丁文和德文。 ¹⁶³⁵ 他的〈读书偶译〉， ¹⁶³⁶ 翻译了多过250个不同的外国文艺工作者、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改革主义者的文字，也在他的许多其他篇章中引用他们的名言或讲述他们的作品和思想。 ¹⁶³⁷ 他和连士升、李星可、苗秀一样，他们可说是那时跨语系的华人知识分子的代	1. 于1947年抵达新加坡后任南洋商报电讯翻译，兼任华侨中学教职。（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8）。 2. 直到1954年初，南洋商报发生人事变动，当时的文艺副刊编者姚紫‘急遽离职’报馆便请杏影替上，从此开始了他的副刊编者生涯。（杨守默〈做一个副刊编辑的经验〉，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以下记述可能有复杂的背景：“有个时期，他被报馆‘冷冻’了七八个月，什么工作都没给他做”（文兵〈恍见牵头挑灯人〉，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32）。这是否有政治因素不详。	1. “在新华的副刊编辑中，提携后进成绩最显著的，莫过于杏影和姚紫，他们两人，不但在编选稿件上倾尽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把年轻的写作者视为文坛接班人般在细心培育；姚紫因为个人才华高超，所以，他手下的写作者，自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他的编版功夫更是尤其是文坛上无人能及的一绝；而杏影，更是用爱心在编版，他不但把每一位年轻的写作者看成是文坛的幼苗来培育，他甚至写文章、写长信向他们灌输爱心，花尽心血，	在印度期间，结识了李汝琳、金克木、郭史翼，互称‘印度同乡’。（李汝琳〈回忆杨守默〉，页11；李汝琳〈忆故人〉，页37-39）。杏影不刊登对李汝琳捧得过火的文章，但告诉他；不发表攻击李汝琳的文章，也不会告诉他。（李汝琳〈忆故人〉，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38）。

¹⁶³⁵ 杏影〈补白杂记〉，杏影《想想写写》（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页88。

¹⁶³⁶ 杏影〈读书偶译〉，杏影《想想写写》，页117-282。

¹⁶³⁷ 在杏影〈读书偶译〉中，共有250个注上名字的名人名言，另外有38位佚名的名言。其他还有圣经、阿拉伯、印度、德国、伊索寓言的翻译。在其他著作里也常引用外国名人名言。

			（李汝琳〈回忆杨守默〉，页 11；李汝琳〈忆故人〉，页 37 - 39）。	能从外而内的视野透视。由于对多国与多元文艺、不同的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认识，他有宽广的视野和胸襟，他向往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向往成为世界公民。¹⁶³⁸	118）；（叶钟铃〈杏影与《文风》副刊〉，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93）。 3. 1954 至 1967 年间，曾主编以下《南洋商报》文艺副刊： - 《文风》，共 4 年 8 个月，828 期。 - 《新苗》，共 5 个月，45 期。 - 《南洋公园》，1 年 1 个月，共 102 期。 = 文艺星期刊《文化》，约 3 年 7 个月，共 144 期。 《文化》较重视学术性的文章。 1. 《青年文艺》约 6 年 6 个月，共 729 期。 在同一时期，曾同时主编两种副刊。	把它们当成碧玉来雕塑，从文章到人格，毫不放松。姚紫的才情，杏影的爱心，让他们的形象长久地烙印在不少当时的年轻一代写作人的心版上，直至永远。” （刘笔农序，《杏影散文选》（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 10）。 2. “他不仅尽了一个编者的本分职责，用心审阅每一份来稿，进行修改，并尽可能给予发表的机会，甚至进而关切文章以外与作者密切相关的种种事项 - 生活、工作、求学领域遇到的问题几乎无所不有，其中几个还曾经得到他剑及履及的无私支援。”（林臻〈岁月悠悠思悠悠〉，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	

¹⁶³⁸ 杏影〈读书偶译〉，杏影《想想写写》，页 125.

					（参〈杏影主编的《南洋商报》文艺副刊〉，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页 225）。	会寂寞》，页 12-13）。 3. 杏影不喜欢吹捧的文章，也不登骂人的文章。对于稿件中提到的人名和事件，格外小心，为了避免因为确有其人而引致的麻烦，他常替文中人物改换姓名，对事件也要求确定。 杏影要求作者“能惠寄没有火气的批评文，幽默的规劝，无刺的讽嘲，和能以理性说服别人的好文章”。（叶钟铃〈杏影与《文风》副刊〉，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94-95）。 4. 杏影去世后，《青年文艺》还继续出版了 10 期才停刊。原来杏影入院前已编好十多二十期的《青年文艺》给排字房。他在医院初期，	

							还托人从报馆拿稿给他看。（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82）。		
李汝琳	中国河南省沁阳县 / 1947年12月24日抵新。	5. 7. 1914 – 17. 3. 1991. 享年76余。	印度（1944年9月–1947年12月）。应同乡翟君的邀请，到印度加尔各答主编《中国周报》和《中国日报》的文艺副刊，并以李极光等为笔名，发表诗歌和散文。（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页	外语掌握能力不详，但他居住于自建国以来以英语为主要沟通媒介的新加坡，对英语应有一定的认识。	1. 1952–55 期间，《南洋教育》在南洋商报借版位出版，李汝琳为主持人之一。 2. 1948–53 年间任华侨中学教务主任；1954 年加入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担任高级讲师兼华文系主任。 3. 1953–54 年间，新加坡南洋报社与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出版《南洋青年》半月刊，李汝琳为主持人和编委之一。 4. 1958 年开始为青年书局主编《新马文艺丛书》、	在 1959 年新加坡大选前夕被吊销公民权，两三年后才重新获得。年份与原因待查。（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242）。	- 编辑态度认真（刘笔农〈应李汝琳邀同编“新马文艺丛书”的一段往事〉，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141–147）；刘笔农〈作家、丛书编辑李汝琳〉，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30）。 - 选稿‘不避疏’的公正。（原甸〈灵前焚诗 – 悼李汝琳先生〉，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229–231）。 - 推荐并协助作者出版作品（云里风〈敬悼李汝琳先生〉，同上，页221；曾采	1. 在印度认识杨守默（杏影）、金克木、郭史翼，戏称彼此为‘印度同乡’。（李汝琳〈回忆杨守默〉，页11；李汝琳〈忆故人〉，页37–39）。	2. 曾为赵戎出版《海恋》与《芭洋上》，列为《新马文艺丛书》；为赵戎出版《在马六甲海峡》，列为《南方文丛》之一。

			241; 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 同上, 页 98)。		《南方丛书》及《新马戏剧丛书》。 (以上见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 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 (新加坡: 新加坡文艺协会, 2003), 页 241-242)。		〈永康路上少一人〉, 同上, 页 184)。 • 培植新进作者 (马汉〈李汝琳与“新马文艺丛书”〉, 同上, 页 258-261; 曾采〈李汝琳的晚年生活与事迹〉, 同上, 页 171-175)。 • 慷慨助人 (云里风〈敬悼李汝琳先生〉, 同上, 页 221-222)。	
姚紫	中国福建泉州安海镇/1947年抵新, 在新约35年。	1920-18.2.1982. 在世62载。	印尼 (1959年曾任海员, 往返新加坡和印尼), 马来亚 (1955年曾在马来亚宽柔中学任高中部华文主任, 吉隆坡《1958年钟声报》总编辑)。(吴蒙〈姚	虽未能查知他的外语能力, 但他在文章中引用许多外国名著。从他的作品中, 知道他关注时局, 不是井底蛙。	• 1940-41年间 (半年) 曾在福建省永泰税务局任职。在永泰时, 也为莆田的《福建新报》编《新生代》文艺双周刊。(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 《姚紫研究专集》(新华文艺协会, 1997), 页 55. 56、59)。	“他不属于左派, 也不是个右派, 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 诅咒黑暗, 呼唤正义和光明, 敢于吐露心中的愿望。轻蔑别人的误解, 毕生坚持着编和写。”(柳舜〈姚紫 - 一支烟多于焰的火把〉, 《姚紫文学历程》, (新	1. “姚紫跟他故乡福建晋江的先贤李 (卓吾) 一样, ‘忿世嫉邪’……, 在性格上有点像晚唐的罗隐那样, ‘秉性介僻, 不能方圆’。”(韦晕〈狂侠与向禅〉, 《姚紫研究专集》, 页 84-85)。 2. 姚紫常为年青文友逐字逐句的修改文章, 或介绍他们的作	姚紫主编的《绿洲》、《世纪路》、《文艺报》, 刊登不少赵戎的文章。(马崙〈梅花香自古寒来〉, 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学会, 2000), 页 96; 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 《赵戎研究专集》, 页 296)。

			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26）。	• 1947 年前，任厦门《江声日报》编辑，由于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被通缉，但他曾自言一生未参加任何政党。 • 1948 年开始在道南小学执教，1949 年转到晋江学校。¹⁶³⁹ • 1949-54 年转入报馆工作。开始时担任南洋商报的资料室主任兼编辑。 • 曾主编商报《家庭妇女》版，《星期六》周刊、《文艺行列》月刊（纯文艺期刊）和《世纪路》（文艺副刊）。 • 兼任南洋商报所发行的《南方晚	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页 151）。 因卷入反英殖民统治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文艺阵线而于 1954 年 9 月被拘捕，被盘问 3 天 4 夜后获释。（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页 26）。	品给报章杂志发表。还为年青文友介绍工作。（同上，页 86）。	

¹⁶³⁹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6 记姚紫在 1948 年先在道南小学，1949 年转晋江学校，而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页 31 则记姚紫先到晋江学校，后到道南小学。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和吴蒙的记述相同（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页 6。

					报》副刊《绿洲》编辑。 7. 1969 年 4 月 1 日，他应聘主编《新明日报》副刊《新风》，至 1977 年 5 月 31 日离职止。 8. 在南洋商报服务期间，曾办《海报》半年，因报馆不许属下同时办报而停刊。 9. 1954 年 2 月离开南洋商报，创办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月刊。 10. 1955 年，于宽柔中学任教时创办《社会新闻》周刊。只出版三期，执照又被吊销。 11. 1956 年，创办《大地》十日刊。只出版三期即被查封。			

					12. 1957 年主编《九月的风》。只出版 1 期。 13. 1958 年 8 月任吉隆坡《钟声报》总编辑，出版 10 期后被令停刊。 14. 1963 间，出版小说、剧作和评论共 7 册， 15. 1965 年出版《天马杂志》月刊。 16. 1967 年出版《华报》周刊。《天马杂志》和《华报》，都只出版一个短时期即停刊。 以上 2-16 见（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26-27）。			

苗秀	出生于新加坡，原籍广东三水。	1920-10.9.1980. 在世60载。	曾与赵戎、张金燕与梦平于1974年一同到马来西亚小笨珍体验山芭农民生活。（照片收于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无页数） 其他地方不详。	苗秀曾在华侨中学教导英文15年（1956-1971）。	1. 1945年，苗秀与赵戎、夏怀霜等人合编出版《南方文艺》 2. 从1947年9月15日至1949年11月3日兼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的主编，为时两年多。 3 1956-1971为华侨中学英文教师。 4. 1967年与张金燕、李延辉（李汝琳）、柳北岸、赵戎、韦晕、于沫我和陈哲力七人一同出版纯文艺刊物《新野》，负责主编工作共5期，至1968年因经费问题停刊。 5. 《新社文艺》第15、16期的执行编辑。 （1-5 见〈苗秀年	1. 1948年，发生一场‘生活里的大风暴’，使他的一堆书散佚。（苗秀〈买书小记〉，《文学与生活》，页162）。 2. 1955“今年下半年，我被文氓们挤出了那个所谓‘民众喉舌’的机构”。（苗秀〈关于我的疏懒〉，《文学与生活》，页178）（详情无可获知）。 因为讲了真话，被“‘挤’出了那个所谓文化机构”。（苗秀〈我的忏悔〉，《文学与生活》，页180）（详情无可获知）。	- 牢记别人对他的恩惠：曾作有-〈我的师傅〉（收于《第十六个》（新加坡：南洋印刷社，1955），页98-112）；-〈少年时代〉，（收于《边鼓》（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3；-〈从听故事到讲故事〉（收于《文学与生活》，刘延陵主编《东方文化丛书》（星洲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57），页151-156）。 - 教学方式，稳健而踏实（尤今〈谈我师苗秀先生〉，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34）。 - 扶掖后进，如为谢克写书评《新人的气息》，给了谢克很大的鼓励。。（谢克〈自学成功的作家-苗	1. 1945年苗秀与赵戎、夏怀霜等人合编出版《南方文艺》。（〈苗秀年表〉，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213；林锦〈苗秀与新野〉，同上，页193）。 2. 在1948年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论证中，苗秀与赵戎站在同一阵线。 3. 1967年与赵戎、李汝琳等七人一同出版纯文艺刊物《新野》。（林锦〈苗秀与新野〉，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193）。 4. 1971-75年间与赵戎、钟祺合编《新马华文学大系》中的《剧本集》。（林琼〈文艺理论批评家-赵戎〉，《赵戎研究专集》，页69）。 5. 1954年，谢克出版

					表》，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212-216；陈世俊〈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同上，页 16-17；林锦〈苗秀与《新野》〉，同上，页 193。 6. 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苗秀编《理论集》和《小说二集》，并与赵戎、钟祺合编《剧本集》，此 3 集于 1972 年至 1973 年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间陆续出版。		秀》，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30）。	了短篇小说集《为了下一代》，一向不写书评的苗秀，破例写了一篇题为《新人的气息》的书评，交给南洋商报杏影主编的文艺副刊《文风》发表，给了谢克很大的鼓励。（谢克〈自学成功的作家-苗秀〉，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30）。
赵戎	出生于新加坡，原籍广东南海。	21. 3. 1920 - 27. 8. 1987. 享年 67 余。	中国（曾至新疆探访幼年好友及邻居刘承德。刘承德从新加坡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后落户新疆。赵戎远至新疆探	幼年只读过两年书（马仑〈梅花香自苦寒来〉，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96），但自学成功。 自言对于各家的文学作品，不论体裁，都没有偏见，	1. 赵戎为吼社（当时新加坡唯一的诗人团体，组织于 1938 年）发起人之一，曾借南洋商报及总汇报版位出版诗刊多期。（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学辞典》，（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	赵戎自言在 1959 年“曾经受过两次最严重的生活底迫害，几乎使我发疯。”（赵戎〈后记〉，《海恋》，（李汝琳主编，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简体字初	1. “注重友情、富有善心、爱憎分明、刚正不阿的性情中人”（赖伯疆〈我印象中的新华作家-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36）。 2. 言而有信，准时	<u>1. 对李汝琳的评论</u> 赵戎〈论李汝琳的创作与功业〉，肯定李汝琳的贡献，也提出他小说和诗歌的缺点。（见《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91-306）。在赵戎的多篇文章

		访旧友，并以小说《刘承德》写其事迹）。 （赖伯疆〈我印象中的新华作家－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学会，2000），页36）。	且虚心拜读。对于英美法俄日的名家作品也尽量阅览。（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296-297）。 “（赵戎）阅读广泛，包括中外作品。如外国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高尔基、杰克·伦敦、史坦培克、雷马克的作品；不囿于文学作品，也阅读考古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的书籍。” （赖伯疆〈我印象中的新华作家－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37） 虽不详赵戎外语掌握能力，但从他阅读中外书籍的广泛以及他居住于建国以来以英语为主	联合教育出版社出版，1979），页197，433）。 2. 1945年开始在裕廊小学任教；1952年被调往中正中学。（刘笔农〈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51；君绍〈忆赵戎〉，同上，页57）。 3. 自述曾主编，《琼潮报》及《爱华周报》。《琼潮报》与《爱华周报》皆被停刊。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197；骆明〈赵戎生平简介〉，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21）。 4. 1967年，与苗秀、柳北岸等出版《新野》。 （https://blogs.ntu.edu.sg/2017/05/20/zhao-rong/）	版，页179）。不知是否与政治有关。详情无可获知。 赵戎在〈文学生活底一页〉自言他“多年来遭受小人的奚落、嘲笑、辱骂，与踩踏。”赵戎在〈文学生活底一页〉《赵戎研究专集》，页296）。详情无可获知。	交稿。邮寄来不及，还亲自送到。（骆明〈我与赵戎的一段来往－聊代编后话〉，同上，页299）。 3. 写作、编辑态度认真，深入生活（赖伯疆〈我印象中的新华作家－赵戎〉，同上；页37；马崙〈梅花香自苦寒来〉，同上。页109-113；君绍〈忆赵戎〉，同上。页58-60）。	里，都对李汝琳的催稿表示感激。 <u>2. 对李星可的评论</u> - 赵戎给予李星可的戏剧研究和小说翻译高度的评价。“在马华作家群里，李星可是个首屈一指的戏剧家和翻译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突出的，这表现在他的剧本创作，中国戏剧研究和小说翻译上，在南来作家中，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1967），页98）。 - 在语言修辞上，赵戎也认为“李氏创作在修辞上的简练明快，是

				要沟通媒介的新加坡，对英语应有一定的认识。	edu.sg/lib-cuhk08/?page_id=39) 5. 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赵戎编《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和《史料集》，并与苗秀、钟祺合编《剧本集》，此4集于1971年至1974年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间陆续出版。		合乎汉语语法底逻辑的，有高度底艺术性”（同上，页100）； • 对李星可处理剧情手法赞赏有加。（同上，页104-130）。 • 和夏衍相比，“夏氏剧作虽多，却全是以中国为题材，李氏则除了几个历史剧外，都是取材于当地的。所以李氏的剧作在马华文坛上是一份重要的果实，他是以马华文艺家的身份而实践的。”（同上。页99）。 • 赵戎在《论马华作家与作品》的〈后记〉中提到，他曾在星洲日报发表长达7万字的〈李星可论〉。此处只取论李星可戏剧的部分。

								赵戎的〈李星可论〉可作为研究李星可的参考资料之一。 - 指出李星可曾“与邵荃麟等组织国际性的‘中法文艺协会’，积极展开抗战宣传工作，厥功殊伟。”（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页98）。 <u>3. 与姚紫的关系</u> - 赵戎在姚紫主编的《世纪路》发表过不少文章。（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赵戎研究专集》，页296）。 <u>4a. 与苗秀的关系</u> - 苗秀向赵戎拉稿，赵戎在苗秀主编的晨星副刊上发表文章。（同上，页295）

							• 1967 年，张金燕、李延辉（李汝琳）、柳北岸、苗秀、赵戎、韦晕、于沫我、陈哲力组织‘新野社’，出版《新野》纯文艺刊物，（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学辞典》，页 435，林锦〈苗秀与《新野》〉，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 193）。 • 与苗秀、钟祺合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集》（林琼〈文艺理论批评家 - 赵戎〉，《赵戎研究专集》，页 69）。 <u>4b. 对苗秀的评论</u> • 写〈苗秀论〉，对苗秀的艺术观、人生观和创作态

								度、都有高度的评价 • 苗秀的作品，每一篇都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每一篇都有其真实的价值。 • 苗秀有‘自创的’、“独步的”、‘突出的’艺术风格。 • 创作态度严谨，但观察力还不够深刻。 赵戎认识苗秀 40 多年（赵戎在 1953 年发表的〈苗秀论〉，记述他与苗秀相处将近 20 年），直至苗秀于 1980 年离世。（赵戎〈苗秀论〉，收于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理论集》，页 151-161 及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128-140）。

附录 4：新华七位华文作家经历简览

	出生地	生卒年	抵新日期	在新年日	英语能力	教育界工作 ¹⁶⁴⁰	办报/写作	政治牵连	
李星可	中国	1913-96	从 1945 至 1949 年	25 ¹⁶⁴¹	√	√	皆有	√	曾于 1971 年 5 月至 1973 年初，入狱 22 个月。
连士升		1907-73		24	√	√		√	1959 年公民权曾被吊销，还差点被驱逐出境。
杏影		1911-67		22	√	√		不确	曾被报馆冷冻了七、八个月。原因不详。
李汝琳		1914-91		44	不确	√		√	在 1959 年新加坡大选前夕被吊销公民权，两三年后才重新获得。
姚紫		1920-82		35	不确	√		√	1954 年 9 月被捕，被盘问 3 天 4 夜后获释。
苗秀	新加坡	1920-80		60（一生）	√	√		不确	自言在 1948 年有生活大风暴，1955 年被挤出‘大众喉舌’。不确是否与政治有关。
赵戎	新加坡	1920-87		67（一生）	不确	√		不确	自言在 1959 年两次受迫害。不确是否与政治有关。

¹⁶⁴⁰ 连士升曾在中国和香港任教，姚紫曾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任教。其余都曾在新加坡任教。

¹⁶⁴¹ 李星可 1949 年从西贡到新加坡，1973 年出狱后曾到日本，及法国，再到澳洲和儿女居住。虽时而回新，但长居新加坡时间应约为 25 年。

附录 5：李星可 生平·著作·他人评论

李星可（11. 4. 1913 – 1996）

李星可使用的笔名有蒂若、赵瑞、康吉父（其二子名成康、成吉。康吉父意其二子之父）。

1. 生平·大事记

	生平、重要事项	日期	内容	备注/出处
1	出生	1913 年 4 月 11 日	自言出生于公历 1913 年 4 月 11 日，农历 1913 年 3 月 5 日（《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3 记为癸丑年 5 月 3 日，应为笔误，因手稿为 1913 年 3 月 5 日，与公历日期吻合）。也有许多其他记载记他出生于 1914 年。说他是出生于 1914 年者可能是误读了他对自己出生年份的解释。	见《李星可资料夹》中李星可自填的表格（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91），页 3。
2	天主教徒	自幼	一家人都是天主教徒 - 父母子女及他自己。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3。
3	学法文	11 岁，1924 年	11 岁开始学法文，就读于南堂法文专门学校。因父亲从事钟表业，希望他学成后到瑞士学习钟表。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4、7，111。
4	与比利时结缘	未注明	于南堂法文专门学校毕业后，学校介绍他到‘度量衡制造厂’工作。所长为比利时留学生，容许他把工作带回家，一星期只需来厂两天。让他得以继续上大学。所长的善意与李星可日后对比利时的看法应有关系。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7。

5	于中法大学念大学，修中法文学并在大学图书馆及天主教會的‘宠光通讯社’兼职。	1933-1935	中法大学图书馆的兼职工作使他饱览许多珍贵藏书，写作并于中法大学月刊发表十数篇文章。 在‘宠光通讯社’的工作，是他‘正式进入新闻界’的开始，这工作及他在中法大学月刊发表的文章，使他得到奖学金到比利时鲁文大学读中古哲学。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3-15，171-172。
6	得奖学金到比利时及巴黎。	1935 年	得到奖学金到比利时鲁文大学读中古哲学，一年后又得研究生奖学金（fellowship）到巴黎研读中古历史，共得双份奖学金。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3-15，171-172。 李星可〈纪念亡妻〉，《十八年后归去来》（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89），页 1，记他 1935 年‘负笈西欧’。
7	到伦敦再回比利时	不详。应是 1935 年后	得陆徵祥指点，认为英文比法文有用。决定转入英国伦敦大学。但到了伦敦后听闻中日战争爆发，又回去比利时。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6-18。
8	回去中国，目的是参战，但未能如愿。	1936 年（推算）	得陆徵祥介绍，从比利时到巴黎，认识杨虎城将军，参加‘旅欧华侨第一次回国参战代表团’回去中国、途经新加坡。在香港下船后，随同行者的安排，从珠江到梧州、桂林、广西、汉口、郑州、西安。在西安，明白不是参战之地，再到延安。在延安的鲁迅学院见到毛泽东，也发现延安的高级领导层和国民党政府一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每礼拜六开一次西洋式的跳舞会。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21-36。

9	在汉口加入航空委员会，担任法国空军志愿队副队长。	1938 年	他从延安到渝州，再到西安、周至、汉口寻找生计。在他走投无路、想自我了结之际，遇到了正在找他的‘法比瑞同学会’，请他担任法国空军志愿队的副队长，在汉口处理行政、人事以及翻译的工作。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36-40。
10	开始到南洋 第一站是北越	不详	被调往海防（北越的海港），负责替空军运输飞机汽油。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48。
11	再到缅甸	不详	转入军需处，担任其驻缅代表。在缅甸，他到过仰光、曼德里、雅玛町、腊戍、八莫、美庙和畹町。了解南洋机工在滇缅公路上的运输工作。凭他的机智，解决了许多难题。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48-64。
12	到印度一年后回到重庆	1942 年（推算）	去印度了解军需。 从回国参战至今共 6 年。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69-70。
13	接受戴高乐战斗法国代表团邀请，为法国新闻处中英文部主任。	不详	努力为法国宣传，自言原因有二：法文是他的‘第二母语’，当时法国与中国一样，正处于苦难中，因此他对法国深为同情。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70-72。
14	日本投降后回到北京探亲及在农工银行负责稽查工作。	不详	接受农工银行职位，目的是到北京探亲。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72-73。
15	被邀到济南交通部的总务处工作。在	1946 年（推算）	在济南交通部的总务处工作一年。当时官场风气不良，通货膨胀情况非常严重。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74-

	济南与宁荣萱结婚。		与宁荣萱共有六个子女。	76。 李星可〈难得的人情味〉，《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16。
1 6	加入中央社，同意去安南西贡，自此定居南洋。	1947 年（推算）	同意去安南（越南古称）是为了生活：“因为那里是热带，一条裤子跟一件衬衫可以过一年，而且出产有名的‘贡米’，总会有的吃”。在西贡住了约两年半。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76-77。 同上，页 89。
1 7	从西贡（现胡志明市）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成立法新社分社。	1949 年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他和法国政府、越南人的‘独立政府’、越盟都有交往，关系复杂，加上中央社也关闭，他必须离开西贡。他曾建议成立法新社，虽法新社尚未成立，但已被聘用为法新社特约通讯员。 得法国总领事的支持，在新加坡成立法新社分社。后发展为东南亚总社，包括印尼、马来亚、曼谷和菲律宾。 后来他被上司抢功、陷害。他一气之下离开法新社。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77-80。 郭蕙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时段是 1919-1949 年，但未包括李星可。一个可能性是未能确定李星可南来的年份。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亦未包括李星可。
1 8	有功于南大的创建 a. 和庄竹林一同倡议成立南	a. 李星可由西贡移居新加坡时。当时他仍在法新社（日	自言他和庄竹林最早倡议成立南洋大学。先开办大学先修班，但办不成。后陈六使认为应办大学，便起来领导。 “南大不是陈六使首先倡议的，不过没有陈六使，南大不会办得起来。真正的发起人是我和庄竹林”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83-85。 李星可〈纪念亡

	洋大学 b. 并发动新马平社（新加坡、檳城、柔佛平社）为南洋大学义演。	期不确）。 b. 1953 年 7 月 25-27 日新马平社为南洋大学义演。	庄竹林认为有需要开办大学，李星可同意。他们决定先在中正中学开大学先修班，但因雨天月眠路积水，来上课的多数是女生望而却步，大学先修班就只开了一年。当陈六使问起，便决定由他来办。 为筹款，李星可发动新马平社（新加坡、檳城、柔佛平社）于 1953 年 7 月 25-27 日为南洋大学义演，李星可妻宁荣萱挑大梁。筹得叻币二十七万元。	妻》，《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8-9。 李星可〈纪念亡妻〉，《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1-10。
19	进星洲日报任副主笔，并在法国大使馆当顾问、南洋大学及师资学院教席。	1959 年	他离开法新社后，1959 年进星洲日报任主笔。在星洲日报时与南洋商报对华文教育问题打笔战。 康吉父《胡文虎传》中也有此事的描写。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99，152-164。 〈质问南洋商报〉，〈南洋商报为什么哑口无言〉，见《政论选集》，页 313-314, 318-319。
20	担任星洲日报的主笔	1959 年 - 1971 年	在星洲日报发表的社论，选 165 篇结集于《政论选集》。最迟的一篇政论文章写于 1963 年 4 月 21 日。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06-107。 《政论选集》自序言 1959 年底他加入星洲日报。书后未注出版年份。

				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32-139, 155-162; 韩山元《李星可与华文报史：从李星可谈到报史研究》 http://www.sgwratings.com/1436/viewspace_17293.html 提 1971 年的这场报业风暴为‘黑色行动’。 1971 年 5 月 3 日各大报章都以头版刊载这则新闻。见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藏，新加坡南洋商报 1971 年 5 月 3 日头版（Microfilm Reel 6731），英文报 The Straits Times（Microfilm Reel NL06749）和 Singapore Herald（Microfilm Reel 6731），以及马来文报 Berita Harian（Microfilm Reel NL6766）。

2 3	在南大代课	时段不详	曾为凌叔华代课。在庄竹林任南大校长时，在中文系教了一年课。（根据南大校史，凌书华于 1956-1959 年在南大任教。）	1.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85。 2. https://www.1xuezhexue.com/Qk/art/404086?dbcode=1&flag=2
2 4	在师资学院教语音训练十年	时段不详	提倡‘标准华语’，自觉努力没有白费。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85-86。
2 5	建议法国邀请李光耀到巴黎访问	1974 年或稍后	在法国领事馆兼职时首次向法国领事馆大使 Hutte ¹ 建议邀请李光耀到巴黎访问，但因法国国内事故，李光耀巴黎之行未成。另一大使 Gasseau 刚上任后，李星可再向他建议李光耀到巴黎访问，此次李光耀成功成行。 ¹ Hutte 在 1968 年成为法国驻新加坡大使（Maxime Pilon & Danièle Weiler, <i>The French in Singapor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1819-today)</i> ,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Pte Ltd, 2011), p. 179.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87-88, 99。 据新加坡国家档案记录（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法国大使 Jacques Gasseau 于 1974 年 5 月 4 日向当时新加坡总统薛尔斯呈递国书。 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photographs/record-details/dd2e778f-1161-11e3-83d5-0050568939ad

26	被法国外交部邀请去巴黎，住了五年。 被法国赠于‘国家功勋骑士奖章’。	1973-1978 年	获颁‘国家功勋骑士奖章’原因：“曾经两次建议，安排邀请李光耀去巴黎访问，促进了法国跟新加坡的邦交”。	李星可《十八年后归去来》中〈汉学家真死啦！〉说明赴法年份为1973年（页27），〈难得的人情味〉说明在法国住了五年，及获颁‘国家功勋骑士奖章’的原因（页16）。
27	退休后到悉尼与孩子同住	约1978年后	在巴黎退休后，与孩子住在悉尼。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180。
28	于1996年离世。	1996年（离世月日不详）	在世83年。	梁秉赋《李星可其人其言》（文化沙龙人物点评系列4/2008）。

2. 李星可的著作与译作

	书名	性质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出处
1	诗的艺术与魏伦	是一篇“用西洋人的方法研究中国古诗”的长文	1930年代	不详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163，言此长文作于五十几年前，在南大一个文学团体的刊物转载过。
2	十几篇有关政论文章	论文	1933-35	中法大学月刊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12。

3	灰古读及其相关诸问题	论文	1933-35	中法大学月刊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63。
4	我谈京戏	评论、戏剧	1955	新加坡：南洋印刷社	
5	怎样欣赏中国戏	评论、戏剧	1957	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出版社：书后页注为星洲：星洲世界书局。
6	桥上	不同形式的作品	1957	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包括〈母亲〉（译诗）、〈借纱笼〉（仿河南坠子）、〈生财之道〉（仿北京对口相声）、〈桥上〉（广播剧本）、〈大众顾问〉（独幕剧）。
7	借纱笼	仿河南坠子。传统上河南坠子以说唱相间方式演述长篇连回故事	1957. 其中一段于 31.8. 1956 年在南洋商报发表	收于《桥上》（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57）	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2005）页 99 记此文为〈借纱笼〉；李星可《桥上》及〈从《新社》想起南洋文艺问题〉，《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78，皆记为〈借纱笼〉。当以作者李星可所记为准。
8	报穷	戏剧	1958	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馬文艺丛书》。收录广播剧〈桥上〉（独幕 PARADOX）、独幕剧〈月饼〉及三幕剧〈报穷〉。
9	餐风饮露（韩素音著，李星可译）	小说	1958/2005	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马文艺丛书》
10	乱世春秋：电影剧本四种（乱世春秋 - 齐宫外史 -- 同室干戈 -- 東墙禍）	电影剧本	1959	新加坡：青年书局	据吴天才《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页 247，《鵲鴿恨》后来收在《乱世春秋》内，改名为〈乱世春秋〉。
11	标准普通话	北京话正音研究	1959/1963	新加坡：青年书局	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2005），页 99，记此书为北京话正音研究。

1 2	鵲鴿恨	历史剧	1960	新加坡： 青年书局	鵲鴿（同脊令。比喻兄弟），后改名为〈亂世春秋〉，见前注 9。
1 3	余风遗韵蔚为洪流：五十年来的新马戏剧与电影	评论	1960	檳榔嶼： 光华日报有限公司	收于刘问渠主编《一九一零－一九六零：这半个世纪》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页 101-108。
1 4	从殖民地到独立自治	评论	1960	檳榔嶼： 光华日报有限公司	同上，页 151-162。
1 5	青山不老（韩素音著，李星可译）上下集。 韩素音（1917-2012）	小说	1960/ 2004	新加坡： 青年书局	《南方文丛》
1 6	快艇	多幕劇	1960/ 2005	新加坡： 青年书局	《南方文丛》之一。包括三幕剧〈快艇〉、五幕剧〈钓金龟〉、两幕剧〈绑票〉。
1 7	绿洲：独幕剧选	独幕剧	1961	新加坡： 星洲维明公司	包括广播剧〈桥上〉、独幕剧〈鬼〉、〈荒岛〉、〈大众顾问〉、〈綠洲〉，哑剧〈赌徒〉、〈哲学家〉、〈割胶〉、〈降头〉、〈梦〉，以及〈谈谈哑剧〉一文。
1 8	南洋与中国戏剧	评论、 戏剧	1962	新加坡： 南洋学会	《南洋学会丛书》：3
1 9	政论选集	评论	1963 （推算。书中未注明出版日期。最后一篇社论写于 1963 年 4 月 4 日。国大图书馆目录记为 1963 年	出版者： 李星可； 承印者： 兴隆印务有限公司	为 1959 年至 1963 年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时所写，共选 165 篇。 （国大图书馆藏书《政论选集》内页有李星可‘拿督邵仁枚海正，著者敬赠，一九六五年六月’亲笔字。）

20	标准华语	评论、教学	1964	新加坡：新马文化事业公司	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2005），页 99，记此书为北京话正音研究。
21	中国现代独幕剧选（欧阳予倩等著；李星可选註） 欧阳予倩（1889-1962）	戏剧	1966	香港：宏智书局	包括五劇： 1. 歐陽予倩著《同住的三家人》 2. 丁西林著《三块钱国幣》 3. 田汉著《洪水》 4. 洪森《五奎橋》 5. 曹禺《正在想》
22	曹禺原著，李星可注释《日出》	戏剧	1966	新加坡：青年书局	
23	政论新集	评论	1967	新加坡：东方文化企业	共 77 篇
24	政论近集	评论	1968	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	共 84 篇
25	胡文虎传	传记	1984	香港：龙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文艺书屋发行	署名为康吉父著。康吉父即李星可（其二子名为成康、成吉，故名康吉父）。
26	华人的信仰与宗教	杂文	确切日期不详，应于 1984. 4. 2 之前	《星云》版	萧依钊《一位传奇人物李星可》（星洲日报 1984. 4. 2）记此文与〈千奇百怪的中外婚姻〉为李星可近作。以此推算，此二文应写于 1984. 4. 2 之前。见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86。
27	千奇百怪的中外婚姻	杂文	同上	《星云》版	见注 24.
28	政论选集外编——十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远景	评论	1988	新加坡：国际图书有限公司	包括自序共 28 篇。书末列出作者著作目录。
29	十八年后归去来	评论	1989	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	

30	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	自述	1991	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	主要收录 1987 年国家档案局的访谈记录，详细的记述了他的生平、许多相关的人和事、华文教育、‘五月风暴’、他被捕入狱和出狱的经过，他和李光耀的关系及对新加坡的看法。 有关维护华文教育及‘五月风暴’，他和李光耀的关系及对新加坡的看法见此文页 18。
31	甲骨学目录并序	汉学研究	未注明是否曾发表		于中法大学图书馆兼职时研究甲骨学成果。《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1。
南洋大学历史参考资料目录（阅览日期：27. 6. 2019） https://eps.ntu.edu.sg/client/en_US/NanyangUniversityBib/search/results/?ic=true&qu=%E6%9D%8E%E6%98%9F%E5%8F%AF&te=ASSET					
32	“戏剧之写作与表演”大纲(南大文学院学术演讲)	戏剧	1958 年 6 月 4 日	新加坡：南洋商报	
33	星加坡高等教育问	评论	1966	南洋文摘第 81 期（第 7 卷第 9 期）	
34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Mr. LY Singko (李星可) Interviewer: Lim How Seng 林孝胜访问; Interviewee: LY Singko 李星可 口述	口述历史	1987 (1987-04-15 Series) 共 9 卷。	Singapore Oral History Centre	类别: Political History in Singapore 1965-1985 新加坡政治发展史. 李星可也将访谈记录完整地收录于<自传之一章>，《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170。书中前言及‘答客问’都收于访谈第 9 卷的附录中。只有最后的一篇萧依钊的《一位传奇人物李星可》（星洲日报 1984. 4. 2）不在口述历史的访谈记录中。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资料				
3 5	李星可资料夹	资料夹	未注 明日 期	新加坡国 家图书馆 (Call number: Chinese C810.092 LXK) (BRN: 12536319)	资料夹含: 1 张与他人合影的彩色照片, 2 份作家简介, 1 份为“新马华文写作人辞 典”填写的表格及 4. 作品〈一位汉学家之死〉。
	《政论选集外编—十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远景》(新加坡: 国际图书有限公司)(1988) 列于书后〈作者著作目录〉中共 25 本。以下为上述未列出之作品:				
3 6	曹禺《日出》		未注 年份	李星可	
3 7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hort Stories	短篇小 说	1967	London: Heineman n	应与《政论选集》后页的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hort Stories 为同一本。
3 8	政论今集	政论文	1971	未注明出 版社	
3 9	Hanoi, Peking,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历史	1976	未注明出 版社	
4 0	毛泽东…(日 文)	不详	1977	Tokyo: Simui Press	应是日文著作
4 1	The Fall of Madam Mao	杂文	1979	New York Vintage Press	
4 2	Reunion and Other Stories	短篇小 说	1980	London: Heineman n	

未刊著作：

李星可《政论选集》后页，〈本书著者未刊著作〉，列出以下作品：

2. 中国戏剧史
3. 美国与美国人
4. 学术论文集
5. 爱与恨（小说）
6. 古城
7. 后方
8. 滇缅路上
9. 凯歌归
10. 烽火窗外
11. 残灰集（杂文）
12. 变色龙及其他
13. 变色龙（剧本）
14. 剧评选集
15. 亚非作家短篇小说选
16. 欧美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选
17. Talks on Peking Opera
18.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 Chinese theatre and Its Masks
20. The Clowns in Chinese Theatre
21. Merdeka Bridge and Other Plays

3. 他人对李星可的评论：

	作者 / 出处	评论	备注
1	《猎户》编者及作者（李星可致《猎户》文写于 1988 年 3 月 19 日。《猎户》文应刊于此日之前。	“李星可被认为是政治评论家，严格说来，不是作家。”（《猎户》编者及作者）。李星可举出赵戎对他的评论及自己的著作，对此加以详尽的反驳。	李星可〈从《新社》想起南洋文艺问题〉，《十八年后归去来》，页 76-79。
2	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见《论马华作	1. 李星可曾与邵荃麟等组织国际性的‘中法文艺协会’，积极展开抗战宣传工作，厥功殊伟。（赵戎〈论〉，页 98；李星可	李星可〈从《新社》想起南洋文艺问题〉，

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98-123。（2005年为简体字版。繁体字版出版于1967年）	〈从〉，页77） 2. 在语言修辞上，赵戎也认为“李氏剧作在修辞上的简练明快，是合乎汉语语法底逻辑的，有高度底艺术性”（赵戎〈论〉，页100；李星可〈从〉，页78） 3. 在剧情处理上，“李氏处理剧情的手法是第一等的，人物的出场与退场，故事的伏线，都显得天衣无缝，并无斧凿痕迹，对于剧情效果方面，也极为小心……”（赵戎〈论〉，页115） 4. 赵戎列出李星可的著作和译作有十余种，并将它们分为4类： （1）剧本创作 - 多幕剧、独幕剧、历史剧、哑剧，共20个剧本。 （2）中国戏的研究与分析，共116则。 （3）翻译 - 长篇小说（青山不老）、中篇小说（餐风饮露）、诗歌（母亲）以及马华创作（未说明创作名称）。 （4）其他 - 评论现实问题的《政论选集》，仿河南坠子的〈借纱龙〉，仿北京对口相声的〈生财之道〉，北京话正音研究的《标准普通话》、《标准华语》等。 （赵戎〈论〉，页98-99；李星可〈从〉，页77-78） 5. 李星可的独幕剧，有一类高谈哲理，如〈桥上〉、〈鬼〉、〈荒岛〉，另一类反映现实，如〈月饼〉、〈大众顾问〉、〈绿洲〉。前者说出了‘现实底真理底一面’，后者更出色更有社会意义。（赵戎〈论〉，页120-121） 6. 赵戎认为李星可“为马华文艺界创作了三个多幕喜剧，这成绩，即使在中国也确是空前的，难能可贵的。那么，李氏可称为唯一的马华戏剧大家了。”（赵戎〈论〉，页101；李星可〈从〉，页78）	《十八年后归去来》，引述赵戎对他的评价（页76-79）。 有关中国戏的研究与分析，李星可〈从《新社》想起南洋文艺问题〉，只共记112则（页77）；而赵戎〈论〉共记116则（页99）。 赵戎〈论〉，页99所记〈借纱龙〉应是〈借沙笼〉。李星可〈从〉，页78记为‘仿河南坠子的〈借沙笼〉’，应以李星可所记为准。

		7. 赵戎认为“李氏的五个哑剧，就内容来说，只有《割胶》一剧较差，就效果来说，则推《降头》为最好了。……戏剧家李星可对于哑剧是个有心得的人，我相信他能使哑剧直立起来底。”（赵戎〈论〉，页 122） 8. 比较吴天和李星可，在创作上，吴天‘输李星可一筹’，但在排导方面，李星可‘却不能与吴天相比’。和夏衍相比，“夏氏剧作虽多，却全是以中国为题材，李氏则除了几个历史剧外，都是取材于当地的。所以李氏的剧作在马华文坛上是一份重要的果实，他是以马华文艺家的身份而实践的。”（赵戎〈论〉，页 99） 9. 赵戎给予李星可的作品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在马华作家群里，李星可是个首屈一指的戏剧家和翻译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突出的，这表现在他的剧本创作，中国戏剧研究和小说翻译上，在南来作家中，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赵戎〈论〉，页 98） “总观李氏在剧作方面的贡献，实在是多彩多姿的，不论是多幕剧或独幕剧，悲剧或戏剧，哑剧或广播剧等等等，无一不能，无一不精，……李氏剧作底成就，已为马华戏剧界写下最光辉灿烂底一页。”（赵戎〈论〉，页 123）	
3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戏剧》，（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页 121-122.	指出李星可戏剧的 4 大特色： 1. 文字隽永，富哲理性，以《桥上》为代表 2. 采取喜剧风格，即使写悲剧，仍是喜剧式笔调 3. 富西洋戏剧色彩 4. 除历史剧外，一律描写本地现实。 李星可的剧作，反殖时期未有上演记录。60年代有部分搬上舞台。（页 121）	

		詹道玉也引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论马华作家与作品》中赵戎对李星可处理剧情的评述以及赖伯疆对李星可艺术手法的肯定。（页 122）	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论马华作家与作品》，页 98-123。
4	赖伯疆《东南亚戏剧概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页 119-120.	李星可曾“在重庆与老舍、茅盾、曹禺、曹靖等人组织国际性组织〈中法文艺联络社〉，开展对外文化联络工作”（赖伯疆，《东》，页 119） “善于通过着力刻画少数几个人物出场，以喜剧的讽刺笔调描写热闹和活泼的场面，揭示出某个社会问题”（赖伯疆，《东》，页 120；詹道玉，《战》，页 122）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戏剧》，（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页 122 也引用赖伯疆文。
5	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s in Malaya”, <i>Community and Nation -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i>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pp. 281-287.	王赓武认为李星可是两位“最出色的剧作人”之一： “新加坡也有几齣好的戏剧创作，但出现得较晚。最出色的剧作人有两位，一位是李星可，他虽在中国已是剧作的老手，但也很快的投入了马来亚的戏剧创作中。另一位是年轻的剧作人林晨。我虽没看过他们剧作的演出，但从他们的剧本中，觉得这两位都很快可以从写独幕剧，进而写长剧。”	

6	新加坡文献馆 (未注作者名) 《回顾华文报业风暴是非》 21/02/09	“李星可的《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1991)，是从当事人的自述中提及五月风暴涉及的一些事件。《乱世沧桑》是一本口述历史记录，所以结构难免散漫，其中一些谈话不符史实，一些谈话前后矛盾。虽然如此，书内提及的一些个人事故经历还是足以引发研究学者对某些事件是非的置疑。重要的是，这是当事人对事件的回忆。另外，从自述中，研究学者也可一窥国共两派的知识分子和人脉关系如何塑造了新加坡华社的内在复杂性。” 五月风暴： “李星可的三段描述是记载有关答复李光耀社论的来龙去脉，主要指出社论是陈振夏通过李有成下旨传达，而他本人是按旨意办事。根据《乱世沧桑》，陈振夏的女婿是一名部次长人物。因此，李星可针对性的指证陈振夏所扮演的角色，并颇费周张重复他的人脉关系，以及详尽记述事发经过的目的就不知是否另有不可明言的陈述？如果李星可确是另有所指而又不可明言的内情，那么这其中的一个可能性是李星可认为‘政府是始作俑者’。因为在一些新加坡文献中就有说法认为 1950 年代的一些政治事件，如福利巴士工潮的暴乱就是由政府特务为了达到一些预定的政治目的而策动挑拨引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事情是否真是如此还有待学者去考证，但显而易见的是，整顿新闻业的全盘操作确是先谋而后动。” 华文沙文主义： “李星可如何看待华文沙文主义的指控？李星可否认这一指责：‘我根本不是沙文主义者，我从来是主张多种语文教育的。这有我多年来的写作可以证明。我自己就是从这一个多语文国家来的。’” 华文教育： “李星可如何看待大事宣扬华文教育的指责？李星可认为：‘这个指责本来是莫须有	https://www.sginsight.com/xip/index.php?id=2312 《回顾华文报业风暴是非》此文带有政治色彩，本论文只参考其史实记录。

		的：华文报纸当然注重华文教育，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命线，未来前途所系的问题。如果没有华文教育，没有人懂华文，那还有谁看华文报？’。李光耀理应不会否定这个说法，因为李光耀就是认为华校学生人数大减不利华文报业，所以从市场的角度强调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必须合并成联合早报以确保生存。”	
7	梁秉赋《李星可其人其言》 （文化沙龙人物点评系列 4/2008）	记李星可生平及评述其社论。尚未能搜阅全文。 内容概要： “李星可（1914-1996）是新加坡的著名报人。他出生、成长于北京，自小接受法文教育，曾留学比利时与法国。中国八年抗战期间，李星可任职于中国航空委员会，军需署与中央社，在印支半岛工作。1950 年前后移居新加坡，任《益世报》总编辑，并协助法新社在本地创办其东南亚总分社。李星可曾执教于中正中学，也在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兼任讲师，亦是一位文坛健将。但他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曾发挥过最显赫之影响的，是其撰写的社论。李星可 1959 年底进入《星洲日报》，出任主笔，专写社论。1971 年 2 月，转投《南洋商报》，继以社论褒贬时政。但却在同年 5 月，因言获罪，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直至 1973 年始获释。这一讲座拟对李氏的社论作一回顾，并重温我国社会的一段发展历程。”	梁秉赋《李星可其人其言》 （文化沙龙人物点评系列 4/2008）中只有内容概要。 文化沙龙人物点评系列 4/2008-《李星可其人其言》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wordpress.com)
8	区如柏 《云南园里的李星可》， 20.10.2013； 章星虹《谁为韩素音做中文翻译？》（联合早报《新汇点》2013）	“他的一生多姿多彩，也多灾多难，人们对他的褒贬不一，无论如何他还是一个有才华的长辈”（区如柏，联合早报 2013 年 10 月 21 日 3:30 AM） 区如柏再引章星虹最近在早报《新汇点》发表的《谁为韩素音做中文翻译？》一文。 “章文提到，1956 年新加坡笔会会长何永佺医生在他们有限的基金中拨了一笔特别奖金以鼓励李星可翻译韩素音的《餐风饮露》和《青山不老》为中译本，而李氏的文学翻译，用词贴切而优美，表意准确而地道，让人们读之如在阅读一部以华文写就的作品，没有丝毫语言障碍。”	早报网 https://www.zaobao.com.sg/social/crossroads/leisure/story20131021-266932

9	史马《过河卒子李星可》上篇刊于联合晚报 1987 年 4 月 12 日。下篇刊于联合晚报 1987 年 4 月 13 日。	史马《过河卒子李星可》有两篇，皆刊登于联合早报。 上篇记述李星可于 1971 年 2 月 1 日从星洲日报转投南洋商报。史马曾于《民报》“列国春秋”专栏，嘲讽他为“北雁南飞·楚材晋用”。16 年后，他旧事重提，不但引述前文，也记述了当时李星可和当时民报社长黎国华的对质。此外，史马也抨击李星可的文句有语病以及他“通篇‘儿’字”，“当儿不当儿，不当儿而儿”。 下篇述李星可的写稿安排与习惯，指李星可在家完稿后有专人来回报馆取稿校稿，而且不许别人改动他的字句，以致在 1971 年 4 月 8 日误把当时的社会事务部次长陈志成‘擢升’（史马词）为社会事务部长。史马自言在叶世芙的怂恿下，第二日即在《民报》刊登了《乌龙政论家张冠李戴》一文挖苦李星可。下篇再评李星可的五言诗押韵不均，七言诗平仄更不调，像唱京剧。 李星可于《乱世沧桑》中记述史马写《过河卒子李星可》攻击他的缘由，与李星可与叶世芙及黎国华结怨有关。也为用‘儿’字、旧诗的押韵辩解。（页 97-100，页 147-148）	史马《过河卒子李星可》上篇刊于联合晚报 1987 年 4 月 12 日。见 NLB Microfilm NL15822（Lianhe Wanbao Singapore Apr 1987）。下篇刊于 1987 年 4 月 13 日，除收于上述 NL15822 外，亦可见于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lhwb19870413-1.2.22.1.2.1?ST=1&AT=search&k=%E6%B0%91%E6%8A%A5%20%E5%8F%B2%E9%A9%AC%E8%BF%87%E6%B2%B3%E5%8D%92%E5%AD%90&P=2&Display=0&filterS=0&QT=%E6%B0%91,%E6%8A%A5,%E5%8F%B2,%E9%A9%AC,%E8%BF%87,%E6%B2%B3,%E5%8D%92,%E5%AD%90&oref=article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91-95，97，100，147-148。

10	新明晚报 联合早报、海峡时报的访问	口述访问者提及新明晚报曾访问他。未提内容。李星可言联合早报、海峡时报都曾访问他，但稿件未见发表。	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95-96。
11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新加坡：SPH，2011），页 50。	“撰写社论的李星可送五个儿子到澳洲受教育，我的子女全在新加坡接受华文教育。”（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页 50） 李星可对送孩子进英校的原因：“超贤的……母亲，那是我两个大孩子的启蒙老师，都在她的中学的附小读过一年级，但是那时候儿的华校风气很坏，整天罢课，所以我最后把他们转送到 St. Joseph Institution 去改读英文，由我自己教他们读中文。现在他们因为在国外居住太久，已经变成‘二毛子’，可是思想上还跟我是一样的‘沙文主义’。”（李星可《乱世沧桑》，页 110） 李星可自认与李光耀总理的关系良好（李星可《乱世沧桑》，页 139-142）： 1. 除了语文跟教育问题，“我们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歧见”。 2. 李星可的朋友赵文锦给李光耀补习华文，文锦每天要逐字逐词的给李光耀念社论，并随时加以解释，减少了不少李光耀对李星可文章的误解。 3. 李光耀曾数次邀请他出席宴会。 4. 李光耀曾和他长谈政治一小时多。 5. 因李星可一再批评王赓武报告书以及抗议苏联官方报章污蔑华人非亲美即亲中，引起李光耀的不满。 6. 在他被扣留期间，李总理和他谈好：要在他出狱后派他去欧洲，为政府工作，但同时不能再写社论。 7. 在出狱之后，李微尘想推荐他为总理的新	李星可送孩子进英校的原因，见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10。 与李光耀总理的关系以及对新加坡的看法，见李星可《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30-144。 参新加坡文献馆（未注作者名） 《回顾华文报业风暴是非》 21/02/09， https://www.sginsight.com/xip/index.php?id=2312

		闻秘书。 李光耀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对商报的言论提出警告。对于那篇回复李光耀的有敏感性语文问题的社论，李星可本认为内容不妥，也不愿“冒犯政府首长，缺乏应有的礼貌”，但社长李有成坚持要他根据‘社论委员会’的决定要李星可执笔回答，他自己看过才发表。文章刊出的第三天，1971年5月2日李星可就和李茂成、总编辑全道章及公众关系经理郭隆生一起被捕，坐了22个月的牢狱。（《乱世沧桑》页132-139，155-161）。 李星可一直看好新加坡（李星可《乱世沧桑》，页143-144）： 1. 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2. 与澳洲相比，“澳洲今天的苦难可以说他们缺少了一位‘李光耀’”。 3. 新加坡的发展有目共睹。 4. 他当年的主张，“比如提倡华语，鼓励多种语文学习，地道车，以及儒教的提倡……等等现在居然成了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甚至由政府付诸实行。这是我做梦都没曾梦到过的。” 李星可认为他只是维护华文教育： “星洲的立场力主华人不能数典忘祖极力提倡华语，维护华文教育。南洋是华文报，照理不应该反对，可是在读者来函里却有系统的批评华校如何如何办得不好，拆后台，扯蹙脚，星洲不客气，星洲不客气，曾经一连写过两篇社论，对南洋提出质问；问得南洋哑口无言，无话可答。”（《乱世沧桑》，页153）。	
1 2	萧依钊《一位传奇人物李星可》（星洲日报，1984.4.2），	内容记述： 1. 李星可生平 2. 李星可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维护华文，以中华民族为傲。 3. 李星可口述中国民族迁徙的历史	

	收于《乱世沧桑：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页 186。	4. 评论澳洲大城市、巴黎、美国华人移民的情况 5. 评论马来西亚华人的分裂。主张华人团结及华巫团结。	
1 3	鲁虎《新马华人中国观之研究，1949-1965》（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及八方文艺创作室，2014），页 218-226。	评述鲁虎对李星可的中国观及论述方法。鲁虎指出，李星可的中国叙说是‘隐约晦涩’的，以间接谈论文化及把中国与其他国家归类，避免单独讨论的方法论述。	

李星可 主要参考资料：

A. 李星可的著作与译作：见此附录中第 2 项

B. 其他参考资料：

1. 韩山元《从李星可谈到报史研究》
http://www.sg writings.com/1436/viewspace_17293.html。阅览日期：10. 7. 2019。
2. 赖伯疆《东南亚戏剧概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页 119-120。
3.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新加坡：SPH，2011），页 50。
4. 梁秉赋《李星可其人其言》（文化沙龙人物点评系列 4/2008）。阅览日期：10. 7. 2019。
<https://sgsocietyofasianstudies.wordpress.com/2008/08/19/%E6%96%87%E5%8C%96%E6%B2%99%E9%BE%99%E4%BA%BA%E7%89%A9%E7%82%B9%E8%AF%84%E7%B3%BB%E5%88%97-408%E2%80%93%E3%80%8A%E6%9D%8E%E6%98%9F%E5%8F%AF%E5%85%B6%E4%BA%BA%E5%85%B6%E8%A8%80%E3%80%8B/>
5. 鲁虎《新马华人中国观之研究，1949-1965》（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及八方文艺创作室，2014），页 218-226。
6. 南洋大学历史参考资料目录：
https://eps.ntu.edu.sg/client/en_US/NanyangUniversityBib/search/results/?ic=true&qu=%E6%9D%8E%E6%98%9F%E5%8F%AF&te=ASSET。阅览日期：27. 06. 19。
7. 区如柏《云南园里的李星可》，2013 年 10 月 21 日于早报网发表：
<https://www.zaobao.com.sg/social/crossroads/leisure/story20131021-266932>。
阅览日期：26. 06. 2019。

8. 史马《过河卒子李星可》上篇刊于联合晚报 1987 年 4 月 12 日,下篇刊于 1987 年 4 月 13 日。两篇皆收于 NLB Microfilm NL15822 (Lianhe Wanbao Singapore, April 1987)。亦可见于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lhwb19870413-1.2.22.1.2.1?ST=1&AT=search&k=%E6%B0%91%E6%8A%A5%20%E5%8F%B2%E9%A9%AC%E8%BF%87%E6%B2%B3%E5%8D%92%E5%AD%90&P=2&Display=0&filterS=0&QT=%E6%B0%91,%E6%8A%A5,%E5%8F%B2,%E9%A9%AC,%E8%BF%87,%E6%B2%B3,%E5%8D%92,%E5%AD%90&oref=article>
9. 孙源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2e2d6d0102x35b.html
 阅览日期: 10. 7. 2019。
10. 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11. 吴天才《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马来西亚: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1975), 页 247。
12. 萧依钊《一位传奇人物李星可》(星洲日报 1984. 4. 2), 收于《乱世沧桑: 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 页 186。
13.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李星可资料夹》(Call number: Chinese C810.092 L XK) (BRN: 12536319) 阅览日期: 03. 07. 2019。
14.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简称 NLB) 的 NewspaperSG 以微型胶卷 (Microfilm) 保存李星可被捕的报章资料。NLB Microfilm Reel 6731 (新加坡南洋商报及 Singapore Herald 1971 年 5 月 3 日头版), NLB Microfilm Reel NL6766 (马来文报 Berita Harian 1971 年 5 月 3 日头版)。阅览日期: 3. 7. 2019。
15. 新加坡国家档案 记录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photographs/record-details/dd2e778f-1161-11e3-83d5-0050568939ad>. 阅览日期: 10. 7. 2019。
16. 新加坡文献馆 (未注作者名)《回顾华文报业风暴是非》21/02/09,
<https://www.sginsight.com/xip/index.php?id=2312>. 阅览日期: 7. 7. 2019。
17. 章星虹《谁为韩素音做中文翻译?》(联合早报《新汇点》2013) 早报网
<https://www.zaobao.com.sg/social/crossroads/leisure/story20131021-266932>
 阅览日期: 01. 07. 2019。
18.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戏剧》(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2001), 页 121-122。
19. 赵戎〈论李星可的戏剧〉,《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 青年书局, 2005), 页 98-123。(2005 年为简体字版。繁体字版出版于 1967 年)。

附录 6： 连士升 生平·著作·敬佩人物·他人评论

连士升（24. 5. 1907 – 9. 7. 1973）

连士升字伯棠，别号及笔名为子云。连士升的文章一般用子云署名。连士升的父亲绶昌公，字云孙（连士升《回首四十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09，页 21），连士升以子云表示他乃云孙之子。顾颉刚也称连士升为伯棠（杨焄〈不知嫉忌为何事，但瞩光明益向前：关于郑侃懿〉，<https://new.qq.com/rain/a/20221005A020VO00>）。

1. 生平·大事记

	生平、重要事项	日期	内容	备注/出处
1	出生	1907 年 5 月 24 日	出生于闽东福安县福宁府秦溪乡	〈连士升走过的路〉，载连士升《回首四十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09），页 10。
2	小学教育	1914– 1918	启蒙老师为其父亲绶昌公（字云孙）。绶昌公为穆洋同文学校国文老师，连士升 7 岁时随父就读于穆洋同文学校。第二年其父病故，他转到第一小学。 1918 年 11 岁小学毕业。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21–22。
3	父亲病故	1915	8 岁时父亲病故，家徒四壁，只留下十一块大洋和几亩薄田。母亲日夜作针黹赚取家用，对他只有鼓励和督促，从未大声责骂。“母亲这种人格的陶冶，好像父亲对我的学问的指导一样，是我所接受的最光荣的遗产” 连亮思（连士升子）认为“祖父给他在学问上开了门径，祖母更是慈祥和蔼的鼓励和督促他，给他在人格上的陶冶，这对他在后来与人无争的态度，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22。 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文思、连亮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南洋学会纪念文

				集第二集） （新加坡：南洋学会，1976），页143。
4	私塾教育	1918-1922 （私塾）	1918年11岁小学毕业后，他不愿到商店做学徒，有没有钱到福宁府或福州上中学，便在家乡私塾读了5年。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23-24。
5	母亲病故	1922	15岁那年（1922）母亲病逝，使他决定离开家乡： “母亲的死，使我的生活起个大转变。从前家贫亲老，我只好留在乡下，希望找个小职业奉养母亲。现在她老人家不幸弃我而长逝，我没有逗留在家乡的必要。我决定到外地去升学，甚至准备投笔从军，说不定在唇枪舌剑，或弹雨枪林中能够找到我的生命。”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29。
6	初中教育	1922-1926 （作元汉英学校）	母亲故后，他变卖了父母遗下的几亩薄田，加上朋友的借贷，考上中华圣公会在福宁府（霞浦县）办的作元汉英学校中学二年级。共读了4年。校长邱约翰（John Curtis）牧师教学法（讲解和背诵兼重、提纲挈领）和为人（热心布道、生活简朴、勤俭自持）给他很大的影响。 他在作元汉英学校苦学英文，取得了好成绩。虽然校长暗示可介绍他到海关就业，但他想继续升学。校长要介绍他去福州协和大学，但他却认为他缺乏数理化知识，要再充实现代知识才去投考大学。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32-33。
7	高中教育	1926-1927	考上福州英华斋高中三年级，学到了新知识，也经历了革命浪潮。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刊物《向导》，时常刊载陈独秀的文章。 他在作元汉英学校和英华斋，学到了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44-47。

			新知识，为中英文打下基础，也经历了当时的改革浪潮。	
8	大学	1927-1931	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获经济学学士。 陶恒生记连士升上过陶希圣在燕京社会系的课，也间中到陶希圣家中和他讨论翻译西方经济史名著的事。	〈连士升走过的路〉，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0。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 http://www.hstao.com/Lien.pdf, 页 3。 阅览日期：10.8.2019。
9	与原配郑侃嫔结婚	确切日期不详，据连士升〈失业与失窃〉及杨焄所记推算，应于 1930 年代初。	连士升原配郑侃嫔是一才女，深得顾颉刚赏识。连士升〈失业与失窃〉，《回首四十年》页 96 记“先室郑侃嫔一面为上海《申报》编辑《通俗读物周刊》，一面和顾颉刚先生合作，准备替上海某书局编辑高中历史教科书。”；杨焄〈不知嫉忌为何事，但瞩光明益向前：关于郑侃嫔〉，记载顾颉刚对郑侃嫔的赏识以及她的文章。 连亮思记连士升在北京期间“与大学的一位同学结婚并生了大姐侨思。”	连士升〈失业与失窃〉，《回首四十年》，页 96； 杨焄〈不知嫉忌为何事，但瞩光明益向前：关于郑侃嫔〉 https://new.qq.com/rain/a/20221005A02OVO00 阅览日期：10.5.2022。 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144。
10	在北京工作	1931 - 1937	“于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政治大学图书馆读书、研究及写作。”〈连士升走过的路〉《回首四十年》，页 10。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0, 71-73。

		连士升大学毕业后，得国学大师顾颉刚的介绍，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得到一个特别研究室的席位，有很好的读书写作的方便：“每次借书的数目没有限制，书还放在书架上，不必马上交还出纳处”。（《回首四十年》，页 71）“由于图书的便利，这无形中增加我读书的兴趣及写作的决心”。（《回首四十年》页 73） “假如燕京大学给我以结交几个朋友的机会，那么北京图书馆可以说是给我带上治学的门径”。（《回首四十年》，页 73） 他同时为著名报章杂志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等撰写或翻译有关中外经济史的文章。（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 3） 连士升自 1935 年起为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撰写或翻译有关经济的文章，共 11 篇，跨 20 期： 1) 译桑巴德 [德] (Werner Sombat) 〈经济理论与经济史〉 2) 译克拉判 [英] (John Harold Clapham) 〈经济史的纪律〉 3) 著 〈重商制度略说〉 4) 译克拉判 [英] (John Harold Clapham) 〈论经济史的研究〉 5) 译西摩勒尔 [德] (Gustav von Schmoller) (陶希圣校订) 〈由村落到都市的发达过程〉 6) 译约克曼 [英] (William T. Jackman) 〈经济史的重要性〉 7) 译西摩勒尔 [德] (Gustav von Schmoller) 〈由城市经济到领域经济的发达〉 (上、下)、 8) 与陶希圣合著 〈斯密亚丹 [英] (Adam Smith) 论中国〉 9) 译费 [英] (C. R. Fay) 〈论原富〉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页 3-4，24。

			10) 译卫布思夫妇[英]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怎样研究社会事实〉 11) 译哈佛学者格拉斯[美] (N. S. B. Gras) 的〈工业发达史〉 (在《食货》连载九期)。	
1 1	燕京大学硕士 (不确)	1936 年	连家子孙到连家太西祠堂时, 宗亲指出栋梁上有两个“硕士”的匾额, 其中一个即是连士升在 1936 年获得燕京大学硕士学位后设置的。然而在连士升的文字中未曾提及。	连文思《寻找父亲的足迹》, 《怡和世纪》31 期 (2017), 页 122-124。
1 2	至香港 在香港工作 - 《港报》 - 《国际通讯社》	1937 年 8 月 21 日 1937-1942	七七事变后, 举家离开北京, 经天津、塘沽由水路抵达香港 自 10 月 1 日在《港报》工作三个月。 “连士升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从北平携妻带女逃来香港, 经由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 许地山介绍进入《港报》, 然报馆因负债累累而 倒闭。为缩小开支, 只好把妻小搬到澳门亲戚家暂住, 趁此机会完成未翻译完的哈佛大学格拉斯教授的《工业史》下半部, 于次年 (一九三八) 二月交由商务印书馆 出版。” 在香港《国际通讯社》专写经济与国际问题, 翻译, 并在岭南大学任教。 “一九四零年六月起, 父亲在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创办“国际通讯社”, 编印《国际通讯周刊》, 分寄国内各地, 以供战时首都重庆领导人士参考, 以及关心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机关和个人用作材料。这份刊物选译国外报章杂志的论文, 间亦刊载社友们的国际时事评论。 “国际通讯社”的编译者, 有连士升、戴杜衡、林一新、李毓田、唐锡如, 洪力生、 黄蔷薇……诸先生。” (陶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 页 10。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 页 96-97。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 的情谊》, 页 7。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 页 10;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 页 6。

	– 担任港大校外考试委员		恒生，页 6） 1941 年，连士升被委任为港大校外考试委员。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 7。
1 3	原配郑侃嫔辞世	1938 年 8 月 3 日	1938 年 5 月，妻子郑侃嫔从澳门搬回香港，因为逃难、贫困及操劳过渡，患上心脏病，于八月三日逝世。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 7。
1 4	与罗梅结婚	1940 年	1940 年，连士升与燕京同学罗牧的胞妹罗梅结婚。她是越南华侨，随兄在香港岭英中学 求学。陶希圣担任男方主婚人，罗牧为女方主婚人，证婚人是文学家许地山（笔名落华生）。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 7。
1 5	到越南茶荣省隐居	1942 年 2 月 20 日-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连士升举家逃离香港，经河内、西贡，到茶荣省（TRA VINH）隐居。 在越南隐居期间，恐怕日本人注意，用了‘郑德华’的假名，并任福建学校校长两年，一面翻译克拉判教授（Sir John H. Clapham）的两本著作：《现代法德经济史》（“ <i>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i> ”）及《近代英国经济史》（“ <i>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i> ”）。在这期间，他也研读几本子书（未注明哪些）及苏东坡全集。	罗牧〈到南洋去 – 连士升君挈眷到越南逃难的过程〉，《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106；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52-156。
1 6	从越南到南京，半年后又返回西贡。	1945 年 底至 1946 年	日本投降后，准备回中国。从越南西贡到柬埔寨的金边和马德望（Battambang，与泰国接壤）、泰国曼谷、菲律宾马尼拉、上海。于1946年2月12日抵达重庆，后到南京。在南京住了半年，因严重通货膨胀，又返回西贡。 在南京时，《中央日报》曾聘他为特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0、192-196；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 11-12。

			派员。	
17	到新加坡	1947 年 1 月（近 40 岁）	他原本只是想到马来亚考察两三个月，再作打算，没想到国内外局势多变，只好留在新加坡。 连士升在南洋的第一份工作，是《中兴日报》特派员，任内曾受命回中国作采访。	连士升<后记>《回首四十年》，页 197；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 12。
18	到中国多处	1948 年 3 月 5 日	由西贡至上海，在中国两个月，写成《祖国纪行》。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0。
19	到欧洲采访	1948 年 9 月 1 日至 1949 年 6 月 19 日	1948 年，他转投新加坡《南洋商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巴黎报道联合国第三届大会。过后到欧洲漫游数月，在欧洲采访期间写了大量游记，后来集结成《祖国纪行》、《欧洲纪行》之《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及《印度洋舟中》五部书，由《南洋商报》出版。 于 1949 年 6 月 19 日回返西贡。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0；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 12。
20	迁居星洲，受聘于南洋商报。	1948（连亮思，页 146）/ 1949 年（陶恒生，页 12）	举家迁往新加坡，正式受聘于南洋商报。	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 146；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 12。
21	受文教界肯定 — 担任南洋学会诸多职位	1951-1971 年	自 1951 至 1971 年的 21 年间的 15 届委员会中，连士升为南洋学会服务了 20 年或 14 届，其中担任了三届的主席，两届的副主席，一届的财政、一届的研究主任和八届的理事。	〈南洋学会历届理事名表〉，见南洋学会网站 https://www.southseassociety.sg/about.php 。

	- 出任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	1953 年 2 月	1953 - 建校筹备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大学为“南洋大学”，并推举连士升出任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	南洋大学编〈南洋大学校史略〉，载《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特刊》，（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页 13；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 14。
	- 新加坡剧场委员	1954	1954 - 受邀为新加坡剧场委员，发表〈当地文艺的特性〉、〈文艺应反映现实〉、〈中国戏剧在巴黎〉等有关戏剧的文章。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7），页 211。
	- 获颁奖章	1963	1963 - 获颁新加坡公共服务纪念奖章	同上，页 212； 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146。
	- 新加坡作家协会顾问	1970	1970 - 新加坡作家协会于 1970 年 8 月 1 日成立，连士升被推选为顾问。	〈新加坡作家协会简史〉，《华文文学》，1996 年第 1 期，页 33。
2 2	新加坡大学理事会委员	年份不详	任新加坡大学理事会委员多年。	连士升简介，载《回首四十年》，首页。
2 3	中国学会副会长	年份不详	任中国学会副会长多年。	同上
2 4	发表见证马来亚独立的文章	1957 年	连士升发表见证马来亚独立的文章，深为各界重视。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

				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页 15。
2 5	受委为魏雅聆的七人检讨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审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南洋大学改组的建议	1959 年	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于 1959 年正月委任一个南大评议委员会，任务就是评审南大的学术水准。评议委员会的主席是西澳大学校长白里斯葛教授（Professor S. I. Prescott, Vice-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评议会在 1959 年 7 月 22 日向新加坡政府提呈报告书。基于对大学的组织，行政和教学的审查，评议会的结论是南大没有达到国际学术水平，拒绝向新加坡政府建议承认南大学位，但提出 16 项改革方案，建议南大改组。该报告书普遍引起新马华人社会的不满和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评议会具有很大的偏见，不但了解南大创校的历史和客观的环境，而且评议员都是外国学术人员，根本不了解新马情况。为了平息社会人士对报告书的不满，新加坡政府再设立一个以新加坡大学医学院魏雅聆教授为首的委员会，任务就是审查白里斯葛报告书和大学改组的建议。魏雅聆的七人检讨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都是新马本地的学者，包括翁姑阿都阿芝，符气林先生，黄丽松教授，廖颂扬先生，连士升先生和 B. R. 史林尼哇山先生。魏雅聆检讨委员会于 1959 年 11 月 20 日提呈报告书，建议南大大幅度改革它的结构和行政。大部分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被接纳和执行。	颜清湟《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助教职位》， http://www.nandazhan.com/huiyi/nydx1963.htm . 浏览日期： 28.8.2019。
2 6	公民权在 1959 年大选之前突被吊销，但在之后的两三年，又重获公民权	1959	李霖〈回忆连士升〉记述他的公民权在 1959 年大选之前突被吊销，而连士升和另一位 SM 也和他一样。但 1959 年后的两三年，他们又先后重获公民权证书。 高凡《连士升传》也提到在 1959 年期间，连士升“险被马政府驱逐出境”。	李霖〈回忆连士升〉，载《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99-100。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页 211。

			连士升公民权被吊销事可能与他险些被驱逐出境有关。陈雪锋〈红帽子险送走连士升〉记述政治部要把连士升驱逐出境，原因是他的思想有‘急进嫌疑’。后来在陈雪锋和李玉荣的协助下，主持华民政务司的郑惠民答应为连士洗却冤屈。	陈雪锋〈红帽子险送走连士升〉，《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136-137。
2 7	受命为政府公众服务委员会委员	1961- 1966	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受命为政府公众服务委员会委员。 连亮思记述 1961 年连士升被新加坡政府为公众服务委员会委员，是委员会唯一的中文教育者，对那些从中文学府来的应征者，特别关照、当他们英文表达不流利时，帮助他们发挥其他的优点。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 页 15 记连士升于 1959 年受命为政府公共委员会委员，应有误。 连亮思〈连士升生平〉，《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146。
2 8	升任《南洋商报》总编辑	1969	连士升升任《南洋商报》总编辑。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页 212。
2 9	退職	1971	1971 年，因病辞去所有职务。	同上； 连士升〈日记〉，《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7-10。
3 0	离世	1973 年 7 月 9 日	与世长辞。在世 66 年余。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页 15-16。

2. 连士升的著作和译作

	书名	性质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出处																																													
1	连士升文集（5册）（主编：许福吉） 第1卷－游记： 1) 塞纳河两岸 2) 地中海之滨 3) 大西洋一角 4) 印度洋舟中 第2卷－散文： ●给新青年 ●闲人杂记 ●回首四十年 ●南行集 第3卷－传记： 1) 泰戈尔传 2) 甘地传 3) 尼赫鲁传 4) 西方英雄谱 第4卷－书信： 海滨寄简 1-4 依次为 ●物华集 ●天宝集 ●人杰集 ●地灵集 第5卷－书信： 1) 落霞集	文集	201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据连文思（连士升之女），《连士升文集》（5册）收藏有百分之九十的连士升著作。 其他未收入在这文集中的有游记《祖国纪行》（南洋商报，1948年11月）和《名山胜水》、散文《春树集》、社论集《慧眼静观》与《卓识思远》和翻译作品。 ●据连士升《秋水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10）后页〈连士升著作一览表〉，及《连士升文集》等所列连士升著作其他版本的出版日期与出版单位依序如下： <table><tr><td></td><td>出版日期</td><td>出版单位</td></tr><tr><td>塞纳河两岸</td><td>1950. 5</td><td>南洋商报</td></tr><tr><td>地中海之滨</td><td>1950. 6</td><td>南洋商报</td></tr><tr><td>大西洋一角</td><td>1950. 7</td><td>南洋商报</td></tr><tr><td>印度洋舟中</td><td>1950. 9</td><td>南洋商报</td></tr><tr><td>给新青年</td><td>1963. 1</td><td>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td></tr><tr><td>闲人杂记</td><td>1957 1963. 4</td><td>南洋报社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td></tr><tr><td>回首四十年</td><td>1963. 6</td><td>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td></tr><tr><td>南行集</td><td>1951. 11</td><td>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td></tr><tr><td>泰戈尔传</td><td>1963. 6</td><td>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td></tr><tr><td>甘地传</td><td>1968. 5</td><td>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td></tr><tr><td>尼赫鲁传</td><td>1965. 7</td><td>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td></tr><tr><td>西方英雄谱</td><td>1953. 10</td><td>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td></tr><tr><td>物华集</td><td>1963. 8</td><td>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td></tr><tr><td>天宝集</td><td>1963. 9</td><td>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td></tr></table>		出版日期	出版单位	塞纳河两岸	1950. 5	南洋商报	地中海之滨	1950. 6	南洋商报	大西洋一角	1950. 7	南洋商报	印度洋舟中	1950. 9	南洋商报	给新青年	1963. 1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闲人杂记	1957 1963. 4	南洋报社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回首四十年	1963. 6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南行集	1951. 11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泰戈尔传	1963. 6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甘地传	1968. 5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尼赫鲁传	1965. 7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西方英雄谱	1953. 10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物华集	1963. 8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天宝集	1963. 9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出版单位																																																
塞纳河两岸	1950. 5	南洋商报																																																
地中海之滨	1950. 6	南洋商报																																																
大西洋一角	1950. 7	南洋商报																																																
印度洋舟中	1950. 9	南洋商报																																																
给新青年	1963. 1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闲人杂记	1957 1963. 4	南洋报社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回首四十年	1963. 6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南行集	1951. 11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泰戈尔传	1963. 6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甘地传	1968. 5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尼赫鲁传	1965. 7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西方英雄谱	1953. 10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物华集	1963. 8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天宝集	1963. 9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2) 孤鹜集 3) 秋水集 4) 长天集					人杰集	1963. 11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地灵集	1963. 12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落霞集	1972. 6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孤鹜集	1974. 6	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秋水集 (典藏版)	2010. 9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长天集（连士升百年诞辰纪念版）	2007. 8	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 《秋水集》（典藏版）和《长天集》（连士升百年诞辰纪念版）以及另一册《回首四十年》（典藏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09）的主编都是连侨思、连亮思和连文思。 • 连士升“最喜欢阅览古今中外的名人传记”（连士升《长天集》，页31）。《史记》是他自幼精心研读的作品。他对传记进行过认真的思考，重视传记对读者的教诲作用：“重要学人的传记，尤其自传，对于我们很有益处。在传记里，我们时常发现某某人在年青的时候最爱那几本书，或者最喜欢结交那几个师友，这些书籍和师友对他一生影响极大。假如我们能够虚心研究，善自体会，我们当然可以找出他成功的原因”。（连士升《闲人杂记》，（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7年，页113）。传记的教诲作用，也是他写作传记的目的之一。 • 他用了15-16年的时间完成泰戈尔传、甘地传、尼赫鲁传。 • 连士升文集集中的8册书信集是根据		

					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两个名句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 而命名。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出版的《秋水集》和新加坡玲子传媒出版的《长天集》里，注明了连士升的一些书信对象，能使读者对连士升的书信内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2	祖国纪行	游记	1948年11月	南洋商报	〈连士升作品一览表〉，连士升《秋水集》后页。
3	名山胜水	游记	2004	新加坡：青年书局	1959年8月初版。《名山胜水》包括《祖国纪行》以及《连士升文集》第一卷中的4本游记 - 《塞纳河两岸》、《地中海之滨》、《大西洋一角》、《印度洋舟中》。
4	春树集	散文	2004	新加坡：青年书局	1960年12月初版。内容： 自序·春到人间·大学生的使命·艺术与人生·忠与恕·我理想中的记者
5	慧眼静观－连士升社评选集	社评	2015年1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连士升子女挑选了连士升社论中有普世性的、前瞻性的、警示性的、教育性的52篇文章，以读者一周看一篇的预期，出版这一个选集。（〈前言〉，《慧眼静观》，页1-3）。
6	卓识思远－连士升社评选集	社评	2016年10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卓识思远》收集了连士升1949年至1971年，有关新马文化和教育问题的52篇社评。在这期间，新加坡经历了冲要的政治变化。阅读这些社评时必须参照当时新加坡内外的局势。
7	翻译作品： －格拉斯《工业史》	经济史翻	1939	商务印	见连士升《回首四十年》，页100-101。

	(N. S. B. Gras, <i>Industrial Evolution</i>) -克拉判教授 (Sir John H Clapham), 《德法经济史》 “<i>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i>”) -克拉判教授 (Sir John H Clapham) 《近代英国经济史》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译		书馆 《德法经济史》与《近代英国经济史》尚未出版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 页 11 记: 在越南任福建学校校长两年期间, 一面翻译克拉判教授 (Sir John H Clapham) 的两本著作: 《现代法德经济史》及《近代英国经济史》。不过这本书只翻译了大半, 日本投降了, 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完成。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页 60 与页 200 记这两本翻译手稿尚存于连家。高凡原名邝金兰, 言连士升女婿高华嶽 (连文思夫婿) 为其姻兄, 为她的研究提供许多资料。
8	连士升 <北望中原>。第 1-4, 6-12 期	月报	1950 年 1-12 月	南洋月报	<北望中原>为南洋月报专栏, 每期刊登一篇有关中国的文字。主编为陈振夏。
9	连亮思、连文思编选《连士升文选——现代人的精神粮食》	文选	2001	N. J.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选自连士升 1948 至 1972 年在新加坡书写的文字, 包括了不同的文体——散文、书信、传记、游记。(连文思<前言>, 连亮思、连文思编选《连士升文选——现代人的精神粮食》, 页 xi)

3. 连士升所敬佩的人物

	人物	原由	备注/出处
1	公孙侨	命名大女儿为侨思, 以纪念春秋战国时期的杰出政治家, 郑国宰相子产 (出生日期不详, 一般认为约在公元前585年至前578年间。公元前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

		522逝世)。子产名侨，因系贵族，故被尊称为公孙侨。 “在中国思想史上，子产是孔子的先驱，时代的先知。那时郑国，是新政发动机，孔子谈仁政，就以子产新政为样板，赞美子产‘有君子之道四’”。	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页16。 刘刚、冬君《子产治郑：春秋时期的民主尝试》，中国经营报，2015.8.15. http://history.sina.com.cn/bk/gds/2015-06-24/0957121800.shtml
2	诸葛亮	命名独子亮思以纪念诸葛亮（181—234）。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蜀汉重要大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连亮思口述连士升以他所敬佩的政治人物为子女命名。虽他未能从政，但希望子女学习他们，为国效力。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17。 罗梅、连亮思、连侨思、连文思、连萧思访谈，National Archives, Literary Scene in Singapore (Chinese), NLB Accession Number 003126
3	王守仁	命名二女仁思以纪念王守仁（1472—1528）。王守仁号阳明，为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和军事家。	同上
4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	命名三女藩思以纪念曾国藩（1811—1872）。曾国藩为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晚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 《曾文正公家书》是连士升从小自动的阅读的第一部书，“它教我怎样治学，怎样做人”。（页201）。“清廉、谦恭、勤劳，是曾文正公在个人修养上的关键”，连士升极为钦佩。在治学上曾国藩提出“专、恒、约”。连士升指出曾国藩的‘专’为“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即‘专精’；‘恒’为‘有恒’，“做事	同上； 连士升〈略论曾涤生〉，《回首四十年》，页201—212。

		必须有恒”；‘约’为‘守约’，曾国藩言‘唯易简乃可行’，在诸多文献中，‘简练以为揣摩’乃治学的重要法则。	
5	孙文	命名四女为文思以纪念孙文（1866—1925）（孙中山）。孙文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总理、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国父。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页 17； 罗梅、连亮思、连侨思、连文思、连萧思访谈，National Archives, Literary Scene in Singapore (Chinese), NLB Accession Number 003126
6	萧伯纳	命名幺女为萧思以纪念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萧伯纳为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音乐剧《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即根据其喜剧作品《卖花女》（Pygmalion）改编。	同上
7	陶渊明	在连士升二三十岁时，被革命、恋爱、读书、职业等问题困扰，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三首》把他“从苦闷的深渊中拯救出来，…把生死、荣辱、贵贱、夭寿等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连士升〈敬仰陶渊明〉，页 235） 陶渊明（约365-427）所具备的儒家道家的两重人格，给他的启示是：“得意也罢，失意也罢，一个比较有素养的读书人总能够活得下去。得意的时候，给国家多做一番事业；失意的时候，让个人多发表一些诗文”（连士升〈敬仰陶渊明〉，页229）。	连士升〈敬仰陶渊明〉，《回首四十年》，页 227-236。
8	梁任公（梁启超）	连士升认为梁任公（1873-1929）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有四方面：报纸的评论、传记、学案（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法学和目录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启蒙的工作。他也认同梁启超对他自己的指摘“混杂而肤浅”，但认为‘这是时代的关系，我们应该予以原谅’。	连士升〈试论梁任公〉，《回首四十年》，页 213-226。

9	顾颉刚	在 1951 年写的〈学习顾颉刚〉，连士升说：“在当代中国的学者中，我个人最钦佩的是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1893-1980）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连士升指出顾颉刚在 1926 年出版的《古史辨》，使中国学者专家对古史的态度，从‘信古’变成‘疑古’，在学术思想史是一个大转变。	连士升〈学习顾颉刚〉，《连士升文集》第二卷〈南行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页 417-420。
10	泰戈尔	以《泰戈尔传》，分析泰戈尔的贡献。泰戈尔为 1913 年以《吉檀迦利》诗集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李辰东认为：“泰戈尔、甘地、尼赫鲁都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人，现今中国六十多岁的人，也都可说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他们的一生正好代表我们的一生，写他们，也正是写我们。”	《连士升纪念文集》〈附录：连士升已出版著作〉，列〈泰戈尔传〉已于 1960 年出版，然未列出版社。 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三卷中包括《泰戈尔传》，连士升〈后记〉（页 188）写于 1961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李辰东〈悼念亡友连士升先生〉，《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56。
11	甘地	出版《甘地传》 甘地生于 1869 年，连士升在 1969 年甘地 100 年诞辰时写了一篇〈圣雄甘地 100 年诞辰〉的	《连士升纪念文集》〈附录：连士升已出版著作〉，列《甘地传》已于 1966 年出版，然未列出版社。 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三卷中包括《甘地传》。连士升〈再版序〉（页 419）写于

		社评文章，精简地总结甘地值得为人崇敬之处，在于他凡事以真理为前提，以非暴力的忍让精神，言行一致，和蔼可亲，虚怀若谷，坦坦荡荡。他对甘地的赞赏，其实是以甘地做他行事为人的楷模。	1963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圣雄甘地 100 年诞辰〉，《慧眼静观》，页 60-63.
1 2	尼赫鲁	出版 《尼赫鲁传》。 李辰东认为连士升在写人物传记时融入了自己的想法和抱负、身世和情感，所以写得真实。譬如他在写尼赫鲁传的〈自序〉中以自己隐居越南，‘迹近坐监’的生活，对于“尼赫鲁在独立解放运动中的长期坐监的生活，表示万分的同情”。同时他认为在国际问题上，解决美苏问题是关键，而“尼赫鲁也一贯地发表类似的主张”。 连士升在 1964 年尼赫鲁逝世时写了两篇文章，一篇为〈盖棺方论定〉，收于《连士升文集》第三卷，另一篇〈追悼印度总理尼赫鲁〉收于社评集《慧眼静观》，两篇都评述尼赫鲁的贡献以及两项有争议性的举措。《慧眼静观》的编者认为这篇文章是连士升对尼赫鲁生平的总结。他认为“连士升为人平和公正，绝不偏激，他不因尼赫鲁生前的最后几年实行了有争议性的政策，而一笔抹杀他在历史上应有的评价。”	《连士升纪念文集》〈附录：连士升已出版著作〉，列《尼赫鲁传》已于 1963 年出版，然未列出版社。 许福吉主编《连士升文集》，第三卷中包括《尼赫鲁传》。此传的〈后记〉（页 627）写于 1959 年，然页 623-626 的文章写于 1964 年。此文记尼赫鲁逝世，应是连士升在写〈后记〉之后还继续关注尼赫鲁的缘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李辰东 〈悼念亡友连士升先生〉，《连士升纪念文集》，页 56。 〈追悼印度总理尼赫鲁〉，《慧眼静观》，页 31-34。

4. 他人对连士升的评论:

	作者 / 文章	评论	备注 / 出处
1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 http://www.hstao.com/Lien.pdf	<u>连士升治经济史的态度</u> 记述陶希圣（陶恒生之父）在《食货》一卷八期（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编辑的话〉中写道：“连士升先生是燕京大学研究院出来的专攻经济史的笃实的学者。”（陶恒生，页4）。陶希圣“在二卷十二期（同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又写道：“连士升先生埋头于各种经济史方法论的研究与经济史名著的翻译，工夫的深苦是通常以一知半解自封自足的人想象不到的。”（页4）。陶恒生评“连士升为经济史专家”（陶恒生，页6）。 <u>连士升的文笔</u> “他用笔温和敦厚，感情丰富，喜欢意境美的描述，善于比喻而富启发性。他虽被赋予“南洋鲁迅”的美誉，其文字却绝不似鲁迅那么尖刻与充满愤怒。”（陶恒生，页16）。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 http://www.hstao.com/Lien.pdf，页4、6。 陶恒生父亲陶希圣与连士升的关系亦师亦友，陶连两家有70年的情谊，对连士升自是赞赏有加。
2	曹聚仁	连士升提曹聚仁对他的批评：“曹聚仁先生在他的大作《散文的韵味》，说拙著《南行集》中的题材，都是平平常常眼前的实事，而作者也只是以说家常的口吻出之，既不会惊骇流俗，也不要天下人皆归于我。其中没有什么大义要宣传，也并不对于世道人心有什么补救。这是作者所以进入冲淡境界的基本条件。在《天一阁人物谭》里，曹先生又说《回首四十年》和《南行集》也就是周氏的《永日集》、《谈龙记》这一型的作品，《南行集》中卷所写的山水景物，比郁达夫的更冷远些，有如六朝小说，潇然物外。其实这个尘嚣中扰扰不安，返於自然的怀抱，就让清泉流水来荡涤我们的心怀，才是真正的出路。”这段话道出了连士升文章，在平淡中见真实，而且能与周作人和郁达夫相比，可见连士升文笔的造诣。	连士升〈中国的散文〉，《春树集》（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页68。

3	方修	方修认为“连士升文章的最大特点，是文字的清新自然。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他的作品给予读者的感受，就好像沙漠上的一阵凉风，炎日下的一杯冰水”。然而，在内容上，方修认为连士升的文章缺乏深度，与时代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因此“谈到中国当代学者，他抬出了他最钦佩的顾颉刚，谈到研究学问，他推荐了什么英国牛津剑桥的学侣生活，谈到读书方法，他有提到曾文正公的什么名言……”。	方修〈导言〉，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7），散文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81），页12。
4	马夫之	马夫之也同样肯定连士升的文笔：“用字遣词，不温不热，不卑不亢，驾驭文字，已到了收放自如，顺畅流利”。然而，他批评连士升虽然“能自爱，能刻苦读书，但是，他却为自己的前途读书，为着自己要过文人风雅的生活而读书”。他更严厉的批判连士升：“连士升是一个学院派的学者，他所向往的就是要坐一个学者，一个儒雅的学者，他希望在一个安静太平的环境里过着悠哉的学者生活。……他最‘想看到’的，是每一位青年拿着一个鸟笼，口吹着哨子在茶楼酒肆间品茗论鸟，那是最够风雅的事了。……他所研究的对象是那些被历史抛弃的人物，他的治学方法就是这些被历史抛弃的人物所学的方法。” 笔者认为这样的批评过于主观，自身就缺乏深度和风度。	马夫之《作家作品研究》（评论集）（马来西亚彩虹出版社，1996），页97-105。
5	许福吉序〈长河日落圆〉，《连士升文集第八集 - 长天集》	有关连士升的书信：“每篇都是以人、事为出发点，以情、社会环境为联系，把传统文化中重视人情、关心时局，实践仁爱的道德价值，融和在文字中，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散文中，看他散文中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谦让、宽容、刚毅、敦厚的思想感情。”	许福吉序〈长河日落圆〉，连侨思、连文思、连亮思主编，《连士升文集第八集 - 长天集》，（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2007 年）， 页 8。
6	黄望青 <橄榄的味道 - 忆念连士升兄>	记述连士升为《南洋学报》筹集出版费用，费心尽力。	连文思、连亮思合编 《连士升纪念文集》 （南洋学会，1976），页 30-31。 这本文集共有 27 篇连士升亲友的文章，在回忆和哀思中，只有刘子政和蒲耀瓊略有批评的文字。
5	魏雅聆 <怀念连士升先生>	言连士升的 • 文章有“真诚而不流于狷介”的意识，是一位“文质两全的君子” • 律己严格 • 处事待人 - 他的谈吐谦卑却有定见、为人热心、鼓励新进	同上，页 32-33。
6	刘抗 <紧密的朋友，连士升>	记述连士升如何 • 爱妻（使妻子生活安适、褒扬妻子对他的支持） • 爱子女（谆谆善诱） • 爱他人（“本性谦恭、淳厚、坦诚而又热情”，隐恶扬善） • 他也珍惜自己的品行和自己的学问，所以‘节俭勤奋’，‘博学深思’。 • 作为学人，他“胸襟豁达，视野广阔，不以种族、国家的界限来局限自己”。他觉察到印度古文化在新时代中的潜在力量，以 16 年的时间完成甘地、尼赫鲁和泰戈尔的三部传记。	同上，页 34-39。

7	何丙郁 <回忆连士升先生>	记述连士升与何丙郁的情谊，并鼓励何丙郁以中文发表文章。	同上，页40-51。
8	李辰东 <悼念亡友连士升先生>	• 连士升曾为新加坡燕京同学会主席 • 指出海滨寄简“每则都写给一个实际对象，而所讨论的却不是某一人的私事，所以读者非常之众，影响也非常之大”。“他的文字朴素、简洁、流畅，讨论的问题又是由浅入深”。（页53） • 举出例子说明连士升对读者的影响。（页56） • 分析连士升写人物传记时融入了自己的想法和抱负、身世和情感，所以写得真实。譬如他在写尼赫鲁传的<自序>中以自己隐居越南，‘迹近坐监’的生活，对于“尼赫鲁在独立解放运动中的长期坐监的生活，表示万分的同情”。同时他认为在国际问题上，解决美苏问题是关键，而“尼赫鲁也一贯地发表类似的主张”。（页56） • 记述连士升对学习文史的看法。他认为学习文史的人要到五六十岁之后才会有成就，“因为文史不比自然科学，它要知识掺和着人生经验两者化而为一时才真正成熟”。李辰东也以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同意他的看法。（页57）	同上，页52-58。
9	黄葆芳 <悼连士升先生兄>	记述连士升多次鼓励他出版画集未果，后在商报副刊发表一篇为他写的画集序文，以‘霸王硬上弓’的方法鼓励他，他的画集才在这不得已的情况下出版。	同上，页59-62。
10	刘蕙霞 <我所认识的连士升先生>	• 连士升诚恳、和蔼、不分地位、职业、身份，热心助人 • 为文化事业献身－记述他患了心脏病，需马上留医，他却请求医生让他迟一天入院，为的是他要在当天为南洋学会筹款，有了把握	同上，页63-67。

		后才入院。入院后即以氧气紧急治疗。	
1 1	余雪曼 以书法提诗二句	“跌宕文史脱略公卿 大名传海外 笔扫千军书成百卷 一切为青年”	同上，页68-69。
1 2	黄丽松也以书法为文表达哀思	称连士升“博学多能 贯通中外 磊落谅直 蔼然亲仁”。	同上，页70-71。
1 3	林熙 〈纪念一位文化战士 - 连士升在香港的一段日子〉	记述连士升和他的交情和帮助，连士升信守承诺。	同上，页72-78。
1 4	陈维龙 〈我所认识的连士升先生〉	把连士升著作对南洋青年的影响，比拟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之的文集对中国青年的影响。	同上，页79。
1 5	陈君葆 〈悼念连士升逝世一周年集王介甫句四首並識〉	以古诗 4 首悼念连士升。	同上，页80-82。
1 6	曹树铭 〈悼连士升先生〉	● 认为连士升“并非为文而作，乃是为世事而作”。 ● 举出连士升文中的‘格言’。对下一代的希望是他们做“老老实实地做奉公守法、利人利己的公民”，希望他们把自己训练为专才，“自己站得住之后，才能救国救民”。 ● 连士升教导后辈“学不厌、诲不倦”的精神，每做一事，必先认真钻研，自己也身体力行，为了指导曹树铭的杜甫研究，准备花上两三年的时间先充实自己。这对曹树铭是无形的教诲，使他在写作过程中更加谨慎。	同上，页83-91。
1 7	戴淮清 〈悼亡友连士升〉	● 举连士升《海滨寄简》第2集所提的“五四运动时代的领导人物，十九也是南方人，只因大	同上，页92-94。

		家都抱‘莫问收获、只问耕耘’的决心，结果，才有卓越的成绩贡献给社会”，认为这是连士升自己的写照。 • 认为他的文章“清逸顺畅，绝无艰涩之弊，读其文有如泛轻舟于清澈可以见鱼的湘江，顺流而下，无惊涛骇浪之险，而有湜湜的涟漪”。 • 他的为人“温文蕴藉，待人和气，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因他常为人排忧解难，戴淮清戏称他为连仲鲁。他有“容人的胸襟，更喜奖掖后进”。他立身处世，深受其师顾颉刚的影响。	
18	李霖〈回忆连士升〉	记述他的公民权在 1959 年大选之前突被吊销，连士升和另一位 SM 也和他一样。但 1959 年后的两三年，他们又先后重获公民权证书。 1961 年当他的教职发生问题时，连士升不但向有关当局询问，还极力担保，使他保住职位。	同上，页 99-100。
19	罗牧〈到南洋去 - 连士升君挈眷到越南逃难的过程〉	叙述连士升挈眷逃难的艰苦过程，也呈现了他的不畏艰苦、沉稳和意志力。如他在船上为大家处理呕吐物至粪便堆积的厨房，面不改色。也叙述了他以郑德华为假名担任福建学校的校长以避免注意。他以“好好先生”来概括连士升的为人。	同上，页 102-106。 罗牧为连士升之妻舅（连士升妻的兄长）。
20	丝韦〈一面之缘的追忆〉	言“读其书，如见其人，使人感到他的平实，平易近人，实实在在。”，但认为连士升也挺风趣的。	同上，页 110。
21	刘子政〈纪念连士升先生〉	讲述连士升 1947 年初到星洲，任职于国民党人办的中兴日报写社论及专论，言论自与国民党息息相关。但 1948 年转入南洋商报担任主笔及总编辑后，他写的文章，“却是另一内容，另一风格”。（注：虽刘子政解为“这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与环境有关”，但这却似为李星可评连士升为‘变色龙’作解释）。	同上，页 112。

2 2	柳存仁 <微思>	记述他与连士升的交情。评连士升“有高度的睿智的确切的判断能力”。	同上，页118-119。
2 3	陈德能 <我所认识的连士升先生>	陈德能兄陈德才与连士升为同窗。其父为连士升早年在霞浦作元汉英学校的监督。 用“情真意自深”形容连士升文章的特点。	同上，页120-123。
2 4	顾颉刚 于连士升 1973 年游北京时，重赠连士升手书	“不知候忌为何事 但瞩光明益向前”	同上，页126。
2 5	蒲耀瓊 <忆连士升同学>	- 蒲耀瓊为连士升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时常一起散步，一起读书讨论，还曾被认为是连士升的对象。 - 她形容连士升“极端好学而深思”。 - 他的文章“因为职业关系，他一方面要应南洋华侨的需要，又要不得罪新加坡的政府当局，所以他的文章都是很含蓄的，与他年青时的豪情奔放的个性不同。” - 至于他的学问，“除了几本传记外，都是没有学术性的随笔，与他要写几本‘传诸后世’的著作的初志不合”。	同上，页127-132。
2 6	吴绍葆 <我所认识的连士升>	对连士升被成为‘海外的鲁迅’（按：连士升也被称为‘南洋鲁迅’），认为两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同样是著作等身，同样是‘青年导师’；然而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不同作风。鲁迅愤世嫉俗，笔下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而连士升主张以平和的态度，循循善诱。	同上，页133-134。
2 7	陈雪锋 <红帽子险送走连士升>	以“温、良、恭、俭、让”形容连士升。 记述当年商报老板李玉荣通知他，政治部要把连士升驱逐出境，原因是他的思想有‘急进嫌疑’，陈雪锋通过另一记者向当时主持华民政务司的郑惠民询问，明白郑惠民不以为然的态度后，再通知李玉荣，在李玉荣的担保下，郑惠民答应为连士洗却冤屈。	同上，页135-137。

28	连文思 <我的父亲>	讲述其父的嘉言懿行。	同上，页138-141。
29	连亮思 <连士升生平>	• 记述连士升在报馆当主笔时，当时言论自由受限制，他有好几次“差不多被驱逐出境”，但因为他的人缘很好，每次都有人从中帮助，化险为夷。 • 记述连士升年轻时对改革社会，从事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兴趣，曾在他的纪念册上写下‘为民先锋’四个字，并希望儿子能如‘小彼得’，为他一偿夙愿，（注：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1783年时他获任首相，时年24岁，时至今日，仍然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但是对着丑恶的政治以及言论的限制，所以变得对政治不闻不问，专心在治学与做人上下功夫。 • 研究印度，也是因为中国问题敏感，所以转移目标研究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的三杰 - 泰戈尔、甘地和尼赫鲁。 • 1961年被委为公众服务委员会的委员，为政府部门挑选适合的人选。连士升为委员会唯一的中文教育者，对那些从中文学府来的应征者，特别关照、当他们英文表达不流利时，帮助他们发挥其他的优点。	同上，页142-147。
30	罗梅 <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头>	记述连士升在1973年中国之行回来后至逝世的经过。	同上，页148-150。
31	李星可 <答客问>，《乱世沧桑 - 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	记述1971年报界‘五月风暴’事件，仝道章、李星可被捕后，李有成社长继续主张强硬立场，但要有人执笔。当时在南样商报的连士升辞职。李星可认为这是因为连士升“胆小如鼠”，“一向有‘变色龙’之称的连士升被吓走了，告老退休。”	李星可 <答客问>，《乱世沧桑 - 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91），页159。

		连士升承认：“老实说，我对于文学是外行。我的主要兴趣在于政论、经济史、传记及游记。可惜近来国际关系越来越紧，言论自由大受限制，尤其写政论容易触犯法令，因此我暂时改变‘文人论政’的习惯，把这份精力省下来多看一些文学的书籍。” 高凡认为连士升的处世法宝是务实主义。“连士升的务实主义思想，是经过深切体验到中国传统的得失，并透彻地了解到人性的优劣得以形成。”（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页158）	连士升〈何其芳著：《刻意集》〉，连士升《春树集》，（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页223。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7），页158。
3 2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	高凡指出了连士升的为人和作品特点： • 以努力为宗旨，以励志为目的（笔者总结）——从8集《海滨寄简》中即可看出（页68） • 坚守曾国藩所信服的孟子‘动心忍性’的理念，“曾国藩的这种‘打脱门牙和血吞’，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力挽狂澜。匡时救世于非常事业的精神，正是连士升所趋之若鹜的。”（页69）（笔者认为从连士升的生平可看出他百折不挠的精神，从社评中可看出他有匡时救世的理想，他也很钦佩曾国藩（号涤生），但即使在〈略论曾涤生〉一文中也未直接提到曾国藩‘动心忍性’的精神。） • 连士升通过理性的分析论证，通过社评提出他的建议和看法（页72-77）。连士升是通过新的‘以文论证’的方法，以‘文质彬彬’的文学素养、人文情怀来审时度势。（页98-99） • 从1960年起，‘建国’的报导文字成了连士升文章的主要内容。（页124）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7），页67-69，72-77，213-214。

	高凡总结连士升的作品（页 213-214）： • 论述得“过于平和、过于学术、过于沉着、过于老气、过于理性，像这样的书读起来，肯定不够痛快”。不过，“连士升确实又是我们新加坡历史与现实的最清醒的观照，他不断为我们释放出对于文化意识的思想动力，当我感到迷茫的时候，我又不能没有他。” • “他相信新马华人是讲究实际的，到了他们真正能够从她的见解中得到实惠的时候，他相信他们会支持他，会同他站在一起，用不流血革命去争取思想的独立和谋取和平自由。” • 她认为我们应该从连士升的文献中学习他的忠诚。“学习他忠诚地面对他的国家与人民，忠诚地写文章反映世态人情，忠诚地提出解决方案，就忠诚二字，所以我们必须肯定他为新加坡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肯定他在新加坡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 在写作艺术上，高凡认为连士升“长于叙述和议论而短于抒情”（页 67）。庄钟庆为高凡写的序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指出“他主张散文的艺术形式必须同现实结合，同现实交通，同历史对话”（页 7-8）。换言之，连士升的散文主要是为社会服务的。 笔者认为高凡在分析连士升的文笔上有精准之处，但在评述他的思想上不够严谨，往往在评论时缺乏充分的论证，有时甚至显得牵强。比如她说：“《甘地传》、《尼赫鲁传》、《泰戈尔传》这三部传著虽以探讨三位人物的丰功伟绩为主轴，但谁也知道其终极意义仅在于对新马社会的人文独立机制的探讨”（页 94）。首先，她在这段话后所举连士升所述尼赫鲁对英国人和印度人的认知，不能证明她的评述（页 94），更重要的，是这三部传记的最初出版年代为 1963 至 1968 年（这是有注明出版社的版本，《连士升纪念文集》中所记的年份更早），他用了 15-16 年的时间写成。以 15 年计	庄钟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读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页 7-8。

		算，还不算出版的时间需要，写作年代为 1948 至 1953 年，他是在 1947 年才到新加坡，应该不会初到星洲，即了解新马社会，并立定‘其终极意义’为探讨新马社会的人文独立机制。 此外高凡言从 1960 年起，‘建国’的报导文字成了连士升文章的主要内容，但也缺乏充分的举证。	
3 3	郑嘉怡《连士升与新马华人文化》	<u>在<北望中原>中的中国认同</u> • 1950 年在《南洋月报》专栏 <北望中原>所发表的文章，目的是“借写作的机会，督促自己和鼓励读者多多注意国事的发展，身在海外，心怀故国，想亲爱的读者定有同感吧”。（<北望中原>，《南洋月报》第一期）。 • 曾称中国政府为‘我政府’，称中国为‘我国’、‘我们’。 • 从他的文章中，表达对中国的热切希望。并在第 12 期，希望能通过报道中国时事，加强每个人对祖国的‘向心力’。 <u>教育</u> • 对新马的社会、教育、文化都有诚恳的建议。例如在连士升的社论里，有关教育的数量不少。 • 他以学以致用为教育的最高宗旨。无论是教育政策、教育方法或是语文问题，都以此为原则，主张理论和实际并行。 • 主张新马的教育政策方向需和国家建设方针配合。 • 强调“先通母语，兼通多种语文”，预料华文在全球的地位将日益提高，使用范围将逐渐扩大。 <u>看法的形成</u> • 连士升的看法和他在燕京大学的教育以及他在中国的生活体验中得来。 • 在分析问题，引用中西方的案例。 <u>影响</u> • 连士升通过他的文字，以及他所参加的这种学	郑嘉怡《连士升与新马华人文化》为郑嘉怡国大中文系荣誉学位论文。（2002/2003）

		术活动和团体，如南洋学会、新加坡作家协会、公众服务委员会、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等的群体力量，推动社会、教育及文化的发展。	

连士升 主要参考资料:

A. 连士升的著作与译作：见此附录中第 2 项

B. 其他资料

1. 陈文滨、苏永明《连士升史学初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8）第 4 期，15. 8. 2018 发表。
2.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7）。
3. 蒋亭亭《南洋传家第一人 - 新加坡第一位职业传记家连士升》（现代传记研究，2016）第 2 期，30. 11. 2016 发表。
4. 李星可〈答客问〉，《乱世沧桑 - 一位传奇人物·八十自述》（新加坡：中外翻译书业社，1991）。
5. 连士升《春树集》（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
6. 连士升《回首四十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09）
7. 连士升《慧眼静观 - 连士升社评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 月）。
8. 连士升《卓识思远 - 连士升社评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
9. 连文思《寻找父亲的足迹》，《怡和世纪》31 期（2017）。
10. 连文思、连亮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新加坡：南洋学会，1976）。
11. 连聪、连兰、刘瞳《南洋鲁迅 - 连士升》（炎黄纵横，2011 第 12 期）。
12. 罗梅、连亮思、连侨思、连文思、连萧思访谈，National Archives, Literary Scene in Singapore (Chinese), NLB Accession Number 003126.
阅览日期：9. 8. 2019。
13.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的情谊》. <http://www.hstao.com/Lien.pdf>. 阅览日期：10. 8. 2019。
14. 杨焄《不知嫉忌为何事，但瞩光明益向前：关于郑侃嫔》
<https://new.qq.com/rain/a/20221005A02OVO00> 阅览日期：10. 5. 2022。
15. 颜清煌《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助教职位》.
<http://www.nandazhan.com/huiyi/nydx1963.htm>. 阅览日期：28. 8. 2019。
16. 郑嘉怡《连士升与新马华人文化》，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2/2003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附录 7：杏影 生平·著作·他人评论

杏影（1911（？）－ 5.1.1967）

杏影原名杨芳洁，又名杨守默。笔名另有钱杏影、公孙哲、里奇、爱欲生、芍红和杨杰等。（〈杏影生平简介〉，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页 8）

1. 生平·大事记

	生平、重要事项	日期	内容	备注/出处
1	早年事迹	从出生至 14 岁	林臻〈杏影先生事略〉言杏影从出生至 14 岁的情况资料短缺，他在世时又绝少提及个人情况，因此早年事迹不详。	林臻〈杏影先生事略〉，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页 204。
1 a	出生	1911 年或 1912 年。还有一说为 1910 年。 出生月 日不详。	出生于中国，原籍四川简阳县，但不是四川人。他的四川口音，是受了父亲杨草仙的影响。 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页 8 记杏影出生于 1911 年。此书由多位编者长时间努力搜索诸多原始资料完成，可信度高。 国大图书馆网页：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_bank-xingying.pdf 记杏影出生于 1912 年。	李汝琳〈回忆杨守默〉，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11。 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8。 国大图书馆网页：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_bank-

			林臻 <杏影先生事略>，推算杏影可能生于 1910。他以杏影在 1950 年 1 月所写的 <谈不惑之年>中说 “四十岁是孔子说的‘不惑之年’” 作为旁证参考。	xingying.pdf 。 林臻 <杏影先生事略>，页 204。
1 b	中学	不详	在中国念中学	李汝琳 <回忆杨守默>，页 11。
2	在日本受高中及大学教育			
2 a	高中	1925 年	14 岁时，由父亲杨草仙携汪日本东京就读于高级中学。 杨草仙是清末“杰出的思想家、慈善家、诗人、狂草书法家”，在 1950 年他 112 岁时开了一个书展，展示他二百多件书法。	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8。 <杨草仙小档案>，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45。
2 b	大学	约 1935 年	上日本早稻田大学。 一说为他在早稻田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另一说为杏影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的是教育，精通中、日、英三种语文。 他在日本生活了‘十来年’。“14 岁就上日本读书，天天吃‘和食’，吃了十来年”。日本的经历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 <谈谈杏影的散文>，《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20。 李汝琳 <忆故人>，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38。 杏影<新年怀思>，杏影《书与人》（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1960 年他也曾担任新加坡广播电台“日本文化系列讲座”的每周讲座。主要是介绍日本的风俗习惯、新旧文化、佛教等，随后在南洋商报发表。 杏影所写有关日本的文章，计有〈日本文化的新与旧〉、〈明治维新和现代日本〉、〈走向一个伟大的日本〉、〈日本的风俗习惯〉、〈孔子学说在日本〉、及〈日本的佛教〉。	12；林臻〈杏影先生事略〉，页 204。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_bank-xingying.pdf。 庄明萱〈杏影论〉，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88；〈杏影的论著〉，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122-155。
3	回返中国，开始发表文章	1936 年	杏影由日本回返中国四川重庆后，便开始在文艺副刊发表文章。 “我自己是差不多是在二十五、六岁时才写出一篇可以发表的文章。” 1936-1941 年杏影在中国生活约 5 年。加上他去日本的前 14 年，他大概在中国生活了 19 年。	同上；杏影〈致 C.F. 文友一封〉，《杏影先生信抄》（仙人掌出版社，1995 年 6 月），页 58-59；林臻〈杏影先生事略〉，页 205。
4	旅居印度	1941 年至 1945 年期间	旅居印度新德里，并在 1945 年受聘于印度加尔各答盟军总部以‘日本通’的身份被聘用。在旅居加尔各答期间，他经常在当地《中国周报》文艺版副刊发表散文。 在印度期间，结识了金克木、郭史翼、李汝琳，互称‘印度同乡’。	李汝琳〈回忆杨守默〉，《杏影研究专集》，页 11；李汝琳〈忆故人〉，同上，页 37-39；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8 记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记杏影 30 岁以前在中国和印度报章曾发表的作品已无法寻见。李汝琳〈忆故人〉，页 39 除列杏影的五册散文集子，加记：“守默在印度发表的散文和杂文，都没有收在集子里，我还保留着，作为我们交往悠久的纪念”。 收在杏影《读书和写作》中有三篇有关印度的文章：〈谈谈印度的热〉，〈我看印度的鸟〉，〈印度的乌鸦〉。杏影《书与人》中有两篇：〈印都杂记〉和〈印度的麻雀〉。根据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中所记录，《读书和写作》的写作年份为 1947 年-1953 年，《书与人》为 1949 年-1954 年，显示杏影的有关印度的文章都写于他 1947 年离开印度之后。 马夫之《论杏影》认为杏影对于印度似乎有着特别的感情，钦佩甘地和尼赫鲁：“甘地的不抵抗运动，尼赫鲁的消极中立和平思想在推动杏影，使杏影屈服于在争取民族民主自由的运动所采取的不流血革命的奇迹。”	《中国周报》为《中国时报》。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杏影 - 他不会寂寞》，页 19。李汝琳〈忆故人〉，页 39。 杏影《读书和写作》（新加坡：南洋报社，1954），页 27，65，115； 杏影《书与人》（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页 16，115。 马夫之〈论杏影〉，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57。
5	到新加坡后的工作与写作	1945 年 9 月	他从印度到达新加坡。 忠扬认为杏影刚到新加坡时，二战刚结束，许多作家回归文艺行列，但闻名文坛的多数是南来作家。杏影急欲培养本地人才。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_bank-xingying.pdf。 忠扬〈文艺青年的导师、散文家杏影〉，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

				集》，页 64。
5 a	任教师兼报 馆翻译	1947 年	抵新后初期在华侨中学执教，后于 1947 年任职于南洋商报担任翻译工作。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bank-xingying.pdf 记杏影开始在教育界服务，1947 年才开始在南洋商报任职。
			于 1947 年任南洋商报电讯翻译，兼任华侨中学教师。在商报副刊和期刊如《星期六》、《文艺行列》上发表许多散文。	《杏影 - 他不会寂寞》中的〈杏影生平简介〉，页 8 及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页 8 记杏影于 1947 年任南洋商报电讯翻译，兼任华侨中学教师，未提就职时间先后。
			然而于 1949 年五月写的〈寄华中同学〉杏影却记述他来华侨中学不过四个多月。	杏影〈寄华中同学〉，杏影《愚人的世纪》，页 19-21.
			黎达材记杏影于 1949 之 1950 年间于华侨中学执教，并经历华中五·卅一事件。	黎达材《杏影作品的启示》（新加坡岛屿文化社，1993），页 175 及 185； 《新加坡华侨中学毕业特刊 1950 年》页 26 的教职员

				照片中有杨守默（杏影）； 页 84-87 记华中五·卅一事件；郑安仑〈华中记忆〉， 《华侨中学建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页 145-147 也记五·卅一事件。
5 b	主编南洋商报文艺副刊五种，近两千期。共主编副刊 13 年。	1954 年 1 月 18 日至 1967 年 1 月 5 日	当他在南洋商报担任翻译工作时，被邀请编辑南方晚报的文艺副刊《绿洲》，但一方面他没有编辑的经验，怕编不好，另一方面他和本地作家‘几乎全不认识’，认为自己不能拉到稿件，就推辞了。直到 1954 年初，南洋商报发生人事变动，当时的文艺副刊编者姚紫‘急遽离职’报馆便请杏影替上，从此开始了他的副刊编者生涯。 “有个时期，他被报馆‘冷冻’了七八个月，什么工作都没给他做” - 原因和其他详情待查。 从以下记录，杏影也曾同时主编两个文艺副刊。	杨守默〈做一个副刊编辑的经验〉，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118；叶钟铃〈杏影与《文风》副刊〉，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93。 文兵〈恍见牵头挑灯人〉，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32。
5 b · 1	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文风》。	18/01/1954 - 15/08/1958	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文风》，共 4 年 8 个月，828 期。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杏影 - 他不会寂寞》，页 18。

5 b . 2	主编《新苗》	01/03/1958 - 05/08/1958	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新苗》，共 45 期。	同上
5 b . 3	主编《南洋公园》	22/06/1959 - 15/07/1960	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南洋公园》共 102 期。	同上
5 b . 4	主编《文化》	17/07/1960 - 26/02/1964	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文化》，共 144 期。《文化》较重视学术性的文章。	同上；杏影〈致洪天赐信（60 年 8 月 16 日）〉，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页 84。
5 b . 5	主编《青年文艺》	20/07/1960 - 6/2/1967	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副刊《青年文艺》共 729 期。 杏影去世后，《青年文艺》还继续出版了 10 期才停刊。原来杏影入院前已编好十多二十期的《青年文艺》给排字房。他在医院初期，还托人从报馆拿稿给他看。	同上； 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82。
5 c	参与广播	1960 年	他也担任新加坡广播电台的每周讲座。这是个“日本文化系列讲座”，主要介绍日本的风俗习惯、新旧文化、佛教等。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bank-xingying.pdf
6	逝世	1967 年 1 月 5 日	如依据他的出生年为 1911 年，他在世仅 56 年。	林臻〈杏影先生事略〉，页 204-209。
7	纪念杏影			
7 a	杏影先生逝世 40 周年纪念会及专辑	2007 年 9 月 15 日	一群曾受惠于在《文风》的文艺工作者，以《仙人掌出版社》的名义，联合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举办了“杏影先生逝世 40 周年纪念会”。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于 2009 年出版《杏影 - 他不会寂寞》，内容包括〈杏影先生逝世 40 周年纪念会暨展览专辑〉、杏影作品选、杏影所主编的副刊资料、研究杏影的一些文章等。	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

7 b	肯定杏影的贡献		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一系列《新华作家研究丛书》，肯定新华老作家的贡献，促进学人对他们的研究。已出版的有苗秀（1991）、杏影（1995）、姚紫（1997）、赵戎（2000）、李汝琳（2003）、铁抗（2006）研究专集。《杏影散文选》也是新加坡文艺协会为已故作家出版的作品集之一。	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刘笔农主编《杏影散文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

2. 杏影的著作及信抄

	书名/篇名	著名	写成年份	篇数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出处
1	读书和写作 （这是杏影的第一本文集，也是他担任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文风》后出版的第一本，这些文章都是在新加坡写的，目的是以文会友，结集成书也是作为在新加坡的纪念。）	杨守默	1947 - 1953	19	1954 年 7 月	新加坡：南洋报社	〈杏影作品总目 - 专书〉，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页 154-155； 江天 〈关于杏影的五本著作〉，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99-105；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 〈谈谈杏影的散文〉，页 19。
2	书与人 （在〈后记〉（页 270）中说他写的这些随笔，是诚实的记下了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场合中自己的感情。）	杏影	1949 下半年 - 1954 尾	54	1958 年初版，2005 年再版	新加坡：青年书局	〈杏影作品总目 - 专书〉，页 156-157； 江天 〈关于杏影的五本著作〉，页 101-102；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 〈谈谈杏影的散文〉，页 19。
3	趁年轻的时候	杏影	1950	4	1958 年	新加坡：	〈杏影作品总目 - 专

	（杏影〈自序〉（页1）中说这四十多篇随笔是在一个短时期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说话的情况下，藉笔来自己说给自己听的。）		- 1954	4	8月初版， 1960年3月再版， 2006年三版	青年书局	书》，页160； 江天〈关于杏影的五本著作〉，页100-101；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页19。
4	杏影、孜肃、鲁白野、贺斧等著《散文选集》	公孙哲（杏影）	1950年6月（〈没〉）； 1950年12月（〈理〉）	2	1958年	新加坡：狮城文化供应社	包括杏影两篇散文：〈没有风的晚上〉（页1-6，藉闷热的夜晚，抒发对社会现象的不满，他期待风、光明和叫唤的声音）及〈理性和科学〉（页131-135，主张理性与科学结合，为人类服务）。〈理性和科学〉目录记为〈科学与理性〉。编者未署名。
5	愚人的世纪（包括了对东西方几位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看法。）	杏影	1947- 1959	7 9	1960年初版， 2004年再版	新加坡：青年书局	〈杏影作品总目-专书〉，页158； 江天〈关于杏影的五本著作〉，页103-104；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页19。
6	想想写写（在〈读书偶译〉这一部分，在116篇中包括了多过250则东西方名人的名言翻译。）	杏影	1952- 1953	1 4 2	1961年初版， 2006年再版	新加坡：青年书局	〈杏影作品总目-专书〉，页161； 江天〈关于杏影的五本著作〉，页104-105；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页19。
7	杏影先生信抄	林臻辑	杏影		1995年	仙人掌出	林臻原名陈国安，

	（除了杏影给文友的 42 信外，还有 3 封文友给他的信及 10 段友人对他的追思）	录	信抄能查证的日期：1952 - 1955，1959 - 62，64-65		6 月	版社	是《文风》早期作者之一，收集了杏影与新马文友的来往信件，勘查杏影的履历和资料，并于 1995 年完成了 42 封信的繁体手抄本，定名为《杏影先生信抄》，装订后赠与杏影夫人及友好，足见林臻对杏影不逾的情谊。 （柳舜 <序二>，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他不会寂寞》，页 7）。
8	杏影散文选	杏影著，刘笔农主编		70	1999 年	新加坡文艺协会	新加坡已故作家作品选集之一。其他五位为苗秀、姚紫、赵戎、李汝琳、刘北岸的作品选。

3. 他人对杏影的评价

	作者 / 出处	评论	备注													
1	刘笔农序， 《杏影散文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10.	“在新华的报章副刊编辑中，提携后进成绩最显著的，莫过于杏影和姚紫。他们两人，不但在编选稿件上倾尽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把年轻的写作人视为文坛接班人般在细心培育。姚紫因为个人才华高超，所以，他手下的写作人，自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他的编版功夫尤其是文坛上无人能及的一绝；而杏影，则是用爱心在编版，他不但把每一位年轻的写作人看成是文坛的幼苗来培育，他甚至写文章、写长信向他们灌输爱心，花尽心血，把他们当成碧玉来雕塑，从文章到人格，毫不放松。姚紫的才情，杏影的爱心，让他们的形象长久地烙印在不少当时的年轻一代写作人的心版上，直至永远。”	姚紫与杏影： <table><tr><td></td><td>姚紫</td><td>杏影</td></tr><tr><td rowspan="2">相同点</td><td colspan="2">都是编者，在编选稿件上倾尽心力</td></tr><tr><td colspan="2">都用心培育新人</td></tr><tr><td rowspan="2">不同点</td><td colspan="2">姚紫编版功夫一绝</td></tr><tr><td colspan="2">杏影以爱心培育幼苗</td></tr></table>		姚紫	杏影	相同点	都是编者，在编选稿件上倾尽心力		都用心培育新人		不同点	姚紫编版功夫一绝		杏影以爱心培育幼苗	
	姚紫	杏影														
相同点	都是编者，在编选稿件上倾尽心力															
	都用心培育新人															
不同点	姚紫编版功夫一绝															
	杏影以爱心培育幼苗															

2	林臻 <岁月悠悠思悠悠>，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页 12-13； 柳舜 <序二>，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页 7）； 林臻辑录《杏影先生信抄》（仙人掌出版社，1995 年 6 月）	林臻的这一段话，总结了他自己以及‘文风之友’对杏影的感激之情： “从遗留下来写给多位‘文友’的信中，尤其能够近距离看到：在身为副刊编者的杏影先生那一端，他不仅尽了一个编者的本分职责，用心审阅每一份来稿，进行修改，并尽可能给予发表的机会，甚至进而关切文章以外与作者密切相关的种种事项 - 生活、工作、求学领域遇到的问题几乎无所不有，其中几个还曾经得到他剑及履及的无私支援；在作者这一端，投稿不再只是由寄出到等待发表的固定流程，伴随而来的还有认真的指导，温馨、亲切的关怀。名为《文风》的副刊似乎正是特地为此而设的一个平台：一位编者和一大群素昧平生来自各处和不同领域的‘文艺青年’得以聚集在一块儿，在呈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以文会友’盛况的同时，也为各自的人生之旅添上一笔斑斓的色彩。”（林臻 <岁月悠悠思悠悠>，页 12-13）。	林臻辑录《杏影先生信抄》，内含杏影给文友信 42 封，文友给杏影信 3 封及 10 位友人对他的追思。
3	文兵 <恍见牵头挑灯人>，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31。	当他还不认识杏影时，多次投稿，即使杏影认为不合适，也用红笔仔细修改了再寄回给他。认识杏影后，发现他对其他人都是这样不辞劳苦的培植。	杏影爱护后进具体例子之一
4	李汝琳 <忆故人>，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38。	杏影不但修改投稿者稿件，还提意见教导作者修改。	具体例子之二
5	子讯 <忆杏影先生>，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29。	他对杏影产生仰慕，是看到杏影在《文风》编后的‘补白’。“虽只寥寥数语，可却是字字珠玑，寓意很深”。 杏影“对后辈的提携，可说不遗余力。每次收到好的稿件，他总要抽空给作者写几句勉励的话；如稿件不适合《文风》刊用，他也会主动给予转到其他地方发表。”	具体例子之三
6	李向 <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一封>，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68。	杏影起初帮他把稿子转给副刊编者，使文章很快得以发表。主编《文风》时，总是让他有机会发表文章，又常常称赞他读书能力强，文章不比怎样修改就可以用等。	具体例子之四

7	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二封〉，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69-70。	李向曾有口吃，杏影除开解他外，还带他去请教医生，替他付诊费。李向再要杏影陪他向心理医生咨询，杏影马上用车子载他陪他问诊。 李向还在新加坡的一个小岛教书时，请杏影介绍他到报馆任职。报馆聘书很快收到，要他从9月开始上班，而学校要他教到年终。他只好早上教书下午到报馆。杏影家离小岛较近，为节省时间，杏影让李向在他家住了三个月，还对他的起居百般照顾。	具体例子之五
8	苏清强《失落的霞影》（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10）页60。	苏清强中学时把稿投给《青年文艺》，收到杏影修改后的稿件，“有用红笔删掉的段落，有增添的文句...,,文章后还有他的附言，勉励一番，我还收过他用毛笔字批改过我的稿件。虽然是退稿，可我依然是高兴了好久。...,,毕竟，有无发表，都一样令人欣慰。因为我都能感受到编者的关爱。”	具体例子之六
9	李汝琳〈忆故人〉，页38。	杏影不登对李汝琳捧得过火的文章，但告诉他；不发表攻击李汝琳的文章，也不告诉他。	杏影的原则
10	叶钟铃〈杏影与《文风》副刊〉，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94-95。	杏影不喜欢吹捧的文章，也不登骂人的文章。对于稿件中提到的人名和事件，格外小心，为了避免因为确有其人而引致的麻烦，他常替文中人物改换姓名，对事件也要求确定。 杏影要求作者“能惠寄没有火气的批评文，幽默的规劝，无刺的讽嘲，和能以理性说服别人的好文章”。	杏影的原则

杏影 主要参考资料：

A. 杏影的著作及信抄：见本附录中第2项

B. 其他资料：

1. 江天〈关于杏影的五本著作〉，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99-105。

2. 黎达材《杏影作品的启示》（新加坡：岛屿文化社，1993）。
3. 李汝琳〈回忆杨守默〉，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10-13。
4. 李汝琳〈忆故人〉，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37-39。
5. 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二封〉，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69-70。
6. 李向〈给朋友的几封信·第五封〉，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82。
7. 梁三百讲述、林臻撰稿〈谈谈杏影的散文〉，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页 18-22。
8. 林臻〈杏影先生事略〉，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页 204-209。
9. 林臻〈岁月悠悠思悠悠〉，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页 12-13。
10. 骆明主编〈杏影的论著〉，《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114-159。
11. 马夫之〈论杏影〉，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57。
12. 苏清强《失落的霞影》（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10），页 60。
13. 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作品总目〉《杏影-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页 154-201。
14. 文兵〈恍见牵头挑灯人〉，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31-33。
15. 杏影〈理性和科学〉及公孙哲（杏影）〈没有风的晚上〉，杏影、孜肃、鲁白野、贺斧等著《散文选集》（新加坡：狮城文化供应社，1958）。页 1-6，131-135。
16. 杏影〈致洪天赐信（60 年 8 月 16 日）〉，载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杏影 - 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页 84。
17. 叶钟铃〈杏影与《文风》副刊〉，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93-98。
18. 子讯〈忆杏影先生〉，载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29-30。
19. 忠扬〈文艺青年的导师、散文家杏影〉，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页 64。
20. 庄明萱〈杏影论〉，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页 88。
21. 国大图书馆网页：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databank-xingying.pdf。浏览日期：9.9.2019。

附录 8：李汝琳 生平·著作·编辑·他人评论

李汝琳（5.7.1914 – 17.3.1991）

李汝琳原名李宏贲，笔名包括司徒克、李极光、李延辉、李霖、李曼丹。¹⁶⁴²

李汝琳也以笔名崔岚、严晖、曹肃、丁宣在槟城星报日报方北方主编的文艺副刊《文艺公园》和新加坡南洋商报谢克主编的文艺副刊《新年代》上发表有关中国新文学的评介作品。¹⁶⁴³

李汝琳再以笔名黄康著作《走马看花毗邻》（11 篇游记）于 1987 年 12 月由李建编，新加坡永康花园联谊会出版。¹⁶⁴⁴然笔者未能寻获此书。

1. 生平·大事记

	生平、重要事项	日期	内容	备注/出处
1	出生	1914 年 7 月 5 日	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沁阳县。祖父是清代丙子科举人，祖母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孙女、工部尚书的女儿，父亲是丁酉科拔贡。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学会，2003），页 239.
2	幼年学古书		4、5 岁时母亲去世，祖母抚养他并教他念诗，他在私塾也读古书，先习《千字文》、《初学琼林》、《龙文鞭影》，再读《古文观止》、《千家诗》、《四书》、《左传》等。	同上；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97。
3	12 岁	1926	入高等小学。	李锦宗〈李汝

¹⁶⁴²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载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怀庐书屋，1984），页 1）；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页 239-245.

¹⁶⁴³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载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 7；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3。

¹⁶⁴⁴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5。

				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239.
4	上中学	不详	毕业后考入省立第十三中学.这时他开始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初三时，祖母去世。他把新诗〈哭祖母〉寄到省城报纸副刊发表。初中毕业时，他写了一篇〈到光明之路〉给校刊，却被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里，教务主任附上赞语。这写这两首诗收到的鼓励对他日后热衷写新诗，影响很大。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239；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页94。
5	升高中 - 爱上新诗 - 诗作获奖	1928 年秋 - 1930	升上省立第一高级中学，深受当时五四运动新诗的熏陶，喜爱五四文学，包括郭沫若、徐志摩、臧克家的作品。 1930 年以《风雪天》获得全班诗作比赛第一名。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239；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页95-96。
6	主编文艺刊物	1930- 1931	在高中最后一年，已发表许多诗歌。也先后主编了《寒雁》和《沁涛》两个文艺刊物，并在一家报章借版位主编诗刊《辛夷》，直到他去北平深造才停刊。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240；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页97。
7	在北平 - 上大学、学知识 - 发表作品 - 编辑刊物	1931 夏	在北平上大学，修读孙席珍、曹靖华和高滔的课，获得许多新文学知识，他的小说《小心的心》被孙席珍推荐在一刊物上发表。 在北平时，觉得孤单苦闷，写了《惜昨集》中第二辑的作品。并投稿给中国新诗歌会出版的《诗刊》。 与堂叔、三弟及好友联合出版《北斗季刊》（出版两期后引入麻烦停刊，原因不详）与《北斗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240。 同上 同上；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页

	- 编辑自己的作品		半月刊》（出版十多期），后又出版《巨浪》，不久《巨浪》也停刊。 在大学三、四年级时把自己的作品编成《惜昨集》《红叶集》与《苦寒集》。后来只有《惜昨集》得以出版。	97。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 240； 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页 98。详情见以下第 10 项。
8	休学一年，参与抗日	1935 夏	以‘民先’队员的身份在开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往南京请愿抗日。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 240。
9	回北平上完大学、出版诗集、获学士学位	1936 夏 - 1937 年 6 月	1936 年回北平上大学最后一年，出版《惜昨集》并通过老师介绍，加入北平作家协会。1937 年 6 月获学士学位。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 240-241。
10	抗日期间，除参与抗日外， -作品被劫 -任图书馆主任。 -与朋友合编文艺杂志 -创作	1938-1944	1938 年 7 月 7 日，北上参与抗日的行列。 1940 年，《红叶集》与《苦寒集》以及一本三幕剧《戮力同心》被劫。 曾任西北艺术学院图书馆主任。 与数友为第二战区文化抗敌协会合编大西北著名文艺杂志《西线文艺》月刊，他的独幕剧《梦》在这月刊上发表。这个时期他多写剧本和小说。	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页 98 记他于 1930 至 1938 年间，把他的诗编成《惜昨集》、《红叶集》与《苦寒集》3 集，现在只留下《惜昨集》。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 241 记：《红叶集》与《苦寒集》及《戮力同心》‘被劫’，而李汝琳〈<惜昨集>再版后记〉（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82)，记《红叶集》‘失落’，而《苦寒集》‘被劫’。另外。李汝琳〈后记〉，《李汝琳创作集》，页346则以‘没收’形容这些作品的遗失。真实情况是否与他诗集的思想内容有关不详。
1 1	父亲逝世	1944	父亲在家乡逝世	〈李汝琳年表〉，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10。
1 2	在印度主编文艺副刊三年多	1944年9月2日－1947年12月	应同乡翟君的邀请，到印度加尔各答主编《中国周报》和《中国日报》的文艺副刊，并以李极光为笔名，发表诗歌和散文。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241；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页98。
1 3	初至新加坡	1947年12月24日	1947年12月24日到新加坡后，起初没有工作，写了《海程》等稿，投于星洲日报《晨星》。其他一些杂文也在新加坡和檳城发表。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页241。
1 4	于华侨中学任职	1948年秋	被华侨中学聘为教务主任。因忙于公务，八年没有写诗。	同上
1 5	成家	1949年6月	与黄莹结婚	同上
1 6	促进教师专业	1952－1955	1952年4月与一些教师发起筹组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该会于同年6月成立。他被选为常任理事之一，一共连任三届。	同上

			他也曾任新加坡教师总会副理事长。 《南洋教育》在南洋商报借版位出版，李汝琳为主持人之一。	
17	推动文艺事业	1953-1954	新加坡南洋报社与新加坡华文中学校教师会出版《南洋青年》半月刊，李汝琳为主持人和编委之一。	同上，页 242.
18	辞去华中教职	1953	辞去华侨中学教务主任一职，较有时间写作。	同上
19	加入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	1954	加入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担任高级讲师兼华文系主任。	同上，页 242
20	重新写诗	1956	出版诗集《再生集》，开始以李汝琳为笔名，开始重新执笔写诗。	同上
21	编辑丛书、创作小说	1958	开始为青年书局主编《新马文艺丛书》、《南方丛书》及《新马戏剧丛书》，并创作小说。	同上
22	公民权被吊销	1959-1962 (?)	在 1959 年新加坡大选前夕被吊销公民权，两三年后才重新获得。公民权被吊销原因与重获公民权年份不详。	同上
23	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	1959-196? (不详)	<u>写诗: 1959-60</u> 以李霖为笔名，发表《长夜的黎明》、《路》、《荒》等作品。 <u>写小说: 1960-61</u> 完成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漩涡》。 这部小说写成后他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	同上
24	对李汝琳剧本创作与编辑的肯定	1965	被推选为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全马剧本创作比赛的评选委员会主席。	同上

25	于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	1970-1973	任教于南洋大学中文系。1973年退休。	同上，页 243.
26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顾问	1977-1991	1977 年被推选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后改名为新加坡作家协会）顾问，至逝世止。	同上，页 243.
27	继续写文章和出版。专题演讲。	1979-1987	发表创作和评介新文学的文章、出版作品单行本、讲演文学创作的理论等。	同上，页 243.
28	逝世	1991年 3 月 17 日	在去世前多年视力减弱。最终因脑癌逝世，享年 76 余。	同上

2. 李汝琳 的著作

诗歌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惜昨集	1936年 9 月	北平北斗书局初版	内分 3 辑： 第 1 辑 - 写于 1930-32 年，是他“在 20 岁以前，在毛头小伙子横冲直撞的年代里写的，总算没有太不健康的东西。”（李汝琳 <惜昨集>再版后记>，页 83）。 第 2 辑 - 是在他“最苦闷的年代里写的，感情是真实的。”（同上） 第 3 辑写于 1936 年 3 月之后，以“健康、乐观、坚强”为基调。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年日，因为此后，他和“苦闷烦恼绝缘了”。（同上） （再参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3；李锦宗 <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平及著作》，页 8 ）。
		1966年 12 月	新加坡青年书局再版	
2	再生集	1956	钟玉春	共 11 首诗。见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

	(写于 1936 - 1947 年)	年 7 月	出版	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4；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平及著作》，页 8-9。
3	扣门	1961 年 9 月	香港万 里书局	《扣门》是《再生集》的增订本。只有 6 篇是新作。内分 2 辑： 第 1 辑写于 1944-1960 年，在印度和新加坡写成，11 篇中有 5 篇是《再生集》的旧作。 第 2 辑的 6 篇全是《再生集》的旧作。（参李汝琳〈从读诗到写诗〉，页 99）。
4	金与沙	1980 年	新加坡 万里书 局	共有 22 首诗歌，19 首写于 1960 及 1970 年代，3 首写于 1940 年代。“李汝琳的诗歌，格调流畅，字句简洁明快，风格清新明朗，感情自然流露，主题十分鲜明，内容也相当深邃。”（黄梅雨〈李汝琳的第四部诗集〈金与沙〉〉，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348-349）。

散文/杂文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艰险的行程	1956 年 7 月	钟玉春 初版	内收 13 篇，分 3 辑： 第 1 辑 共 6 篇 - 写于 1943-1944 年，写中国，充满中国原野的朴素气息。赵戎认为这 6 篇应该列为小说而非散文（赵戎〈论李汝琳的创作与功业〉，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平及著作〉，页 49）。 高峰认为这第 1 辑是报告文学，所记载的是作者“在敌后的实际生活情况”，表现了游击战士的战斗精神、人民的爱国情绪和敌后现实生活最凄惨的一面。（高峰〈《艰险的行程》与《再生集》〉，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 80-81）。 第 2 辑 - 有迹近杂文性质的散文； 第 2 辑里的〈诗的原野〉，是在印度写成的。李汝
		1962 年 8 月	青年书 局再版	

				琳崇拜泰戈尔，恰有机会参加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举行的泰翁八五诞辰纪念会，自称是“怀抱敬慕之心的诗人的追随着”，陶醉于大学美好的氛围内。（马摩西〈读艰险的行程〉，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75）。 第3辑－有迹近小说的散文。赵戎形容为“散文小说”。 第2、3辑的评介，又参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8；赵戎〈论李汝琳的创作与功业〉，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49及52；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244。
2	消夜集	1959年11月	青年书局初版.	内有：〈中国长篇小说的新收获〉、〈陀思妥夫斯基〉、〈陀思妥夫斯基的处女作〉、〈我的文学老师〉及〈关于阅读文学名著〉五篇。首三篇受到新加坡作家陈群的抨击。（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12）。
		1968年10月	青年书局再版	再版时受抨击的三篇由1961-1967年间的另外七篇作品取代。（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12）。
		2006年	新加坡：青年书局简体字版	
3	走马看花毗邻（游记11篇）	1987年12月	李建编，新加坡永康花园联谊会出版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245记李汝琳以笔名黄康著有此书，然笔者未能寻获。

小说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悔	1957 年 12 月	南华出版社	内有〈悔〉和〈炸〉两篇，署名司徒克。 洪林编《南华小说丛刊》之一
2	姐妹俩	1958 年 5 月	青年书局初版	内有〈巢〉和〈姐妹俩〉两篇。 《新马文艺丛书》之一
		1959 年 4 月	青年书局再版	
		2006 年	青年书局简体字版	
		1988 年	桂林：漓江出版社	除收〈姐妹俩〉外，还收〈公关荆〉、〈新贵〉、〈飘浮〉、〈炸〉、〈郁结的心〉、〈内疚〉、〈懊悔〉和〈泡沫〉共 9 篇。未收〈巢〉。
3	新贵（小说集）	1979 年 8 月	香港：海洋出版社	内有〈炸〉、〈巢〉、〈懊悔〉、〈内疚〉、〈泡沫〉、〈宝岛的来客〉和〈新贵〉7 篇。 《海洋文艺丛书》之一
4	飘浮（小说集）	1985 年	文学书屋（出版地不详）	据李锦宗〈李汝琳年表〉，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12，李汝琳于 1985 年把此书交于文学书屋出版。
		1987 年	香港：海风出版社	收 8 篇小说：〈老曹〉、〈江湖客〉、〈怪物〉、〈崩溃〉、〈探亲〉、〈飘浮〉、〈公关荆〉和〈夏岛絮语〉。（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5）。
5	李汝琳中篇小说集	不详	香港南方书屋	记于〈李汝琳的主要著作书目〉，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14。然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南

				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皆未藏此书。
6	漩涡（长篇小说）	1962 年 12 月 2004 年	新加坡： 青年书局 新加坡： 青年书局 简体字版	《南方文丛》之一，长达 20 万字，以印度华人社会为背景。
7	李汝琳小说选	1999	新加坡文艺协会	主编刘笔农，新加坡已故作家作品集之一。
8	悟	不详	西南开明书局印行	记于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5。

戏剧

	剧名/文章标题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重逢（独幕剧）	不详	不详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5 记李汝琳曾出版此剧，然新加坡各大图书馆未藏此剧。
2	戮力同心（三幕剧）	不详	不详	同上
3	五分钟内	1987	香港： 南方书屋	收于李汝琳《李汝琳创作集》，页 309-323。
4	梦（独幕剧）	1987	香港： 南方书屋	同上，页 324-343。
5	现代中国戏剧简史（剧评）	不详	不详	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45 记李汝琳曾出版此文。然笔者未能寻获。

综合性作品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李汝琳创作集	1987 年 3 月	香港：南方书屋	包括诗歌（53）、散文/杂文（23）和戏剧（2）共 78 篇，其中不包括小说； 《南方文丛》之一。 参李锦宗〈李汝琳的生平及作品〉，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目次及出版详情。

3. 李汝琳的编辑工作

1958 年至 1961 年，他为青年书局编撰了三套文艺丛书：

《新马文艺丛书》、《南方文丛》及《新马戏剧丛书》

《新马文艺丛书》	第一集（12 册）	第二集（12 册）	第三集（12 册）
长篇小说	韩素音《餐风饮露》		
中篇小说	韦晕《还乡愿》	赵戎《海恋》	方北方《说谎世界》
	李汝琳《姐妹俩》	李过《大港》	李过《新垦地》
短篇小说	絮絮《坎咪之死》	方北方《思想请假的人》	林参天《余哀》
	苗秀《边鼓》	于沫我《末流》	骆起东《翡翠带上》
	云里风《出路》	陈全《学艺记》	陈全《小城之夜》
	赵戎《芭洋上》	谢克《新加坡小景》	麦青《伙伴》
	貂问湄《腐蚀》	貂问湄《金马梭胶园》	吕朗《情义》
		姜宁《春暖》	丁冰《芭野上的春天》

戏剧	李星可《报穷》		宋人《长窗外》
散文	杏影《趁年轻的时候》	苗芒《铜锣声中》	王葛《路上》
		林潮《野火》	
		李汝琳《消夜集》	
诗歌	周粲《青春》	钟祺《土地的话》	鲁彬《号角》
	杜红《树胶花开》		范北羚《召唤》

《南方文丛》	共 12 册
长篇小说	韩素音《青山不老》 (分上下册)
	林参天《浓烟》
	林参天《热瘴》
	苗秀《火浪》
	韦晕《浅滩》
	赵戎《在马六甲海峡》
	李汝琳《漩涡》
游记	连士升《名山胜水》
散文	杏影《书与人》
	杏影《愚人的世纪》
	连士升《春树集》
戏剧	李星可《快艇》

《新马戏剧丛书》（共 6 剧）
朱绪《海恋》
叶苔痕《第二街》
陈征雁《封锁线》
罗大章《新一代》
史可扬《生活的旋律》
关新艺《学店》

4. 他人对李汝琳的评论

	作者 / 出处	评论	备注
		新马华文作家	
1	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修订版），新加坡：万里书局，1994。	在界定‘中国作家’时，林万菁认为李汝琳是属于“来自中国，然后落根新马，不再回返中国而在新马继续文艺事业”的一类，和林参天、铁亢（郑卓群）、李润湖（宋千金）、韦晕（上官彥）、刘思、杏影（杨守默）、丘絮絮、以今、柳北岸、范统（王秋田）同为一群，应归类为‘新马华文作家’，而不能称为‘中国作家’。（页6）	
		文艺长跑者	
2	爱薇《文艺长跑者李汝琳》 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33。	李汝琳常被称为文艺长跑者，因为他有 - 多方面的成就 - 严肃对待文艺事业 - 数十年坚持文艺创作	
3		三套丛书的编辑： 许多人都认为李汝琳对文坛主要的贡献在于三套丛书：《新马文艺丛书》（共3辑，每辑12册）、《南方文丛》（共12册）以及《新马戏剧丛书》（共6剧）的编辑。较详细的评论如下：	
		编辑目的	
3a	陈爱玲〈文坛前辈李汝琳〉，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162-163。	李汝琳编辑《新马文艺丛书》的目的为协助作家出版作品，因当时： 1. 作家发表了作品，但无法结集成书，容易散失。 2. 报章副刊篇幅有限，长篇作品难于发表。	
		选稿态度及方针	
3b	刘笔农〈应李汝琳邀同编‘新马文艺丛书’的一段往事〉，骆明主编《李汝琳研	根据刘笔农所记，李汝琳选稿的态度和方针是： 1. 选稿认真，凡有作家来稿他都会详细阅读，入选作品也再三阅读。 2. 以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及《现代长篇小	刘笔农对李汝琳选稿的规定与事实有些出入。刘笔农记在《新马文艺丛书》三辑内

	究专集》，页141-147；刘笔农〈作家、丛书编辑李汝琳〉，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怀庐书屋，1984），页30。	说丛书》为编辑的榜样与标准。 - 重视对作家的评鉴。 - 重视丛书内文体的分配。 - 每位作家只收一本作品，每种文体只选一册。所以36件作品中只有36位作家。不过亦因如此，使刘笔农所编辑的丛书得以收入这些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及新人的作品。 - 李汝琳计划编辑第四套《新马文艺丛书》时拒绝收入姚紫的作品，因为姚紫曾经坚决拒绝他的邀请。	的作者没有重复，但其实三辑内有重复的作者，即赵戎、李过、陈全、貂问湄、方北方和李汝琳。36件作品中共有30位不同名的作家。但因其中一位作家鲁彬即貂问湄，则只有29位作家。（赵戎记：鲁彬即貂问湄，见赵戎〈论李汝琳的创作与功业〉，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60）。
3 c	原甸〈灵前焚诗 - 悼李汝琳先生〉，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229-231。	- 称李汝琳编辑的三套丛书，“在我国文坛上，堪称空前且绝后” - 记李汝琳曾提丛书中有3位作者和他素不相识，表示李汝琳选稿‘不避疏’的公正。 - 李汝琳对他的鼓励，成为他出版《30年集》的鼓舞。	空前非不可能，但绝后何能断言？
		贡献	
3 d	刘笔农〈古稀老翁著书忙 - 文坛前辈李汝琳〉，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155-158。	- 李汝琳从1957年开始编辑的三套丛书，“突破了新马当年荒芜的出版局面，竖立了青年书局出版正统优秀文艺的美誉”。（页157） - 李汝琳在5年期间，为已出版的书看了约4百万字的稿，加上未出版的更是数目惊人。	
3 e	陈爱玲〈文坛前辈李汝琳〉，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164。	这三套丛书从出版“至今新马文坛还没有一套丛书出过36本的，大型的文艺丛书和戏剧丛书也没有出现第二套。”（陈爱玲未注明撰稿日期，按上下文推算，‘至今’应指1980年代。）	

3 f	马汉 <李汝琳与新马文艺丛书>, 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 页 258-261。	《新马文艺丛书》包括了当时文坛资深的作家以及 50 年代崛起的作者, 年龄上包括了老、中、青, 文体也多样化, 有全面性和代表性, 不论从文艺作品的保存或推广, 都有极大的意义和贡献。	
3 g	方北方 <巴金与李汝琳>, 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 页 166-168。	1. 李汝琳的这三套丛书, 反映了当地社会一定的内容。这共约三百万字的作品, 使海外对新马文坛作品还是很模糊的人士, 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2. 马华文学写作人看到同行有不俗的表现, 淡化了妄自菲薄的观念。	
4		推荐并协助作者出版作品	
4 a	云里风 <敬悼李汝琳先生>, 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 页 221。	云里风的短篇小说集《冲出云围的月亮》和散文集《梦呓集》在李汝琳的协助下由青年书局出版。	
4 b	曾采 <永康路上少一人>, 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 页 184。.	他曾主持巴金主编, 茹志鹃、周介人执行编辑的《上海文学》中的《新加坡小说选》。在 1990 年, 根据他的选稿原则 (即必须出版过 2 本以上的小说, 并未曾被选入花城出版社的《新加坡华文小说家 15 人集》的作者), 推荐并发表了以下 8 位作者的 10 篇作品: 英培安《那零食档上的女人》(1 月号) 梅拉《抉择》、《苦恼》(4 月号) 田流《得失之间》(6 月号) 流军《西门丁》(6 月号) 洪生《马老先生》、《炼》(7 月号) 黄叔麟《牛车水之窗》(9 月号) 怀鹰《偷渡》(11 月号) 范北羚《最后一次宴会》(11 月号)	
5		培植新进作者:	
5 a	马汉 <李汝琳与新马文艺丛书>, 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 页	马汉的第一本创作集《听来的故事》在 1959 年出版后得到李汝琳的提点和鼓励。以后的通信也对他勉励有加, 并告诉他, 在《新马文艺丛书》出版第 4 辑时, 将收录马汉的一部小说。约 20 年后的 1982 年, 李汝琳邀请他将一部小说参与	

	258-261。	出版。虽然马汉的《无声之歌》已被接受，但随《新马文艺丛书》第4辑出版计划被取消，《无声之歌》也胎死腹中。即便如此，马汉对李汝琳对新进的鼓励和信守承诺，仍铭记于心。	
5 b	曾采〈李汝琳的晚年生活与事迹〉，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171-175。	曾采原在电影界工作，李汝琳鼓励他以电影界所见所闻为资料写成小说。后来他写了长篇小说《红尘滚滚》、中篇小说《万世留名》和短篇小说《她这一辈子》等。	
6		慷慨助人	
6 a	云里风〈敬悼李汝琳先生〉，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221-222。	云里风于1969年得类风湿关节炎，在马来西亚及台湾求医，耗尽积蓄但全无果效，想再到中国求医但无经费。他先向一富有同乡求助不成，再向李汝琳求助。李汝琳为他取得短篇小说集《冲出云围的月亮》和散文集《梦呓集》的版权费伍佰元，再借他伍佰元，并对他诸多安慰和鼓励。	
7		鼓励文艺活动	
7 a	陈爱玲〈文坛前辈李汝琳〉，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165。	创立‘锡山文艺中心’，成员包括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岛屿文化社、五月诗社、拔萃画会的成员。李汝琳认为只要是文艺团体能促进文艺活动，鼓励创作，就有成立的好处。	
7 b	骆明〈后记〉，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372。	李汝琳积极参与50年代的‘写作者协会’与后来的‘作家协会’。他发起和组织的‘锡山文艺中心’，便是想以它作为各个文艺团体的联系，能在共同课题上一起合作。	
8		对李汝琳作品的评论：小说	
8 a	潘亚暲〈犀利的批判、冷静的解剖〉，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249-255。	潘亚暲认为李汝琳作品的基本倾向是：“对现实作冷静的剖析，特别是对丑恶的社会现象、人物作犀利的批判。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李汝琳的所有小说都是以性格为中心或背景为中心，而不是以情节为中心的。他的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曲折离奇的故事，而是要透过现实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人物、平平常常的事情，引读者思考一点人生的不平、人性的弱点。”（页250）	

8 b	许崇铭 <浅论李汝琳小说的创作特色>，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65-290。	1. 李汝琳小说的特色包括：“时局化背景、南洋化题材、本地化思想、隐怀原籍的情怀，主体意识鲜明，作品知识性强；艺术形式上多用平稳的结构、直叙的手法、雅正的语言、朴实的勾勒、传神的形象和陈叙完妥的情节；它在某个程度上反映了早期新马华文小说中一个创作主流的基本风格。”（页 266） 2. “李氏创作的题材取向，既不倾向侨民派作家的北归意识，也不同于本地作家的南洋情怀。”（页 269） 3. “李汝琳的小说创作以南洋题材为本，有时辅以与本土社会相对应的中国人、情、世、故，交织成既有新马南洋的内容，又缀有些许中国家乡的情怀。他选取的题材包括教育界败行、殖民地意识、出版圈内幕、日治时期的生活、移民心态、政治恶棍等。”（页 269-270） 4. “李氏创作强调正义与道德观念的特色，常使他的小说在较为乐观的气氛下结束，给读者留下较为积极的启迪。”（页 272） 5. “李汝琳小说常涉及时代大背景，包括了时局动向以及地方形势与政治气候的演变，因此李氏的故事就难免“多半带有‘政治’气味”。虽然作者不予承认。”（页 274）	
8 c	苏卫红 <李汝琳小说创作浅论>，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307-315。	1. “李汝琳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新加坡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表现的统一；中国传统白描手法与形象的南洋特色的溶合。”（页 307） 2. “他的小说创作既具有热带南洋社会的色彩，又带着中国母体文化传统的胎记与印痕。”（页 308） 3. “与许多新华作家比较，切入淡淡政治背景，远距离地展示复杂的政治关系，不能不说是李汝琳小说的一种特色。”（页 310） 4. “出现在李汝琳小说中的人物是各式各样的。但作用着力刻画，并且更具特色的是两类小人物：一类是处于新华社会中多种政治势力较量	

		中的小人物；一类是挣扎于新华社会中夹缝中的小人物。”（页 310） 5. “李汝琳的小说时常呈现创作主体的‘惩恶扬善’的社会道德观念。”（页 312） 6. “爱国思想也是李汝琳社会道德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爱国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对祖国的怀恋，以李汝琳的《内疚》为例；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对缺乏国家观念‘飘浮’的人的否定，以李汝琳的《飘浮》为例。从《内疚》到《飘浮》，“荣饶着面对海外华人认同危机的一种思考和选择，清晰映出作家思想嬗变的心理历程：从过去作客异乡的侨民意识，变为落地生根的主人翁意识；从过去的侨民，变为新马社会的主人。”（页 314-315）	
8 d	黄孟文〈新华文学与国家意识（节录）- 李汝琳的短篇小说《飘浮》〉，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 139。	“在散文和小说方面，也有一些反映国家意识的作品。陈华淑的散文《乡土寸寸香》和李汝琳的短篇小说《飘浮》就是很好的例子，后者主要在刻画一个完全没有国家民族观念的自私自利的人。…… 这篇小说的主题很明显：一个对自己的国家好人民不忠的人，其结果将是悲惨的。”（页 139）。	
8 e	东端〈新加坡作家的〈新贵〉〉，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 124。	作者“往往通过一个完整的事件，反映社会特征方面颇具功力，而小说中的人物，不但丑恶嘴脸和盘托出，连灵魂也被深挖出来，有着深刻的社会典型意义。因此，他的作品常引起某方面人士的不满、反感和攻击。但却正是因为他取材殖民社会的上层人和事，笔锋所向，无所遁形，遂使他的作品各具讽刺的现实意义。”	
8 f	上官末〈李汝琳小说的时代意识 - 读短篇小说集《新贵》的感受〉，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的这个时期，东南亚的华人处在政治恐慌中，不论在文化界、教育界、工农界、社团、学堂，都充满了窒息的气氛，作者李汝琳就通过了他的小说来反映这个动荡的时代。这些作品已经写了好几十年，到现在才结集出单行本，固然其中有着很多的因素，但是主要的还是囿于客观环境，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的：‘这两篇东西（指〈炸〉和〈漩涡〉- 笔	

	361-370。	者）曾惹起某方面人士的不满，对我一再讽刺、攻击。’ ” （页 361-362） 李汝琳所描绘的反面人物包括了华社的‘侨领’、报馆的社长，学校的教务主任等。当他写了有关学潮的《懊悔》后，“自然地更引起某方面人士的极大反感，对作者诬衅攻击更加变本加厉了。”（页 367）	
8 g	赵戎 <谈李汝琳的创作与功业>，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91-306。	“在小说创作里，陈旧词汇用得过多，缺少了形象力” （页 305）	
8 h	许崇铭 <浅论李汝琳小说的创作特色>，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 265-290。	“本地词语和生活语言用得不很多，……使他的创作与许多充满方言土语的本地作品迥然不同。从这个角度看，李氏作品的语言具有另类的风土气质。” （页 284）	
8 i	陈家骏 <李汝琳 <漩涡> 语言研究>，陈荣照主编《南洋学报》第 73 卷，2019 年 9 月，页 82。	李汝琳“在用语上力求规范，更不似当时的马华作家，常在作品中加插新马方言、马来文或是印度语，而出现难读、难懂的现象。” （页 82）	
9		对李汝琳作品的评论：诗歌	
9 a	柯戈 <青春未老的旋律 - <再生集> 和 <扣门>，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页 96-103。	“他的诗力求自然活泼，不愿注重韵律，句行也不受拘束，完全服从感情的自然流露，事件力求平铺直叙。” （页 96） “作者不拘形式，浅白如话，自然流露，使得内容一气呵成，主题十分鲜明。但是反过来说，这一特点用得不好，却又造成反效果。那就是诗行松散，诗句不够洗炼，近乎说教，犯到概念化的毛病。尤其是写叙事诗或较长的诗，这毛病更加显露出来，如《金丝草》、《黑巷》、《乞儿的哀诉》等，就存在着这种缺点。” （页 100）	

9 b	赵戎〈谈李汝琳的创作与功业〉，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页291-306。	“在诗歌创作上，格调虽有，魄力仍差”。（页305）	
1 0		对李汝琳作品的评论：散文	
		见此附录中散文/杂文部分	
1 1		对李汝琳作品的评论：戏剧	
	李汝琳〈后记〉，《李汝琳创作集》，页346-347。	尚未寻获有关李汝琳戏剧的评论。李汝琳自己叙述他的《五分钟内》写汉奸的下场，《梦》写一青年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的梦醒，都具有反映现实的意义。又言他在1944年离开中国到印度后，就没有再写剧本了。	

李汝琳 主要参考资料：

A. 李汝琳的著作及编辑工作：见此附录中第2及第3项

B. 其他资料：

1. 陈家骏〈李汝琳〈漩涡〉语言研究〉，陈荣照主编《南洋学报》第73卷，2019年9月，页65-82。
2. 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怀庐书屋（出版地不详），1984）。
3. 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修订版）（新加坡：万里书局，1994）。
4. 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
5.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网站
<http://search.nlb.gov.sg/Search?query=%E6%9D%8E%E6%B1%9D%E7%90%B3>
6.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网站
<http://linc.nus.edu.sg/search/Y?SEARCH=%E6%9D%8E%E6%B1%9D%E7%90%B3&searchscope=16&SORT=D&submit=Submit>
7.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图书馆网站 https://ntu-sp.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search?query=any,contains,%E6%9D%8E%E6%B1%9D%E7%90%B3&tab=Everything&search_scope=MyInst_and_CI&vid=65NTU_INST:65NTU_INST

附录 9：姚紫 生平·著作·他人评论

姚紫（1920 – 18.2.1982）

姚紫原名郑梦周,有许多笔名,用不同的笔名写不同的文体。根据刘笔农〈勇敢接过姚紫交下的棒〉,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华作家研究丛书)(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42-43,他用笔名的方式如下:

写小说,用姚紫、黄槐、欧阳碧

写散文,用上官秋、吴萍

写杂文,用贺斧、符剑、唐兮

写诗,用向阳戈、淳于旭

写《新加坡传奇》。用武吉巴兄

写妇女文坛的文章,用西门风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28 指出,郑梦周还有以下笔名:舒仲、公孙龙、黑浪、吴笙、司徒然、赵旭、鲁明、毕三等,但吴蒙未提郑梦周用这些笔名于何种文体。

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57 提及郑梦周在永泰时常用胡加和胡笳为笔名。

1. 生平·大事记

	生平、重要事项	日期	内容	备注/出处
A	出生至抵新			
1	出生	1920 年 (出生月日不详)	出生于福建泉州安海镇。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26。
2	家庭背景		父亲郑时雨是位西医,外祖父黄日增是基督教牧师,除传福音外,也热心公益。	侯贤辉〈忆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姚紫是抗请名将郑成功的后人。	115. 侯贤辉称他乃姚紫童年时的同学。 刘笔农〈三十年前伟丈夫〉《姚紫研究专集》，页 92。
3	中学	不详	毕业于基督教会开办的培元中学，然而没有宗教信仰。	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55。
4	中学毕业后	1940-41 年间半年	曾在福建永泰税务局任职。在永泰时，也为莆田的《福建新报》编《新生代》文艺双周刊。	同上，页 55-56，59。 白寒记当时姚紫未满 20 岁。
5	进大专	约 1941	进泉州海疆学院	同上，页 57。
6	来新前	1947 年前	厦门《江声日报》编辑，由于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被通缉，但他曾自言一生未参加任何政党。 在中国时为《江声日报》编文艺副刊。他的杂文犀利尖锐，“终不见容于当局，迫使他须弃家背乡南逃”。 “培元书院毕业后，即担任厦门江声日报编辑。郑君赋性耿直，常为文讥诮官吏，惟讽刺之祸，速於飞尘，终为当局所通缉。”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6。 刘笔农〈勇敢接下姚紫交下的棒〉，《姚紫研究专集》，页 42。 柳北岸〈‘郑梦周诗词集’序〉《姚紫研究专集》，页 155。
7	抵新	1947 年	搭客轮“万福斯”号抵达新加坡	同上

B	离开中国后的 工作与生活经历			
8	任小学教师	1948 年	于道南小学执教。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6。
9	任中学教师	1949– 1955 年	1949 年转到晋江会馆附属的晋江学校，教高一及高二的历史和地理。刘笔农为其学生。 1955 年于《文艺报》停刊后到柔佛的宽柔中学高中部国文（华文）主任（吴蒙，页 27）。	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的记述和吴蒙不同。吴蒙记姚紫 1948 在道南小学，1949 到晋江学校，而刘笔农则记姚紫先到晋江学校，后到道南小学（页 31）。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和吴蒙的记述相同（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页 6。
10	开始发表文章	1949 年	以姚紫为笔名，在南洋商报发表《秀子姑娘》，同年 5 月出版单行本。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6。
11	恋爱经历	1951 年后	曾有恋爱经历，但无结果。柳北岸记述他认识姚紫是在订购《咖啡的诱惑》电影版权后。“三数年后，郑君与 IC 热恋”，常来探访他。在 IC 离郑而去后，“JC 投怀送抱，亦无结果”。 《咖啡的诱惑》于 1951 年出版，改	柳北岸〈‘郑梦周诗词集’序〉《姚紫研究专集》，页 155；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

			名为《蔷薇处处开》的电影于 1952 年 12 月 18 日首映。因此姚紫的恋爱经历当在 1951 年之后。	学历程》，页 23。
1 2	进报馆工作 - 南洋商报与南方晚报	自 1949 年至 1954 年 • 1952 年 11 月 15 日 • 1952 年 11 月 • 1953 年 1 月 3 日 • 1953 年 10 月 8 日	• 在编《绿洲》时，保留《周末青年》周刊，鼓励青年写作，为他们修稿。重视内容却不重视技巧，鼓励年轻人发表接近他们生活的作品。 • 转入报馆工作。开始时担任南洋商报的资料室主任兼编辑。 • 曾主编《家庭妇女》版，《星期六》周刊、《文艺行列》月刊（纯文艺期刊）和《世纪路》（文艺副刊）。 • 兼任南洋商报所发行的《南方晚报》副刊《绿洲》编辑。 • 他在 1953 年 1 月 3 日停止编辑《绿洲》和《周末青年》。但未明言为何编者易人。 • 1953 年 10 月 8 日，开始编《世纪路》文艺副刊。 《世纪路》共编 66 期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6-27。 同上 同上 姚紫〈今天·明天〉《姚紫研究专集》，页 207；姚紫〈读者·作者·编者〉，同上，页 209。 姚紫〈告别《绿洲》读者〉，同上，页 215。 姚紫〈《世纪路》编前小语〉《姚紫研究专集》，页 205。 姚紫〈告别读者〉《姚紫研究专集》，页 206。

			在商报期间，培养了一批本地的年轻写作者，如杜红、陈凡、苗芒、谢克。	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同上，页 33。
13		1954 年 1 月 16 日	离开商报。	姚紫〈告别读者〉《姚紫研究专集》，页 206。
14	任海员	1959 年	生活困苦，曾任海员，在往返新加坡和印尼的轮船上工作。	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7。
15	他应聘主编《新明日报》副刊《新风》	1969 年 4 月 1 日 - 1977 年 5 月 31 日	1969 年 4 月 1 日，他应聘主编《新明日报》副刊《新风》，至 1977 年 5 月 31 日离职止。 - 在《新明日报》期间，也培养了一批本地的年轻写作者，如君盈绿、蓝玉、冷若冰、蓉子等。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6-27。 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页 38。
C	办报与出版			
16	在南洋商报服务期间开始办报	1949-1954 (?)	在南洋商报服务期间开始办报，时段不肯定。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6-27。
17	开始自行办报《海报》	不详	在报馆期间，曾办《海报》半年，因报馆不许属下同时办报而停刊。	同上
18	成立出版社，出版《文艺报》月刊	1954 年 2 月 15 日	离开南洋商报，创办文艺报出版社，出版《文艺报》月刊。 1954 年初，离开南洋商报是因‘人事问题’	同上；韦晕记述姚紫办的是《文艺报》和《文艺报副刊》。 谢克〈姚紫与常凯法师〉

				《姚紫研究专集》，页 72。
19	被捕、获释	1954 年 9 月	因卷入反英殖民统治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文艺阵线而被拘捕，被盘问 3 天 4 夜后获释。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6-27。
20	《文艺报》月刊停刊	1955 年	《文艺报》月刊出版执照被吊销	同上
21	创另一周刊《社会新闻》	1955 年	于宽柔中学任教时创办《社会新闻》周刊。只出版三期，执照又被吊销。	同上
22	创《大地》十日刊	1956 年？ 1958 年 3 月	创办《大地》十日刊。只出版三期即被查封。 在创办《大地》杂志发刊词后的日期与吴蒙所记不同。如无笔误，应以姚紫所记为准。	同上； 姚紫〈‘开张大吉’ - 《大地》杂志发刊词〉 《姚紫研究专集》，页 217-218。
23	主编《九月的风》	1957 年	主编《九月的风》。只出版 1 期。	同上
24	吉隆坡《钟声报》总编辑	1958 年	应聘至吉隆坡任《钟声报》总编辑，出版 10 期后被令停刊。 同年出版《新马工商考察团在北京》。	同上
25	创《天马图书公司》	1963 年	出版 ●曹禺的剧作《桥》 ●穆时英的小说《黑牡丹》 ●金玉明的《萧红的一生》 ●他自己的小说《窝浪拉里》、《没有季节的秋天》、《萍水记》，历史评论《西楚霸王项羽》。	同上
26		1965 年底	出版《天马杂志》月刊。出版一个短时期及停刊。	同上
27		1967 年	出版《华报》周刊。《华报》销路不错，但出版一个短时期即自动停刊，	同上；

			因他觉得该报受到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政治意识太浓，他认为中国应该是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共产党人的中国，继续出版《华报》会卷入中国政治中，变成支持共产党人的中国。从此他也停止了一切出版活动。	韦晕记述 《华报》的出版社为〈华报社〉，见〈狂侠与向禅〉《姚紫研究专集》，页 86。
D	逝世、遗愿			
28	患上食道癌	1981 年	在他病重拟往中国求医时告诉好友，无论他的病是否能治好，即使一病不起，他都要把命拖回新加坡，死也要死在新加坡。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刘笔农〈悠悠終古-悼姚紫师〉，《姚紫研究专集》，页 62-63。
29	遗愿	1982 年正月	召集友好，并立遗嘱，委托吴俊刚、张道昉、林范平、郑捷浩为其遗产信托人，将其遗产（大部分为股票）适时变卖，设立文艺基金以鼓励本地文艺创作。 在病重时，要他的朋友替他开一个展卖会，把他的书籍都送去展卖，所得款项全部拨入“姚紫文艺基金”。他计划得很认真仔细：展卖会定名为《姚紫文艺工作展览兼作品义卖会》，地点要选在维多利亚礼堂，时间一定要在学校假期内，还列了工作人员名单。 “姚紫文艺基金”设立的目的在于“鼓励自由、民主、正义与进步的文艺的发展”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29； 刘笔农〈悠悠終古-悼姚紫师〉，页 64-65； 刘笔农〈勇敢接过姚紫交下的棒〉《姚紫研究专集》，页 43。
30	自备挽联	1982 年 2 月 16 日	挽联为“五十始知非，原思有所奋发，修积寸功，补偿谬误；风雨偏来恶，无奈落花狂飞，凄凉明月，空照篙篷。”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7； 刘笔农〈悠悠終古-悼姚

			横幅为“悠悠終古”	紫师》，页 62。
3 1	逝世	1982 年 2 月 18 日傍晚 6 点 45 分	与世长辞。在世 62 载。	同上；刘笔农〈悠悠終古-悼姚紫师〉，页 65；莫河〈记病中的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149。
3 2	姚紫文艺基金的执行	1992 年 2 月 23 日	姚紫遗产信托人举行〈姚紫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报告〈姚紫文艺基金〉所赞助的总额（8 万 9 千元）、赞助的作者名单（36 位），赞助的作品（38 部）以及出版姚紫遗著 9 部。	张曦娜〈一片落叶，叩响大地的胸膛 -姚紫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姚紫研究专集》，页 313-314。

2. 姚紫的著作

	书名	署名	性质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出处
1	秀子姑娘	姚紫	中篇小说	1949 年 5 月，同年出版三次。	新加坡：南洋报社。初版八千册，二版五千册，三版三千册，共一万六千册。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页 19-20；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姚紫研究专集》，页 28。 黄叔麟记姚紫自言《秀子姑娘》是学俄国的《第四十一》。见黄叔麟〈姚紫与

						我》，《姚紫研究专集》，页 109。
2	乌拉山之夜	姚紫	中篇小说	1950 年	新加坡：南洋印刷社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21-22；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3 a	咖啡底诱惑	黄槐	中篇小说	1951 年	新加坡：南洋印刷社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23；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曾被邵氏兄弟影业公司拍成电影，于 1952 年首映，片名为《蔷薇处处开》，并曾出版电影小说。（〈作品总目〉，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23）。
3 b	咖啡的诱惑（删订版）	黄槐	中篇小说	1962 年	新加坡：新野出版社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32，41；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3 c	咖啡的诱惑	姚紫	中篇小说集	1987 年	桂林：漓江出版社	
3 d	咖啡的诱惑	姚紫	中篇小说集	1987 年，1992 年	厦门：鹭江出版社	
4	马场女神	黄槐	短篇小说	1952 年	新加坡：南洋商报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26；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5	阎王沟	黄槐	中篇小说	1953 年	新加坡：南洋商报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27；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6	风波	姚紫	中篇小说	1954 年	新加坡：文艺出版社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30；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7	带火者	姚紫	短篇小说集	1955 年	新加坡：文艺出版社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29；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8	黑夜行	贺斧	杂文集	1959 年	新加坡：刘维新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31；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9	半夜灯前十年事	黄槐	中篇小说	1961 年	新加坡：新野出版社	同上。 黄叔麟记姚紫自言《半夜灯前十年事》是学屠格涅夫的《阿列霞》。见黄叔麟〈姚紫与我〉，页 109。
10	情感的野马	黄槐	散文集	1963 年	香港：新野出版社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32；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刘笔农认为黄槐的〈情感的野马〉，既是散文又是诗，是“新华文艺是上散文诗的典范”。（刘笔农〈序，新加坡已故作家作品集〉，《赵戎小说选》，页 9）。
11	没有季节的秋天	黄槐	中篇小说	1963 年	新加坡：天马图书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页 40；吴蒙〈姚紫生平简介〉，页 28。

						介》，页 28。
1 2	西楚霸王 - 项羽	黄槐	历史 评论	1964 年	新加坡：天马 图书出版公司	黄惠龄、王烨主 编《姚紫文学历 程》，页 33；吴 蒙〈姚紫生平简 介〉，页 28。
1 3	萍水记（又 名《葬情 记》）	欧阳 碧	短篇 小说	1964 年	新加坡：天马 图书出版公司	黄惠龄、王烨主 编《姚紫文学历 程》，页 34；吴 蒙〈姚紫生平简 介〉，页 28。
1 4	窝浪拉里 （又名《兰 娜》）	姚紫	中篇 小说	1965 年	新加坡：天马 图书	黄惠龄、王烨主 编《姚紫文学历 程》，页 35-36； 吴蒙〈姚紫生平 简介〉，页 28。 陈贤茂记述《窝 浪拉里》在 1950 年代初发表。
	姚紫遗产信托人编，姚紫遗著系列共有下列 9 部（15-23）					黄惠龄、王烨主 编《姚紫文学历 程》页 37-38, 40- 46；李向〈开 头・空白・结尾 - 我和姚紫的交 往传奇〉，《姚紫 研究专集》（新 加坡：新加坡文 艺协会，1997） 页 102；张曦娜 〈一片落叶，叩 响大地的胸膛 - 姚紫逝世十周年 纪念会〉页 313- 314。
1 5	新加坡传奇	姚紫	小说 集	1985 年	新加坡：陈龙 玉	黄惠龄、王烨主 编《姚紫文学历 程》页 37. 作者 名根据该书所 印。

						陈贤茂 <论姚紫的小说创作、我>，《姚紫研究专集》页 171 记：《新加坡传奇》在 1950 年代初的新加坡报纸，直到他去世后才有他的遗产信托人编辑出版。
1 6	九月的风	姚紫著： 姚紫遗产信托人编	散文集	1986 年	新加坡：陈龙玉	同上，页 38。
1 7	杂文 - 这支部队	姚紫著： 姚紫遗产信托人编	杂文集	1987 年	新加坡：陈龙玉	同上，页 40。
1 8	木桶鸭（姚紫遗著）	姚紫著： 姚紫遗产信托人编	小说集	1987 年	新加坡：陈龙玉	同上，页 42。
1 9	九月的原野（姚紫遗著）	姚紫著： 姚紫遗产信托人编	小说集	1988 年	新加坡：陈龙玉	同上，页 43。
2 0	潜龙记（姚紫遗著）	姚紫著： 姚紫遗产信托人编	历史小说 5 篇	1988 年	新加坡：陈龙玉	同上，页 44。
2 1	短长书	姚紫著：	杂文集	1988 年	新加坡：陈龙玉	同上，页 45。

		姚紫 遗产 信托 人编				
2 2	夜歌	姚紫 著： 姚紫 遗产 信托 人编	新诗 集	1989 年	新加坡：陈龙 玉	同上，页 46。
2 3	郑梦周诗词 集	姚紫 著： 姚紫 遗产 信托 人编	旧诗 词集	1989 年	新加坡：陈龙 玉	同上。作有〈华侨 子弟在天涯〉 （刘笔农〈三十年 前伟丈夫－姚紫 先生逝世半年 祭〉，页 92）。
	其他					
2 4	姚紫小说选	姚紫	小说 选	1999 年	新加坡：新加 坡文艺协会	同上，页 47。

3. 他人对姚紫的评论

	作者/出处	评论	备注
		为人处世	
1	侯贤辉〈忆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115。	“个性刚烈、与人争执，绝不退让” 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	
2	叶昆灿〈将毕生献给文艺－记姚紫先生〉，《姚紫研究专集》，页 40。	- 为人忠直刚正，有原则、有见地，不随便附和他人，因此被人冠以怪脾气、怪性格。 - 热爱文艺，在病中仍念念不忘。请友人为他设立文艺基金以把遗产投入，使文艺得以拓展。	
3	蓝平昌〈焚三炷香－我哭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130。	形容姚紫性格倔强、脾气爆烈、爱憎分明、一生浪漫、热爱文艺、生活寂寞、正直善良。	

		创作艺术	
4	陈振夏〈序〉 《秀子姑娘》，（新加坡：南洋报社，1949）。	对“秀子姑娘”赞誉有加： • 优美的文艺创作：“作者强烈的想象力、丰富的的情感、洗脸的辞藻、灵活的手法、细腻的描写，使它够得上被称为一部优美的文艺创作”。 • 题材：“处理得体刺激有趣” • 情节：“曲折离奇” • 行文：“经济结实” • 段落组织：“就像几篇精致的短篇小说被连缀在一起，又像是从短篇小说中拣出最精彩的一段” • 写景：“如一泓沟水，有晶莹透彻之妙” • 写情：“虽然是缠绵悱恻，却有着好色不应与怨诽不乱的含蓄功夫”	陈振夏和姚紫都是晋江同乡。
5	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37-38。	• 散文：“姚紫的散文是出名的美的，美得和诗一样，其实应该称它是散文诗才适当。” • 杂文：“《黑夜行》集中的文章，文字洗炼、行文简洁自不在话下，而他笔尖所至，当真是入木三寸”。	
6	刘笔农〈序，新加坡已故作家作品集〉 《赵戎小说选》，页 9。	刘笔农认为黄槐的〈情感的野马〉，既是散文又是诗，是“新华文艺史上散文诗的典范”。	
7	杨越、陈秋舫、米军〈凄然望星洲，垂泪悼故友 - 怀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53。	“他的散文笔调清新，抒情味很浓，极富诗意，又蕴含哲理。”	
8	陈贤茂〈论姚紫的小说创作〉，《姚紫研究专集》，页 175。	“姚紫小说的语言，清新俊逸而又绮丽畅达，叙事中带着抒情，峭拔中带着细腻，好像有一种美的旋律，流泻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它运用语言的熟练和技巧，即使与中国 30 年代的名作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创作题材及内容	
9	列蒲〈我生平见过姚紫两	姚紫是文艺先驱，是‘带火者’。	

	次》，《姚紫研究专集》，页 120。	指出在五十年代姚紫的某些作品被激进分子认为是色情之作的看法是很主观的。 “姚紫曾向读者指出：写情描爱的作品，不一定是属‘色情作品’，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姚紫亦向读者阐述：‘我们应该以大我观念和逻辑来辨审作品是不是‘黄色文化’为依归’。”	
10	黄梅雨〈记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143.	1979 年 5 月，姚紫的小说《马场女神》被方修选入《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小说一集，方修认为他向色情生活方面寻找题材的作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11	郭惠芬〈青春风采丽人行 - 姚紫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姚紫研究专集》，页 188-198.	• 《秀子姑娘》、《咖啡的诱惑》及《窝浪拉里》都以第一人称的‘我’来刻画青春女性的性格特征与精神世界。 • 姚紫在对小说中人物进行细腻的外在描绘时，其深刻之处还在于通过人物的外貌、衣饰和神情的变化，来揭示人物内在精神世界的巨变。 • 姚紫在对这些青春女性进行外貌刻画描写时，个别地方分寸把握不够，有些描写稍嫌大胆暴露，游离于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的需要之外。 • 从总体来看，姚紫的小说是严肃和健康的。其外貌描写对于塑造人物形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2	杨越〈追求和追求中的懊恼 - 姚紫小说简论〉，《姚紫研究专集》，页 162。	姚紫通过对笔下的女性屈辱生活的描绘，“挖掘出潜藏在她们身上的道德美与人性美，通过那美的毁灭或消失，揭发了社会的邪恶，通过自己对美的接触与分离，寄托了他的追求以及求而不可得的痛苦与懊恼。”	
13	杨越、陈秋舫、米军〈凄然望星洲，垂泪悼故友 - 忆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53。	历史题材 - 姚紫不止反映生活中的悲欢离合，还把笔触伸向历史题材。《西楚霸王》展示的是两千多年前楚汉相争中项羽的英雄形象及悲剧，《九月的原野》是从十九世纪大诗人普式庚的长诗《茨网》改编的小说。	

14	黄叔麟〈姚紫与我〉，《姚紫研究专集》，页109。	黄叔麟记姚紫自言《秀子姑娘》是学俄国的《第四十一》。	
15	陈贤茂〈论姚紫的小说创作、我〉，《姚紫研究专集》，页169。	从《秀子姑娘》可以看到它受到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表现在故事情节的某种类比＝如敌对双方的男女谈恋爱，最后以其中一方被枪杀告终－而小说的整体构思，以至于主题思想，艺术手法等，则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故事情节的雷同和相互影响，即使在著名作家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并不影响《秀子姑娘》成为马华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16	陈贤茂〈论姚紫的小说创作、我〉，《姚紫研究专集》，页169-172。	1953年写的《阎王沟》是以1944年中日抗战中湘桂大撤退为背景，反映华侨的的心态。 1950年初写的另一部中篇小说《窝浪拉里》的场景已经从中国移至南洋。是一部反殖民主义的小说。 “姚紫不顾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把新马人民反对殖民统治、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呼声，巧妙地隐藏在一个风光旖旎的爱情故事中，表现了作家的胆识和鲜明的政治立场。为了小说能够出版，作者不得不把小说的背景，搬到印尼的一个偏僻的乡村，同时又不得不在小说中加上一些男女欢情的描写，以便涂上一层政治保护色。但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作者把兰娜的殖民主义者真面目的暴露，放在新加坡庆祝英皇加冕的观礼台上，确是有很深寓意的。” 姚紫在〈正视‘反黄色文化运动’〉一文中曾不无感慨地说，“尽管《窝浪拉里》是暴露殖民地统治者的面目，被他们这大帽子一套，也就‘一笔勾销’”。	
17	苏菲〈姚紫与他塑造的殖民主义的小姐形象－短篇小说《窝浪拉里》〉，《姚	《窝浪拉里》通过对兰娜几种面孔的描绘，塑造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小姐形象：落魄时，她可以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得势时，她却趾高气扬、得意忘形；失意时，她温柔顺眼、怯弱可怜，得意时，她却凶狠无情，高傲可恶；落难时，她可以付出真情，胜利时，她却可以忘恩	

	紫研究专集》，页 203。	负义，恩将仇报！	
		编辑及创作态度	
18	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55。	姚紫爱说的一句话是‘文艺良心’。	
19	杨越〈追求和追求中的懊恼 - 姚紫小说简论〉，《姚紫研究专集》，页 157-164。	姚紫创作的主要倾向是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如小说《咖啡的诱惑》、《秀子姑娘》和散文《被遗忘的人》。	
20	骆明〈我对姚紫的一点认识〉，《姚紫研究专集》，页 46。	编报版面：“姚紫编的《文艺报》、《九月的风》、《从荆棘中走出来》、南方晚报的《绿洲》、南洋商报的《世纪路》、新民日报的《新风》，版面清新、有技巧、很新颖，经常有新的风格，很受人欢迎，还受人称道”。	
21	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37-38。	编报版面：“美观新颖”	
22	叶昆灿〈将毕生献给文艺 - 记姚紫先生〉，《姚紫研究专集》，页 40。	对文艺创作非常认真，对字词仔细推敲，对文稿反复审阅。对排版、校正、设计都亲力亲为。当发现不完美处，即使印刷机已经开动，都要下令停止，加以改正。	
		对新加坡的想法	
23	白寒〈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55-59。	他在给白寒的信中这样写： “我有一个衷心的想法，中国孕育我三十四年，而新加坡生活我三十二年。没有父母之邦的中国，就不会有我的生命，但如果没有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恐怕在三十二年前就给枪毙了”。（页 58）	说明了 1. 他为何一定要离开中国 2. 对能在新加坡生活的感激 然而他所写中国孕育他 34 年似与他 1920 年

			出生，1947 年抵新之记录有矛盾，因他抵新时应为 27 或 28 岁，非 34 或 35 岁。 他 1975 年在新加坡已生活 32 年之说也有疑点。照此说法，他 1943 年就已南来。 他南来后大约有 5 年不在新加坡生活。1955 年他曾在柔佛办《文艺报》及在宽柔任教，1958 年应聘至吉隆坡任《钟声报》总编辑，出版 10 期，1959 年又当海员，往返印尼和新加坡。 除了这 5 年，姚紫至少在新加坡生活了 30 年（1947—1955，1960—1982），比他在中国生活的 27 年长久（1920—1947）。

24	刘笔农〈悠悠終古－悼姚紫师〉，《姚紫研究专集》，页 62-63。	姚紫“在中国只住了二十多年，更长的时间，他是在新加坡过的。他和新加坡有着极浓郁的感情。就在他病重拟往中国求医时，还告诉我们，他是要回来的，不论病能否医好，即使一病不起，他也要拖命回来新加坡，死也要死在新加坡。”	
		对文艺事业发展的贡献	
25	陈龙玉〈半夜灯前十年事－追念姚紫先生〉，《姚紫研究专集》，页 112。	提拔后进－姚紫替新作者改稿和缮写，也写信给新作者，告诉他们写作的目的和理想。	
26	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37-38。	提拔后进、奖掖新秀：“如果他发现了哪一位投稿者是可造之材，他真的大喜若狂，他会给他打电话，写信，催他的稿，为他改文章，该得很用心，然后再为它设计版面，一定做到清新绝俗，真是求才若渴。”	
27	杨越、陈秋舫、米军〈凄然望星洲，垂泪悼故友－怀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53。	姚紫在自己办的杂志中，对中国、欧美的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与当代各源流的文艺创作经尽力介绍。	
28	列蒲〈我生平见过姚紫两次〉，《姚紫研究专集》，页 120。	姚紫是文艺先驱，是‘带火者’。	
29	刘笔农〈勇敢接过姚紫交下的棒〉，《姚紫研究专集》，页 43。	“姚紫文艺基金”设立的目的在于“鼓励自由、民主、正义与进步的文艺的发展”。	
30	黄梅雨〈记姚紫〉《姚紫研究专集》，页 139。	姚紫遗言，嘱咐友好组成信托委员会，利用他的遗产设立‘姚紫文艺基金’，以鼓励自由、民主和进步，推动新加坡文艺事业的发展。	
31	华之风〈深切的感谢〉，	“姚紫文艺基金的贡献，绝不只限于他赞助了 38 本书的出版，更重要的是他为我国华文文坛	

	《姚紫研究专集》，页 135。	树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典范，开创了文人以个人力量，协助其他文人的先河。”	

姚紫 主要参考资料：

A. 姚紫的著作：见此附录中第 2 项

B. 其他资料：

1. 白寒 〈一朵凋谢的鲜花 - 哭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新华作家研究丛书），页 55。
2. 陈贤茂 〈论姚紫的小说创作、我〉，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171-175。
3. 陈振夏 〈序〉，《秀子姑娘》（新加坡：南洋报社，1949）。
4. 侯贤辉 〈忆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115。
5. 郭惠芬 〈青春风采丽人行 - 姚紫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188-198。
6. 黄惠龄、王焯主编《姚紫文学历程》（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页 19-20。
7. 黄梅雨 〈记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143。
8. 黄叔麟 〈姚紫与我〉，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109。
9. 蓝平昌 〈焚三炷香 - 我哭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130。
10. 李向 〈开头・空白・结尾 - 我和姚紫的交往传奇〉，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102。
11. 列蒲 〈我生平见过姚紫两次〉，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120。
12. 柳北岸 〈‘郑梦周诗词集’ 序〉，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155。
13. 刘笔农 〈勇敢接过姚紫交下的棒〉，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42-43。
14. 刘笔农 〈悠悠終古-悼姚紫师〉，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62-65。
15. 刘笔农 〈三十年前伟丈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 92。

16. 刘笔农〈杰出的前辈作家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31-38。
17. 刘笔农〈序,新加坡已故作家作品集〉《赵戎小说选》(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9。
18. 骆明〈我对姚紫的一点认识〉,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45。
19. 莫河〈记病中的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149。
20. 苏菲〈姚紫与他塑造的殖民主义的小姐形象-短篇小说《窝浪拉里》〉,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203。
21. 杨越〈追求和追求中的懊恼-姚紫小说简论〉,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157-164。
22. 杨越、陈秋舫、米军〈凄然望星洲,垂泪悼故友-忆姚紫〉,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53。
23. 姚紫〈《世纪路》编前小语〉,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205。
24. 姚紫〈告别读者〉,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206。
25. 姚紫〈今天·明天〉,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207。
26. 姚紫〈读者·作者·编者〉,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209。
27. 姚紫〈告别《绿洲》读者〉,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215。
28. 姚紫〈‘开张大吉’-《大地》杂志发刊词〉,《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217-218。
29. 叶昆灿〈将毕生献给文艺-记姚紫先生〉,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华文艺协会,1997),页40。
30. 韦晕〈狂侠与向禅〉,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86。
31. 吴蒙〈姚紫生平简介〉,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26-28。
32. 谢克〈姚紫与常凯法师〉,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72。
33. 张曦娜〈一片落叶,叩响大地的胸膛-姚紫逝世十周年紀念会〉,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页313-314。

附录 10： 苗秀 生平·著作·文艺观·他人评论

苗秀（1920 - 10.9.1980）

苗秀原名卢绍权。笔名苗秀最广为人知，此外尚有军笛、文之流、闻人俊、苗毅、班毅、夏盈、夏凝霜、笠夫、贾村、史进等。还有鲜为人知的笔名如苍言、闻人进、费朗、尤俊、尤里、尤琴、尤毅、尤金、宋溪、白云天、于进、丘居竹、钱子遗等。他之所以用这么多笔名，因当时副刊版位有限，他将中篇和长篇小说分成几个独立故事，以不同笔名发表。（陈世俊〈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 17）。

1. 生平·大事记

	生平、重要事项	日期	内容	备注/出处
1	出生	1920 年 （出生月日不详）	赵戎记苗秀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为广东三水。赵戎为苗秀好友，而且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态度严谨，可信度高。 苗秀记他父亲在黄花岗事件后，‘剪了辫子远迢迢的跑到新加坡来了’。 赵戎引用苗秀《旅愁》后记所述，苗秀的父亲是以‘闯关东’的精神只身南渡。 另有一说为苗秀出生于中国广东，两岁时随父母来新，然未注出处。	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及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1979），页 183。 苗秀〈少年时代〉，苗秀《边鼓》（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2。 赵戎〈苗秀论〉，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 134。 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化

			上官彥（韦晕）记述苗秀的父亲原是粤剧团的‘管箱’（管理服装和道具的主管），因牵涉革命活动，带着妻子和儿子苗秀到香港，在一家机器厂工作了一段时期，才到新加坡。上官彥未注出处。	创作室，2015），页 188. 上官彥〈作家的血库 - 记得苗秀的书柜〉，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 24。
2	幼年-少年的生活	1927 -	父亲南来之前，在南中国西江流域做过长时期的戏班的‘衣箱’（管理戏子的服装和道具），在辛亥革命前夕，当了红坎士敏土厂的工人。在黄花冈事件后到新加坡，靠卖画为生。 1931 年世界经济不景气，父亲店铺倒闭，无业，一家靠典当过活。有一个时期还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敢上学。 为了房租，他们搬了几次家，后来搬到贫民区一所古老的楼房里。母亲筹了十几元，在骑楼下卖香烟。他的学费和买书钱也是父母亲典当借贷凑成的。 楼房是一个大杂院，楼上楼下住了三十几家人，大人小孩一百多个，住户都是被生活践踏的贫民，包括占卜算命的、补鞋匠、人力车夫、妓女、拉皮条的、收买烂布鸡毛的、码头估俚、机器卡、赌鬼、开鸦片间的、摆青菜摊的小贩、上街叫卖熟鸭肉的贩子、咖啡店的女招待等等。生活环境使他日后接近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 后来他所写的小说中，有许多人物、故事情节和背景都是这段生活	苗秀〈少年时代〉，《边鼓》（新加坡：青年书局，2005），页 1-15； 苗秀〈从听故事到讲故事〉，《文学与生活》（刘延陵主编《东方文化丛书》）（星洲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57），页 151-156； 同上，页 154。

			的再现。 上官彥也记述苗秀的父亲初期在小坡经营镜画店，后来在珍珠上街顶了一层旧楼作二房东，挂上‘留芳居’的牌匾，自己靠以前在机器厂和戏班学到的一点医药常识，间中替人看病和制造成药。在小厅摆了一个书架，里面放的是制药的乳罐、药粉、药油和一些空罐空瓶。 苗秀有一些文章在篇后注明写于留芳居，如《第十六个》的〈自序〉。 赵戎引用苗秀《旅愁》后记所述其父抱负不凡，个性倔强，不见容于封建的家乡，于是以‘闯关东’的精神只身南渡，并以多种职业谋生，认为苗秀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是秉承了他父亲的倔强性格与冷静。	上官彥〈作家的血库 - 记得苗秀的书柜〉，页 24 及 26。 苗秀〈自序〉，《第十六个》，（南洋印刷社有限公司，1955），页 2。 赵戎〈苗秀论〉，《苗秀研究专集》，页 134。
3	幼年-少年的学习	1927 年	幼年-少年的学习所受的熏陶和帮助： • 上午念英校，下午由父亲在家教《三字经》、《成语考》、《论语》、《燕山外史》等。 • 由于父亲在家的时间较多，苗秀以替父亲磨墨、洗画笔或其他小差使为交换条件，要父亲讲故事。他父亲的故事许多出自西游记。晚饭后，他父亲也常带他去大坡珍珠山脚大塌地，那里有‘讲古老’，他的别喜欢听‘讲古老’‘大粒烟’讲的《济公传》和《聊斋志异》的故事 章回小说。 • 到了他能看小说的年龄，最先看的是《济公传》和《粉妆楼》，后来又看了许多神怪剑	苗秀〈从听故事到讲故事〉，页 151-156； （‘讲古老’‘大粒烟’善于描摹人物的口吻，惟肖惟妙，相信这对苗秀的小说人物的描绘不无影响。） 苗秀〈我的师傅〉，《第十六个》，页 98-

	13 岁开始发表作品	1933 年 1934 年	侠小说。 • 一位电版所的学徒阿全借给他许多新出版的中国作家的著作与译作。 • 照相馆的学徒郑照飞热爱文学，也曾在《新国民日报》发表作品。在他的指导下，苗秀以‘苍言’为笔名的散文〈苦闷〉被《新国民日报》的星期日副刊《星期美点》于 1933 年 9 月 17 日刊登。这是苗秀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 1933 年的下半年，苗秀开始在南洋商报的副刊《晓风》与《狮声》以军笛为笔名发表作品，作品以散文、杂文为主。 • 1934 年，苗秀的第一篇小说《生活铁蹄下的俘虏》，也是听取了郑照飞的意见后，把原先不被刊登的小说《在当铺里》重新改写后被许金钟所编《大世界国货展览会特刊》刊登。	112；苗秀〈少年时代〉，《边鼓》，页 3；苗秀〈从听故事到讲故事〉，页 154-156。 陈世俊〈苗秀年表〉，《苗秀及其小说论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学位毕业论文，1983-84），页 148；陈世俊〈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 15。
4	当银行书记	1937-1942	赵戎记苗秀战前为银行书记。 苗秀自言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和几位朋友组织了个救亡话剧团，当导演还参与演出。当时他在一家白种人开的银行当‘小财副’（小书记）。	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183； 苗秀〈少年时代〉，《边鼓》，页 6； 陈世俊〈苗秀年表〉，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212。
5	与友人出版《南方文艺》	1945	与赵戎、夏怀霜等合编出版文艺杂志《南方文艺》	陈世俊〈苗秀年表〉，《苗秀研究专集》，页 213；

				林锦 <苗秀与新野>，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 193。
6	任《星洲日报》电讯版翻译。	1947-1955	被郑皆得拉去《星洲日报》当翻译，任此职 8 年。	陈世俊 <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页 16。
7	任《星洲日报》翻译时，兼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的主编	1947 年 9 月 15 日至 1949 年 11 月 3 日	从 1947 年 9 月 15 日至 1949 年 11 月 3 日兼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的主编，为时两年多一些。 “1948 年前后，……我晚上在一家报馆工作，编一个小小的文艺副刊”，	陈世俊 <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页 16。 苗秀 <住的故事>，《文学与生活》，页 199。
8	发生生活风暴	1948	发生一场‘生活里的大风暴’，使他的一堆书散佚。（详情不知）。	苗秀 <买书小记>，《文学与生活》，页 162。
9	介入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	1948	支持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有铁戈、赵戎和苗秀。苗秀当时以闻人俊为笔名写了《侨民意识与马华文艺独特性》一文支持这一立场。反对的阵营有沙平、金丁、李玄、洪丝丝等。	陈世俊 <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页 16。
10	发表许多作品	1950-1955	1950 年，用史进、贾村、苗秀、尤琴、尤里等笔名在南洋商报姚紫主编的《文艺行列》里发表许多短篇小说。 1951 年，又继续写了许多小说，多数发表在冯列山的《南洋月报》。 1954 年，在南洋商报姚紫主编的《世纪路》中以笔名于进、费朗、夏凝霜、苗秀发表杂感与短篇小说《挂红》。	陈世俊 <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页 18-19； 陈世俊 <苗秀年表>，《苗秀研究专集》，页 213-214； 姚紫主编《文艺行列》，1950 年，第 1 卷，1-5 期；

			1954-55 年，在《文艺报》中发表许多散文和杂文。 这些小说，有许多是他以后出版的长篇和中篇小说的部分篇章。	姚紫主编《世纪路》，1954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3 日，刊载《挂红》（一）至（八）； 姚紫主编《文艺报》，1950 年第 1 卷第 1 期，1954 年第 1 卷第 2-6 期； （姚紫主编《文艺行列》、《文艺报》、《世纪路》所刊苗秀作品依序见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页 95-98，99-102，209-210）。
1 1	离开报社	1955	“今年下半年，我被文氓们挤出了那个所谓‘民众喉舌’的机构”。（详情无可获知） 因为讲了真话，被“‘挤’出了那个所谓文化机构”。（详情无可获知）	苗秀〈关于我的疏懒〉，《文学与生活》，页 178； 苗秀〈我的忏悔〉，《文学与生活》，页 180。
1 2	华侨中学英文教师	1956 年 1 月 1 日-1970 年	计有 14 年。 苗秀在教育界的经验，让他写出了不少反映当时教育现象的小说，如《人畜之间》、《门槛》、《群姐》、《晚景》和《金剪》。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金禧纪念特刊 1919-1969》（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69），页 57。

			他自己也写了一篇评论文字《论马华教育小说》，评述林参天的《浓烟》和《热瘴》、吴仲青的《辜负你了》和张金燕的《换朝》。	
1 3	出版及主编文艺刊物《新野》	1967年元月-1968年	1967年与张金燕、李延辉（李汝琳）、柳北岸、赵戎、韦晕、于沫我与陈哲力一同出版文艺刊物《新野》，负责主编工作共5期，至1968年因经费问题停刊。 《新野》是一本纯文艺刊物，在1967年2月创刊，主编是苗秀，出版人是张金燕，由南方文化企业公司发行。	陈世俊〈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页16；苗秀〈<新野>发刊私语〉，《文学与生活》，页202-203；谢克〈自学成功的作家-苗秀〉，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页29。 林锦〈苗秀与新野〉，《苗秀研究专集》，页193。
1 4	《新社文艺》第15、16期的执行编辑	1970	任《新社文艺》第15、16期的执行编辑。	陈世俊〈苗秀年表〉，《苗秀研究专集》，页215。
1 5	苗秀编《理论集》和《小说二集》，并与赵戎、钟祺合编《戏剧集》	1972-73	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辑《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苗秀编《理论集》（1973）和《小说二集》（1972），并与赵戎、钟祺合编《剧本集》（1973）。《新马华文文学大系》8册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年至1974年间陆续出版。	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辑《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1974）。
1 6	南洋大学助理教授	1971至1974年5月	开两门课：《新马华文学》与《文学概论》。	陈世俊〈苗秀年表〉，《苗秀研究专集》，页215。 尤今〈谈我师苗秀先生〉，林锦主编《苗秀研究

				专集》，页 32 记述苗秀是她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到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书的。尤今是在 1969 年入读南洋大学（见《我心中有盏灯》，（新加坡：新亚出版社，1991），页 153.
17	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公共服务勋章	1971 年 8 月	肯定他文学创作的成就。	陈世俊〈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页 17。
18	任《民报》翻译	不详	“离开南洋大学后，失业了一段时间，后来到《民报》当翻译，大约工作了两年，便因健康欠佳离开了《民报》，在家养病。”	谢克〈自学成功的作家-苗秀〉，页 29.
19	为文化事业服务	1976-1980	担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顾问	陈世俊〈苗秀年表〉，页 216。
20	作品获书奖	1978	长篇小说《残夜行》获书籍节书奖	同上
21	患上眼疾	1979	患上眼疾，屡医不癒。新加坡华文文艺界的朋友曾热心为他的医药费筹款。 马来西亚文艺界的朋友也为他筹款及探望他。	同上；谢克〈自学成功的作家-苗秀〉，页 29； 刘笔农〈关于苗秀和他的作品〉，《苗秀研究专集》，页 42-43。
22	逝世	1980 年 9 月 10 日	因鼻癌去世，在世仅 60 载。	刘笔农〈编后话〉苗秀小说选（新加坡已故作家作品集，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 276.

2. 苗秀的著作及编辑工作

小说－短篇小说集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旅愁	1953 年 6 月	新加坡：南洋商报社	
2	第十六个	1955 年 5 月	新加坡：南洋印刷社	小说和杂文都有
3	边鼓	1958 年 8 月 2005 简体字 初版	新加坡：青年书局	
4	红雾	1963 年 10 月 1964 第 3 版 1965 年第 2 版	新加坡：新马文化事业 新加坡：新马文化事业 公司	六十年代新马小说丛书 六十年代新马小说丛书
5	人畜之间	1970 年 7 月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6	苗秀小说 选	1999 年 12 月	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 会	新加坡已故作家作品 集，刘笔农主编
7	上流人家	出版日期不 详。 此篇未注完稿 于 1960 年 12 月 17 日。	新加坡：青年书局	苗秀〈上流人家〉为李过 主编《星月文艺丛刊》 《上流人家》中之一篇 （页 36-46）。《上流人 家》包括论文、散文、 小说共 7 篇。

小说－中篇小说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新加坡屋 顶下	1951 年 11 月 1962 1987	新加坡：南洋商报社 新加坡：文工书店 桂林：漓江出版社	 修订版 海外华文文学丛书
2	年代和青 春	1956 年 6 月	新加坡：南大书局	
3	小城忧鬱	1962 年 1963 年再版 1964 第 3 版	新加坡：海鸥书局 新加坡：新马文化事业 公司	 海燕文艺丛书

小说－长篇小说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火浪	1960 年 1 月	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4 简体字 初版		
2	残夜行	1976 年 1 月	新加坡：大地文化事业	有日文版-東京：めこん，1985.

散文・杂文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文学与生活	1967 年 9 月 1 日	新加坡：刘延陵主编 《东方文化丛书》，星洲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戏剧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独幕剧〈夜〉收于《边鼓》中（页 75-86）	1958 年 8 月	新加坡：青年书局	苗秀解释收〈夜〉于短篇小说集《边鼓》的原因：“这只是我的一个新的尝试，未必有人要拿去上演，就当作用戏剧对话形式写的小说，聊备一格吧。”（《边鼓》〈跋〉，页 89）。
2	新加坡屋顶下（多幕剧）	不详	《南方晚报》的副刊《新地》	据刘笔农所记，宋人曾将此小说改编成多幕剧，在《南方晚报》的副刊《新地》上连载数月。（刘笔农〈关于〈苗秀和他的作品〉〉，《苗秀研究专集》，页 44）。

诗歌

刘笔农记苗秀也写过诗，有一首新诗在《星洲人》杂志上发表。（刘笔农〈关于苗秀和他的作品〉，《苗秀研究专集》，页 44），但未记新诗名称及其他详情。叶钟铃记苗秀（署名丘居竹）曾写《蜘蛛》一诗讽刺殖民地社会的剥削，于 1949 年 7 月 28 日在《晨星》发表。（叶钟铃〈苗秀与《晨星》副刊〉《苗秀研究专集》，页 205-207）。

文艺评论与编辑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马华文学史话	1968 年 1 月 2005 简体字初版	新加坡：青年书局	
2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苗秀编《理论集》（1973）、《小说二集》（1972），与赵戎、钟祺合编《剧本集》（1973）	1972-1973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苗秀编《理论集》，除编辑新马华文文学理论外，尚写导论及评论文章如下： 〈建立马华文艺批评〉 〈马华作家应多写“平凡人生”〉 〈这还是杂文时代〉 〈巴儿狗的论调〉 〈论文艺与地方性〉 〈论“侨民意识”与“马华文艺独特性”〉 〈新人的气息〉 《小说二集》，写导论并收录 33 位作家的 51 篇作品，其中包括李汝琳的〈内疚〉。 苗秀与赵戎、钟祺合编《剧本集》，除赵戎的导论外，收录 15 位作家的 23 篇作品。 参赵戎《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18（《小说二集》），页 111（《剧本集》），页 135（《理论集》）。

3. 苗秀的文艺观

	出处	文艺观
1	苗秀〈现阶段的文艺何去何从〉，《文学半月刊》，1978 年第一期，页 14-15。	现实主义：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产品”，“离开了现实生活就不会有什么文学了”。

2	苗秀 <论文艺与地方性>，《文学与生活》（新加坡：东方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67），页 40。（此篇写于 1963 年）	<u>应取材于马来亚社会：</u> “马来亚社会是个多元民族构成的社会，在这里生活是多彩多姿的，它向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单就我们这些华侨在海外的艰苦斗争的生活来讲，便不晓得有多少可歌可泣的题材，供我们的作家去发掘。”
3	苗秀 <论文艺与地方性>，页 38。（写于 1963 年）	<u>马华文艺的地方性不等于风景的描绘：</u> 苗秀指出 1929 年陈炼青的《文艺与地方色彩》号召作家多写本地景物，“把‘地方色彩’缩小，仅限于指某一特殊地区的风景，这是错误的见解。‘地方色彩’该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自然背景，跟社会生活特殊风貌的综合，有着本身的特殊的色调。强调马华文艺的地方性是正确的，但是仅仅风景描写不就是等于地方性。”
4	苗秀 <论文艺与地方性>，页 37。（写于 1963 年）	<u>侨民文学是马华文学史的一个应有的发展阶段：</u> “我们不能完全抹杀移民文学在马华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移民文学是华侨的侨民意识形态的反映，因而有它存在的条件，也是马华文学的史的发展上应有的阶段，再来，它使得马华文学得以继承中国新文学的优良传统－现实主义的精神。”
5	苗秀 <论文艺与地方性>，页 39-40。（写于 1963 年）	<u>马华文艺必须负起新的历史任务－民族自主运动：</u> “战后，客观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民族的觉醒，如火如荼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方面。过去，华侨效忠对象是中国，这当然没有错的，中国人难道不关心中国吗？不过目前，还有一个更迫切的，关系着华侨本身利益的任务－献身于当地的民族自主运动。……历史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华文艺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阶段了，否则便要与现实脱节。马华文艺必须负起新的历史任务；这任务就是完成民族自主运动。那旧的属于侨民意识的移民文学，自然不能负起这重大的任务的。新的马华文艺首先应该否定本身的‘侨民意识’，作家得站在马来亚人民立场从事创作有浓厚地方性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是以实现马来亚人民民主为其具体内容的。这样才能产生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
6	苗秀 <建国时期的文艺方向>，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文艺协会，	<u>新加坡文艺应充实内容，改进写作技巧：</u> “目前的文艺作品……除少数外，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不够充实的，不少是犯了公式化的毛病。作品反映现实面不广，观察不够深刻。至于写作技巧，水准不

	1991), 页 120-124。(写于 1978 年 8 月)	高, …… 难怪本地的文艺作品不受读者欢迎。…… 只要大家肯努力, 新加坡文艺是有无限的前程。缺点是可以克服的。” (页 121)
7	苗秀 <建国时期的文艺方向>, 页 120-124。(写于 1978 年 8 月)	<u>文艺创作应该配合建国事业:</u> • 国民文学的创作立场是效忠本国, 为社会建设做出贡献。因此国民文学必定反映现实、深入生活。 • 国民文学创作的首要宗旨, 是教育群众, 培养国民具有国民意识和发扬爱国精神。(页 122-124)

4. 他人对苗秀的评论

写作题材

	作者 / 出处	评论
1	陈世俊 <苗秀小说的题材与主题思想>, 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 新加坡文艺协会, 1991), 页 141-146。	苗秀小说的题材有以下几类: 1. 日治的暴行、抗日的英勇事迹及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长中篇小说《火浪》、《年代和青春》、《小城忧郁》、《残夜行》和短篇小说《在途上》、《忌日》、《肥料》都属于这一类。 (笔者注: 红雾讲日军的暴行、人们的恐惧、华侨的心态及不顾家人反对, 青年参与抗日被抓的下场。) 2. 市民的生活 苗秀曾经生活的‘大杂院’, 让他接触到许多中下层人民的生活, 并把他们描绘出来, 如《新加坡屋顶下》里的扒手陈万与妓女赛赛、《钟摆》里的小职员莫振、《乔迁喜》里在商行办事的汪淡心、《婚礼》里的报馆翻译余洁之、《挂红》里被人冤枉的校工荣欣伯、《青春素》里的机器工人王彪、《我也管不了》里的咖啡店助手明仔、《恢复自由以后》的杂货店助手傻仔超等。 3. 女性的生活 描绘中下层女性的生活如《上一代的女人》与《黄瓜婶想不通》中的红头巾, 《女职员日记抄》里女职员的职场困扰, 《河滩上》与《等候副船长》女职员的恋爱故事, 《女人的故事》里茶花女的悲哀。 描绘上流社会女性的生活如《肚子买卖》、《笼》、《狗、女人》写这些女性生活的空虚, 《上流社会》与《深渊的

	城》写这些女性爱慕虚荣的心理。 4. 教育问题 在短篇小说中，有多篇是关于教育问题的，如《人畜之间》、《门槛》和《群姐》、《晚景》和《金剪》。 5. 青年人的心态 许多年轻人在 1949 年后纷纷回中国。苗秀在 1950 至 1951 间写的短篇小说如《火蝇》、《雨》与《边家的人民》就是写这些年轻人一心向往中国的心态和行为。 据陈世俊的分析，第一类的题材占大部分，其次是第二类。 有关不同时期的题材，“以四十年代为背景的小说，在题材上，它所关心的是当时在铁蹄下的人民，还有那些英勇的抗日分子。到了他以五十年代初期为他的小说背景，在题材上，出现了第一个转向，他所关心的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加上殖民地政府无能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澎湃的工潮，失业问题的严重，私会党的猖獗，小市民生活的困苦。在他以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为他的小说背景，他的小说题材出现了第二个转向，主要以写妇女、少女问题为题材，因为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已不复存在。”（页 147）

作品优缺点

	作者 / 出处	评论
1	赵戎〈苗秀论〉，《苗秀研究专集》，页 128-137。	优点 在质上说，苗秀底作品，每一篇都受得住历史的考验，每一篇都有其真实的价值。（页 137） 1. 苗秀有‘自创的’、“独步的”、‘突出的’艺术风格： • “由于他底丰富的词藻，配合着抒情的词意底描绘，使他底艺术风格，成了崭新底、出色底。” • “他底笔锋，是活泼的，伶俐而清新的。” • “他底艺术风格，充满着热情、青春活泼，浓郁底美。” （页 129-130） 2. 语言艺术： ▪ 苗秀的作品“充分的利用方言艺术来表达” （页 131） ▪ 遣词用字，一丝不苟（页 132） ▪ 刻画人物，灵活而生动（页 137）

2	同上，页138	缺点 有些情节牵强 如《新加坡屋顶下》的扒手和妓女的对话，像是知识分子的对话，不符合他们的身份。他们在拘留所相拥而泣，也不符合拘留所隔离探视者与被拘留者的事实。
3	陈世俊〈苗秀小说的题材与主题思想〉，页156-157。	缺点 一些小说在题材的处理上该挖深的地方挖得不够深，该简约的地方太芜杂，如《年代的青春》，主题是歌颂文艺青年的抗日热情及暴露日军的罪行，却有大半的篇幅讲述老丁和丁莹之间的爱情，冲淡了小说的主题。又如《残夜行》也是歌颂抗日份子的勇敢和日军的暴行，却对抗日活动着墨太少，无法突出主题，其他的情节又拖泥带水。《边家的人们》也犯了人物过多，问题表面化的毛病。

苗秀 主要参考资料：

A. 苗秀的著作及编辑工作：见此附录中第2项

B. 其他资料：

1. 陈世俊〈苗秀年表〉，《苗秀及其小说论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毕业论文，1983-84。
2. 陈世俊〈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15-19。
3. 陈世俊〈苗秀小说的题材与主题思想〉，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141-146。
4. 陈世俊〈苗秀年表〉，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212--215。
5. 林锦〈苗秀与新野〉，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193。
6. 刘笔农〈关于苗秀和他的作品〉，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页42-44。
7. 刘笔农〈编后话〉，《苗秀小说选》（新加坡已故作家作品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9），页276。
8. 刘秀珍《姚紫小说文学语言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3。
9. 苗秀〈现阶段的文艺何去何从〉，《文学半月刊》，1978年第一期，页14-15。

10. 苗秀〈建国时期的文艺方向〉, 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 新加坡文艺协会, 1991), 页 120-124。
11. 上官豸〈作家的血库 - 记得苗秀的书柜〉, 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 新加坡文艺协会, 1991), 页 24-26。
12. 王润华等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新加坡: 八方文化创作室, 2015), 页 188。
13. 谢克〈自学成功的作家-苗秀〉, 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 新加坡文艺协会, 1991), 页 28-31。
14.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金禧纪念特刊 1919-1969》(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1969), 页 57。
15. 姚紫主编《文艺行列》, 1950 年 1-5 期; 1954 年 1-6 期; 1954 年 1-7 期, 55-62 期。
16. 叶钟铃〈苗秀与《晨星》副刊〉, 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 新加坡文艺协会, 1991), 页 202-208。
17. 尤今〈谈我师苗秀先生〉, 《我心中有盏灯》(新加坡: 新亚出版社, 1991), 页 153。
18.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新加坡: 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及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79), 页 183。
19. 赵戎〈苗秀论〉, 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 新加坡文艺协会, 1991), 页 128-140。
20.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苗秀资料夹》(Call number: Chinese C810.092 MXZ)(BRN: 12535866)。阅览日期: 03.07.2019。

附录 11：赵戎 生平·著作·他人评论

赵戎（21. 3. 1920 - 27. 8. 1987）

赵戎原名赵大成，又名赵笔平，已知笔名有 21 个。除赵戎外，还有赵心、以多、孔怀、芸窻、笔奴、西樵、史忱、白丁、丁戈、田丁、田风、白玉堂、西门柳、西门汉、宋游、公治文、刁斗、施舟、金瓯、东门雪。

（马崙〈梅花香自古寒来〉，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0），页 96；刘笔农〈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同上，页 52；黄梅雨〈赵戎的笔名〉，同上，页 86-93）。

1. 生平·大事记

	生平、 重要事项	日期	内容	备注/出处
1	出生于新加坡	1920 年 3 月 21 日	出生于新加坡豆腐街（或上珍珠街），祖籍广东南海。	马崙〈梅花香自古寒来〉，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0），页 96 记赵戎的出生年日及地点； 赵戎《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9）封底。
2	幼年	不详	幼年只读过两年书	马崙〈梅花香自古寒来〉，《赵戎研究专集》，页 96。
3	少年时代生活困苦，做过许多行业，刻苦	1930 年代	1930 年代，世界不景气，“父亲眼看没有作为了，又因年事太高，也回国养老”，一家生	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赵戎研究专集》，页

	自修，阅读文学、哲学、政治、经济的书籍。		活的重担由他八哥一人负担。赵戎便自动辍学当学徒。当过雪厂学徒、码头工人。在雪厂认识一个工人尹根，和他成为好友。尹根借了很多书给他看，和他谈文艺。尹根认为只读了几个月的书的高尔基也能写作，他们也能，给了赵戎很大的鼓励。 还当过机器学徒、小贩、报馆校对。	286-293。 赖伯疆 <我印象中的新华作家 - 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36。
4	开始文学创作	1936 左右	靠自修开始文学创作。 首次发表了纪念鲁迅逝世的诗篇《巨星》。当时鲁迅刚逝世，《新国民日报》要出纪念特刊，他的诗被选上，受到很大的鼓舞。接着《沙滩上》（几首诗）和《卖花声里》（短篇小说）、《在月台上》（散文）也被刊登了。他认为他有“与人不同的生活体验、不同的创作态度。与不同的写作题材”，是拜他的‘低贱’出身所赐，也使他永远记住劳苦人民的生活要求。 自此，作品陆续发表于：星洲日报苗秀主编的《晨星》星洲日报姚紫主编的《绿洲》、《世纪路》、《文艺报》以及其他刊物《南洋教育》、《新野》、《新社文艺》、《新加坡青年》、《新加坡文艺》。	赵戎 《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封底。 刘笔农 <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赵戎研究专集》页 52； 赵戎 <文学生活底一页>，《赵戎研究专集》，页 289-292。 赵戎《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封底；赵戎 <文学生活底一页>，《赵戎研究专集》，页 296。
5	开始文艺活动	1937	与郭松林、赵正荣等发起组织‘怒吼话剧社’，不久即停	马崙 <梅花香自苦寒来>，页

			办。	96。马崙未注明原资料出处。
6	参与筹赈工作	1938	“与苏元威、胡家友、何满祥、赵正荣、李光明等人复办‘国风幻境剧社’，协助南区筹赈会的筹赈工作。” “我没有忘记社会工作。在‘修竹圆’期间，与友人组织一个剧社，参加各种筹赈救亡工作。”（不详此剧社是否‘国风幻境剧社’） ‘国风幻境剧社’“组织历史甚长，后停办，1938年再复办，协助当地筹赈分会工作，曾演出救亡街头剧多次，星洲沦陷后解散” 同年（1938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同上。马崙未注明原资料出处。 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赵戎研究专集》，页295。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联合教育出版社出版，1979），页434。 马崙〈梅花香自古寒来〉，页96。马崙未注明原资料出处。
7	‘吼社’发起人之一	1938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中，自述为吼社发起人之一：“吼社：新加坡唯一的诗人团体，组织于1938年，发起人白荻、刘思、拉音、呢喃、林秋、以多等，曾借南洋商报及总汇报版位出版诗刊多期。”（以多为赵戎笔名之一） 然而下列资料未提赵戎为发起人之一。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197，433； 〈赵戎生平简介〉，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21。

			“吼社：由刘思、姚木、蕴郎等人发起的诗歌组织“吼社”成立于1939年4月，他们在一些副刊的园地办“诗歌专页”，认为诗歌“已经不是文人吟风弄月的玩意儿，不是艺术之宫里的象牙，它成为了全民族的吼声，它是时代的号角，它是抗战的歌颂者”。作为一场文学运动，“诗歌大众化运动”开展的时间不长，在气势和影响上也有所不足，但它却给抗战时期的马华诗坛注入了生气和活力。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诗歌创作不为人们重视，处于相对冷落的境地，倡导者高扬起大众诗歌的旗帜，其胆识的确很不一般。” “吼社成立于1939年，是新加坡第一个诗歌团体，.....直接受到‘中国诗歌会’的影响，发起人有刘思、白荻、蕴郎、桃木、呢喃等。诗社强调‘诗歌大众化’，.....成了全民族的吼声。.....诗社有诗刊‘大众诗歌专页’，共出版了5期，社社成员也借南洋商报等副刊版页发表诗刊多期。”	张森林《新加坡八个华文文学团体简介》，见知识网 https://knowledgeuser.weebly.com/36164260096530626032211522236920843200102132625991259912339822242203073161620171.html 黄孟文、徐迺迪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2），页169。
8	‘九一社’会员	1945	“1945年9月1日日本投降后所组织，其成员有苗秀、梁天、以多、于沫我等人，乃绿社前身。” “绿社：星洲光复后即组织的文艺团体，初名「九一社」，后改为「绿社」，曾出版「南方文艺」纯文艺刊物。其成员有上官彥，文之流、夏怀霜、以多、大白等。”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432。 同上，页435-436。
9	编报	1946年8月至1948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学辞典》中，自述曾主编《琼潮	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

		年7月间	报》及《爱华周报》。 《琼潮报》为陈平所创办的报纸。“1946年8月，《琼潮报》以周报的形式正式出版发行。这份报纸的宣传重点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着重报道新加坡琼籍进步人士、工人学生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 1948年4月，《琼潮报》的办报条件变得艰难，遂改为月刊。7月13日《琼潮报》被迫停刊。 “《爱华周报》为“新加坡8开报纸性综合性刊物，爱华社出版，1948年8月28日创刊，曾出数十期，先后由丁家端、以多等人主编，最后改为《爱华报》，终被封禁”（以多为赵戎的笔名之一） 爱华社成立于战前，原名爱华音乐社，后加戏剧二字成爱华音乐戏剧社，最后改为爱华社。主持人为吴盛育。积极推动音乐戏剧等活动，更办学校及教师别墅，最后办《爱华周报》，终被封禁，吴盛育被遣送出境。	典》，页197； 〈赵戎生平简介〉 《赵戎研究专集》，页21。 海南日报 25.4.2018 《琼侨革命先驱 陈平：回乡报国 尽此心》（作 者：蔡葩、周梦 旎；责任编辑： 杜汶纹） http://www.81.cn/jdjd/2018-04/25/content_8014787_2.htm 赵戎编著《新马 华文文艺词典》，页446。 赵戎编著《新马 华文文艺词典》，页435。 页446记爱华社最后所办的是《爱华报》。页435则记为《爱华周报》。
10	教学－小学	1945 (?) (以1952年赵戎被调往中学及刘笔农所记推算)	任教于裕廊小学 在小学教了8年。	君绍〈忆赵戎〉，《赵戎研究专集》，页60。 刘笔农〈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页51。

1 1	教学－中学	1952－ 1978	无学历，但教育部姚国华视学官认为他的学问‘已达大学水准’请准调任中学执教。（据君绍所记。1952年他与赵戎同班{据上下文，应是指师训班}，数月后，赵戎提早毕业，被调往中学）。 任教于中正中学多年。 因为他的学历不高，虽在中学任教，有很长一段时间，赵戎的薪酬是根据小学教师的待遇。	君绍〈忆赵戎〉，《赵戎研究专集》，页57。 赵戎〈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封底。 刘笔农〈<赵戎小说选>编后语〉，《赵戎研究专集》页123；骆明〈一个值得怀念的人〉，《赵戎研究专集》，页43-44。
1 2	受生活的迫害		赵戎在《海恋》〈后记〉中自言在1959年“曾经受过两次最严重的生活底迫害，几乎使我发疯。”详情无可获知。 赵戎在〈文学生活底一页〉自言他“多年来遭受小人的奚落、嘲笑、辱骂，与踩踏。”详情无可获知。	赵戎〈后记〉，《海恋》，（李汝琳主编，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简体字初版），页179。 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赵戎研究专集》，页297。
1 3	编辑工作	六十年代 后期	1. 赵戎与苗秀、张金燕、李延辉（李汝琳）、柳北岸、韦晕、于沫我与陈哲力组织‘新野社’，1967年2月纯文艺刊物《新野》创刊，苗秀为5期主编，出版人是张金燕，由南方文化企业公司发行。1968年因经费问题停刊。	陈世俊〈苗秀的生平及其著作〉，《苗秀研究专集》，页16；苗秀〈<新野>发刊私语〉，《文学与生活》，页202-203；谢克〈自学成功的作家－

		1971-74	2. 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辑《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赵戎编《散文一集》（1971）、《散文二集》（1972）和《史料集》（1974）。并与苗秀、钟祺合编《剧本集》（1973）。	苗秀》，《苗秀研究专集》，页 29；林锦〈苗秀与新野〉，《苗秀研究专集》，页 193；赵戎编著《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页 435； https://blogs.ntu.edu.sg/lib-cuhk08/?page_id=39
		不详	3. 任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编辑顾问多年。	马崙〈梅花香自苦寒来〉，页 96。
14	从教职退休	1978	赵戎退休后曾被邀回中正代课。但不久后他因喉咙痛而辞职。	白荷〈寂寂传薪者〉，《赵戎研究专集》，页 31。
15	逝世	1987 年 8 月 27 日	因胃癌逝世。赵戎生于 1920 年，逝世时应享年 67 余，但有些资料却记他享年 69，可能出于华人的风俗习惯。 也有一些文章记录他逝世的年份为 1988 年。	〈赵戎生平简介〉，《赵戎研究专集》，页 21；赵戎〈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封底。 如潘亚暎〈擅长描绘南洋风情的赵戎〉，《赵戎研究专集》，页 160。

2. 赵戎的著作及编辑工作

小说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芭洋上 (短篇小说集)	1958 年初版	新加坡： 青年书局	以赵戎署名，为李汝琳主编《新马文艺丛书》之一，共有〈芭洋上〉、〈码头上〉、〈古老石山〉、〈狗的故事〉4篇和1篇〈后记〉。 赵戎在《芭洋上》〈后记〉中说明他以《芭洋上》为书目的原因。这篇小说写于1951年，刊于当年的《南洋月报》上，不过他不是因为曾得主编冯列山的赞美而选取，而是因为“酷爱它是非常贴切地表达热带原野底浩瀚、无垠，与壮大的新词。‘芭洋’，这是多么动听的咧！这几年，有些作家已经在注意创造艺术辞句了，只有这样，方能吧多姿的热带题材深刻地表现出来。”（2006年简体字初版，页93）。这段话表现了赵戎对热带题材的热爱。 《芭洋上》收录的〈古老石山〉，是完全用方言写的，不只是用于对话上。赵戎自言“我虽不是第一个用方言写小说，但能大胆地彻底去运用，只有我而已。”（2006年简体字初版，页94）。他认为方言有其特色，应在写作上鼓励使用。
		2006 年简体字初版		
2	海恋（中篇小说）	1959 年初版	新加坡： 青年书局	以赵戎署名，为李汝琳主编《新马文艺丛书》之一
		2006 年简体字初版		
3	在马六甲海峡（长篇小说）	1961 年初版	新加坡： 青年书局	以赵戎署名，为李汝琳主编《南方文丛》之一。
		2004 年简体字初版		

4	热带风情画（短篇小说集）	1977年7月	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	以芸窻为笔名，共收六篇短篇小说，为《中教文艺小丛书》之一。作者在〈后记〉中说，这六篇小说的题材在他脑海中已潜藏了二三十年之久。
5	楼上花枝笑独眠（短篇小说集）	1979年10月	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	以芸窻为笔名，为《中教文艺小丛书》之一。
6	神媒（短篇小说集）	1981年5月	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	以芸窻为笔名，为《中教文艺小丛书》之一。
7	我们这一伙（短篇小说集）	1982年5月	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	以芸窻为笔名，为《中教文艺小丛书》之一。 (NLB 索书号：RCL0S C814.3 YC)
8	周末篇（短篇小说集）	1984年2月	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	以西门柳为笔名，为《中教文艺小丛书》之一。
9	刘笔农主编《赵戎小说选》	1999	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	新加坡已故作家作品集之一。
10	流浪行（短篇小说集）	不详	不详	刘笔农〈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页51记《流浪行》是赵戎未出版的小说集之一。刘笔农此文原刊于范北羚所编星洲日报《世纪风》，但未注明发表日期。

杂文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坎坷集	1978年5月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以赵心为笔名，共收28篇杂文，都是在《新风》和《南洋教育》发表过的。（林琼〈文艺批评理论家赵戎〉，《赵戎研究专集》，页68-69）。
2	集锦集	不详	不详	刘笔农〈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页51记

				《集锦集》是赵戎未出版的杂文集之一。刘笔农此文原刊于范北羚所编星洲日报《世纪风》，但未注明发表日期。《集锦集》尚未能于各大图书馆寻获。

文艺评论与编辑

	书名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备注
1	论马华作家与作品	1967	新加坡：青年书局	共评 5 位作家及作品及一篇后记： 〈苗秀论〉 〈论絮絮的小说〉 〈论韦晕的作品与思想〉 〈论李汝琳的创作与功业〉 〈论李星可的戏剧〉 赵戎在〈后记〉中提到，他曾在星洲日报发表长达 7 万字的〈李星可论〉，此处只取论李星可戏剧的部分。赵戎的〈李星可论〉当可作为研究李星可的参考资料之一。
2	赵戎文艺论文集	1970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新社文艺丛书之七。此书收集作者文长万言的文艺论文，前两篇专论马华文学问题，曾刊载于南洋大学创作社的文集上，已成历史文献，有些《理解与写作》高级中学课本编入为教材。第三篇则分别刊在《南洋教育》、《新野》与民报《新生代》上，是泛论我国当前文学诸问题。第四篇则登在国家图书馆出版之《图书世界》上，是概括一九六九年我国文艺界的成绩。”（赵戎《赵戎文艺论文集》〈内容简介〉，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
3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赵戎编《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剧本集》和	1971-1974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辑，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1971 年至 1974 年陆续出版，共分八大册，分别是赵戎编的《散文一集》（1971）、《散文二集》（1972）、《史料集》（1974），苗秀编的《小说二集》（1972）和《理论集》（1973），赵戎与苗秀、钟祺合编的《剧本集》（1973），孟毅编的《小说一集》（1972），以及周粲编的《诗歌集》（1972）。上述依序参赵戎《新马华文

	《史料集》。		文艺词典》，页 53、54、136、19、134、111、19、98 或目录 v、vii-x；林琼〈文艺批评理论家赵戎〉，《赵戎研究专集》，页 69。林琼所记《散文二集》、《剧本集》及《史料集》的出版日期与赵戎有异。笔者采用赵戎所记。 赵戎除了为他所编辑的《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写导论及为《史料集》写序例外，也为与苗秀、钟祺合编的《剧本集》写导论。 对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朱文斌作了这样的评论：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也编纂出版了《新马华文文学大系》（8 卷），收集了战后时期（1945—1965）的作品。这套《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在当时刚好和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构成互补，因为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只到 70 年代末才开始出版，并且收集的作品到 1957 年为止。新社编纂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依然以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为蓝本，遵循它的体例编排结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请李廷辉作总序，请孟毅、周粲、苗秀、赵戎、钟祺等分别编选各种体裁的选集并撰写各集导论。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稍有不同的是，《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多了一集“史料”卷，请赵戎编选并作了序例，没有作导论。新社编选的大系导论共 7 篇，由于撰写者也是当时新马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家、诗人，他们自身就是创作者，自然也很熟悉战后新马文坛的历史，所以他们撰写的各集导论便也成了很好的历史总结，对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朱文斌《对新马华文文学史撰写及其文学大系编纂之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总第 117 期，页 78）。 “赵戎所作的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和戏剧集的三篇导论对散文、戏剧的梳理可谓精当，较好地把握了这两种体裁的发展脉络，尤其注重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述和总结。”（同

				上，页 79）。 “苗秀、赵戎和孟毅都是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忠实服膺者，他们的创作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反映到编纂文学大系上，自然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取舍作品的标尺。”（同上，页 80）。 在苗秀编的《理论集》中，赵戎发表了以下评论： 1. 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学论 2. 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 3. 苗秀论 4. 絮絮论 5. 韦晕论 6. 略论侨民文艺 7. 问题的开脱 8. 论铁戈底诗 9. 论夏霖的小说 10. "年代和青春"论 11. 一支历史的火炬 （见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网页 http://linc.nus.edu.sg/record=b2203005）
4	赵戎文艺批评集	1975	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赵戎《赵戎文艺批评集》为《中教文艺丛书》之一，收录对苗秀（2 篇）、火浪、韦晕、梦平（2 篇）、君绍、柳北岸（2 篇）、叶苔痕、史可扬、冰谷的作品的评论共 12 篇及一篇后记。
5	新马华文文艺词典	1979 年 8 月	新加坡：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及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新马华文文艺词典》〈编辑凡例〉说明： 此辞典由赵戎编著，历时 7 年完成。 词典分成书名、人名、语词、其他 4 大部分，共 5 千多条目，从战前至 1977 年 12 月止。文言文著书不录。 书名 - 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诗文集、研究与评论、游记与传记、丛刊、杂著、翻译、非本地题材作品等。 人名 - 包括中国南来作家和本地作家。“凡中国南来作家与当地有文学因缘者，均录其

				人与书目，以示关系。……非谓其人即马华作家的，凡当地人出国深造或任职，尚未回来者。其在外出版作品均录，以存鸿爪。” 语词 - 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二百多著作中辑条而成，几占全书一半，“以为研究新马作家修辞遣字及解析之用。亦可从中窥知星马华文文艺底独特性之一面。” 其他 - 文艺团体、纯文艺或综合性刊物、副刊及丛书。
6	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	2009	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	为赵戎在 1987 年已编好，排好版、还有亲笔写的封面书名和签名，生前嘱托于骆明的两册文稿之一，骆明在 20 多年后才翻查出来。（骆明〈那一口箱子 - 赵戎两册书发现的经过〉，赵戎《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新加坡文艺协会，页 1-4）。 除骆明的〈那一口箱子 - 赵戎两册书发现的经过〉外，共有 12 篇赵戎的新马华文学的文字及一篇〈后记〉。 NLB 索书号：RSING C810.9595 ZR
7	文艺月旦集	2009 年 9 月	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	同上，为托付于骆明的两册文稿之一。 NLB 索书号：RSING C810.9595 ZR

3. 他人对赵戎的评论

	作者 / 出处	评论	备注
1		书痴	
	赖伯疆〈我印象中的新华作家 - 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为嗜书如命的‘书痴’ 1. 生活不宽裕，却酷爱买书藏书 2. 阅读广泛，包括中外作品。如外国作家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高尔基、杰克·伦敦、史坦培克、雷马克的作品；不囿于文学作品，也阅读考古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的书籍。（页 37）	赵戎自言对于各家的文学作品，不论体裁，都没有偏见，且虚心拜读。对于英美法俄日的名家作品也尽量浏览。（赵戎〈文学生活底一页〉，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页 296-297。

2		为人	
2 a	赖伯疆〈我印象中的新华作家－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注重友情、富有善心、爱憎分明、刚正不阿的性情中人”（页 36）	
2 b	湖畔人〈想起了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忠厚、老实”，待人“持之以诚”， “他总是那么低调，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而我总觉得他像一座隐藏在一层薄雾中的山。”（页 64）	
2 c	骆明〈我与赵戎的一段来往－聊代编后话〉，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言而有信，准时交稿。邮寄来不及，还亲自送到。（页 299） 借阅书籍，看完即还。（页 300）	
2 d	谢克〈作品就是文凭〉，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谢克曾批评赵戎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赵戎编《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和《史料集》的作品编选有失公平。料想赵戎必暴跳如雷。但赵戎却认为这只是见仁见智的看法，处之泰然。（页 23）	
3		写作、编辑态度认真	
3 a	赖伯疆〈我印象中的新华作家－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马崙〈梅花香自苦寒来〉，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u>为写作而深入体验生活、认真观察</u> 1. 多次到笨珍龟咯，漫步长桥，观望渔村水屋，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环境特点。 2. 到吉兰丹的话毛生小镇去了解二战时期，英军在撤退前夕自己炸毁的铁桥孔道，以及当地人民与外界隔绝以后，如何生活等（页 37） 赵戎与苗秀、梦平从双兰港到新芭，体验荒野芭场的贫农生活。（页 109-113）	

3 b	君绍 <忆赵戎>, 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为编辑《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求证作者生平 为求证 <狮岛的春天> 作者君绍为何人, 以便编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中, 赵戎在南马北马来回寻找, 7 个月后才得以与君绍见面。(页 58-60)	
4		文学渊源	
	黄郁兰、王润华 <解开鲁迅小说遗传基因跨族群与语言‘生命之谜’: 从绍兴到东南亚>, 王润华、潘国驹主编《鲁迅在东南亚》(新加坡: 八方文艺创作室, 2017)。	<u>受中国新文学的影响</u> “新马战后的著名作家兼评论家赵戎 (1920-1998), 虽然在新加坡出生, 他的文学观完全受中国新文学的经典所支配, 他也不是最前线的鲁迅神话的发扬与捍卫者, 但他在经典化鲁迅的影响下, 也一样的处处以鲁迅为导师, 无时无刻不忘记引用鲁迅为典范, 引用他的话来加强自己的论据或作为引证。他的《论马华作家与作品》就很清楚看到鲁迅及中国新文学前期的经典如何支配着他。” (页 149)	赵戎卒于 1987 年, 非 1998 年。
5		文学创作观	
5 a	刘笔农 <自学成功的作家赵戎>, 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u>强调本土创作</u> 赵戎认为本地报章不应该转载外地作家的作品, 报章只需要介绍好的作品, 让读者去书店购买。本地的副刊应该用来培植本地作家。本地作家反映的是本地人的生活、思想、感情, 具本地的色彩、立场、认同感和爱国意识。(页 50)	赵戎认为 1931-1942 年的侨民文艺曾起很大的作用, 但随着客观现实的急激转变, 马华文艺有了新的任务。文艺“不是消遣品, 它是反映现实、暴露现实的。要是我们的文艺拿来反映几千里远的中国, 那简直是多余无谓的。”
5 b	赖伯疆 <赵戎小说初探及其他>, 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u>题材本土化</u> 认为赵戎的观点是“新马华文文艺取材于当地各民族的现实生活, 塑造各民族的任务形象, 创造新的民族风格, 旨在推动各民族社会向上发展、” (页 166)	赵戎 <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赵戎研究专集, 2000》, 页 205);

5 c	张宏 <试论赵戎小说的短篇小说>，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张长虹 <丹青妙笔话南洋 - 谈赵戎的长中篇小说 <在马六甲海峡>、<海恋>>，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u>强调现实主义</u> “赵戎的小说批判了社会的不良风气。……赵戎所处的社会是个拜金主义的社会。……赵戎一生都在默默工作，默默写作，在写作中完成精神的升华，用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完成对拜金主义的蔑视。”（页 138） “在马六甲海峡”的大半在 1955 年就发表过，在 1960 年完稿。“前后 5 年，新加坡的历史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续写时，赵戎对该部以反映战前与战时救亡运动为主的小说增加了不少部分新加坡社会风貌，表现了强烈的写实精神。”（页 126）	赵戎强调现实主义是马华文学的优良传统。（赵戎 <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文学论>，苗秀主编《理论集》《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3），页 27-32）。
5 d	赖伯疆 <赵戎小说初探及其他>，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u>文学应效忠本土</u> 赵戎明确地认识到，有许多公民，身上带有多多少少‘祖家’的意识。这‘祖家’意识一天不铲除，马来亚化的国家意识就一天不能成立。（页 172）	“一路走来秉承着现实主义传统的马华文艺作家们就是一百巴仙的效忠于当地的。……我们写的却是当地现实，不是效忠当地效忠谁？当然我们并非于一个人或一群人，而是效忠于国家社会，人民群众的。”赵戎 <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赵戎研究专集, 2000》，页 211）； 我们“必须抛弃华侨身份，成为当地公民，与各民族呼吸相关，忧戚与共，微个民族的利益而服务”（赵戎 <新马华文文学概论>，赵戎《新马华文文学思想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华文文艺协会，2009），页 3。

6		华人的双重身份	
	张长虹〈丹青妙笔话南洋 - 谈赵戎的长中篇小说〈在马六甲海峡〉、〈海恋〉〉，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潘亚墩〈擅长描绘南洋风情的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以《在马六甲海峡》说明南洋华人不但怀念故乡，也和当地人民团结一心；以《海恋》为例，南洋青年要用文艺来启迪渔民，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指出这两部小说显示了从侨民文学向新华文学的过渡痕迹。（页 133） 赵戎的《马六甲海峡》中在新加坡出生的华人的身上，体现出‘中国和新加坡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页 161） 《芭洋上》土生土长的华裔青年知识分子，自认是‘新加坡仔’，也是‘唐山’人，把中国人视为同胞。（页 161）	
7		肯定新加坡的青年	
	赖伯疆〈我印象中的新华作家 - 赵戎〉，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赵戎：“我曾研究过本地的知识青年，他们实在比香港的上海的以及各地的青年更热情、更勇敢、更进步。我将以能刻画他们为荣”（页 38）。	
8		作品以 1965 年为分界	
	张长虹〈新马华文作家赵戎论〉，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1965 年前，“赵戎的作品对现实的批判较明显，主要表现重大社会矛盾，即沦陷时期新加坡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及普通百姓对日军入侵，毁坏家园的仇恨和反抗。这类作品包括中篇小说《海恋》、《在马六甲海峡》及短篇小说《芭洋上》等。”（页 142） “建国之后，赵戎的态度由激进向客观转变，他的小说开始侧重表现新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其一，表现城市婚姻中的问题。…… 其次，反映工厂里存在的弊病。…… 再次，揭示了农村所隐藏的矛盾。…… 赵戎的创作视角也转向了令人	

		同情的女性和小人物身上。”（页 143-146）	
9		语言艺术	
9 a	黄涓《叶丽仪〈热带的音符、节奏与旋律——赵戎华语文学语言勘察〉》（联合早报 24. 6. 2019）	<u>赵戎的文学语言</u> “本书以赵戎的文学语言为研究重点，包括其本土化的语言观、语词的采撷、熔炼与创造、长短句、排句及语调的韵律，修辞手法的运用等，本书并阐释了赵戎文学语言的风格的形成及特征，分析赵戎文学语言的特色与不足，东南亚华文文学语言的长处与短处，并总结了对于推进今后新华及东南亚华文文学语言的看法。”	叶丽仪笔名丽茜，出版过散文集《我们三十岁了》。 https://www.zaobao.com.sg/news/fukan/books/story20190624-966854
9 b	张长虹〈新马华文作家赵戎论〉，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赖伯疆〈赵戎小说初探及其他〉，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u>语言富地方特色</u> “赵戎主张吸收、提炼方言，使之成为文艺的语言，并于创作上尽量利用方言，充分利用方言来表达人物个性。”（页 151）。 “当描绘人物的对话、行动时，赵戎很喜欢使用富有地方特色的方言、俚语，甚至行话、黑社会的话。他主张创作应该‘吸收方言艺术’。”（页 171）	赵戎《芭洋上》收录的〈古老石山〉，是完全用方言写的，不只是用于对话上。赵戎自言“我虽不是第一个用方言写小说，但能大胆地彻底去运用，只有我而已。”（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年简体字初版，页 94）。他认为方言有其特色，应在写作上鼓励使用。
1 0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编撰	
	朱文斌《对新马华文文学史撰写及其文学大系编纂之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总第 117 期。	<u>总结历史</u> 《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编撰者孟毅、周粲、苗秀、赵戎、钟祺等也是当时新马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家、诗人。他们自身就是创作者，自然也很熟悉战后新马文坛的历史，所以他们撰写的各集导论便也成了很好的历史总结，对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页 78） <u>对散文、戏剧的梳理精当</u> “赵戎所作的散文一集、散文二集和戏剧集的一篇导论对散文、戏剧的梳理可谓精当，较好地把握了这两种体裁的发展	

		脉络，尤其注重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述和总结。”（页 79） <u>编纂内容具现实主义精神</u> “苗秀、赵戎和孟毅都是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忠实服膺者，他们的创作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反映到编纂文学大系上，自然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取舍作品的标尺。”（页 80）	
1 1		精神影响后人	
	马崙〈梅花香自苦寒来〉，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马崙认为他之所以能完成他的 4 部作品：《马华写作人剪影》、《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新马文坛人物扫描》和《新马华文作者风采》，是受了赵戎编撰《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史料集》和《新马华文艺词典》的毅力的鼓舞。（页 115）	
1 2		缺点	
	张长虹〈新马华文作家赵戎论〉，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	张长虹认为赵戎的一些观点过激： 1. 赵戎认为“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手法，……违反了文学多样性的特征，而且，过分强调本土化，容易造成文学的孤立。” 2. 赵戎主张文学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先驱，应该负起先锋的指导作用，“但是，却有把文学与政治、新闻的功能混为一谈的弊端。” 3. “虽然赵戎提出应该学习中国现代文学，然而他却只侧重鼓吹革命文学理论，忽视吸收中国古典文学及其他文学流派的长处，显示了他视野的狭隘性。”（以上皆见页 152）	

赵戎 主要参考资料：

A. 赵戎的著作及编辑工作：见此附录中第 2 项

B. 其他资料：

1. 黄涓《叶丽仪〈热带的音符、节奏与旋律——赵戎华语文学语言勘察〉》，联合早报 24.6.2019。
2. 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0）。
3. 苗秀主编《理论集》《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3）。
4.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赵戎资料夹》（Call number: Chinese C810.092 ZRZ）（BRN: 84550525）。
5. 叶丽仪〈赵戎文学语言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1。
6. 叶丽仪《热带的音符、节奏与旋律－赵戎华语文学语言勘察》（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9），页 27。
7. 朱文斌《对新马华文文学史撰写及其文学大系编纂之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总第 117 期。

主要参考资料

I. 研究对象个人文集、合集（见附录 5-11）

II. 中文书目

1. 北华大学《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吉林:北华大学)第 11 卷 第 5 期(2010 年 10 月)。
2. 柏杨主编《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共五集: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史料)(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1982)。
3. 潮龙起《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7)第 3 期。
4. 陈鸿瑜《新加坡史》(增订版)(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2017)。
5. 陈华淑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四十年,1970-2010:构建跨世纪的文学景观》(新加坡:理想印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10)。
6. 陈家骏〈李汝琳〈漩涡〉语言研究〉,陈荣照主编《南洋学报》第 73 期,2019 年 9 月,页 65-82。
7. 陈文滨、苏永明《连士升史学初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8)第 4 期。
8. 陈育菴《南洋第一报人》(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
9.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4)。
10.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 1945-1959》(修订卷)(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11. 丁艾薇《论新加坡独立前的学生运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毕业论文。1999-2000。
12.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中下三册(新加坡:世界书局,1962)。
13.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前,共十册)(新加坡:世界书局,1970-1972)。
14.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共四册)(新加坡:世界书局,1979-1983)。

15. 方修《两径轩杂文》（新加坡：群岛文化社，1979）。
16. 方修《马华文学史补》（新加坡：春艺图书，1996）。
17. 方修《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99）。
18. 方修《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集》、《戏剧集》（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
19. 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6）。
20. 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下册）（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
21. 高凡《连士升传·文学述评》（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7）。
22. 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台北：联经出版社，2016）。
23. 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24. 郭惠芬〈新马新文学时起点的新界定：〈国民日报〉与〈益群报〉探析〉，《亚洲文化》第24期（2000年6月），页166-179。
25. 何炳彪、梁慧群主编《方修编著资料辑录》（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8）。
26. 黄惠龄、王烨主编《姚紫文学历程》（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11）。
27. 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增订版）（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28. 黄孟文〈新加坡华文小说的发展〉(Wong Meng Voon, “Chinese Fiction”), 见 Thumboo, Edwin. (General Editor), *The Fic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Unipress, 1993), pp. 283-306.
29. 黄孟文、徐迺翔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企业公司可联合出版，2002）。
30. 黄孟文〈新加坡华文文学简史〉，黄孟文《新华文学·世华文学，评论与史料选辑》（新加坡：云南园雅舍，2008）。
31. 赖伯疆《东南亚戏剧概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
32. 黎达材《杏影作品的启示》（新加坡：岛屿文化社，1993）。

33. 李光耀致〈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开幕词，见《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印，1990），页1。
34. 利亮时《陈六使与南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八方文化创作室，2012）。
35. 李廷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独立25年新华文学纪念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研究会，1990）。
36. 李有成〈绪论：离散与家国想像〉，李有成、张锦忠主编《离散与家国想像：文学与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晨文化，2010.06），页7-45。
37.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
38. 李元昆等编《李汝琳的生活和著作》（怀庐书屋（出版地不详），1984）。
39. 连亮思、连文思合编《连士升纪念文集》（南洋学会纪念文集第二集）（新加坡：南洋学会，1976）。
40. 连亮思、连文思编选《连士升文选》（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
41. 梁荣锦〈华文华语的发展〉，潘国驹主编《新加坡华社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页137。
42. 林锦主编《苗秀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1）。
43. 林清如总编辑《怡和世纪》第38期（2019年1月）（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2019）。
44. 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修订版》（新加坡：万里书局，1994）。
45. 林孝胜、张夏伟、柯木林、吴华、张清江、及李奕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4月）。
46. 林志强等编辑《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论文集》（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3）。
47. 刘笔农主编《姚紫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
48. 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集》（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49.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50. 刘宏、龙登高、武斌主编，游俊豪执行编辑《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第八卷 第二期（2016 年 12 月），（英国：诺丁汉大学华人移民研究中心，及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八方文化创作室）。Doi:10.1142/S1793724816000146。
51.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 / “华语语系文学”视野下的“新华文学”——以《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为中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2 期，总 215 期），页 4。
52. 刘秀珍〈姚紫小说文学语言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3。
53. 鲁虎《新马华人中国观之研究，1949-1965》（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及八方文艺创作室，2014）。
54. 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
55. 骆明主编《赵戎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0）。
56. 骆明主编《李汝琳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
57. 马夫之《作家作品研究》（评论集）（马来西亚：彩虹出版社，1996）。
58. 马洪林〈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1 期（上海：上海师范大学，1989）。
59. 南洋大学编〈南洋大学校史略〉，《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特刊》（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页 13。
60. 潘国驹策划，王润华、蔡志礼、许通元、李金生、曾繁靖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艺创作室，2015）。
61. 潘星华主编《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2014年华校校史展》（新加坡：华校校友联合会，2014）。
62. 彭丽儿主编〈历届理事名录〉，《世纪晋江，百载辉煌：新加坡晋江会馆百年庆，1918-2018》（新加坡：新加坡晋江会馆，2018），页A9。
63. 尚国文、赵守辉〈华语规范化的标准与路向——以新加坡华语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 年第 3 期。

64. 尚国文、周清海〈新加坡华语的语音与流变〉，《国际汉语学报》第7卷第1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学林出版社专题资料汇，2016）。
Doi:10.14095/b.cnki.jics.2016.01.021.
65. 史书美著，纪大伟译〈全球的文学，认可的机制〉，《清华学报》，2004年，34卷1号。
66. 史书美著，杨华庆译、蔡建鑫校订《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67.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
68. 苏清强《失落的霞影》（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10），页60。
69. 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3月初版，2005年1月二版），原载于《天风月刊》，1971年3月。
70. 唐青编著《新加坡华文教育》（华文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台北：华侨出版社出版，1964）。
71. 王纯强〈约莫是华人：“华侨”与海外华人的边缘化〉，《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九卷 第一期（2017年6月），页41-66。DOI: 10.1142/S1793724817000050.
72. 王德威《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页12。
73. 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新加坡经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14），页34。
74. 王德威〈序言〉，《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页11。
75. 王德威、高嘉谦、胡金伦编《华夷风：华语语系文学读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
76. 王赓武〈马华文学导论〉，赵戎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1）。
77. 王赓武〈再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刘宏、黄坚立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 - 王赓武教授论文集》（新加坡：八方出版社，2002年），页97-116。
78. 王赓武〈海外华人与作为中国人〉，《移民与兴起的中国》（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5），页185。

79. 王赓武〈终而复始：全球化的中国历史（傅斯年讲座 2005 之三）〉，《离乡别土-境外看中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页 78。
80.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之研究〉，《华人与中国 - 王赓武自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页 294-313。
81. 王赓武〈十九、二十世纪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与忠诚〉，刘宏、龙登高、武斌主编，游俊豪执行编辑《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八卷 第二期（2016 年 12 月），（英国：诺丁汉大学华人移民研究中心，及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八方文化创作室，2016），页 1 - 12。Doi:10.1142/S1793724816000146。
82.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1989。
83. 王连美、赖燕鸿、林臻主编的《杏影 - 他不会寂寞》（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2009）。
84. 王润华〈论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阶段与方向简史〉，《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4），页 3-17。
85. 王润华、蔡志礼、许通元、李金生、曾繁靖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五十年》（新加坡：八方文艺创作室，2015）。
86. 王天夫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八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 12 月）。
87. 谢克《新加坡华文文艺》（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6）。
88. 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华文研究会，1990）。
89. 新加坡立法议院议案卷 1956 年第 53 号《解散〈中学联〉白皮书》（译本，出版社及日期不详，新加坡：星洲文联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90.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编辑《华中毕业刊：1950》（新加坡：1950 年华侨中学高初中毕业刊联合编委会，1950）。
91.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编辑《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金禧纪念特刊：1919-1969》（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1969）。
92.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李星可资料夹》（Call number: Chinese C810.092 L XK）（BRN: 12536319）

93.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苗秀资料夹》(Call number: Chinese C810.092 MXZ)
(BRN: 12535866)
94.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赵戎资料夹》(Call number: Chinese C810.092 ZRZ)
(BRN: 84550525)
95. 新加坡文艺协会编《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大系》(共 4 册: 小说上下二册、诗歌、散文)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96. 新社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编纂, 李廷辉总编辑《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
《理论集》(苗秀编); 第二集: 《小说一集》(孟毅编); 第三集: 《小说二集》
(苗秀编); 第四集: 《散文一集》(赵戎编); 第五集: 《散文二集》(赵戎编);
第六集: 《诗歌》(周粲编); 第七集: 《剧本集》(赵戎、苗秀、钟祺合编)及第八
集: 《史料集》(赵戎编)(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1971-1974)。
97. 许维贤《华语电影在后马来西亚: 土腔风格、华夷风与作者论》(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18)。
98. 许维贤《重绘华语语系版图: 冷战前后新马华语电影文化生产》(香港: 香港大学出版
社, 2018)。
99. 严飞〈历史、社会与历史社会学〉, 王天夫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八辑(北京: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 页 6。
100. 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新加坡: 青年书局, 2007)。
101. 杨明慧〈华语语系研究及其对母语观念的重塑 - 石静远教授公开演讲概述〉, 《华人研究
国际学报》第 7 卷第 1 期(2015 年 6 月)。
102. 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 南洋商报, 1982)。
103. 杨松年《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新加坡: 教育出版社, 2000), 页 12。
104. 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
方文化企业公司, 2001)。
105. 杨松年主编《从选集看历史 - 新马新诗选析, 1919-1965》(新加坡: 创意圈工作室,
2003)。
106. 叶丽仪〈赵戎文学语言研究〉, 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2011。

107. 叶丽仪《热带的音符、节奏与旋律－赵戎华语文学语言勘察》（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公司，2019），页 27。
108. 叶钟铃《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
109. 游俊豪《移民轨迹与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110. 游俊豪著，卢婷、谢文君、刘燕玲译《广东与离散华人：侨乡景观的嬗变》（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6）。
111.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戏剧》（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与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
112. 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2011）。
113. 张松建《后殖民时代的文学政治：新马文学六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7）。
114. 张松建《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中国新诗研究》，2019 年讲堂课大纲：文学史作为方法（3 月 29 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4 月 5 日）。
115. 赵守辉〈“汉语拼音”在新加坡的实践—历史与现状〉，《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1 卷 第 5 期（2010 年 10 月）。
116. 郑嘉怡《连士升与新马华人文化》，新加坡国大中文系，2002/2003 荣誉学位论文。
117. 周聿娥《东南亚华文教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
118. 周清海〈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
119. 周维介〈华文成为英校科目的历史进程〉，林清如总编辑《怡和世纪》第 38 期（2019 年 1 月）（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2019），页 72-74。
120. 朱崇科《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
121. 朱崇科〈再论华语语系（文学）话语〉，《扬子江评论》，2014 年第 1 期》，页 16。
122. 朱建颂〈方言和文学〉，《方言与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23. 朱文斌《对新马华文文学史撰写及其文学大系编纂之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4 期，总第 117 期，页 78-79。

III. 英文书目

1. Allen, Kieran. *Weber, Max: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hapter 5: Methodology*. pp 68-80. (Pluto Press, 2004). DOI: 10.2307/j.ctt18fs592.
2. Anderson, Benedict. Introduction. Chapters 3 & 7, i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Verso, 1991).
3. Basch, Linda., Glick Schiller, Nina., Szanton Blanc, Cristina.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7.
4. Ben-Rafael, Eliezer. "Diaspora". *Current Sociology Review* 61, nos.5-6 (2013): p.849. Doi: 10.1177/0011392113480371.
5. Benton, Gregor and Liu Hong eds. *Diasporic Chinese Ventures: the Life and Work of Wang Gungwu*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6. Benwell, B. and Stokoe, E. *Discourse and Identit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Butler, Kim D. "Defining Diaspora, Refining a Discourse",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10, no. 2 (2001): p.204. Doi:10.1353/dsp.2011.0014.
8. Chan Daniel. "Chapter 1: Challenges facing th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n Delombera Negga, Monika Szirmai, Daniel Chan, *Language Policy, Ideology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a Globalised World: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PLIDAM 2014 Conference on "Policy and ideology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ors and discourses"* (Archives Contemporaries, 2018), pp.4-25.
9.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10. Chew Swee Kee. *Report of the All Party Committee of the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on Chinese Education*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ingapore, 1956).
11. Chief Statistician,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1984/85*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1985).
12. Chief Statistician,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Yearbook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1987*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ingapore, 1987).

13. Chow, Rey.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thinking a Fiel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 Chua, S.C.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57*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The Government Printer, 1964).
15. Clammer, John R. *The Ambiguity of Identity: Ethnicity Maintenance and Change Among the Straits Chinese Community of Malay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9).
16. Clifford, James.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no. 3 (1994), p.317.
17. Cohen, Robi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niversity London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7).
18. Cohen, Robin. "Diaspora",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 6, 2015, pp.353-356.
19. Doraisamy, T.R.. Gwee Wee Hian, Joseph Doray, K.M Waldhau and Zahoor Ahmad, *150 years of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TTC Publication Board,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Paterson Road, Singapore, 1969) .
20. Gabriel, Sharmani Patricia. "'Migrations of Chineseness': in conversation with Ien Ang",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12, Number 1, 2011 .
21.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rd (ed.) ,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90).
22. Hara, Fujio. *Malayan Chinese and China: Conversion in identity consciousness, 1945-1957* (NUS Press, 2003).
23. Hong Lysa and Huang Jianli. *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 Singapore and Its Pasts*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24. Jones, LeRoi. *Black Music* (New York, Quill, 1967).
25. Kenny, Kevin. "What is diaspora? –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p 2013).
26. Lee Kuan Yew. *My Lifelong Challenge: Singapore's Bilingual Journey* (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2012).
27.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traits Times Press, 2013).
28. Malvezin, Laurent. "The Problems with (Chinese) Diaspora: An Interview with Wang Gungwu", in Gregor Benton and Hong Liu eds., *Diasporic Chinese Ventures: the Life and Work of Wang Gungwu*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29. McKeown, Adam.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8, No.2, May 1999, pp.306-337.
30. McNair, J.F.A. *Miscellaneous numerical returns [and] Straits Settlements population [for the year] 1871* [microform] (Singapore : [s.n.], 1871)),
31. Merewether, E. M. Esq. *Census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1* (Singapore: Th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2).
32. Pakir, A. Education and In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The Ca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Singapore. In J.Tan, S.Gopinathan and W.K.Ho (eds.),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 Book of Readings*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1997), pp.54-74.
33. Portellii, Alessandro. *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 and other stories: Form and Meaning in Oral Histor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34. Portes, Alejandro; Guarnizo, Luis E. and Landolt, Patricia.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2, Issue 2, (January 1999), pp.217-237.
35. Purcell, Victor. "The Dual Nationalit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di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1, Issue 4, (October 1955), pp.344-354.
36. Roth, Guenther and Weber, Max. "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7, No. 3, (Special Issue: History and Sociology) (Sep., 1976) (Published by Wiley on behalf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pp. 306-318. DOI: 10.2307/589618.
37. Safran, William.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 Volume 1, Number 1, Spring 199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38. Safran, William. "What and Where Is Diaspora?: Definitions, Analytical Boundaries, and Research Agendas" In *Between Dispersion and Belonging: Global Approaches to Diaspora in Practice*, edited by Chowdhury Amitava and Akenson Donald Harman (Montreal; Kingston; London; Chicag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39. Saw Swee Hock. "Population Trends in Singapore, 1819-1967",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Vol.10, No.1, Singapore Commemorative Issue 1819-1969 (Singapo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969).
40. Saw Swee-Hock. *Singapore Population in Transi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0).
41. Saw Swee Hock. *The Population of Singapore* (Third Edi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2).

42. 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Calif.;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43. Shih Shu-mei. "Introduction –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 p.3.
44.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Singapor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1941 -1984)*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Information Division 新加坡文化部资料组编, 1984).
45. Suryadinata, Leo eds.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ASEAN States: Bibliographical Essay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9).
46. Tan Chee Beng.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 in M. Jocelyn Armstrong, R. Warwick Armstrong and Kent Mulliner eds., *Chinese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Identities,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Curzon Press, 2001), pp.201-236.
47. Tan Chee Beng.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Language, Nationality and Identity", in 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Selected Essays*, Vol. I, Chapter 3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48. Thumboo, Edwin et al. eds. *Anthology of ASEAN Literatures: The Poetr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The ASEAN Committee on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Singapore National Printers Pte. Ltd.,1985) .
49. Thumboo, Edwin (General Editor). *The Fic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Unipress,1993).
50. Tölölyan, Khachig. Stateless Power and the Political Agency of Diasporas: An Armenian case Studies, In Gloria Totoricaguena ed., *Opportunity Structures in Diaspora Relations: Comparisons in Contemporary Multilevel Politics of Diaspora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Center for Basque Studies (Navada,2007), pp.215-234.
51.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in Daedalus, Vol.120, No.2, Spring, 1991, pp.1-32.
52. Turnbull, C. Mary.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 - 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53. 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 Wignesan, *Bunga Ema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of Malaysian Literature,1930-1963* (Kuala Lumpur: Blond/Rayirath (Raybooks) Publications, 1964).
54. Wang Gungwu. "A Note on the Origins of Hua-ch'iao" ,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Kuala Lumpur: Heinen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1981).

55.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1981).
56.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ennifer W. Cushman and Wang Gu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It was first presented in June 1985 at the symposium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II" held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Canberra.
57. Wang Gungwu. "Patterns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imes Academic Press, Singapore, 1991).
58.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as Immigrants and Settlers: Singapore,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59. Wang Gungwu.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Writings in Malaya", *Community and Nation –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Australia: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 Unwin, 1992).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 Wignesan, *Bunga Ema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of Malaysian Literature, 1930-1963* (Kuala Lumpur: Blond/Rayirath (Raybooks) Publications, 1964).
60. Wang Gungwu. "Sojourning: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Southeast Asia", in Anthony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in association with Allen and Unwin, 1996).
61. Wang Gungwu. "Chineseness: The Dilemmas of Place and Practice",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p.182-199.
62. Wang Gungwu.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in *Don't Leave Home: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1), pp.87-118.
63. Wang Gungwu. "The Statu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 Wang Ling-Chi &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 Selected Essays Vol.1*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64. Wang Gungwu. "Within and Without: Chinese Writers Overseas", in Ng Chin-keong and Tan Chee-Beng (ed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Vol 1, No.1, May 2005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15.
65. Wang Ling-chi & Wang Gungwu eds., *The Chinese Diaspora*, Vol I & II (Times Media Private Limited, 2003).
66. Wetherell, Margaret. "Introduction – The field of Identity Studies", in Wetherell, M and Mohanty, C.T.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Identities* (Los Angeles, Sage, 2010).

67. Yeo Kim Wah.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1945-1955* (Singapore: NUS Press, 1973).
68.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69. Yi-Fu Tuan, *Preface,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70. Yow Cheun Hoe. "Global Capitalism and Diaspora in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Era", *Cross Cultural Studies* 12(2) (December 2008).
71. Zhang Zhixiong.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 Untold Story of Conflict and Change* (Singapore: [Publisher not identified], 2016).

IV. 电子资源

1.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
<https://www.99csw.com/book/1400/38196.htm>。阅览日期：1. 1. 2022.
2. 察客<下午察：《丑陋的中国人》应‘功成身退’？>，发布于新加坡联合早报《即使·中国》2021 年 11 月 19 日，2021 年 11 月 20 日更新。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11119-1215151>。阅览日期：1. 1. 2022。
3. 费孝通〈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 年 第 1 期。
<http://oa.shxyj.org/UploadFile/20130926008/2015-09-12/Issue/yt4kfkfb.pdf>。阅览日期：4. 10. 2019.
4. 郭振羽《文化中华的多元和开放》，参远见华人精英论坛 9. 11. 2016 发文，
http://gvlf.com.tw/article_content_6253.html (原文刊载于《亚洲周刊》2015 年 8 月 16 日，页 39-40)。阅览日期：4. 10. 2018.
5. 海南日报 25. 4. 2018 刊载《琼侨革命先驱陈平：回乡报国尽此心》（作者：蔡葩、周梦旎；责任编辑：杜汶纹）提《琼潮报》为陈平于 1946 年所创办。见
http://www.81.cn/jsdj/2018-04/25/content_8014787_2.htm。阅览日期：4. 10. 2019。
6. 李国樑《在种族暴动中浴血诞生的新加坡》，<https://www.yan.sg/yuxuedansheng/>（新加坡眼 30. 6. 2014）。阅览日期：25. 10. 2019.

7. 李里峰《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一个比较的反思》，（学海，2018，第三期），页 4.
<http://www.sss.net.cn/106004/67141.aspx>. 阅览日期：4. 10. 2019.
8. 梁秉赋《李星可其人其言》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讲座，23. 8. 2008.
[文化沙龙人物点评系列 4/2008- 《李星可其人其言》 |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wordpress.com\)](#). 阅览日期：10. 7. 2019.
9.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南洋大学大事记〉，根据《纪念南洋大学创校 25 周年特刊》“南洋大学大事纪要”编录，<https://www.nandazhan.com/lishi/nlijiao.htm>. 阅览日期：9. 11. 2020.
10. 柯木林（Kua Bak Lim）博客〈豆腐街昔日繁华今何在，2013 年 7 月 8 日〉。
http://kuabaklim.blogspot.com/2013/07/blog-post_4066.html. 阅览日期：4. 10. 2019.
11. 陶恒生《南洋的“京派文人”连士升——兼述连、陶两家七十年情谊》，
<http://www.hstao.com/Lien.pdf>，页 12。阅览日期：10. 8. 2019.
12.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简称 NLB）的 NewspaperSG 以微型胶卷（Microfilm）保存李星可被捕的报章资料。NLB Microfilm Reel 6731（新加坡南洋商报及 Singapore Herald 1971 年 5 月 3 日头版），NLB Microfilm Reel NL6766（马来文报 Berita Harian 1971 年 5 月 3 日头版）。阅览日期：3. 7. 2019.
13. 新加坡文献馆，《南洋大学大事记》，新加坡文献馆网页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2839>（23. 12. 2018）。阅览日期：24. 10. 2019.
14. 新加坡文献馆，《福利巴士工潮》，新加坡文献馆网页
<https://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1>（19. 2. 2008）。阅览日期：25. 10. 2019.
15. 杨焄〈不知嫉忌为何事，但瞩光明益向前：关于郑侃嫔〉
<https://new.qq.com/rain/a/20221005A02OVO00>. 阅览日期：10. 5. 2022.
16. 颜清煌《南洋大学历史系的助教职位》。<http://www.nandazhan.com/huiyi/nydx1963.htm>.
阅览日期：28. 8. 2019.
17. 张曦娜〈从华语语系文学观点看新加坡华文文学——访史书美〉，《联合早报》，2016 年 5 月 24 日，<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160524-620695>. 阅览日期：25. 12. 2019.
18. 朱崇科〈华语语系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学术研究》2010 年第 7 期，页 146-152.
<https://chn.oversea.cnki.net/remotexs.ntu.edu.sg/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XSXJ201007024&dbcode=CJFD&dbname=CJFD2010&v=>. 阅览日期：28. 10. 2021.

19. Barthes, Rol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https://newlearningonline.com/literacies/chapter-8/roland-barthes-on-the-death-of-the-author>. Accessed 4.4.2020.
20. Bokamba, Eyamba G. Code-mixing, Language Variation and Linguistic Theory: Evidence from Bantu Languages. *Lingua* Vol 76, 1988, pp.21–62. Accessed 23.5.2021.
21. CEIC 《中国企业家投融资俱乐部》网页 <https://www.ceicdata.com/zh-hans/indicator/singapore/gdp-per-capita>. 浏览日期: 25. 10. 2019.
22. Chow, Rey.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Boundary 2*, Vol. 25, No.3, Autumn, 1998, pp. 1-24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303586>. Accessed: 21.3.2017.
23. Gilroy, Paul. "Nationalism, History and Ethnic Absolutism." *History Workshop*, no. 30. (1990), p.116. www.jstor.org/stable/4289014. Accessed 3.7. 2020.
24. Gilroy, Paul. "Diaspora." *Paragraph* 17, no. 3 (1994), pp.207-212. www.jstor.org/stable/43263438. Accessed 3.7. 2020.
25. Johnson, Nadja C. "Global journeys: from transnationalism to diaspo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Studies* 4, no. 1 (2012): 41+. *Gale Academic OneFile*. <http://link.gale.com/apps/doc/A359999192/AONE?u=nantecun&sid=AONE&xid=e6fb78dc>. Accessed 7.6.2020.
26. Kenny, Kevin. "What is diaspora?" –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Published online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p 2013. Doi:10.1093/actrade/9780199858583.001.0001. Accessed 1.8.2018.
27. Lee Kuan Yew. "In his own words: English for trade; mother tongue to preserve identity" Speech delivered on November 24, 2004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published on 27.3.201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in-his-own-words-english-for-trade-mother-tongue-to-preserve-identity>. Accessed 17.12.2019.
28. *National Archives, Literary Scene in Singapore (Chinese)*, NLB Accession Number 003126. [LUO Mei @ Mrs Lien Shih Sheng 罗梅@连士升夫人; LIEN Lian Sze; LIEN Qiao Si; LIEN Wen Sze; LIEN Siao Sze](#). All 8 Reel/Discs: 11 Mar 2007, Reel/Discs 1 & 2; 18 Mar 2007, Reel/Discs 3; 25 Mar 2007, Reel/Disc 4; 25 Mar 2007, Reel/Disc 5; 1 Apr 2007, Reel/Disc 6 & 7; 22 Apr 2007, Reel/Disc 8. Accessed 9.8.2019.
29. *National Archives,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65-1985*, NLB Accession Number 000772. [LY Singko 李星可](#). All 9 Reels/Discs: 15 Apr 1987, Reel/Discs 1 -4; 16 Apr 1987, Reels/Discs 5 -9. Accessed 9.8.2019.

30. Sridhar, S. & Sridhar, K. The Syntax and Psycholinguistics of Bilingual Code-switching.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34, 1980, pp.407–416. DOI: 10.1037/h0081105. Accessed 23 .5. 2021.

31. *The Straits Times*, [Citizenship offer to 250,000 aliens](#) (1957, August 27). p. 7. Retrieved from NewspaperSG. Article also available on Microfilm Reel NL001810. Accessed 9.8.2019.

32. Tölölyan, Khachig. “Armenian Diaspora”, Tölölyan, Khachig. Armenian Diaspora Entry in *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 2005, p.36. Academia: [Tölölyan Khachig-ArmenianDiaspora-v2.pdf](#). Accessed 22.5.2022.

33. Tölölyan, Khachig. “Diaspora Studies - Past, Present and Promise”, IMI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55, April 2012, p.8. Academia: [Tölölyan WP55 Diaspora studies-with-cover-page-v2.pdf](#). Accessed 22.5.2022.

34. Zhang Zhixiong.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n Untold Story of Conflict and Change* (E-book, Smashwords Edition, 12.2.2015).